

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专项经费资助

北方民族考古

The Archaeology of Northern Ethnicity

第2辑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科学出版社

本书出版受到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支持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的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专项经费资助

北方民族考古

THE ARCHAEOLOGY OF NORTHERN ETHNICITY

第2辑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编辑的《北方民族考古》系列学术集刊。本辑收录了考古发掘报告、研究论文、碑铭考释和书评等共29篇。内容涉及旧石器时代至历史时期中国北方及边疆地区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城址、岩画和重要出土文物等诸多方面。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和艺术学研究者及高校考古、历史专业的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方民族考古. 第2辑 /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8

ISBN 978-7-03-045770-7

Ⅰ. ①北…　Ⅱ. ①中…②中…　Ⅲ. ①古代民族—民族考古学—中国—文集　Ⅳ. ①K8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5242号

责任编辑：王琳玮 / 责任校对：邹慧卿

责任印制：徐晓晨/ 封面设计：张　放

科 学 出 版 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厚诚则铭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 8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 × 1092　1/16

2015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3　1/4　插页：4

字数：552 000

定价：108.00元

目　　录

考古与科技

书评与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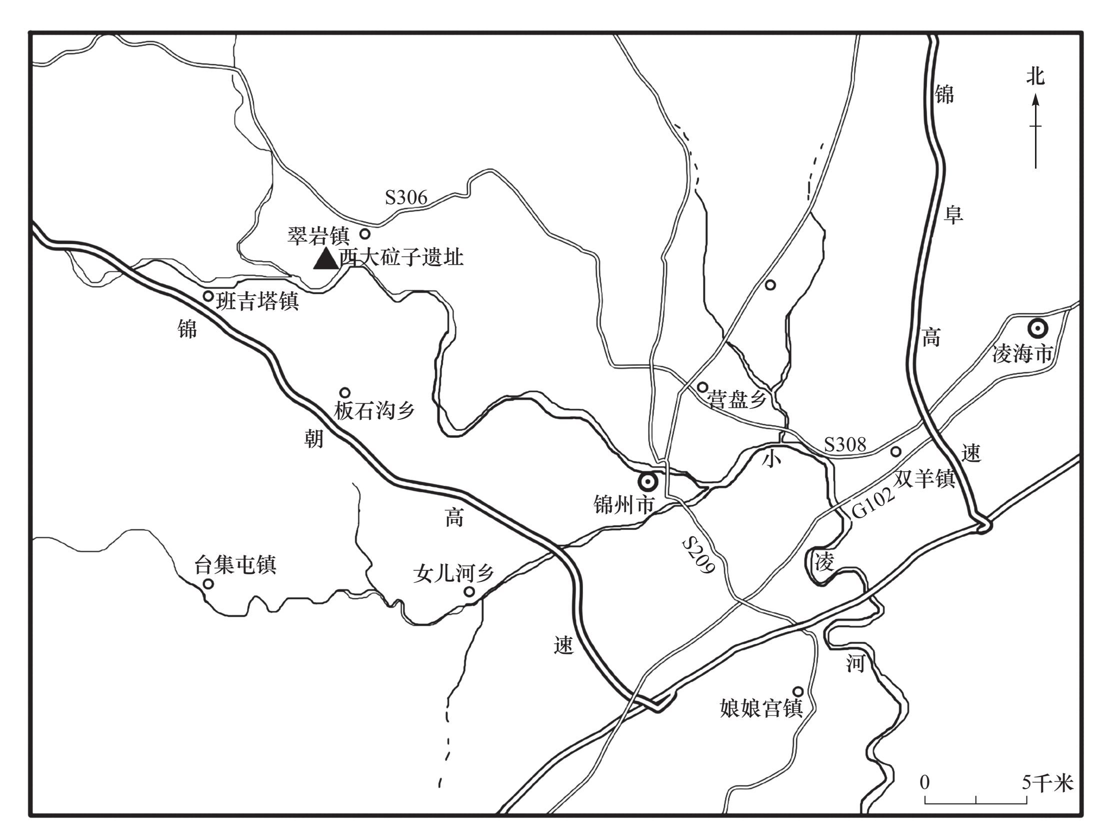
彩版目录

辽宁锦州西大砬子遗址发掘简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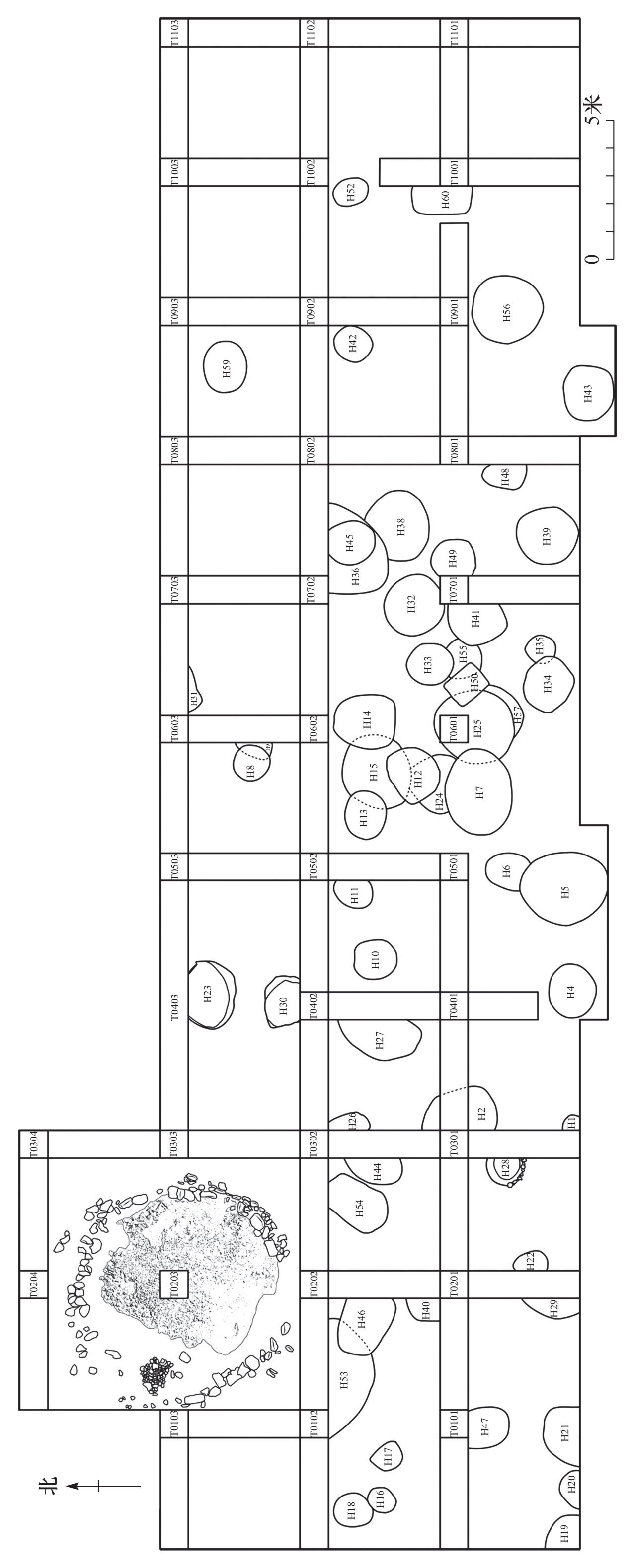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　锦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
（1. 沈阳，110003；2. 锦州，121001）

2012 年 6 月，为配合辽宁省锦州市锦凌水库淹没区动迁工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锦州西大砬子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西大砬子遗址位于辽宁省锦州凌海市翠岩镇金宝岭屯西约 400 米的一处河岸台地上（图一）。中心地理坐标：北纬 41° 11′ 17.39″、东经 120° 55′ 10.34″，海拔 63 米。小凌河从遗址西侧和南侧环绕而过，遗址西行约 1 千米为二道河和小凌河汇合处。遗址东西宽约 80 米，南北长约 100 米，面积约 8000 平方米。

本次发掘区域位于遗址中心，发掘面积约 1000 平方米（图二）。发掘灰坑 60 座，



图一　西大砬子遗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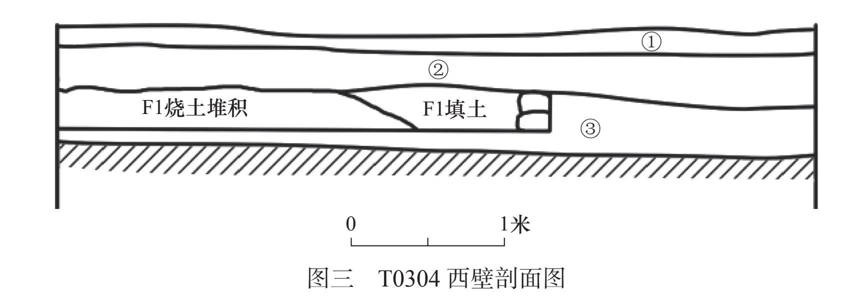


图二　西大砬子遗址探方总平面图

房址 1 座；出土大量的陶器、玉石器和骨器，总计有 200 余件。经过发掘及初步整理研究，可以确定该遗址是一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人类居住址。现将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介绍如下。

一、地层堆积

遗址地层堆积比较简单，可分为三层，第 1 层在整个发掘区均有分布，第 2 层分布于发掘区北侧，第 3 层仅分布于发掘区西北角。以 T0303 西壁为例（图三）。



图三　T0304 西壁剖面图

第 1 层：厚约 10～25 厘米，黄褐色，土质疏松，植物根系发达，出土少量夹砂红褐陶片，为耕土层。灰坑多开口于此层下。

第 2 层：厚约 5～35 厘米，灰褐色，土质较疏松，包含有大量夹砂红褐、灰褐陶片及石器。

第 3 层：厚约 10～20 厘米，土色呈灰黑色，土质较黏，包含有少量夹砂红褐陶、灰褐陶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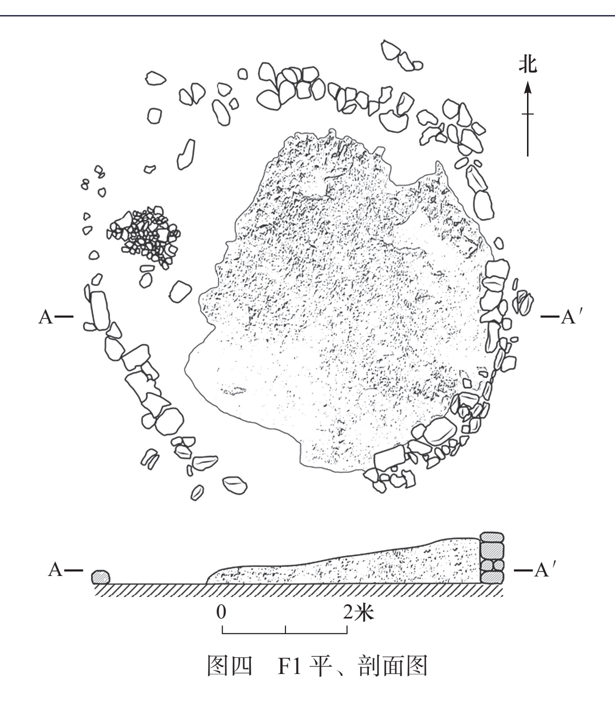
二、遗　　迹

1. 房址

F1　开口于第 2 层下，打破第 3 层。房址平面大致呈圆形，门向正南，由石块垒筑作为墙体，现仅存部分墙基。房址内堆积有大量的红烧土块和泥质墙皮，推测毁于火灾。房址内西侧靠近墙体发现有用小石块垒筑的半圆形台，台周围未发现灶或用火的痕迹，推测其用途是搁置杂物（图四）。房址直径约 6 米，墙体保存最高处约 50 厘米，红烧土块范围直径约 5 米，厚 0.4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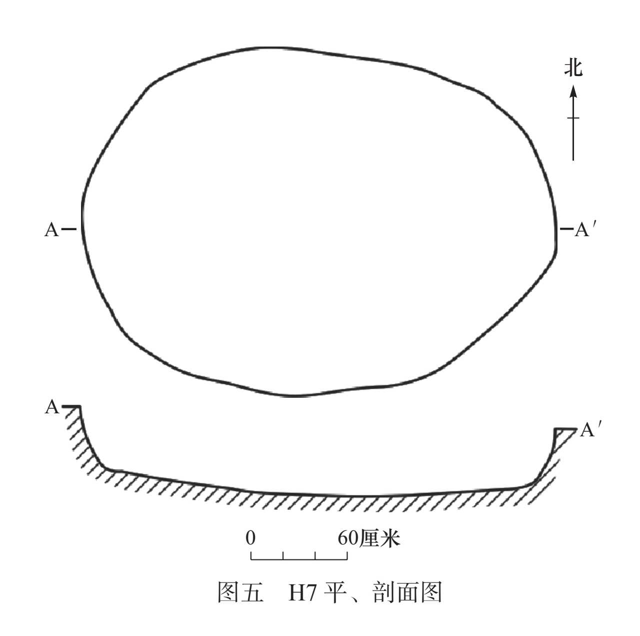
2. 灰坑

灰坑平面形状主要有圆形和椭圆形，少数为长方形、不规则形；坑底多数为平底或圜底。



图四　F1 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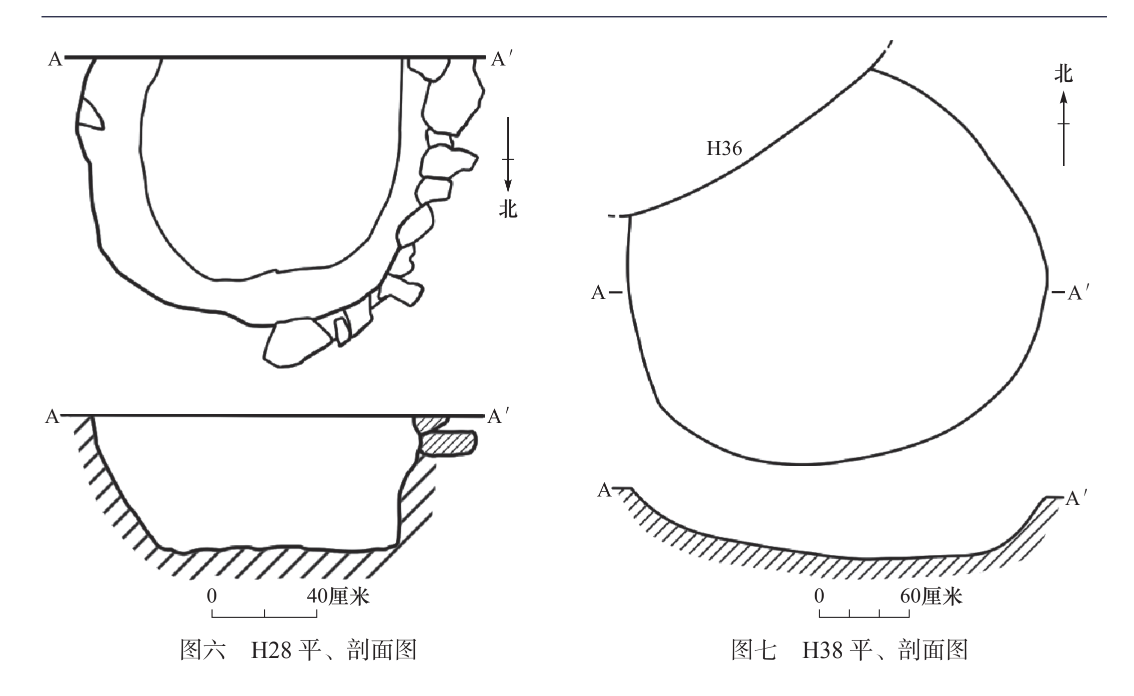
H7　开口于第 1 层下，打破 H24、H25 及生土。平面呈椭圆形，斜直壁，平底。口长径 304 厘米，短径 216 厘米，深 42 厘米（图五）。



图五　H7 平、剖面图

H28　开口于第 1 层下，打破第 2、3 层。已发掘部分平面呈半圆形，弧壁，部分坑壁用石块砌筑，平底。直径 140 厘米，深 50 厘米（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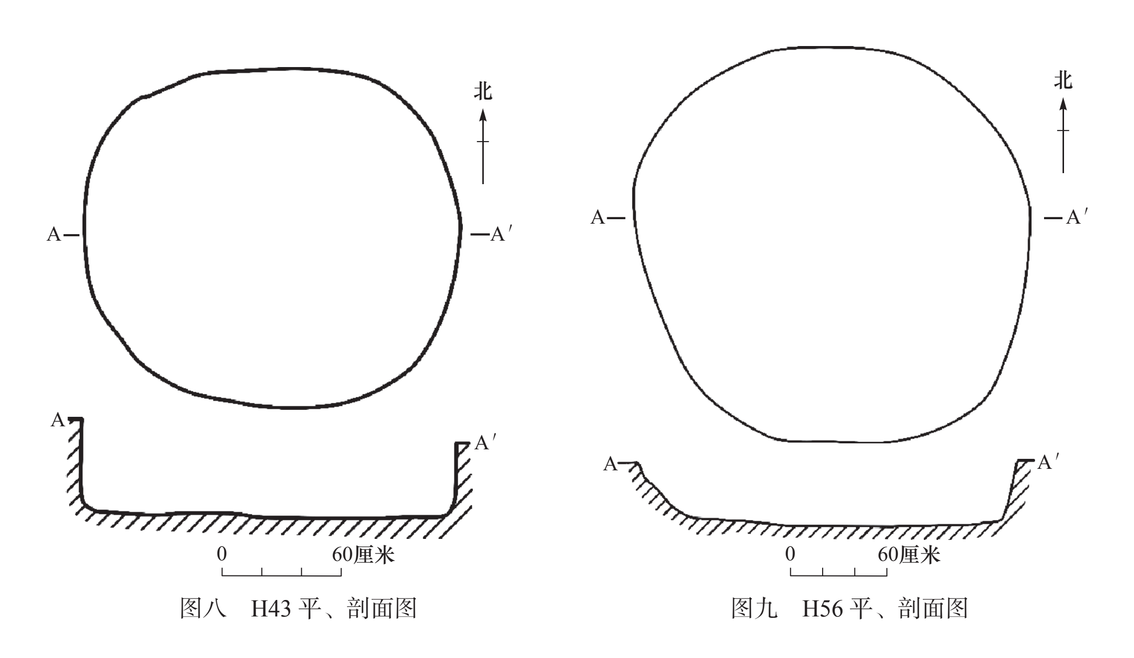
H38　开口于第 1 层下，被 H36 打破。打破 H45。平面呈圆形，弧壁，圜底。直径 260 厘米，深 40 厘米（图七）。



图六　H28平、剖面图　　图七　H38平、剖面图

H43　开口于第1层下，打破生土。平面呈圆形，直壁，平底。直径190厘米，深48厘米（图八）。

H56　开口于第1层下，打破生土。平面呈圆形，斜壁，平底。直径262厘米，深41厘米（图九）。



图八　H43平、剖面图　　图九　H56平、剖面图

三、遗　　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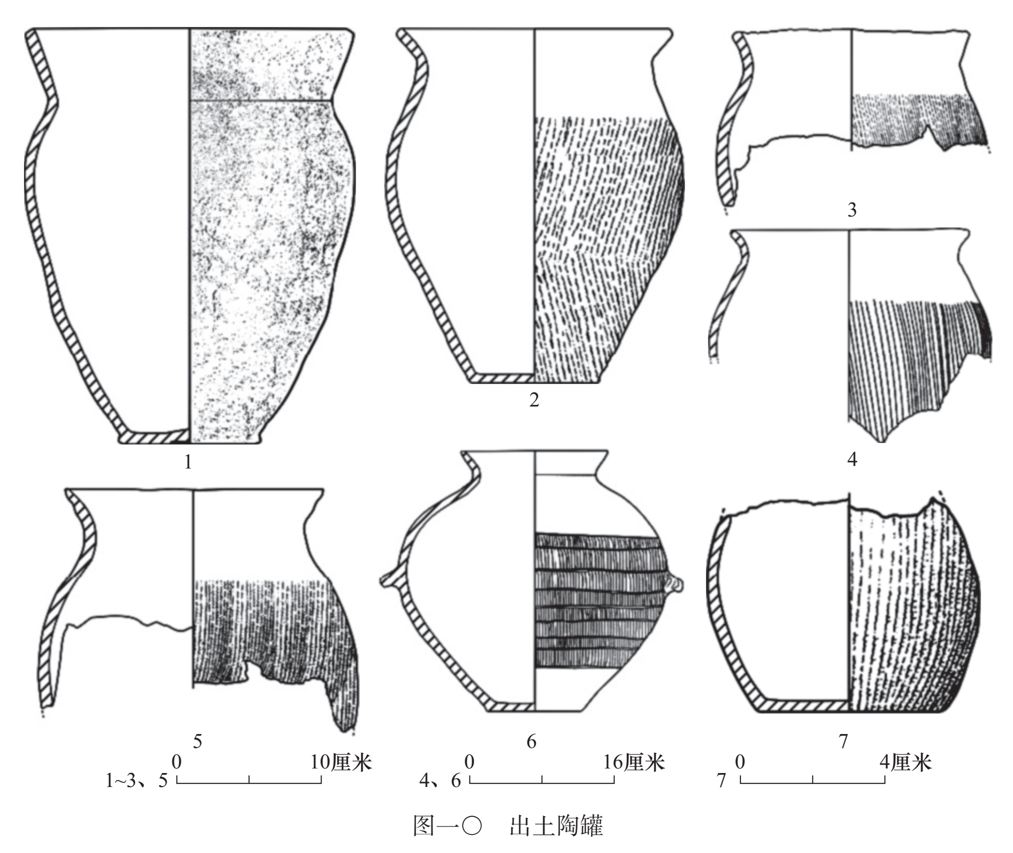
1. 陶器

陶系以夹砂红褐和灰褐陶为主，少量泥质灰陶、泥质红陶，另有极少彩绘陶。器表纹饰以粗绳纹最多，其次有附加堆纹、弦纹等。弦纹和绳纹常饰于同一器物上，在弦纹带之间拍印竖行绳纹，且绳纹经抹平处理。多数器物唇外侧加厚或回泥呈叠唇状，且在叠唇上饰抹平绳纹。器形可见有罐、鬲、甗、尊、瓮、钵、豆、盆、兽足、环、饼、纺轮、网坠、玩具、祖形器等。

罐　7件。据腹部形态可分二型。

A型　2件，弧腹。H23 ：1，夹砂灰褐陶。方唇，敞口，矮领，束颈，溜肩，平底微内凹。素面。口径22.7厘米，底径9.3厘米，高28.9厘米，壁厚0.8厘米（图一〇，1）。H43 ：1，夹砂灰褐陶。圆唇，侈口，矮领，溜肩，平底。周身饰粗绳纹。口径19.2厘米，底径8.8厘米，高24.7厘米，壁厚0.7厘米（图一〇，2）。

B型　5件，鼓腹。据有无器耳分两个亚型。



图一〇　出土陶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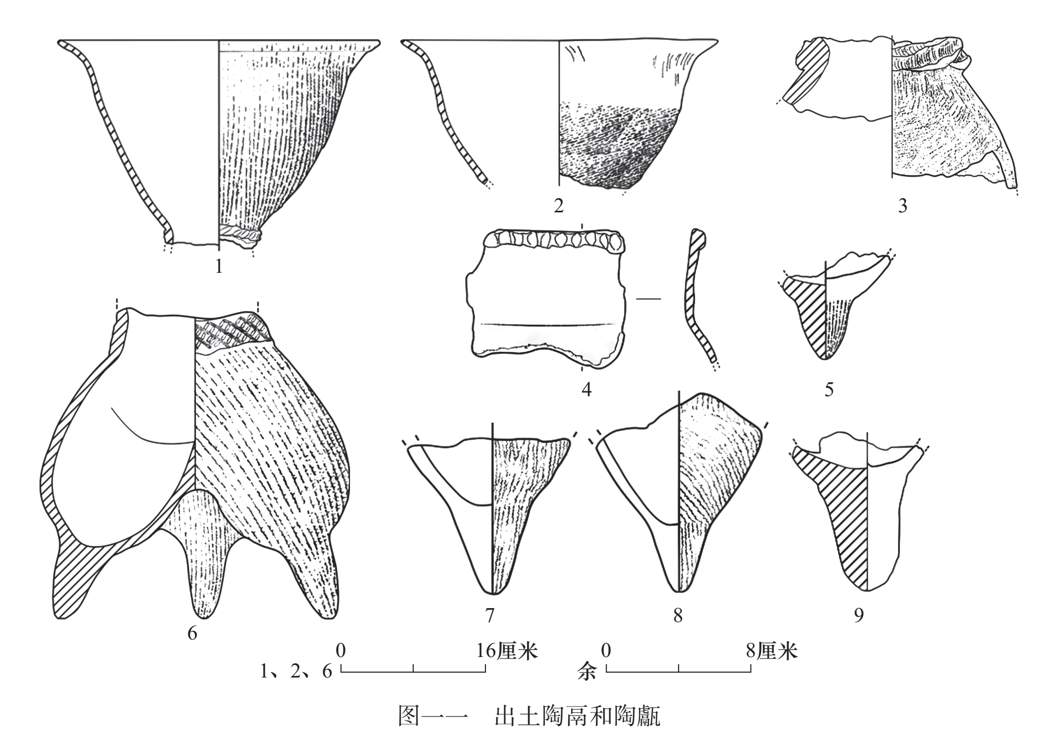
1. H23 ：1　2. H43 ：1　3. H25 ：1　4. H52 ：1　5. H56 ：1　6. H33 ：2　7. H60 ：1

Ba 型　4 件，无耳。H25 ：1，夹砂红褐陶。圆唇，侈口，矮领，溜肩，下腹部及底部残。上腹部饰绳纹。口径 15.7 厘米，残高 12.1 厘米，厚 0.9 厘米（图一〇，3）。H52 ：1，夹砂红褐陶。圆唇，侈口，矮领，溜肩，腹部及底部残。腹部饰绳纹。口径 26.4 厘米，残高 23.7 厘米，壁厚 0.8 厘米（图一〇，4）。H56 ：1，夹砂红褐陶。尖唇，侈口，矮领，溜肩，下腹部及底部残，肩部及上腹部饰绳纹。口径 17.9 厘米，残高 16.9 厘米，壁厚 0.7 厘米（图一〇，5）。H60 ：1，夹砂红褐陶。口部残，平底。周身饰细绳纹，个体较小。底径 5.1 厘米，残高 5.9 厘米，壁厚 0.3 厘米（图一〇，7）。

Bb 型　1 件，有耳。H33 ：2，夹砂红褐陶。圆唇，敞口，矮领，束颈，圆肩，下腹斜收为平底。肩部和上腹部饰数道凹弦纹，弦纹之间施篮纹。上腹部贴附两个鸡冠状鋬手。口径 16.4 厘米，底径 10.6 厘米，高 29 厘米，最大腹径位于中部 30.2 厘米，壁厚 0.6～1 厘米（图一〇，6）。

鬲　未发现完整器，见有大量鬲足。

T1003 ②：1，陶鬲口沿。夹砂红褐陶。圆唇，直口，高领，领下部残，口沿外侧饰一周按窝附加堆纹。残高 8.7 厘米，厚 0.5 厘米（图一一，4）。T0302 ②：1，夹砂红褐陶。饰绳纹。残高 6.9 厘米（图一一，5）。H46 ：1，夹砂红褐陶，饰粗绳纹，残高 9.8 厘米（图一一，7）。H27 ：3，夹砂灰褐陶，饰粗绳纹，残高 12.4 厘米（图一一，8）H43 ：2，夹砂黄褐陶。素面。残高 10.2 厘米（图一一，9）。



图一一　出土陶鬲和陶甗

1～3、6. 甗（H5 ：1、H10 ：1、H33 ：4、T0303 ②：2）4、5、7～9. 鬲（T1003 ②：1、T0302 ②：1、H46 ：1、H27 ：3、H43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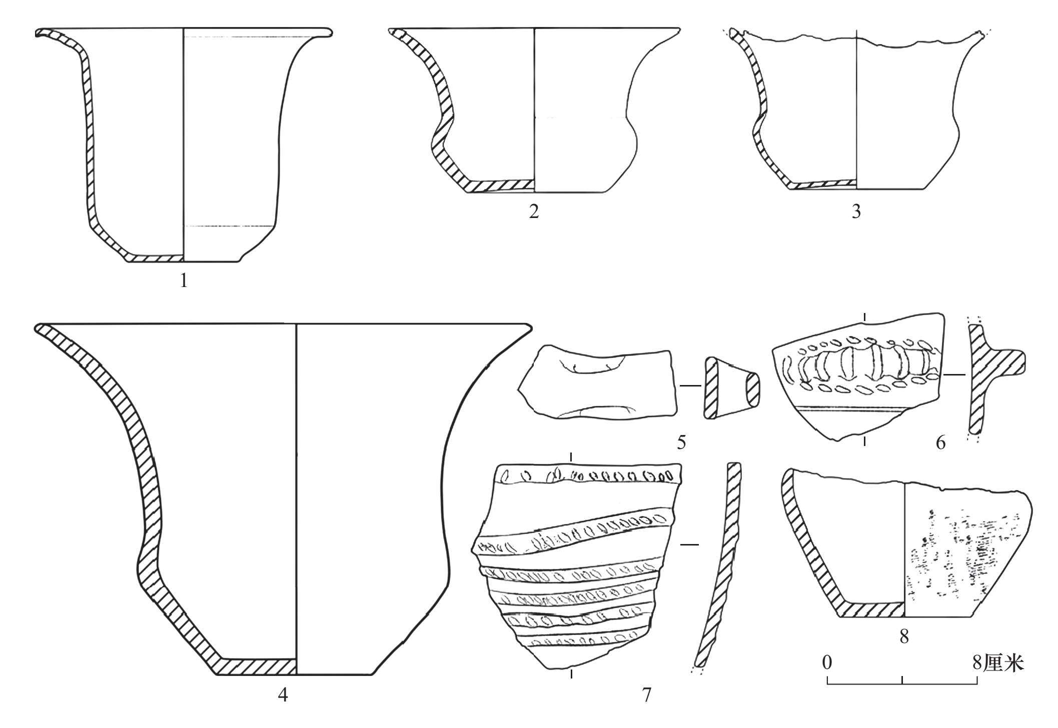
甗　4件。仅保存有盆部或鬲部，未发现完整者。

H5 ：1，夹砂红褐陶。圆唇，唇外侧加厚，敞口，弧腹，袋足部分残。唇外侧及腹部饰绳纹，甗腰饰一周按窝附加堆纹。口径37.9厘米，残高24.5厘米，壁厚0.6厘米（图一一，1）。H10 ：1，夹砂红褐陶。尖唇，斜沿，敞口，弧腹，底部残。腹部饰绳纹，沿外侧饰稀疏绳纹。口径37.4厘米，残高17.6厘米，壁厚0.6厘米（图一一，2）。T0303②：2，夹砂灰褐陶。仅存鬲部，袋足较大，下有粗壮的实足根。甗腰饰一周按窝附加堆纹，袋足与实足根饰绳纹。残高23厘米，壁厚约0.7厘米（图一一，6）。H33 ：4，夹砂红褐陶。仅存袋足部分。甗腰饰附加堆纹，袋足饰绳纹。残高12.3厘米，厚1.1厘米（图一一，3）。

尊　4件。据腹部形态可分为三型。

A型　1件，直腹。H5 ：2，泥质灰陶。敞口，卷沿，圆唇，近底部折收。口径16.2厘米，底径6.1厘米，高12.9厘米，壁厚0.3厘米（图一二，1）。

B型　2件，大敞口，束颈，腹缓折处外凸。H5 ：8，泥质灰陶。口部残，平底内凹。素面磨光。底径7.4厘米，残高8.8厘米，壁厚约0.4厘米（图一二，3）。H5 ：9，泥质灰陶。尖唇，平底内凹。素面磨光。口径16厘米，底径7.5厘米，高9厘米，壁厚约0.5厘米（图一二，2）。



图一二　出土陶器

1～4.尊（H5 ：2、H5 ：9、H5 ：8、H7 ：2）　5、6.器耳（H5 ：12、H60 ：4）　7、8.（T0503②：1、H2 ：1）

C型 1件，腹部缓折。H7 ：2，泥质红陶，大敞口，圆唇，颈腹间曲收，平底。素面。口径26.5厘米，底径8.6厘米，高19.4厘米，壁厚约0.8厘米（图一二，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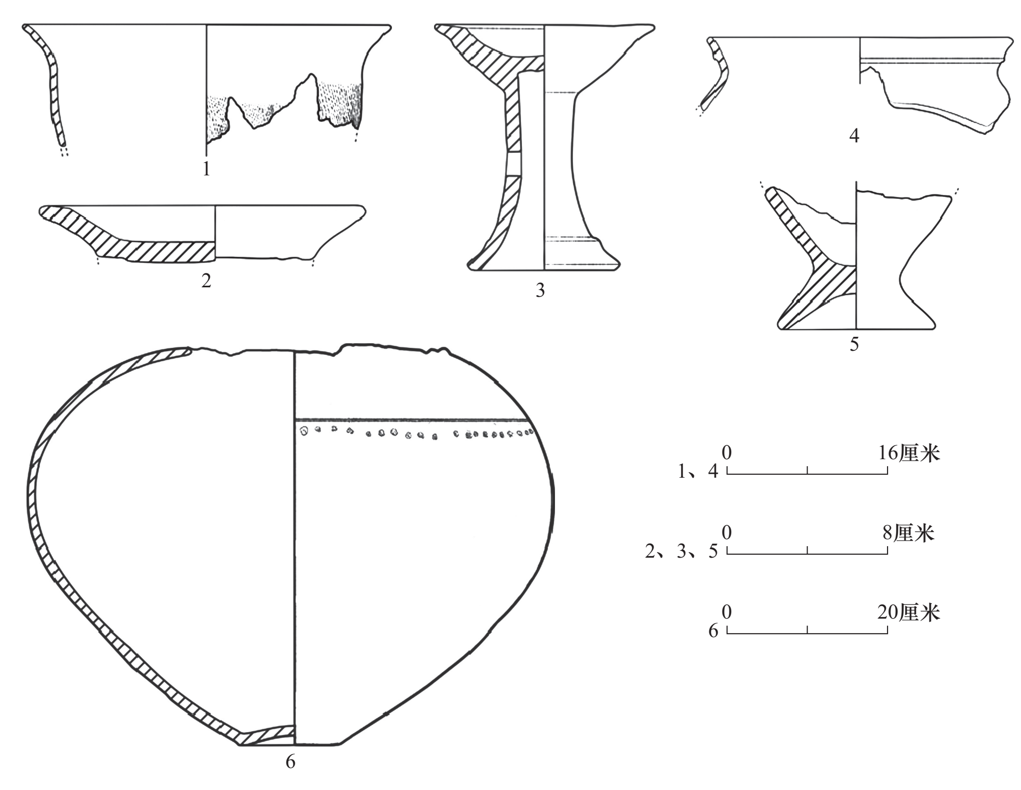
器耳 数量较多，据形态可分为二型。

A型 桥形耳，数量较少。H5 ：12，泥质灰陶。残长8.7厘米，宽4厘米，厚0.5厘米（图一二，5）。

B型 鸡冠耳，数量较多。H60 ：4，泥质黄褐陶。残长9.4厘米，宽7.1厘米，厚3.2厘米（图一二，6）。

瓮 2件。

H5 ：7，陶瓮口沿。泥质红陶。方唇，敞口，矮领，束颈，颈部以下残。素面。口径30.3厘米，残高9.8厘米，壁厚0.6厘米（图一三，4）。H23 ：2，夹砂灰褐陶。口部残，鼓肩，弧腹，平底内凹。肩部饰一周凹弦纹和按窝纹。残高50.4厘米，底径12.9厘米，壁厚1厘米（图一三，6）。



图一三 出土陶器

1. 盆（H5 ：4） 2、3、5. 豆（H112 ：3、H5 ：6、H27 ：1） 4、6. 瓮（H5 ：7、H23 ：2）

钵 2件。

T0503②：1，泥质灰褐陶。方唇，直口。腹部饰六道按窝附加堆纹。残高11.3厘米，厚0.8厘米（图一二，7）。H2 ：1，夹砂灰褐陶。尖唇，敛口，弧腹，平底。腹部

饰杂乱的粗绳纹。口径 12.4 厘米，底径 7.2 厘米，高 8.1 厘米，厚 0.6 厘米（图一二，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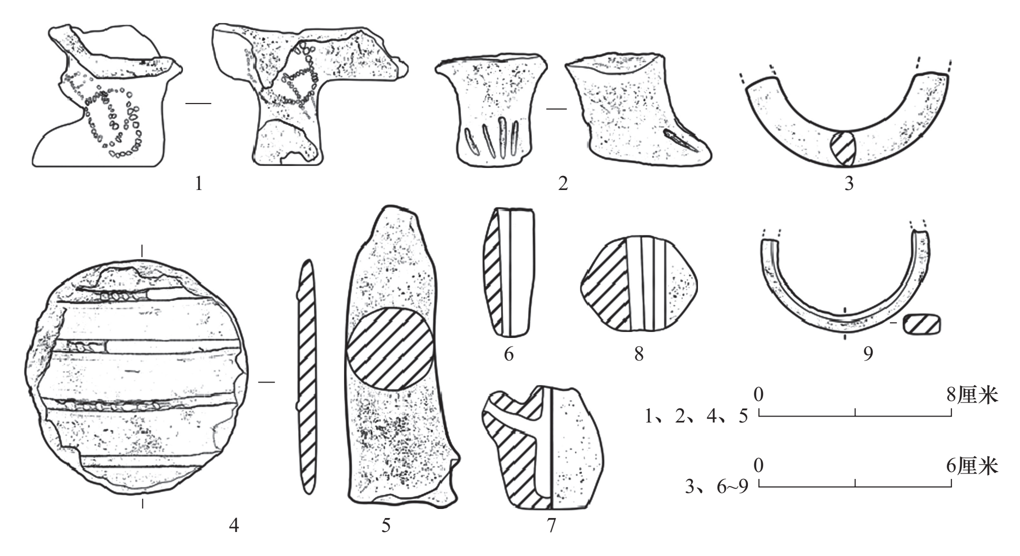
豆　3 件。据豆盘形态可分为二型。

A 型　2 件，浅盘状。H12 ：3，泥质灰褐陶。圆唇，斜沿，浅腹，豆柄残。口径 16.6 厘米，残高 2.8 厘米，厚 1 厘米（图一三，2）。H5 ：6，泥质黑褐陶。圆唇，斜沿，敞口，豆盘较浅呈覆钵状，高圈足，豆柄中部有对称的圆形穿孔。素面磨光。口径 11.2 厘米，底径 7.2 厘米，高 12.6 厘米，壁厚 0.6～1.5 厘米（图一三，3）。

B 型　1 件，深碗状。H27 ：1，夹砂红陶。矮圈足。素面。残高 7.3 厘米，圈足径 7.7 厘米，壁厚 0.5～1.3 厘米（图一三，5）。

盆　1 件。H5 ：4，夹砂灰褐陶。圆唇，敞口，腹及底部残。腹部饰绳纹。口径 37.5 厘米，残高 13.3 厘米，壁厚 0.8 厘米（图一三，1）。

兽足　2 件。H27 ：2，夹砂红陶。饰菱形篦纹。残高 5.9 厘米（图一四，1）。H60 ：3，夹砂红陶。足前做出分趾的凹槽。有红色彩绘。残高 4.7 厘米（图一四，2）。



图一四　出土陶器小件

1、2. 兽足（H27 ：2、H60 ：3）　3、9. 环（T0302 ②：2、H5 ：10）　4. 饼（H56 ：2）　5. 祖形器（T0403 ②：1）　6. 网坠（T0203 ③：3）　7. 玩具（T0301 ②：1）　8. 纺轮（H4 ：1）

环　2 件。T0302 ②：2，泥质红陶，截面呈卵圆形，残。外径约 6.8 厘米，内径约 4.4 厘米，环厚 1.2 厘米（图一四，3）。H5 ：10，泥质红陶。截面呈圆角长方形。环外侧壁施黑色彩绘，内侧可见陶胎。外径约 5.2 厘米，内径约 4.2 厘米，环厚 0.5 厘米，环宽 1.1 厘米（图一四，9）。

饼　1 件。H56 ：2，泥质灰陶。由陶器的腹部残片打磨而成，周边打制痕迹明显，正面有压花附加堆纹，部分纹饰已脱落。直径约 9.3～9.7 厘米，厚 0.7 厘米（图一四，4）。

纺轮　1 件。H4 ：1，泥质红陶。中间有两个穿孔。直径 3.7 厘米，高 2.9 厘米，

孔径分别为 0.5、0.3 厘米（图一四，8）。

网坠　1 件。T0203 ③ ：3，泥质灰陶。长 4 厘米，直径约 1.6 厘米，孔径 0.6 厘米（图一四，6）。

玩具　1 件。T0301 ② ：1，小陶壶。夹砂黄褐陶。高 3.8 厘米，底径 2.1 厘米，厚 1 厘米（图一四，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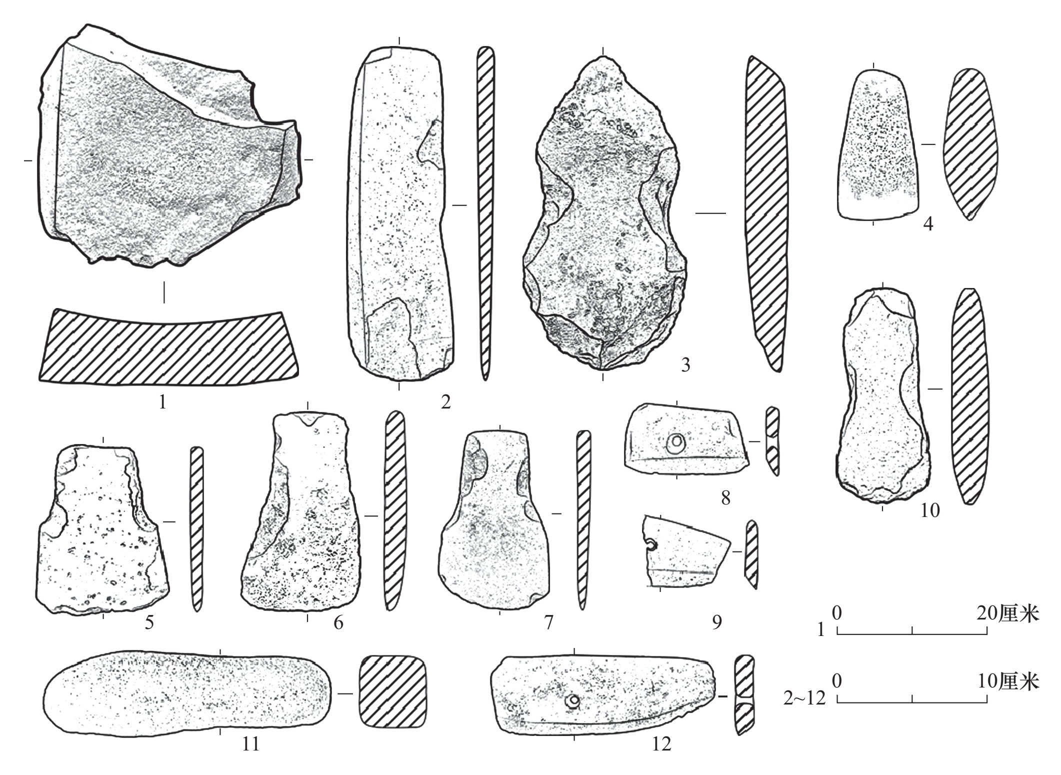
祖形器　1 件。T0403 ② ：1，泥质红陶。末端残。长 12.6 厘米，直径 3.6 厘米（图一四，5）。

2. 石器

磨制石器较多，打制者较少，石料多为砂岩，少数为页岩、石英。器形可辨有铲、斧、锄、凿、刀、磨棒、磨盘、饼、锤、球、镞、玉芯等。

铲　4 件，据肩部可分为二型。

A 型　2 件，无肩。H15 ：1，通体磨制。平背，无肩，弧刃。刃部有使用痕迹。长 22.7 厘米，宽 7.1 厘米，厚 1 厘米（图一五，2）。H60 ：2，通体磨制。平背，无肩，直刃。刃部有使用痕迹。长 13.6 厘米，宽 8.1 厘米，厚 1.3 厘米（图一五，6）。



图一五　出土石器

1. 磨盘（T0602 ③：1） 2、5～7. 铲（H15 ：1、H33 ：1、H60 ：2、H52 ：2） 3. 锄（H32 ：1） 4、10. 斧（H33 ：3、采：7） 8、9、12. 刀（H12 ：2、T0201 ②：1、H55 ：3） 11. 磨棒（H5 ：11）

B 型　2 件，有肩。H33 ： 1，通体磨制。平背，有肩，直刃。刃部有使用痕迹。长 11.7 厘米，宽 9.1 厘米，厚 0.8 厘米（图一五，5）。H52 ： 2，通体磨制。平背，有肩，弧刃。刃部有使用痕迹。长 12.1 厘米，宽 7.6 厘米，厚 0.8 厘米（图一五，7）。

斧　2 件。H33 ： 3，通体磨光。平顶，弧刃，侧边斜直。长 10.2 厘米，宽 5.4 厘米，厚 3.7 厘米（图一五，4）。采 ： 7，通体打制，局部磨光。平顶，弧刃，亚腰。长 14.7 厘米，宽 6.3 厘米，厚 2.5 厘米（图一五，10）。

锄　1 件。H32 ： 1，通体打制。尖顶，弧刃，亚腰。长 21.4 厘米，宽 11.1 厘米，厚 2.9 厘米（图一五，3）。

凿　2 件，据剖面形态可分为二型。

A 型　1 件，截面呈圆形。H7 ： 1，通体磨制。顶部残，双面直刃。残长 4.5 厘米，直径 2.1 厘米（图一六，8）。

B 型　1 件，截面呈长方形。H55 ： 2，通体磨制。平背，单面直刃直刃。侧边斜直。长 4 厘米，宽 2.6 厘米，厚 0.5 厘米（图一六，7）。

刀　3 件。H12 ： 2，通体磨制。梯形，直背，单面直刃。中间有一两面对钻的穿孔。长 8.4 厘米，宽 4.7 厘米，厚 0.9 厘米（图一五，8）。T0201 ② ： 1，通体磨制。残呈梯形，弧背，单面直刃。残有一两面对钻的穿孔。长 5.9 厘米，宽 4.7 厘米，厚 0.8 厘米（图一五，9）。H55 ： 3，通体磨制。长条形，直背，单面弧刃。有一两面对钻的穿孔。长 15.1 厘米，宽 5.5 厘米，厚 1.2 厘米（图一五，12）。

磨棒　1 件。H5 ： 11，通体磨制。长条形，截面呈圆角方形。长 19.6 厘米，宽 4.6 厘米（图一五，11）。

磨盘　1 件。T0602 ③ ： 1，磨制而成。残长 35.7 厘米，宽 32.4 厘米，厚 9.9 厘米（图一五，1）。

饼　1 件。H59 ： 2，打磨而成，周边打制痕迹明显，两侧面经磨制，一面较平整，一面呈丘状。直径约 7.7 厘米，厚 1.8 厘米（图一六，1）。

锤　1 件。T0304 ② ： 1，通体磨制。平顶，底部为椭圆形。体径 6.6 厘米，高 6.7 厘米（图一六，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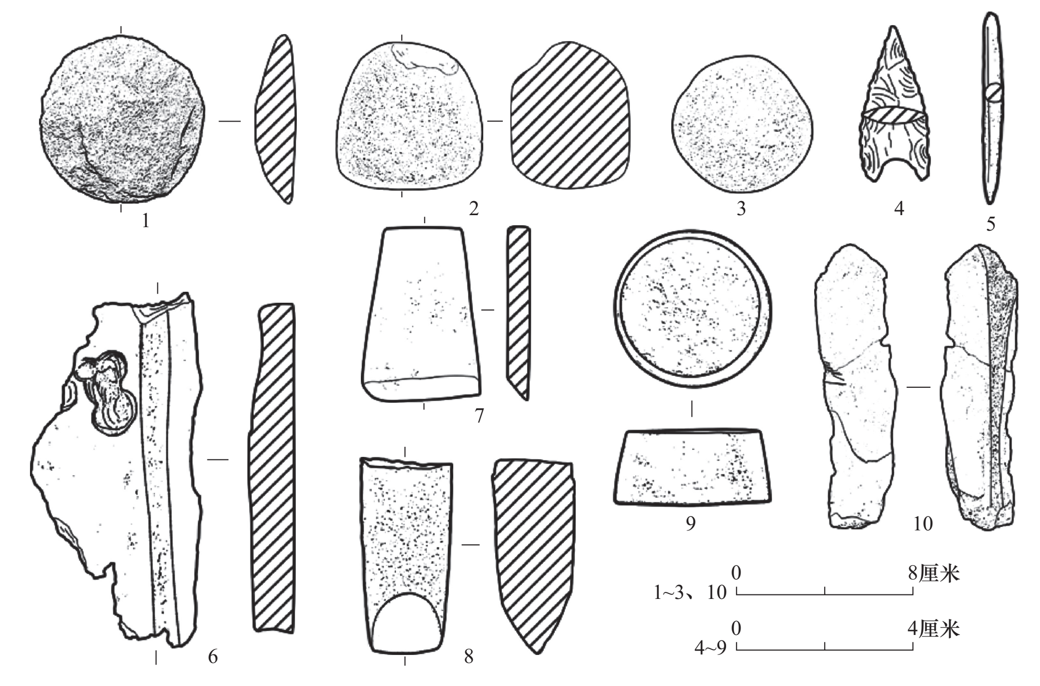
球　1 件。T1102 ② ： 1，磨制而成。直径约 6.4 厘米（图一六，3）。

镞　1 件。H12 ： 1，琢制。凹底。长 3.5 厘米，宽 1.6 厘米，厚 0.3 厘米（图一六，4）。

玉芯　1 件。H54 ： 1，通体磨制光滑。呈台柱体状。高 1.6 厘米，顶径 3.1 厘米，底径 3.6 厘米（图一六，9）。

3. 骨器

数量较少，主要由动物的肢骨打磨而成，可见有匕、针等。



图一六　出土石器和骨器

1. 石饼（H59 ：2） 2. 石锤（T0304 ②：1） 3. 石球（T1102 ②：1） 4. 石镞（H12 ：1） 5. 骨针（H59 ：1） 6. 卜骨（H60 ：5） 7、8. 石凿（H55 ：2、H7 ：1） 9. 玉芯（H54 ：1） 10. 骨匕（H52 ：3）

匕　1 件。H52 ：3，由大型哺乳动物的肋骨磨制而成。整体呈“圭”状，前端薄，末端厚。一侧边缘有切割痕迹。长 12.9 厘米，宽 3.4 厘米，厚 1.2 厘米（图一六，10）。

针　1 件。H59 ：1，由动物肢骨磨制而成。针鼻一端残。残长 4.4 厘米，直径 0.4 厘米（图一六，5）。

4. 其他

卜骨　1 件。H60 ：5，由大型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制成，制作方法是先去除肩胛骨背面的棱脊，然后将棱脊打磨平整再用作占卜。从钻孔看，有钻无凿，钻后个别灼烧，有在正面钻孔也有在背面钻孔，还有两面都有钻孔的，钻孔有大有小但都比较规整，残存 5 个钻孔。残长 8 厘米，宽 4 厘米，厚 1.1 厘米（图一六，6）。

四、结　　语

经过初步整理及与周边已发表材料的比对，确定西大砬子遗址为一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人类居住址。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广泛分布于辽西地区的青铜时代早期文化，其核心区域位于今赤峰、朝阳境内，年代从夏代中期至商代。小凌河流域以前所发掘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

址较少，见有锦西部集屯[1]、锦州前西山[2]等；临近的大凌河流域发掘遗址较多，有北票丰下[3]、北票康家屯[4]、义县向阳岭[5]、朝阳罗锅地[6]、建平水泉[7]、阜新平顶山[8]等。

以上已发掘并发表材料的遗址中，义县向阳岭和朝阳罗锅地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分期。义县向阳岭分为四期，其中一期和二期分属于夏代晚期和商代前期，即夏家店下层早期偏晚和晚期偏早阶段。朝阳罗锅地分为三期，一期属于夏家店下层早期，二期和三期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早晚两段。

西大砬子遗址出土陶器与上述两处遗址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较为接近，如西大砬子遗址的罐（H52 ∶ 1、H43 ∶ 1、H56 ∶ 1）、尊（H5 ∶ 2）与义县向阳岭第二期的罐（H220 ∶ 2、H212 ∶ 4、H200 ∶ 2）、尊（H212 ∶ 25）及朝阳罗锅地遗址第二期的尊（H21 ∶ 16）形制相近。由此推断遗址年代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偏早。

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西大砬子遗址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与赤峰、朝阳等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有所不同。其中以鬲最为明显，赤峰、朝阳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典型的尊形鬲在该遗址没有发现，该遗址发现的陶鬲口沿和鬲足均为鼓腹鬲个体。根据王立新先生《夏家店下层文化渊源刍论》[9]一文的研究，尊形鬲和鼓腹鬲同时存在于这一时期燕山南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大坨头文化中；但是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尊形鬲的比重远远超过鼓腹鬲；而在大坨头文化中恰好相反，呈现出鼓腹鬲较多，尊形鬲较少的局面。因此我们认为尊形鬲的缺失以及鼓腹鬲的数量较多，体现了燕山以南的大坨头文化对本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影响。此外夏家店下层文化常见的鼎和三足盘在该遗址也没有发现。以往已有学者指出，夏家店下层文化自早期以后开始逐步分化，东、西区的差别开始明显，其中小凌河流域及辽西走廊地区与大坨头类型关系更密切[10]。

由上可见，西大砬子遗址因其所处地理位置远离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心区，在商代早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开始衰落后，燕山以南的大坨头文化开始逐步影响这一地区。西大砬子所出土的遗物体现了两个考古学文化在该遗址的交集。

综上，西大砬子遗址的发掘对研究小凌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及燕山南北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附记：本次发掘领队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白宝玉，参加发掘人员有：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褚金刚、马红光，锦州市考古所崔蕾，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吕学明、张林虎、陈晓露及 2011 级历史系本科生及部分研究生。此次发掘得到锦州市考古所和凌海市文物管理所大力支持，于此一并致谢。

执笔：褚金刚（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
崔　蕾（锦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

注　释

［1］ 吉林大学考古系等．辽宁锦西部集屯古城址勘察与试掘报告［A］．考古学集刊（第11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130～153．
［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锦州前西山青铜时代遗址发掘简报［A］．辽宁省道路建设考古报告集［C］．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249～281．
［3］ 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辽宁省北票县丰下遗址1972年春发掘简报［J］．考古，1979（3）：197～210．
［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北票市康家屯城址发掘简报［J］．考古，2001（8）：31～44．
［5］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义县向阳岭青铜时代遗址发掘报告［A］．考古学集刊（第13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41～82．
［6］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罗锅地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A］．辽宁省道路建设考古报告集［C］．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95～163．
［7］ 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市博物馆．建平水泉遗址发掘简报［J］．辽海文物学刊，1986（2）：11～29．
［8］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阜新平顶山石城址发掘报告［J］．考古，1992（5）：399～417．
［9］ 王立新、齐晓光、夏保国．夏家店下层文化渊源刍论［J］．北方文物，1993（2）：5～16．
［10］ 华玉冰、张振军、杜守昌．朝阳罗锅地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的分期及相关问题［A］．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123～137．

The Excavation Report of The Xidalazi Site in Jinzhou Liaoni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 Liaoning Province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 Jinzhou

Abstract: During the month June 2012, Liaoning Provincial Institute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unearthed the Xidalazi Site. The excavation of the site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Xiaoling River Basin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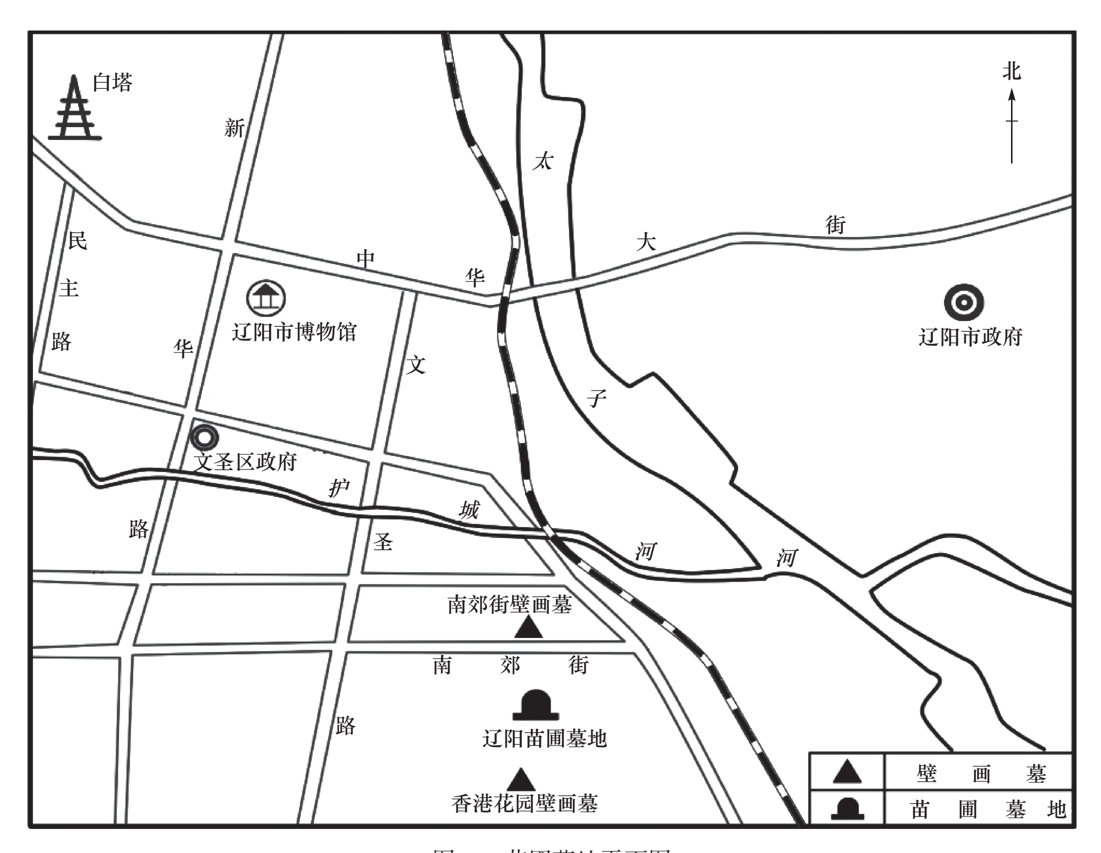
Key words: West Dalazi Site; West Dalazi Site; Cultural stage; Xiaoling River Basin

辽阳苗圃汉魏墓地纪年墓葬

李海波[1]　刘　潼[2]　徐沂蒙[3]

（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110003；2. 锦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锦州，121001；3. 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沈阳，110011）

苗圃墓地位于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原辽阳林业科学研究院苗圃院内，太子河西岸台地上，其西北距辽阳老城区约 2 千米（图一）。为配合当地政府进行土地开发，自 2008 年开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对苗圃院内的东南区和北区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共发掘墓葬 200 余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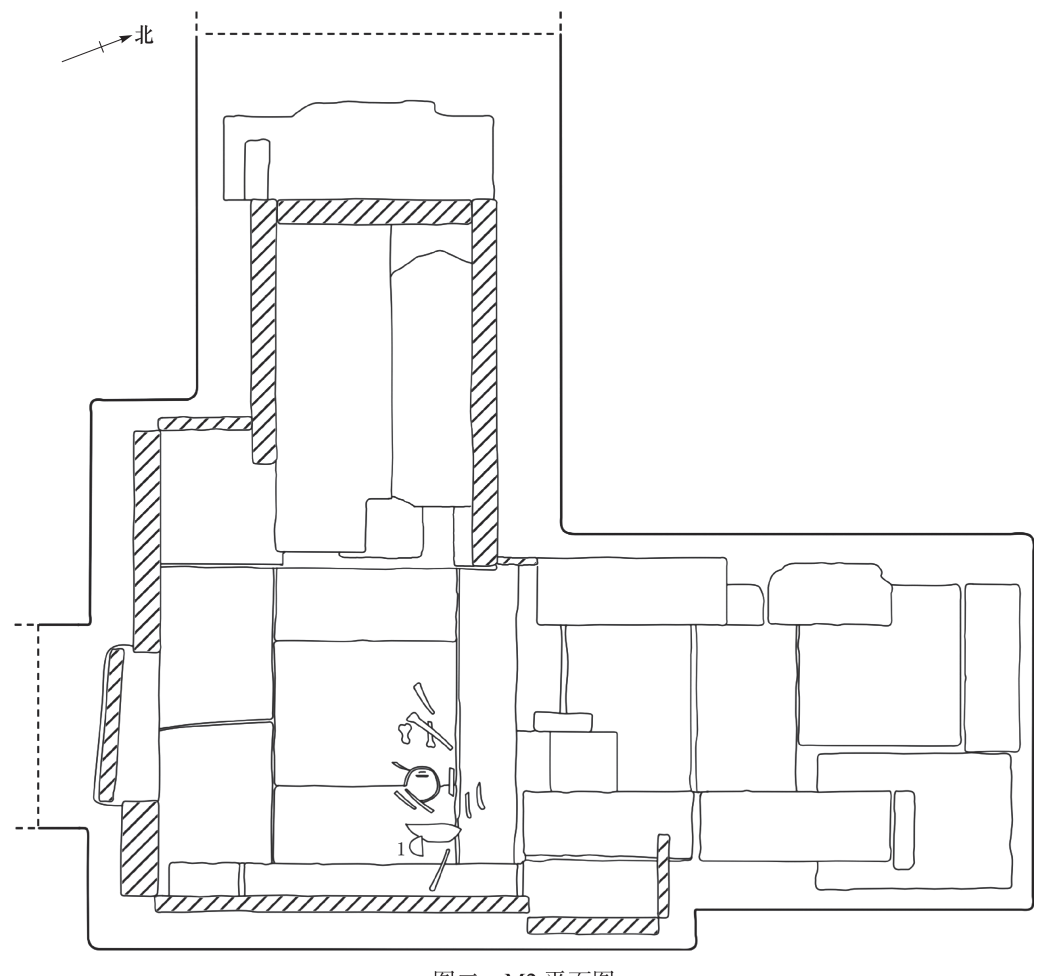


图一　苗圃墓地平面图

在 2014 年度的发掘工作中，清理了一座纪年壁画墓，编号为 2014LMM2，由于在墓室内发现石刻纪年文字、石刻图案及彩绘壁画，且其墓葬形制也比较特殊，故对其进行专门介绍。

一、墓葬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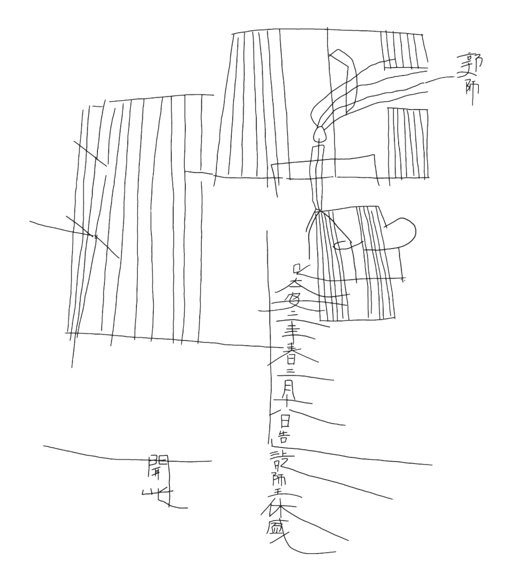
M2 为一座大型石板砌筑的多室石墓，遭盗掘破坏严重，墓顶、墓室后部石板基本不存。该墓由墓道、西室、中室、北室组成。墓道两条，斜坡状，分别位于中室南侧和西室西侧；西室长方形，长 2.56 米，宽 1.44 米，高 1.34 米；中室近正方形，南北长 2.68 米，东西宽 2.44 米，残高 1.60 米；北室破坏较为严重，近长方形，残长 3.74 米，残宽 2.48 米（图二）。出土有陶罐 2 件、陶钵 4 件，另有数枚五铢钱。其中 1 件陶钵出土于墓室内，其余均出土于扰土中，另有少量人骨散乱于中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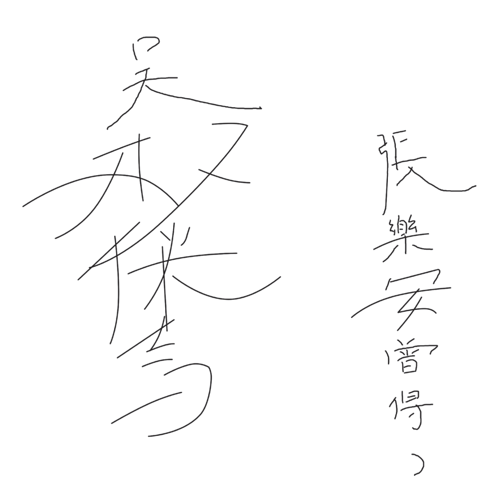
图二　M2 平面图

1. 陶钵

墓室内石壁上有文字和壁画。文字分别刻于西室南北两侧和中室东侧的立板上。其中西室北侧石壁之上刻有“郭师”“以太安三年春三月十八日造讫师王休盛”“闻此”以及由横竖线条组成的简单类似幔帐图案（图三）。西室南侧石壁之上的文字及图案入石较浅因而模糊，可辨识的仅有“张乐安曾得口”“吴口口口口”字样以及简单刻画的两个行走的人物图案（图四、图五）。中室东壁之上刻有“吾以建安三年”“茂安”字样（图六）。壁画剥落较为严重，色彩为黑红两色，内容为人物和幔帐，位于南侧墓门和中室北侧立板之上。南墓门的东侧，绘有一门吏，左手较清晰，折腕执一长柄状物，右手不太分明，似掌心向外置于胸前（图七）。中室北立板之上壁画剥落更为严重，隐约可见幔帐形象（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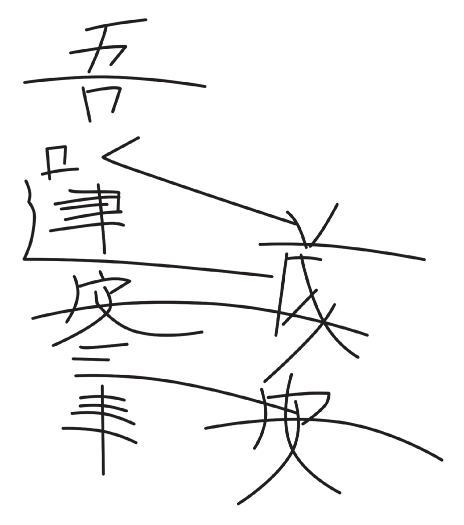
图三　立板上刻绘文字和壁画



图四　西室南侧石壁上刻绘文字



图五　西室南侧石壁上刻绘图案



图六　中室东壁上刻绘文字



图七　南墓门的东侧门吏图



图八　中室北立板壁画

二、初步研究

该墓在墓室石壁上刻有明确纪年，即西室北壁上的“太安三年”与中室东壁上的“建安三年”两处年号，且结构较为特殊，南侧和西侧各存有一条墓道一道墓门。那么墓葬的始建及使用年代是否不同？墓葬是否历经二次建造？

1. 墓葬年代

先看“太安三年”，在历史上以“太安”为年号的朝代共计有四个，按时代早晚分别为西晋、前秦、后凉与北魏。根据时地相关原则，前秦、后凉、北魏的太安都与此“太安三年”墓无关，可以排除。

前秦的太安是前秦哀平帝苻丕的年号，从385年八月至386年十一月，仅存二年，之后改元太初，本无“太安三年”，且即便误写，视为387年（前秦太初二年）[1]，但此时前秦已撤出东北，辽阳复属后燕[2]，故此时期墓葬不应再用前秦的年号纪年。

后凉的太安，或作大安，（386年10月～389年2月）后凉太祖吕光的年号，共计四年[3]。后凉政权地处西北，势力从未到达过辽海地区，辽东的“太安三年”墓与后凉政权无任何交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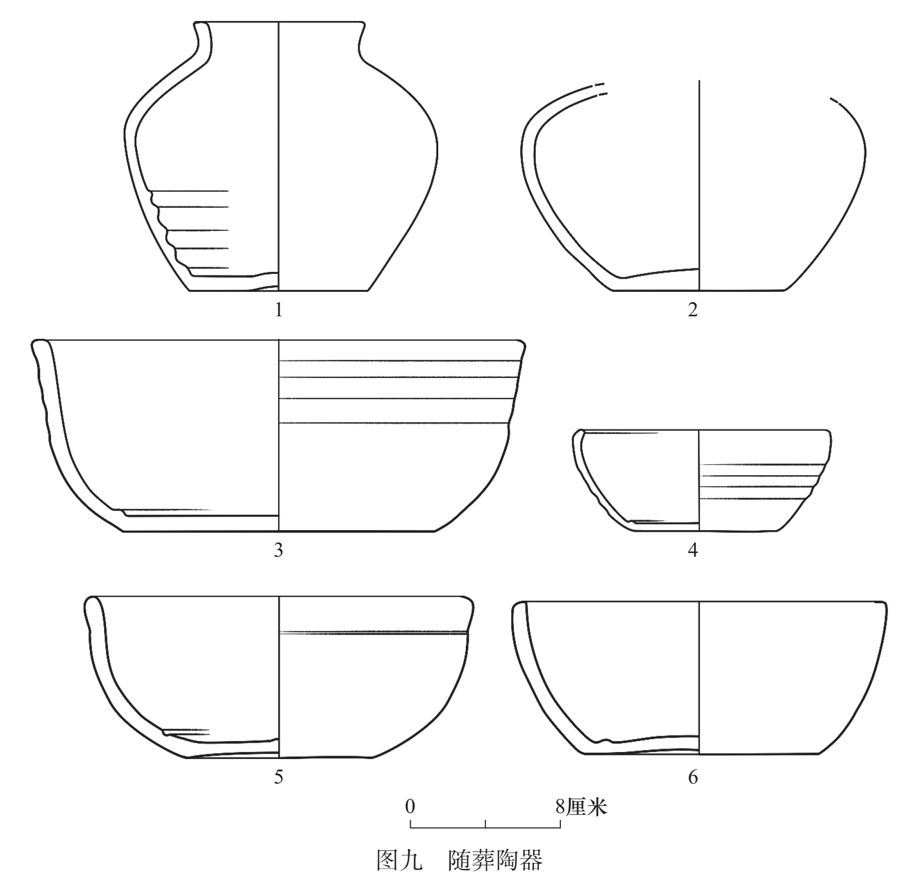
北魏太延二年（436年）灭北燕在龙城置营州，但辽东地区自五世纪初后直至唐高宗总章元年灭高句骊，一直为高句骊的势力范围，故今辽阳“太安三年”墓也可以排除是北魏遗存。

那么，此“太安三年”墓非为西晋莫属了。首先从墓室形制看，此墓秉承了辽阳汉晋墓的大石板砌筑的传统构筑方式，形制与三道壕1号墓、2号墓及公认为晋代的上王家墓的相近；其次从随葬品看，器型组合不出辽阳地区汉晋墓葬随葬品组合范围，且随葬的陶罐等器物型式与三道壕西晋纪年墓[4]出土的类似（图九）。

然而文献记载太安（或作大安，302～303年）是西晋惠帝司马衷的第六个年号，历时两年，没有第三年。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两点。

首先，墓葬地处辽东，不仅与当时的统治中心距离遥远，且自东汉末年（189年）公孙度割据后，在一百多年间数次易主，行政级别、辖区范围、行政长官经常变动，不是十分稳定。很有可能造成政令不通信息滞后，即中央政权已改元，辽东地区却仍沿用旧年号。

其次，西晋266年建立，291年即爆发“八王之乱”，晋惠帝太安前后正是动乱的高潮期。《晋书·惠帝纪》载“（太安二年十二月）甲子，大赦。……永兴元年春正月丙午，尚书令乐广卒。成都王颖自邺讽于帝，乃大赦，改元为永安。……秋七月……庚申，大赦，改元建武。”[5]《资治通鉴·晋纪》“永兴元年”条下注：“长沙王乂之死，改元永安；西迁长安，方改元永兴。”[6]可见这一年的年号变更频仍，是修史注史者必



图九　随葬陶器

1、2. 陶罐（M2 扰：1、M2 扰：5）3～6. 陶钵（M2：1、M2 扰：2、M2 扰：3、M2 扰：4）

然关注的问题。据《中国历史纪年表》可知，304 年这一年里，正月，西晋政权将年号由太安改为永安，七月改为建武，十一月又改为永安，十二月又改为永兴[7]，一年里四易年号，政局又极其混乱。“太安”年号使用到了太安二年的十二月，距离 M2 造讫的时间仅仅三个月，辽东百姓不知改元为永安，使用“太安”是非常可能的。

再看“建安三年”，即 198 年，正是公孙氏割据辽东之时。此时辽东地区流行带回廊的大型墓葬，如北园 1 号墓[8]，与此墓墓葬形制相去甚远。东汉晚期随葬品种类繁多，生活用器、明器林林总总，此墓虽经盗掘，但发现的随葬品明显与东汉晚期应有的型式不符。再看此纪年的句式，并不像“太安三年造讫”明确交代墓葬建筑时间的完整句子，似工匠随手刻划，随意性较强，“建安三年”后可接生于此死于此移居于此等，且目前所见的物勒工名或者墓志铭都没有在纪年前置主语“吾”的例子，所以不能确认“建安三年”与“太安三年”一样，表示着墓葬的建造年代。再看字体，与“太安三年”也极为相近：“以”字左旁均为点和竖钩的竖形成一“口”；“安”字的宝盖头和“女”的写法也很近似；“年”字同是四横一竖；所有字的横都拖得极长，经过比对，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推测，“建安三年”与“太安三年”为同一人所为。这两行重要的石刻文字

与墓室建造时间一致，即西晋永安元年（304 年）为墓葬的建造时间。

“太安”句后面的“师王休盛”又为我们透露了另一信息。“师”，刻作“陟”，是“师”的异体字。《康熙字典》收入此字“……《字汇补》：与师同。见《杨震碑》阴。”[9] 联系前文“……造讫”之语，“师”应指建造墓葬的工匠，即“有专门知识技艺的人。”（见《辞源》977 页）《辞源》还举例释意：“汉白石神君碑有‘石师王明’。”不仅说明汉魏时的“师”字有工匠的含义，也说明碑志中存在物勒工名的现象。故“师王休盛”意为建造墓葬的工匠叫王休盛。“以太安三年春三月十八日造讫师王休盛”意为“于太安三年春三月十八日此墓落成，工匠王休盛”。

西室南壁上的两个简单人物，痕迹较浅，未刻五官，但可清晰辨出头、身，似在行走。值得注意的是，人物头顶较小，是发髻或小冠的形象，无帻。东汉墓中发现人物形象多数头戴帻[10]，“直到汉末梁冠去梁之平巾帻，汉末也经过统一，不分贵贱，一律使用。……至两晋衣着特征，男子在官职的头上流行小冠子……一般平民侍仆，男的头上则为后部尖耸略偏一侧之帩头，到后转成尖顶毡帽……”[11]，因此这画是墓葬修筑时的西晋工匠为之。

绘于墓门东侧的门吏，其位置非常契合建墓观念，与既往发掘[12]发现的门吏或门卒的位置也相类似。画法从其右下方衣襟可见为勾勒墨线后色彩平涂，人物表情生动传神，线条利落洒脱，绘制技法相当娴熟。头部可见鬓角及发际线，无帻，头顶可能为发髻或小冠，与东汉常见的墓主、属吏、仆役无论贵贱均戴帻不同，因此其年代非东汉，应与墓葬纪年年代西晋相当。其手中持物为长柄状，自其下颌处斜至右足部，并且上窄下宽，不应是剑等短兵器，只能是有长柲的武器或其他物品，从此人左手腕回勾的肌肉松弛的状态、右足下模糊的向其左足飘荡的线条，推测为彗，与辽阳别的墓发现不同，别者尽为持武器的门卒、武士，此是第一例。

中室东壁残存的壁画，除上部墨迹似垂坠的帐子外，下部还有几道残留墨迹，应为墓主身后的屏风，与上王家晋墓相类，故此推测此处为墓主家居图。

石刻图案及壁画也成为墓葬建造于西晋时期的重要佐证。

2. 墓室结构、建造方式及葬俗

此墓的特殊形制，在辽阳地区也确有先例，墓地之北约 300 米的南郊街东汉壁画墓 M1[13]就与之相类似，在北侧和东侧也各存有一条墓道一道墓门，此种情况可视为其形制的延续。

南门东侧绘有门吏，推测其应为主门道。墓室各部分功能如下：中室应为前廊，北室为南北长东西短的后室，中间以立柱间隔；西室为右耳室，底部搭砌明器台；前廊东端靠近中间部分向外凸出，形成一个进深不大的左耳室，北部靠近后室处以石板砌高。排除墓道因素外，平面结构与三道壕 1 号墓[14]、三道壕 2 号墓[15]、上王家墓[16]非常近似。三道壕 1 号墓与此墓相比有以下不同：形制较大，耳室右大左小皆砌明器台，前

廊呈长方形；三道壕 2 号墓与此墓相比：东部几乎没有耳室，只用石板略向外砌了一点，前廊也呈长方形，另外西部小室比此墓长而无此墓深；上王家墓与之相比：右耳室大左耳室小，右耳室有明器台左耳室无，此墓则右耳室深左耳室长，左耳室靠近后室处以石板砌高的位置可能是另一个明器台。参照以往对于辽阳石室墓的研究成果，公认三道壕 1 号和 2 号墓为同一期，早于上王家墓，上王家墓是时代最晚的一座[17]，其年代甚至可晚至东晋咸和九年（334 年），三道壕 1 号、2 号墓则在四世纪初至三十年代，即西晋中期至西晋末年[18]。M2 从形制上看，似乎是三道壕 1 号、2 号墓形制至上王家墓演变的中间环节。三道壕 1 号墓应晚于三道壕西晋纪年墓的建造时间太康七年（286 年）而早于 M2 的纪年（304 年）；上王家墓应晚于 M2 纪年（304 年），早于 334 年。

另外，M2 家居图的绘法与上王家墓近似，而位置在左耳室，与上王家绘于右耳室的做法不大相同。检索前人发掘报告，东门里墓[19]、三道壕 3 号墓[20]、三道壕窑业四场墓（即车骑墓）[21]、南环街墓[22]墓室左壁或左耳室内均有墓主家居图，从时间上看，无论依照哪一家的分期[23]，将墓主家居图绘于墓室左壁或左耳室的做法从东汉中晚期到西晋，始终存在，这或许是墓室壁画的另一传统[24]，此墓作为西晋末年墓葬，正是目前发现的这一传统的最后继承者。左耳室地面本与前廊齐平，唯墓主家居图前有高起的小石台，应是特地配合家居图搭建的明器台[25]，这又从墓葬结构的角度证实了此图为墓主家居图。

墓内部分铺底石板及南端墓门西侧立板均在一角存有缺口，原始功能应为立置墓内架设横梁之用；南门外加固墓门的碎石及墓内部分底板边缘上残存红色颜料，并非特意为之；建墓石材规格不统一，东侧石材较薄而西侧石材规整厚重。据此推断这座墓是用了前代墓葬的造墓材料砌筑而成，而苗圃墓地发掘的部分石室墓，被破坏殆尽，构墓石材所剩无几，仅存少量陶器残片及人骨碎片，应是被后人二次利用，也恰好印证了这种墓葬砌筑方式。

其他地区墓葬形制与此墓相似者，有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26]和江苏新沂瓦窑画像石墓[27]，这两座墓葬虽有汉画像石，然而随葬物品有后代器物，都是后人用汉代造墓材料改建的墓葬，此事学界早有定论[28]。特别是元嘉元年墓，画像石上有“元嘉元年”大段题记，墓内则出土了陶槅这种典型的晋代器物，是西晋人改造东汉墓为己所用的一个典型。后代人盗用汉墓材料造墓是中国葬俗的一种现象，魏晋时期并不鲜见，但考古发现所证实的，多集中于鲁南、苏北、南阳等地[29]，辽东地区此前并未见诸报道。汉末的军阀混战时期，大量人口迁往辽东，山东地区与辽东在政治、文化上的联系十分密切。“初平元年……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30]；“（邴）原在辽东，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31]说明汉末为避乱中原而有大量山东人口迁徙辽东。因此，辽东地区汉晋墓受到山东、河南等地画像石墓影响[32]，M2 的墓室形制和葬俗体现了这一点。而在汉代画像石墓中，留下姓名的工匠有许多出自鲁地，鲁地石工技巧高超又有远走异

乡营造墓阙的记录[33]，M2 很有可能是由迁徙辽东的山东造墓师或山东造墓师的传承人王休盛进行改建的。

三、结　论

（1）苗圃 M2 是一座利用前代墓葬材料砌筑的墓葬，墓壁上有修造墓室的匠人留下的西晋石刻纪年，墓葬结构、随葬品、壁画都体现晋代特征，确定其砌筑年代为西晋，即 304 年。此墓留有明确的纪年，可作为辽阳壁画墓中西晋末年的一个代表。M2 家居图的绘法与上王家墓近似，而绘制位置则因袭了东门里、三道壕窑业四场、南环街、三道壕 3 号墓，从特地搭建小明器台也要将家居图绘于左耳室的做法看，这一传统还是相当根深蒂固的。至上王家墓以及更晚些的袁台子墓[34]时这种绘于左耳室的传统似乎消失了。明确的纪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两晋之间对于前代丧葬习俗和观念的继承及演变。

（2）利用汉代建墓材料建新墓，是魏晋时山东地区的传统葬俗；留下造墓师名字，也是东汉魏晋时山东地区工匠的一大习惯；因此，此墓作为西晋人改造前代墓葬为己所用在辽东地区的新材料，应是受山东地区的影响。这又一次体现了魏晋时期辽东与山东地区的密切交流及联系，印证了史料记载。

（3）此墓破坏太过严重，可供参考信息非常少。期待日后有新材料的发现，对此研究做进一步的补充。

注　释

[1] 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59．

[2] 房玄龄等．晋书・慕容垂载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同［1］：60．

[4] 辽阳博物馆．辽阳市三道壕西晋墓清理简报［J］．考古，1990（4）．

[5] 房玄龄等．晋书卷四・帝纪第四・惠帝［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 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七［M］．北京：中华书局，1956：2692．

[7] 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S］．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48．

[8] 李文信．辽阳北园画壁古墓记略［J］．国立沈阳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汇刊，1947（1）．

[9] 张玉书、陈廷敬等．康熙字典（汉语大辞典编纂处标点整理版）［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1338．

[10] 李文信．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J］．文物参考资料，1955（5）．

[11]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7．

[12] a．同［10］．三道壕窑业四场墓．
b．王增新．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J］．考古，1960（1）．棒台子 2 号墓．

[13]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辽阳南郊街东汉壁画墓［J］．文物，2008（10）．

[14] 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两座壁画墓的清理简报［J］．文物参考资料，1955（12）．

[15] 同 [14].

[16] 李庆发. 辽阳上王家村晋代壁画墓清理简报 [J]. 文物，1959（7）.

[17] a. 郑岩. 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 [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b. 刘未. 辽阳汉魏晋壁画墓研究 [J]. 边疆考古研究（第 2 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c. 张永珍. 辽沈地区汉魏晋墓葬的类型与分期研究 [D].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d. 孙力楠. 东北地区 2～6 世纪墓葬壁画研究 [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18] 刘未. 辽阳汉魏晋壁画墓研究 [J]. 边疆考古研究（第 2 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19] 辽宁省博物馆、辽阳市博物馆. 辽阳旧城东门里东汉壁画墓发掘报告 [J]. 文物，1985（6）.

[20] 辽阳市文物管理所. 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墓 [J]. 考古，1980（1）.

[21] 同 [10].

[2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辽阳南环街壁画墓 [J]. 北方文物，1998（3）. 该简报所说的“左”“右”耳室，是从观看者的角度而言的，与其他简报不同，因此简报中所说的“右耳室”即其他墓简报的“左耳室”.

[23] a. 魏存成、张博泉. 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 [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

b. 同 [17] a.

c. 刘萱堂. 集安高句丽壁画墓与辽东、辽西魏晋壁画墓比较研究 [J]. 博物馆研究，2003（1）.

d. 同 [18].

e. 陈超. 辽阳汉魏晋时期墓葬壁画研究 [D].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24] 家居图与宴饮图不同，家居图一般指墓主一人端坐，宴饮图则多为夫妻对坐饮宴. 已发现的壁画墓中，家居图居于左耳室的墓葬往往同时在右耳室绘有宴饮图.

[25] a.〔美〕巫鸿. 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 [M]. 施杰译. 北京：三联书店，2010：66～78.

b. 李林. 图像铭记与祭奠空间——以辽阳壁画墓墓主画像与明器台（室）为中心 [J]. 艺术探索，2013（4）.

[26] 山东省博物馆、苍山县文化馆. 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 [J]. 考古，1975（2）.

[27] 徐州博物馆、新沂县图书馆. 江苏新沂瓦窑汉画像石墓 [J]. 考古，1985（7）.

[28] a. 方鹏钧、张勋燎. 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题记的时代及有关问题的讨论 [J]. 考古，1980（3）.

b. 周保平. “再用汉画像石墓”研究 [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1）.

c. 钱国光、刘照剑. 再葬画像石墓的发现与再研究 [J]. 东南文化，2005（1）.

d. 杨爱国. 魏晋人盗用汉代坟墓材料造墓研究 [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12）.

[29] 同 [28] d.

[30] 陈寿. 三国志 • 魏志 • 公孙度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31] 陈寿. 三国志 • 魏志 • 邴原管宁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32] 同 [17] d.

[33]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北京西郊发现汉代石阙清理简报 [J]. 文物，1964（1）.

[34]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等. 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 [J]. 文物，1984（6）.

A Study on A Chronology Tomb of the Cemetery in Han and Jin Dynasty in Miaopu Liaoyang

Li Haibo　Xu yimeng

Abstract: Miaopu Cemetery is the only large scale excavation of a tomb group in Han and Jin Dynasty in Liaoyang area. The Taian chronology tomb was discovered in 2014, which is a typical Liaodong engraved mural tomb carving the building time and the name of the craftsman. According the previous research, the third year of Taian is 304 AD, or the first year of Yongan in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The existing tomb murals are images of a government official and the interned's everyday life. The discovery and study of this tomb filled the gaps of burial research in the Liaodong area in later Western Jin Dynasty, provided the accurate scale for burial chronology of the Miaopu cemetery and the reference for burial customs origin of the Liaodong area during the Han and Jin Dynasty.

Key words: Liaodong area; Chronology stone tomb; Mural tomb; Secondary construction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研究范式的问题

陈胜前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长春，130012）

一、引　　言

人类进化史上，曾经发生过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其中一些发生在距今5万至1万年[1]，或称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2][3]。也有不少学者视之为一种过渡，讨论其出现的时间、形式、意义等一直都是旧石器考古学与人类演化理论中的焦点[4]～[6]，因为这与解剖学意义上现代人的扩散以及所谓“行为现代性”等问题密切相关，与之相关的研究已是汗牛充栋。通过几代学者前赴后继、从不同角度的不懈探索，“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相关问题也日渐清晰。尽管我们现在尚不能确切地回答它们，但我们或可以知道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当前的焦点问题仍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材料与人类演化理论之间的矛盾。尽管现代人“走出非洲”假说[7]，已经彻底取代欧亚大陆土著人种假说，让位于“替代并少量混血”假说[8]，但与土著人种“连续进化并附带杂交”假说[9][10]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异。旧石器考古学如何定义现代人的文化特征成了问题的关键，或者说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与现代人的扩散有着怎样的关系。旧石器考古学家开始从概念上反思“行为现代性”这一概念，认为它得不到考古材料的支持[11]，已经不是一个有价值的概念[12]；同样，“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个来自于19世纪法国史前学者的定义，当时只是为了划分人类史前史的时间阶段而提出的，并不一定符合21世纪以人类行为特性为目的的研究[13]～[15]。

近些年来，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发现与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其中包括若干新的考古发现[16]～[18]、运用国际流行的技术进行发掘、严格控制考古层位关系，并进行精确测年；还有对旧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特征如艺术行为的研究，主要侧重其技术过程[19][20]；此外，综合的梳理工作也在不断进行[21]。正因为有这些工作基础，“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研究成为可以讨论且需要讨论的问题。在这个讨论中，我们首先需要澄清什么是史前文化的“革命”？进而了解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革命？还需要讨论从研究石器材料到认识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有着怎样的差距？不同的研究范式对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认识有着怎样的影响？最后，要认识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范式？

二、什么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

考古学上柴尔德提出过两次革命：新石器时代革命与城市革命[22]。这实际上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前者是整个文化体系的，包括生计方式、聚落形态、人口规模与组合、社会关系，甚至还包括意识形态。后者则更多是单线条的，城市出现，意味着政治中心的形成，社会复杂性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真正的城市革命是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此时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人口分布、社会关系等都发生了如新石器时代革命一样的变化。从城市的出现到真正的城市革命，前后相差数千年。就好比驯化之于新石器时代革命，驯化无疑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核心，但是从驯化的最早出现到真正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完成，前后同样相差数千年。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把人类历史上的革命分成两种：一种是关键文化特征的出现，它后来带来了人类历史的重大变迁；一种是全体系的改变，如同新石器革命，它是驯化、定居、人口增长、社会复杂性、气候、技术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不是哪个因素单方面的发展。

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是什么形式的革命呢？我们不妨把它与新石器时代革命做个比较（表一）。

表一　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与新石器时代革命之比较

特征	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	新石器时代革命
人地关系的基本特征	氧同位素第3阶段，随后是末次盛冰期，欧亚大陆两侧史前狩猎采集者的适应方式发生明显改变，流动性提高；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没有明显的环境动因，人类迅速扩散到除南极洲之外所有大陆	末次冰期结束，气候变暖，稳定性提高，人类采用新的适应方式，人地关系显著改变
生计方式	大动物狩猎，强化利用灵巧的小动物与生长缓慢的动物，利用植物种子，体现出“广谱适应”的特征	动植物驯化开始，从简单食物生产到农业生态系统形成
人口	遗址的数量、密度与规模相对旧石器早中期急剧提高反映人口有明显的增长	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相互促进，人口有爆发性增长
居址形态	流动方式与民族学上的狩猎采集者基本相同，存在流动性的分化，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已出现中心营地与临时营地的分化	定居，长期（超过一年）居住的村落，居址布局复杂化
技术	石器原料精细化，加工也更加精良，装柄技术出现（或者说更加普遍）	新的技术组合，包括磨制工具、陶器、建筑等
社会组织	类似于民族学上狩猎采集者的基于性别、年龄的分工开始形成	社会复杂性不断提高，最终国家形成
人与物的关系	人开始用物来表现身份与社会关系； 礼仪行为； 艺术的“创造性爆炸”	更复杂； 新的礼仪形式； 新的艺术形式
变化的规模	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有的明显，有的不那么明显	地区间差异比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更大，世界范围内农业仅起源于若干个中心地带

比较这两个革命，不难看出，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影响的深度不及新石器革命，它表现得更突出的方面是认知意义上的。当然，它也在其他各个层面上都发现了显著变化，不是单个方面的。某种程度上说，似乎可以称之为一次“亚革命”。

当前研究者似乎更偏好“过渡”这个概念，不仅旧石器时代晚期是过渡[23]，就是新石器时代革命也多以“过渡”来称呼[24]。所谓过渡，顾名思义，就是逐渐地变化。将之视为过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变化的时间长，而革命是指迅速的变化。其二，就是变化是在多个层面、多条线上展开的，不同层面或线索上的变化速率并不相同，虽然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相互关联，但究竟是哪个因素起到决定性作用，或是引发了后来的连锁反应，目前并不清楚。生计方式、人口、居址形态、技术、社会组织、认知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其三，可能是人类进化史上重要的事件很多，工具发明、用火、狩猎、人口扩散、语言起源、社会分工等似乎都可以称之为“革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用“革命”来命名一种变化，容易忽视对长期过程的详细追溯。

当然，“革命”之所以不受偏好还有另外的隐情。特里格曾指出，考古学的崛起与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形成关系非常密切[25]，许多时候它反映的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如果特里格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革命”的提法就具有政治上的不正确性。事实上，无论是生物进化，还是人类文化进化，都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当代进化思想中的“间断平衡”的观念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特征，变化存在过渡与飞跃[26]。强调“过渡”的说法则容易将人类进化史线性化、简单化，忽视了两种变化之间重要的区别。强调革命也不等于说就不关注过程，反而会让研究者更注意过程以及影响它的相关因素。对许多研究者而言，采用某一概念与否多与学术研究主流的共同话语有关，在“主流”之外，保持另一种看法，在不同观点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是有好处的[27]。归纳起来说，我们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认识差异与研究范式有很大的关系。

所谓范式，按托马斯·库恩的说法是指“科学共同体的信念，这种共同的信念建立在某种公认的并成为传统的重大科学成就（如牛顿的万有引力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的基础上，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一种把握研究对象的概念框架，一套理论和方法论信条，一个可供仿效的解题范例，它规定了一定时期中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和研究途径，同时也决定着共同体成员的某种形而上学信念及价值观”[28]。实际上，其间的过程是双向的，科学共同体信念的形成也是后面所说诸多因素在研究过程中相互作用的产物。旧石器时代晚期是过渡或是革命这一问题，是价值观、对进化论的认识、概念框架、理论方法、形而上学的基础（唯物或唯心主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下面的讨论主要侧重理论方法的视角。

三、技术类型学视角下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

1. 什么是现代人的石器技术？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经常面临着一个矛盾的状况，一方面我们知道不同时代、地区

旧石器时代石器技术组合存在着相当大的变化，很多因素都可能影响组合的特征，其中包括原料、生态、技术、生计方式（狩猎还是采集为主）、替代物（如竹子、骨角）等；另一方面，许多旧石器遗址中我们能够看到的考古材料也仅限于石器，石器几乎成了旧石器考古学家唯一专属的研究对象。

水洞沟遗址所发现的石器组合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矛盾。水洞沟遗址 1920 年由法国传教士与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发现，它以具有莫斯特向奥瑞纳过渡特征的石器组合而闻名，这种特征为访华的步日耶所肯定[29]。后来经更系统的发掘与研究，以及近年来广泛运用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新技术所取得的收获进一步肯定了当初的发现。以之命名的水洞沟工业作为位于中国北方西部的石器工业通常被认为是来自于欧亚大陆西侧的技术，它可能来自欧亚大陆西侧人口向东亚的迁徙，是东西方“史前文化交流的风向标”，最古老的“丝绸之路”[30]。如果它是来自西方的技术，是否可以将之视为现代人的技术呢?

可能很少人会否认水洞沟工业是现代人的技术，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技术的流行范围限于蒙古高原及其以北区域、中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自然过渡带，主要分布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森林草原交错带，是狩猎采集者中更依赖狩猎的群体所偏好的区域，他们更需要这种能生产具有一定标准化产品的技术，以适应更高流动性的生活[31][32]。中国南方则几乎没有类似的发现。有趣的是，水洞沟遗址近年的发现表明水洞沟工业之后是一种以小石片工具为主的工业类型，这也是中国北方地区传统的工业类型。该地区直到晚更新世之末才出现细石叶技术，比中原地区要晚一万多年，如水洞沟 12 地点的发现[33]。

如果现代人是从非洲走出来，他们的优势是否会表现在石器技术上呢？或者说，表现出的技术优势通过我们现在所用的研究方法无法发现？通过石器技术组合来判断人类群体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在新石器时代以及更晚时段的考古中，人类群体与“考古学文化”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至少可以认定一个考古学文化是一个群体的产物[34]。至于这是一个什么意义上的群体，则另需讨论。旧石器考古学家希望能通过石器风格分析来探索人类群体的身份[35]，这种方法某些情况下是有效的，如细石叶技术与移民美洲的 Na-Dene 人之间的关系[36]。就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而言，通常是运用一系列特征组合来加以区分[37][38]，石器技术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如更精致的加工、装柄技术（制作复合工具）等，而无法将现代人与某种石器风格对应起来。这可能与现代人的扩散是一个数以万年的过程有关，他们需要适应的环境千差万别，石器技术本身又是高度功能化的，它不像装饰品、艺术品那样以象征为主，所以现代人的身份难以用技术类型学的方式表现出来。

2.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出现

习惯上，我们都是从南北两个地区来看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这样的格局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形成。旧石器时代中期因为一直缺乏具有典型意义的特征，所以其存

在的合法性也受到质疑[39][40]。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直接与早期相接，于是，早晚期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使得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出现显得非常突然，具有了革命性的色彩。

但是，从现有考古材料的技术类型学特征来看，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开端却相对模糊。以考古发现相对丰富的中国北方为例，目前有四处遗址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开端有交接，分别是河南的织机洞[41]、灵井[42]、山西的许家窑[43][44]、内蒙古的乌兰木伦遗址[45]。织机洞遗址早期文化层还是以砾石器为主，距今 5 万至 4 万年前，石器技术组合发生明显的变化，以石英、燧石为原料的石片石器开始占据主要地位。灵井遗址的下文化层的石器组合是脉石英与石英岩为主要原料的小型石片器为主，兼有类似于许家窑的石器与南方的砍砸器，整体上，跟周口店遗址的石器工业特点一致。年代争议颇多的许家窑遗址石器组合以细小石器为主，另外包括上千件石球，还出土漏斗形与原始棱柱状石核、凹刃刮削器、较粗糙的拇指盖刮削器、雕刻器等，具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特征。近些年发现的乌兰木伦遗址距今年代 7 万至 3 万年，石器组合特征也是小型石片石器为主，但部分石器对称的修理方式可能反映装柄复合工具的存在，明显趋薄型石片的存在似表明存在软锤技术。这四处遗址可能处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或向其过渡阶段，其石器组合特征中无疑都有新的特征出现，但是它们与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以来的石器技术类型特征是基本一致的。如果将之归为克拉克所谓的模型 I[46]显得过于宽泛的话，那么它们仍然可以说属于小石（片）器工业传统。

更晚的典型旧石器时代晚期较早阶段遗址如水洞沟、峙峪[47]、王府井[48]、山顶洞[49]、小孤山[50]等，除水洞沟的工业特征具有欧亚大陆西侧石器工业的特点外，其余石器组合仍与中国北方长期存在的石器工业特点一脉相承。即使是水洞沟遗址，第 2 地点的新材料发现表明在其类似莫斯特 – 奥瑞纳石器组合之上，小型石片石器仍占主要地位[51]。在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基本特征就是出现了石片工业，以燧石或石英为主要原料，传统的砾石石器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一直持续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如彭头山遗址[52]。简言之，单纯从石器技术类型特征来看中国旧石器晚期革命是非常贫乏的，其变化相当有限，开始的时间也难以确定。更关键的是我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石器并不能指示现代人的到来，同样不能说明人类行为上的变化。“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概念是 19 世纪法国史前史研究者为了整理当时的考古材料而提出，将之分为按照时空特征、技术形制特征区分的一系列石器工业，如莫斯特、奥瑞纳等[53]。这一划分方法在当时对于整理纷乱的石器材料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对于 21 世纪的考古学来说，其不足也非常明显，我们需要新的研究范式。

四、作为适应变迁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

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不应该只是一系列特征的组合，这些遗存特征都与人类行为的

变化有关，通过遗存特征的变化去了解人类行为的变化，是旧石器考古学家的主要任务之一。而这方面的工作是我们当前研究中较为薄弱的方面，通常找到了行为变化的重要证据，但却很少透过考古证据去追溯行为变化的过程与意义。其次，从人类文化适应的角度来看，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革命是一次飞跃性的变化，其成功的标志就是人类文化适应开始辐射到边缘环境以及其他人类此前从未涉足的地区，如美洲，很可能还包括澳大利亚大陆。在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适应经历一系列的改变，包括分化发展与趋同演化。下面将从这两个方面展开讨论，都强调功能—适应的角度，显然是过程考古学范式的研究。通过讨论，一方面希望说明功能—适应角度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归纳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所发生的适应变迁，进一步丰富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内涵。

1. 技术变化的行为意义

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材料中出现很多新现象，每一项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这里希望通过一个案例来说明这个过程。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诸多特征中，石器装柄（hafting）技术是重要的一项，它不一定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出现的[54]，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它才得到普遍应用，成为明显的工具特征。乌兰木伦、萨拉乌苏遗址据称都有装柄技术的痕迹[55][56]，水洞沟所采用石叶技术生产的产品通常也需要装柄使用，细石叶更是如此，不装柄是无法使用的。要证明石器的确存在为装柄而做的修理加工，形制分析、特征观察、微痕分析与实验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它与人类行为变化之间的关系目前很少有讨论，材料研究之后往往戛然而止。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装柄工具可以包括箭头、标枪头、端刮器（有装柄的加工修理的）、石叶与细石叶，可能还要包括部分雕刻器等。澳洲土著还有装柄的锤斧。装柄工具有什么好处呢？最直接的好处就是省力，问题是，为什么此时会出现这样的工具呢？省力的设计有助于处理加工大批量的资源（简称为批处理），也就是说同样的体力或时间能够干更多的活。进一步说，就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可以比以前处理更多的关键资源：食物、皮服、工具原料等。这些资源可能对时间敏感，如食物不处理很快会腐烂掉，迅速处理就可能更充分地利用资源，甚至可能把用不了的储备起来；也有可能对空间敏感，资源只存在于某地，比如优质石料，必须赶紧利用。批处理有什么好处呢？显然可以减少生存风险，换句话说，叫增加生存优势。生存优势增加意味着人口增加——更适应环境。

省力的工具出现还可能意味着有些人可能要为别人处理资源，由此就会衍生出一系列社会关系的发展，比如可以因此而获得社会威望，有更多的机会繁衍后代；可以与周围的人或群体互通有无，发展交换网络，社会群体的规模可能会扩大。不过，按照萨林斯的说法，狩猎采集者社会有一种平均主义机制，抑制生产剩余的产生[57]。这样的话，省力工具将会导致人们花更少的时间就能满足生存的需要，节省下来的时间将用来从

事非生产性的活动。对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来说，也许可以称之为文化艺术社会生活。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所谓"创造性的大爆炸"，艺术品、装饰品或象征符号迅猛增长。这些创造是后来的艺术、文字、科学的萌芽，也就是文明的基础。节省时间的行为可能不是平均的，有的人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继续用于生产活动，这样的话，另外一些人就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了，比如充当巫师、工匠，专业化分工初现，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分别从事不同的工作。当前的研究表明，这样的分工可能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出现的[58]。

通过装柄工具我们可以把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许多行为特征联系起来，我们通过不断拓展的关联在考古材料的发现与人类行为变迁间架起桥梁，使得细微的考古材料与宏大的学术意义之间不再显得突兀，而贯穿其间的就是功能–适应的推理逻辑。

2.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文化适应的演化

从功能–适应的角度来看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文化适应变迁，所需要关注的考古材料特征包括遗址布局、器物组合、动物遗存以及人类遗骸。由于人骨材料罕见，生物特征如同位素、DNA 难以保存或是缺乏研究，所以我们只能侧重前三个方面来分析。其理论基础就是狩猎采集者的文化生态与行为生态学。狩猎采集者的基本生存方式是流动采食，失去了流动性，采食也就难以为继，所以流动性是分析狩猎采集生计最核心的变量。通过分析古代狩猎采集者流动性的变化，我们可以推断其适应方式的特点。综合分析遗址布局、器物组合与动物遗存，可以把流动性与适应方式的变化联系起来。

宾福德曾把狩猎采集者的流动性区分为两种：后勤型流动（logistical mobility，即有中心营地支持的），居址型流动（residential mobility）[59]。前者的居址存在功能分化，中心营地、临时营地、储藏点等；后者的分化不明显，人们在一地居住几天后就整体搬走。宾福德认为这代表流动性的两端，狩猎采集者可能两种方式并用。但是，如果我们把狩猎采集适应方式区分出复杂与简单两种类型，复杂的狩猎采集适应更多运用后勤型流动，他们拥有居住时间较长的中心营地，尤其是在冬季。因为在一地居留时间越长，聚居人口越多，所以他们可以投资较为复杂的建筑、更耐用的工具、储藏设施，在遗址中从事更多样的活动，器物组合与遗存类型都会更加丰富。与此同时，流动性程度还跟生计方式相关，相对而言，依赖狩猎的流动性最高，最低的是依赖水生资源的，尤其是海岸资源，这种类型的利用最早见于中石器时代。除开水生资源依赖者，流动性较低的复杂狩猎采集者成为了最早的食物生产者[60]。

近年来，河南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一系列发现较好地体现了史前狩猎采集者在流动性上的变化。如老奶奶庙遗址的布局与丰富多样的发现很好地体现出了中心营地的特点，遗址周围 20 千米范围内还发现不少地点，地层要薄得多，遗存也少，更像是临时营地[61]，其中经过发掘的典型临时营地遗址如皇帝口[62]。而赵庄遗址则更近于专门从事仪式活动的场所，从 5 千米外运来以数百公斤紫红色石英岩，置于古棱齿象的头骨下与

旁边[63]。

值得注意的是在距今 22000 年左右，细石叶技术出现，如西施遗址[64][65]。细石叶技术能够生产轻便、标准化的可用于镶嵌的细石叶，生产细石叶的细石核，尤其是楔形细石核，还兼有多用途工具的功能[66]。这一技术在所有已知的石器技术中最适合流动的生活，它是史前狩猎采集者在末次盛冰期来临时应对环境变化的适应。随着温度的降低，初级生产力下降，资源分布改变，不同资源斑块之间的距离变远，人们的流动性不得不提高；当时华北地区的环境为森林–草原，是最需要流动性的生态地带、最需要细石叶技术，华北可能为细石叶技术起源地[67]。西施、柿子滩[68]～[70]、龙王辿[71]遗址超过 2 万年细石叶技术产品的发现很好地证明这一理论假说。细石叶技术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分布最广泛的技术，从华北、东北亚、西伯利亚一直延伸到阿拉斯加与北美西北部。这可能与人类趋同适应演化相关，他们有共同的问题需要解决。将之视为某一族群的遗存难以解释如此广大区域同存同一技术。更新世之末，细石叶适应发生分化，太行山以东地区，如新密李家沟遗址中层[72][73]，与同一时期柿子滩遗址迥然不同，遗址结构、器物组合、动物遗存组合都有差异，它代表流动性下降，这是走向食物生产的第一步；而柿子滩遗址直到早全新世依旧保持着高流动的生计[74]。到新石器时代中期，食物生产经济又大规模扩散，人类适应方式又趋同（表二）。

表二　中国北方人类适应方式演化的基本形态

<table>
<tr><th colspan="2">阶段与文化类型</th><th>年代</th><th>考古材料特征</th><th>适应形态</th><th>典型遗址</th></tr>
<tr><td colspan="2">成熟的新石器时代</td><td><8kya</td><td>定居遗址，陶器、磨制石器</td><td>趋同演化，原始农业开始普及</td><td>磁山、裴李岗</td></tr>
<tr><td colspan="2">新旧时代过渡阶段</td><td>12～8kya</td><td>某些遗址陶器、磨制石器、集中化的遗址结构</td><td>分化演化，部分地区食物生产起源</td><td>李家沟、柿子滩、马鞍山、东胡林、转年</td></tr>
<tr><td colspan="2">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td><td>23～12kya</td><td>细石叶技术在整个北方地区普及，不同地区存在技法上的差异</td><td>趋同演化，高流动的觅食模式</td><td>西施、柿子滩、大岗、灵井、下川</td></tr>
<tr><td rowspan="4">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td><td>水洞沟类型</td><td rowspan="4">40/45～23kya</td><td>石叶工业，产品的标准化</td><td>更高流动性的狩猎依赖</td><td>水洞沟地点群</td></tr>
<tr><td>峙峪类型</td><td>小石片石器，石镞、修柄工具，动物遗存丰富</td><td>偏向狩猎的觅食模式</td><td>峙峪、丁村、乌兰木伦</td></tr>
<tr><td>山顶洞类型</td><td>小石片石器
出现中心营地
遗址功能分化</td><td>混合的狩猎采集</td><td>山顶洞、东方广场、小南海、老奶奶庙、赵庄</td></tr>
<tr><td>小孤山类型</td><td>小石片石器
骨鱼镖</td><td>趋向水生资源利用</td><td>小孤山</td></tr>
<tr><td colspan="2">旧石器时代早中期</td><td>>40/45kya</td><td>小石片石器</td><td>分化不明显的适应形态</td><td>许家窑、灵井、板井子</td></tr>
</table>

表二以考古材料较为丰富的中国北方为例，展示了人类适应方式演化的基本形态，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适应辐射到晚段的趋同；再到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分化，到新石器时代的趋同，人类演化史经历了两次旋回。后一旋回也见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更早的情况还需要更多的材料发现与分析来证明。功能–适应的视角可以很好地解释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细石叶工业的起源与扩散，也可以解释更新世之末向食物生产的适应变迁，它还可以归纳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发生的人类适应辐射；但是目前它似乎无法解释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产生，以及如此多新的文化特征涌现出来的意义。也就是说，它还是无法准确定义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性质。

五、讨论： 我们需要怎样的研究范式

与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解剖学上现代人的扩散，能否从石器材料中看出来，人群的迁徙、交流与更替是否会反映在石器工业上面？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60年代宾福德就与博尔德就石器组合与人群的关系进行过论战[75][76]。这促使宾福德到阿拉斯加开始民族考古学研究[77]，其研究结果证明狩猎采集者的遗存比从前认识的更加多样[78]。另外，还有很多学者质疑旧石器时代晚期与现代人之间的关系，两者并不等同[79]~[81]。当然这不是说石器材料与现代人没有关系，石器与人类认知、人群关系、行为生态、技术投入等关系密切[82]。只是打制石器是实用的工具，影响它的因素众多，如原料、技术、生计等。按照Neutral Theory的认识，石器技术的选择可能只是战术，而非战略的[83]。能够代表人群的石器风格因素研究有过一些尝试[84][85]，但一直没有发展出系统的方法来。“石器工业”作为对石器技术–类型的归纳更多与欧洲旧石器考古学研究早期建立基本时空框架的努力相关。就像柴尔德试图运用“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梳理欧洲史前人群的迁徙一样[86]，旧石器考古学家也有类似的目的。姑且不说旧石器时代的石器组合离“考古学文化”的内涵有多远，即便是新石器与青铜时代运用“考古学文化”讨论人群迁徙、交流与替代问题也是困难重重[87]。人群的归属多大程度上会体现在物质材料上，在什么意义上体现出来，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所以，在没有形成新的研究理论方法之前，通过石器的技术–类型研究试图了解现代人向东亚地区的扩散是非常困难的。

从功能–适应的角度来看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有比较清晰的意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早段可以看到明显的适应辐射，不同区域的器物组合分化，这种特征在更早的材料中是鲜见的，可能指示不同的生计方式[88]。它反映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能够针对不同地区的资源特征发展不同的利用方式。位于西部的水洞沟采用具有一定程度标准化的石叶技术，这种技术主要分布于中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自然地理过渡带（其他地区有零星分布，如朝鲜半岛[89]），跟早中全新世细石叶技术的分布一致。这一地带为森林与草原的过渡地带，于狩猎采集的生计方式而言，适合以狩猎为主的生计；而以狩猎为主

的生计相对于依赖采集与渔捞的生计需要更高的流动性，标准化的工具设计显然更加有利[90]。也就是说，打制石器标准化的策略更多是一种适应。而在具有濒水环境的东部地区，水生资源利用开始出现。东西部之间是较为混合的生计，相应的工具组合也较多样。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中还较少运用到功能 – 适应的视角，所以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适应辐射跟早中期旧石器时代的差异究竟如何，还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

采取石器技术 – 类型的视角来看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从已有的材料来看，“革命”几乎不具有实质性的含义。某些通常称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技术 – 类型，如石叶、端刮器、雕刻器、有机工具等，都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前找到类似的形态[91]，而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标准化工具才大规模出现。再者，石器技术类型研究并不能直接告诉我们人类行为的变化方式。功能 – 适应的视角有利于解读考古材料所指示的人类行为意义，但仍不足以清晰地界定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实质。现有的研究表明它可能并不是一次如同新石器时代革命那样的生计方式的革命，人类还处在狩猎采集阶段。但是这并不是说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并不存在。相反，无论是从中国来看，还是从世界其他地区来看，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存在还是非常明显的。认知考古学（过程考古学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分支）强调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可能是认知意义上的[92]。Mithen 解释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数种从前联系较少的心智模块完全沟通，标志人类进化史上一个新的阶段开始[93]。真正能够标志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的是个人装饰品、刻划符号、仪式活动等代表象征行为的物质的出现。象征与符号行为更重要的意义首先可能是社会、语言层面的，象征是要向社会其他成员传递某种信息，社会组织有效性的提高无疑有利于群体的生存。平时人们通过仪式活动练习群体的组织，如赵庄遗址所见将数百公斤的岩石搬运到几千米之外。另外，信息的便利交流与储存也有助于技术的改良与发明。从认知的角度来理解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似乎与目前的材料发现更加契合。认知 – 过程的考古学范式似乎更适合研究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这一问题。

如上文所述（表一），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可能是一个多层次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变化，人能动地运用物（包括运用技术加工物质，如个人装饰品）来表达身份、社会关系，这代表人之自我意识的出现。考古学家通常将工具的制作与使用视为文化的起源，文化是人适应环境的体外（身体之外）形式，换句话说，它就是人之器官功能的延伸，比如石片切割代替牙齿的撕咬，用火烤熟食物代替胃部的消化能力，如此等等。但是人能动地运用物来表达自身，就不只是人之器官功能延伸的问题，它是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再造，即人在物质世界之外重构了一个近似于虚拟的世界，是通过符号、仪式等形式来表达的存在，我们或可以称之为“精神世界”。这种人与物关系的变化不仅仅是一场认知上的革命，考古学家开始需要探讨物质的意义——人赋予了物以意义，需要探讨意义的变化（不同情境下意义可能不同），以及人的能动性（人运用物质意义）。这些都是后过程考古学强调的研究对象。一般地说，后过程考古学多见于历史时期考古中，就像过程考古学更多在旧石器考古领域获得承认一样，但是随着

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这样的问题上，也需要后过程考古学的思考，尽管当前展开具体的研究还有不小的困难。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前艺术分析上，通过它讨论物质意义的表达[94]，现在还有研究拓展至景观上面[95]，以后或可以延伸至其他物质遗存。要理解旧石器晚期革命的性质，后过程考古学研究范式日益成为不可或缺的途径。

六、结　　论

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是人类演化史上的里程碑，人类在生计、聚落形态、技术、人口、人地关系、人物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把它跟新石器时代革命相比，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规模相对较小，最突出的变化表现在人与物的关系之上。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研究范式目前主要还是以技术–类型学为中心的，显然这是不够的。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类型变化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存在明显的连续性。由于石器研究方法上困难，石器技术类型与人群属性难以对等，所以很难通过它来回答现代人的扩散，也很难体现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性质。相对而言，过程考古学的功能–适宜的视角能够较好地解释技术变化的行为意义、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的适应辐射、晚段的细石叶技术起源以及更新世之末到早全新世食物生产的起源，但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并不完全是一场人类适应方式的革命。晚近发展起来的认知-过程考古学更注重从人类认知与社会关系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更有利于我们理解旧石器晚期革命。而注重研究物质意义、能动性与历史的后过程考古学范式能更好地把握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最突出的特征，人与物关系的变化，所以，后过程考古学的范式应该是我们研究这一问题值得关注的途径。上述四个范式的研究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不是相互替代而是补充与叠加的关系，代表旧石器考古学研究在不断深入，我们对旧石器晚期革命的理解更加透彻。就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而言，我们还需要在技术–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上，拓展研究范式，从而更好地理解史前人类的演化。

注　　释

[1] Stiner MC. Carnivory，coevolution，and the geographic spread of the genus Homo [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2002(10)：1-63.

[2] Bar-Yosef O. The Upper Paleolithic revolution [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2002(31)：363-393.

[3] Bar-Yosef O. The archaeo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Upper Paleolithic revolution [J]. *Diogenes*，2007(54)：3-18.

[4] Straus L G. The Upper Paleolithic of Europe：An overview [J].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1995(4)：4-16.

[5] Hoffecker J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in the Upper Paleolithic of northern Eurasia

［J］.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2005（14）：186-198.

［6］ Camps M，Chauhan P，editors. *Sourcebook of Paleolithic Transitions*: *Methods*，*Theories*，*and Interpretations*［M］. New York：Springer，2009.

［7］ Stringer CB，Andrews P. Genetic and fossil evidence for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s［J］. *Science*，1988(239)：1263-1268.

［8］ Green RE，Krause J，Briggs AW，et al.A draft sequence of the Neanderthal genome［J］. *Science*，2010(329)：710-722.

［9］ Wolpoff MH，Wu XZ，Thorne AG. Modern Homo sapiens origins：A general theory of hominid evolution involving the fossil evidence from East Asia［A］.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s*：*A World Survey of the Fossil Evidence*［C］.New York：Alan R Liss，1984：411-484.

［10］ Wu X.On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s in China［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2004(117)：131-140.

［11］ Belfer-Cohen A，Hovers E.Modernity，enhanced working memory，and the Middle to Upper Paleolithic record in the Levant［J］. *Current Anthropology*，2010(51)：S167-S175.

［12］ Shea JJ.Homo sapiens is as Homo sapiens was［J］. *Current Anthropology*，2011(52)：1-35.

［13］ Clark GA.Through a glass darkly：conceptual issues in modern human origins research［A］. *Conceptual Issues in Modern Human Origins Research*［C］.Chicago：Aldine Transaction，1997：60-76.

［14］ Clark GA. Accidents of history： conceptual frameworks in paleoarchaeology［A］. *Sourcebook of Paleolithic Transitions*［C］. New York：Springer，2009：19-41.

［15］ Soffer O. Defining modernity，establishing rubicons，imagining the other-and the Neanderthal enigma［A］. *Sourcebook of Paleolithic Transitions*［C］. New York：Springer，2009：43-64.

［16］ 陈福友，李锋，王惠民等．宁夏水洞沟遗址第 2 地点发掘报告［J］. 人类学学报，2012（31）：317～333.

［17］ 高星，王惠民，关莹．水洞沟旧石器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认识［J］. 人类学学报，2013（32）：121～132.

［18］ 王幼平．嵩山东南麓 MIS3 阶段古人类的栖居形态及相关问题［A］. 考古学研究（十）［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287～296.

［19］ 王春雪，张乐，高星等．水洞沟遗址采集的鸵鸟蛋皮装饰品研究［J］. 科学通报，2009（54）：2886～2894.

［20］ 宋艳花，石金鸣，沈辰．山西柿子滩旧石器遗址蚌饰品制作工艺研究［J］. 人类学学报，2011（30）：115～123.

［21］ Qu T，Bar-Yosef O，Wang Y，et al. The Chinese Upper Paleolithic：geography，chronology，and techno-typology［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2013(21)：1-73.

［22］ Childe VG. *Man Makes Himself*［M］. 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51.

［23］ Hovers E，Kuhn SL. *Transitions before the transition*：*Evolution and stability in the Middle Paleolithic and Middle Stone Age*［M］. New York：Springer，2006.

［24］ Price TD，Gebauer AB.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rehistoric 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A］. *Hunters First Farmers*［C］. Santa Fe：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1995：3-20.

［25］ 布鲁斯 • G • 特里格著．陈淳译．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26］斯蒂芬·杰·古尔德著．田洺译．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

［27］托马斯·库恩著，范岱年，纪树立译．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8］Kuhn T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10-11.

［29］Breuil H.Archéologie［A］. *Le Paleolithique de la Chine*［C］. Archives de I'Institute de Paleontologie Humaine，Memoire 4.Paris：Masson，1928：103-136.

［30］侯亚梅．水洞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风向标？——兼论华北小石器文化和"石器之路"的假说［J］．第四纪研究，2005（25）：750～761.

［31］陈胜前．细石叶工艺的起源：一个理论与生态的视角［A］．考古学研究（七）［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244～264.

［32］Elston RG，Brantingham PJ.Microlithic technology in Northern Asia：a risk-minimizing strategy of the Late Paleolithic and Early Holocene［A］. *Thinking Small*：*Global Perspectives on Microlithization*［C］，Arche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2002(12)：103-116.

［33］刘德成，陈福友，张晓凌等．水洞沟 12 号地点的古环境研究［J］．人类学学报，2008（27）：295～303.

［34］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35］Close AE.The Identification of Style in Lithic Artefacts［J］. *World Archaeology*，1978(2)：223-237.

［36］Yesner DR，Person G. Microblades and migration：ethnic and economic models in the peopling of the Americas［A］. *Thinking Small*: *Global Perspectives on Microlithization*［C］，Arche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2002(12)：133-162.

［37］Mellars P.The impossible coincidence.A single-species model for the origins of modern human behavior in Europe［J］.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2005(14)：12-27.

［38］陈胜前．中国北方晚更新世人类的适应变迁与辐射［J］．第四纪研究，2006（26）：522～533.

［39］高星．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探讨［J］．人类学学报，1999（18）：1～16.

［40］Norton CJ，Gao X，Feng XW. The East Asian Middle Paleolithic reexamined［A］. *Sourcebook of Paleolithic Transitions*［C］. New York：Springer，2009：245-254.

［41］张松林，刘彦锋．织机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J］．人类学学报，2003（22）：1～17.

［42］李占扬．许昌灵井遗址 2005 年出土石制品的初步研究［J］．人类学学报，2007（26）：138～154.

［43］贾兰坡，卫奇．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J］．考古学报，1976（2）：97～114.

［44］贾兰坡，卫奇，李超荣．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1976 年发掘报告［J］．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17）：277～293.

［45］王志浩，侯亚梅，杨泽蒙等．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J］．考古，2012（7）：3～13.

［46］Clarke DL. *Analytical Archaeology*［M］. London：Methuen，1968.

［47］贾兰坡，盖培，尤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2（1）：39～58.

［48］ 李超荣，郁金城，冯兴无 . 北京市王府井东方广场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2000（9）：1～8.
［49］ 裴文中. 周口店山顶洞之文化［M］. 中国古生物志新丁种第九号 . 北平：中国地质调查所，1939.
［50］ 张镇洪，傅仁义，陈宝峰等 . 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发掘简报［J］. 人类学学报，1985（4）：70～79.
［51］ 陈福友，李锋，王惠民等 . 宁夏水洞沟遗址第 2 地点发掘报告［J］. 人类学学报，2012（31）：317～333.
［52］ 湖南省考古研究所 . 彭头山与八十垱［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53］ 同［14］.
［54］ Keeley LH. Hafting and retooling：effects o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J］. *American Antiquity*，1982(47)：798-809.
［55］ 王志浩，侯亚梅，杨泽蒙等 .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J］. 考古，2012（7）：3～13.
［56］ 黄慰文.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A］. 中国远古人类［C］.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23～24.
［57］ 马歇尔·萨林斯著. 张经纬，郑少雄等译 . 石器时代经济学［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58］ Kuhn SL，Stiner MC. What’s a Mother to Do? The Division of Labor among Neandertals and Modern Humans in Eurasia［J］. *Current Anthropology*，2006，(47)：953-981.
［59］ Binford LR. Willow smoke and dogs' tails：hunter-gatherer settlement systems and archaeological site formation［J］. *American antiquity*，1980(45)：4-20.
［60］ Binford LR. *Constructing Frames of Reference*：*An Analytical Method for Archaeological Theory Building Using Ethnographic and Environmental Data Sets*［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
［61］ 王幼平 . 嵩山东南麓 MIS3 阶段古人类的栖居形态及相关问题［A］. 考古学研究（十）［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287～296.
［62］ 王佳音，张松林，汪松枝等 . 河南新郑黄帝口遗址 2009 年发掘简报［J］. 人类学学报，2012（31）：127～136.
［63］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二七区文化旅游局 . 郑州老奶奶庙遗址暨嵩山东麓旧石器地点群［N］. 中国文物报，2012-1-13（004）.
［64］ 王幼平，张松林 . 河南新郑赵庄和登封西施旧石器时代遗址［J］. 中国文化遗产，2011 年增刊：280～283.
［65］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 中原腹地首次发现石叶工业——河南登封西施遗址旧石器时代考古获重大突破［N］. 中国文物报，2011-2-25（004）.
［66］ Kelly RL.The three sides of a biface［J］. *American antiquity*，1988（53）：717-734.
［67］ 同［31］.
［68］ 柿子滩考古队 . 山西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 S14 地点［J］. 考古，2002（4）：15～28.
［69］ 柿子滩考古队 . 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第九地点发掘简报［J］. 考古，2010（10）：7～17.
［70］ 柿子滩考古队. 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 S12G 地点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2013（3）：3～8.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宜川县龙王辿旧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2007（7）：3～8.
［72］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市李家沟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11（4）：3～9.
［73］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新密李家沟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J］．中原文物，2011（1）：4～6.
［74］ 陈胜前．史前的现代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75］ Bordes F，de Sonneville-Bordes D．The Significance of Variability in Palaeolithic Assemblages［J］．*World Archaeology*，1970(2)：61-73.
［76］ Binford LR．Interassemblage variability-the Mousterian and the“functional”argument［A］．*The explanation of culture change*：*models in prehistory*［C］．London：Duckworth，1973：227-254.
［77］ 路易斯・宾福德著．陈胜前译．追寻人类的过去［M］．上海：三联书店，2009.
［78］ Binford LR. *Nunamiut Ethnoarchaeology*［M］．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8.
［79］ 同［3］.
［80］ Bednarik RG．The Middle-Upper Paleolithic transition revisited［A］．*Sourcebook of Paleolithic Transitions*［C］．New York：Springer，2009：273-282.
［81］ Chazan M．Techn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upper Paleolithic［J］．*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2010（19）：57-65.
［82］ Kuhn SL．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J］．*World Archaeology*，2004(36)：561-570.
［83］ Brantingham PJ．A neutral model of stone raw material procurement［J］．*American Antiquity*，2003(68)：487-509.
［84］ 同［35］.
［85］ Sackett J R．Isochrestism and style：a clarification［J］．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1986(5)：266-277.
［86］ 戈登・柴尔德著．陈淳，陈洪波译 . 欧洲文明的曙光［M］．上海：三联书店，2008.
［87］ 陈胜前 . 考古学的文化观 . 考古［J］，2009（10）：59～67.
［88］ 同［38］.
［89］ Seong C．Emergence of a blade industry and evolution of late Paleolithic technology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J］．*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2009(65)：417-451.
［90］ 同［31］.
［91］ Bar-Yosef O，Kuhn SL．The big deal about blades：laminar technologies and human evolution［J］．*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99(101)：322-338.
［92］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著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 . 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93］ Mithen S. *The Prehistory of the Mind*［M］．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96.
［94］ Hodder I. *Symbols in Action*：*Ethnoarchaeological Studies of Material Cultur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95］ Thomas J．Archaeologies of place and landscape［A］．*Archaeological Theory Today*［C］．Cambridge：Blackwell，2001：165-186.

The Upper Paleolithic Revolution of China：Problems of Research Paradigms

Chen Shengqian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Pleistocene modern humans colonized the world except the Antarctic continent. A series of important evolutionary changes occurred between 50ka and 10ka, sometimes called “the Upper Paleolithic Revolution” (UPR), while other researchers stress the process of gradual change, that is, it is transition. Since the Upper Paleolithic closely relates to the problem of so-called “behavioral modernity”, it has long been the hot topic of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in the world, including China. However, the studies are perplexed by the conceptual problems, and more widely involved with the paradigms to which these studies belong.

A comparison is made with the Neolithic Revolution, which was also proposed by Childe,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nature of the UPR. This comparison including many aspects of cultural systems such as subsistence, population, settlement, technolog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wo dimensions of relationships: human-environment and human-material. The UPR is apparently characterized by the emergent chang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 although there were also a number of other changes occurred. Comparatively, the scale of changes in the UPR is not as much as the Neolithic Revolution, but the changes in cognitive aspects are much more prominent. Undoubtedly,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that we should focus in the explanations of the UPR.

However, for a long time, the UPR has been assumed to be visible in lithic technologies and tool types, and to relate to the west to east diffusion of modern humans. In the case of North China, the Shuidonggou industry has some resemblance to the Mousterian or Aurignacian, seems to manifest the diffusion, and symbolizes the oldest “silk road”. Nevertheless, an adaptive perspective can better expla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huidonggou-like industry, which produces relatively standardized blades or flakes. Generally, this kind of industry fits well with mobile lifeways frequently depended on hunting. Its distribution along the transition zone from Northeast to Southwest China confirms the reality that the features of this industry were most likely resulted from subsistence diversity, rather than diffusion and replacement of the native populations by modern humans. The 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from Shuidonggou suggest that the typical Shuidonggou industry, characterized by blades and Levallois flakes, was superseded by the industry of small flake tool, 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most ancient tradition of small flake tool, that is, the Zhoukoudian industry. Other discoveries such as Zhijidong, Lingjing, Xiujiayao, and Ulan Moron, usually named the middle Paleolithic, show some features that are often used to define the Upper Paleolithic. In other words, the UPR is largely transitional in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typology.

In contrast, the adaptive perspective focuses on the behavioral meaning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includes the explanations of why and how some Upper Paleolithic feature emerged or came into being. It can be effectively used in explaining the origin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and even the origin of food production. According to the adaptive advantage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in highly mobile foraging, theoretically, this technology should be the most necessary in the milieu of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when resources became more patchy for ancient hunter-gatherers, and the optimal zone to use this technology would be the forest-grassland ecotone. The recently well-dated sites such as Longwangchan, Shizitan and Xishi, produce the earliest dates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around 22ka, quite concordantly with the hypothesis (Chen 2008). The final Pleistocene discoveries in Shizitan and Lijiatou show a very interesting bifurcation in the Paleolithic-Neolithic transition of North China. The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of Shizitan represent continuously high mobility of hunter-gatherers in foraging, whereas the Lijiagou record indicates much lower mobility that is generally required in developing sedentism. However, with this perspective, we still do not explain why and how the UPR occurred, rather than that four regionally adaptive patterns are differentiated in the early Upper Paleolithic of North China.

To understand the UPR, we might need some new paradigms. In the discussion, a cognitive processualism is suggested because it touches the prominent feature of the UPR, the change of human-material relationship. The prehistoric evolution of mind can partly explain the special meaning of UPR. Furthermore, this kind of change is involved with human agency in that humans used materials to symbolize social identities and express their existence in terms of visual forms, that is, a spiritual world. In the UPR, modern humans remaded the world in a meaningful way, and thus, the world became meaningfully constituted by human agents. This paradigm stressed meaning and agency in human history is generally accord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 Therefore, to deeply explore meanings of the UPR, we may need to use four paradigms simultaneously and synthetically, rather than only depended on the techno-typological one (e.g., cultural historical paradigm). In conclusion, a multi-dimension research paradigm is suggested to widen the research field of Chinese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and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n the history of human evolution.

Key words: Upper Paleolithic Revolution; Paradigm; Adaptation; Human-material relationship; 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

1949 年前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的形成与发展*

宋　姝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长春，130012）

第四纪是地球历史的最新阶段，最早于 1829 年由法国学者德努埃（J.Desnoyers）提出。包括更新世和全新世。更新世又分为早、中、晚三期，即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主要时期，在我国结合地层特点则被称为泥河湾期、周口店期及马兰期[1]。在这一纪，发生多次冰川活动，使得全球气候急剧变化。但是最突出的特点还是出现了人类，因此“第四纪”又被称为“灵生纪”。哺乳动物在这一时期与上新世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进化，并且种类增多、分布范围扩大。受冰川活动的影响，在促成一部分生物进化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生物的绝灭。在第四纪地层中搜集或发掘得来的哺乳动物遗存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简单来说，对于这些哺乳动物遗存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地层年代、还原当时的生态环境、探索物种演化的规律、了解人与动物的关系等问题。哺乳动物遗存本身就难以保存，它们的研究价值更是难以估量。下面我将根据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研究的发展情况及相应的成果来谈一谈对其发展历程的认识。

一、萌芽时期

我国对于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发现的比较早，王炳章、李仲军认为最早关于“龙骨”的记载见于《史记·河渠书》：“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穿渠得龙骨，故名龙首渠。”[2]

此外，《神农本草经》《水经注》《梦溪笔谈》等典籍中都不乏动植物化石的记载。例如《水经注》有十几处记载了发现的化石，包括软体动物的壳体化石，鹿、马、虎等动物化石以及人类化石。再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根据化石的发现来推测古今气候的变异情况，并给出了较为科学的解释。这是中国学者利用遗存揭示客观事实的一大进步，它脱离了以往单纯利用遗存研究历史的框架。不同于传统的金石学，更加理性，以

---

* 本科教学改革项目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项目（2013285）的资助。

科学的眼光阐释现象。可见当时我国学者对地质科学已经有所领悟，这比文艺复兴时期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认识到化石是生物遗存要早 400 多年。虽然说 19 世纪 30 年代由莱伊尔（Lyell Charles）提出的均变论是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但是不得不说中国这些较为质朴的成果更显得难能可贵。

但是由于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有限，人们还不能对这些化石产生完全科学的认识。更多的人将它们称为“龙骨”，认为有止血和镇静的作用，长期以来作为中药使用。我觉得在清代以前中国的自然科学发展并不落后于任何西方国家，可惜的是中国自然科学发展速度明显呈现缓慢的态势，相反哲学和文学方面却硕果累累。西方的自然科学研究后来居上，很大的原因是出于西方经济迅速发展对其产生的强烈需求。而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科技本身并没有多大的要求，即并非社会的主流需求。

二、形成时期（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

中国的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相关研究并没有从古代转型为具有科学体系的现代学科，仅仅止步于对化石的发现与简单的描述和推测阶段。使得它重回大众视野的是那些来中国传教的教士及因为各种原因来华的外国学者，这些化石令他们很感兴趣，并且不断进行相关考察与收集。中国最早的一篇关于哺乳动物化石研究的论文是英国学者欧文（Owen R.）于 1870 年发表的《中国的哺乳动物化石》，它拉开了对中国哺乳动物化石研究的序幕。不过初期的研究方式相对简单，大多数只是对第四纪哺乳动物骨骼遗存进行鉴定、简单统计和初步研究，并不具备完整的体系和现代研究目的的多样性。随着研究材料的逐渐积累以及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研究才逐渐走向正轨。

与国外相比，我国具有时空分布极为丰富的第四纪哺乳动物遗存，但是从理论、方法、技术层面来看都是零。直到现在，我们一些方面研究仍落后于国外。继第一篇关于哺乳动物化石研究论文发表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多外国学者来到中国主持发掘研究，并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这与中国考古学的形成出奇的相似，最初在中国主持发掘工作的基本上都是古生物学家与地质学家，因此在发掘方式与研究方法上会很大程度上承袭其学科特点。外国学者在研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后来接手工作的中国学者也多为国外留学的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和考古学家。同时，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使得科学与民主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再加上西方自然科学的传播与引进，使得中国的研究工作受到了较为科学的引导，并逐渐结合自身的特点，不断发展壮大。不过这一转变也经过了漫长而艰苦的过程，毕竟从无到有就是一种飞跃。

（一）外国学者的工作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步达生（Davidson Black）、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桑志华（Emile Licent）等都是被我们考古工作者所熟知的外国学者，他们为中国考古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在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的形成与发展方面也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我们在了解学科发展特点与历史的时候，往往很多工作就是要知道当时科学家的科学实践，从他们的实际研究历程中来体会当时的时空框架之下所应用的理论方法与技术。才可以得知我们现在的位置，我们在相关研究中欠缺的是什么，我们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在日后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下面简单列举几位颇具代表性的外国学者，及其研究成果与贡献。

（1）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941 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受到北洋政府的聘请，来华担任矿政顾问。期间他从中药铺里收集了许多哺乳动物化石。1918 年他来到“龙骨产地”——周口店进行考察，并采集了许多小哺乳动物化石，次年发表《直隶省房山县周口店骨化石堆积的初步观察》一文。这篇文章最先向人们介绍了周口店洞穴堆积及出土的化石情况，使周口店遗址正式进入了研究学者们的视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3]。他在后来的工作中与古脊椎动物学家师丹斯基合作，在周口店的几个地点进行试掘。1926 年进行整理的时候，发现了两颗牙齿化石，证实了中国猿人的存在，拉开了周口店遗址大规模发掘的序幕。周口店遗址是中国考古人的圣地，在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项轰动世界的发现吸引了更多的外国学者加入到研究的行列中，并组织了数次大规模的化石搜索与发掘工作，是中国科研活动的一大助力。同时，安特生在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突破，比如对于“仰韶文化”的命名，揭开了中国田野工作的序幕；“彩陶文化西来说”现在看来并不正确，但是也促成了后来更多的学者进行积极思考；在发掘中更加注重从遗址中提取信息，并运用地质学中辨认土质土色的方法来研究遗迹现象的研究方法更是影响至今。

（2）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法国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从 1923 年开始先后九次来到中国。他被中国科学界看做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者和引路人，贾兰坡先生称他为“最敬爱的老师”。1922～1923 年，德日进与桑志华（Emile Licent）在萨拉乌苏地区做了调查与采集，发现了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之后进行了简要报导。1923 年，德日进与桑志华在宁夏水洞沟发现旧石器遗址两处，其中包括不少动物化石。1928 年，德日进与布勒（M.Boule）对萨拉乌苏地区采集到的 44 种脊椎动物化石（其中包括 33 种哺乳动物化石）进行研究，并发表了正式报告。萨拉乌苏动物群自此成为了北方地区晚更新世的一个代表性动物群，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4]。1929 年应邀担任中国地质研究所新生代研究室科学顾问和合作研究者，同时负责《中国古生物报》的出版工作。上面的文章主要为英文出版，为读者介绍了许多新科学与新知识，对中国考古学与古生物学的发展尤其重要。1940 年，德日进在北京建立“大陆生物研究所”。他发表过上百篇学术论文，对中国的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步达生（Davidson Black）：加拿大解剖学家，于 1919 年受邀来华，后来担任

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系主任。长期以来为周口店的发掘经费问题奔走游说，为中外联合发掘周口店遗址做出了很大贡献。被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称为“真正的朋友”。1927 年，他根据周口店遗址中发现的三枚人牙化石，判定属于一个个体。并于同年发表学术专著，其中建立了一个新的人科新属新种，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5]。1929 年隶属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新生代研究室成立，步达生任名誉主任。这是我国第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古生物学特别是古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开创了新生代研究工作的新局面。在华期间，他共组织周口店遗址 14 个地点的发掘，至少出版了十本专著和多篇学术论文，开创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新局面[6]。

（二）国内学者的工作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所做的工作比较少，多数是当外国学者的助手，学习理论、发掘与研究方法。在《吴汝康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当时根本看不起中国，并不愿意让中国人类学家参与这项研究，也不相信中国专家有这方面的研究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这一研究成果由他们向世界公布，而不是中国向世界公布，所以，他们根本不可能让中国科学家参加研究工作。”[7]这是最初外界对于中国学者学术能力的普遍偏见。北京猿人化石是举世瞩目的伟大发现，作为我国宝贵的研究资料之一，我国学者有权利也有责任对其进行研究。当时我国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还存在很多不足，但是学者们仍然在不断地努力学习。尤其是周口店遗址的早期工作培养了中国的第一批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的研究专家，他们逐渐成长为日后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逐渐把研究的主动权从外国学者手中拿回。

1927 年，我们中国人终于发表了第一篇有关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论文，即我国古脊椎动物学奠基人杨钟健的博士论文——《中国北部之啮齿动物化石》[8]。这篇文章用德文发表于《中国古生物志丙种》，它标志着中国学者对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研究的正式开始。

1927 年，我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与孙云铸相互表达了想要成立古生物学会的意愿。他们回国后不久，即着手筹备。1929 年 8 月 31 日，中国古生物学会在北平中心堂召开成立大会。创办之初仅有丁文江、葛利普、孙云铸、俞建章等十人。会议选举孙云铸为会长，并通过了会章[9]。同年 9 月 17 日，于北平兵马司地质调查所召开了常委会首次会议，并在会议中宣讲了三篇学术论文。成立之初，学会的运营举步维艰。又因学会本身没有自己的刊物，工作失去了重心。

1929 年，为了进一步合作发掘周口店遗址，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协和医院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它是我国第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古生物和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新生代研究室成立和周口店十年大规模发掘，使得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的研究大规模展开，有了更多的成果，同时奠定了学科的基础框架。

（三）学术刊物的助力

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的产生与发展同样离不开一些学术刊物的助力，这些学术刊物所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向研究学者们展示了当时的学术动向与最新技术成果，还将中国学者的工作所得展示给世界，让世界学术界看到我们的努力与进步，让更多的人信任我们，同时增进了交流与合作。纵观当时的学术刊物，虽然种类不多，但是在学科初建伊始便积极筹办，其中的艰难自不必说。1949 年前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以下四种刊物上。

（1）《中国地质专报》（Mem. Geol. Surv. China）：1919 年，中央地质调查所在北京创办。发刊时间不固定，分为甲、乙、丙三种。甲种主要刊登专题研究成果和大面积区域地质报告，乙种刊登地质相关编译著作和报告，丙种刊登中国矿业纪要[10]。关于第四纪哺乳动物研究的文章主要刊载在甲种和乙种上。

（2）《中国地质学会志》（Bullel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创刊于 1922 年，丁文江担任编辑部主任。刊发论文多以英文为主，德、法等文次之。每年一卷，刊载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地质调查研究之所得及在学术年会中宣读的论文[11]。共出版过 31 卷，其中的论文涉及与地质学有关的研究成果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学术成果。于 1952 年与《地质论评》合并，更名为《地质学报》。它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的地质期刊，其中包括许多关于第四纪哺乳动物的研究，是早期指导学者们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

（3）《中国古生物志丙种》（Pal. Sin. Ser. C）：《中古古生物志》创刊于 1922 年，由前地质调查所刊行，均以英文出版，并逐年递增新种。其中详细记录了我国地层中所发现的各个地质时期的各种化石，并讨论了其相互之间的演化关系。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共分为四种：甲种为《古植物化石》，乙种为《古无脊椎动物动物化石》，丙种为《古脊椎动物化石》，丁中为《史前人类研究》。它是研究中国古生物学的一部重要的工具书[12]。研究第四纪哺乳动物主要关注的是丙种中的相关论述。

（4）《地质论评》（中文）：1936 年，由中国地质学会谢荣家等理事提议创刊于北平。主要刊登地质学及相关学科的论文、报告、书评和新闻。创刊的目的在于考虑到在中国地质学会创办之初就发行了《中国地质学会志》，主要以英法德三国文字发表，独缺中文刊物，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信息的获取与知识的传播。因此，在 1963 年春天在南京召开的第二十次中国地质学会年会的时候，理事会决定发行中文的《地质论评》。其内容除专门的学术报告和论文之外，还包括国内外地质书报的摘要以及地质相关机关和地质界同人的近况，以便使读者掌握相关信息并增长见闻。至 1949 年共出版 14 卷，之后继续发行至今。它是我国当时唯一的定期发刊的地质刊物，开阔了更多学者的眼界，对我国学术界影响深远。

这些都是当时比较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刊物。从创刊之初到 1949 年之间，由于时局动荡、相关研究人员有限以及经费紧张等问题，大多数刊物发刊时间不固定甚至一度停刊。不过对学术的执着以及读者们的支持是支撑它们走下去的强大动力，很多刊物直到今天还在学术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形成时期的特点：

（1）研究工作由外国学者主导，以调查和搜集材料为主，发掘工作较少。虽然大量哺乳动物化石被运往国外，但是这仍然促进了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的学科发展。

（2）我国还没有形成学科体系，给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受五四运动影响，中国学者不断引进外国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另外大量进行第四纪哺乳动物研究的学者也多为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出身，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发展方向。本学科以地质学上的均变论为理论基础，发掘方法与研究方式上多继承了西方的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传统，同时中国第一批第四纪哺乳动物学专家从中成长起来。

（3）研究目的单一，大多数时候并无明确的研究目标，从古生物遗存中解读到的信息有限。最初学者们对古生物化石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对找到“猿人”化石的一种期待。

（4）当时相关刊物较少，而且多以外文发刊，但它们仍是学者们获得相关信息的主要来源，对于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三、初步发展时期（19世纪30年代到1949年）

这一时期，我国的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研究才算是初步走入正轨。虽然成果不是很多，但是与上一时期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中国学者渐渐掌握了研究的主动。不过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发展变得缓慢，田野工作一度停滞，室内的研究工作也受到很大影响。不过这个期间日本学者所做的工作增多。

从 1929 年到 1934 年，杨钟健和裴文中陆续发表了 7 有关周口店和华北地区地层中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专著以及 40 多篇有关哺乳类化石和新生代地层的论文。

1930 年，德日进发表了专著——《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把下沙沟一带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称为“泥河湾动物群”。在这本书中共记述了 42 种标本，可鉴定 18 个种。这是我国能够与欧洲维拉方期动物群直接对比的最丰富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动物群，在我国第四纪哺乳动物研究领域中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1931 年，尹赞勋在哈尔滨顾乡屯发现了包括披毛犀和猛犸象在内的 19 种哺乳动物化石，命名为“顾乡屯动物群”。并于同年在《中国地质学会志》上以法文发表报告《哈尔滨附近第四纪哺乳类动物化石群之发现》[13]，记述内容包括地层、化石地点，详细描述了哺乳动物化石，对动物群时代也进行了讨论。顾乡屯动物群代表了东北地区晚更新世的河湖相沉积，与华北的萨拉乌苏动物群属同期异地同向沉积。这是我国学者对

东北地区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地点进行的第一次研究考察，是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在东北地区进行研究取得的最主要成就，奠定了我国东北地区第四纪研究的基础[14]。

1933 年杨钟健、裴文中以及步达生、德日进合作发表了《中国原人史要》(Fossil Man in China)。这本著作集地层、人类化石、哺乳动物和旧石器于一体。另外，德日进发表了周口店第 9 地点、第 12 地点以及第 13 地点（与裴文中合作）的哺乳动物化石。卞美年发表了周口店哺乳动物以外的其他类动物化石。王恭睦发表了周口店第 1 地点的犀牛化石。步林（Bohlin，B）和巴博尔（Barbur，G.B）发表了有关周口店以及北京西山一带的地质地层方面的报告。值得一提的是以周口店第 1 地点洞穴堆积中的中、晚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群为代表的周口店动物群，其中化石种类丰富，包括肿骨鹿、葛氏斑鹿、洞穴斑鬣狗、最后剑齿虎、德氏水牛等都是当时特有的新种。

周口店遗址在 1937 年“七七事变”之后被日军占领，发掘工作被迫中止，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恢复发掘。周口店遗址是我国第四纪哺乳动物研究的主要阵地，它的发掘对于人才培养与学科体系的建立有深远的意义。

初步发展期的特点也十分鲜明：

（1）中国学者逐渐掌握了研究工作的主动，不再仅为外国学者工作的副手，他们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学科体系基本成形，使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的学科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学科初建理论、方法、技术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研究技术人员短缺，资金匮乏，再加之时局动荡，可谓举步维艰。

（2）发掘方法上有所改进，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上按探沟加探方的方法，注重对地层的区分，绘制平、剖面图，并进行照相记录。

（3）初步发展期前段的研究成果十分显著，我国在华北、华南、东北地区的哺乳动物群研究上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其中华北地区主要是对以周口店为中心的中、晚更新世洞穴哺乳动物群进行研究；华南地区主要是以云南元谋早更新世河湖相和四川万县盐井沟以及云南富民河上洞中更新世洞穴哺乳动物群的研究；东北地区是以对哈尔滨顾乡屯晚更新世河湖相哺乳动物群的研究。

（4）在初步发展期的后段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爆发，发掘工作一度停滞，但是相关的学术工作者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将重心由发掘工作转向综合研究。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学科发展受阻，很多相关的学术刊物被迫停刊。但由于前段所打下的良好基础，使得 1949 年之后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的发展又呈现出繁荣的趋势。

（5）研究目的与研究手段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学者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动物化石本身，还关注它们所能说明的问题。比如对动物群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划分地层并确定遗址的相对年代；对于哺乳动物群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自然环境及气候情况；对于各种动物化石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种类动物当时的地理分布情况等。当时的研究重点是新生代晚期的哺乳动物及与人类化石有关的生物地层方面。

四、总　　结

经过了以上三个阶段，我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的发展又经历了飞速发展时期，和现在的繁荣时期。新中国成立标志着我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研究的新起点[15]，之前由于战争而停滞的各项发掘工作很快恢复。1949 年以来，随着我国不断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经济发展，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不断被发现。例如在 20 世纪 50 年代由于修筑成渝铁路发现了资阳人和资阳动物群、在修三门峡水库的过程中发现了西侯度、匼河动物群，在治淮工程中发现了下草湾和新蔡动物群等。在华南特别是广西山洞一些重要发现（如巨猿洞动物群等）也与当地农民寻找和挖掘肥料有关。改革开放以来，第四纪地层和哺乳动物的发现在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展开，相关的研究工作也更加深入细致，研究成果也更加丰硕。

经过了多年的发掘与研究，我国已经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第四纪哺乳动物区划。目前，除了西藏地区外，在华北、华南以及东北都发现了第四纪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动物群。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发掘方法的改进、筛洗法的运用，在小哺乳动物的发现和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在与国际接轨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研究领域中的空白点逐渐被填补。

纵观我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的发展历程，从无到有，中间经历几度波折，但是在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之下，还是于漫长的历程中克服了重重困难发展至今。随着研究理论、方法、技术的不断完善，专业研究机构与人员的不断增多，研究资料的不断积累，相关法律支持的不断健全，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深入，我们在学科建设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应该看到其中存在的多处不足，在批评反思与总结中才能不断取得进步。

致谢：本文得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王春雪老师的悉心指导。

注　　释

［1］张之恒，黄建秋，吴建民 .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王炳章，李仲均 . 对甄朔南著《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古脊椎动物的一些记载》一文的商榷［J］. 古脊椎动物学报，1956，9（3）：306～308.

［3］程新民 . 在周口店遗址工作过的外国学者［J］. 化石，2006（3）：26～27.

［4］谢骏义，高尚玉，董光荣，李保生 . 萨拉乌苏动物群［J］. 中国沙漠，1995，15（4）：313～322.

［5］Black，D. On a lower molar hominid tooth from the Chou Kou Tien deposit［J］. *Palaeon to logia Sinica and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1927，Series,Vol（1）.

［6］钱益汇 . 步达生与近代中国的科学事业［J］. 齐鲁学刊，2007（5）：55～60.

［7］ 张森水 . 龙骨山精神赞（上）——以史为鉴［J］. 化石，2008（1）：42～45.
［8］ 杨钟健 . 中国北部之啮齿动物化石［J］. 中国古生物志丙种，1927，5（3）.
［9］ 中国古生物学会简史 .http://www.china-psc.org.cn/lszl/index.asp?leibieid=45.
［10］ 张银铃 . 中国地质学期刊的演进［J］.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05，7（4）：32～38.
［11］ 地质学报（英文版）简介 . http://www.geojournals.cn/dzxbcn/ch/first_menu.aspx?parent_id=2008061865532001.
［12］ 徐祖友，沈益 . 中国工具书大辞典［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0：11.
［13］ 尹赞勋 . 哈尔滨附近第四纪哺乳动物类动物化石群之发现［J］. 中国地质学会志，1931，11（2）：155～159.
［14］ 丁梦林，刘东生 . 尹赞勋先生对第四纪研究的开拓性贡献——兼论顾乡屯动物群及其时代［J］. 第四纪研究，1994（2）：143～153.
［15］ 周明镇 . 中国的古脊椎动物学研究（1949～1979）［J］.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17（4）：263～276.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Quaternary Mammology before Liberation

Song Shu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a, there is no lack of the discovery of Quanternary mammal fossils. But a more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study is later than the western. In this paper,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liberation of Chinese Quaternary mammal science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Review the infancy and the rise of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and elabo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rmation and initial development stage. It introduces more representative of academic development events, distinguished archeologists, as well as important academic works related publications. Because no one has done before the related work is described a brief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 there is a big difficulty in collecting and sorting the material. In writing, there are also some drawbacks.

Key words: Chinese quaternary mammal science; geology; paleontology; mammal fossil

赫列克苏尔遗存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特尔巴依尔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乌鲁木齐市，830011）

19 世纪末期，在中亚旅行的旅行家和学者们首先发现了赫列克苏尔遗存，其后百余年的时间内，俄罗斯和蒙古国的考古工作者对此类遗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调查收集及研究工作，发表了很多论著，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国内对该遗存的研究较薄弱。对此情况，本人搜集蒙古国近十年来发掘的赫列克苏尔遗存的材料，并对其进行分析和梳理，提出本人对赫列克苏尔的粗浅的观点，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赫列克苏尔名称的由来

中心用石块堆砌成圆形石堆，外围用石块有序地铺成圆形或方形“石围”[1]，中心石堆和外围“石围”之间再平铺石块形成射线状连接，这类圆形或方形的积石建筑在考古学上被称为“赫列克苏尔”。“赫列克苏尔”（хиргисүүр）一词来源于蒙古语的“克尔克孜胡尔”（киргисхүүр），最早迁至蒙古中西部地区的蒙古部落看到该遗存便误以为是 9 世纪曾活跃于该地区的吉利吉斯（又称纥里迄斯）人的墓葬，蒙语中“吉利吉斯”（kirgiz）音译成汉语为“克尔克孜”，于是当地牧民就将“克尔克孜”（киргис）与“胡尔”（хүүр，蒙语中意为“墓葬”）二词结合形成了“克尔克孜胡尔”（киргисхүүр）一词，并逐渐成为一种习惯称谓传承到现在，后被考古学界引入。现蒙古国中西部地区对这种遗存的叫法稍有区别。如：蒙古国西部地区的人们把这一遗存称为（хялгасанүүр，киргизхүүр），而蒙古国中部地区的人们称为（хиргэсүүр，хиргисүүр）[2]，新疆阿勒泰、塔城、博尔塔拉、伊犁州乌苏、昭苏和巴州的蒙古族也称之为（хялгасанүүр，киргизхүүр）。这四种叫法中唯独 киргизхүүр 具有吉利吉斯人的墓葬的意思，其他三个叫法没有实际意义，只不过是方言和名称由来久远等原因造成的音变而已。其实，赫列克苏尔的确是一种集墓葬和祭祀为一体的考古学遗存，但却与 9 世纪时的吉利吉斯人没有任何关系，其年代也比吉利吉斯人至少要早一千年。

从概念来看，赫列克苏尔是由中心石堆、圆形或方形的石围、射线状结构这三个部分的地表建筑所构成的墓葬，但目前调查所见的赫列克苏尔的情况却复杂得多：有些赫列克苏尔只有中心石堆和石围，没有连接二者的射线状结构；有些赫列克苏尔则不仅有

墓葬，往往还附属有占地面积较大、结构较为复杂的祭坛，祭坛或为鹿石（通常竖立在赫列克苏尔和祭坛的东面或东南面），或为小型圆形石堆和环形石圈的组合，或为三者兼而有之。

二、研究现状

如前所述，在中亚的阿尔泰、图瓦、外贝加尔以及蒙古等地区旅行的旅行家和学者们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最早发现了赫列克苏尔，并将其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下来[3]，其后百余年间考古工作者借助这些记录对赫列克苏尔进行了广泛的发掘和较为深入的研究。

在这方面，俄罗斯考古学家堪称先行者。1890 年，Ю. Д. 达里科－格林采维奇在外贝加尔地区首次发掘了一批赫列克苏尔，其中绝大多数只是在距地表深约 25～50 厘米处出土了少量的腐烂骨头，并没有出土其他能够体现年代的遗物[4]。只有名为“干泉”（СухойКлюч）的墓地的一个赫列克苏尔中发现了能够帮助推断年代的人和家畜的颅骨，其中一个人的颅骨标本由于前额扁平、后脑勺较宽、面部的宽度也显得不合比例，使得 Ю. Д. 达里科－格林采维奇推定这些赫列克苏尔的时代属石器时代，并推测在修建赫列克苏尔的时代，外贝加尔地区生活着各式各样的人种[5]。

1925 年，Г. И. 巴洛夫卡在蒙古的图拉河右岸发现了一批各种形式的赫列克苏尔，在将它们标注于地图上的同时，还对这些赫列克苏尔的形制及其附属建筑物进行了细致的文字描述[6]，并通过对附属建筑分布顺序的研究提出了赫列克苏尔的正面朝向应该是东或东南方向的观点。其后，他又先后在塔日尼德高勒（Тарантыв-Гол）流域和纳音托－苏木（Наинто-сум）各发掘了一处赫列克苏尔。他根据前者封堆直接叠压在生土之上的情况推定那些所谓的陪葬墓才是赫列克苏尔中真正用来埋葬死者的地方，由后者所出土的马骨联系到突厥人墓葬中随葬马匹的传统而将赫列克苏尔的时代认定为突厥－奥古兹人时代[7]。

进入 20 世纪 40 年代，有关外贝加尔地区赫列克苏尔的发掘和研究在 Ю. Д. 达里科－格林采维奇所做工作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8]。一些赫列克苏尔的封土中出土有铁鍑和包含属东亚类型甲片的铁器残件以及两类很有特色的灰陶，其中形制较为古老的一类为当地制造且技术较为粗糙，另一类制造技术较为先进的则与叶尼塞河流域和蒙古北部地区发现的陶器类似[9]。据此 А. П. 奥科拉德尼科夫推定这些赫列克苏尔当为中世纪的回鹘人或是突厥人的贵族墓葬，年代应在 6～9 世纪[10]。另一位考古学家 Е.А. 哈姆辛娜在对布里亚特考古遗存进行总结时也依据封堆中出土遗物的年代而将赫列克苏尔的年代推定为 10 世纪前后[11]。

俄罗斯图瓦地区赫列克苏尔的发掘和研究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 С. А. 捷普楼霍夫的工作[12]，到 50～60 年代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А. Д. 格拉奇发掘了乌鲁格－哈

鲁姆地区的一批赫列克苏尔，并把它们与很多学者所认为的作为赫列克苏尔源头的莫尼衮－塔伊嘎文化进行了细致的比较研究，指出：尽管跟莫尼衮－塔伊嘎遗存一样，这些赫列克苏尔的封堆下面也是无任何随葬品的单人墓葬[13]，但二者却没有任何关系，莫尼衮－塔伊嘎遗存属于青铜时代[14]，赫列克苏尔属于斯基泰时代，这批赫列克苏尔是斯基泰时代的萨格勒文化冢墓中用于祭祀的祠堂[15]。与 A. Д. 格拉奇有所不同，M. X. 曼纳伊奥勒和 Л. P. 克兹拉索夫均认为赫列克苏尔是斯基泰时代的墓葬[16]，不过二人也有差异：作为首位将赫列克苏尔视为一种独特墓葬类型的研究者，M. X. 曼纳伊奥勒虽然认定赫列克苏尔封堆中出土遗物的时代为乌尤克时期[17]，但却没有举出让人信服的具体例证，在对乌尤克文化遗迹进行分期研究时也没有将赫列克苏尔这种墓葬类型归入前者的序列之中[18]；Л. P. 克兹拉索夫则根据德特德格合姆河流域一处赫列克苏尔石圈内巨石上的图画与一些鹿石上的图画很相似这一现象[19]，认为图瓦南部地区的一些赫列克苏尔的时代属乌尤克文化的早期阶段。

20 世纪 70 年代，M. B. 科尼斯塔尼季诺夫在希洛克河流域发掘了一座赫列克苏尔[20]，并根据封堆中所出土的陶片、铁镰和勺状扣环等遗物的年代，将这座赫列克苏尔的时代认定为匈奴时期。

蒙古国对此类遗存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相对薄弱，1988 年蒙古与苏联历史文化联合考古队在扎布汗省托松青格勒苏木（Тосонцэнгэлсумын）附近发掘了 5 座赫列克苏尔。其中 2 座赫列克苏尔中心石堆外有方形石围，四角都有圆形小石堆，其他 3 个未见有石围。其中三座赫列克苏尔的中心石堆下发现有安葬的痕迹，其他两座是祭祀遗址[21]。

1990 年以后蒙古与法国联合考古队在色楞格河流域的布尔干省胡塔格－文都尔（Хутаг-Өндөр）苏木地区的艾格、鄂尔浑和图拉等河流域发掘了大小不等 20 座赫列克苏尔。他们发现这些遗存的葬俗、祭祀方式和年代跟贝加尔湖一带的赫列克苏尔相同[22]。1999、2003～2006 年蒙古与日本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西北部库布苏古尔省乌兰乌西格Ⅰ号遗迹，共分 5 个季节进行了发掘。他们分别在 1 号赫列克苏尔和 12 号赫列克苏尔的中央石堆下发现了石棺，在 12 号赫列克苏尔的石棺里还检验出 5～6 岁小孩的骸骨。此外，在 1 号赫列克苏尔东侧的大部分石堆里发现了鼻面朝东的马头骨和胫骨的组合，同样的组合在鹿石周围的小石圈和石堆里也有出土。所以他们认为赫列克苏尔是作为墓葬而建造的，建造赫列克苏尔和鹿石的是同一群人[23]。2001 年蒙古与比利时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布尔干省达新其林苏木地区哈日布哈河右岸发掘了 1 座赫列克苏尔。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中心石堆下，原地表上仰身直肢葬的人骨，面朝上头向西，未发现任何随葬品和葬具。清理中心石堆时在石堆之间发现保存较好的青铜管銎斧 1 件。2003～2009 年蒙古国民族博物馆与美国史密森尼学会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库布苏古尔省地区对鹿石与赫列克苏尔进行了多学科综合研究。他们在库布苏古尔省发现 2000 座赫列克苏尔，发掘了其中 43 座赫列克苏尔。2011 年开始蒙古国民族博物馆与美国史密森尼学会联合考古队对蒙古阿尔泰地区巴彦乌列盖省青格勒苏木霍通湖比鲁特岩画（Хотоннуур-

Билүүттолгойн）进行了考古调查，同时也对岩画附近的墓葬、赫列克苏尔和鹿石进行了发掘与调查工作。

与前述俄罗斯外贝加尔、图瓦地区和蒙古国的赫列克苏尔既有发掘又有研究不同的是，戈尔诺 – 阿尔泰地区的赫列克苏尔虽然也有记录，但却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只有 В．Д．库巴列夫对其中的几处进行过调查。根据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一些灰色斑点和动物骨骼，库巴列夫认为这些赫列克苏尔的性质是祭祀场所，时代为青铜时代和斯基泰时代[24]。

20 世纪中后期，中国的新疆地区也发现了不少赫列克苏尔，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学者却并未认识到它们就是赫列克苏尔，而将其命名为“石堆石围墓”。近些年来因配合基建有些地方零星发掘过几座小型的赫列克苏尔。国内学者们在这类遗存的年代或文化属性等问题上众说纷纭。新疆境内较为典型的赫列克苏尔遗存是位于新疆阿尔泰青河县查干郭楞乡三道海子的一处“巨石冢”。此遗存是 1965 年首次被发现，1986 年王明哲才向学界报道这重大发现[25]，此后陆续有学者和考古调查队到三道海子实地调查。1999 年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亲自调查并撰文探讨该遗存的相关问题。他认为阿尔泰山三道海子大石冢的年代为公元前 8～前 7 世纪，是独目人的王陵[26]。刘学堂和吕恩国认为三道海子“大石冢”不是王陵而是用于祭祀的太阳神殿[27]。郭物认为中亚东部草原地区以鹿石为主要特点的考古遗存可以认为是一种考古学文化，以“三道海子文化”来命名该考古学文化，还将该文化按分布地域划分为三种类型，即蒙古和外贝加尔区以库苏古尔省为中心的乌什金类型、图瓦和阿尔泰部分区以阿尔赞为中心的阿尔赞类型、新疆阿尔泰、天山和蒙古科布多以三道海子为中心的三道海子类型。其年代为公元前两千纪晚期至公元前一千纪前期。文化属性上与林梅村的观点一致，属“独目人”的遗存[28]。2006～2007 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院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对新疆巴里坤县东黑沟石构房屋遗址和墓葬进行了发掘。虽然这些遗存与早期游牧民族有关，但文化面貌和年代都比赫列克苏尔晚，从墓葬中出土的遗物看与巴泽雷克文化有关。2010 年夏，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基金的资助，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与富蕴县文物局、清河县文物局合作，在该地区进行了专题性田野调查[29]。2012 年为配合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努尔加水库的建设，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水库涉及的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古墓葬 53 座，其中 M3、M33 与赫列克苏尔很相似[30]。2013 年 6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阿勒泰地区文物局和青河县文物局组成的考古队对阿尔泰地区青河县查干郭楞乡三道海子墓葬与鹿石遗存群中的花海子 3 号进行考古发掘。该遗址由中心石堆，外围圆形石围和十字形石道或辐射线组成，如车辐状。东西直径 77.8 米，中心石堆直径 33.8 米，西北和东北已被湖水破坏，东南和西南保存较好。整个遗址呈不规则圆形。石围外侧发现 49 座石构祭祀址。这次发掘过程中出土 81 件五边形石板，其中 8 件上有雕刻图案，外形上与鹿石上学者们认为的盾牌的图案一样，雕刻图案也很相似。上部片中间位置雕刻圆形图案，其他都是人字形的图案。郭物先生认

为这些雕刻有图案的石板很有可能跟萨满教祭祀礼仪或崇拜有关[31]。

由于国界和语言不通等问题，国内学术界一直没有把这些遗存跟蒙古、俄罗斯地区的赫列克苏尔进行比较研究，直到最近一些学者在了解国外发掘赫列克苏尔遗存的资料后，与国内该类遗存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这些大石冢与蒙古、俄罗斯地区的赫列克苏尔是同属一个文化体系。但对其具体文化性质的看法与刘学堂、吕恩国一致，该遗存为祭祀遗址[32]。

此外，在哈萨克斯坦东部和吉尔吉斯也发现了一些周围环绕着圆形或正方形围墙的坟冢[33]。

三、赫列克苏尔的分布及其形制分类

1. 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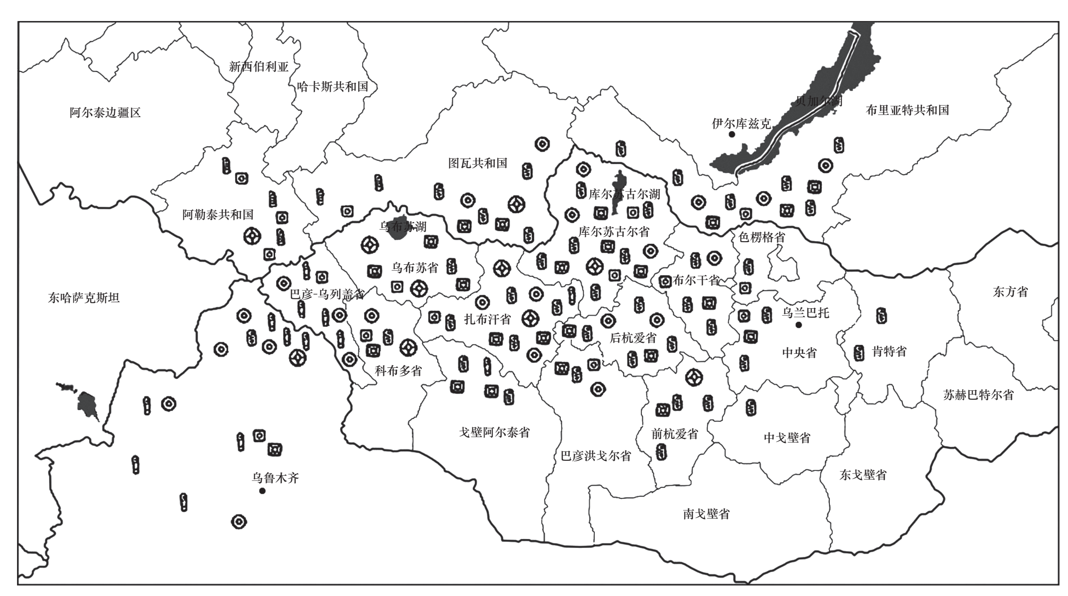
如前所述，赫列克苏尔广泛分布于俄罗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等国家的很多地区，主要包括俄罗斯的阿尔泰共和国、图瓦共和国和布里亚特共和国南部，蒙古国西部、中部和北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尔泰、塔城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布鲁克草原以及阿克苏地区等地区的山区草原地带，都零星发现过带有鹿石和祭祀圈的赫列克苏尔。至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虽有俄罗斯学者提及，但由于笔者未收集到相关资料，因此本文不涉及。该区域内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着西南东北走向的阿尔泰山、唐努山、萨彦岭、杭爱山、肯特山和东西走向的天山，发源于上述山脉的伊犁河、额尔齐斯河、叶尼塞河、色楞格河、鄂尔浑河、鄂嫩河和图拉河等蜿蜒其间，山河相间，天地广阔，形成了一片片天然的大牧场，自古以来就是很多游牧民族的生息繁衍之地。

作为游牧民族历史文化结晶的赫列克苏尔就分布在上述河流两岸台地上、山间谷地中，多则十几座，少则一两座，有时还与石板墓、圆形石堆墓、突厥人的方形祭祀坛和石人并存。石板墓分布区域偏东，赫列克苏尔偏西，但蒙古国中部地区石板墓和赫列克苏尔遗存是重合的（图一）。

2. 形制分类

（1）地表形制的分类

赫列克苏尔的地表特征明显，结构复杂，占地面积大。其中，作为最核心建筑的中心石堆形制基本相同，都是圆形，在中心石堆外围有方形或圆形的石围，有时石围外侧还有积石或圆圈形祭祀址和鹿石。研究赫列克苏尔的学者正是根据中心石堆外侧石围的不同而将其进行分类的。俄罗斯考古学家 Ю.С. 胡达科夫在《赫列克苏尔与鹿石》一文中根据地表结构特征、规模、附属建筑，首次对蒙古、俄罗斯图瓦、布里亚特和阿尔



图一　赫列克苏尔类遗存的分布图

（Ю・С・胡加科夫的《赫列克苏尔与鹿石》一文中的分布图的基础上添加与补充赫列克苏尔和鹿石遗存的分布示意图。）

泰共和国发现和发掘的赫列克苏尔进行分类。第一组具有双重石围，最外围的石围是圆形，内侧石围是方形，第二组仅有单重石围，其中根据石堆与石围之间放射线的不同分了 7 个型[34]。

同时他也观察到，根据赫列克苏尔的地表建筑特征大体可分为两个类型，即圆形赫列克苏尔和方形赫列克苏尔。刘文锁先生在《东阿尔泰地区的祭祀遗存》一文中根据基本结构和建造的先后顺序以及附属遗存，把东部新疆赫列克苏尔分为花海子类型和图布辛湖类型，同时把花海子类型和图布辛湖类型又分为甲、乙和甲、乙、丙等亚型[35]。

俄罗斯学者 A.Д. 茨毕克塔罗夫在《布里亚特、北和中部蒙古赫列克苏尔》一文中收集了布里亚特和蒙古发掘的四十座赫列克苏尔材料，根据地表建筑特征将这些赫列克苏尔共分为八个类型：外围石围为圆形的赫列克苏尔共有 19 座，圆形石围并中心石堆和石围之间有石道的 1 座，圆形石围四边立有石碑的 1 座，外围石围为方形或正方形的 8 座，方形或正方形并且四角带有小石堆 4 座，四角带有石堆的方形或正方形并且中心石堆和石围之间还带有石道的 2 座[36]。

2004～2007 年，蒙古和美国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北部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后，根据地表特征将分布在蒙古北部区域的赫列克苏尔分为七个类型，即方形（中心石堆与石围之间距离较大）、方形（外围石堆挨着中心石堆）、圆形（无石围）、椭圆形、小方形、圆形（石围挨着中心石堆）、方形（四角有石堆）[37]。

严格意义上说，赫列克苏尔由中心石堆和石围两个基本元素组成，但蒙古国学者将

一些不带石围的圆形大石堆也称为赫列克苏尔。这些圆形石堆遗存中的石围可能已被破坏，或本来就不带石围，但石堆周围的祭祀址和石堆下的丧葬方式与赫列克苏尔是一致的。所以首先，就可以根据赫列克苏尔中心石堆外侧是否有石围这一标准，分为有石围的赫列克苏尔和无石围的赫列克苏尔两种；其次，有石围的赫列克苏尔又可以根据石围的形状不同分为圆形和方形两种。而上述这两个类型，根据石围和中心石堆之间是否有石道或放射线，以及石围四角是否有立石和石堆等，又可细分为很多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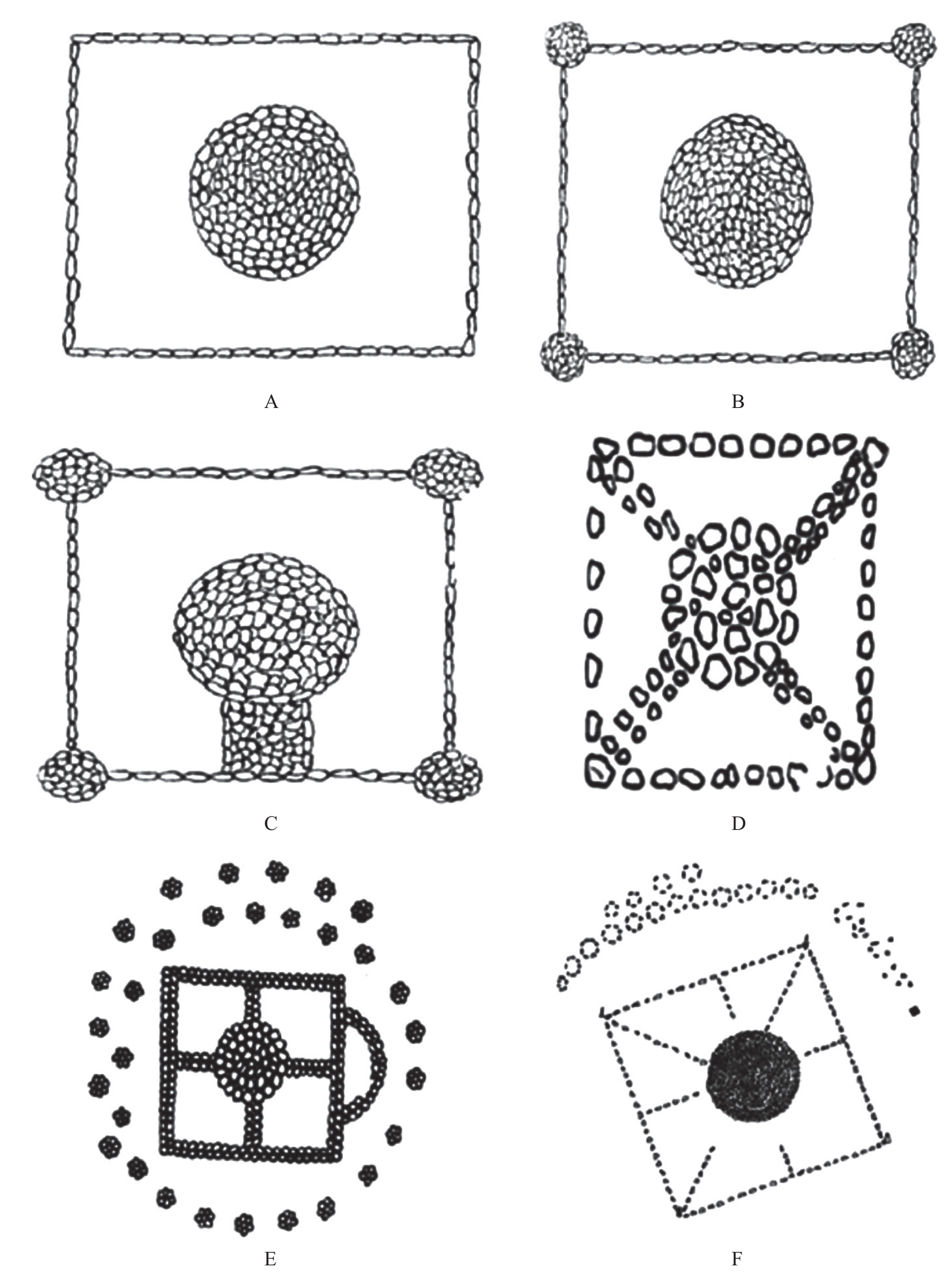
除上述类型外，有些赫列克苏尔石围外侧还带有石堆祭祀址、石圈祭祀址和鹿石等附属建筑。根据有无这些附属建筑，又可分为结构复杂的大型、高级别赫列克苏尔和无附属建筑的普通赫列克苏尔。大型赫列克苏尔的组成元素有中心石堆、石围、石道或辐射线、祭祀址和鹿石。祭祀址根据地表特征可分为石堆祭祀址和石圈祭祀址两种，请看赫列克苏尔地表特征示例图或举例图（图二～图五）。

（2）中心石堆下墓葬的形制与葬俗

2000 年之前，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赫列克苏尔是祭祀遗址。俄罗斯考古学家 A.Д.茨毕克塔罗夫统计蒙古中、北部和南布里亚特地区 22 处遗址点中共发掘了 40 座赫列克苏尔、7 处祭祀遗址。其中 20 座赫列克苏尔的中心石堆下发现了人骨，9 座是面朝上仰身直肢葬，1 座是侧身屈肢葬，7 座头向西，3 座是头向西北葬。11 座赫列克苏尔的人骨是直接在原地表上安葬，3 座赫列克苏尔的人骨是约 15～20 厘米深的浅坑中安葬。9 座赫列克苏尔的石堆下发现在原地表上围成的石围墓室[38]。近几年蒙古国与其他国家合作或配合基建抢救性发掘了不少赫列克苏尔，共计 11 处 87 座[39]。这些赫列克苏尔中心石堆下大多数发现了人骨或人类丧葬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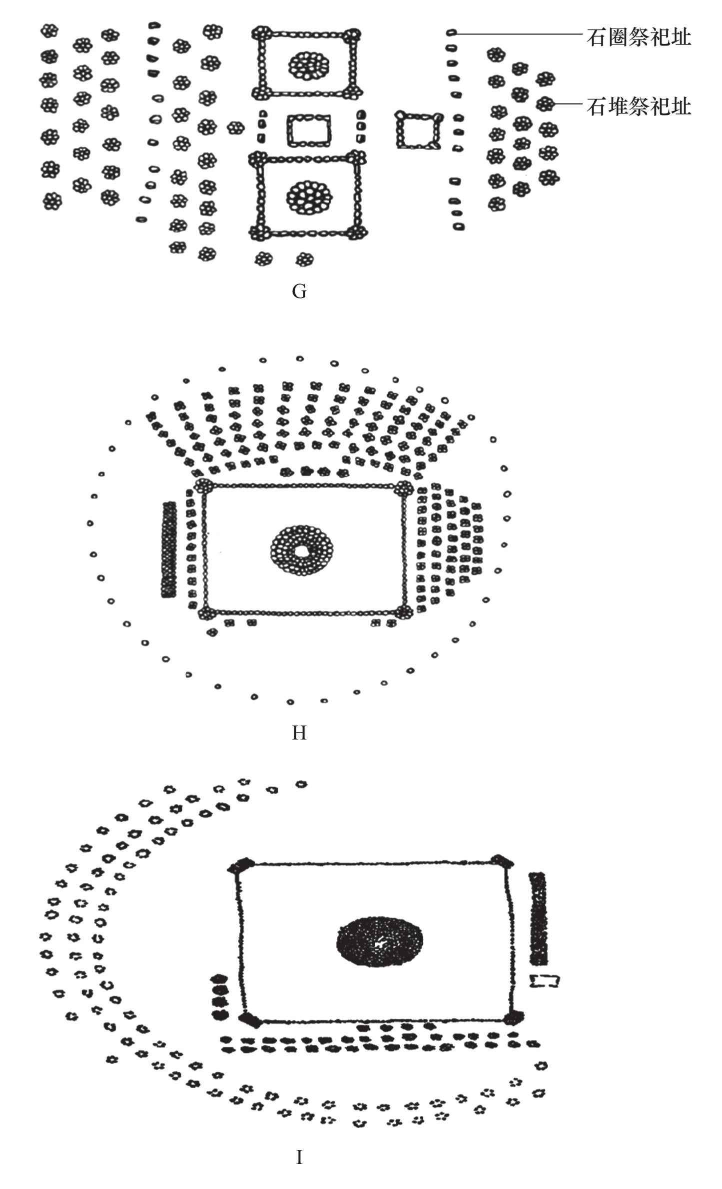
对此，学者们的看法也由原来的祭祀遗址改变为丧葬和祭祀为一体的遗存。根据这些赫列克苏尔中心石堆下发现墓葬的形制，可分为以下两个类型：

① 石围或石板墓。在中心石堆下原地表上直接用大型石板围成方形或椭圆形棺，棺内丧葬人骨后直接用石堆填埋。如 1992～1999 年在蒙古国艾格河谷地区 5 处共发掘了 7 座赫列克苏尔和 2 座附属祭祀址：比图根查干 2、5、15 号赫列克苏尔和 8 号祭祀址、浩勒托斯特 9 号赫列克苏尔、叶木根特浩术 1、2 号赫列克苏尔、达尔罕山赫列克苏尔遗存 1 号祭祀址、布尔汗陶鲁盖赫列克苏尔等[40]。其中比图根查干 2、5、15 号赫列克苏尔下发现在原地表下建造的石棺，大都不是很规整，棺内均未发现人骨；浩勒托斯特 9 号赫列克苏尔中心石堆下发现原地表上建造的石围棺，棺内发现一具儿童个体，该儿童个体直接在原地表上，头向西，仰身直肢葬。1997 年蒙古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为配合中央省扎马尔苏木巴音郭楞金矿采矿区抢救性发掘了 2 座赫列克苏尔，还有 1 座已被杂土掩埋，无法确定[41]。其中 1 号赫列克苏尔的石堆下发现石棺，但未发现人骨，2 号赫列克苏尔石堆下未发现石棺和人骨。1999、2003、2006 年蒙古 – 日本联合考古队在库布苏古尔省布仁托格托赫乌什格尼奥吾尔 1、12 号赫列克苏尔和 4、7 号鹿石周围的祭祀址分五个季度进行了发掘。1 号方形赫列克苏尔，中心石堆直径 13 米，



图二　方形赫列克苏尔地表特征示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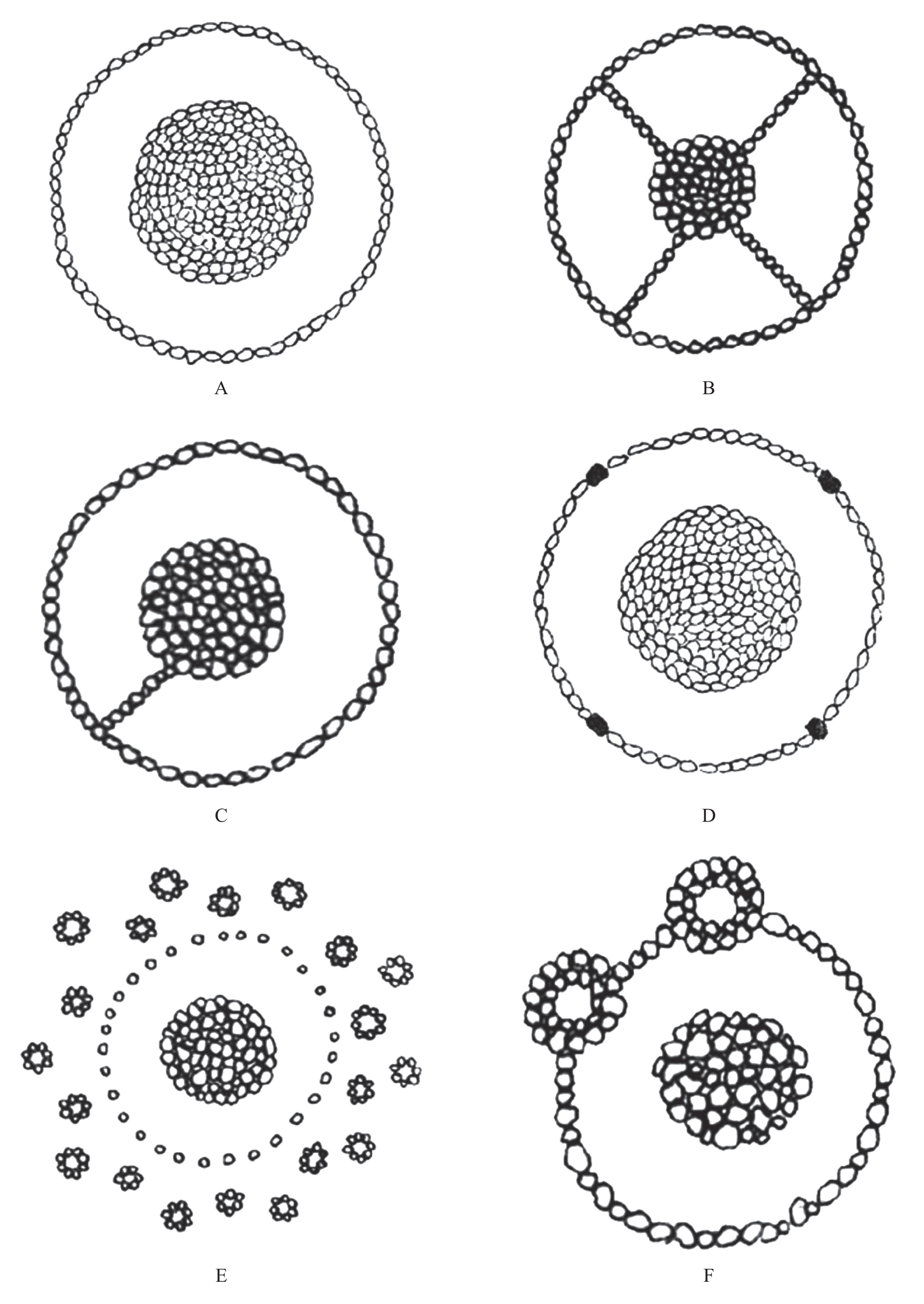
（A、B、C 引自 Цыбиктаров А. Д. *Херексуры Бурятии, Север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Монголии*［C］–Культуры памятники бронзового и раннего желзного веков Забайкалья и Монголии. –Улан-Удэ, 1995, стр. 38.D、E 引自 Худяков Ю.С. *Херексуры и оленные камни*［C］–Скифская эпоха Алтая.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Барнаул, 1986, стр. 142-143.FТөрбат Ц., Баяр Д., Цэвээндорж Д., Баттулга Ц., Баярхүү Н., Идэрхангай Т., Жискар Х.П.*Монгол Алтай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дурсгалууд-I, Баян-Өлгий аймаг*［M］.–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9. т. 35.）



图三　方形赫列克苏尔地表特征示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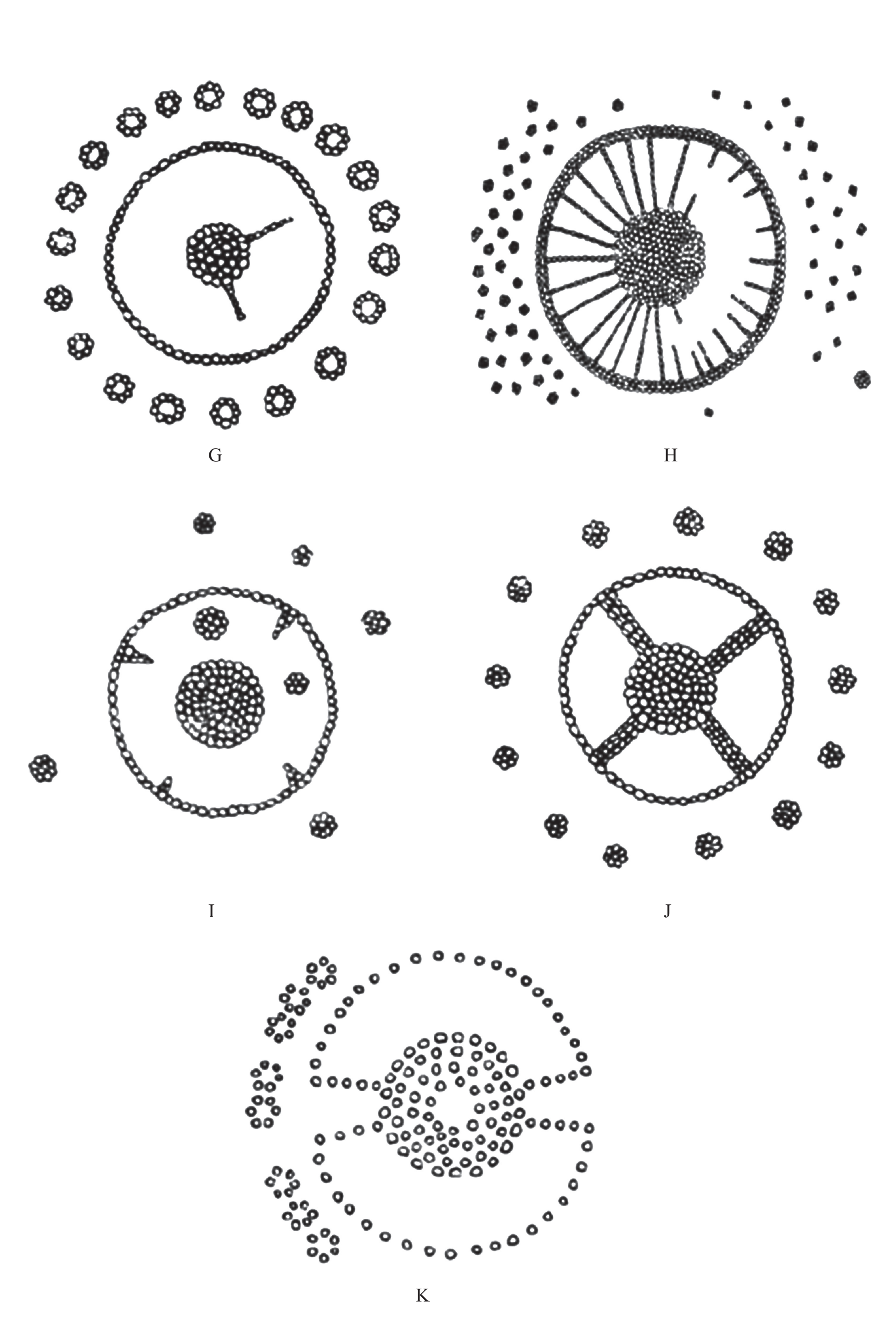
（G、H 引自 Худяков Ю.С. *Херексуры и оленные камни*［C］– Скифская эпоха Алтая.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Барнаул, 1986, стр. 142-143.I 引自 V.V.Volkov. *Stone Stelaes from Mongolia*［M］.Moscow, 2002：195.）

高 1.5 米。石围四角有圆形石堆，石围东、东南和东北围绕石堆祭祀址 21 座。中心石堆下发现石围棺，未发现人骨。12 号赫列克苏尔的中心石堆发现石棺，化验出棺内有 5～6 岁小孩的骸骨[42]。2005 年蒙古为配合基建在戈壁阿尔泰省泰西日苏木扎布汗河水库墓地发掘了 1 座赫列克苏尔和 3 座与赫列克苏尔类似的墓葬（3～5、12 号）。其中 4 号墓葬石围方形，其他 3 座圆形，中心石堆下发现石围棺，棺内发现人骨，3 和 12 号仅发现人头骨，4 和 5 号棺内人骨保存较好，头向西，侧身直肢葬，未发现随葬品[43]。



图四　圆形赫列克苏尔地表特征示例图

（B、C、E、F 引自 Худяков Ю.С. *Херексуры и оленные камни*［C］–Скифская эпоха Алтая.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Барнаул, 1986, стр.142-143.A、D 引自 Цыбиктаров А.Д.*Херексуры Бурятии, Север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Монголии*［C］–Культуры памятники бронзового и раннего желзного веков Забайкалья и Монголии. –Улан-Удэ, 1995，стр. 38.）



图五　圆形赫列克苏尔地表特征示例图

（G、H、I、J、K 引自 Худяков Ю.С. *Херексуры и оленные камни*［C］–Скифская эпоха Алтая.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Барнаул, 1986, стр. 144.）

2006～2007 年蒙古 – 美国联合考古队在库布苏古尔省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他们在库布苏古尔省布仁布仁托格托赫苏木恰古恩次 – 乌兰乌拉、萨勒赫特 – 哈日哈达、巴音乌吉尔等三处地方共发掘了 13 座赫列克苏尔和祭祀遗址。其中 11 座赫列克苏尔的中心石堆下发现了人骨，葬式基本一致，头向西，仰身直肢或侧身屈肢[44]。

② 无石围墓。2001 年蒙古 – 比利时联合考古队在布尔干省达西青格勒苏木哈日布哈河右岸发掘了 1 座赫列克苏尔。这座赫列克苏尔中心石堆直径 9 米，外围有 25×27 米方形石围，石围东侧有两排石堆祭祀址 8 座。清除中心石堆时在原地表上发现一具人骨，头向西，面朝上，仰身直肢葬，无任何葬具。东侧祭祀址中选择发掘了 1 座石堆下出土马头骨[45]。2011 年蒙古 – 美国巴彦乌烈盖省青格勒苏木比鲁特 1 号赫列克苏尔中心石堆下发现的人骨也是在原地表，头向西、面朝上，仰身直肢葬[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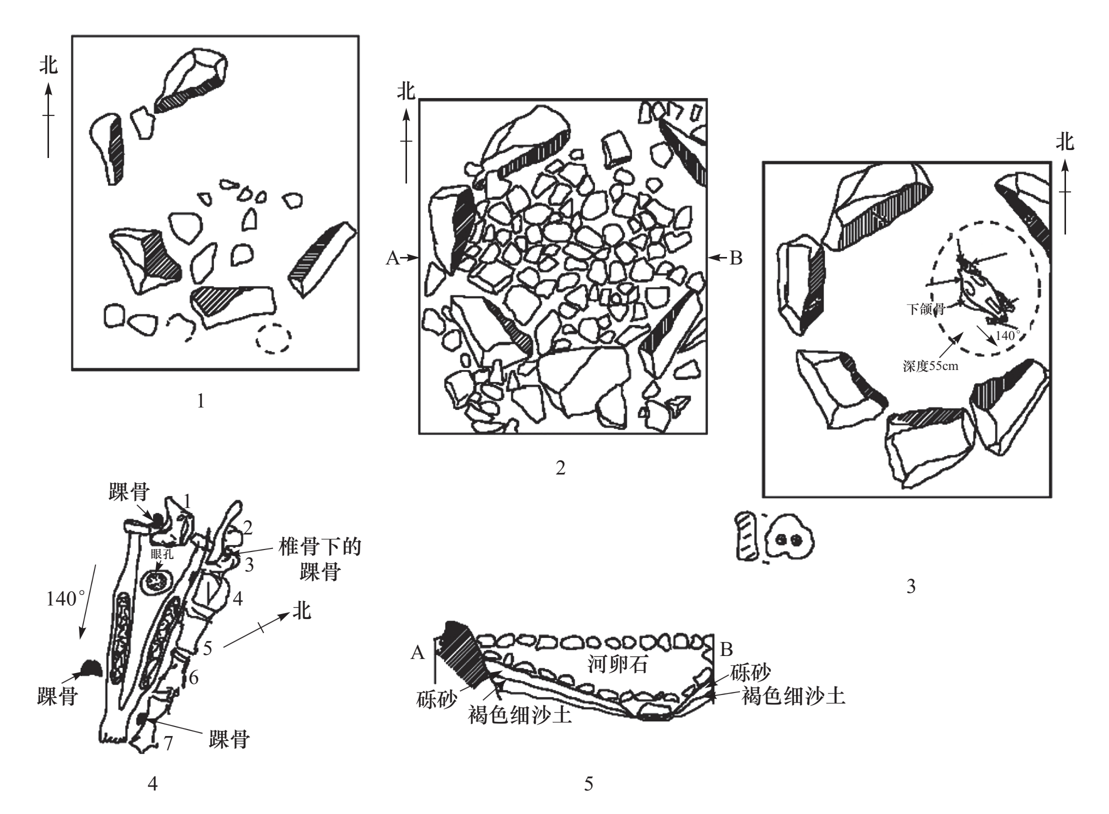
这些赫列克苏尔的中心石堆下大多都发现了人骨或人骨残片，同时也有一部分赫列克苏尔的中心石堆下没发现人骨。但蒙古 – 美国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北部进行的“动物考古”项目研究结果显示，赫列克苏尔中心石堆下确实有墓葬，但由于这些人骨葬在原地表上或埋葬较浅，保存条件差，而且由于死者年龄和骨骼发育程度不同以及啮齿类动物的扰动等等原因没能保存下来。根据上述赫列克苏尔中心石堆下发现的人骨的葬式很简单，主要头向西或西北，面朝上或朝左，仰身直肢或侧身屈肢葬，不随葬任何遗物，虽然发掘过程中在石堆中出土了一些石器、铜器、铁器、陶器碎片等，但它们和死者不在同一个层位上。石器可能是当时比他们更早的人遗弃的或者它们建造该遗存的时候用过，用完就丢到石堆里了。陶器也很少发现，但发现的陶器中有早的，也有晚的，不能说明和拿来当做断定赫列克苏尔的年代和文化性质证物。所以本文一概没采取发掘过程中从石堆中出土的遗物。

四、赫列克苏尔的功能及年代

1. 赫列克苏尔的功能

赫列克苏尔的功能方面，目前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概括的讲有以下几种解释：①墓葬遗存，②祭祀遗址，③丧葬和祭祀双重功能的遗存，④太阳神殿等。根据近 30～40 年发掘的资料的梳理和不完全统计，对赫列克苏尔的墓葬和祭祀址多多少少有一些认识。首先，赫列克苏尔本身就是墓葬，其地表特征是以圆形石堆为中心，外围有方形或圆形石围，中心石堆下直接在地表用大型石板围成棺或不用棺椁直接在原地表安葬人骨并用石块堆砌进行埋葬，再用石块在石堆外侧平铺成方形或圆形的石围，有时石堆和石围之间平铺石道或辐射线进行连接。有些大型的方形或圆形赫列克苏尔东侧发现圆形石堆、石圈祭祀址（图六、图七），从这些祭祀址的发掘情况看，建造赫列克苏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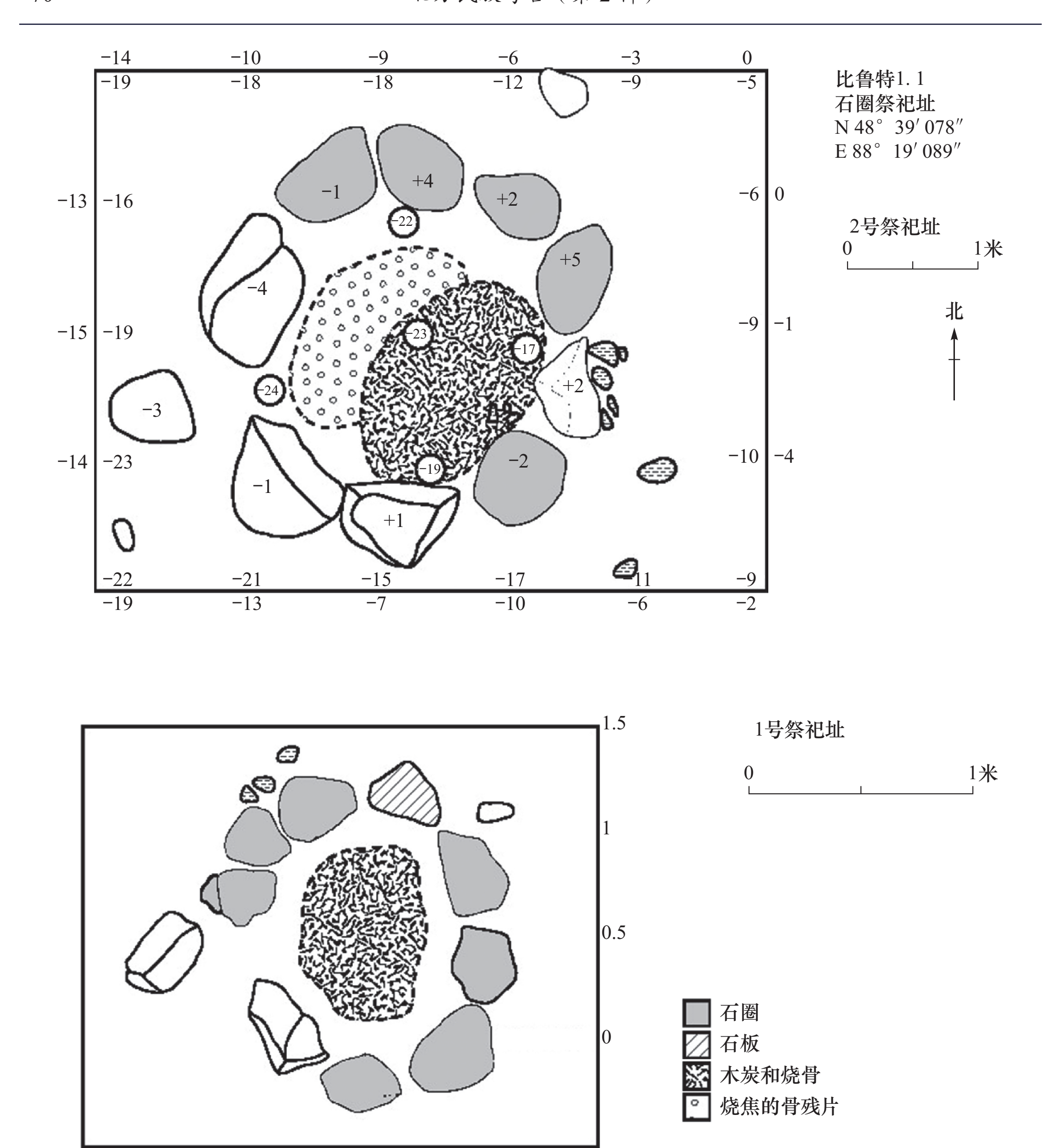
的人群用马头骨、颈骨和蹄骨进行祭祀死者的习俗。这给赫列克苏尔增加另一个祭祀功能。除此之外，这些人群也有固定的祭祀点，这些祭祀遗址是由鹿石、圆形石堆、石圈祭祀址和一些平铺成长条形石道组成的（图八、图九）。祭祀方法与大型赫列克苏尔外侧的祭祀址一样。所以不带附属祭祀址和鹿石的遗存只有丧葬功能，周围带附属祭祀址和鹿石的赫列克苏尔遗存具有丧葬和祭祀双重功能。



图六 蒙古国后杭爱省祖尼高勒赫列克苏尔外的 1 号鹿石南侧的圆形石堆祭祀址平、剖面图
1. 地表特征图 2. 清除表土后 3. 清除积石后（马头骨方向：140°，马头骨长度：54 厘米，距地表到马头随葬 28 厘米，距地表到下颌骨底部 50 厘米，距地表到椎骨底部 50 厘米） 4. 下颌骨椎骨与踝骨示意图 5. 剖面图
（引自 Fitzhugh W. Pre-Scythian Ceremonialism, Deer Stone Art, and 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in Northern Mongolia. *Social Complexity in Prehistoric Eurasia. (Eds.) B.K.Hanks*, *K.B.Linduff*［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97.）

2. 赫列克苏尔类遗存的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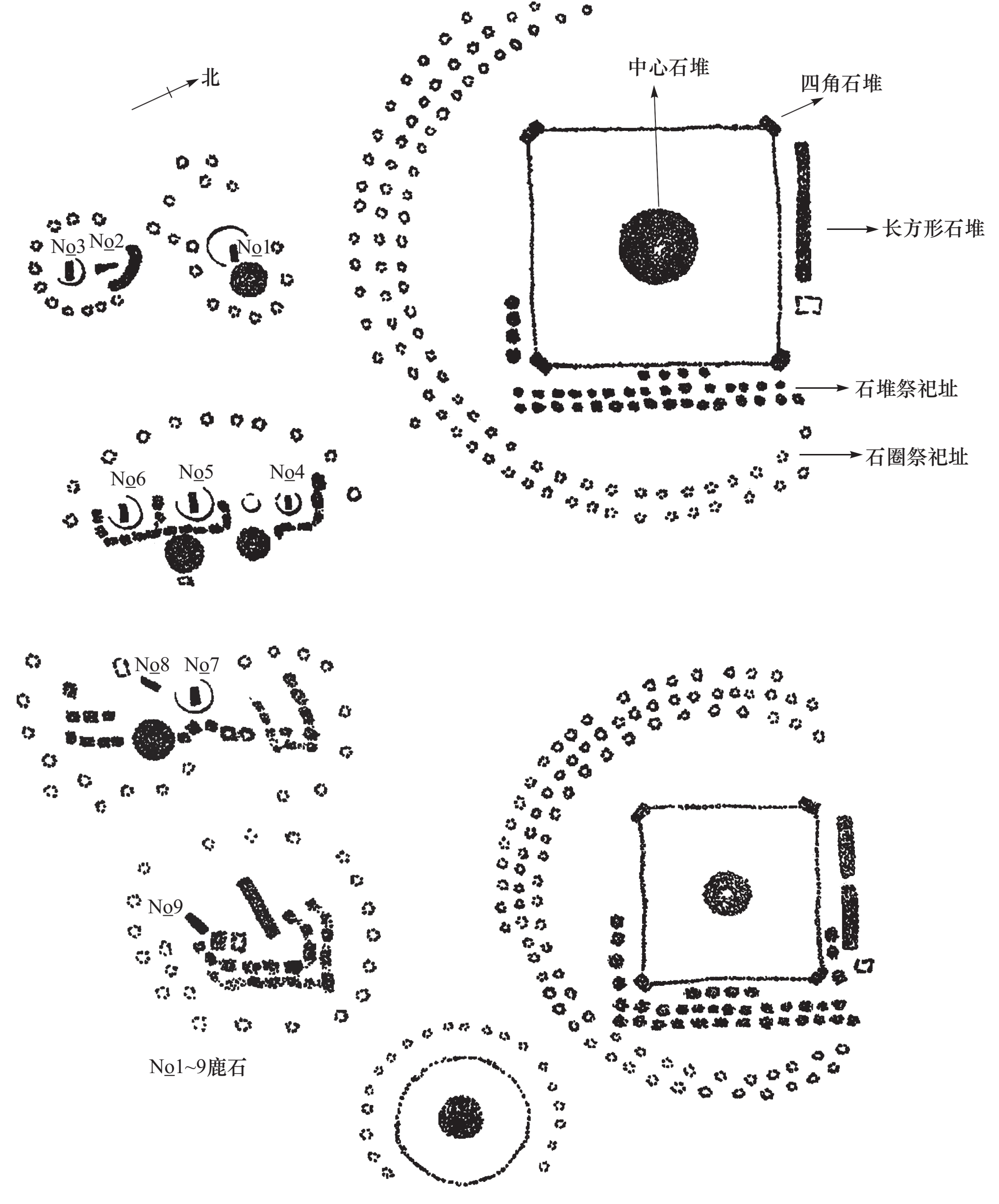
赫列克苏尔从发现到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时间，百年来学者对赫列克苏尔的年代问题都持有不同的观点。20 世纪中后期以前赫列克苏尔的年代都是通过发掘中在石堆中出土的遗物或祭祀遗址中出土马骨来推断其年代，而且这些遗物中有早期的遗物也有晚期的青铜器或铁器以及陶器残片等，所以出现了如石器时代、匈奴时期和突厥与回鹘时期或吉利吉斯时期等错误的结论。20 世纪 60～80 年代在图瓦地区发掘了一些孟根泰



图七　巴彦乌列盖省青格勒苏木比鲁特 1、2 号赫列克苏尔石围外侧石圈祭祀址

（引自 Fitzhugh W, Richard Kortum、*Rock Art and Archaeology: Investigating Ritual Landscape in the Mongolian Altai*［R］. Field Report，2011: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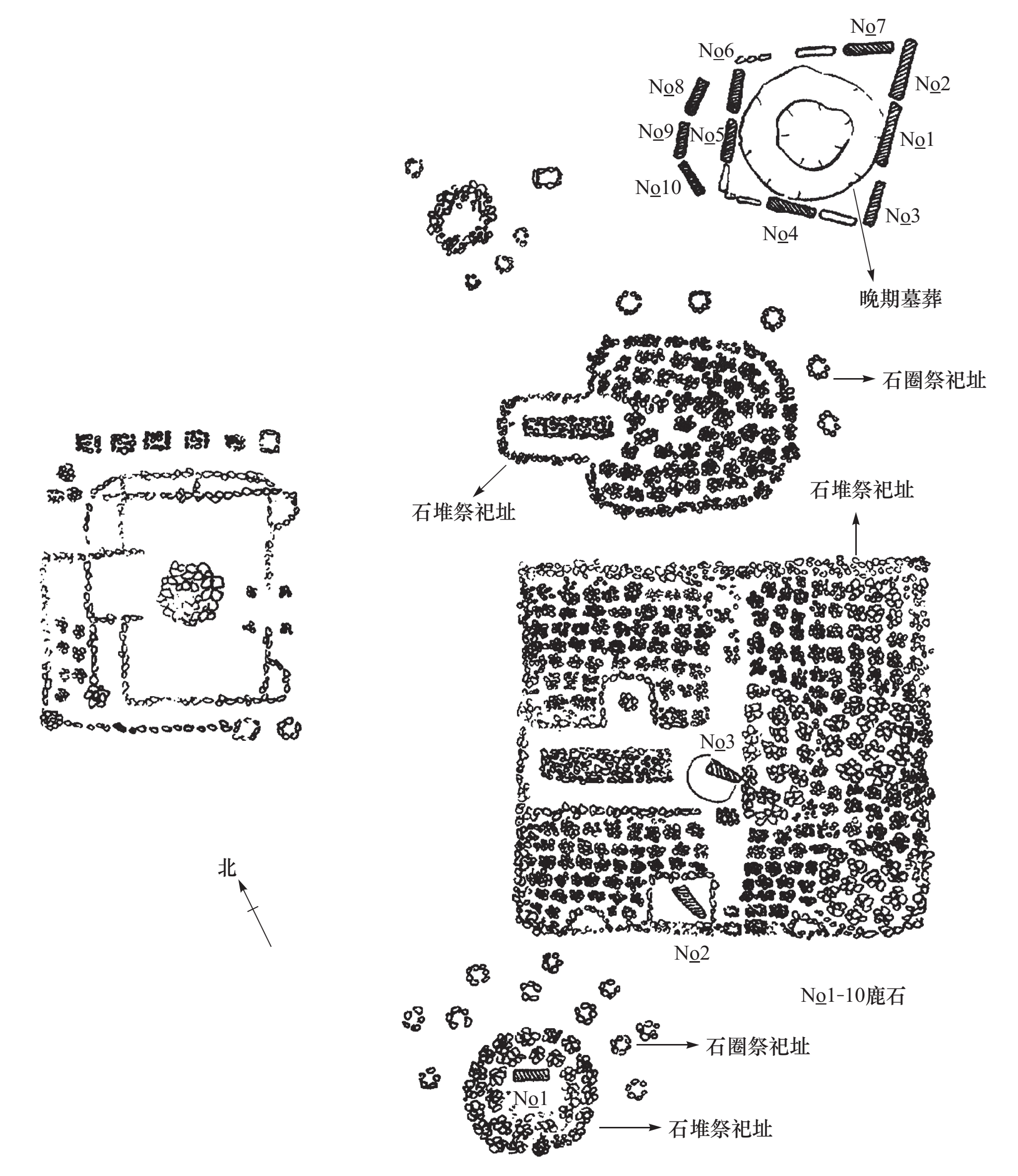
格类型的墓葬，其中有不少是赫列克苏尔。考古学家 A.D 格拉奇也发掘了一些孟根泰格类墓葬，他发现一些斯基泰时期的墓葬叠压着这类孟根泰格墓葬。于是，他认为孟根泰格类墓葬的时间要早于斯基泰时期[47]，其年代在公元前 2000 年末至前 1000 年初期。1986 年在布里亚特海格特省欧勒则特（Улзыт VIKяхтинском）Ⅵ号发现赫列克苏尔和方形石板墓各 1 座。他们对方形石板墓进行发掘时，在石板墓石堆下露出赫列克苏尔的石围，石板墓叠压着赫列克苏尔的石围，因此他们首次提出赫列克苏尔的年代



图八　库布苏古尔省布林托哥托赫苏木祖尼高勒赫列克苏尔、祭祀址和鹿石组成的大型建筑遗址的平面示意图

（引自 V.V.Volkov. *Stone Stelaes from Mongolia*［M］. Moscow, 2002: 195.）

应该是青铜时期晚期至斯基泰时期[48]。B.B. 沃尔科夫也支持这一观点，并提出布里亚特地区和蒙古西、北部地区的赫列克苏尔的年代也是这一时期的[49]。A.Д. 茨毕克塔罗夫、Ю.С. 胡达科夫、П.Б. 科恩瓦罗夫、З. 巴图赛罕，Д. 额尔德尼巴特尔等研究这类遗存的学者认为赫列克苏尔的年代属青铜器晚期至斯基泰或方形石板墓同一时期[50]。2001 年蒙古 – 美国联合考古队，发掘了位于蒙古国后杭爱省吉尔嘎楞图口以南 10 千米



图九　后杭爱省温都尔乌兰苏木扎尔加兰特祭祀址与石板墓平面示意图

（引自 V.V.Volkov. *Stone Stelaes from Mongolia*［M］. Moscow,2002: 136.）

处大型赫列克苏尔外围的祭祀址，并对其中出土的马头骨进行了 ^{14}C 年代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该遗存的年代为公元前 1040～前 850 年[51]。蒙古与美国联合考古队在库布苏古尔省共发掘了 44 个遗存，其中 32 座遗存进行了 ^{14}C 测年，这些测年结果显示这些遗存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 1604～前 818 年[52]。1999 年、2003～2006 年日本草原考古研究所在蒙古国西北部乌兰乌什格 1 号赫列克苏尔进行了发掘。他们在外围祭祀小石圈里发现了鼻面朝东的马头骨和胫骨的组合，同样的组合在鹿石周围的小石圈和石堆里也有出土。所以学者们认为赫列克苏尔是作为墓葬而建造的，建造赫列克苏尔、祭祀小石圈或

石堆和鹿石的是同一个群人，属同一种文化。其实，20世纪中后期我国北方地区的考古新发现，为赫列克苏尔文化提供了确定年代的依据。俄罗斯学们也发现到这一点，并着手对俄、蒙和中国考古新发现的遗物进行比较研究，主要是利用我国北方的古代遗物的研究，对鹿石年代有了新的认识。概括起来讲，他们断定的年代是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

我国考古学家乌恩先生在俄罗斯学者们所做工作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北方地区出土的实物的年代认为：这一独特的文化遗存的年代为公元前13世纪～前7世纪[53]。这一年代的上限与赫列克苏尔的附属祭祀址的年代相吻合。而学者潘玲根据鹿石上雕刻青铜剑和我国北方地区青铜剑的年代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三种鹿石具有年代差别，蒙古–外贝加尔类型鹿石出现的年代最早，约商末周初到战国时期；写实性为主的鹿石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欧亚类型鹿石出现的年代为春秋时期，从分布范围和存在的时间可以看出，鹿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不同时期的有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群所使用"[54]。蒙古与美国联合考古队实行的"鹿石项目"在巴彦乌列盖省青格勒苏木欧恩哈达尼赫列克苏尔外侧的祭祀址中出土的马骨中选出几颗牙齿标本进行^{14}C年代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该祭祀址年代为公元前1270～前1010年[55]。2001蒙古与俄罗斯联合考古队在科布多省孟赫海尔很苏木地区哈尔古文赫列克苏尔进行了发掘，之后选取人骨标本进行^{14}C鉴定结果显示该赫列克苏尔的年代为公元前1270～前750年[56]。目前新疆境内发掘的赫列克苏尔缺少^{14}C数据。

五、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和比较，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赫列克苏尔的地表现象、中心石堆下的墓葬形制、葬式葬俗及其附属建筑等方面特征比较明显，与分布区域内同一时期其他文化在文化特征上有明显的差别，可以作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来认识。由于该考古学文化的核心是赫列克苏尔，所以本人认为该以赫列克苏尔来命名（赫列克苏尔文化）。

（2）赫列克苏尔通常在石围外侧带有祭祀址和鹿石等附属建筑。两种祭祀址同时存在，但数量和分布特征不同。一般情况下，圆形石堆祭祀址在内，石圈祭祀址在外。

（3）从赫列克苏尔的发现和发掘情况看，蒙古国中北部区域的赫列克苏尔在宗教信仰方面的表现比其他区域浓厚。西部和更北的图瓦阿尔泰地区的赫列克苏尔外围的祭祀建筑少，主要是石圈祭祀址为主，数量也少。

（4）从赫列克苏尔附属建筑的数量来看，该人群的社会等级比较明显。有些赫列克苏尔不仅本身占地面积大，而且在石圈外侧还带有上百至上千座圆形石堆或石圈祭祀址。当然还有雕刻比较精细、高大的风格化鹿图案的鹿石。

（5）至于鹿石在石板墓和晚期的祭祀址中出现的原因，晚期的石板墓文化实力强

盛，赫列克苏尔文化实力消弱，或者西迁了。石板墓文化为了方便，选取了赫列克苏尔文化的鹿石作为建造墓葬材料。按年代上看，赫列克苏尔文化的发展有往西或西北迁移的迹象，而不是石板墓吞并了赫列克苏尔文化。如：蒙古国巴彦乌列盖省共发现了 1600 座赫列克苏尔[57]，新疆北部及环西部山区均发现赫列克苏尔墓葬和欧亚类型为主的鹿石遗存。

（6）目前为止，赫列克苏尔文化只发现墓葬和祭祀址，未发现相应的聚落遗址。从文化内涵看，显现出浓厚的游牧文化特征。

注 释

[1] 有学者将外围的这一圈石块儿称为“围墙”（*The Permanent Archaeological Joint Mongolian and Japanese Mission*，“*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Invetigations in Mongolia*，2003”，《草原考古通讯》No.14 November 2003），有学者将其称为“石垣”［刘文锁 . 东阿尔泰山地区的祭祀遗址［J］. 新疆文物 .2011（1）］，还有学者将其称为“石圈”（郭物 . 三道海子文化初论 . 欧亚学刊第七辑［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笔者认为，结合这一圈石块的高度、形状以及相应的蒙古语称呼，称作“石围”更为妥当。

[2] Д.Эрдэнэбаатар. *Монголнутгийндөрвөлжинбулш, хиргисүүрийнсоёл*［M］. *УБ*, 2002. *Т*. 126-127.

[3] Радлов В .В. *Атлас древностей Монголии*［J］-Спб.,1896.- Вып.2.- Табл .,Потанииг. Н . *Очрки Северо-Зап ад ной Монголии*［J］- Спб.,1883.- Вып.3- С., 1883.- Вып. 3.С. 53- 54.

[4]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Кяхтинский Музей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археологию Забайкалья*［C］-История и культураБурятии .- Улан-Уда, 1976.- с . 260.

[5] Талько- Грынцевич Ю. Д. *Население древних могил и кладбищ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х*［M］-Верхнеудин с к ,1928.-С.3-4.

[6] БоровкаГ.И.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еобследованиесреднеготечениияр ТолыСевернаяМонголия*［J］-Л.,1927.- Вып.2.-С.67-71.

[7] БоровкаГ.И.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еобследованиесреднеготечениярТолыСевернаяМонголия［J］-Л.,1927.- Вып.2.-С.68、69、75.

[8]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Кяхтинский Музей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археологию Забайкалья*［C］. -История и культураБурятии .- Улан-Уда , 1976.- с . 263.

[9]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Бурят- Монголии*［C］. Истор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Бурятии.- Улан- Удэ,1976.- С.327.

[10]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Бурят- Монголии*［C］. Истор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Бурятии.- Улан- Удэ,1976.- С.327.

[11] ХамзинаЕ. А.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Западного Забайкалья*［M］. - Улан- Удэ,1970. С.84.

[12] Худяков Ю. С. *Херексуры и оленные камни*［C］– Скифская эпоха Алтая.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 Барнаул, 1986,137.

[13] Грач А. Д.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раскопки в Монгун- Тайге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Туве*［M］. Тр. ТКАЭЭ.- М.- Л.,1960.-Т.1.- С.12-17.А. Д.

[14] ГрачА.Д. Новые данные о древней истории Тувы［J］*Учен. Зап. ТНИИЯЛИ.- Кызыл*,1971.-

Вып.15.- С.96.

［15］Грач А. Д. *Древние кочевники вцентре Азии*［М］. - М.,1980.- С.62、120-121.

［16］Маннай-Оол М.Х. *Тува в скифское время*.［М］. 1970.- С.17-18.

［17］Маннай-Оол М.Х. *Тува в скифское время*.［М］1970.- С.18.

［18］Маннай-Оол М.Х. *Тува в скифское время*.［М］. 1970.- С.17、78-88.

［19］Кызласов Л.Р. Древняя Тува［М］- С.47.

［20］ХамзинаЕ.А.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Бурятии.［М］- Улан-Удэ,1982.- С.121.

［21］Төрбат Ц., Баяр Д., Цэвээндорж Д., Баттулга Ц., Баярхүү Н., Идэрхангай Т., Жискар Х.П. *МонголАлтай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дурсгалууд-I, Баян-Өлгий аймаг*［М］-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9: 34.

［22］Эрдэнэбаатар *Д.Монгол нутгийн дөрвөлжин булш, хиргисүүрийн соёл*［М］−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2: 27.

［23］高濱秀．モンゴル高原のヘレクスルと鹿石の発掘［A］. 北東アジアの歴史と文化［C］. 北海道：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10：21~123.

［24］Кубарев В.Д. Древние изваяния Алтая (оленные камни)［J］. −Новосибирск：Наука, 1979: 37-38.

［25］王明哲．新发现的阿尔泰地区岩刻画考述［J］．新疆社会科学 .1986（5）.

［26］林梅村．谁是阿尔泰深山金字塔式陵墓的主人［J］．文物天地 .1999（5）．又收入林梅村 . 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M］．北京 : 三联书店，2000.

［27］刘学堂，吕恩国 . 青河三海子金字塔式“巨石冢”的文化性质及其他［J］．新疆文物 .2002（3～4）：142～144.

［28］郭物．三道海子文化初论［J］．欧亚学刊，.2007（7）：29～59.

［29］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富蕴县文物局，清河县文物局．东阿尔泰山的古代文化遗存［J］．新疆文物，2011（1）：1～62.

［30］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昌吉努尔加墓地 2012 年发掘简报［J］．文物 .2013（12）：22～36.

［31］郭物．新疆青河三道海子墓葬及鹿石遗址群考古新收获［J］．西域研究 .2014（7）：128～131.

［32］刘文锁 . 东阿尔泰山地区的祭祀遗址［J］．新疆文物 .2011（1）：68～84.

［33］Адрианов А.В. *Кархеологии Западного АлтаяИАК*［J］. - Пг.,1916.- Вып.62.- С.49.

［34］Худяков Ю.С. *Херексуры и оленные камни*.［C］– Скифская эпоха Алтая.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 Барнаул, 1986: 141.

［35］刘文锁．东阿尔泰地区祭祀遗迹［J］．新疆文物 .2011（1）：76

［36］Цыбиктаров А.Д. *Херексуры Бурятии, Север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Монголии*［A］. −*Культуры памятникибронзового и раннегожелзного веков Забайкалья и Монголии*［C］. − Улан-Удэ, 1995, стр. 37.

［37］Амгалантөгс Ц., Эрдэнэ Б., Прохлич Б., Хант Д. *Умард Монголд явуулсан хиригсүүрийн* судалгаа［J］. − Studia Archaeologica. Tom. XXIX(IX), Fasc. 9. –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7, т. 53-81.

［38］Цыбиктаров А.Д. *Херексуры Бурятии, Север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Монголии*［A］. −Культуры памятники бронзового и раннего желзного веков Забайкалья и Монголии−Улан-Удэ［C］, 1995, стр. 39.

［39］Амгалантөгс Ц,Эрдэнэ Б, Прохлич Б, Хант Д. Умард Монголд явуулсан хиригсүүрийн судалгаа［J］. − *Studia Archaeologica*. Tom. XXIX(IX), Fasc. 9. −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7, т. 53-81.

［40］Төрбат Ц., Амартүвшин Ч., Эрдэнэбат У. Эгийн голын сав нутаг дахь археологийн дурсгалууд

(Хүрлийн үеэс Монголын үе)［M］-*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3.T.38-40.

［41］Монголын археологи төсөл:1997 *ОНД ТӨВ АЙМГИЙН ЗААМАР СУМАНД АЖИЛЛАСАН ХЭЭРИЙН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АНГИЙН ТАЙЛАН*［R］.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97,т.2-3.

［42］高滨秀 . 蒙古高原赫列克苏尔和鹿石的发掘．东亚历史与文化［C］. 北海道：北海道大学出版社，2010：122.

［43］Амартүвшин Ч., Алдармөнх П. Улаанбоомын хүрэл зэвсгийн үеийн дурсгал.［J］- *Studia Archaeologica*. Tom. XXIX(IX), Fasc. 4. –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0, т. 53-81.

［44］Амгалантөгс Ц., Эрдэнэ Б., Прохлич Б., Хант Д. Умард Монголд явуулсан хиригсүүрийн судалгаа.［J］– *Studia Archaeologica*. Tom. XXIX(IX), Fasc. 9. –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7, т. 53-81.

［45］Цэвээндорж Д., Баяр Д., Цэрэндагва Я., Очирхуяг Ц. *Монголийн археологи*［M］–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2.T.152-153.

［46］Ж.Баярсайхан. *Монгол-Америкийн хамтарса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алгааныангийн* 2011 *оны товч тайлан, т*［R］. 2011: 77-81.

［47］А.Д Грач Алды- бель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раннескиф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в Туве［A］. - *Соотношение древних культур Сибири с культурами сопредель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Новосибирск*［C］,1975. с .255.

［48］Цыбиктаров А.Д. *Херексуры Бурятии, Север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Монголии*［A］. –Культуры памятники бронзового и раннего желзного веков Забайкалья и Монголии［C］. –Улан-Удэ, 1995, стр. 41.

［49］В.В Волков. *Бронзовый и ранний железный века Северной Монголии*［M］. - Улан- Батор.1967, с.47-48.

［50］Төрбат Ц., Баяр Д., Цэвээндорж Д., Баттулга Ц., Баярхүү Н., Идэрхангай Т., Жискар Х.П. *Монгол Алтай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дурсгалууд-I, Баян-Өлгий аймаг*［M］. –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9.

［51］F.Allard,D.Erdenebaatar. *Kereksurs,ritual and mobility in the Bronze Age of Mongolia-Antiquity*［J］. 79(2005):1-18.

［52］Ц.Амгалантөгс *Хиргисүүрийн судалгааны сүүлийн үеийн үр дүн*［C］. ХҮРЭЛ, ТҮРҮҮ ТӨМРИЙН ҮЕ БА ХҮННҮГИЙН ӨМНӨХ СОЁЛЫН СУДАЛГААНЫ АСУУДАЛ-ЭРДЭМ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БАГА ХУРЛЫН ИЛТГЭЛИЙН ЭМХТГЭЛ［C］–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4. т.84.

［53］乌恩 . 论蒙古鹿石的年代及相关问题［J］. 文物与考古 .2003（1）

［54］潘玲 . 论鹿石的年代及相关问题［J］. 考古学报 .2008（1）

［55］Ж.Баярсайхан *Буган чулуун хөшөөний он цагийн асуудалд*［C］. ХҮРЭЛ, ТҮРҮҮ ТӨМРИЙН ҮЕ БА ХҮННҮГИЙН ӨМНӨХ СОЁЛЫН СУДАЛГААНЫ АСУУДАЛ-ЭРДЭМ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БАГА ХУРЛЫН ИЛТГЭЛИЙН ЭМХТГЭЛ,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4.т.84.

［56］Ж.Баярсайхан *Буган чулуун хөшөөний он цагийн асуудалд*［C］. ХҮРЭЛ, ТҮРҮҮ ТӨМРИЙН ҮЕ БА ХҮННҮГИЙН ӨМНӨХ СОЁЛЫН СУДАЛГААНЫ АСУУДАЛ-ЭРДЭМ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БАГА ХУРЛЫН ИЛТГЭЛИЙН ЭМХТГЭЛ,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4.т.84.

［57］Төрбат Ц., Баяр Д., Цэвээндорж Д., Баттулга Ц., Баярхүү Н., Идэрхангай Т., Жискар Х.П. Монгол *Алтай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дурсгалууд-I, Баян-Өлгий аймаг*［M］. –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9.

The Date and Relevant Issues of Khirigsuur Remains

Bayier

Abstrac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ravelers and scholars first discovered the remains of Khirigsuurs in Central Asia. For 100 years archaeologists investigated this type of material. Today, Khirigsuurs style artifact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Russia, Mongolia, Kazakhstan, Kyrgyzstan and large parts of Xinjiang China. This article put forward some preliminary views about Khirigsuur remains by gathering and analyzing materials in Mongolia over the past decade.

Key words: Helieheer; Deer Stone; Nomadic Culture

新疆岩画初步研究

于建军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乌鲁木齐，830011）

新疆以其三山夹两盆的地貌著称，面积广阔，地形复杂，历史悠久，古人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不同遗迹，岩画即是其中之一。

岩画（Petrogram），指镌刻在岩石、石崖壁面或独立岩石上线刻、浮雕等的总称，也可以包括岩石等上面的彩绘，从旧石器时期到历史时期一直在制作。英文衍生的词汇还有 Petroglypic（岩石雕刻的）、Petroglyph（岩石雕刻术）。岩画一词，英文对照的还有使用 Rock Art，这个似乎专指岩石艺术，跟岩画还是有区别的。

从远古时代起，岩石就不断地被人类使用，作为劳动工具，也作为日常用品，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绘画材料，古人用他们精心挑选的坚硬岩石或者其他工具，在选定的岩面上通过凿刻、磨刻和涂画，来描绘自己的生活，或者描绘各种想象和愿望，这就是岩画。史前时期岩画中的各种图像，构成了文字发明以前，原始人类最早的“文献”，它不仅涉及原始人类的经济、社会和生活，同时，还作为人类的精神产品，以艺术语言打动人心，甚至可以说是留给后人最直接的语言。岩画最初的起源，可以上溯到距今四万年前后，一直绵延至现代仍有原始部族在制作。岩画分布地域广泛，遍及世界五大洲，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分布于欧洲、非洲、亚洲的印度和中国。

简而言之，岩画就是古人描绘或者凿刻在岩石上的图画；有的学者将凿刻在岩石上的称为岩刻画，描绘的称为岩绘。目前比较明确的岩画制作方法多为凿刻，少量为线刻和磨刻。有的先凿刻出图案的轮廓，中间再以密集的点凿刻填充或者直接磨刻出剪影的效果；有的仅用线条刻出图案轮廓，表示一定的形象；有些直接磨刻成剪影效果的形象。绘在岩石上的岩画用的多数是矿物颜料，有红、白、黑等颜色，有些是用动物血掺和其他物质组成的。

一

清代纪昀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三　槐西杂志三》中记载“喀什噶尔山洞中，石壁飐平处有人马像。回人相传云，是汉时画也。颇知护惜，故岁久尚可辨。汉画如武梁祠堂之类，仅见摹本，真迹则莫古于斯矣。后戍卒燃火御寒，为烟气所熏，遂

模糊都尽。惜初出师时，无画手窠笔摹留一纸也”，这是最早对新疆岩画记录的文字资料。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当时学者不但已注意到岩画，而且将此与汉代砖画进行了对比。1928 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徐旭生调查了天山山脉博格达峰的岩画，并记录下来：“有鹿、有羊、有持弓矢的人，余不甚可识”；考察团成员瑞典考古学家佛尔克·贝格曼（Folke·Bergmen）在他的《考古探险笔记（第二章）：1928 年新疆之旅》中记载了他在去罗布泊途中、兴地南 65 千米处布延图布拉克山谷中发现了岩画，“石灰岩壁上画着潦草的动物、骑马者的图像和一些难以理解的符号，甚至在小河中一些大石块上也有雕刻。岩画是以这样的方式‘分层’的：最古老的画在最上头，最新的在底部。最新的类型含有佛教符号和土尔扈特人的笔迹，因此十分现代；另外最古老的明显是史前的。我用白颜色把他们拓下来……壁画离地面 5.5 米高”。从上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贝格曼当时已经注意到了岩画中的时代问题，他在这段文字的注释里还写到他在芬兰陆军元帅曼纳林[1]的《从西向东穿越亚洲》书中发现，已经提到了这些天山岩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新疆历史文物考古工作者重点调查了哈密、吐鲁番、昌吉、伊犁、阿勒泰等区域的岩画，对于岩画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和有益的尝试。以王炳华、王明哲、王博为代表的文物考古专业人员，撰写了一批介绍和研究新疆岩画的文章，集中发表在《新疆文物》《西域研究》《新疆艺术》《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报刊杂志上。另有学者从体育史、艺术史的不同角度在《西安体育学院学报》《体育文化导刊》《西北民族研究》《阴山学刊》《齐鲁艺苑（山东艺术学院学报）》《黑龙江史志》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拓展了岩画研究的视野，为今后的岩画工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新疆文物》上还陆续发表了大量的第二次文物普查的调查报告，对新疆岩画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1993 年，户晓辉在《岩画与生殖巫术》[2]一书中，对包括新疆岩画在内的史前岩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专题研究，提出了生殖巫术岩画的概念，将岩画研究从简单的描述式解读，转向表象背后，以生殖巫术的理念阐发了岩画图案所蕴含的意义，开拓了岩画研究的新思路。同年，周菁葆主编了《丝绸之路岩画艺术》[3]一书，收集了草原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发现的主要岩画，是丝绸之路岩画综合研究的重要文献。1994 年，新疆大学的苏北海先生编著了《新疆岩画》[4]一书，集中整理了当时发现的多数岩画资料，对于岩画分类、创作方法、意义等作了分析，对当时已经发现的新疆岩画作了可贵的研究。成振国、张玉忠联合发表了《新疆天山以北岩画述略》[5]一文，对新疆北部阿勒泰、塔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地域内的部分岩画进行了介绍，并对岩画族属和年代判断作了初步的探索，认为对于岩画族属和时代的判断，只能结合其附近的古代遗迹作推测。著名画家刘青砚、刘宏夫妇编著了《阿尔泰岩画艺术》[6]一书，从艺术的角度，对阿勒泰地区的岩画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

近年来，对于岩画时代判断的研究逐渐增多，王建新、何军峰在《穷科克岩画的分类及分期研究》[7]一文中，尝试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地层学的方法，对新疆伊犁穷科克岩画进行了比较全面地研究，认为“岩画的年代和岩画作者的族属或文化属性这一难题的解决，需要将岩画与居址、墓葬等其他考古学文化遗存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在岩画本身的研究方面，只有在理清同一岩面、同一地点岩画相对年代关系的基础上，对岩画内容的解释与研究才有可能是准确和科学的。”席琳的《试论甘肃马鬃山区岩画的文化因素》[8]文章中提到，用岩画及其相关遗址、墓葬三位一体综合研究的方法对马鬃山区岩画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得出“岩画并非孤立存在的一类遗存，岩画的研究应与墓葬和居址的研究结合起来。根据马鬃山区各类游牧文化遗存不同文化因素之间表现出的联系性，可划分出几组文化因素组合。其中：一期岩画、方形石筑墓的特征均与新疆东部以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为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存在相似性；二期非鹿石风格岩画、圆形石筑墓的特征与新疆东部的黑沟梁、东黑沟遗址群等为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存在相似性；二期鹿石风格岩画、石板墓的特征可能与蒙古高原和外贝加尔地区的石板墓文化有关；三期岩画可能是受到吐蕃文化和蒙古文化影响的遗存”的结论。这种将岩画结合相关遗迹进行综合的研究，进一步开阔了岩画研究领域的视野，对于更进一步的岩画断代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启迪作用。

虽然以前也曾经有人注意到岩画层次叠压现象，部分学者没有从时间早晚上考虑，而是从艺术的角度论证这种现象是古人艺术表达的透视效果，这或许是其中的一部分现象，囊括于全部，则大有疑问。实际上，多数叠压的岩画，受阳光影响，岩晒程度不一，色彩上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大部分应该是因为创作时间早晚不同形成的，并非是为了艺术表达的透视效果而有意为之。

二

2007～2009年，新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实地调查工作中，共普查了岩画472处，新发现岩画249处，其中有1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9处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新发现的岩画主要集中在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也有少量发现。岩画之所以集中出现在这些山区，与古人生活的地理环境有着紧密的关系，为此，了解这三条山脉的地理环境是非常必要的。

阿尔泰山脉是欧亚大陆上宏伟的山系之一，山势西北—东南走向，经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国、蒙古，北高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呈阶梯状递降，表现出明显的垂直层次地貌。经过中国境内新疆北部的是其中段以及东端南麓少部分地域，从国境山脊线到额尔齐斯河谷地，明显有3～4个阶梯，气温和自然景观均呈垂直、分带形展布，海拔3200米以上是冰雪带，形成冰川侵蚀与堆积地貌，仅在槽谷与古冰斗底部发育有苔藓、地衣等高寒植被。2400～3200米为高山带，古冰川作用导致形成的U形谷较多，植被

以高山草原为主，是优良的夏牧场，可放牧时间一般为 75 天。1500～2400 米为中山带，降水丰沛，槽形谷地分布广泛，水热条件好，是适宜放牧的优良夏牧场，放牧时间长达 95 天。1000～1500 米为低山带，地形是山地与断谷相互交替，发育有山地草原植被，其间小盆地与小块准平原发育有荒漠化草原植被，是优良的春秋牧场，放牧时间春秋两季约 135 天。800～1500 米之间山前丘陵谷地，上部发育为荒漠化草原植被，下部为草原化荒漠植被，也属优良的春秋牧场；500～800 米间为额尔齐斯河与乌伦古河间的洪积平原，主要发育有半荒漠草原植被，属低等的春秋牧场，靠近河谷低地处发育有低地草甸植被，可作为冬牧场。

阿尔泰山西南部是准噶尔西部山地，北为塔尔巴哈台山，东为沙吾尔山，南有额敏县境内的乌日可下尔山；和布克赛尔县境内的斜米思台山；裕民县境内的巴尔鲁克山；托里县境内的玛依勒山、扎依尔山等低山，最高峰为海拔 3816 米的沙吾儿山木斯岛峰。山间盆地较多，如吉木乃谷地、和布克谷地、塔城盆地、托里盆地，均向西展开，水草丰茂，成为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哈巴河县，塔城地区塔城市、额敏县、裕民县、托里县冬牧场。其中，塔尔巴哈台山的高中山地是夏牧场，山前丘陵及洪积冲积扇地带是春秋牧场；巴尔鲁克山、玛依勒山也有这良好的夏牧场和春秋牧场。

阿尔泰山脉在我国境内，向东南延伸为北塔山，至木垒县、巴里坤县、伊吾县北部，也形成了重要的冬牧场。

在阿尔泰山脉独特的地理环境中，自古以来就零散分布着众多的冬、夏牧场，这些牧场从阿勒泰地区到塔城地区，再到昌吉回族自治州的木垒县，哈密地区的巴里坤县、伊吾县，虽然都是不连续分布，但都是新疆重要的岩画分布区域。在这些地域分布的岩画，既有其特性相近的地方，也有其不同之处，新疆目前发现的洞穴岩画，都集中在阿尔泰山脉中，洞穴岩画中多见手掌纹和简单线条组成的抽象人物；凿刻的岩画多北山羊，车、马等图案。

新疆境内另一处岩画相对集中的分布区域是横亘于新疆中部的天山山脉。天山山脉最宽处 200～300 千米，由三列平行的褶皱山脉组成，山势西高东底，山体宽广，山脊线海拔 4000 米以上。北脉有阿拉套山、科古琴山、婆罗科努山、博格达山等；中脉有阿拉喀尔山、那拉提山、艾尔温根山等；南脉有科克沙尔山、哈尔克山、贴尔斯克山、科克铁克山、霍拉山等，总长 2500 多千米，在新疆境内东西绵延约 1500 千米。其西段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境内，新疆境内的部分自西向东又可分为三段：伊犁盆地南北缘的哈尔克他乌山、济嘎郎山、雅布尔山、婆罗科努山等称为西段，海拔 3000～5000 米；额尔布特山、乌肯山、博格达山等为天山中段，一般高度为 4000～4300 米；巴尔库山、哈尔里克山等为天山东段，海拔 3000～4000 米。再东延至与河西走廊北侧合黎山、龙首山等相连接，山岭时断时续，山势渐平，直至倾没。天山山脉把新疆分隔成塔里木盆地与准噶尔盆地，是地理上一条重要界线。

天山山脉各山之间，发育有许多河流，著名的有特克斯河、巩乃斯河、喀什河、伊

犁河；并且分布着 6890 多条大小冰川，是天然的固体水库。融冰的化雪，汇集成两百多条河流，滋润和灌溉着天山南北的广阔绿洲。崇山峻岭之间，又分布着一个个盆地、谷地，著名的有哈密盆地、吐鲁番盆地和伊犁谷地，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茂、形成了良好的山区天然草场。

天山山脉的岩画也是主要分布在其间草场附近，并且向北与阿尔泰山脉的岩画群连在了一起，向南延伸至昆仑山脉附近，只是天山南部的岩画远远少于北部，风格特征也与山北的岩画有着稍微明显的差异，与昆仑山脉的岩画风格更趋于一致。

新疆南部的昆仑山系分布于塔里木沙漠南缘，自西向东包括我国境内的帕米尔高原、新疆与克什米尔间的喀喇昆仑山及主要在新疆、西藏间的昆仑山脉；北支还有阿尔金山、东北延伸接祁连山。在新疆境内的昆仑山系，由于远离水汽来源，是亚洲腹地不多的干旱山地之一，加上所处纬度的客观原因，这里普遍缺失北疆的高山草甸、草原，这样的环境对于人类生存有着较大的影响，因此在这里发现的岩画相对于北疆，要少很多。李永宪、霍巍将昆仑山脉南麓西藏境内阿里等地区的岩画与相邻的新疆地域的岩画作了对比，发现了较多相似之处[9]。

新疆岩画的分布规律似乎以天山为界，出现了不同的变化，天山北坡及其向北的多数山间草场、牧场，直至阿尔泰山的南坡，都有内容丰富的大量岩画分布，阿尔泰山的岩画以阿勒泰地区和塔城地区最为集中。天山北坡的岩画以哈密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博尔塔蒙古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最为典型。天山南部的岩画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为特色。

总体来看，新疆岩画主要分布在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也有少量分布。多数岩画凿刻在避风朝阳山坡的岩石上，附近有草场和水源（无论现在是否干枯），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其间有很多的山间盆地，有的甚至是比较广阔平坦的草场，在这些草场周边的山坡上，往往有大量的岩画存在。古代岩画的分布区域，与今天牧场的区域是比较一致的，因此调查中，比较容易从牧民那里收集到丰富的线索。

三

跟全国其他岩画的研究情况类似，新疆岩画的研究多着力于其制作方法、艺术特点、生殖崇拜、文化意蕴等方面。对于岩画起源的研究，多数学者已经涉及，有个一致的观点认为，岩画的起源是出于原始艺术的需要，或者是艺术的表达。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袁同凯先生在 1996 年第 2 期《西域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古代中亚游牧民族的岩画及其原始信仰》的文章，认为初民创作岩画的动机，主要是基于对食物的渴求，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观点。

古人到底为什么要创作这些岩画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是否应该先解决这个问题：岩画多分布在环境适宜放牧之地的周围山坡上，是否可以认为古人在放牧的闲暇凿

刻了岩画？这个问题并非只有一个答案。

从艺术起源的角度以及心理学的研究来看，表达的冲动是岩画起源的一个重要原因。古人因为自然及其周边人类活动在内心的投射而引发的各种情感，赋予了表达的冲动，所见的各种动物或者自然现象以及生活场景凿刻或者描绘在岩石上，是疏解这种冲动的方式之一，因此最初的岩画，具有强烈的写实性，甚至有着普遍的娱乐性。这一阶段的岩画，给予任何解释和演绎似乎都是多余的。

古人创造岩画，除源自于表达的冲动之外，不应该排除出于巫术等原始宗教信仰的需要。众多的岩画中，有些是可以明显看出属于当时人们出于原始信仰或者巫术的需要而凿刻或描绘的，如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等。

具有原始宗教意义的岩画，有其地域的独特性，所在的位置与一般岩画所处的环境有较大的差异，一般都会选择在比较高耸醒目处，前面还要有比较开阔的平地，既利于营造巫术或者原始宗教仪式的神秘气氛，也是举行宗教仪式活动所必需的空间。

因此，古人除了在放牧闲暇制作岩画之外，还有具有明确原始宗教目的而主动创作的岩画。在此基础上，模仿的岩画也有很多。

制作方法上，新疆岩画，以凿刻居多，凿刻方法多以较为坚硬的工具在岩石表面凿刻，以密集的点组成线条，构成图案；在此基础上，有的以点线构成的线条形成图案轮廓，中间磨刻，形成组合的图案；有的还使用更为坚硬的工具在岩石表面上凿、割成较为流畅的线条，构成图案；还有直接在岩石表面上磨刻成剪影式图案。因此根据制作方法，新疆岩画有线条式图案、剪影式图案等。

新疆的洞穴彩绘岩画（岩棚岩画）较少见，几乎都分布在阿尔泰山系中冰蚀地貌的浅穴内，最深的有 2 米多。具有洞穴彩绘岩画的浅穴一般多分布在相对独立陡峭高耸的山丘上，少数在断崖壁的浅穴内。

总而言之，岩画的制作无非两种：一是凿刻，二是彩绘。凿刻的具体方式有点凿、线刻、磨刻等；点凿一般是以较硬工具在岩石上凿出点来构成图案；线刻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用凿点构成线条，再由线条构成图案，其次是用更加坚硬的工具在岩石上直接凿刻成线条，以这些线条组成图案；磨刻多指在岩石上直接打磨成剪影式图案，有的磨刻岩画用线条勾勒轮廓。实际调查过程中发现，大多数岩画不会采取一种单一的制作方法，而是多种技法混合使用。有的岩画凿刻成形后，还涂有颜色，如阿勒泰市的阿克塔斯岩画。

岩画的演变发展过程中，模仿的行为一直贯穿其中，模仿是人类的共同心理特征之一，并且模仿是有其感染性的。田野考古调查中发现，几乎所有距离居民区较近的岩画区，都有被刻画的痕迹，其中模仿古岩画凿刻羊的图案的十分常见。即便有的远离了居民区，只要有牧民经常在周边活动，一样也会遭到刻画，而且都会选择有岩画的岩面上刻画，这种模仿不应该是仅仅现代才有的。在发现的古代岩画中，有多少属于模仿的呢？还有多少是被模仿的呢？也许古人创造了一幅岩画之后，第二年就可能被模仿，或

者第二个月……而且就在原创岩画所在的岩面上。岩画从它产生之时起，就一直存在着相互模仿的现象。

研究古代岩画，是否应该先从每一幅岩画中剥离出有多少属于原创，多少属于模仿？然后再进行时代特征的判断及其他相关的研究，那样会更加容易接近客观事实，这样做的难度应该很大。但是，相对于一般岩画而言，反映典型生活场面以及具有原始宗教意味的岩画制作的技术更加规范，人们刻画时会更加认真，我们可以把这一类岩画看作是典型岩画，如果把岩画当作出土文物，那么对于岩画的研究，就相当于对出土文物的研究，对反映典型生活场面以及原始宗教、巫术仪式类岩画的研究，则相当于对出土器物标型器的研究，因此，研究岩画可以先从典型岩画着手研究，这样不但从其中研究古代原始宗教以及人们精神世界的具体内容，还会从中发现当时流行的制作岩画的技法。在这样的岩画中发现的制作岩画技法，应该更接近于当时的真实情况，而不会像研究模仿类岩画那样，缺乏自然生动的特征；而且由此发现岩画的时代特点，对于分辨和区别模仿与被模仿的岩画应该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相关遗迹进行岩画的研究，无疑是可行的。

岩画记录是研究岩画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何区分、记录、描述岩画，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基本工作。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王建新先生在这些方面做了较多的探索工作，先后在新疆巴里坤县西黑沟－岳公台遗址群、尼勒克县穷科克岩画的调查中，采用了编号、分幅记录的方法，并且在对穷科克岩画的研究中，认为“岩画表现形式的异同，是判断岩画相对年代最基本的依据。岩画的表现形式，是由刻画岩画的工具、技法和刻画人的文化传统、技术能力、艺术表现力、审美观念以及岩画的功能等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对岩画的表现形式进行分类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判断岩画的相对年代是完全可能的。”同时对岩晒判断岩画年代早晚，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岩画颜色的对比，在同一个岩面上才是最有效的。不同岩面、不同岩石、不同岩画点的岩画，由于日晒和风化的程度不同，很难单纯用颜色作为判断相对年代的标准。同时，岩画刻画技法和刻画深度的不同，也会造成颜色的差异，在对岩画颜色进行对比时，必须对此认真观察。”……“岩画的年代和岩画作者的族属或文化属性这一难题的解决，需要将岩画与居址、墓葬等其他考古学文化遗存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在岩画本身的研究方面，只有在厘清同一岩面、同一地点岩画相对年代关系的基础上，对岩画内容的解释与研究才有可能是准确和科学的。”这些探索对于今后岩画的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他们也提到：“与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类遗物相比，岩画形式的随意性和个体差异要大得多，分类的难度也大得多，在对岩画进行分类研究时，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10]

实际上，正因为岩画有着因大量模仿行为以及互相影响的存在而导致难以区分的衍生性岩画，我们更应该寻找和区分其中的“标准岩画”——集中反映典型生活场景以及原始宗教类岩画，所以在完成岩画记录的基础上，对此类典型岩画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是岩画研究的第一步。只有完成了这一步的工作，后面结合岩画周边遗迹对岩画综

合性的研究才会事半功倍。

照相是岩画记录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手段，正投影拍摄是其基本的要求，只有正投影的岩画照片，图案变形的程度最小，真实反映古人刻画图案的程度也高。通过一些电脑软件对于照片的处理，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图案上肉眼难以看到的一些细节。根据我们调查、汇总岩画资料的经验来看，岩画照片用软件处理，凸现古人刻画的图案后，最好不要做人为的后期处理，避免主观的痕迹。相比之下，拓片，现场描绘等岩画记录方法比照相繁复，而且稍显主观。在野外对于岩画拍摄，需要控制光线，以凸现岩画内容，因此，对于岩画照相的摄影器材有其基本的要求：遮光板、灯具、人字梯等。

以此为基础，结合某些田野考古发掘过程中的一些相关发现成果，拓展岩画研究的视野，是不容忽视的步骤之一。如结合新疆洋海墓地出土木器纹饰研究当时的岩画，以及一些墓葬内填土的岩石块上的岩画、陶器上具有岩画制作技法特点的动物纹饰来研究。俄罗斯考古学家在阿尔泰山北部发掘的一些古墓中构筑墓室的石板上，发现了古人的绘画以及凿刻出的岩画，这些对于岩画相对年代的判断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2012 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哈巴河县加郎尕什、哈拜汗墓地发掘中，从墓葬填土中发现了多块岩画，墓葬年代距今约 2700 年，而那些岩画的年代因此可以断定，至少距今 2700 年，其岩画构图、形象构成等方面的特点可以因此作为参照来推断同类的岩画年代。

对于岩画所处环境的研究也不容忽视，具体到岩画所处的海拔、经纬度、植被、朝向、水源等，都要与岩画一起记录下来，岩画中的动物及其相关内容都有可能与所在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对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岩画的出现，多数是跟牧业经济有着直接的关系，少数的诸如江苏连云港将军山岩画、河南禹州具茨山岩画跟农业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

从世界范围来看，最早的岩画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 4 万～1 万年前）的欧洲，早期的岩画都发现于洞窟岩壁上，因此也被称为洞穴崖壁画或洞穴岩画。一般认为，法国南部索米欧湾的科斯凯洞穴一期（距今 6 万～2 万年前）崖壁上的手印图案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岩画。

距今一万年前的洞穴岩画在欧洲已发现数百处，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Altamira）洞穴和法国拉斯科（Lascaux）洞穴两处遗址。阿尔塔米拉洞窟发现于 1879 年夏天，西班牙索图拉伯爵（Sautaola，Marquis de）与其 4 岁的女儿玛利亚首次发现洞穴内的岩画。拉斯科洞穴位于法国西南部布里夫西南约 30 千米处，1940 年 9 月 12 日 4 个孩子（Marcel Ravidat，Jacques Marsal，Georges Agnel，and Simon Coencas）玩耍时首次发现了此洞穴。两座洞穴内的壁画中以野牛、马、鹿等动物题材为主，画面大多是粗线条的轮廓画剪影，在黑线轮廓内用红、黑、褐色渲染出动物的体积和重量，形象生动，色彩明快，富有生气。洞穴内出土木炭的 ^{14}C 科学测年结果显示，原始人类在两座洞穴的活动时间在距今 1.5 万年前左右。[11]

新疆岩画的年代，一般认为最早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一时期的岩画以阿尔泰山的洞穴（岩棚）岩画为代表；晚一些的岩画是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再晚一些的是唐代突厥时期，最主要的岩画集中在这三个时期。虽然有了这些时代的大致划分，但具体对应哪些岩画确实缺乏更加细致的研究，一些年代的判断尚缺乏有力的论证。

国际上利用阳离子比断代、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断代、微腐蚀断代法等自然科学的手段来测定岩画年代都有成功的例子。1966 年波兰学者柴诺胡兹（J.Cernohouz）和索尔切（I.Sole）提出通过观察岩画刻痕中岩石晶体风蚀程度从而对岩画进行断代方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澳大利亚学者贝德纳里克（Bednarik）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后来他又在西伯利亚奥内戈湖（Lake Onega）地区和瑞典等地的岩画进行了试验，效果不错。1990 年贝德纳里克到中国参加了宁夏国际岩画研讨会，与汤惠生探讨了岩画微腐蚀断代法的理论、可行性以及在青海地区进行试验等问题，会有商定，在南非、南美、北欧和中国北方同时进行岩画微腐蚀断代实验。青海岩画直接断代研究在 1997 年列入青海省科委科研项目，1998 年通过了省科委验收。经过实验，结果表明，想必其他方法，微腐蚀断代法测定岩画年代更具有可操作性，更接近真实年代，是目前唯一不损坏样品的直接断代法。不过这种方法要求较高，需要熟练操作，需要建立测定岩画所在地区蚀亏对比的数据库，相互比较，测定结果才会趋于精确。

新疆岩画的内容以动物为主，如羊、牛、马、驴、骆驼、狼、野猪、虎、豹、鹿、麋鹿等，也有一定数量的人物形象，如站立、行走、射箭、舞蹈、滑雪、骑猎、战斗等，不但有骑马的形象，也有骑骆驼的形象，还有车辆、车轮、太阳等形象。其中，关于生殖崇拜的场景占据了一定的比例，以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最为典型；另外，还有一些经过变形夸张处理的动物图案，独具艺术魅力，如青河县巴润萨依岩画，一只羊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中心，夸张的脖子比身体还长，羊腿也变得细小，狼的形象在这只庞大的羊面前小如蚂蚱，巨大的羊角内，有凿刻有一只羊，在岩面其他的空白处，凿刻有大量的小羊和其他动物；也有一些抽象的符号。洞穴彩绘岩画中手印较为多见，天山山脉也有零星的凿刻出的手印，昆仑山脉也发现有彩绘的手掌印岩画，而且，凿刻的手掌印也较多见。昆仑山山脉内的岩画比天山山脉、阿尔泰山脉的显得更加粗犷有力，抽象图案较多，密集图案组成的画面比较多见，岩画刻痕明显。

在岩画反映的动物种类上，王博先生等人做过细致的研究，其中引人关注的是对于大象岩画的讨论，从孤证不立的角度来讲，似乎缺乏更加充分的说服力，而且，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中，的确没有发现具有明显大象特征的岩画，尤其是具有明显象牙的动物的岩画。岩画中动物还是以羊的形象最多，又以山羊最为常见，据其形象特点，可以判断，多为羱羊（Capra ibex）。这是一种典型的高山动物，登山技术高超，即便如悬崖峭壁，也能攀爬其上，一般也被称为北山羊。羱羊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被草原上的人们认为是一种神秘的动物，它身体差不多所有的部分，甚至包括排泄物都会被

用作治疗不同疾病的魔法药的成分，这或许是羱羊在岩画中占据大半数量的原因之一。雄性羱羊一般可以成长至 1 米高，重达 100 公斤，雌性羱羊多是雄性体型大小的一半。雄性及雌性羱羊都有向后弯曲的大角，雄性的角更可以生长至 1 米长，最长可达 1.47 米，可以用来保护自己，免受狼、熊、狼等动物的袭击。除此之外，岩画中还有盘羊的形象。不仅在新疆，在蒙古的岩画中，羊一样也占据 60% 以上的数量。

骑骆驼的岩画，同样值得关注，古代人们是否在驯化马之前，已经可以驾驭骆驼了。古人驯化骆驼并作为骑乘使用的时间可能比马的驯化要早。

新疆的岩画起源较早，并且延续时间长，集中分布在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这里曾经是古代以牧业经济生活为主的人群繁衍生息之地，具体地说，一度活跃在欧亚草原上的塞人、月氏、乌孙、匈奴、丁零、高车、突厥等似乎都应该与这些岩画有关系，但是，究竟哪些属于他们各自创作的，却是一个至今无法确切回答的难题。

既具有与天山山脉岩画比较接近的特点，又具有自己独有特色的昆仑山岩画，可能与早期的羌人有关，这些都是需要作进一步多学科的深刻、全面研究，才有可能解决的难题。相比之下，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昆仑山的田野调查工作开展得比较少，对这一区域的调查尚不足以完全把握昆仑山脉新疆段的考古遗存，其中岩画更是如此。昆仑山域岩画是否与青藏高原之间有更多的联系，也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工作，才能解决。

综上所述，对于新疆岩画，尚有更多更加细致的问题需要去探索和研究，比如与阿尔泰山北部以及中亚地区的比较研究等。即使困难重重，只要发现其中存在的客观线索，充分总结过去对岩画的研究经验，是可以对其对应的年代、族属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注 释

［1］ 即卡尔·古斯塔夫·冯·曼纳林：Carl Gustaf von Mannerheim，也译“曼纳海姆”，1867 年生于芬兰土尔库附近的维尔纳斯，卒于 1951 年，芬兰元帅、总统 . 日俄战争期间被沙俄派到中国搜集情报，对新疆也进行了考察，中文名字为“马达汉”.

［2］ 户晓辉．岩画与生殖巫术［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
［3］ 周菁葆．丝绸之路岩画艺术［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4］ 苏北海．新疆岩画［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
［5］ 成振国，张玉忠 . 新疆天山以北岩画述略［J］．文物，1984（2）.
［6］ 刘青砚，刘宏 . 阿勒泰岩画艺术［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8.
［7］ 王建新，何军峰 . 穷科克岩画的分类及分期研究［J］．考古与文物，2006（5）.
［8］ 席琳．试论甘肃马鬃山区岩画的文化因素［J］．考古与文物，2009（4）.
［9］ 李永宪，霍巍．西藏岩画艺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10］a. 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哈密地区文管会．新疆巴里坤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调查［J］．考古与文物，2005（2）.

b.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尼勒克穷科克岩画调查［J］．考古与文物，2006（5）.
c. 王建新，何军锋．穷科克岩画的分类及分期研究［J］．考古与文物，2006（5）.
［11］a. 陈兆复，邢琏．外国岩画发现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9～14.
b.〔英〕保罗·G·巴恩著．郭小凌，叶梅斌译．剑桥插图史前艺术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72～73.

A Preliminary Study of Petroglyphs in Xinjiang Province

Yu Jianjun

Abstract：The discovery and study of petroglyphs is an important issue, and the age determination is the core of it. This paper 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etroglyphs in Xinjiang. It focuses on how this research has developed, new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the study of Xinjiang petroglyphs.

Key words：Xinjiang petroglyphs; distribution; origin; research

张掖市西城驿遗址的彩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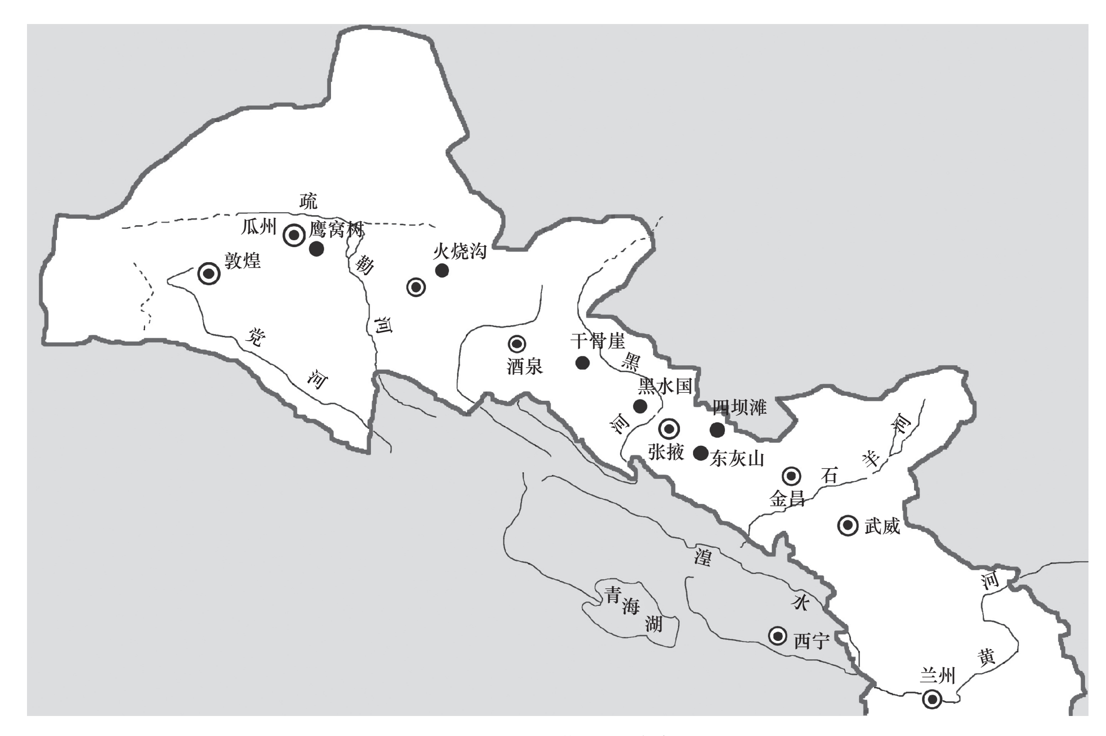
张良仁[1]　王　辉[2]

（1.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南京，210093；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兰州，730050）

1948 年，甘肃省山丹县培黎学校在县城以南的四坝滩挖水渠时，发现了一处遗址和一批陶器和石器。1953 年，该校创办人新西兰籍路易·艾黎（Rewl Alley）函告夏鼐，建议派人前去发掘[1]。1954 年他将所有遗物移交给甘肃省文管会。1956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安志敏在甘肃省文管会看了这批器物，并且前往遗址调查，采集了一部分陶器和石器[2]。他发现该遗址出土的器物可以分为三组，其中主体的乙组和甘肃省境内当时已知的甘肃仰韶文化（后来改为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沙井文化都不同，陶器质料粗糙，彩陶颜料浓厚而且凸起。因此它可能代表了一个新的文化类型，其年代晚于甘肃仰韶文化，早于沙井文化，而与齐家文化相当；根据当时掌握的资料，可知其分布范围为酒泉、山丹、民乐和永昌一带。从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墓葬的猪头骨随葬，说明该文化的居民过着定居生活，从事农业和家畜养殖[3]。虽然当时只有一些调查资料，安志敏暂时命名了四坝文化[4]，但是很快宁笃学和严文明采用了这一名称[5]。尽管当时资料缺乏，但是他对文化面貌的认识在今天看来大体都是正确的。当然，他将其定为新石器时代并把该遗址出土的金环和青铜刀残片归入沙井文化，现在来看是错误的。但这是囿于当时的资料限制，不能求全责备。

四坝滩遗址以后，考古工作者陆续发现了民乐县的东灰山、西灰山[6]、天祝县的董家台、民勤县的沙井、山丹县的山羊堡滩、酒泉下河清[7]；而且他们在酒泉下河清遗址还发现了四坝晚于甘肃仰韶文化马厂期的地层。[8]1976 年，在玉门火烧沟发掘了 312 座墓葬，出土金属器 200 余件和镞范若干[9]。遗憾的是这批发掘材料至今仍未发表，只有 65 件金属器的检测资料见诸报道。其中有红铜、砷铜和锡青铜，从而确定四坝文化属于青铜时代[10]。1990 年，该墓地做了第二次发掘，清理了 17 座墓葬[11]。1986 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西走廊做了调查，并且在安息县鹰窝树清理墓葬 3 座[12]。1987 年两家单位又在酒泉干骨崖发掘了 107 座墓葬[13]，同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在民乐县东灰山发掘了 249 座墓葬[14]。2003～2004 年，在酒泉西河滩发掘了一处聚落，发现了 50 多座房屋，400 多座烧烤坑，以及储藏坑、祭祀坑、陶窑和墓葬，不过发掘资料还没有发表[15]。因此，

四坝文化的遗址主要分布于河西走廊中西部，南低祁连山北麓，北近巴丹吉林沙漠的西南边缘，西北达安西县城的疏勒河南岸，东至山丹县一带[16]。据最近报道，考古工作者在额济纳旗周围发现了一些四坝文化的陶片，说明四坝文化向北扩散到了这里[17]（图一）。



图一　四坝文化遗址分布图

有关四坝文化分期，李水城的《四坝文化研究》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合编的《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揭示与研究》和张忠培的《东灰山墓地研究》做了讨论。其中《四坝文化研究》发表于 1993 年，作者主要根据干骨崖墓地及火烧沟墓地的部分墓葬资料，提出了五期说。干骨崖墓地属于三～五期，而火烧沟属于一～三期，二者衔接，没有间断，^{14}C 年代在公元前 2000 年至前 1600 年[18]。四坝文化的来源，作者认为是河西的马厂文化。不过二者之间还存在一个过渡类型（乙类），其遗存既有别于马厂，也不同于四坝文化，同时又具有马厂和四坝文化的一些特征[19]。四坝文化还存在一部分齐家风格的陶器，而前者的彩陶也出现在后者（即甲类）[20]。《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揭示与研究》作者根据东灰山墓地的地层关系和器物演变，将其分了三期。张忠培认为东灰山三期基本上与火烧沟吻合，而早于干骨崖墓地[21]。根据当时取得的 9 个 ^{14}C 数据（公元前 1900～前 1585 年），张忠培认为四坝文化落在夏纪年之内或夏商之际。他同意马厂文化是四坝文化的源头，但是他提出马厂文化与四坝文化存在一段时间距离（大约相差一百年）；至于李

水城提出的“过渡类型”是介于马厂与四坝之间的考古学文化，还是马厂或者四坝的一个阶段，他认为还有进一步研究。四坝文化与齐家文化也存在“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22]。虽然四坝文化的去向不明，但是它的一些因素传播到新疆哈密市的天山北路墓地[23]。

上述分期都推动了四坝文化的研究。本文尝试在此基础上利用西城驿遗址的发掘资料提出一个新的分期。西城驿遗址位于甘肃省张掖市西北 171 千米，距离黑河 7～9 千米。经过测绘，该遗址总面积达 28 万平方米；但是遗址区内分布有古河道和若干座大沙丘，将遗址区分为三个部分，所以我们分了 A、B、C 三区。A、B 两区为隔古河道东西相望的两片台地，而 C 区则在一座大沙丘的东侧。A 区的堆积最后，厚度在 150 厘米以上。2010 年以来，我们已经连续四年在这里做了发掘，不仅发现了很多房屋建筑和灰坑，而且发现了大量的彩陶和其他陶片。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了连续地层，可以对该遗址的建筑遗迹和遗物进行分期。目前发掘仍在继续，已经发表了一篇发掘简报[24]，另一篇发掘简报和前期的一些科技考古论文也即将问世[25]。本文将利用 2010 年的发掘资料提出一个初步的分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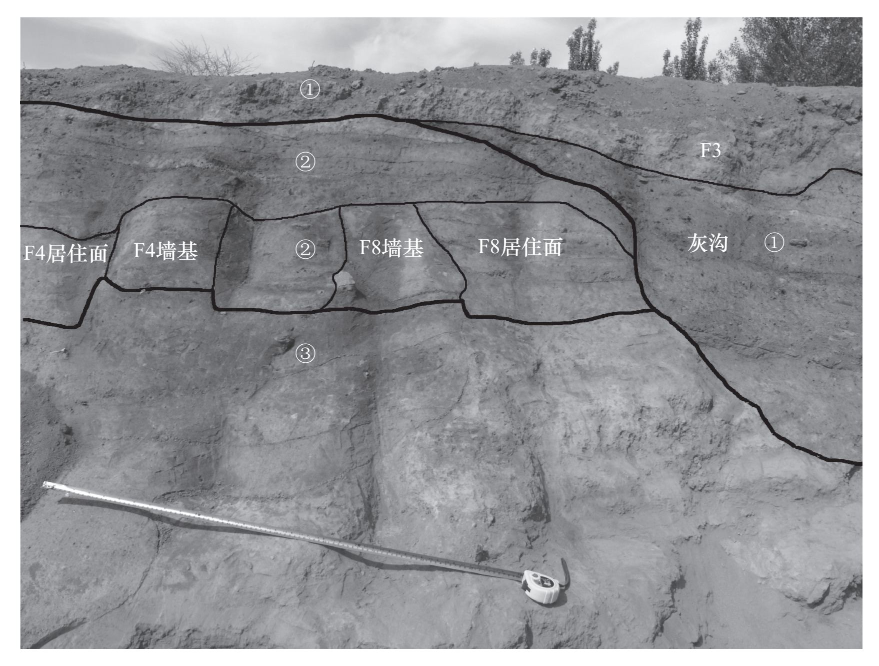
前文说到，有关四坝文化的分期前人都做过研究，如何处理与以往的分期成果是每个发掘者都要面临的问题。一种方法是无视原有的分期成果，另起炉灶；一种方法是把新材料套进原先的分期成果。两种方法在我国考古界都很常见，但是都有问题。文化分期与其他学术问题一样，存在各种局限，需要经过不断检验而得到修正和升华。这就要求后人接力棒似地对前人的工作进行剖析，看看旧分期存在哪些问题，新材料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如果旧分期没有问题，那就没有必要提出新的分期。如果有问题，那么就利用新材料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前人的工作不至于浪费，后人也不用再做前人做过的功课，其他研究者也无需面对两套大相径庭的分期无所适从而烦恼。后种方法往往是出于对前人的尊重乃至敬畏，不敢碰其分期成果，其结果是浪费新材料带来的新认识，文化分期也只能裹足不前，停留在前人的成果上。文化分期是一项必要的基础工作，但是它不是考古学研究的中级目标（解决具体学术问题，如经济形态，社会组织），更不是高级目标（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可惜的是，我国的考古学界不注重学术传承，不注重学术批评，各自为政，导致很多人消耗很多精力甚至停留在这种重复而低质量的基础工作上。

李水城和张忠培二人的分期，都是当时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但是两位学者也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缺乏地层材料，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发挥类型学的作用。所以西城驿遗址的连续地层和丰富的陶片为我们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其优势是纯粹的类型学所不可比拟的。尽管地层出土陶片比较破碎，缺乏完整器形，但是通过观察各个地层单位（含灰坑，墓葬，房屋等遗迹单位）出土的陶片，利用类型学，我们可以归纳更为明确细致的陶器演变规律。我们要做的是利用新材料来建立分期，然后来检验他们的分期，而不是把新材料套进他们的分期。在分期时，我们要观察各个层位的陶器的变化大小，合并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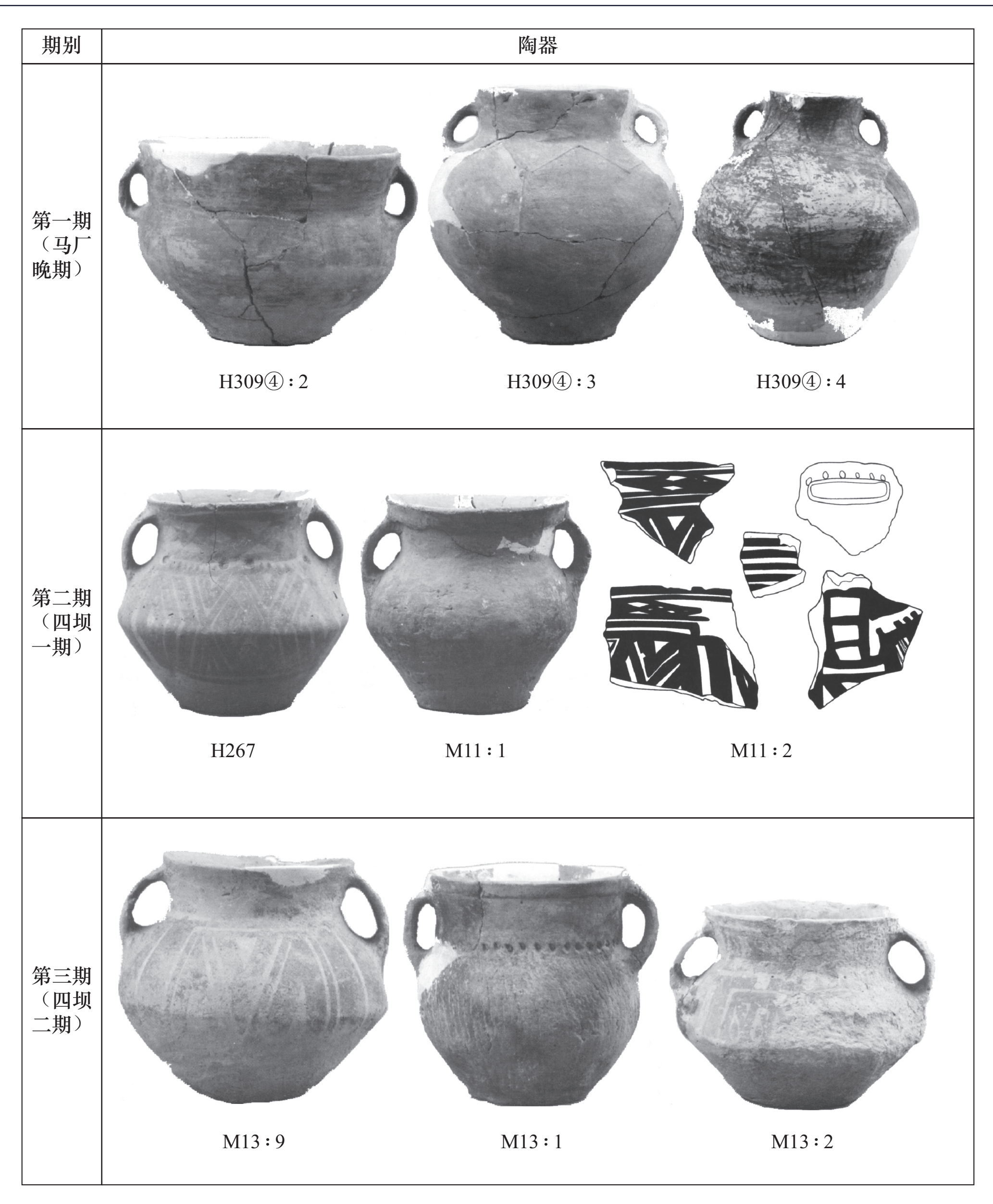
的，区分大的，形成分期。与此同时，由于我们的分期不仅是为自己服务的，也是为其他研究者服务的，所以要简单明了，各期特征也容易掌握，便于检验应用。由一个探方的发掘资料形成分期，还要对照其他探方反复验证，不对的修正，不足的补充。如果发掘了新的探方，也要反复验证。将来如果发掘了其他聚落，也要与之反复验证，使分期得到及时的更新，同时提高它的适用范围。这样就不用发掘一个遗址就提出一个新的分期，我们只要对原有分期进行补充修正就行了。其他研究者也不用从头再搞一次文化分期，而可以集中精力去研究其他问题。

上述的简报中发表了 2011 年的部分发掘资料，但是没有公布地层资料[26]。西城驿遗址的发掘是从 A 区台地东北角遭到破坏的豁口开始的，刮开台地的壁面后，可以清晰地看到三大层堆积（图二）。以灰沟底部为界，以上为第 1 层，表面为建筑 F3；以下的 F4、F8 及其上面的一层为第 2 层；F4、F8 以下为第 3 层，里面也包含若干层建筑。这样的分期后来在整理陶器时得到了验证；我们在第 1、2 层之间以及第 2、3 层之间都观察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而各大层内则变化不明显。因此我们将西城驿遗址的堆积分为三期，同时我们重新整理了简报发表的陶器资料，做了一张分期表（图三）。

西城驿遗址的三期陶器的各方面特征延续性很强，均包含粗砂、细砂和泥质陶，前两类均有灰陶和砖红陶，后一类均为红陶。器类与已经发表的东灰山墓地的接近，均有双耳罐、无耳罐、腹耳壶、豆、双耳盆、盘、器盖和瓮，说明四坝文化的居民死后随葬



图二　西城驿遗址缺口剖面图



图三　西城驿遗址陶器分期表

日常使用的陶器。它们以素面为主，但也有彩陶、绳纹、篮纹、戳印纹和珍珠（有窝）。三期器类没有大的变化，只是第三期出现了钵和单耳杯。下述的三期陶器的变化发生在器形和花纹上，体现的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第一期：第 3 层。陶质坚硬清脆，表面经过刮抹磨光，鲜艳亮泽。陶色大多为砖红色，但也有橙红色和深红色。绳纹深而清晰。绘彩陶者大多直接绘于器表，少数绘于白色或紫红衣之上。图案有竖线、横线、竖行连续菱格纹、网格纹、涡纹、对三角纹、三

角形网格纹、菱格网纹、“M”形纹、“人”形纹和“X”形纹。线条纤细均匀。所用颜料有墨汁状，也有泥粉状，漆黑发亮。有些陶器镶嵌珍珠。罐高领，直口，尖圆唇或圆唇，有指压纹花边，双耳上端紧贴器口；壶类器高领，直口，尖唇，圆肩，深腹。其他器类有切口罐。此外还发现齐家文化的薄胎双耳罐、圆肩篮纹罐、鬲足、鼎足，其中薄胎双耳罐折腹，形体瘦高。

第二期：第 2 层。陶色稳定，呈砖红色，表明制陶技术趋于成熟。表面虽然经过磨光，但是工艺退化，失去光泽。无论粗砂陶还是细砂陶都普遍在表面施白衣，使得色泽灰暗混浊。绳纹浅而模糊。彩陶直接绘于器表者减少，而多绘于紫红或白色陶衣上。所用颜料为泥粉状，易起皮脱落。图案为网格、棋盘格、折线、三角纹、菱格形网格、横线和竖线，线条粗犷。有些器物镶嵌珍珠。罐和壶一般侈口或敞口，厚唇，有指压纹花边。双耳上端移至唇下。本期器物普遍变得厚重。本期出有齐家文化的鬲足。

第三期：第 1 层。陶色稳定，呈砖红色，同时器物个体无论是厚胎器物还是薄胎器物都有所增大，表明制陶技术更为成熟。但是磨光技术退化，更加依赖施白衣或紫红衣来装饰表面，色泽更为暗浊。彩陶普遍绘于白衣或紫红衣之上，所用颜料更为厚重，色泽发白；同时图案更为丰满，线条更为粗犷，更加显得富丽堂皇。只是颜料更加容易脱落，而且线条不易识别，看上去黑乎乎一片。图案有三横线、折线、三角纹、回纹。不见镶嵌珍珠者。壶和罐的口沿加宽，更加外张，呈侈口或敞口，同时腹部外鼓。罐的双耳上端下移至颈的中部。本期出有齐家文化的薄胎双耳罐和鬲足，前者胎增厚，形体变矮。

上述分期显然不同于以往的分期，对于陶质、陶色、器形、彩陶陶衣和纹样方面的认识更为清晰。这一切要归功于西城驿遗址提供的连续地层和丰富的陶片。那么上述的三期陶器与以往讨论的马厂文化和四坝文化有什么联系呢？下面将着重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西城驿遗址的一期陶器与马厂文化晚期的关系。关于马厂文化的分期，瑞典学者巴尔姆格伦（Nils Palmgren）最早利用采集或征购得来的陶器，使用艺术史方法提出了一套方案[26]。尽管其材料比较零星，但是其观察角度和分析方法不无可取之处，可惜该分期出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中国考古学家的重视。1970 年以后，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人们利用新发现的墓葬材料整理出了若干分期。1976 年，考古工作者根据地层关系将当时在青海省乐都县柳湾墓地发掘的 227 座墓葬分了三期[27]。至 1979 年发掘结束时，墓葬数量增至 872 座，但是发掘者维持了此前的三期说[28]。1973 和 1974 年，考古工作者在永昌县鸳鸯池墓地发掘墓葬 189 座，后来将其分为三期，提出早期属于半山类型，中期和晚期都属于马厂类型，相当于后者的早期和晚期[29]。这个分期与 1977～1978 年发掘的兰州市红古区土谷台墓地（发掘 84 座墓葬）类似[30]。后来李伊萍将柳湾墓地分为四期，随之将马厂文化也分为四期[31]。后来李水城更为系统地整理柳湾墓地出土的彩陶的器形和花纹，也将之分为四期[32]。上述各位学者认识到的陶器演变规律都大体相似，都是器形由胖而瘦，彩绘由红黑复合彩而黑彩，纹样由

写实而抽象。

根据李水城的描述，马厂文化从二期开始进入河西走廊西段（酒泉以东），三期进一步扩张至酒泉以西，四期马厂文化衰落，在河西走廊消失[33]。西城驿遗址的一期陶器与马厂二期相比，器类上缺少长颈瓶和高低耳壶，彩陶上缺少红黑复合彩。就可比较的器形双耳罐而言，前者比马厂二期的要瘦高[34]。因此西城驿遗址的一期显然不属于马厂二期。马厂三、四期的器形属于同一组，彩陶花纹变化不大，只是构图更为简单，风格更为粗放[35]，可以合并为一期，其中的差别或许是墓葬之间的差别，而不是时间的差别。长颈瓶和高低耳壶基本消失，剩下小口瓮，单耳罐，双耳罐，双耳盆，钵，豆等，西城驿遗址的一期陶器器类与之大体重合。不同的是马厂三、四期瓮的比例偏高，不过这可能反映的是文化喜好。纹样有些变化，红黑复合彩消失，剩下黑色单彩，而且陶器表面流行施深红色陶衣，与西城驿遗址的一期陶器相近。器形方面，西城驿一期的彩陶和夹砂双耳罐都是直口，高领，双耳上端与口沿平齐。这些特征与马厂三、四期的典型墓葬MM558，M1284，M564和M1290出土的陶器接近[36]。西城驿一期流行竖线、横线纹、竖行连续菱格、网格、涡纹、对三角纹、三角形网格纹、菱格网纹、“M”形纹、“人”形纹、“X”形纹也与马厂三、四期的花纹接近。不过后者仍然残留有人蛙纹，大圆圈纹和锯齿纹，为西城驿一期所没有，但是这可能是聚落的日常用品与墓葬的随葬用品的不同。总体而言，西城驿一期在器类，器形，彩陶风格与纹样方面与马厂三、四期接近，因此属于后者，也就是马厂晚期[37]。

西城驿遗址第三期陶器的器类，器形，花纹和风格都与已经发表的山丹县四坝滩，玉门县火烧沟和民乐县东灰山出土的陶器，属于典型的四坝文化。这里无需多说，需要着重讨论的是本期与前人所作的分期。如前所述，张忠培认为东灰山墓地的年代与李水城所分的火烧沟墓地相当，而早于干骨崖墓地。总体来看，李水城所分的五期中，三～五期与西城驿遗址的第三期相当。各期的彩陶双耳罐口沿外侈呈喇叭状，双耳上端移至颈中部，腹部圆鼓，腹部装饰下端张开的三角纹；夹砂双耳罐与之类似，口沿侈口呈喇叭状，双耳上端位于颈中部，腹部圆鼓。这些器形和花纹特征与西城驿第三期的接近，应该同时。也许将来地层资料增加，可以允许我们分得更细，但是目前我们只能作为一期。

西城驿遗址第二期相当于简报的第一期。从现有材料可以看出，本期与一期之间差别明显，两期应该分开。彩陶双耳罐微侈口，双耳上端下移至口沿下，腹部微鼓，夹砂双耳罐和无耳罐同样微侈口。它们类似于李水城分出来的“过渡时期”的陶器，既继承了西城驿第一期即马厂晚期的特征，也出现了西城驿第三期即四坝文化的特征。此外，李水城分出的四坝文化一至二期陶器，从陶器特征来看，也属于本期。与四坝文化分期不同，在划分“过渡时期”时，李水城依靠的是从若干遗址拼凑起来的陶器，根据就是他们体现出了一些介于马厂与四坝之间的特征[38]。现在西城驿遗址提供的新资料把马厂与四坝文化连接起来，它一方面证实了他的方法和思路，另一方面提供了他当时拥有

的材料所无法比拟的完整资料。同样，将来等资料增加，也许有可能分得更细。只是"过渡时期"一词已经不再合适。过渡现象是两个前后相继的文化之间经常出现的现象。往往前一个文化和后一个文化的第一期都会出现过渡特征，但是人们一般不会单独划出一个过渡时期。李水城研究的半山与马厂类型之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39]。它本来就是一个暂时使用的名词，以应付资料有限，马厂与四坝文化之间的承接关系不清楚的需要。现在需要做的是，讨论该期到底属于马厂还是四坝。从西城驿第二期陶器的器形和花纹来看，它们更接近于第三期。因此我们把西城驿遗址的第二、三期称为四坝文化的第一、二期。

在 2010 年，我们从三大层的地层和遗迹单位筛选出来的木炭和植物种子中选了一部分标本，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 ^{14}C 实验室，供测年之用。现在测年数据已经出来，有关的分析论文也准备刊发。测年数据经过拟合以后，三期的年代范围分别为：一期，3 个数据，公元前 2135 年～前 1900 年；二期，9 个数据，公元前 1880 年～前1680 年；三期，9 个数据，公元前 1670 年～前 1530 年[40]。总体而言，西城驿遗址的四坝文化一、二期年代范围与以往所得年代范围基本重合。如此看来，西城驿遗址的四坝文化历时 350 多年，这么长的历史只分两期似乎有点少，但是目前的资料分这么多。

总之，本文根据张掖市西城驿遗址的系列地层和彩陶，将四坝文化的彩陶分成三期。三期彩陶的器类、器形和纹样都具有很强的延续性，说明它们是前后延续发展的；同时，三期彩陶又各有自己的特征，可以代表三个阶段。其中第一期属于马厂晚期，第三期属于四坝文化，而第二期相当于过去的"过渡类型"。但是从彩陶特征来看，本期更接近于第三期，可以归入四坝文化。过去发掘的火烧沟、干骨崖和东灰山等墓地出土的彩陶可以归入这两期。根据最新获得的 ^{14}C 数据，三期的年代分别为公元前 2135 年～前 1900 年、公元前 1880 年～前 1680 年和公元前 1670 年～前 1530 年。

注　释

[1] 有关路易・艾黎写信之事引自李水城 . 四坝文化研究［A］. 考古学文化论集（三）［C］.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80. 重印于李水城 . 东风西渐——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之进程［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58～105.

[2] 安志敏. 甘肃山丹四坝滩新石器时代遗址［J］. 考古学报，1959（3）.

[3] 同［1］：13～14.

[4] 安志敏. 甘肃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J］. 考古通讯，1956（6）. 而他本人在 1959 年发表的文章里，没有提"四坝文化"这个命名。可能当时考古界对该文化的命名还有争议，安志敏出于谨慎起见搁置 1956 年命名的"四坝文化".

[5] 宁笃学. 民乐县发现的二处四坝文化遗址［J］. 文物，1960（1）. 严文明. 甘肃彩陶的源流［J］. 文物，1978（10）. 但是同年甘肃省博物馆发表的. 甘肃古文化遗存［J］. 考古学报，1960（2）. 采用的是"四坝式"遗址，1979 年发表的《甘肃省文物考古三十年》又采用"火烧沟类型"。后

来许永杰还曾用过“火烧沟・四坝文化”的名称，但是 1991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表（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A］. 文物考古工作十年［C］.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之后“四坝文化”一名就固定下来 .
［6］ 宁笃学. 民乐县发现的二处四坝文化遗址［J］. 文物，1960（1）.
［7］ 甘肃省博物馆. 甘肃古文化遗存［J］. 考古学报，1960（2）.
［8］ 同［7］. 山羊堡滩遗址见第 29 页，表一.
［9］ 甘肃省博物馆. 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A］.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C］.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10］ a. 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 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J］. 考古学报，1981（3）.
b. 孙淑云，韩汝玢. 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J］. 文物，1997（7）.
c. 严文明. 甘肃彩陶的源流［J］. 文物，1997（7）.
［11］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火烧沟四坝文化铜器成分及制作技术的研究［J］. 文物，2003（8）.
［12］ a. 李水城，水涛. 甘肃西部地区考古调查. 中国考古学年鉴［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b. 李水城. 四坝文化研究［A］. 考古学文化论集（三）［C］.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101～102.
［13］ a. 李水城，水涛. 酒泉县丰乐乡干骨崖遗址. 中国考古学年鉴［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b.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的发掘与收获［J］. 考古学报，2012（3）.
［14］ a. 许永杰. 民乐县东灰山火烧沟四坝文化遗址. 中国考古学年鉴［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b.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 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揭示与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15］ 赵丛苍. 西河滩遗址发掘主要收获及其意义［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5（3）.
［16］ 同［12］b：103～104.
［17］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 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R］.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408～411.
［18］ 干骨崖墓地有四个 ^{14}C 测年数据，校正后年代范围很大，在公元前 1890 年～前1250 年之间，李水城选取了公元前 1850 年～前 1600 年；火烧沟墓地也有四个数据，校正后年代范围为公元前 1940 年～前 1630 年，李水城选取了公元前 2000 年～前 1800 年。最后归总为公元前 2000 年～前 1600 年，三次处理都没有说明根据。见李水城 . 四坝文化研究 . 考古学文化论集（三）［C］.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90，94，103.
［19］ 同［12］b：109.
［20］ 同［12］b：108.
［21］ 张忠培. 东灰山墓地研究［J］.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香港中文大学，1997（6）. 重印于张忠培. 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253～286.
［22］ 同［21］.
［23］ 同［12］b：108～109.

［24］ 同［21］：253～286.
［25］ 同［21］：300，302～303，305.
［26］ Nils Palmgren. Kansu Mortuary Urns of the Pan Shan and Ma Chang Groups［A］. *Palaeontologia Sinica Series D*, *Volume Ⅲ*［C］. Peiping: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1934.
［27］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葬第一次发掘的初步收获［J］．文物，1976（1）．该文有关各期特征的叙述文字漏印较多，完整者见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J］．文物，1997（7）.
［28］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239～242.
［29］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 . 甘肃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J］．考古学报，1982（2）.
［30］ 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文化馆．兰州土谷台半山—马厂文化墓地［J］．考古学报，1983（2）.
［31］ 李伊萍．半山、马厂文化研究［A］．考古学文化论集（三）［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32～67.
［32］ 李水城．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78～182.
［33］ 同［32］：184～187.
［34］ 同［32］：179～180，图六五 .
［35］ 同［32］：180～181.
［36］ 四座墓葬的陶器图分别见《青海柳湾》上册图三八 B，图四六和图四九 .
［37］ 李水城将马厂第三期视为马厂晚期．李水成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80.
［38］ 同［12］b：109～113，图一一，图一二，图一三.
［39］ 同［32］：178.
［40］ 张雪莲，张良仁，王辉，卢雪峰，陈国科，王鹏．张掖市西城驿遗址的碳十四测年及初步分析．待刊.

Pottery of Zhangye West City Station Site

Zhang Liangren　Wang Hui

Abstract：The culture history of the Hexi Corridor has been an unsolved question. Since Zhimin An went to Shandan to investigated the Sibatan ruins in 1956, people have excavated many Siba culture sites, most of which are cemeteries, fewer are settlements. Due to the lack of continuity, some scholars use the typology to divide the painted pottery by stages and put forward that Siba culture developed from Machang culture, but in the middle there is a transition period. We have excavated the ruins of Zhangye west city station for 5 years since 2010. Excavation produced a continuous record and a large amount of pottery. According to

this data we divide the pottery into three stages. The first period belongs to the later period of Machang culture, the third period belongs to Siba culture. The second period is a transition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culture background this period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first period of Siba culture. Thus, the sequence from Hexi Corridor to Siba culture has been preliminary established.

Key words：Siba Culture; Hexi Corridor; Bronze Age

西藏西部的早期墓葬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霍　巍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成都，610064）

本文所论的西藏西部地区大体上以今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的行政区划为界。这个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的北麓，以喜马拉雅山的西段为中心，境内有藏民族信仰的“神山”冈底斯山和“圣湖”玛旁雍错，象泉河、狮泉河、马泉河、孔雀河等多条河流纵贯其间，最后汇入印度次大陆。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多种古老文明的交汇之处，在汉藏史籍中通常将这一区域的核心地带称之为“羊同”或“象雄”[1]，在西藏早期历史文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我国考古学工作者开始有计划地在这一地区开展考古调查工作，前期的考古工作主要围绕建立于10世纪的古格王国都城遗址札不让及其周边相关佛教考古遗存展开；近年来，对于这一区域内“前佛教文化遗存”的考古工作也开始提上日程，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考古收获[2]，本文拟以其中古代墓葬为观察对象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因这批墓葬的年代均早于吐蕃王朝时代，年代大约均在2至3世纪以前，故本文称其为“早期墓葬”。

一、早期墓葬所反映出的基本文化面貌

迄今为止，在本区内发现的早期墓葬包括日土阿垄沟墓地[3]、卡尔普墓地[4]、皮央、东嘎墓地[5]、格布赛鲁墓地[6]、故如甲木墓地[7]、曲踏墓地[8]等各处，目前均未开展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仅做过小面积的调查清理和抢救性清理。从发现情况来看，可大体归纳出这些墓葬的基本文化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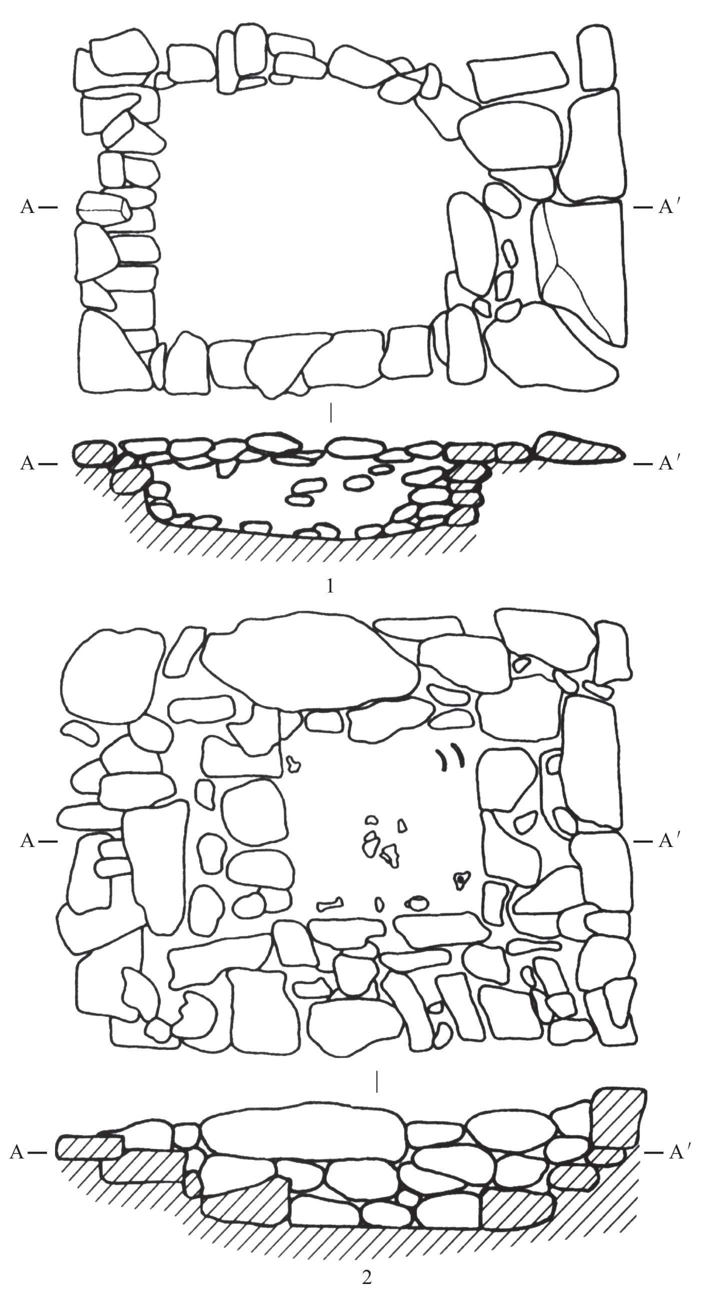
（一）墓葬形制

墓葬形制从结构上看，主要有石丘墓、石室墓和土洞墓三种形制。所谓石丘墓，是指在地表上可以明显观察到有用石头垒砌的坟丘，形状以圆形为多，也有不甚规则的形

*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文物考古所见西藏与中原关系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号11&20121）系列成果之一。

状，地表下的墓室结构十分简单，或用石头垒砌成浅平的墓框，或者平地起墓，不构墓室，较为典型的墓葬见于日土阿垄沟、皮央萨松塘、东嘎朗布钦等墓地（图一）。

石室墓的结构要比石丘墓复杂，其特点是在竖穴土坑的边缘用较为规整的石块垒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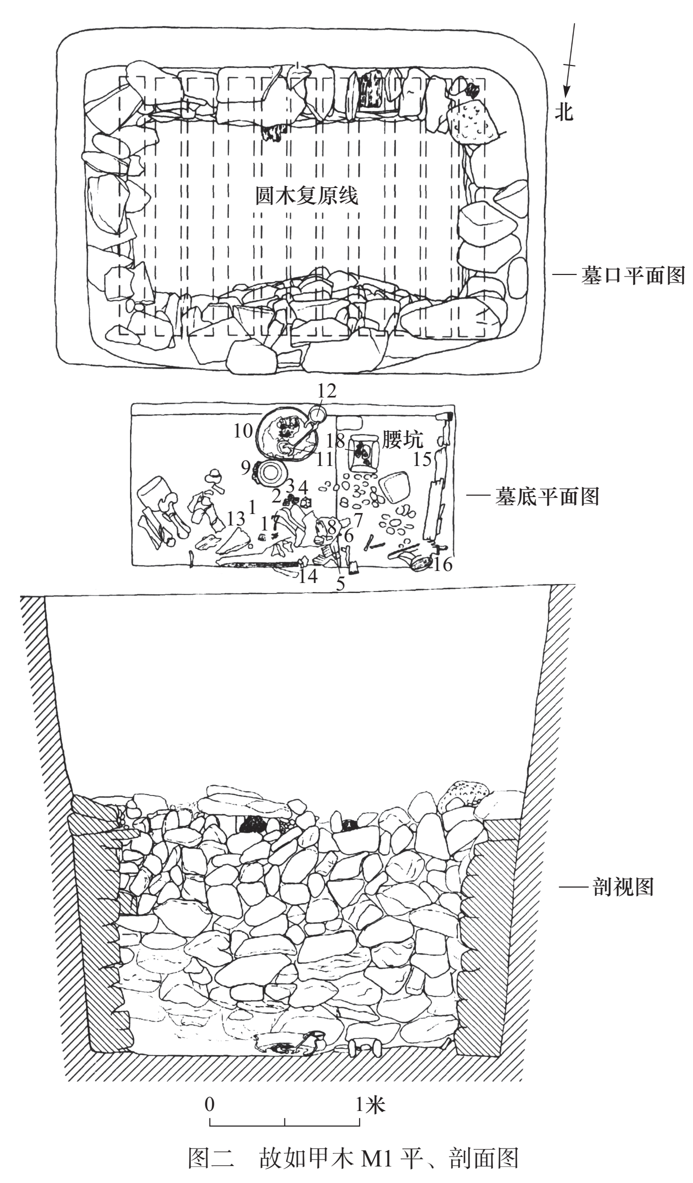


图一　石丘墓平、剖面图

1. 东嘎Ⅴ区朗钦 M1 墓室平、剖面图　2. 萨松塘 M1 墓室平、剖面图

（采自《平皮央 • 东嘎遗址考古报告》）

墓壁形成墓室，有的采用石块封顶，也有的采用木石结合的方式封砌墓室。目前发现的最具典型意义的石室墓为故如甲木墓地2012年度清理发掘出的四座墓葬（M1～M4），这四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墓壁均采用天然石块或略经挑选的方形石块垒砌而成，封砌墓顶的石材采用经过初步加工的石片，一般长20～40、宽15～30、厚4～6厘米。其中，M1的墓室顶部两侧壁顶端有规律摆放的石块形成的间隙，表明原来在墓顶横置有圆木11根，用来支撑墓顶部覆盖的石块（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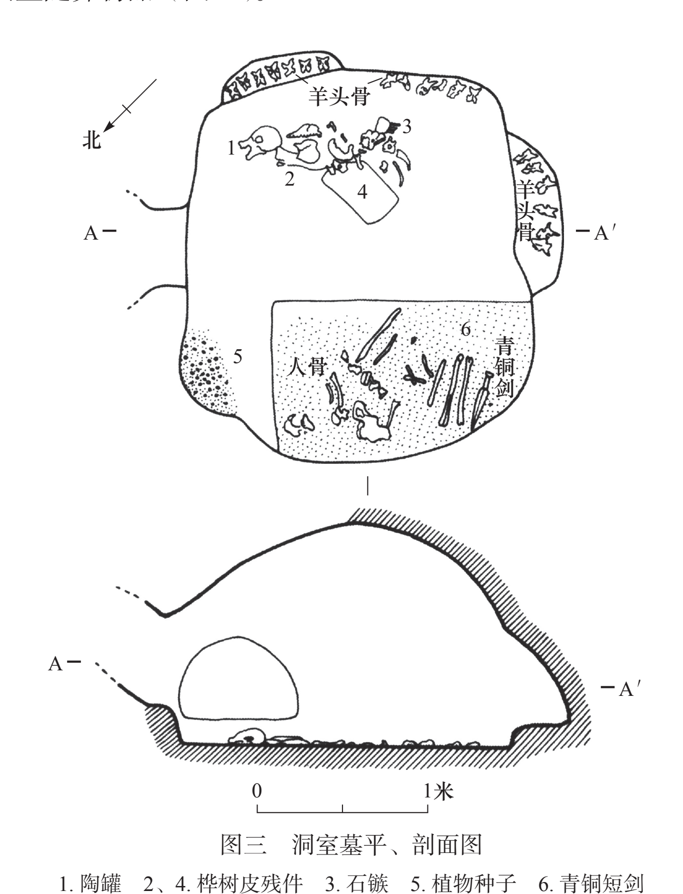


图二　故如甲木M1平、剖面图

1.金面具　2～5.银方形饰　6、7.银圆柱形饰　8.银饰片　9.铜壶　10.铜盆　11.铜勺　12.铜釜　13.铜圆形饰件　14.铁剑　15.木棺残片　16.方形木案　17.料珠　18.铁器残片　19、20.铁马衔（叠压在8之下）

（采自《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2012年发掘报告》）

土洞墓是在土壁的一侧向内挖出洞室，典型的墓例为皮央格林塘墓地中的 M6，此墓为单室土洞结构，由墓道、墓室和龛室等组成，墓道位于墓室一侧，向上呈斜坡状，墓道西端与墓室相连，墓室北部挖出一长方形的浅坑葬入死者，墓室的东、南、西各壁挖出小龛以用放置随葬物品（图三）。



图三　洞室墓平、剖面图

1. 陶罐　2、4. 桦树皮残件　3. 石镞　5. 植物种子　6. 青铜短剑

（采自《皮央 • 嘎尔遗址考古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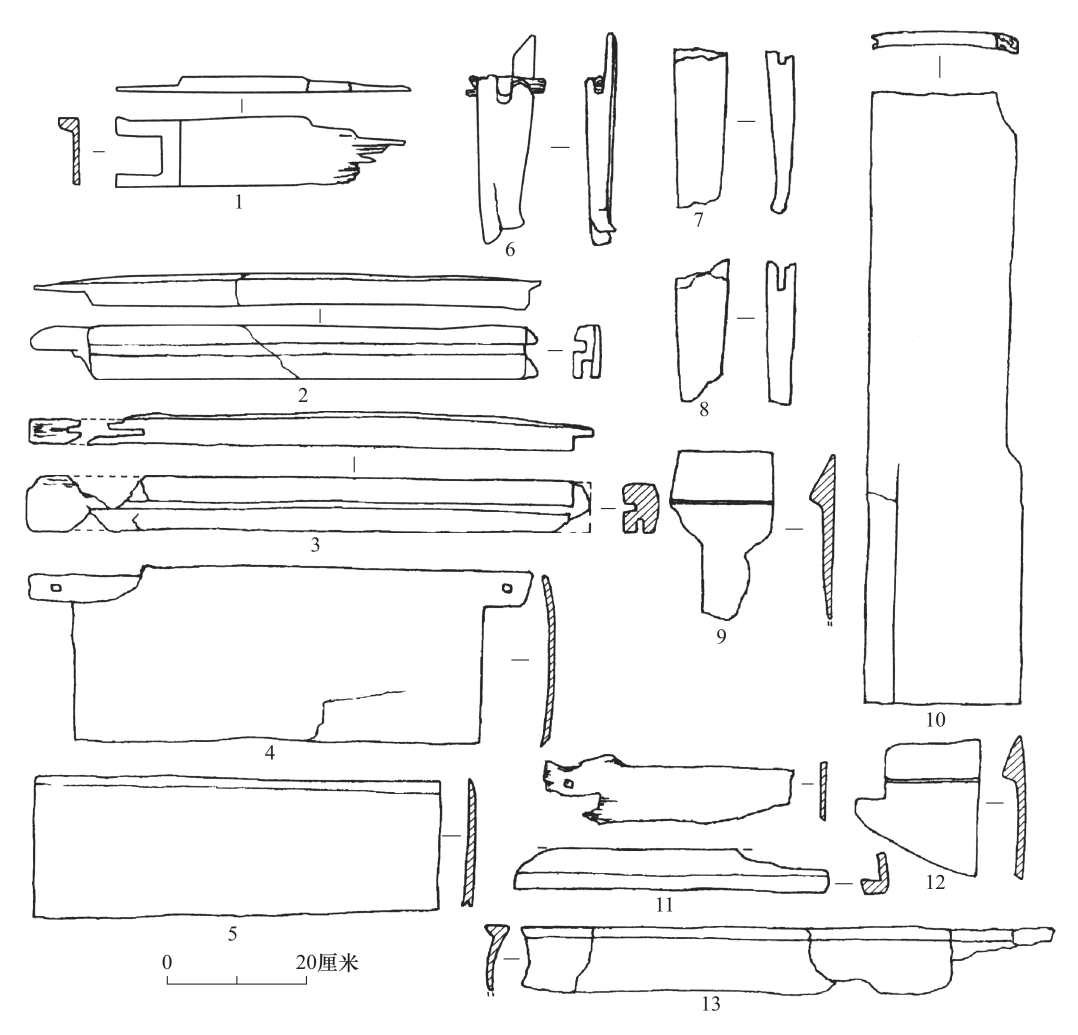
此外，在本区内还发掘出土过一些墓坑浅平、地表未见封土或封石墓丘的竖穴土坑墓，如皮央格林塘墓地 M1、M2、M3、M7、M8 等各例。但从其中一些迹象观察，原来在地表和竖穴内有的还残存有石头的遗迹，如 M3 的墓室西北角有几块石块竖置，墓底也有石板[9]；M7 发掘前在地表观察到有大石块，发掘过程中在上层中部填土中也发现有大石块[10]，由此推测可能这类墓葬原来的结构形态还是属于石丘墓类型，只是后来自然或人为的原因，石砌结构受到破坏，方成为现在的状态。

（二）埋葬习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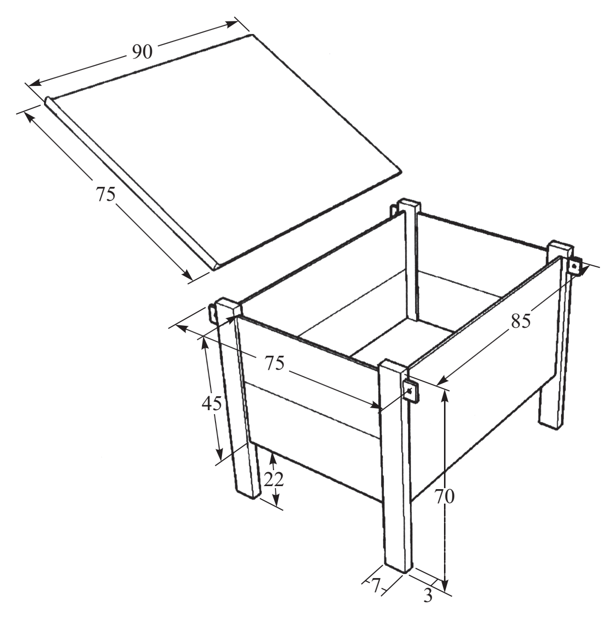
从目前已发掘清理的墓葬来看，死者采取的葬式主要以屈肢葬、二次拣骨葬和火葬

等方式为主，尤其是以侧身屈肢葬式和二次拣骨葬占据主流。大部分墓葬均未发现葬具的痕迹，但少数墓葬中发现有木棺的残痕。最初发现使用“箱式木棺”的报导见于札达县卡尔普墓地[11]，后来在噶尔县门士乡的故如甲木墓地、札达县托林镇的曲踏墓地中也发现了使用木棺的痕迹，经过正式考古发表的资料以故如甲木墓地 M1 出土的一具木棺最为完整，这具木棺发现在墓底西端，出土时残存四足及盖板残片（图四），根据四足位置、形状判断，应是长方形箱式木棺，长约 0.9、宽约 0.76 米。原来的木棺构件大部分被寺院僧人拆除取走，后经复原后可知这具木棺高约 0.7 米，由四足、底板和盖板榫卯结构拼接而成（图五）。

值得注意的是，在故如甲木同一墓地发掘的 4 座墓葬中，仅有 M1 发现使用木棺，其他各墓均未发现木棺的残迹，其原因可能与死者的身份、地位相关。据最初打开这具



图四　故如甲木墓地出土木棺残片
1～13. 均匀木棺构件与残件
（采自《西藏阿里地区嘎尔县故如甲木墓地 2012 年发掘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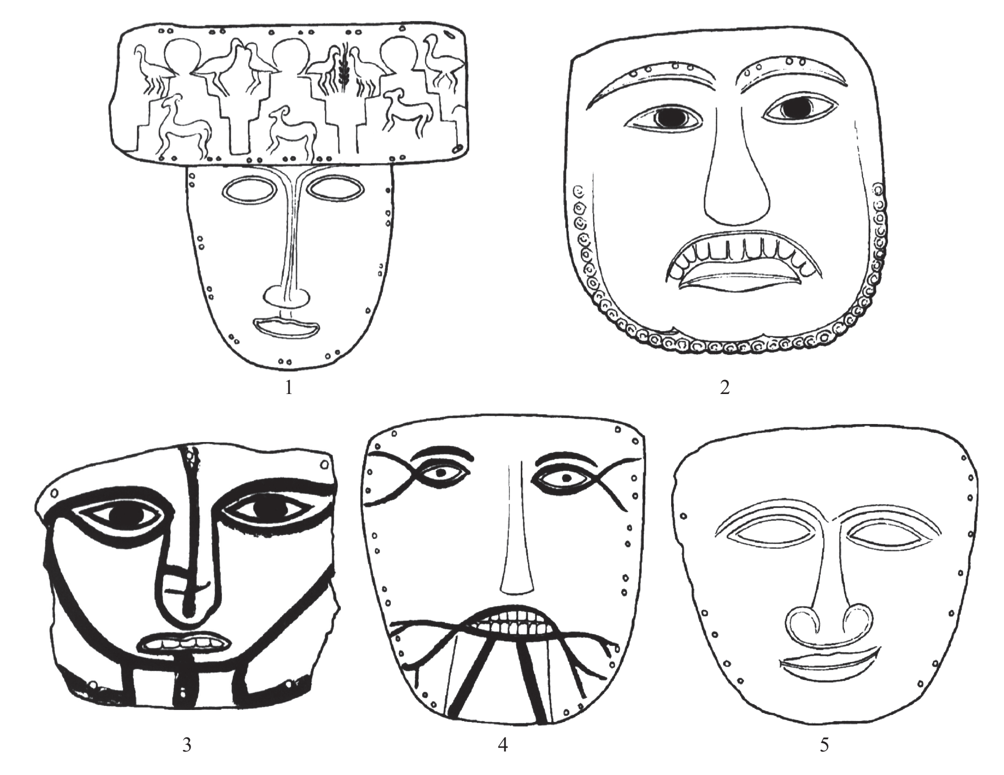


图五　故如甲木墓地出土木棺复原图（长度单位：厘米）
（采自《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 2012 年发掘报告》）

木棺的故如甲寺僧人描述，死者葬入棺内，双手作束缚状置于胸前，头骨包裹有“王侯”文鸟兽纹锦，棺内发现大量丝织物，在木棺周围还发现其他金属器、陶器和木器[12]，可知死者的身份特殊，故能够使用木棺作为葬具。

本区内个别墓葬还发现死者戴有黄金面具（覆面）的习俗。故如甲木 M1 死者的面部便覆盖有这样的黄金面具，面具为正方形，由金片压制而成，长 4.5、宽 4.3、厚 0.1 厘米，正面用红、黑、白三色颜料绘出人物面部五官特征，在面具的周边均匀地分布有八个小圆孔，直径 0.2 厘米，应为缝缀在较软质地的材料上使用，在面具周围还发现有较多的费昂斯串饰[13]。另在札达县曲踏墓地Ⅰ区 M1 也发现过一具黄金面具，大小与真人面部相仿，由冠部和面部两部分连缀而成，冠部长方形，长约 14.2、宽 14、厚 0.01 厘米，冠部正面并列錾刻出雉堞、立鸟、羊、穗状物等图案，冠部之下为面部，其上压印出五官，冠部和面部的边缘都有直径为 0.2 米的小孔，两两一组，背后衬有多层丝织物，并残留有打结的系带，冠部背后的丝织物还用薄木片加固。此外，札达县曲踏墓地Ⅱ区也曾出土过一件黄金面具，呈椭圆形，长 5.5、宽 4.1、厚 0.01 厘米，由金片压制成面部轮廓及眉眼、口鼻等五官，边缘处向后折转，可能用以固定在其他质地的材料上使用（图六）。

此外，本区早期墓葬中还有一些特殊的葬俗也十分引人注目。例如，故如甲木墓地的发掘者发现：“根据填土中的堆积及随葬动物摆放情况，判断为二次葬，埋葬顺序应是先放置随葬动物，预留出圆形区域用以放置墓主人尸骨。墓坑可能敞开过一段时间，导致自然淤沙将墓底骨骼和随葬品掩埋，后尸骨葬入，与随葬品之间形成自然的地层分



图六　喜马拉雅地区出土的黄金面具

1. 曲踏墓地　2. 伊犁波马墓地　3. 故如甲木墓地　4. 桑宗墓地　5. 马拉日墓地

（采自吕红亮《西喜马拉雅山地区早期墓葬研究》）

割。墓坑敞开的一段时间很可能是停厝待葬或进行尸体处理，并进行某种形式的祭祀。”[14]。联系到墓葬出土的死者尸骨均十分散乱的情况来看，这种“停厝待葬”的丧葬风俗应为一种二次拣骨葬法。又如，在该墓地 M1 在木棺下偏南置有一方形腰坑，由四块砾石拼成正方形，内置小石块及铁器的残片，应为埋葬前的某种祭祀遗迹。再如，故如甲木墓地还发现一部分用来垒砌墓壁的石块上有涂朱的现象，也应与埋葬习俗中的原始信仰观念有关。

（三）动物殉葬习俗

本区内发现的墓葬均普遍流行以动物殉葬的习俗，其中既有完整的马、羊、狗等骨骼的发现，也有用大量的羊头、马头、动物肢骨等殉葬的情况。如在皮央格林塘墓地 M6 中，一墓出土羊头 17 个。另在故如甲木墓地 M4 中，动物殉葬情况还出现明显的分层现象：在距墓坑口深约 0.5 米处发现完整的马、狗骨各一具，可能为石砌墓室上方的祭祀层；墓室的底部随葬有完整的羊骨架七具和羊头五个，形成一个直径约 1 米的圆形动物祭祀区。

（四）器物随葬习俗

本区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器物除极少发现的黄金面具、银饰件、丝绸等珍稀器物之外，较多出土陶器、竹木器、石器以及少量铜器、铁器。陶器以圜底形器较多，多见罐、钵等器形，带单柄和带流的器物也较常见，陶色以红褐色为主，少见平底器的带足器。竹木器类有方形的四足木案、马蹄形木梳、木奁、钻木取火器、竹编器、桦树皮袋等器类。铜器有青铜剑、青铜泡饰、马饰以及盆、钵、壶、釜、碗、杯等生活用具。铁器有长剑、矛、镞、马衔等器物。石器有纺轮、石镞、磨刀石等物。

上述墓葬的年代，做过 ^{14}C 测年的有皮央、东嘎墓地和故如甲木墓地等处，其中格林塘墓地 M6 出土木片的测年数据为距今 2725～2170 年，东嘎第Ⅴ区 M6 出土标本的测年数据为距今 2370±80 年[15]，故如甲木墓地的四座墓葬年代为距今 1715～1855 年，即 2 世纪至 3 世纪前半，总体而言相当于中原秦汉或汉晋时代，均早于唐代吐蕃王国的年代（7 至 9 世纪），所以学术界一般将其归入到“西藏史前时期”或“前吐蕃时期”这个发展阶段来看待，本文则称其为“西藏西部早期墓葬”。

二、早期墓葬中的文化因素分析

西藏西部新发现的这批墓葬考古资料，给学术界提出了不少新的思考和新的问题。它们是否存在着自身的发展体系？与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之间有何共性？是否与尼泊尔穆斯塘等地发现的早期墓葬同属于一个“跨喜马拉雅文化带”内的考古学文化？在目前有限的资料条件下，我们只能通过对墓葬文化因素的具体分析，提出一些初步的认识。

西藏西部地区早期古代墓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仍是在地表封树以石丘，在地下“以石筑墓”，从而形成石丘墓和石室墓这种基本的墓葬形制。石丘墓和石室墓是西藏高原早期普遍流行的墓葬形制，年代最早者可举拉萨曲贡墓地发现的同类墓葬[16]，曲贡墓地石室墓的用材和构筑方式与本区内东嘎、皮央等地发现的石丘墓、石室墓均十分相似。20 世纪 20 年代中亚考古队的罗列赫（J.N.Roerich）在藏北高原、西部中部也发现过石丘墓，特点是在墓上以石块或石板环绕，出土器物有青铜镞和铁镞[17]。所以，石丘墓和石室墓这一基本面貌表现出西藏西部与藏北和西藏中部地区墓葬所具有的某些共性。

若从更大的视野内来加以考察，这类石丘墓在我国新疆地区、蒙古高原、前苏联阿尔泰及贝加尔湖地区以及中亚北方草原地带都有广泛的分布，而且在葬式上也主要流行屈肢葬、二次葬、火葬等葬法，在墓葬中以马、羊、狗等动物殉葬的习俗十分普遍，学术界一般将这类石丘墓和石室墓葬视为具有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考古学遗存，认为其与北方游牧文化带的古代游牧民族关联性很强[18]，西藏高原发现的石丘墓和石室墓也应

归入这个大的文化体系当中来加以认识。

故如甲木墓地发现的四座石室墓在西藏西部石室墓系统当中级别较高的墓葬，所以在石室墓这个共性之外另具有特性。例如，M1 不仅出土有黄金面具、大量铜器、铁器和珍贵的丝织品，而且十分难得的还用木材来修筑墓室，墓顶用圆木封盖，墓壁可能还用了木材加以支撑。发掘者经实验室测试证实这些木材的很可能是印度三尖杉属（*Cephalotaxus sp.*）[19]，这类树木可能来自喜马拉雅山麓的南坡，推测应是通过远程贸易获得。类似这种用圆木搭盖石室墓顶的做法，在“早期铁器时代”欧亚草原文化较高等级的墓葬中较为常见[20]，后来青海都兰唐代吐蕃墓葬中也较多采用了这种构筑墓葬的方式[21]，可见这种传统延续的时间很长，而故如甲木墓地则是目前在青藏高原发现的使用这种筑墓方式中最早的例证。

西藏西部发现的另一类墓葬是洞室墓，其形制较之一般的石丘墓更显复杂，其构筑方式是“深挖土洞”而并非“以石筑墓”，所以从建墓方式来看应有别于石丘墓和石室墓系统。在这种洞室墓死者尸体和随葬器物之下铺垫有一层红色的朱砂，这种现象令人联想到故如甲木墓地中在筑墓的石块上“涂朱”的情形，两者显然均具有某种独特的原始宗教含义在内，表明这两类墓葬虽然形制有别，但也并非毫无联系。它们之间的差异究竟是由于文化系统上的相异或者年代上的差异造成的，还是因为死者的身份等级、社会地位的不同造成的，由于目前材料太少还难下结论，但笔者认为从皮央格林塘洞室墓 M6 出土的随葬器物种类较丰，并且一次可以随葬 17 个羊头的情况分析，后一种原因的可能性会更大。这类洞室墓葬以往在西藏高原尚未见到披露，应是具有本地文化特点的一种墓葬形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藏西部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与之毗邻的尼泊尔穆斯塘地区常见的“崖洞葬”葬法。过去在古格王国故城札不让的洞窟当中曾经发现过在窟内壁上开出龛室埋藏尸体的情况，与尼泊尔穆斯塘地区的葬俗似有相似之处，但如果联系到古格王国佛教盛行的历史背景来看，也不排除其属于利用佛教石窟掩埋僧人遗体的“瘗窟葬”这种可能性[22]。即使将其纳入到“崖洞葬”这一系统当中来加以考虑，目前在本区内也属孤例，还不能确定其与境外尼泊尔等地的崖洞葬有明确的关系。再从年代上来看，古格发现的这例材料也要比尼泊尔穆斯塘地区的崖洞葬晚得多，两者之间很难具有可比性。此外，虽然过去在考古调查中曾在西藏吉隆县境内也曾发现过葬尸于崖洞中的习俗[23]，但其年代多为近现代，与本文所论的早期墓葬也难以比较。所以，从总体上来看，西藏西部的这批早期墓葬与尼泊尔穆斯塘地区的崖洞葬之间在文化面貌上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别，目前还很难将两者纳入到一个共同的考古学文化系统当中来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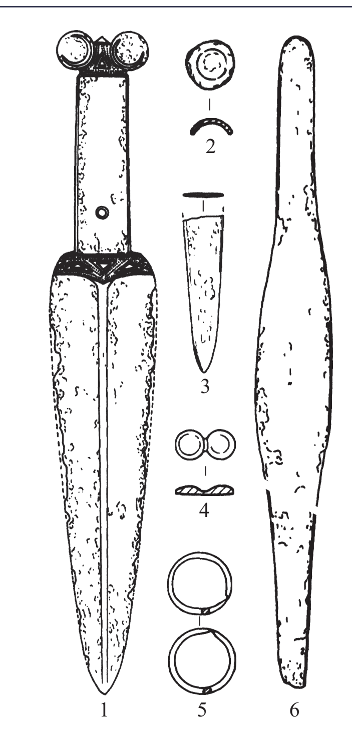
若干线索表明，西藏西部早期墓葬以石丘墓、石室墓为主体的基本文化面貌，应当主要还是受到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系统的影响，但同时也可以观察到与周边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联系。

首先，我们可以观察到来自汉地西域文化的影响[24]，这些影响很可能通过西域“丝绸之路”传入高原西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故如甲木墓地中带有“王侯”字样和鸟兽纹样的丝绸，与之相类似的带有“胡王”汉字的丝绸过去也曾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和新疆营盘墓地中出土[25]，一般认为是由中原官方织造机构制作、赐予边疆地方王侯贵族或部落首领的标志性物品。故如甲木墓葬中出土的“一”字格铁剑也具有中原文化的特点，发掘者认为其“有可能是仿汉地铁剑”。此外，故如甲木和曲踏墓地中出土的方形四足箱式木棺，是汉晋以来流行于西域的汉式葬具之一，虽然被西域各国有所改造，但其基本形制的源头应是来自于汉地[26]。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中还出土有大量木竹器和草编器，如马蹄形木梳、方形四足木案、旋制的木奁、钻木取火器、草编器等，这些器物在新疆汉晋时代的墓葬中多有出土，形制特点也十分接近[27]。考虑到新疆南疆地区与西藏阿里高原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交通路线与文化交流[28]，西藏西部早期墓葬中的这些具有浓厚汉文化色彩的因素，最大的可能性是通过汉地西域南疆一带南传至阿里高原。

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中均发现黄金面具，已有学者关注到在与之相毗邻的印度北方邦马拉里墓地、尼泊尔穆斯塘地区萨木宗墓地中也有相似的黄金面具发现，并提出这是一种在西喜马拉雅高山区域流传甚广的葬仪[29]。实际上，类似的丧葬习俗在我国新疆地区也十分常见，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波马墓葬中也同样出土过与之形制极为相似的黄金面具[30]，同时还在伊犁营盘墓地中发现过死者面部覆盖有贴金麻制的面具[31]、吐鲁番墓地中出土过鎏金铁面具[32]。若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加以考察，在欧亚大陆这种制作和使用黄金面具的葬俗曾广泛流行于公元前 3 千纪至前 1 千纪后半，在北非、西亚、中亚等各个地区都有发现[33]。从总体上讲，我国新疆、西藏甚至包括上述印度、尼泊尔一带所流行的黄金面具，都与这个大的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可能都与欧亚大陆民族和文化之间通过西域“丝绸之路”的互动有关。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国中原地区早在商周之际，也流行掩蔽死者面部的“面衣”“覆面”之制，甚至也有用玉、青铜等制作面具或五官掩蔽死者面部的习俗[34]，但它和欧亚大陆这种黄金面具在丧葬文化背景上是有所区别的，不可简单地纳为一体看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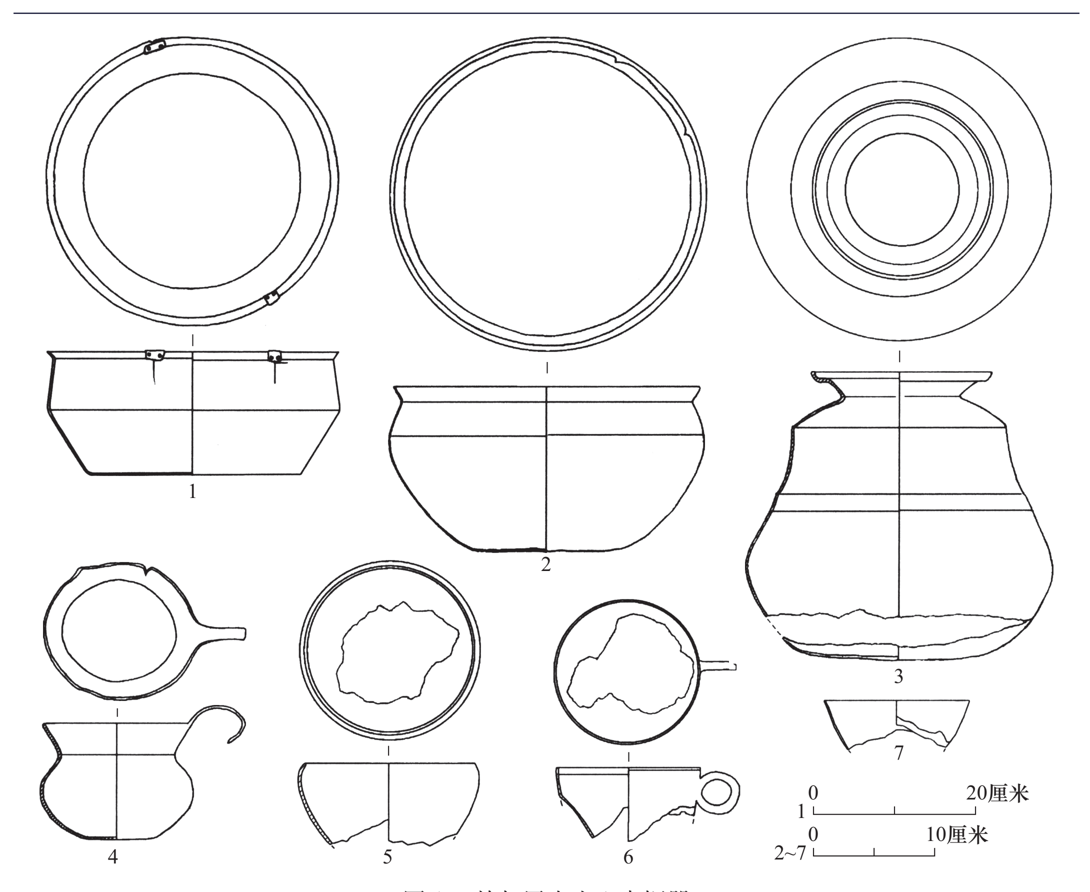
此外，在西藏西部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竹编器和桦树皮制品的残片，如皮央、东嘎墓葬中发现的桦树皮袋残片，表面有长条形和折线带状纹构成的几何图案[35]，有意见认为它们可能来自喜马拉雅山南坡的低海拔山区，在尼泊尔穆斯塘地区的崖洞葬中也发现过同类制品，表面也雕刻有带状纹饰[36]。由于今天西藏西部地区已经没有森林，也不适合竹子的生长，所以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这类桦树皮制品在公元前 1 千纪欧亚北方草原“斯基泰 – 西伯利亚文化”中也曾经十分流行，与北方游牧民族关系密切，在我国新疆地区汉晋时代墓葬中也有发现[37]，所以，西藏和尼泊尔穆斯塘地区发现的这种桦树皮容器的残片，是否也是通过古代游牧部族从北方传来值得考虑。

西藏西部早期墓葬中发现的青铜器主要包括青铜兵器、泡饰和青铜容器等种类，其中的皮央格林塘墓地中出土的青铜兵器、泡饰、扣饰残片等均具有较为明显的北方草原地带游牧文化色彩（图七），尤其是从格林塘 M6 中出土的一件双圆饼首青铜短剑，与我国西南地区盐源出土青铜短剑柄部的装饰几乎完全相同，吕红亮认为它有可能是从“金沙江流域西渐而来，属于远程交换物”[38]，由于目前材料有限，这个推测是否成立可备一说，但这个现象至少提示我们关注西藏西部早期墓葬和青藏高原东部以及四川盆地等地青铜文化的联系是很有必要的。此外，故如甲木墓地还出土了一批青铜容器，器形有盆、钵、壶、碗、杯等（图八），其特点是器壁轻薄，表面均有烟熏过的痕迹，说明是用死者生前的实用器物随葬。过去在西藏西部墓葬中没有发现过可与之相比较的同类青铜器物，目前还没有线索将其与周边地区的青铜器联系在一起，它们究竟是本地传统下的产物还是外来影响的产物尚有待进一步讨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中一件铜壶的内壁和一件勺子的内壁均发现有“茶叶状植物叶片”残留，如果经鉴定可以确认为茶叶的话，那将是西藏高原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煮茶和饮茶的考古实物遗迹，意义十分重大。茶叶传入西藏高原的路径可从南亚印度和汉地中原两个方向来设定，但若联系到西藏高原与汉地在文化上的密切关系来考虑，我们认为这些茶叶通过汉地（尤其是西域或者西南山地）传入的可能性也许更大。唐宋时期形成的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和所谓“茶马古道”的滥觞，或许正是由此滥觞。



图七　皮央出土青铜器之一
1. 短剑（PGM6 ：4） 2. 泡饰（PGM2 ：1） 3. 剑残件（PSM4 ：1） 4. 扣饰（PSM5 ：5） 5. 环（PSM6 ：1） 6. 铜片（PGM5 ：3）
（采自《皮央 • 东嘎遗址考古报告》）

最后，我们再来观察讨论西藏西部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陶器群。从目前已知的材料来看，出土陶器相对数量较多、器形比较完整的有札达县皮央、东嘎墓地和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等。皮央、东嘎墓地出土陶器主要的器形为圜底的钵、单耳圜底罐、单耳折肩圜底罐等，多为红褐陶，以绳纹为主，少数饰有几何刻划纹（图九）。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陶器主要有圜底罐、圜底杯、平底杯、高足杯等器形，多为红陶，素面无纹饰（图一〇）。两相比较不难发现，这两处墓地出土的陶器很明显不是一个考古学文化系统，故如甲木墓地中出土的一侧带流的平底杯、高足杯等均不见于皮央、东嘎墓地，两者的圜底罐形制差别也十分明显，所以很难将其放置在一个考古文化系列之内来加以排比。不过，这种一侧带流的平底器（主要是罐而不是杯）在新疆地区察吾乎沟口墓地中较为流行[39]，两者之间是否有一定关联可以进一步关注。但就目前仅有的材料来看，



图八　故如甲木出土青铜器

1. 盆（M1 ： 10） 2. 钵（M1 采： 2） 3. 壶（M1 ： 9） 4. 釜（M1 ： 12）

5、7. 碗（M1 采： 4、M1 采： 3） 6. 杯（M1 采：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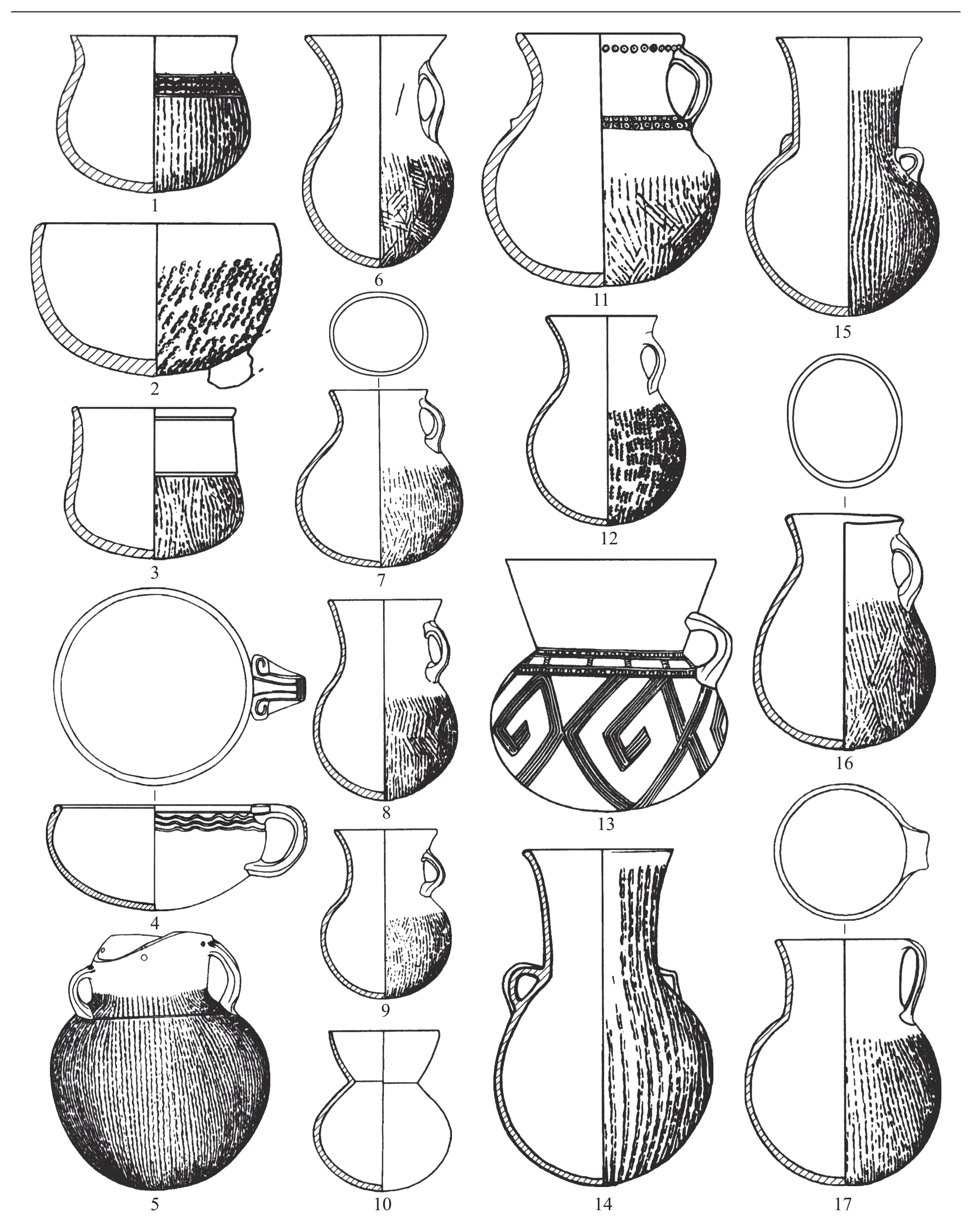
（采自《西藏阿里地区嘎尔县故如甲木墓地 2012 年发掘报告》）

还看不出西藏西部早期墓葬存在一个由早到晚较为明显的统一的发展序列，各个墓地之间陶器群之间彼此的相关度仍然较低，可能与不同的人群或者文化传统有关，还需要等待更多的出土材料才能观察得更为清楚。

三、区域性中心的形成与跨区域文化的互动

近年来西藏西部早期墓葬的不断发现，对于藏族古代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关西藏西部地区早期历史的文献记载，晚至唐代方开始出现，在《唐会要》《通典》《文献通考》和《册府元龟》等汉文献记载当中，将这一地区称之为“大羊同”“小羊同”，如《通典·边防六》“大羊同”条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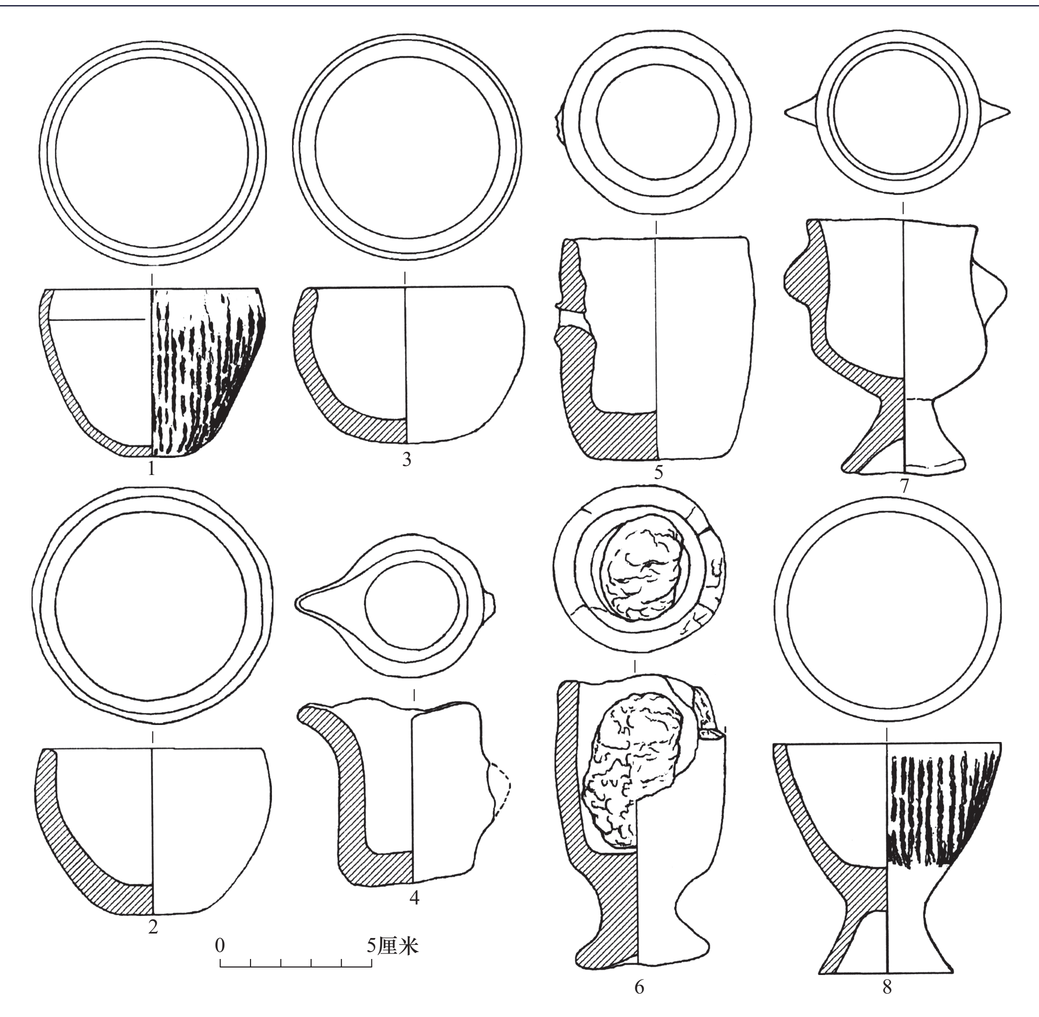
> 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人。其人辫发发毡裘，畜牧为业。地多风雪，冰厚丈余，所出物产，颇同蕃俗。无文字，但刻木结绳而已。刑法严峻。其酋豪死，抉去其脑，实以珠宝，剖



图九 皮央东嘎墓地出土陶器

1～3. 圜底钵（DVM1 ：1、PSM1 ：2、DVM1 ：2） 4. 单耳圜底钵（DVM1 ：3） 5、14、15. 双耳圜底罐（PSM1 ：3、PGM6 ：1、PGM5 ：1） 6～9、11、12、16、17. 单耳圜底罐（PGM3 ：6、PGM3 ：4、PGM9 ：2、PGM9 ：1、PGM3 ：5、PGM3 ：3、PGM3 ：1、PGM5 ：2） 10、13. 单耳折肩圜底罐（PGM3 ：2、PGM1 ：1）

（采自《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



图一〇　故如甲木墓地出土陶器

1～3. 圜底杯（M4 ： 1、M1 采： 27、M1 采： 28） 4、5. 平底杯（M1 采： 29、M1 采： 30） 6～8. 高足杯（M1 采： 31、M4 ： 2、M4 ： 3）

（采自《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 2012 年发掘报告》）

其五脏，易以黄金，假造金鼻银齿，以人为殉，卜以吉辰，藏诸岩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杀牦牛羊马，以充祭祀，葬毕服除。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国事。自古未通，大唐贞观十五年，遣使来朝。[40]

唐人的一些游记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记载。如唐代著名僧人道宣（596～667 年）所著《释迦方志》卷上 • 遗迹篇 • 第四记载“婆罗吸补罗（北印度）”的道路情形时，特别指出与之相邻近的西藏西部地区的情况：

国北大雪山有苏伐剌拏瞿呾罗国（言金氏也），出上黄金，东西地长，即东女国，非印度摄，又即名大羊同国，东接吐蕃，西接三波诃，北接于阗。其国世以女为王，夫亦为王，不知国政。男夫征伐种田而已[41]。

唐代史料当中所记载的羊同（女国），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也就是藏语中的象雄（Zhang zhung）。如张毅先生曾论述说："杨同，两《唐书》作羊同，即藏语中的象雄。……羊同在日喀则以西，直至阿里的广大区域内，人口也相当众多，它在吐蕃的十二小邦中名列第一。苯教古代传说中把吐谷浑、党项、苏毗、羊同列为内四族，孟族、突厥、吐蕃、汉族列为外四族。这说明吐蕃兴起之先羊同在古代西藏的重要性。羊同不仅人口众多，藏文有所谓'一切象雄部落'之称，又处于西藏西部的高峻地带，与后藏仅有玛法木湖一水之隔，对吐蕃有居高临下之势。吐蕃兴起向外扩张时，为了除去后顾之忧，首先就征服羊同"[42]。羊同被吐蕃征服之事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P.T.1228"大事记年"中有明确记载："此后三年，墀松赞赞普之世，灭李聂秀，将一切象雄部落均收于治下，列为编氓"[43]。

如上所述，汉藏文献记载都认为早在7世纪吐蕃王朝兴起之前，这个地区已经存在着古老的文明，其特点是以游牧为主、兼以农作，出现了早期的国家形态，并在唐贞观年间与中原唐王朝有过朝贡关系，其后才被强大起来的吐蕃王国所兼并。但是，长期以来，由于考古材料的缺乏，我们还无法更多的了解这个被称为"羊同"或"象雄"的部落集团早期的历史以及社会生活方面具体的情况。

从近年来西藏西部地区考古发现的早期墓葬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少考古现象可与文献记载进行参互比较。例如，从故如甲木墓地M1出土有带有"王侯"字样的汉地丝绸、黄金面具，随葬较多器物的情况来看，墓葬的死者很可能身份等级较高，与文献记载的当地"酋豪"地位相当，并且与中原王朝之间早在汉晋时期便已经通好往来。文献记载这些"酋豪"死后要采取特殊的丧葬仪式："抉去其脑，实以珠宝，剖其五脏，易以黄金，假造金鼻银齿，以人为殉"，这与墓葬出土的情况也十分相近。

在故如甲木墓地附近，考古发现了具有城堡性质的卡尔东遗址[44]，有学者认为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推测墓葬的主人应是卡尔东城址的修建者或者使用者"[45]。还可关注的是，在这处城址附近还发现了一处名为"泽蚌"的古墓地，墓地中建构有两座高大的积石冢，墓丘残存高度达到2～6米，最大边长达到62米，逐层向上收分，形如阶梯[46]。如此规模巨大的积石冢在西藏周边欧亚草原地带均有发现，其墓主人往往被认为是游牧部落的贵族和首领[47]，所以可以初步推定卡尔东遗址附近的这两座巨大的积石冢，也应是当地的"酋豪"的墓葬，代表着社会最高等级，处在社会结构当中"金字塔"的顶端。而被考古学者命名为"卡尔东"的这座城堡遗址，现代故如甲木寺院的僧人和当地群众都认为它就是后期藏文文献记载和口碑传说当中的"穹隆银城"，称其为"穹隆·俄卡尔（Khyung.lugn.dngul.Mkhar）"，或"穹隆·卡尔东（Khyung.lugn.Mkhar-bdong），并认为其在藏语中的含意即为"穹隆银城"[48]。近年来在对这座城堡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过程中，不仅在城堡内发现有石砌的房屋建筑遗址、祭坛、通向山下的暗道、石块与土砖混合砌成的城墙，还出土有石磨盘、石磨杵、铁三角、铁甲片、铁箭镞、羊矩骨等大量遗物[49]，可以初步断定其的确是当时西藏西部地

区一个重要的中心城堡。

处在这个社会结构中层和基层的民众，也形成与自身地位相适合的丧葬礼仪。从皮央、东嘎墓地、故如甲木墓地、曲踏墓地等几处相对地理位置较为接近的墓葬所反映出的文化面貌上看，可以观察到它们既有着本区内早期墓葬若干相似的共性，但也有明显的特性，很可能是由这个区域内不同的部落人群各自形成的墓地，等级有高有低，文化传统保持着不同的特点。

上述这些考古现象已经足以表现，最迟在公元 1 千纪前后，在这个区域内已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古老的文明中心，这个中心已经具有较为复杂的社会结构，来自各地的人群汇聚于中心之内，不仅带来和保持着自身的传统文化特点，而且也逐渐开始形成区域性的若干共同性的文明标志，积石冢、石丘墓、石室墓、黄金面具、箱式木棺、青铜器、丝绸和茶叶的远程贸易等各项因素的出现，显示出跨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那么，如果从文献与考古资料相互整合的结果来看，历史上与这个文明中心最相符合的古代族群，就只能非“象雄”（羊同）莫属了。当然，由于象雄是一个地域辽阔、族群成分极为复杂、历史传承十分久远的历史和民族的概念，目前的考古材料所能揭示出的仅仅是这座庞大冰山的一角，但其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却是不能低估的。

2015 年 3 月草于四川大学江安花园
2015 年 5 月定稿于香港城市大学

注　释

［1］霍巍．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J］．西藏研究，2005（8）．

［2］最近期的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材料及其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 2012 年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14（4）．

b．吕红亮．西喜马拉雅山地区早期墓葬研究［J］．考古学报，2015（1）．

c．仝涛，李林辉．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J］．考古，2015（2）．等文．

［3］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地区文物志［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132～133.

［4］资料尚未公布，但出土陶器见于甲央，王明星．宝藏［M］．北京：朝华出版社，2000：1.

［5］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189～231.

［6］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阿里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西藏札达县格布赛鲁墓地调查简报［J］．考古，2001（6）．

［7］同［2］a.

［8］资料尚未公布，有关发现情况可参见金书波．从象雄走来［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81～97.

[9] 教育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212.
[10] 同［9］：213.
[11] 资料尚未正式公布，有关信息来自发掘者张建林、吕红亮在札达县托林寺内所设的“札达文物陈列室”内，观察到这些箱式木棺的残片，参见吕红亮．西喜马拉雅山地区早期墓葬研究［J］，考古学报，2015（1）.
[12] 故如甲木墓地的发现系因一次偶发事件，最初打开M1的是墓葬附近的故如甲木寺院的僧人，后来才由考古工作者进行正式的发掘清理．有关情况可参见金书波．从象雄走来［M］.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81～97.
[13] 同［2］c.
[14] 同［2］a.
[15] 同［9］：259.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曲贡村石室墓发掘简报［J］. 考古，1991（10）.
[17] 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J］. 文物，1985（9）.
[18] 有关中亚地区早期铁器时代墓葬的资料可参见A.H. 丹尼等．中亚文明史［M］. 第一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1）：312～358.
[19] 同［2］a．附录王树芝．故如甲木墓地M1所出木材的鉴定和树轮分析：585～586.
[20] 典型的例子如前苏联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于1929年发掘的阿尔泰巴泽雷克古墓，五座巨大的石室墓都采用了大量圆木构筑墓室，参见〔苏〕A. Л. 蒙盖特. 苏联考古学［M］. 北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译，1963：138～139.
[2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125～127.
[22] 霍巍．古格故城壁葬为佛教瘗窟葬考．中国文物报［N］，1995-7-16.
[23] 霍巍．藏南吉隆崖葬习俗的调查与初步研究［J］. 南方民族考古，1990（3）.
[24] “西域”这一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本文所指的西域取其狭义，主要指我国玉门关以西甘肃、新疆一带，汉晋时期这一区域被中原中央王朝控制，汉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这一地区，并占据主导地位。
[25] 赵丰．纺织品考古新发现［M］. 香港：艺纱堂服饰出版社，2002．新疆文物局等．丝路考古珍品［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130.
[26] 这类汉式木棺在新疆汉晋时代墓葬中多有发现.
[27] a．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999年发掘简报［J］. 考古，2002（6）.
b．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民丰县大沙漠吉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J］. 文物，1960（6）.
c．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新疆山普拉［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28] 有关新疆南部与西藏西部地区远古以来交通路线与文化交流等问题，可参见霍巍．于阗与藏西：新出考古材料所见两地间的古代文化交流［J］. 藏学学刊，2007（3）.
[29] a．同［2］b.

b．同［2］c．
［30］安新英．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葬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J］．文物，1999（9）．
［3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 15 号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9（1）．
［32］〔俄〕鲁伯·列斯尼契科夫著，李琪译．阿斯塔那古代墓地［J］．西域研究，1995（1）．
［33］同［2］c．
［34］a．王澎．复面、眼罩及其他［J］．文物，1962（7、8）．
b．武伯纶．唐代的覆面和胡部新声．文物［J］，1961（6）．
［35］同［9］：218～219.
［36］同［2］b.
［37］Christoph BauMer.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M］．London：I.B.Tauris,2012：222.
［38］同［2］b.
［39］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乎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40］（唐）杜佑．通典·边防六［M］．北京：中华书局，1998：5177～5178.
［41］（唐）道宣著．范祥雍点校．释迦方志·遗迹篇［M］．北京：中华书局，2000：37.
［42］（唐）慧超著．张毅笺注．往五天竺国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66.
［43］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145.
［44］霍巍．西藏西部象泉河流域穹隆遗址的考古调查［C］．西部西藏的文化历史——来自中国藏学研究机构和维也纳大学的最新研究［A］．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
［45］同［2］a．
［46］同［44］．
［47］林梅村．阿尔泰山和天山的大石冢［J］．欧亚学刊，北京：中华书局，2002（3）：101～115.
［48］为笔者提供这一看法的主要为现古鲁甲寺本教住持格龙丹增旺扎．
［49］同［44］，图 11，．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arly Tombs of Western Tibet and the Surrounding Cultures

Huo Wei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a series of discoveries have promoted the growth of archeological work in western Tibet. Several phenomena indicates that western Tibet’s “Earlier Buddhism Period Archaeology” already has obvious regional features, and also ha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surrounding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Discoveries of archaeology show that after the tenth century, this region has become a regional center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This center already has a more complex social structure, people from different areas converged here, not only brought and Maintained themselves’ tradit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began

to form a regional common signs of civilization. Stone tombs, golden masks, box-type oak coffin, bronze ware, silk and tea trade are indicators of this. These indicators have shown the cross-regional exchange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chaeology materials, the Zhangzhung(Yangtong) ethnicity is the most likely candidate which facilitated this cultural exchange.

Key words: Tibet Archaeology; Prehistory Culture; Zhangzhung Civilization; Cultural Exchange

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研究

刘　潼[1]　温科学[2]

（1. 锦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锦州，121001；2. 辽宁省博物馆，沈阳，110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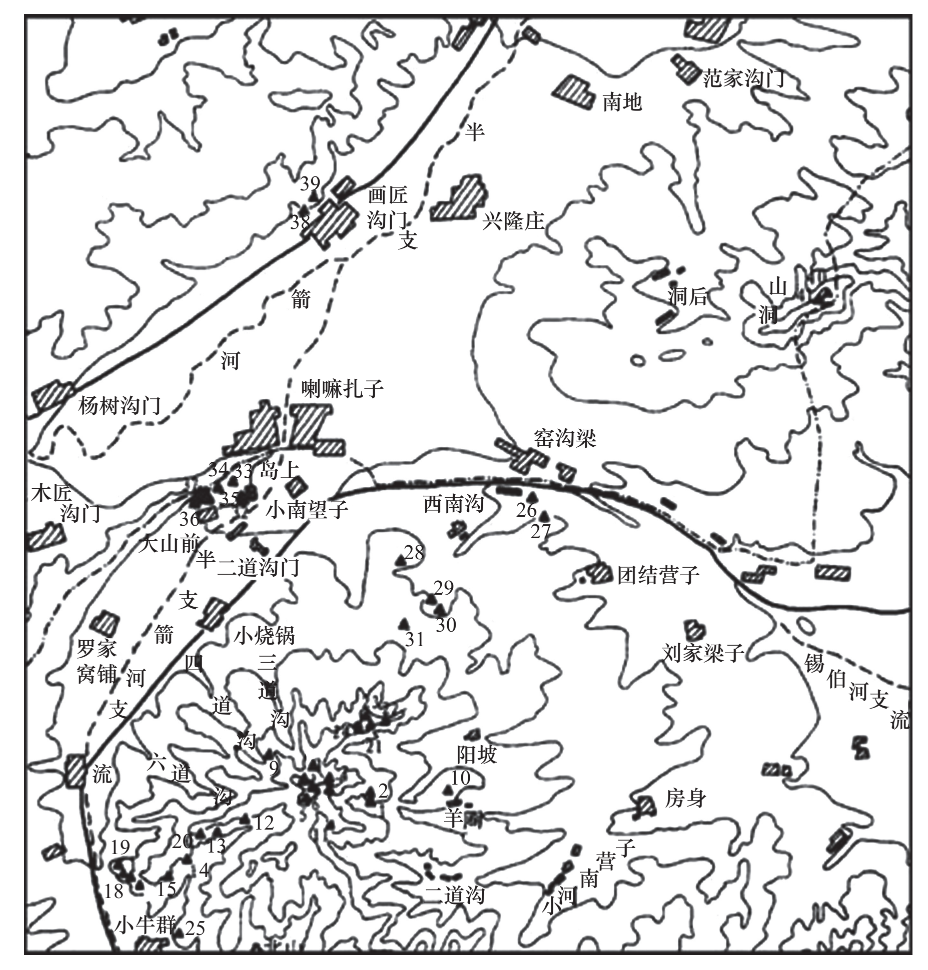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辽河地区一系列考古发掘的展开，专家们提出了“西辽河地区是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的观点，并且相应地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也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西辽河地区的复杂社会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但是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却骤然衰落。经历后红山时代的缓慢发展，西辽河地区又迎来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繁荣。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聚落规模更加庞大，居住形态日益多样，特别是出现了石城这样特殊的建筑形态，成为探索西辽河地区早期国家起源的关键。本文从大山前的一个家户研究开始，继而扩展到夏家店下层几处已发掘的遗址，将重点关注聚落的空间布局与社会关系。

一、青铜时代早期家户的活动

（一）大山前的一个家户

赤峰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是一处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主的大型聚落，1996～1998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1]。该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永丰乡大山前村，半支箭河与锡伯河之间的朝南坡岗上。半支箭河中游一带（包括赤峰市松山区城子乡以及喀喇沁旗永丰乡、牛营子镇等）目前发现遗址41处，其中有38处是夏家店下层或者以夏家店下层为主的遗址，绝大多数遗址在半支箭河南岸（图一）[2]。

大山前遗址共发掘有6个地点，编号为KD1～KD6，前5个地点主要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存。为了全面了解该遗址的详细情况，1996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遗址的第1地点（KD1），并对第2地点（KD2）和第4地点进行了试掘和清理。这次发掘时，在遗址中部设一基点，由此点向遗址北端引出一条第1、4象限的分界线，沿此线在第4象限区内布两排5×5米的探方，后来在这一发掘区的北段向东、西两侧各增布了一排探方，再加上扩方的部分，总计发掘面积为782平方米（图二）。这里分析的主要资料都来自这个区域（KD1）。



图一　半支箭河中游遗址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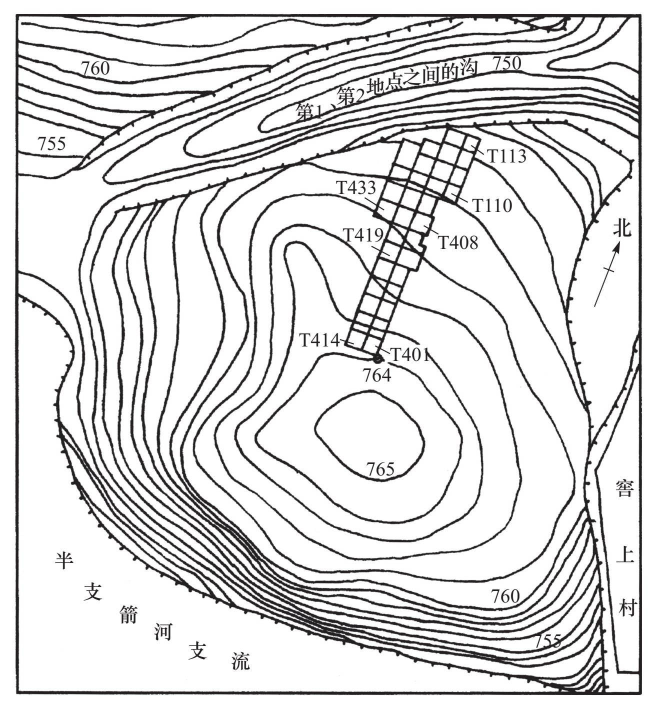
KD1 青铜时代早期文化层中，层层叠压，堆积很厚。这很有可能是在长时间内不断地在旧屋基础上加盖新屋的结果，表明大山前遗址有一个很长的稳定居住期。这种现象并非孤立，在已发掘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屡见不鲜，如辽宁建平喀喇沁河东遗址[3]、北票丰下遗址[4]等。

KD1 是一处不规则的圆台，东、南、西三面濒临河床，北面与 KD2 被一道探沟隔开。发掘者认为，这道深沟是最初在营建 KD1 时留下的人工遗迹[5]。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有意识地将 KD1 隔离开，使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

大山前 KD1 除了发现大量房基外，还发现有灰坑、残墙、圆台外围土墙等遗迹，陶、石、骨、蚌、铜等人工制品，以及人骨和大量动物骨骼。

1. 房址

大山前遗址 KD1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房址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两种。房屋一般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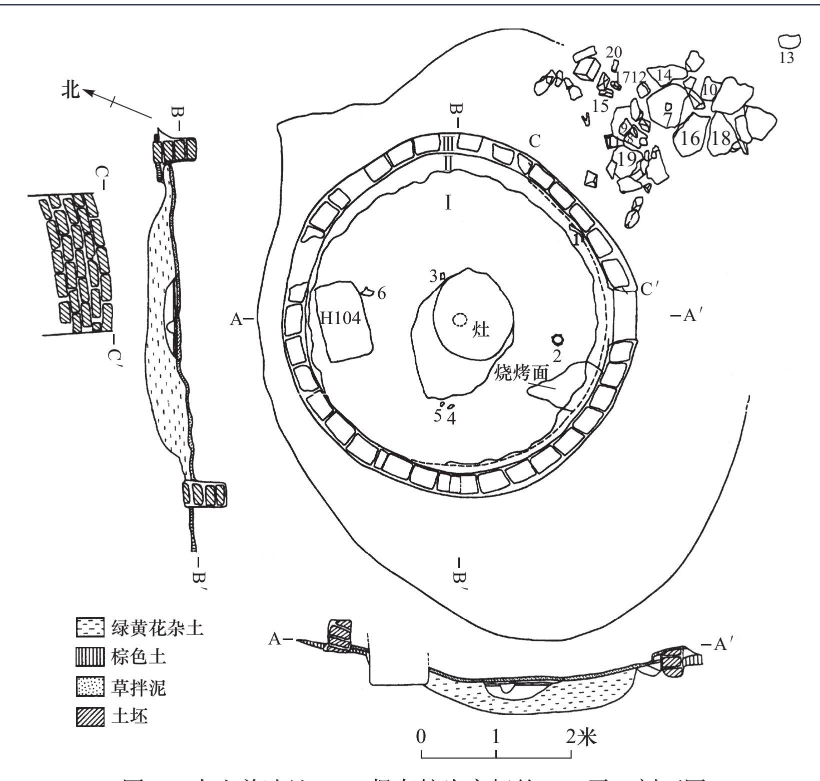
图二　大山前遗址 KD1 位置图

为圆形，方形较少。居住面都经过特殊加工，多数地面都铺有草拌泥面，方形房屋的居住面还要再加抹一层白灰面。墙壁为夯筑或用土坯、石块垒砌。石块垒砌的石墙分单层和双层两种，有的石墙和土坯墙之间还有一定距离，形成近似院落式的空间。每间房屋至少有一个灶，多数灶位于房址的中部，为略呈圆形的坚硬烧烤面，在烧烤面的最下面往往还开有一个圆形小凹坑，可能是为了保存火种（图三）。

民族考古学的研究表明：一处有一个用于炊煮的灶、一套家居用品和工具的单间或是双间房屋内，很可能居住一个核心家庭[6]。因此，大山前遗址 KD1 夏家店下层文化有灶的房屋中，最有可能居住一个核心家庭。而夏家店下层诸遗址中有很多连间房屋或者共处于同一院落内的一组房屋，则可能是居住着多个有亲属关系的核心家庭，形成一个扩大家庭（extended family）。扩大家庭应该是当时的基本经济单位。

2. 灰坑

大山前遗址 KD1 发现众多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灰坑，其中包含不少陶片和动物骨骼。有的灰坑发现有少量粟等炭化谷物，表明这些坑原来是用作粮食贮藏的窖穴。H1 和 H206 中，发现有人骨，表明有些灰坑被用来埋葬死者。在 H445 的坑底北部，有两个直径 17～20、深 7～10 厘米的圆形浅窝，二者相距 90 厘米左右，这里很可能曾经并列放置过两件形体较大的瓮、罐类器物，应与祭祀等仪式活动相关。一些灰坑的动物骨骼明显偏多，可能是与仪式性宴饮有关。



图三　大山前遗址 KD1 保存较为完好的 F28 平、剖面图

Ⅰ. 第一层面　Ⅱ. 第二层面　Ⅲ. 第三层面　1. 兽角　2～4. 陶片　5、6. 石块　7～20. 经打磨的石块

3. 土墙

大山前遗址 KD1 圆台外围的土墙是这次发掘中获得的一处重要遗迹，分布在 T111～T113、T411～T413、T423～T425、T434～T436 这 12 个探方之内，其走向是西南——东北方向。墙底宽约 10 米，现存高度不足 2 米。墙壁内外两侧均为斜坡，内壁坡度较缓，外壁与 KD1、KD2 间的那道探沟的南壁连成一体。从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片分析，土墙很可能是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居民们在 KD1 营建的较早的一项建筑之一。

4. 遗物

大山前遗址 KD1 夏家店下层文化层出土的人工制品主要包括陶、石、骨、蚌、铜五类，以陶器最多。

陶器以灰陶为主，有罐、鼎、尊、壶、鬲、甗、钵、盘、豆、盖、瓮、盆等器物。多数陶器的器身以泥条盘筑成型。造型较为复杂的器物，则往往是先做好各个部件，再粘接成型。瓮、罐等器物成型后，还会在轮盘上对口沿和上腹进行旋刮修整。除素面陶外，最常见的装饰纹样是绳纹、篮纹和附加堆纹，有的筒形鬲、尊、豆等泥质陶器表面

会施一层黑或者黄色的陶衣，此外还有不少的彩绘陶。

石器种类有磬、钺、铲、斧、刀、锛、凿等，以磨制石铲最多，约占石制品总数的1/3多。石器的原材料很多，有玄武岩、安山岩、英安岩、石灰岩、大理岩、凝灰岩、凝灰质板岩和板岩等，这说明当时人们除对几种常用石料的岩性较为熟悉之外，对其他岩石的性能还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在取材上仍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与试探性。上述石器多数与农业生产有关，各类工具在形制上已经高度的定型化，说明当时石器加工的专业化程度已经很高。

5. 动物骨骼

大山前遗址KD1夏家店下层文化层出土的动物骨骼，经鉴定有猪、狗、羊（山羊和绵羊）、牛（野牛、家牛、水牛）、马、熊、狼、獾、马鹿、斑鹿、狍、麃、刺猬、麝鼹、草原鼢鼠、小家鼠、蒙古黄鼠、兔、禽类等。其中，最为常见的是猪、牛、羊、狗四类，而熊、狼等大型食肉动物的骨骼则十分少见。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DNA实验室对该地点出土的2103块标本作了细致的分析，其中猪骨所占的比例最大，达到47.65%。其次是牛、羊、狗，分别占到了24.44%、15.50%和10.94%。这些动物骨骼中，除个别个体的牛骨（或角）尚具有野生性状外，绝大多数动物骨骼都已具有明显的家养动物的特征。此外，该地点还出土有18块马骨（其中多为马牙，少数为马的掌骨、趾骨等），其中3件马牙和1件趾骨的线粒体DNA分析显示，他们与现代马有着亲缘关系，但是这4例样品却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谱系，它们有着不同的母系来源[7]。应当说，大山前遗址KD1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已存在出现家马的可能性。

在KDI出土的可鉴定的动物骨骼中，明确属于野生动物的骨骼仅有狍6例、马鹿4例、麃3例，加上少数的野牛骨，合计所占比例不超过1%。这表明当时的居民很少以捕猎取食了。

（二）大山前遗址反映的问题

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的发掘，不仅全面收集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地层及遗迹单位中出土的生产工具及其残片，细致观察和记录了灰坑中遗留的工具痕迹，而且系统采集了动物骨骼、粮食颗粒和木炭碎块，还在两个地点割取了孢粉土样。这些考古资料为我们了解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家户生计经济和社会活动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1. 环境和生态

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处时代变得比红山文化时期干冷得多，但自然地层和考古地层的孢粉分析，说明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气候条件仍然相对优越。在距今4000年前，西

拉木伦河中上游南岸的气候温暖湿润[8]。3600 年前后，老哈河上游的气候温和[9]。

大山前遗址夏家店下层的植物遗存表明，当时的植被属于以针叶树为主的针阔混交林草原植被，水资源十分丰富，植被比现在要茂盛，反映的气候环境较现在温和湿润。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和宁城南山根遗址也能反映这一情况[10]。柳树树种及部分湿生、水生植物的存在，显示聚落遗址附近的河流（现为时令河）当时应有充沛的水量。而粟属植物属于喜暖类型的植物，它的存在表明当时的气候应较今温暖。

大山前遗址夏家店下层的动物遗存表明，当时为草原和森林混合景观，水资源丰富，植被茂密。水牛等生活在水边的动物表明，遗址附近有湖泊、湿地和河流。麂主要生活在热带、亚热带的密林、草丛、丘陵以及森林边缘的农田地带。羊、马、兔表明当时存在草地。狼、熊等可能是在附近森林中捕获的。

2. 生计和食物

夏家店下层文化居民从事混合的生存经济：粟 / 黍作农业、动物饲养、狩猎和采集并举。几乎所有经过发掘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都出土有大量的动物骨骼，以及炭化谷物和众多的农业生产工具，可以说大山前的生存经济是以农业为主的。

如前所述，大山前遗址夏家店下层的动物遗存显示，养猪在整个动物饲养活动中日益占据着支配的地位。此外，敖汉旗大甸子墓葬中多殉牲猪和狗，也佐证了猪在家畜饲养中的重要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猪是与人争食的动物，所以，猪的饲养规模是以农业的发展水平为基础的。猪、牛、羊所占比例合计高达 87.59%，说明家畜饲养业已成为当时居民肉食品的主要来源，在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大山前遗址夏家店下层的动物构成看，野生动物特别是大型食肉动物的比例偏低，合计不到 1%。并且，大山前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出土的上千件工具中，可用于狩猎的仅有骨镞 34 件、石镞（或镞形石片）10 件、陶弹丸 5 件、石弹丸 1 件。结合其他遗址所见的类似现象，很可能狩猎活动在夏家店下层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已不再占有支配的地位。

大山前遗址夏家店下层中马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已发掘的建平水泉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 H104 中曾出土过一枚被火烧过的马的牙齿，有学者认为其“原始结构颇为明显，似为野马可能性大”[11]。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否已经出现家养的马这一问题，还有待今后材料的进一步丰富。但不管怎样，作为典型草原动物的马的数量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逐渐增多，说明当时可能出现了畜牧经济的萌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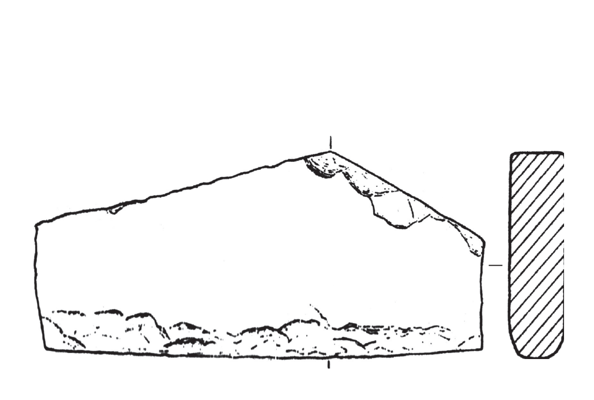
出土的动物骨骼反映出，这一时期虽然居址附近仍然有大片森林分布，但是可以用来狩猎的野生动物资源已经远远不及红山文化时期，也比不上兴隆洼文化时期。由此可见，即使是经过了近 700 年的环境好转，依然无法恢复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红山文化时期的状况，可见红山文化的农业活动、人口增加、气候变化的耦合作用的强度之大和后果

之严重。若不是人类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和生态环境的长期恢复，以及相对温和的气候条件，无论如何也不会促使夏家店下层文化农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加。如上所述，夏家店下层家户的生计是以定居的农业为主，兼营狩猎采集活动，偶尔也可能会在一定范围内从事放牧，是综合了农、牧、猎的三元生计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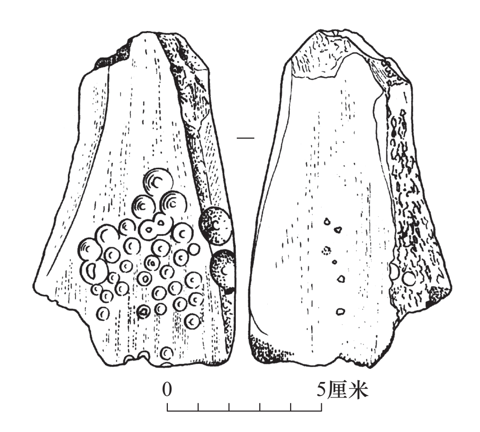
3. 仪式用具：石磬、卜骨和龟形器物等

大山前遗址夏家店下层的 H149 出土多件石磬，其中完整器 1 件，其余为残磬。完整的这件石磬（图四）为灰色五边形，主要部位都经过打磨，底边两侧留有打制的痕迹。这件石磬发现于灰坑之内，当为礼器，是用于某种仪式的器具。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了为数不少的石磬，仅喀喇沁旗就出土了石磬 8 件[12]。从出土的这些石磬看，夏家店下层石磬的制作工艺精湛，技术娴熟，可能是个别家户所特有，象征着某种特权，具备了仪式用具的特点。

大山前遗址夏家店下层还发现了一些卜骨，均有钻，有的有灼痕。KD1 的 H145 就出土了一件动物肩胛骨打磨制成的卜骨（图五），有肩胛岗的一面留有钻孔 37 个，钻孔孔径为 0.3～1.3 厘米。钻多为圆锥状凹坑，并且从另一面可看出几道极细的烧痕。新石器时代开始很多地方都曾经出土有卜骨，从各地卜骨上相似的痕迹看，不同时期遗址的占卜过程可能使用了相似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在肩胛骨较薄处灼烧以使卜骨表面出现裂痕纹，然后根据痕纹占卜。



图四　大山前遗址 KD1 出土的一件完整石磬（96KD1H149 ： 2）



图五　大山前遗址KD1出土的一件卜骨（96KD1H145②：1）

夏家店下层文化曾出土了一件玉龟形器[13]，从出土的数量和位置看应当为仪式用具。龟作为仪式用具，这在西辽河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中就有出现[14]。龟主要栖息在亚热带和热带地区的动物。西辽河地区核心地带并没有出土乌龟的报道，这一现象表明西辽河地区核心地带的气候条件不适合习惯亚热带和热带

气候的乌龟生存。因此，夏家店下层家户遗址的乌龟形象很可能是长距离仪式用品交换贸易的结果。民族考古学资料显示，龟崇拜在环太平洋地区广为流行[15]。主导这类祭祀用品交换的人，应该是仪式的主持者——巫师。

4. 仪式活动：人牲

大山前遗址共出土有 6 具人骨，其中有 4 具人骨发现在灰坑中。灰坑中这 4 具人骨，有 2 个成年人、1 个儿童和 1 个婴儿。其中 2 个成年人仰身直肢葬，但两臂伸展贴于身侧，可能被捆绑后埋葬的。而小孩的尸体被肢解后埋葬，他的许多骨头被捆绑在一起。小孩上方的灰坑中为一婴儿。此外，在 KD1 和 KD4 的 3 个灰坑中有零星人骨发现，在 T430～T431 间的探沟内还发现一儿童的颚骨。

上述这种非正常埋葬行为，说明了人牲可能已经存在。如果这些人骨真是人牲的话，那么他们的社会地位是怎样呢？是大山前社会集团的下层人士，还是来自其他社会集团的战俘？如果是前者，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等级分化；如果是后者，则反映了社会集团冲突的加剧。但不论哪种情况，人牲都表明一组人群对另一组人群的强权。因为只有少数家庭使用人牲，很可能是同一社会集团中的不同家庭之间存在着不平等。

5. 仪式性宴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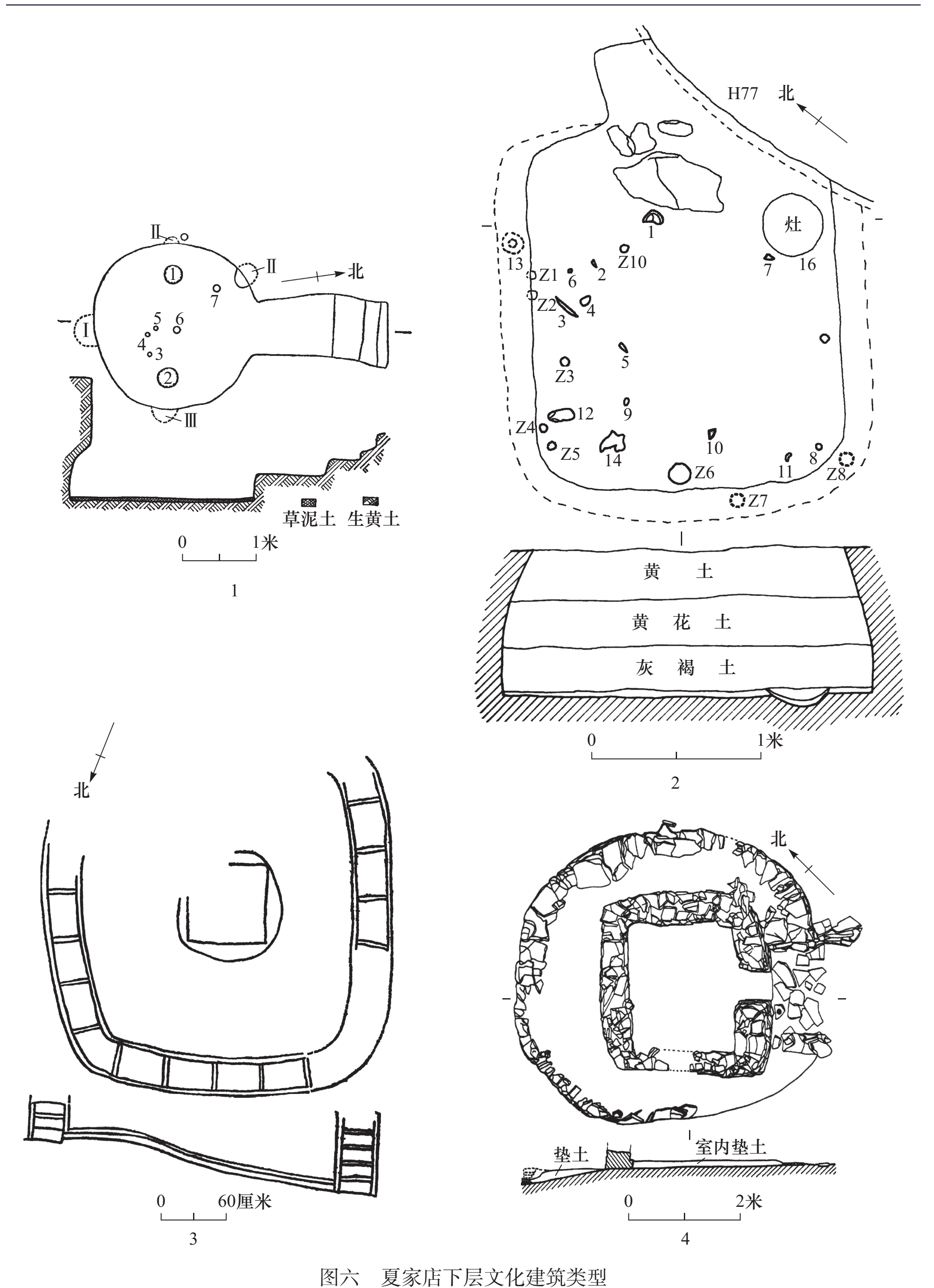
KD1 中出土的动物骨骼特别多，但在堆积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显然，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处的自然资源丰富，为某些家庭创造并积累了剩余产品，这为仪式性宴饮的举行提供了物质保障。宴饮是一种建立和维持互惠关系的社会机制，为个人之间、家庭之间乃至社会组织之间的不平等发展和有政治性质的竞争提供了机会。在社会生活中，能够组织、提供大型宴饮及所需物质资源的家庭容易获得更高的政治以及宗教威望，因而经常举办大型宴饮的家庭逐渐成为社会上层。大山前遗址出土熊、狼以及卜骨、龟形器的家户就应该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是聚落的上层。

二、青铜时代早期聚落的空间布局与社会关系

青铜时代早期出现了更多的建筑形式，尤其是夏家店下层晚期，聚落结构上的一些主要变化也开始出现。这些表现在三个现象：复合式的房屋组合、环墙聚落系统和大型聚落。

（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建筑形式

青铜时代早期，西辽河地区的建筑形式呈现出多样性的局面。半地穴式建筑依然是西辽河地区最主要的建筑形式，一些新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材料（如石城）也开始广泛出现。夏家店下层文化房屋形式包括：地穴式、半地穴式、地面式和台基建筑（图六）[16]。



图六 夏家店下层文化建筑类型

1. 四分地东山咀遗址 F2 2. 上机房营子遗址 F9 3. 建平水泉遗址 F25 4. 康家屯遗址 F23

1. 地穴式建筑

地穴式建筑有圆形和方形两种，面积为 5～15 平方米，有的房屋穴壁深近 2 米。居住面和墙壁多为原生黄土，抹草拌泥现象极为少见。屋内墙壁下部挖有壁龛，壁龛被烟熏黑，可能有生火烘干、照明或取暖作用。房屋中心或墙角处设灶坑，房址周边的地面设有排水沟。如四分地东山咀遗址 F2[17]，平面呈圆形，直径 2.2 米，壁高 1.8 米，门道长 1.6 米，宽 0.7～0.9 米，有四级台阶，墙壁四面各有一个壁龛。东山咀遗址属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所以推测这种地穴式建筑可能是该文化早期的一种形式。

2. 半地穴式建筑

半地穴式建筑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最为普遍的一种房址形式。房屋平面以圆形为主，方形并不多见。居住面一般铺草拌泥面，也有铺黄土或抹白灰的。灶坑位于房屋的中心，四周有柱洞。门一般开在南部，有内宽外窄的门道，有的房屋还设有门槛。半地穴式基址之上砌土坯墙，有的土坯墙外筑石墙，石墙有单层和双层之别，石墙与土坯墙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形成近似“院落式”的空间。石墙外多有延续的铺石面等附属建筑，房屋旁边有储藏物品的窖穴。如上机房营子遗址 F9[18]，其口小底大，口长 2.06 米（不含门道），宽 1.86 米，底长 2.2 米，宽 2.18 米，深 0.84 米。门位于东侧，门道长 0.42 米。居住面经火烤，厚度为 3～6 厘米。墙壁除西南经烧烤外，其余均抹泥，壁厚 1～2 厘米。圆形灶台位于房屋东南角，共发现 10 个柱洞。

3. 地面式建筑

地面式建筑是以土坯、石块或夯土直接从地面砌墙起建的房屋。墙壁抹有草拌泥，居住面一般先抹草拌泥，再抹白灰。辽宁建平水泉遗址 F25[19] 为地面式建筑，房址平面呈圆角方形。室内东西宽 2.46 米，南部被另一房屋打破，现存长度 2.5 米。墙面以土坯砌筑，土坯规格一致，长 0.4 米，宽 0.8 米，厚 0.12 米。墙内外均抹一层厚 3 厘米的草拌泥，居住面上亦先抹一层厚 5 厘米的草拌泥，上面再抹 3 厘米的白灰面。居住址中央有直径 0.96 米的椭圆形红烧土硬面，在其中部划有边长为 0.74 米的方形框线。在水泉遗址群中发现多层居住面打破、叠压现象，反映了当时定居生活程度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4. 台基式建筑

台基式建筑是在圆形或方形台基上砌建房址，这是 1998 年在北票康家屯首次发现的，共发掘房址 19 座[20]。城址中发现若干道石墙，这宽窄不一、形状不同的道道石墙，似将城内分割成若干院落，在每个院落中都建有一个较大型的圆形台基式房址和若干中、小型房址。大型房址台基直径一般约为 10 米，中型约为 7 米，小型约为 4 米。房址分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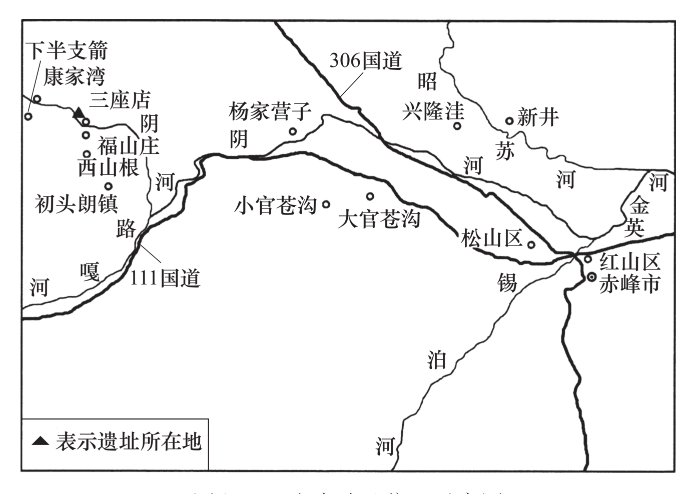
形和方形两种，一般早期房址为圆形，晚期房址为方形。早期房址建筑一般为石筑大边缘台基式房址，墙为黑泥土或石骨黑泥土墙再以黄泥挂面，居住面以较厚的杂土铺垫而成，灶位于室内中部；晚期房址一般为石筑小边缘或无边缘方形台基式房址，墙用细腻黑泥土或石板砌筑，墙面抹黄泥，居住面铺厚厚的黄土，灶位于室内一侧。康家屯城址“院”中建房的形式，与敖汉旗城子山城址外城内“方院”中的石砌房址颇为相似。

（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聚落结构

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的环壕聚落逐渐演变为“城墙 + 壕沟”的建筑形式，并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普遍流行于西辽河地区。夏家店下层时期聚落大多数为小型村落，有一些有城墙环护的中心聚落和少量有城的大型聚落。许多大、中型聚落在其所在地区占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地位。下面，将对其中发表资料相对丰富的几处遗址进行讨论，他们是赤峰市三座店遗址、北漂市康家屯遗址、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和敖汉旗城子山遗址。

1. 三座店遗址

三座店遗址[21]（图七）位于阴河左岸的洞子山顶部及南坡，西侧是临河断崖，北侧与阴河东岸的山冈相连，南侧和东侧为沟谷冲积形成的平川。该遗址由大小两座石城组成，大城在西，小城在东。大城方形，面积约 10000 多平方米，城西为陡崖，南面是陡坡，东、北面有石砌的城墙和马面。小城也是方形，面积约 1600 平方米，东、南、北三面都有石砌的城墙和马面，西面仅有一道列石作为大、小城之间的界限。2005 年 6 月至 2006 年 11 月，考古学家们对该遗址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发掘，揭露面积 9000 平方米，包括大城的大部分和小城的全部（图八）。这次发掘共发现房址 65 座、灰坑 49 个以及规模巨大的城墙和马面等遗迹，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卜骨和带有刻划符号的陶片、岩画等重要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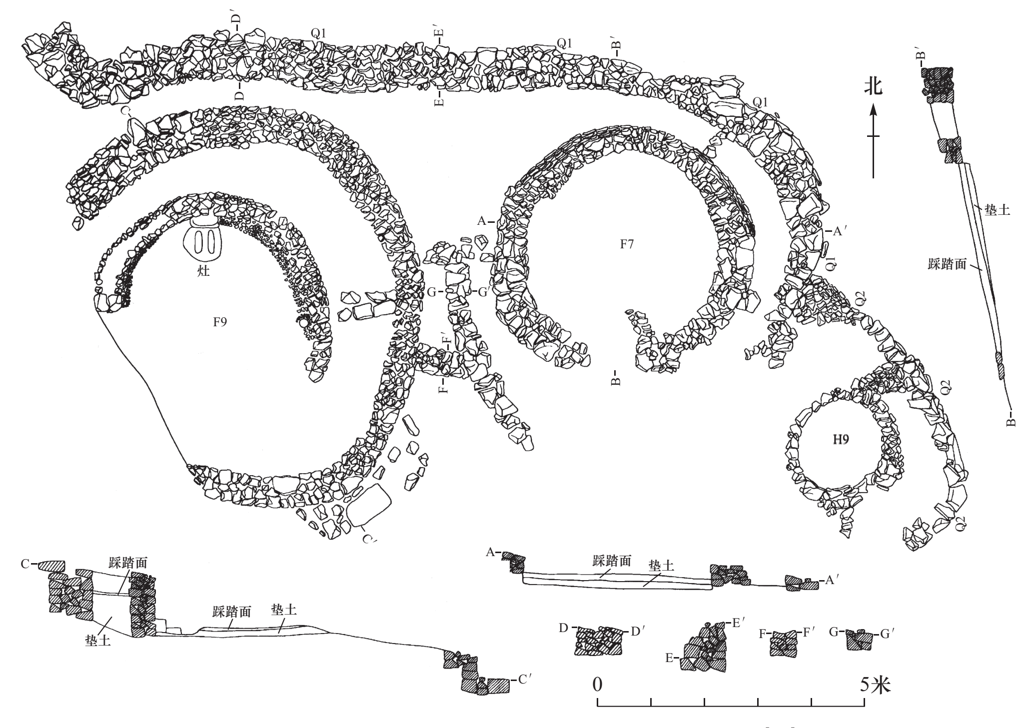


图七　三座店遗址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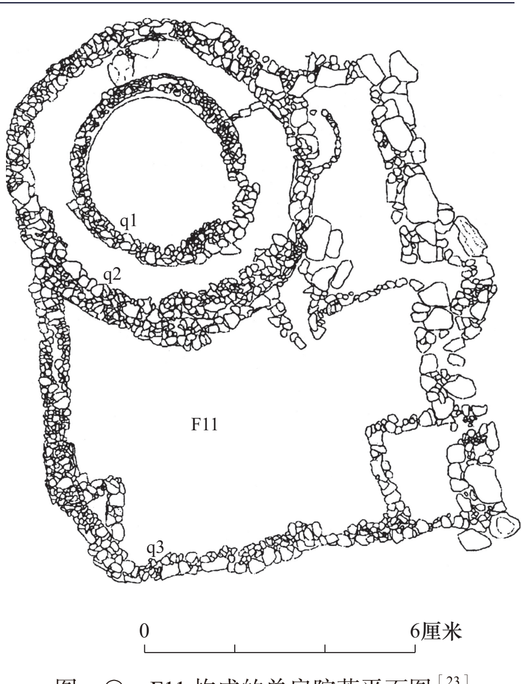
图八　三座店遗址航拍图

在大城内发现若干条不同走向的石墙，它们把众多房址和灰坑（含窖穴）划分 20 余处相对独立的建筑单元——院落。院落之间多有一道共用的院墙，呈阶梯状分布。根据院落内房屋的数量可分为双房院落（图九）和单房院落（图一〇），其中以双房院落



图九　F7、F9、H9 构成的双房院落平、剖面图[22]

最多且具有典型性。小城内多为空地，现存建筑基址 5 处，可能为单圈或双圈的石砌建筑与灰坑（含窖穴）。



图一〇　F11 构成的单房院落平面图[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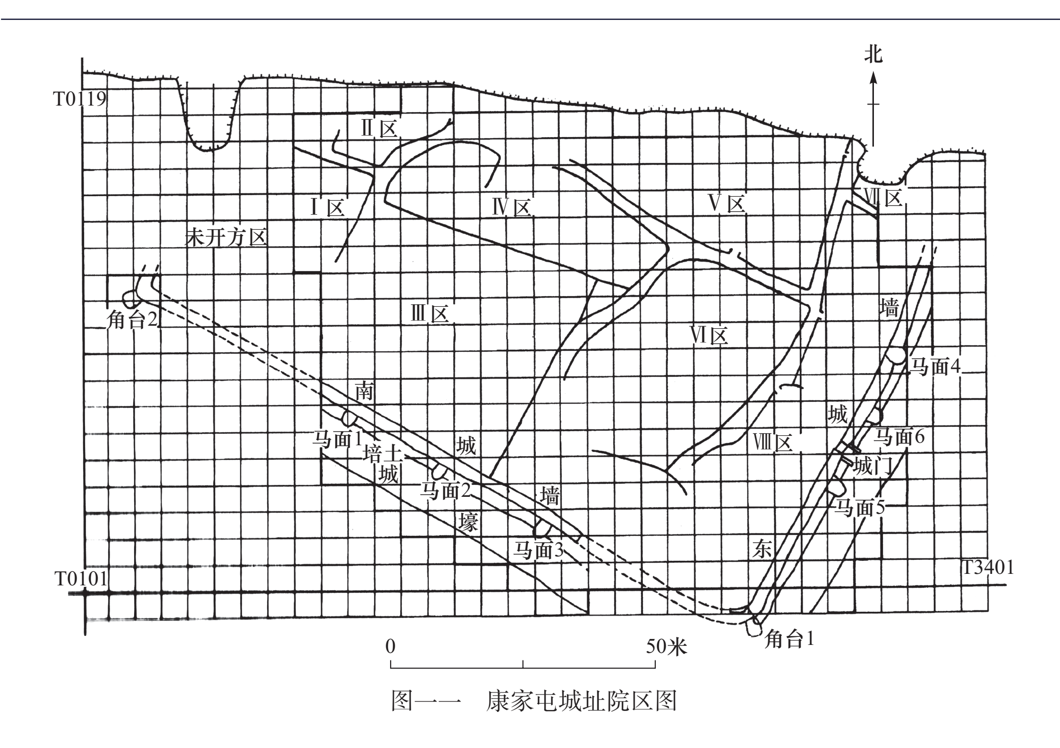
三座店大城和小城在城墙、马面和城内布局上都有一定区别。大城的城墙为石头包砌，内填黄土；而小城砌墙的石块仅一层，且较矮。大城马面一般是多层的，而小城马面则是单层的，并且体积比大城的小得多。城内布局上，大城内有院落、道路，城墙高大而复杂，防御设施完备；小城内建筑物较少，且多无院墙。这说明小城是大城的附属建筑。三座店石城聚落在布局上具有房屋、院落、城池、整个聚落四个层次，院落包含有一座或者两座房屋，是基本的生活单位，从房屋面积和内部关系来看，比较符合一个核心家庭或者一个扩大家庭。而由“院落—城池—整个聚落”构成的三个层次看，三座店聚落可能已经形成了三级社会组织。

2. 康家屯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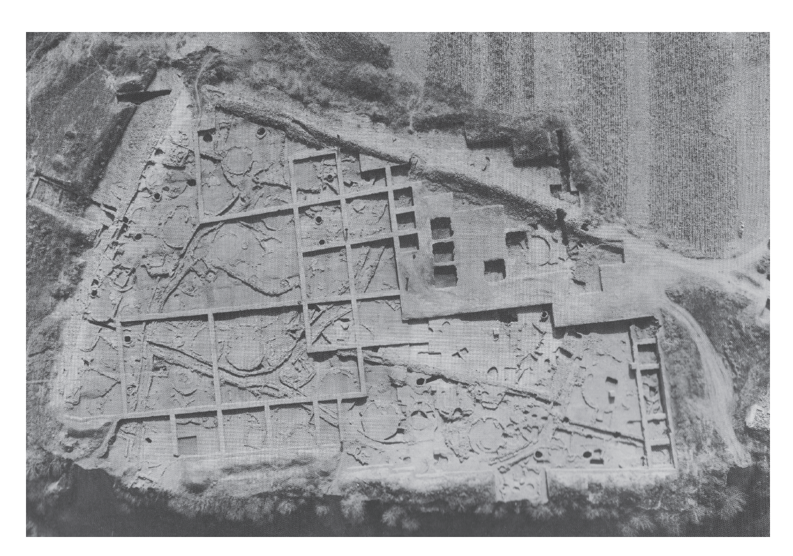
康家屯城址[24]位于大凌河和牤牛河的交汇处，大凌河南岸的一块台地上。遗址保存不完整，现存面积约为 15000 平方米。1997～2001 年进行了连续发掘，发现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地层共 6 层。整个城址（图一一）略呈方形，东、南面墙体外侧均有 3 个马面，东南和西南角各有一个角台，城外有环壕围绕。

康家屯石城的建筑形式十分复杂、生活设施非常完备（图一二）：整个城址以石墙分隔成若干院区；院区的墙与墙之间有相互连通的道路，道路设计十分合理，靠墙的一侧为石板路，另一侧是排水的小沟，院区石墙上还设有水洞，雨水可以沿水洞流出墙外、排入水沟；院区内有房屋、门、石筑穴、石仓、石台、灰坑、石槽等遗迹，院区内的房屋之间也有隔墙围合成不同的院落。

康家屯遗址明显经过良好的规划，建筑风格统一。但是这样一个复杂的聚落却并没有发现一处陶器作坊或者陶窑址，这说明在康家屯城址的周围可能有一个与之进行交换的制陶聚落存在。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康家屯聚落的手工业专业化程度，但是如果这种远距离交换存在的假设成立，那么康家屯的手工业专业化也可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图一一　康家屯城址院区图



图一二　康家屯城址全景图

已发掘的房址有 49 座，石块和土坯砌筑均有，有圆形和方形两类。发掘者认为圆形房屋的年代可能早于方型房屋[25]。根据面积大小可分为大、中、小型三类，大型房屋直径 5～6.5 米，中型房屋直径 3.5 米，小型房屋直径 2.5 米。最大房屋的面积在 30 平方米左右，可居住 2～4 人，据此推算，一个院落可以生活 2～8 人，一个院区就可以生活 50 人左右。他们共用一套防御和生活设施，关系应该十分密切，很可能对应一个

同血缘的社群。前面曾经讨论过，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村落里，同一亲属集团中总会有个别人士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随葬品较其他社会成员也要豪华。如果康家屯遗址的一个院区对应一个亲属集团，那么整个石城应该居住着8个以上这样的亲属集团，这些亲属集团间必然存在着一个首领，才能完整其聚落整体规划布局以及进行城墙修筑等大型工程。而这位首领可能通过宴饮、组织手工业生产和组织远距离的交换来展开权利和威望的竞争。

康家屯城址盛行隔离居住的现象说明，不同亲属集团之间存在着派系的竞争（factional competition）。派系（faction）可以定义为功能相似的竞争资源、权利和威望的集团。同一社会内部竞争派系的形成与不同社会间派系首领联盟的发展，总是同时性的。具有上述特征的康家屯石城，已经达到了相当复杂化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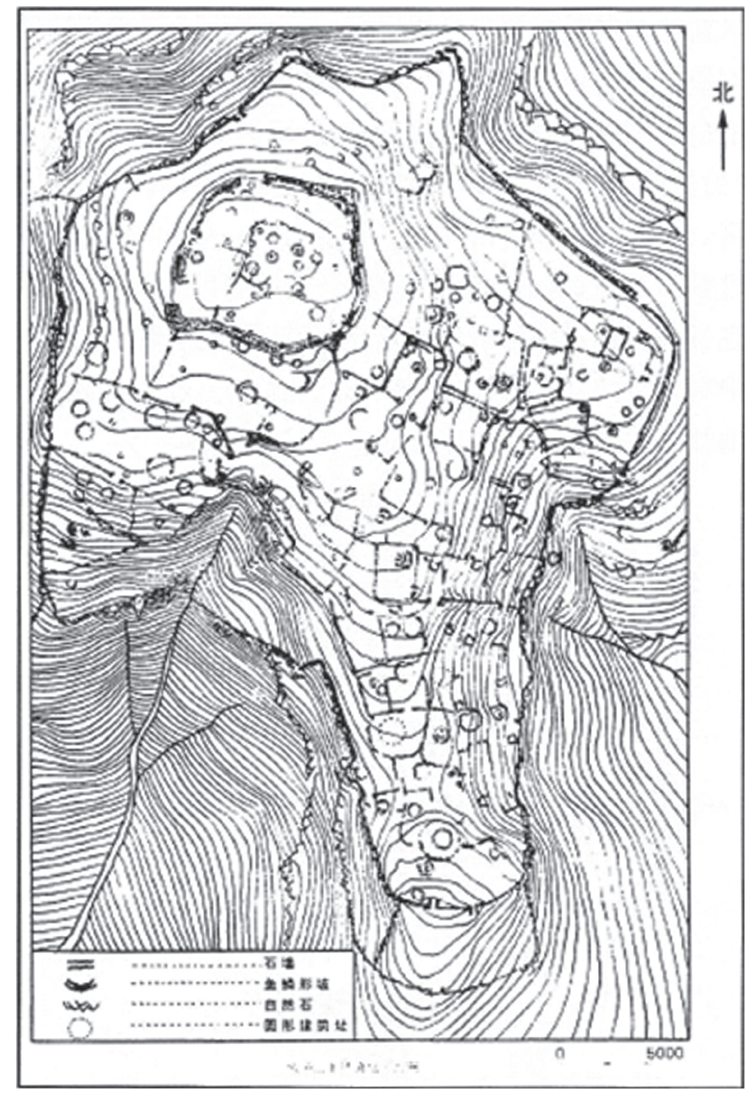
3. 大山前遗址

前面提到的大山前遗址是喀喇沁地区保存比较完好的一处以青铜时代早期为主的大型聚落。整个聚落面积近15万平方米，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范围大致在13万平方米。

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的6个地点中，KD1、KD4两个地点位置比较突出，且与山体相连的部分都有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人工环壕围绕。在KD1靠近环壕的边缘尚揭露出一段大型围墙。其中KD1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KD4发掘面积近700平方米，各发掘出数十座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房屋建筑，还有大量的灰坑、灰沟、墙、路土等遗迹。由于大山前遗址的聚落布局图尚未发表，现仅能将其主要的布局特点归纳如下：①这两个地点经常出现上下几层相互叠压的现象，说明家户在聚落中已具有了相对固定的位置，可能反映了一种对居住地的私有观念。②遗址分成几个区，每区包括1～3座房屋，以两座房屋并排或相接的现象较多。房屋的周围则散布着一些窖穴、祭祀坑、取土坑、排水沟、路土等遗迹。有些区域中的房子外面还有一圈围墙，从而形成院落。与东山嘴遗址一样，这些个较小的遗迹区所对应的很可能就是个体家庭一级的组织。③在遗迹保存较好的KD4，发现有三座院落的围墙相接的现象，由此紧密联系的三座院落构成了较高一级的居住单位。④祭祀性质的遗迹比较常见，有的祭坑甚至两两成对，出土的陶器也可相互拼接。有些房址则有明显的奠基遗存，如KD1的F8，这是一圆形地面式建筑，有灶址与门道，房址中央开口一圆形袋状坑，坑口局部保留有较硬的踩踏面，说明它与房子可能是一体的遗迹。坑内有大量焚烧后留下的炭灰，还有烧过的人的左右脚骨，出土了鼎、罐、壶、尊、瓮等一套完整的陶器及鹿角、石斧等遗物。结构类似的奠基坑在KD4的半地穴式房址中也有发现。这些房址已非普通家户的住房可比，可见KD1、KD4应当是当时祭祀、宴饮等仪式活动相对比较集中的场所。

4. 城子山遗址

城子山遗址[26]（图一三）位于敖汉旗萨力巴乡哈拉沟村，地处附近一个制高点上。



图一三　城子山遗址平面图

西距老哈河 23.4 千米，东距孟克河 16 千米。2000 年 9 月中旬至 10 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与敖汉旗博物馆合作对这一遗址进行调查。遗址平面呈亚字形，南北长 440 米，东西宽 340 米，总面积 15 万平方米。外侧有石块垒砌的围墙，墙基宽约 15 米，残高约 1～2 米，共有 10 余个门道，墙外侧附有马面。城内布局与康家屯城址基本相同，均由众多院区组成，从平面布局看，可分为中心区及东、北、西、南、东南共计 6 个区，院区之间有石墙相隔，以板道相通。

这次调查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南侧石墙拐角处有一个自然石块雕出的猪首像，在天然的巨石上，人工雕琢的猪首神态灵动，面对南部的鸭鸡山。猪嘴张开，头顶正中弧起，总长约 8 米，宽约 5 米，与主区示坛和远方的鸭鸡山处在一条直线上。西辽河地区崇

拜祭祀猪有着悠久的历史：兴隆洼二期聚落“首领”式人物的旁边埋有一雌一雄两头整猪；赵宝沟文化中将野猪的形象刻划在祭祀用的陶器尊形器上；红山文化中雕出玉猪龙的形象；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墓地中用整猪随葬更是随处可见。猪是打猎、饲养的主要动物，为居民提供肉食，围绕猪而进行的各种祭祀、祈求可能是当时人类宗教典礼中的大事。

三、小　　结

青铜时代早期，随着环境的好转，西辽河地区的社会继续向复杂化发展。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生存经济是农业、家畜饲养、畜牧业和狩猎采集的混合体。大山前的考古资料显示出家猪饲养不断增加并且在家畜饲养中日益占据主要地位，以及对野生动物的狩猎减少和畜牧动物增多的趋势。同时，这一趋势与公元前 2000 年发生的气候变化吻合，表明夏家店下层居民在环境波动中采取了新的适应方式。在这种新的适应方式下，夏家店下层居民通过经常举办仪式性的宴饮结成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和联盟。大山前遗址的资料都能够对这种情况或多或少的有所反映。

从聚落结构上看，聚落内布局出现了不同种类的建筑形式，这是社会上层采取不同的领导策略以应对不同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挑战的结果。区域聚落形态出现等级化现象，大的区域性中心聚落不断增多，反映出社区内和社区间的合作在不断加强，夏家店下层的一体化趋势显著。另外一方面，西辽河地区出现了防御性的建筑设施——城墙和马面，说明政治集团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集体建造城墙等大型建筑设施，已经超越了家庭组织的大型活动，表明一种重要的社会变革。城墙的建造需要大量劳力，这些劳力可能由区域内的很多社区集中而来，表明更复杂的社会组织可能已经形成。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出现了类似庭院的房屋组合，这一变化是应对家庭内人口增长和社会组织变革的结果。社会的发展造成生产力相对不足，于是家庭扩大规模以增加劳动力，进而又需要居住空间相应的扩大，导致院落式房屋组合的产生。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家庭间竞争性攀比不可避免，如举行宴饮等，社区内家庭间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了。

总之，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数量和规模的日益增长，表明人口在持续增长，聚落由村落发展为城镇，并形成一批区域中心，西辽河地区早期社会正日益复杂。

注　　释

[1]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赤峰考古队 . 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 1996 年发掘简报［J］. 考古，1998（9）：43～49.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赤峰考古队 . 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 1998 年的发掘［J］. 考古，2004（3）：31～39.

c. 王立新 . 大山前遗址发掘资料所反映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经济形态与环境背景［A］. 边疆考古研究（第 6 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350～357.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赤峰考古队 . 内蒙古赤峰市半支箭河中游 1996 年调查简报［J］. 考古，1998（9）：36～42.

［3］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组 . 辽宁建平喀喇沁河东遗址试掘简报［J］. 考古，1983（11）：973～981.

［4］ 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 . 辽宁北票县丰下遗址 1972 年春发掘简报［J］. 考古，1976（3）:197～210.

［5］ 同［2］.

［6］ 尼古拉斯 • 戴维，卡罗 • 克拉莫著 . 郭立新，姚崇新等译 . 民族考古学实践［M］. 湖南：岳麓书社，2009：300～322.

［7］ 同［1］c.

［8］ 胡金明，崔海亭，李宜垠 . 西辽河流域全新世以来人地系统演变历史的重建［J］. 地理科学，2002，22（5）：535～542.

［9］ 李水城 . 西拉木伦河流域古文化变迁及人地关系［A］. 边疆考古研究（第 1 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269～288.

［10］a. 同［1］c：354～356.

b.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 . 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1975（1）：117～140.

c.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R］.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

［11］张镇洪 . 建平县水泉夏家店文化遗址兽骨研究［J］. 考古与文物，1989（1）：57～63.

［12］李凤举 . 喀喇沁旗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石磬［J］. 内蒙古文物考古，2007（1）：38～41.

［13］同［10］c.

［14］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 年度）［R］.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15］凌纯声 . 中国与海洋洲的龟甲文化［M］.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2.

［16］郭大顺，张星德 . 东北文化与幽燕文明［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17］辽宁省博物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赤峰县文化馆 . 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咀遗址试掘简报［J］. 考古，1983（5）：420～429.

［18］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 内蒙古赤峰市上机房营子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2008（1）：46～55.

［19］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市博物馆 . 建平水泉遗址发掘简报［J］. 辽海文物学刊，1986（2）：11～29.

［20］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辽宁北票市康家屯城址发掘简报［J］. 考古，2001（8）：31～44.

［21］a.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 内蒙古赤峰市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遗址［J］. 考古，2007（7）：17～27.

b.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 赤峰市松山区三座店遗址 2005 年度发掘简报［J］. 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1）：1～8.

［22］F7、F9、H9 构成的双房院落由 1 座单圈建筑、1 座双圈建筑和 l 座窖穴组成 . 大体呈长方形，东西长约 18 米，南北宽约 6.8 米，院墙仅保存东部和北部 . 院落内很可能居住着一个扩大

家庭 .
［23］F11 为一单房院落，由双圈石墙建筑（主室）、侧间（侧室）和院墙组成 . 院落南北长 14 米，东西宽 11 米 . 院落内很可能居住着一个核心家庭 .
［24］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辽宁北票市康家屯城址发掘简报［J］. 考古，2001（8）：31～44.
［25］同［24］.
［26］邵国田 . 敖汉文物精华［M］. 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

A Study on the Settlement of the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Liu Tong　Wen Kexue

Abstract: The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Bronze Age in West Liaohe River valley, the study of early civilization and national origin in this region is significant. This study starts with a household at the Dashanqian site. Using the theory of settlement archeolog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cess of social complexity in the early Bronze Age in West Liaohe River valley.

Key words: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settlement; early Bronze Age; social complexity

关于青铜觯的定名和器用问题*

曹　斌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北京，100872）

觯得名于《博古图》，自北宋以来学界一直沿用。觯的器用，学界也依据文献归为酒器，容庚更是直接划归“饮酒器门”之下。所以关于青铜觯的定名和器用问题，学界此前鲜有专文论及。早年我们曾就这两个问题进行过单独论述，特别指出出现在椭方粗体觯上的“𣪘”不能作为铜觯的共用名称，另外铜觯除了墓葬中常见的酒器组合外，还有粗体觯与斗相配（加柶於觯）舀而饮用甜酒（醴）的礼制用法（建柶之礼）[1]。近年，随着新材料的出现，如澳门崇源国际拍卖会出现1件自名为“饮罐”的铜觯，叶家山M27发现斗置于粗体铜觯内的现象，有学者开始重新关注这一问题[2]。因此，我们在陈述旧文的同时，也想结合新的材料，再对这一问题做些讨论。

一、青铜觯的定名问题

由于青铜觯无自名，学界对其定名讨论较少。本文首先通过对文献和金文中共名、自名现象的梳理，讨论铜觯的定名问题。

1. 文献中的青铜“觯”

“觯”早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就有记载。《仪礼·乡饮酒礼》曰：主人“实觯酬宾”。《礼记·礼器》：“尊者举觯，卑者举角。”《韩诗》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东汉时期，许慎在《说文解字》曰：“觯，乡饮酒角也。”可见，从东周至东汉时期，古人都将觯视为一种饮酒器。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觯”在文献中出现时已是战国，此时觯已经消失很久，战国文献中的觯是否就是我们现在所认同的器形？例如有学者注意到了《仪礼》古、今文本中爵、觚、觯互有异文的现象，并举出多例。如武威《仪礼·特牲》：“尸左执爵，右取菹，擩醢，祭于豆間。”陈梦家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周代的“东土”研究》（项目批准号13CKG013）阶段成果之一。

《校记》云：“爵，今本作觶。”王关仕云：“觶、爵义无别。”《礼记·檀弓》：“杜蕢洗而扬觶，公谓侍者曰：如我死，则必无废斯爵也。”且今甲本前言洗觶，后言卒爵者多，《士冠》：“实勺觶。”郑注：“爵三升曰觶。”則爵为总名。《有司》：“兄弟之后生者举觶于其长。”注：“古文觶皆为爵，延熹诏中校书定作觶。”且亦见有《仪礼》经文中觚觶、觚爵或觶觚互文的例子，如《仪礼·燕礼》主人献宾：“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主人坐奠觚於篚。”郑注：“古文觚，皆为觶。”又《仪礼·燕礼》宾酢主人：“主人降，宾洗，南坐奠觚。”郑注：“今文从此以下，觚皆为爵。”《仪礼·燕礼》宾媵觶于公：“宾降洗，升媵觚于公。”郑注：“此当言媵觶，酬之礼，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误也。古者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误尔。”《句读》：“陆氏觚依注音觶。”《仪礼·大射》主人献士及旅食：“士长升拜受觶。”郑注：“今文觶乍觚。”又《仪礼·大射》宾举爵為士旅酬：“宾降洗，升媵觶于公。”郑注：“今文觶為觚。”又“宾降洗象觚。”郑注：“此觚当为觶。”《句读》云：“凡旅酬皆用觶，故知觚当为觶。”[3] 所以到了北宋时期，金石学家也无法辨别何种为觶。吕大临《考古图》中并无觶属，将持戈父癸觶、父乙觶、木父已觶、父己足迹觶称之为卣。首先将觶这种商周时期的酒器与器物对应起来，是在王黼等所著的《博古图》。他们大致依据容量，将一类侈口、束颈、鼓腹、带圈足的器物，如立戈父辛觶、立戈觶、山觶、父贝觶、饕餮觶 5 件器物称之为觶，以别于其他器物，但仍不能将蜼觶、諫觶等从尊中辨识出来。王黼在对觶定名时具体依据为何今已难弄清。到了清人的著录书籍，基本延续了对“觶”的称谓，“西清四鉴”共著录铜觶 79 件，但也常常将觶与卣、尊、觚等混淆。乃至今日，对于个别器物仍有较大争议。要搞清楚何种为觶，我们首先来看被王黼称为“觶”的器物的自名情况。

2. 青铜觶的共名和自名

自名原则是青铜器定名的第一标准，即根据器铭中的自称来定名，如鼎、甗、鬲、豆等器类都是依此命名。要解决铜觶的定名问题，自然首先要从自名现象出发。但寻遍各个器类的自名铭文，都未找到“觶”字。而就在王黼所定的“觶”中，多见的也是“共名”现象（表一）。通过简单的收集，我们注意到除了铜器中常见的“尊”“彝”共名外，还有“宝尊”“宝彝”“宝”“宝尊彝”“旅彝”“旅”“宗彝”，而后三者中，“旅彝”“旅”表示与行军、征战有关，“宗彝”与宗庙等祭祀有关，可以说共名涉及的范围相当广。而在共名之外，我们注意到也有个别疑似自名的情况存在。1981 年冬长安斗门镇花园村 M17 出土一件椭方体铜觶自名为“[illegible]”，2006 年澳门崇源国际拍卖会又出现类似的 1 件椭方体觶自名为“饮鑵”，而出土和传世还有 4 件自名为“饮壶”（3 件椭方体，1 件直筒形）以及光绪十四年江西高安县发现的 3 件自名为“耑”的铜觶。前三者时代为西周早期偏晚到西周早、中期，后者时代为春秋晚期。但四者的字、形、义差别较大，所以自名也无统一标准。

表一　铜觯共名、自名情况一览表

共名	器名	时代	铭文	著录
尊	作尊觯	西周早期	作尊	《三代吉金文存》14.39.5 《殷周金文集成》06199
宝尊	作父辛觯	西周早期	作父辛宝尊	《三代吉金文存》11.19.1 《殷周金文集成》06448
彝	子作父戊觯	西周初期	子作父戊彝犬山刀又	《殷周金文集成》06496
	伯觯	西周早期	白作彝	《西清古鉴》26.19 《殷周金文集成》06361
宝彝	耒伯觯	西周早期	耒伯作宝彝	《三代吉金文存》14.52.7 《集成》06437
宝	姮亘母觯	西周早期	姮亘母作宝	《三代吉金文存》14.53.1 《殷周金文集成》06451
	遽仲觯	西周早期	遽仲作父丁宝	《三代吉金文存》14.54.7 《殷周金文集成》06495
宝尊彝	邑觯	西周早期	邑作宝尊彝	《文物》1972年10期
	作父辛觯	西周中器	□作父辛宝尊彝	《殷周金文集成》06473
小旅彝	事觯	西周早期	事作小旅彝	《西清古鉴》9.8 《殷周金文集成》06460
旅彝	叔觯	西周早期	叔作新邑旅彝	《天马——曲村》第417页
旅	作旅觯	西周早期	作旅	《殷周金文集成》06198
宗彝	太史觯	西周早期	太史作宗彝	《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1期
歖	[illegible]觯	西周中期	[illegible]进作父辛歖，[illegible]	《文物》1986年1期
饮鑵	伯觯	西周早期	伯作饮鑵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图像集成》10855
饮壶	伯戜饮壶	西周中期	伯戜作饮壶	《文物》，1976年10期
	曩仲饮壶	西周中期	曩仲作倗生饮壶	《夏商周青铜器研究》（342）
耑	儀楚耑	春秋晚期	儀楚之祭耑	《善斋彝器图录》
	徐王耑	春秋晚期	徐王巿又耑	《贞松堂吉金图录》

注：　表格所收录，仅为个别代表器物，并不表示此类共名、自名的全部。

3. 青铜觯的定名

文献和自名、共名现象的梳理，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考虑铜觯的定名问题。长安斗门

镇花园村 M17 在发掘之初，李学勤先生就认为椭方体铜器上的“[illegible]”字似从皀、欠会意、羊声，故读其为觶[4]。而黄盛璋先生认为“[illegible]”为方壶专名[5]。但此时方壶并未兴起，称之为壶似有不妥。从该器器形看，此是我们现在惯称的椭方体觶，李先生的说法更为妥当。但“[illegible]”字并未出现在常见的椭圆体及圆体觶上，而出现在数量较少的椭方体觶上，且“[illegible]”字单独出现的仅此一例，显然不能作为这一类器的通称。但是其是否是椭方体觶的专称？通过收集我们注意到，这类椭方体铜器已有一定数量，花园村出土的这件为椭方形粗体，时代在西周中期偏早或略早，在此之前以及之后都有一定数量该类器的出土，就在此器出现后，同为椭方形粗体的西周中期的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光觶、英国博物院藏作宝尊彝觶[6]也都未采用“[illegible]”的称法，因此其是否为该类器的专称也很难确定。此外，2006 年澳门崇源国际拍卖会出现 1 件自名为“饮鑵”的椭方体觶[7]。由于此种自名也只有 1 件，而时代、形制都与前者接近而略早，基于同样理由我们认为其不能替代觶的名称。此外，与以上两器形制接近的还有 3 件自名为“饮壶”的铜器，我们也曾专文讨论其都应是椭方粗体铜觶[8]，因此在此类椭方粗体铜觶自名都如此不统一的情形下，其更不能作为铜觶共同的名称来理解。至于江西高安县的 3 件耑，王国维先生早在《释觶觛卮𦉜䚸》一文认为觶觛卮𦉜䚸五字同声，亦当为同物[9]。但是无论从器形上，还是时代上看，“觶”“卮”都不是同一类器物，流行的时代也有差异。而 3 件耑的时代，是觶早已消失的春秋晚期，结合徐王铜器群的情况看，其只是一种对西周铜器的复古，最多只能算铜觶的孑遗，并不具有共通性。而且在此之前的商周时期，和耑形制一致的细体觶，特别是西周中期时期的细体觶也均不见这样的自名，同时此时还依然流行“宝尊彝”（《集成》06473）这样的共名，因此也不能说“耑”一定就是“觶”。假如我们再回到文献，从容量上分析，“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的记载基本与觶相符。礼书讲的都是周礼，西周时期觚变的细长，腰部相当细，容量自然有限，而粗体觶在此时更加矮胖，容量自不必说，就是细体觶也不断细高，容量有所增加，所以容量大于觚与事实基本相符。但是，文献也有混淆的地方，如上文提到的异文和互文的现象，一方面可能与细体觶与觚形制、用途接近有关，另一方面与战国据西周时代已久远，礼学家在“复周礼”的过程中难免有所错误以及理想化有关。这在“尊者举觶，卑者举角”的记载中也有所体现。我们知道，角的数量并不是非常多，一般都出在等级相对较高的墓中。在它与觶并存的时代里，看不出“觶”比“角”地位高的例子，反而是“角”的地位绝大多数情况下高于“爵”，自然也不低于常与“爵”组合的铜觶，所以个别混淆的情况也可以理解。但总体而言，先秦文献中记载觶为饮酒器与事实基本一致，且容积也基本相符。那么宋人将这种侈口、束颈、鼓腹、带圈足的饮酒器定名为“觶”基本还是与先秦文献记载相吻合的。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言“知宋人古器之学，其说虽疏，其识则不可及也。”[10]在新的材料未出现之前，为避免不必要的混乱，我们还是沿用宋人的称法。

二、青铜觯的器用问题

在讨论青铜觯的定名问题之后，我们主要将礼书记载与考古发现相结合，重新探讨铜觯的用途和器用制度。

1. 青铜觯的用途

关于青铜觯的用途，文献中有大量记载。《仪礼・乡饮酒礼》云："主人实觯酬宾。"郑玄注："酬，劝酒也。酬之言，忠信为周。"贾公彦疏："此解主人将酬宾，先自饮之意……示忠信之道，故先自饮。"《仪礼・乡射礼》曰："胜者之弟子，洗觯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郑樵在《通志・器服略第一・尊彝爵觯之制》中更是明确记载："爵与觯皆饮器，觯大而爵小……觯与爵同为饮器……"可见，在先秦礼书及宋人记载中，觯均为饮酒器，主要用于饮酒。《礼记・礼器》曰："宗庙之祭，贵者献于爵，贱者献于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仪礼・特牲馈食礼》曰："实二爵、二觚、四觯、一角、一散。"可知，觯又为一种地位较高的礼器，用于祭祀或礼仪性场合。

在近代研究青铜器的学者中，青铜觯也都被定为饮酒器。容庚先生在《殷周礼乐器考略》中，首先将觯归为酒器[11]。其后又在《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将觯归入"酒器部"的"饮酒器门"[12]，朱凤瀚先生亦明确指出觯为饮酒器[13]。我们也支持这样的看法，因为无论从青铜觯的体量、形制，抑或组合等方面都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体量方面看，粗体觯高度一般均在 15 厘米以下（个别高至 17 厘米），口径在 14 厘米以内；细体觯高度一般在 20 厘米以下，口径在 12 厘米以内，体量为酒器中最小者之一。从形制上看，铜觯基本都是口部外侈，口沿部分圆润利于饮用，这与带流器完全属于两类不同器形。从容量上看，铜觯容积太小，所盛之酒仅供饮用，作为盛酒器的可能较小。如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的 6 件铜觯中，容量最大的粗体觯仅 400 毫升（M85 ∶ 4），且该觯的时代已经进入西周中期，是铜觯最粗矮、容量最大的时期，也是粗体觯的最后形态。而该墓地容量最小者仅 55 毫升，其他的也都在 200、300 多毫升，这与一般的盛酒器相比容量差距明显（彩版一，1）；从功能看，觯为圈足器而非三足器，亦无法、也不可能用于温酒；从组合上看，商代晚期酒器基本组合多为觚、爵、觯，西周早期过渡为爵、觯的组合，觯取代的是另一种饮酒器觚；从发展流变看，粗体觯器形较矮胖，最早一件见于妇好墓（M5 ∶ 783），带盖且制作精美，满足了殷人大量饮酒的需要。自西周早期始，粗体觯有减少的趋势，而细体觯大量流行，一般无盖，装饰也不似殷墟时期繁缛。这有时代的因素，但也可能与觯由贵重的饮酒器转化为取代觚的基本饮酒器有关。最后，近年考古材料又进一步支持了以上结论。2008 年发掘的山西翼城大河口 M1 出土的最大 1 件铜卣（M1 ∶ 276），内置青铜酒器一套 7 件，分别为 5 件细体觯、1 件单耳罐和 1 件斗[14]。卣为盛酒器学界并无其他意见，斗常于卣内已有多例考古发现。5


图一　守妇觯

件细体觯置于盛酒器之中（彩版一，2），很容易理解为饮酒器和盛酒器配套放置的情形，而这样的放置方式在现今的生活中亦很常见，都说明体量大者为盛酒器，小者为饮酒器。因此，青铜觯为青铜礼器中的饮酒器无疑。但是，觯在商周时期主要是作为礼器用于祭祀等场合。尽管目前所出带盖觯，基本上器为母口，盖为子口，其口沿较薄且外侈，利于饮酒，但我们依然发现有像守妇觯（图一）这种器为短子口的个别器形[15]，其口沿对直接饮酒可能略有影响。这种觯数量很少，似乎反映了青铜器礼器化高度发展的商周时期，铜觯主要是作为礼器，应用于祭祀等场合的功用。因此，觯作为礼器的性质是第一位的，实用器仅是少数，这与其他铜器的情况一致。

2. 青铜觯的器用制度

在青铜觯的器用制度中，有粗体觯和斗相配（加柶於觯）舀而饮用甜酒（醴）的方式长期为学界所忽视，对于这种用法，我们在 2006 年就据宝鸡竹园沟 M4 麦伯觯内置斗的现象明确指出[16]，而近年考古材料也进一步支持这样的提法。

《仪礼・士冠礼》记：“冠者即筵坐，左执觯，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兴，筵末坐。啐醴，建柶。兴……”。唐人杜佑在《通典》卷一二九又云：“盥手洗觯酌醴加柶於觯。”其实指的都是觯盛醴酒与柶搭配的建柶之礼。多年来，研究青铜器的学者受 1 件商代晚期铜尊族徽铭文的影响，以为其是指铜觚与柶相配的建柶之形[17]。其实这件族徽铭文（图二，1）的载体为铜尊，而晚商至西周早期偏早阶段的铜尊形制多为此类觚形尊，其描述的更可能是墓葬中常见的盛酒器与铜斗共出的情形，而与东周礼书记载的“建柶”无关。至于近年有学者引用战国铜器上的宴射、宴饮图像进行补正，从而认为建柶之礼指的是细体觯与勺、匕等相配的形式的看法亦不能成立。首先，战国距离铜觚、觯等的消失时代已久，其在宴饮、宴射中使用流行于晚商、西周前期铜礼器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其次，这些图像中饮者所举器形不一，看不出似觚、也看不出似觯，甚至是否为铜器都很难确定（图二，2、3）。再次，将战国铜器纹饰中的器形指为细体觯并无考古证据佐证，细体觯与斗建柶的形式亦无考古证据佐证，而细体觯从体量、形制上分析其内也没有可以放入铜斗、匕或勺的空间。最后，《仪礼》虽成书于东周，但其都是在试图记述西周的礼制，因此这样的建柶之形应在西周时期的器用之法中寻找，而巧合的是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证据。

早年在发掘宝鸡竹园沟 M4 时，甲组出土有觯 2 件、斗 1 件、勺 1 件，其中这件斗就放在麦伯觯（BZM4 ： 3）中[18]。近年在随州叶家山墓地又发现一例，该墓出土的祖南獸觯（M27 ： 10）内亦放置 1 件铜斗（图三）[19]。这两墓时代同处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且前者为𢐗季墓，后者为曾侯夫人之墓，墓葬等级均很高。而这 2 件铜觯又



图二　与建柶相关的铜器铭文和战国铜器花纹
1.《录遗》189 尊铭文　2. 首阳斋藏宴射刻纹铜匜花纹　3. 保利艺术博物馆藏宴饮画像纹铜壶花纹

均为粗体带盖觯且形制、纹饰近同，带盖觯同样是铜觯中等级较高的器形。高等级墓中出土粗体带盖觯与斗相配的情况可能就是文献中“酌醴加柶於觯”的真实写照。醴，甜酒也。其记述了粗体觯带盖觯与斗相配，用斗（作匙之用）舀取而饮甜酒（醴）的情形。《仪礼·士冠礼》记述的在盛醴（甜酒）的酒器中建柶之形，与斗放在觯中的情形正好相同，这应该就是礼书中所记的建柶之礼。而能采用此种礼制并食用醴酒的，在文献中都是大贵族，这也与墓葬等级相合。这种器用制度应是“周礼”的体现，因为晚商尚未发现斗置于觯内的现象，而文献所记也是周代礼制。进入西周后，粗体觯仍在使用，但是周人对其用法做了一些改变。这也可以解释粗体觯自西周早期开始，越加矮粗的原因，如趩觯因其粗壮，有学者都称之为尊，有了与斗相配的器用制度之后，西周粗

体觯的器形当容易理解。此外，粗体觯与斗相配的器用制度的也可解决器子口类粗体觯不易直接举而饮用的问题，所以在西周还会继续发现矢王觯这样的器子口、盖母口的个别形制[20]，这可能都与此类觯在西周前期有与斗相配的器用之法有关。



图三　祖南獸觯（M27 ： 10）附斗带盖粗体觯及内置的斗、器子口铜觯

此外，青铜觯的基本器用之法，还是与尊、卣、觚、爵等相配，构成一套酒器组合。由于商周宗庙祭祀的情形现已无法复原，这方面只能依靠墓葬的材料去了解。在晚商时期，铜觯基本是与觚、爵组合，构成酒器的基本组合。然此时期觯的地位尚不如铜觚，在各个等级的墓葬中觚、爵似乎都是核心组合的必须成员，而觯则是可以被舍弃的对象。在进入西周后，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觯开始逐渐取代觚的地位，觚的数量开始减少，仅主要见于商文化性质的墓葬之中，且形制快速向细高的极端方向发展，似已不合适与爵配对。而此时期觯的地位大大提升，常与爵搭配以酒器的核心组合成员身份出现。此时期觚、爵、觯的组合多见于等级较高的墓葬，而小贵族墓则较多的以爵、觯的组合形式出现。有证据表明，西周时期铜觯组合的变化首先于西周早期偏早阶段出现于王畿地区的小贵族墓葬之中，之后逐渐扩大至上层贵族。此时期的觯是酒器核心组合的必然成员之一，甚至在西周中期偏早阶段的墓葬中还有一件觯的情形。青铜觯的组合以及在墓葬中的器用问题我们有专文详细讨论[21]，此处不再敷言。总之，青铜觯在晚商与觚、爵组合，西周前期较多的与爵组合或单件觯独立存在，特别粗体觯与斗相配的形式，都是商周时期青铜觯器用制度的写照。

三、小　　结

觯得名自《博古图》，由于铜觯无自名，此类器形制、容量又与礼书中的“觯”近同，因此学界也基本沿用了《博古图》的说法。虽然几件椭方体粗体铜觯上有“歓”“饮

壶”“饮罐”这样的自名现象，但其一是出现在铜觯开始衰落的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其前、其后的椭方粗体铜觯均不见采用此类名称；其次是即便发现有 5 件，名称还很不一致，出现三种不同的自名现象。因此，在“[illegible]”“饮壶”“饮罐”是否为椭方粗体铜觯专名都不能肯定的前提下，其更不能作为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椭圆体、圆体铜觯的共同名称来理解。而 3 件耑的时代，更是觯早已消失的春秋晚期，只是一种对西周铜器的复古，最多只能算铜觯的孑遗，并不具有共通性。所以还是沿用宋人的名称以避免不必要的混乱为好。

青铜觯的基本用途为饮酒器，近年在大河口 M1 的一件卣内置有 5 件铜觯，盛酒器和饮酒器的对比一目了然。但是铜觯主要还是作为礼器使用，在殷墟晚期墓葬中主要与觚、爵组合，然此时期觯的地位尚不如铜觚，在各个等级的墓葬中觚、爵似乎都是核心组合的必须成员。在进入西周后，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觯开始逐渐取代觚的地位，特别是细体觯。觚的数量开始减少，仅主要见于商文化性质的墓葬之中，且形制快速向细高的极端方向发展，似已不合适与爵配对。而此时期觯的地位大大提升，成为酒器的核心组合成员，常与爵搭配出现。此时期的觯是酒器核心组合的必然成员之一，甚至在西周中期偏早阶段的墓葬中还有一件觯的情形。除了上面谈到的器用之法，铜觯还有一种与斗相配的形式为学界所忽视。礼书记载有“建柶”之制，通过文献记载，特别是多件粗体铜觯与斗（斗置于觯内）同时出土的现象表明其与文献中“酌醴加柶於觯”有一定关系，因此粗体觯还有与斗配对舀取而饮甜酒（醴）的器用之法，当然此类用法以粗体觯中的带盖觯为主，是“周礼”器用制度的一种体现，而带盖觯本身等级较高的特点也正与文献记载的用法相暗合。

注　释

［1］ 曹斌．商周青铜觯研究·青铜觯的定名与用途［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7.

［2］ a．周忠兵．释甲骨文中的“觯”［J］．古文字研究，2014（30）.

b．谢维明．谈谈金文中宋人所谓“觯”的自名［EB］．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4-12-25.

c．张光裕．《仪礼》饮酒礼用觯小议［J］．饶宗颐国学院院刊，2013（创刊号）.

d．张光裕．从新见材料谈《仪礼》饮酒礼中之醴柶及所用酒器问题［J］. 文物，2013（12）.

［3］ 同［2］c.

［4］ 李学勤．论长安花园村两墓青铜器［J］．文物，1986（1）.

［5］ 黄盛璋．长安镐京地区西周墓新出铜器群新探［J］．文物，1986（1）.

［6］ 从器形、纹饰上判断，这两件椭方体觯的时代要略晚于花园村 M17 觯。曹斌．青铜觯的分期和年代［J］．东洋古典研究，2015（58）.

［7］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10855）［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8］ 该器为椭方粗体觯，详细可参看拙文对于铜觯与饮壶关系的讨论：曹斌．试论青铜觯与饮壶、觚、尊、卣等的关系，待刊 .

［9］ 王国维．释觯觛卮膞腨［A］．观堂集林［C］．北京：中华书局，1956.
［10］ 王国维．说觥［A］．观堂集林［C］．北京：中华书局，1956.
［11］ 容庚．殷周礼乐器考略［J］．燕京学报，1927（1）.
［12］ 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3］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1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联合考古队．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J］．考古，2011（7）.
［15］ 旅顺博物馆．旅顺博物馆［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16］ 同［1］.
［17］ 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的研究・总论［M］．日本：吉川弘文馆，1984.
［18］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強国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1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J］．文物，2011（11）.
［20］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25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1］ 曹斌．试论青铜觯的组合和墓葬等级的关系，待刊.

A Study on Denominating and Usage of Bronze Zhi

Cao Bin

Abstract: By using both established research and new data this paper researches denomination and use of Bronze Zhi.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in Zhi contexts both formal and common names are used. In addition, Zhi are also found with Gu and Jue in tombs. Futhermore, it is still used in the system of Zhou Rites when found with bold-lidded Zhi and Dou.

Key words: Bronze Zhi; Denominating; Usage System; Zhou Rites

商周时期悬铃青铜礼器研究

孙　明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410005）

本文所言的悬铃青铜礼器，指的是下端或底部悬挂铜铃的青铜礼器，不含青铜车马器、铃首刀等。关于商周时期的悬铃类铜器，由于数量较少，虽然以往曾有学者简单提及[1]，但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对目前所知的商周时期悬铃铜器的发现与分布、起源与传播、悬铃的功能等内容进行梳理，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发现与分布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所知的考古发掘及传世收藏悬铃铜器共27件，包括觚4、簋9、尊1、豆3、盘3、簠1、提梁方卣1、方座筒形器1、彝1、罍1、觯1、俎形器1件，现根据时代及出土地点不同，分别介绍如下。

1. 商代晚期

8件，主要出土自山西中北部地区，分别介绍如下。

1957年，山西石楼县二郎坡出土商代兽面纹铜觚，底设小环，环上系铃[2]。

1959年8月，山西吕梁县石楼片罗村公社沙窑管理区桃花庄一座商代晚期贵族墓葬出土一批青铜礼器，其中一件铜觚圈足下系铃，该觚仅圈足饰雷纹，觚高32、口径18、足径8厘米，铃高4厘米（图一，3）[3]。一般认为该墓年代大体为武丁以后的晚商时期[4]。

1971年11月，山西保德县林遮峪村一处商代晚期墓葬出土30件青铜器，其中的两件铜豆，形制相同，敛口尖唇，深盘，圈足饰三个长方形或十字形镂孔，高10.4、口径9.9厘米，圈足内置一铜丸（图一，5）[5]。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商代晚期悬铃铜豆，高12.4、口径12.5厘米（图一，6）[6]。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两件悬铃铜觚，器底有小环，环系一铃[7]。其中一件高23.7厘米，重0.68公斤，手握全器，铃声作响，可能系二次铸造，时代为商代前期至殷墟早期（图一，1）。另一件高26.1厘米，重0.89公斤，时代为殷墟早、中期（图一，2）。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一件商代晚期悬铃铜牺尊，高65.6厘米，底部外侧正中有残断的环钮，应为悬铃之用（图一，4）[8]。



1　2　3　4　5　6

图一　商代悬铃青铜礼器

1、2. 觚　3. 觚　4. 尊及底部　5、6. 豆

2. 西周早期

13 件，主要出土自辽宁、江苏、安徽、陕西和湖北地区，分别介绍如下。

1979 年 4 月，辽宁义县北边的稍户营子公社花尔楼大队一处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 5 件，时代为商末周初[9]。其中一件悬铃铜俎形器，长 33.5、宽 18、高 14.5 厘米，重 2.5 公斤，俎形器板足空裆两端各吊一个扁形铜铃（图二，1）。窖藏位于医巫闾山西麓



图二　西周早期悬铃青铜礼器

1. 俎形器　2. 簋　3. 方座簋　4. 悬铃方座簋　5. 䍙叔方座簋　6. 簋　7. 觯　8. 罍　9. 方彝

坡地上，发现时器物堆放零乱，有的倒置和套装，除铜俎形器外，还有铜鼎 1、铜甗 2、铜簋 1 件。这处铜器窖藏，很可能与分布于北方长城地带东端的魏营子文化相关，魏营子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吸收并融合了朱开沟文化、高台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某些因素[10]。

1976 年 12 月，江苏丹阳县城东司徒公社砖瓦厂取土时发现一批 26 件青铜器，其中一件西周早期悬铃铜簋，通高 10.4、口径 18.7 厘米，底部有一个半圆形的环，应为悬铃之用（图二，2）[11]。除这件悬铃铜簋外，同出的还有铜鼎 11、铜簋 6、铜尊 4、铜盘 3、铜瓿 1。铜器出土地点附近还发现有陶甗、钵、鬲、盘、木炭、草木灰等遗物，铜器出土地点东南约 100 米的大仙墩曾出土西周时期印纹硬陶和原始瓷豆，铜器中有些具有西周早期特征，但多数是西周中期或更晚的器物，而窖藏年代应该不晚于春秋早期。

陕西宝鸡竹园沟强国墓地 M13 出土一件悬铃铜双耳方座簋 BZM13 ∶ 20，时代为西周早期，通高 25.9、座高 9.6、座长 17.6 厘米，重 4.75 公斤，方座内悬挂一个小铜铃，系二次补铸悬铃挂铃，铃体饰阳线勾勒的小兽面纹（图二，3）[12]。纸头坊 M1 出土的一件悬铃铜双耳方座簋 BZPM1 ∶ 7 和一件悬铃铜双耳圆座簋 BZPM1 ∶ 10 的座内皆悬挂一个小铜铃[13]。

2013 年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出土一批铜器，其中 M4 出土的一件悬铃青铜簠的侧壁系着一件铜铃。据发掘者王占奎先生介绍，这件青铜簠铸造时非常讲究，先铸造好铃铛，随后再铸造簠体和链接铃铛的铜环，铜环无任何缝隙，铃铛、铜环、铜簠三者浑然一体[14]。

2013 年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 M28 出土一件悬铃铜罍 M28 ∶ 177，该罍通高 44、口径 17 厘米。纹饰夸张，上腹是两组相对的大嘴卷尾夔纹，下腹为四组兽面纹，圈足为两组相对的长尾夔纹，双耳作扁角兽首状。罍外底有悬铃，制作悬铃的工艺颇为复杂：悬铃的钩为长方形系先铸，铃内有长方形的环也系先铸，环下再悬坠形铃舌，铃体两侧有阳线兽面纹，（图二，8）[15]。该墓地 2011 年发掘的 M50 曾出土一件悬铃方座簋 M50 ∶ 14，这件方座簋分别在腹部和四面方座上装饰无地纹的大兽面纹，其间的圈足所饰的夔纹也无地纹[16]。

1987 年，安徽省枞阳县文物管理所在周沄乡七井村征集到一件西周早期悬铃青铜方彝，据调查乃是附近一处商周时期遗址出土[17]。方彝通高 44 厘米，重 11.5 公斤。圈足内底悬一件铜铃，铃高 9 厘米，有舌长 6 厘米，摇动时仍发出清脆的响声（图二，9）。

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博物馆在上海冶炼厂废铜中拣选所得的鄠叔悬铃方座簋，时代为西周早期，通高 18.7、口径 18.2、座长 14.7、宽 14.5 厘米，重 3.86 公斤，方座内悬挂一铜铃，铃中有舌，稍有振动，就能发出清越之声（图二，5）[18]。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西周早期悬铃兽面纹铜簋，通高 15.5、口径 18.1、底径 12.7 厘米，重 2.54 公斤，圈足内也悬挂有一铜铃（图二，6）[19]。

陈梦家《美劫》收录一件西周初期的悬铃方座铜簋，通高27、口径22.2厘米，方座底有小环，应为悬铃之用（图二，4）[20]。瑞士Museum Rietberg收藏一件西周时期的悬铃铜觯，高18.3厘米，器底有小环，环系一铃，铃已遗失，仅存铃钮（图二，7）[21]。

3. 西周晚期

6件，主要出土于山西和湖北地区，分别介绍如下。

1975年，山西闻喜上郭村墓地M51出土的一件西周晚期悬铃铜盘M51 ：3[22]，敞口，窄缘，浅腹，附耳，圈足底外侈，圈足与盘底相连处有四个穿孔，圈足内系一铜铃。该盘高11、口径31.3、腹深5、圈足径22.5厘米。盘内中部饰卷体蛇纹，内壁饰一圈鱼纹，颈饰云雷纹，圈足上部饰重环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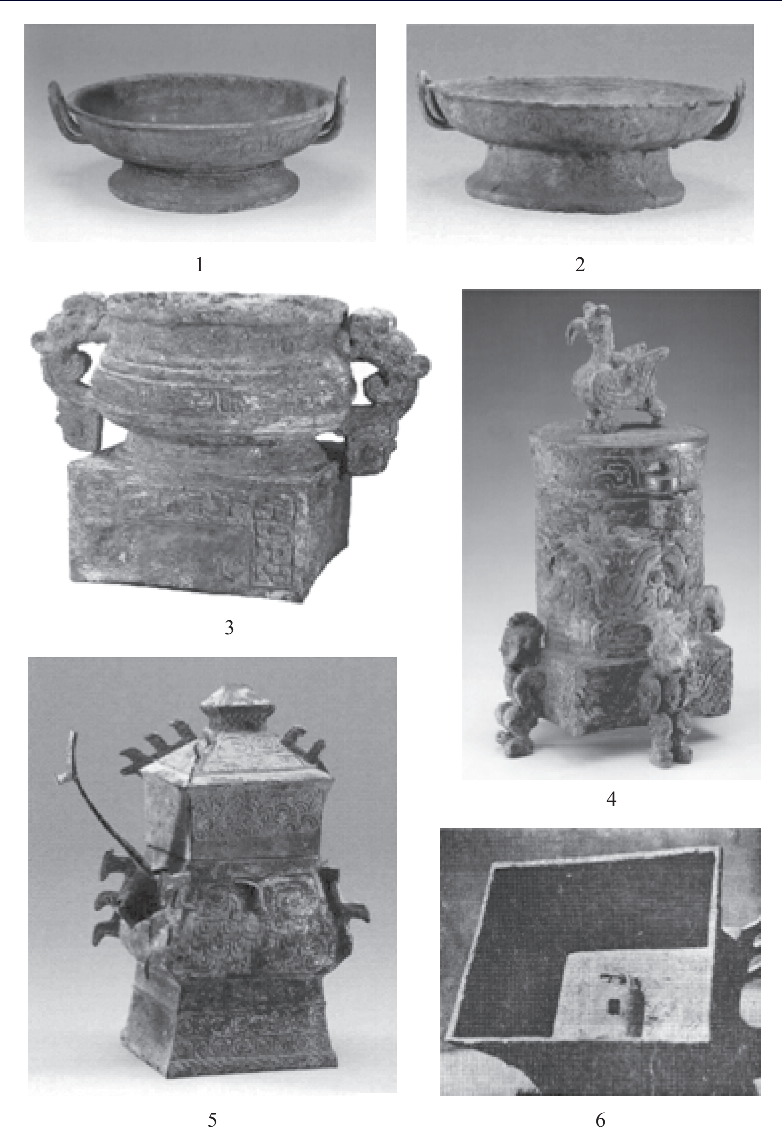
1993年，山西晋侯墓地M8出土的两件悬铃青铜方座簋，时代为西周晚期，其中一件通高27.8、口径24.5、座宽23.6～24.2厘米，重13.2公斤，方座底部有一环，应为悬铃之用，铃已遗失（图三，3）[23]。M63出土一批青铜器，其中一件悬铃方座筒形器，筒径9.1、筒深9.2、通高23.1厘米，方座底斜挂2个小铃，时代为西周晚期（图三，4）[24]。

1972年，湖北随县熊家老湾出土一批9件西周晚期青铜器，包括铜鼎、方甗、簋、盘、匜等，其中一件悬铃圈足盘，口径28～28.4、通高12厘米，重2.766公斤，盘底残存有先铸的环钮端部，两端相距1.5厘米，当为悬挂铜铃之用（图三，1）[25]。关于熊家老湾铜器群的族属，张昌平认为，有铭铜器中黄国铜器和曾仲大父铜器各两件，黄器两件铜鼎形制、纹饰各不相同，一套三件列鼎为拼凑组合而成，器主很可能是黄国嫁在曾国的女子，时代为西周晚期[26]。

1980年5月，湖北京山县三机械厂扩建厂房时发现一批4件西周晚期青铜器，其中一件悬铃提梁方卣，口径10.5～11.5、腹深15、通高31.7厘米，圈足内底悬挂铜一个铜铃，铃中部有一对穿长方形孔（图三，5、6）[27]。另一件铜盘形制与72年随县熊家老湾出土悬铃铜盘形制相似，且底部有残断的钮痕，可知原先也是有悬铃的[28]。这批铜器形制虽然与同时期曾国铜器相同，但是否属于曾国尚有待进一步研究[29]。

二、起源与传播

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铜铃是1983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M3296出土的红铜铃形器，该铃素面，截面呈合瓦形，埋葬时可能以织物包裹（图四，2）。除红铜铃形器外，该遗址还采集发现有陶铃形器（图四，1），其中红铜铃形器的绝对年代据同出人骨^{14}C测定，当在公元前2085年左右[30]。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中也出土有3件铜铃（图四，3、4）[31]，但未见将铜铃悬于其他青铜礼器者，属于商代早期的郑州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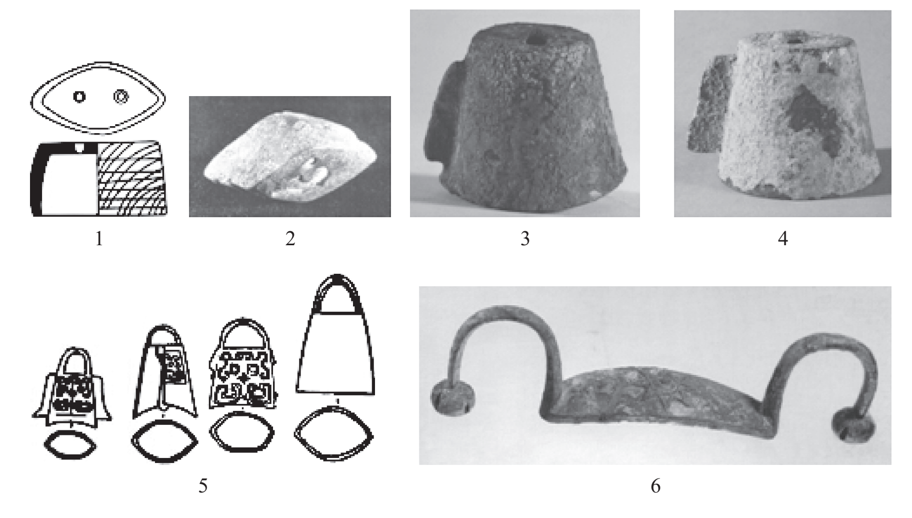


图三　西周晚期悬铃青铜礼器

1. 盘　2. 盘　3. 簋　4. 方座筒形器　5、6. 提梁方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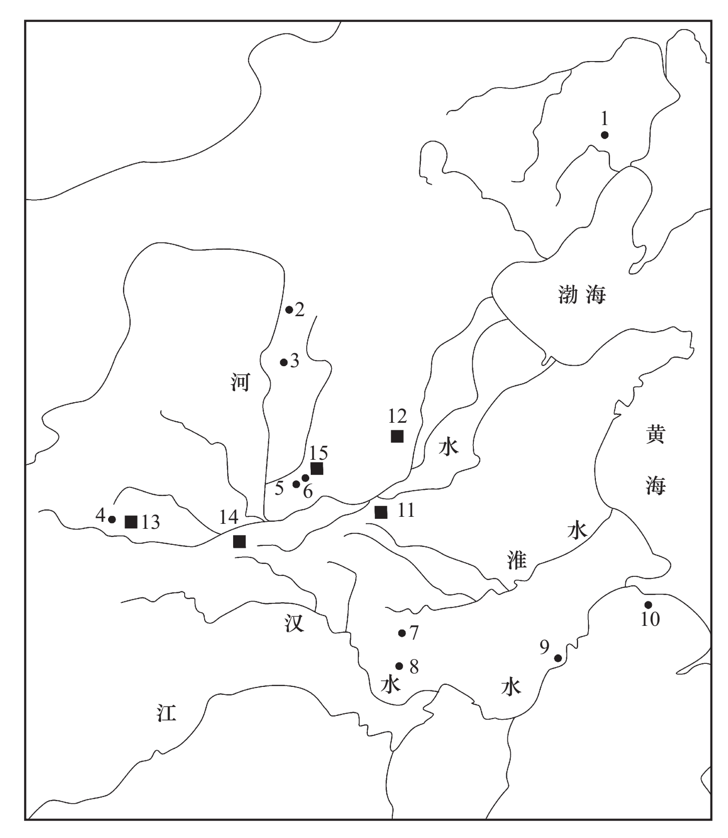
城、偃师商城亦未见将铜铃悬于其他青铜礼器者。殷墟遗址中虽然有铜铃（西区墓葬出土）（图四，5），但多见于墓室、殉狗的颈下、车马坑中马颈下[32]，除铜弓形器（郭家庄 M160 出土）、铃首刀外，尚未发现将铜铃悬于其他青铜礼器者。

目前所见铜铃悬于其他青铜礼器者，共计 27 件，其中考古发掘和偶然出土品 19 件，分布范围包括山西、陕西、辽宁、湖北、安徽、江苏等，其余 8 件为国内外博物馆和私人藏品。悬铃铜器时代的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晚期，地域分布上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商代晚期的悬铃铜器见于北方的辽宁和晋北地区，西周早期的铜器主要分布在关中、南阳盆地及长江下游地区，西周晚期的铜器分布在晋南和江汉地区（图五）。时空



图四 陶寺遗址、二里头遗址、殷墟遗址出土铜（陶）铃、铜弓形器

1. 陶铃形器 2. 铜铃形器 3、4. 铜铃 5. 铜铃 6. 弓形器[33]



图五 悬铃铜器出土地点分布示意图

1. 辽宁义县花尔楼 2. 山西保德林遮峪 3. 山西石楼二郎坡、桃花庄 4. 陕西宝鸡竹园沟、纸头坊、石鼓山 5. 山西闻喜上郭 6. 山西曲沃晋侯墓地 7. 湖北随县熊家老湾、叶家山 8. 湖北京山 9. 安徽枞阳七井 10. 江苏丹阳司徒 11. 郑州商城 12. 殷墟 13. 周原 14. 丰镐 15. 曲沃

分布的差异，说明这种特殊的青铜礼器可能最早出现在商代晚期的北方草原地带，西周时期逐渐传播至晋南、关中、豫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

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青铜礼乐文化对北方草原民族青铜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同时期北方草原民族青铜文化对中原地区商周青铜文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殷墟出土的铃首、马首、羊首和牛首刀，其刀身形制具有商文化铜刀的特点，而柄首铸成铃形或兽首状[34]，与典型的商代晚期铜刀削既有诸多相似之处，又存在明显区别。商周时期，我国北方及西北草原地带少数民族方国部落林立，如工方、土方、鬼方、羌方、猃狁等，从目前出土的北方青铜器来看，当时这些草原民族的青铜铸造技术和工艺水平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辽宁义县花尔楼、山西保德林遮峪、山西石楼桃花庄、二郎坡、陕西宝鸡竹园沟、石鼓山等地出土的悬铃俎形器、悬铃觚、悬铃豆、悬铃簋、悬铃簠等，应该是北方草原文化的铜铃与中原商周文化青铜礼器融合而形成的混合型青铜器。

山西保德林遮峪发现的悬铃豆为墓葬随葬品，虽然发现时墓葬已被严重破坏，形制不详，但出土铜器组合铜鼎 2、瓿 2、提梁卣 1、豆 2、铃首剑 1、斧 2、车軎 2、舆栏饰 4、双球铃 2、单球铃 2、车铃 1、马铃 1、铜泡 3、管状器 1、钩形器、赤金弓形饰等，品类复杂，独具风格，兼具晚商文化和当地文化因素，应是两种文化融合的产物[35]，墓主人应该是深受中原晚商青铜文化影响的草原民族贵族。強国位于今天的陕西宝鸡地区，可能属于羌氏的一支，自商末周初开始与周人为邻，诸戎环伺，且与夌、夨、井等姬姓诸侯国保持密切的姻亲关系[36]。2012～2013 年发现并发掘的石鼓山西周墓出土的大量铜器、铭文及高领袋足陶鬲，说明这处墓地很可能是西周早期非姬姓的姜戎族“户”氏家族墓地[37]。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山西保德林遮峪墓葬发现的悬铃铜觚、陕西宝鸡強国墓地出土的悬铃方座簋及石鼓山（M4）出土的悬铃铜簠等，应该是北方及西北草原戎狄民族吸收借鉴商周青铜文化产生的混合型青铜礼器，其铸造虽然很可能是商周王室控制下的铸造作坊完成的，但铸造过程应该有草原戎狄民族成员或熟悉草原民族文化的工匠参与。

尽管如此，部分悬铃铜器仍不排除属于生活在北方地区受草原游牧民族文化影响的商周王朝贵族的可能性，如石楼桃花庄悬铃铜觚，该觚为一处带腰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式墓葬随葬品，墓中随葬青铜器组合为鼎 2、甗 1、簋 1、觚 2、爵 1、斝 1、提梁卣 1、壶 1、瓿 1、盘 2、觥 1、斗 1[38]，墓葬形制与器物组合与中原晚商文化墓葬基本一致，墓主人很可能是殷商贵族。

悬铃风格在草原文化出现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反过来影响中原商周文化青铜器。传世文献记载，周初分封，鲁、卫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39]，唯独封于晋南地区的晋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40]，“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41]，由此可知晋国数代君王常与戎狄之人周旋，晋侯墓地出土的悬铃方座簋、悬铃方座筒形器，以及闻喜上郭村出土的悬铃铜盘，应受戎狄文化影响。

瞿与周在商代同为商王朝方国之一，其最初的地望可能在今天的晋南、豫西北地

区，西周早期迁至今天的南阳盆地一带[42]，2012 年 4 月河南南阳夏饷铺西周晚期噩国贵族墓地的发现及带“噩伯”“噩侯”“噩侯夫人”铭文铜器的出土[43]，说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噩国仍然存在于南阳地区，据此可以推断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噩叔簋，可能是商末周初的噩国受北方草原戎狄部落文化影响而铸造的混合型青铜器。

曾国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至西周早期，其疆域范围，根据出土铜器位置分析，大体集中在今天的漳河上游、滚水中上游、涢水中上游及其支流地区，该区域位于随枣走廊，北邻南阳盆地，是连接周文化中心区域和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地理通道[44]。目前发现的西周时期铜器铭文中曾、噩多次并列出现，如：

中甗[45]：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设居，在曾。……余令汝使大小邦，……中省自方、邓、洀、口邦。在噩师次，…… —《集成释文》949

静方鼎[46]：王在成周大室，命静曰：俾汝口司在曾、噩师……

说明二者彼此为邻，曾国铜器中发现的悬铃铜器，很可能是西周晚期受南阳盆地鄂国青铜文化影响产生的。京山西北台铜器是否属于曾国铜器，目前虽然尚存争议，但从铜器特征分析，西周晚期曾国与西北台铜器所属族群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并对其发生过影响[47]，悬铃提梁方卣很可能就是在这种交流与影响的产物。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兽面纹悬铃簋、悬铃豆，台北故宫收藏的两件悬铃觚，瑞士 Museum Rietberg 收藏的悬铃觯，及陈梦家《美劫》收录的悬铃方座簋，因出土地点不详，其族属及铸造背景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悬铃的功能

关于悬铃的功能，目前学界存在一定争议。依据现有资料可知，悬铃铜器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目前所知悬铃铜器，均为盛器，其中盛酒器包括觚、尊、提梁方卣、方座筒形器、彝、罍、觯，盛食器包括簋、豆、盘、俎形器，这些盛器主要用于盛放酒水和食物，多出现在贵族阶层祭祀或宴饮场合，被放置于几案之上，移动频率相对较低。

第二，悬铃均位于铜器下方底座内部，除辽宁出土俎形器外，其余器物正常放置情况下从外侧很难看到器物下方底座内悬挂的铜铃。

第三，底座下方悬铃活动自如，个别器物时至今日只要稍加触碰仍能发出悦耳铃声。

据此，笔者认为，青铜礼器所悬铜铃应该是具有特定功能的装饰品，其功能可能与北方游牧民族车马器中的双球铃、单球铃、车铃、马铃，以及铃首刀、铃首剑、铃首杆头饰（图六）等相似，即在使用过程中发出悦耳的声响，尤其是在庄严肃穆的宗教祭祀仪式上，突然而至的铃声，或被视为祖先神灵对人们祭祀活动的一种回应，从而增加整个仪式的神秘感。



图六　鄂尔多斯出土带铃铜器与铜铃[48]

1. 铃首短剑　2. 铃首杆头饰　3～9. 铜铃

综上所述，悬铃铜器是北方草原民族文化与商周青铜文化相互影响、民族融合的产物，其最早应该出现在商代中晚期北方和西北草原民族地区，或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过渡地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随着征伐战争及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悬铃风格逐渐传播到中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周晚期悬铃风格仍然存在于戎狄环伺的晋国及地处江汉的曾国，春秋时期随着华夏民族与戎狄部落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悬铃铜器逐渐消失。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导师郑州大学张国硕教授、郜向平老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何毓灵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注　释

［1］ a．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b．朱华东．人形器足与悬铃：以晋侯墓地出土青铜筒形器为缘起［J］．文博，2011（4）．

［2］ a．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组．山西石楼县二郎坡出土商周铜器［J］．文物参考资料，1958（1）．

b．同［1］b．

［3］ 谢青山，杨绍舜．山西吕梁县石楼镇又发现铜器［J］．文物，1960（7）．

［4］ a．同［3］．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3：584～587．

［5］ 吴振录．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J］．文物，1972（2）．

［6］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 4 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五〇．

［7］ 陈芳妹．故宫商代青铜礼器图录［M］．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98：236～239，260，261．

[8]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官网：http://webarchives.tnm.jp/imgsearch/show/C0092901.
[9] 孙思贤，邵福玉．辽宁义县发现商周铜器窖藏［J］．文物，1982（2）.
[10] 董新林．魏营子文化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2000（1）.
[11] 镇江市博物馆，丹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阳出土的西周青铜器［J］．文物，1980（8）.
[12]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强国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55～58.
[13] 同［12］：图版Ⅶ，Ⅸ.
[14] 转引自华商网：http://news.hsw.cn/system/2013/12/30/051828315.shtml.
[15]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092～095.
[16] 同［15］：230.
[17] 方国祥．安徽枞阳出土一件青铜方彝［J］．文物，1991（6）.
[18]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73～75.
[19] 同［18］：78～79.
[20] 陈梦家．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A208.
[21] 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M］．东京：吉川弘文馆：觯149.
[22] a．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177.
b．朱华．闻喜上郭村古墓葬试掘［A］．三晋考古（第1辑）［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104～106.
[23] 赵瑞民，韩炳华．晋系青铜器研究［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63.
[2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J］．文物，1994（8）.
[25] 同［22］a：175～177.
[26] 同［25］：178.
[27] 熊学兵．京山县发现一批西周青铜器［J］．江汉考古，1983（1）.
[28] 同［25］：177.
[29] 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331～341.
[30]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J］．考古，1984（12）.
b．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7.
c．苏荣誉，华觉明，李克敏，卢本珊．中国上古金属技术［M］．济南：上冻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50.
[31] a．同［30］b：836.
b．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二三，二四.
[32]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300.
b．同［30］b：325.
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9（1）.
[33]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3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二〇九.

［34］乌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J］．考古学报，1985（2）.
［35］a．同［5］
b．同［4］b.
［36］同［12］：462．
［37］a．石鼓山考古队．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2013（2）.
b．王颢，刘栋，辛怡华 . 石鼓山西周墓葬的初步研究［J］．文物，2013（2）：77～85.
［38］a．同［3］.
b．同［6］：584～587.
［3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1535～1540．
［40］同［39］.
［41］同［39］：1371．
［42］徐少华．鄂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综考［J］．考古与文物，1994（2）.
［43］转引自大河网：http://news.dahe.cn/2012/12-26/101865079.html.
［44］同［29］.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卷一）［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595．
［46］张懋镕．静方鼎小考［J］．文物，1998（5）.
［47］同［25］：4．
［48］鄂尔多斯博物馆．鄂尔多斯青铜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The ritual bronze hanging bell in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Sun Ming

Abstract: The hanging bell ritual bronze is the product of cultural fusion of grassland culture and Shang and Zhou bronze cultures. It first appeared in the later Shang Dynasty in Northern grassland tribes.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in a context of conquest and warfare combined with mass migration of people, bronzes spread to the downstream area of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Yangtze River.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thnic integration, and this special bronze ritual gradually disappeared.

Key words: Hanging bell ritual bronz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Grassland tribes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秦代城址及相关问题

王晓琨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北京，1008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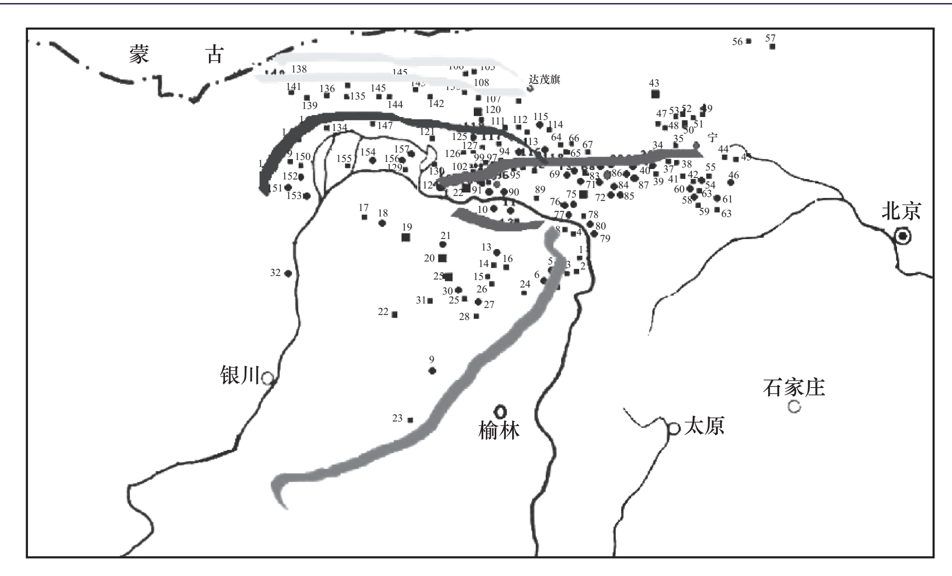
战国晚期，在掀起统一高潮前夕，秦国占据了今鄂尔多斯高原东北部，后相继得赵国所设九原、云中、雁门、代等郡县，秦国的北方疆域扩展到了黄河北岸、阴山南麓一带，占领了今天内蒙古乌加河以南包括鄂尔多斯高原在内的广大地区。此后，以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为桥头堡，向东、向南相继攻灭燕国、赵国、齐国等，进而完成对全国的统一。

公元前 215 年，秦朝大将蒙恬率领秦军，攻占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次年（前 214 年），秦朝沿黄河天险设置障塞，巩固和加强河套地区的防卫。为了阻止匈奴南下，秦朝征发劳工，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东部），利用地形地势修筑长城，绵延万余里，即著名的万里长城。

公元前 212 年，秦始皇又命令蒙恬修筑从秦朝都城咸阳通向九原郡的直道，全长 1800 里，成为连接关中平原与鄂尔多斯高原的交通要道，也加强了这一地区与是秦朝中心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近年，随着对这一区域的田野考古调查及发掘的不断深入，我们对这一地区的秦始皇长城、城址及墓葬的某些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

一、秦始皇长城及直道

对秦始皇长城的研究素来是社会各界关注热点，尤其是其与秦昭王长城、赵国和燕国长城等的关系等问题，使得学界多有争论。目前，段清波、于春雷等研究者通过对常见的布纹瓦的摩挲思考，对陕西、甘肃等地区的战国秦长城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1]，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战国秦长城及秦始皇长城遗迹走向也基本查清（图一）[2]，秦始皇长城在内蒙古中南部的分布如下：乌海市卓子山山岭西侧有一段长城遗迹，可能是秦始皇时期修筑的。由乌海市过黄河向北，浩瀚的乌兰布和沙漠中难觅长城遗迹，而始见于乌拉特中旗石兰计山口北面，向东蜿蜒在狼山、查石太山上，于部北乡南境进入乌拉特前旗小佘太乡北境，继续沿查石太山顶北侧向东延伸，经苏计沟、灰腾沟、板申图沟后，复入乌拉特中旗部北乡梁五沟林场，再东行约 2 千米东南折入固阳县西斗铺镇。秦长城在乌拉特中旗段全长 190 千米，乌拉特前旗段约 25 千米。



图一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秦汉长城示意图，黑色曲线代表秦始皇长城

秦长城遗迹大体经固阳县中部向东伸延，全长约 90 千米，经大庙乡陈家村南坡向东伸入武川县哈拉门独乡，大体东行经哈拉合少乡、纳令沟乡、蘑菇窑乡，在大青山乡什尔登村折向东南行，翻越大青山顶伸向南麓，经大兴有村、白彦山村、魏家窑村、崞县窑子村，至冯家窑村南进入呼和浩特市郊区毫沁营乡境内，武川县段秦长城遗迹全长约 95 千米。在呼和浩特北郊，秦长城沿大青山南坡向东南方延伸，至坡根底村与赵长城相交，继续东行，证明秦修缮沿用了部分赵长城。后经东干丈村进入卓资县旗下营，沿大黑河北面山地向东蜿蜒，至三道营乡蒙古营村后的大黑山顶，沿南坡山脊下行，穿越大黑河谷，大致经保安乡等，自羊圈乡大苏计一带进入丰镇市境内。秦长城遗迹自丰镇麻迷图乡伸入察右前旗老圈沟乡察汗贲贲村西，东行呼和乌素乡黑沟村南，直至口子村中断。

另外，秦长城在兴和县高庙子乡南境有一段遗迹。自呼和浩特市北郊至兴和县境，仅可见到局部秦长城遗迹，主要因为这一地段多为东西横亘的大山区，可以作为天然屏障，与《史记》秦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因边山险，堑溪谷谷，可缮者治之”，即利用一些陡险的山势，只在坡缓地带修筑墙体的记载相符。秦长城自兴和县高庙子乡进入河北省境内。

秦长城经武川县西南入呼和浩特市区北郊，东南方伸延进入卓资县旗下呼和浩特平原及以南的山区丘陵地带属云中郡。今秦长城遗迹以南的呼和浩特市区、土默特左托克托县、清水河县、和林格尔县及武川县西南部等都属于秦云中郡管辖之下。自云中郡北可越阴山进入北，南可渡黄河接近中原心腹之地，自古为中原政权北方民族政权必争之地。

公元前 212 年，秦始皇为巡视北边防务，命令蒙恬负责修筑从秦朝都城咸阳通向九原郡的直道，直道由云阳（今陕西淳化县北梁武帝村）向北，通抵九原郡九原县（今内

蒙古包头麻池古城北城），全长900千米，成为连接关中平原与鄂尔多斯高原的交通要道，也是当时由秦朝统治中心咸阳地区到达边塞九原郡一带最为接近的道路，加强了秦代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同各地区尤其是秦朝中心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直道的具体走向，"由陕西淳化县北梁武帝村秦林光宫遗址北行，至子午岭上，循主脉北行，直到定边县南，再由此东北行，进入鄂尔多斯草原，过乌审旗北，经东胜县西南，在昭君坟附近渡过黄河，到达包头市西南秦九原郡治所[3]"。即直道于今陕西定边县东北行进入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纵贯乌审旗、伊金霍洛旗，经东胜区西南的漫赖乡进入达拉特旗，在黄河南岸昭君坟附近过黄河，到达秦九原郡治所今包头麻池为终点。在今东胜市西南45千米漫赖乡二顷半村南，有一段百米左右清晰可辨的直道遗迹，路基残宽约22米，断面暴露明显，现高1～1.5米，为当地红沙岩土所筑，其规模可见一斑。

据调查，在伊金霍洛旗红庆河附近、东胜市漫赖乡城梁村及达拉特旗昭君坟附近一线，南北长约200千米道遗迹旁，目前发现有古城遗址、墓葬和陶片、瓦等遗物，说明直道两侧，曾有大规模的城镇和大量的居民。1998年，笔者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城梁段秦直道遗迹进行发掘解剖时，了解到路基宽约16米，修筑过程首先是底部以黑土填实找平，上部再以黏度较大的红土掺以砂石夯实，经过发掘道路旁侧的高台建筑基址，得知该基址并非前人认为的汉代古城遗址[4]，而是一座秦代的砖瓦窑址[5]。

二、相关城址考证

秦朝建立以后，进一步完善商鞅始行的郡县制度，分全国为36郡，普遍推行郡县制。秦郡守、尉、监等官职，据《史记·集解》引《汉书·百官表》34郡守掌一郡行政军事，有丞辅助；尉掌兵权，佐助郡守处理军务；监代表朝廷，监察一郡事务。秦在各郡下设若干县。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秦占据河南地后，于阴山以南黄河沿岸筑设44（一说34）座县城，迁入人口，从事生产，同时防边。秦朝36郡中的北地郡、上郡、九原郡、云中郡、雁门郡、代郡等管辖内蒙古中南部的河套地区。

北地郡，战国秦征服相邻的西戎义渠以后设置，秦朝保留建置，辖地因蒙恬开拓疆土至阴山而有所北扩，鄂尔多斯高原西南部包括内蒙古鄂托克前旗、鄂托克旗、乌海市等地大致在北地郡统辖范围内。

有学者认为今乌海新地古城始建于秦代，是临黄河所筑44座县城之一[6]。但经过我们的类型学分析发现，该城年代偏晚，属于秦汉时期的晚期城址[7]。并且在城外侧西北300米处发现墓葬群。1989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乌海市文物工作站发掘了其中的24座[8]。发掘者将墓葬分为早晚两段，早段属西汉中期，大致相当于汉武帝～宣帝时期，流行竖穴直洞室墓；晚段属西汉晚期，相当于宣帝到王莽前，流行直洞式木椁墓。综合城址的分期和城周的墓葬分析，新地城址始建于汉代，而非秦代。

上郡，战国魏置，秦惠文王时，魏献上郡 15 县于秦，秦沿用魏国上郡的建置。秦时上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县东南）。辖区包括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东部乌审旗、伊金霍洛旗、东胜及准格尔旗等地，西与北地郡为邻。

1975 年，在今准格尔旗乌日图沟门城址（即瓦尔吐沟古城[9]）附近发掘的 14 座墓葬，随葬品具有典型秦文化特征，出土有 3 件刻画“广衍”字样的陶壶。鉴于城址被严重破坏，只残留东墙、北墙的一部分，我们推定该城为秦代上郡所属广衍县故城。

广衍县故城位于准格尔旗乌日图高勒乡乌日图沟门村西约 1 千米（图二）。乌日图沟注入脖牛川南岸的一级台地上，台地距现今河床 30 余米，东北依山，西北临两沟，东南为碾房渠环抱，依山傍水，形势险要。



图二　乌日图沟门城址航拍图

城址大部分已被脖牛川冲毁，在地面上平面布局不清，仅残存东墙和北墙残段。东墙残长 390 米，北墙残长 87 米。城墙夯筑，基宽 6.7 米，残高 1.6 米，夯层厚 10～15 厘米。城内暴露建筑基址，文化层厚约 2 米。断崖上暴露有坩埚，铜、铁渣，泥、石范，铜器及陶瓦片等。采集有圆瓦当、半瓦当，铜削、镞、带钩、带扣，泥、石范及“半两”“五铢”“大泉五十”铜钱等。周围有同时代的墓葬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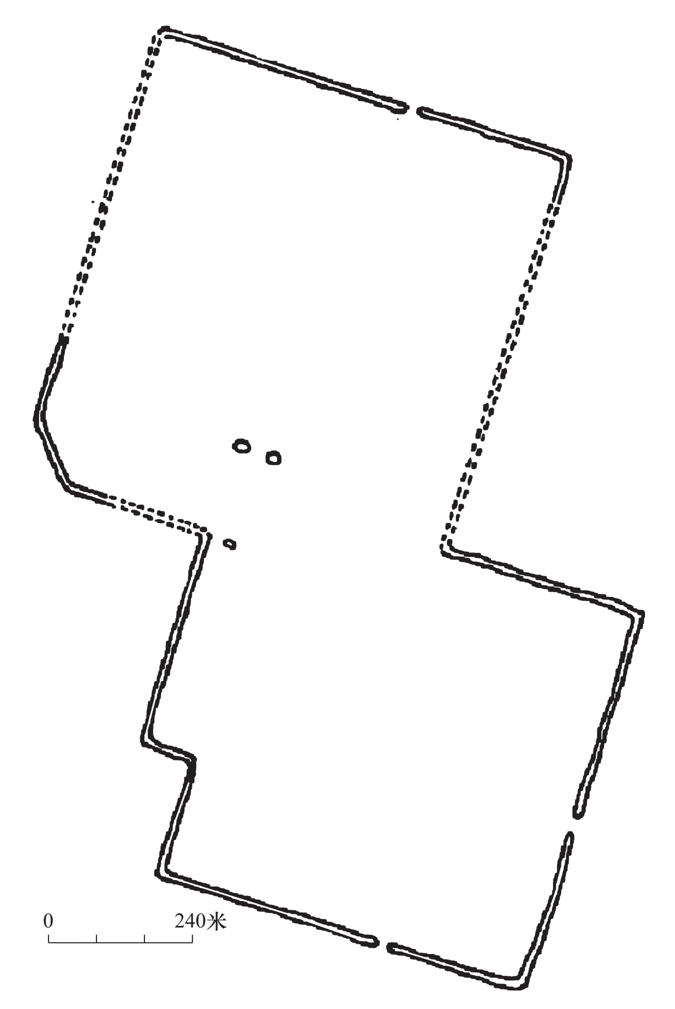
九原郡，最早战国赵营建九原城，秦败赵国后，占据九原，郡治在今包头市郊的麻池古城（图三、图四）。

秦九原郡辖区北部止于长城，南界至于黄河，与北地郡、上郡相接，大致今黄河以北的磴口县、杭锦后旗、临河市、五原县、乌拉特前旗、包头市区、固阳县南部及黄河以南的杭锦旗、达拉特旗等地。九原郡是北上漠北、南下关中的战略交通枢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云中郡，战国赵占据林胡、楼烦地后置郡，秦灭赵，承赵国建置，治所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图五、图六），西邻九原郡、上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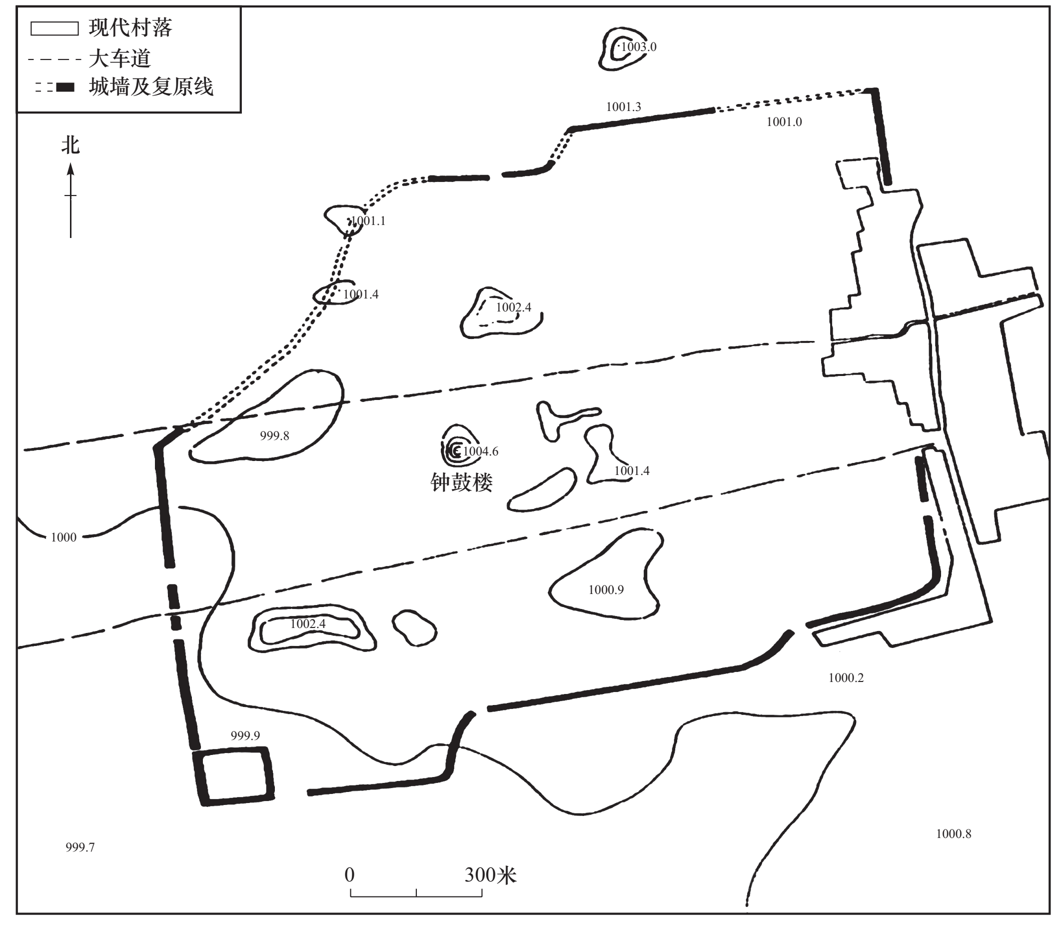
图三　麻池古城航拍图及平面图



图四　麻池古城航拍图及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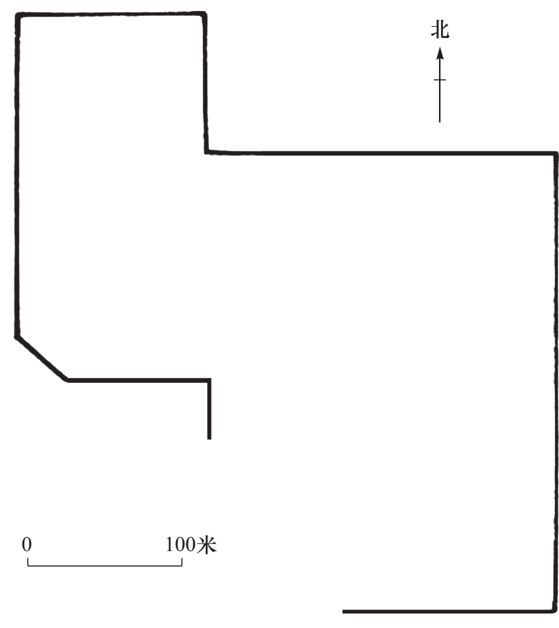


图五　古城村古城航拍图及平面图



图六　古城村古城航拍图及平面图

今托克托县哈拉板申西古城（图七），城址西北角均向外凸出，整体形状不规则，这些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早期城址的特点；并且在城内采集有折口罐、折口盆等秦代残片，因此推测该城是蒙恬临河筑的 44 座县城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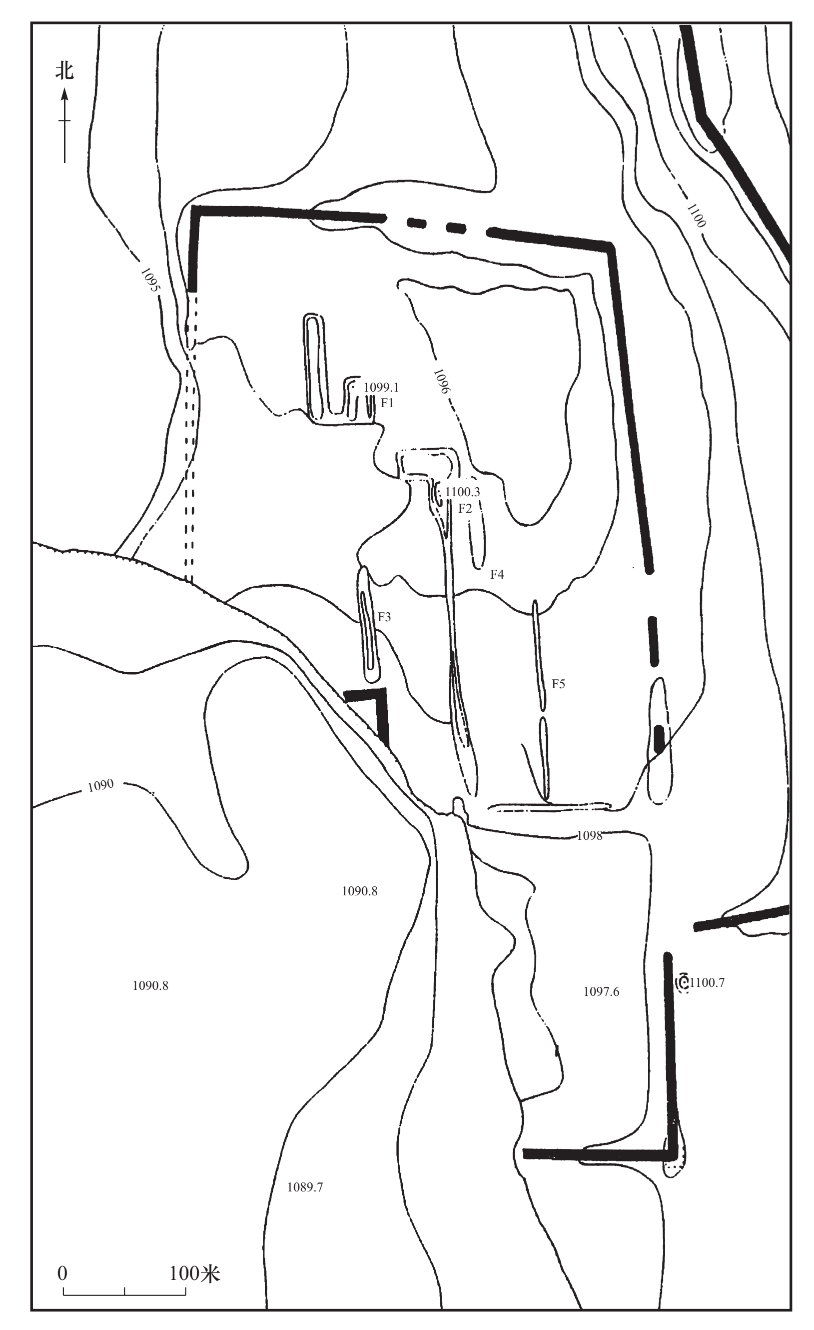


图七　哈拉板申西城址平面图

另外，值得重视的还有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城址。该城位于和林格尔县土城子乡西窑村东 50 米（图八、图九）。1960～2002 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等单位对该古城先后进行了六次发掘[10]，获得多批有重要价值的考古资料，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为数不多的经过系统考古发掘的城址之一。



图八　土城子城址航拍图及平面图



图九 土城子城址航拍图及平面图

古城北临土默特平原，南侧是东西走向的摩天岭，东西两侧是山地丘陵，西南有宝贝河自东南向西北流入大黑河，古城北经呼和浩特通过蜈蚣坝（白道）与漠北相连，南经杀虎口可达大同，东经蛮汗山可达凉城岱海地区，古城位于连接大漠与中原的要冲地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城平面呈不规则多边形，南北长 2290 米，东西宽 1450 米。

东北西南三面城墙中部设有城门，外置瓮城。古城内有两道东西向横墙，将城址分为区、北区和中区三个部分。南区包括南墙、东墙南段与连接南北两区之间的一条横墙，南北长 550 米，东西 520 米，系战国至魏晋时期的遗存；北区为唐代遗存；中区位于南区的西北部，文化堆积最深有 10 米，文化内涵战国至辽金元时期的遗物。古城周围有墓群。[11]

1997 年以后的四次发掘中，发掘者将南城编号Ⅳ区，“地层堆积较为简单，分四层，1 层为耕土层，2～3 层为汉代文化层，4 层为战国文化层”[12]。由于南城城墙的解剖资料，还未公布，因此，我们对城址的建筑年代还不能确定，但从发布的不甚完整的消息看，似乎暗含着城址始建于战国这样的信息。

雁门郡，秦沿袭战国赵建置，治所在善无（今山右玉南）。秦长城遗迹经卓资县中部、丰镇市西北、右前旗南部，雁门郡辖境除有山西北部外，还包括凉城县、丰镇市及卓资县、察右前旗南部。雁郡西毗云中郡，是北入漠北的交通孔道之一。

代郡，秦沿袭战国赵建置，西接雁门郡地，治所代县（今河北蔚县东北）。今兴和县高庙子乡境有一段秦长城遗迹，表明兴和县南部曾归属代郡。

三、墓葬及相关问题

内蒙古中南部的秦代墓葬数量不多，在准格尔旗乌日图沟门（即瓦尔吐沟）古城周边[13]、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周边[14]、黄河南岸的包头、托克托县等地有少量发现[15]。

1975 年，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在准格尔旗瓦尔吐沟广衍古城附近发掘的 14 座秦墓，其中 10 座为屈肢葬，随葬品有小口陶瓮、罐形陶釜、双耳铜釜，以及罐、壶、甑、盒等陶器，与关中地区的秦墓的基本特征相同。发掘者将这批墓葬材料分为五期，其中第二期的组合为：瓮、釜、盒、壶、环底夹砂罐等，判断该时期为秦代，同时在铜戈及同时出土的矛和铜壶上，发现刻划有“广衍”二字的陶壶，因此发掘者认为该城可能始设于是秦代、汉代沿用，是秦代广衍县故城。广衍故城东部，大小城之间，有一片手工业区，从遗物看，可能是铸造兵器的作坊。

1997 年至 2006 年，为了配合国家基本建设，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和林格尔古城附近的墓葬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一批秦国的墓葬。目前考古发掘报告正在整理，仅有少量资料见诸报道。陈永志、李强、刘刚发表短文[16]，简要介绍了土城子城址周围墓葬发掘情况。

和林格尔古城周围的秦式墓葬多为竖穴土坑墓，有东西向、南北向两种，仰身屈肢、侧身屈肢为其主要葬式。大部分墓葬的尸骨保存较差，随葬品有带钩、蒜口壶等。如二区的 M518，墓向 95°，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口大底小呈斗状，口长 5.7 米，宽 2.7 米，墓底长 5.3 米，宽 1.9 米，墓深 4.5 米。棺、椁呈长方形，椁长 1.9 米，宽 1.4 米，厚 0.1 米。棺长 4.3 米，宽 0.6～0.8 米。骨骼腐蚀严重，葬式不清。随葬有陶盆、陶壶、

铜带钩、铜钱等。

此外，还发现带有环壕的墓葬，出土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铁器、玉器、骨器、铜钱以及木器等。陶器常见有陶罐、陶钵，仿青铜礼器的鼎、豆、壶、盘、博等。铜器主要有带钩、铜环、铜剑、铜戈、铜礦等。铁器有铁剑、铁带钩等。如二区的 M1394，墓向 100°，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外有环壕。墓葬口大底小呈斗状，墓壁较为光滑平整，墓口长 3.8 米，宽 2.6 米，墓底长 3.2 米，宽 2.2 米，墓深 4.9 米。有木棺，长 2.4 米，宽 1.4 米，残高 0.8 米，厚 0.1 米，人骨保存较差，葬式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放在人骨头部，有陶鼎、带盖陶壶、铜带钩、带盖陶豆等。环壕平面呈方形，长 15 米，宽 2.5 米，壁呈斜坡状，底长 13.5 木，宽 1.5 米。

另外在环壕内侧发现两具陪葬的尸骨。这种带环壕的墓葬，发掘者将其时代定在战国时期，无疑是正确的，但却未将其归到秦式墓葬内，其实，这种带环壕的墓葬是典型的秦人的墓葬，学界对此类墓葬又称为“方形周沟墓”，这在陕西凤翔秦公大墓[17]、临潼秦始皇陵[18]等几乎所有秦公、秦王等大墓都有围壕。

秦人小墓至少在战国时期亦流行围墓沟的风尚，早在 1959 年在山西侯马乔村就有发现，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乔村又发掘了数十座这种带围墓沟的小墓（图一〇），随葬品很少，沟内却或有殉人，时代为战国末至汉初[19]。根据俞伟超先生的研究，这种对于方形的围墓沟墓葬的特点是[20]：

① 墓的周围，有一圈围墓沟。围墓沟或作方形，或作圆形。

② 沟内或为一个墓葬，或为一群墓葬，有的则是中心有一主墓，主墓的旁边和围墓沟中，还埋有附葬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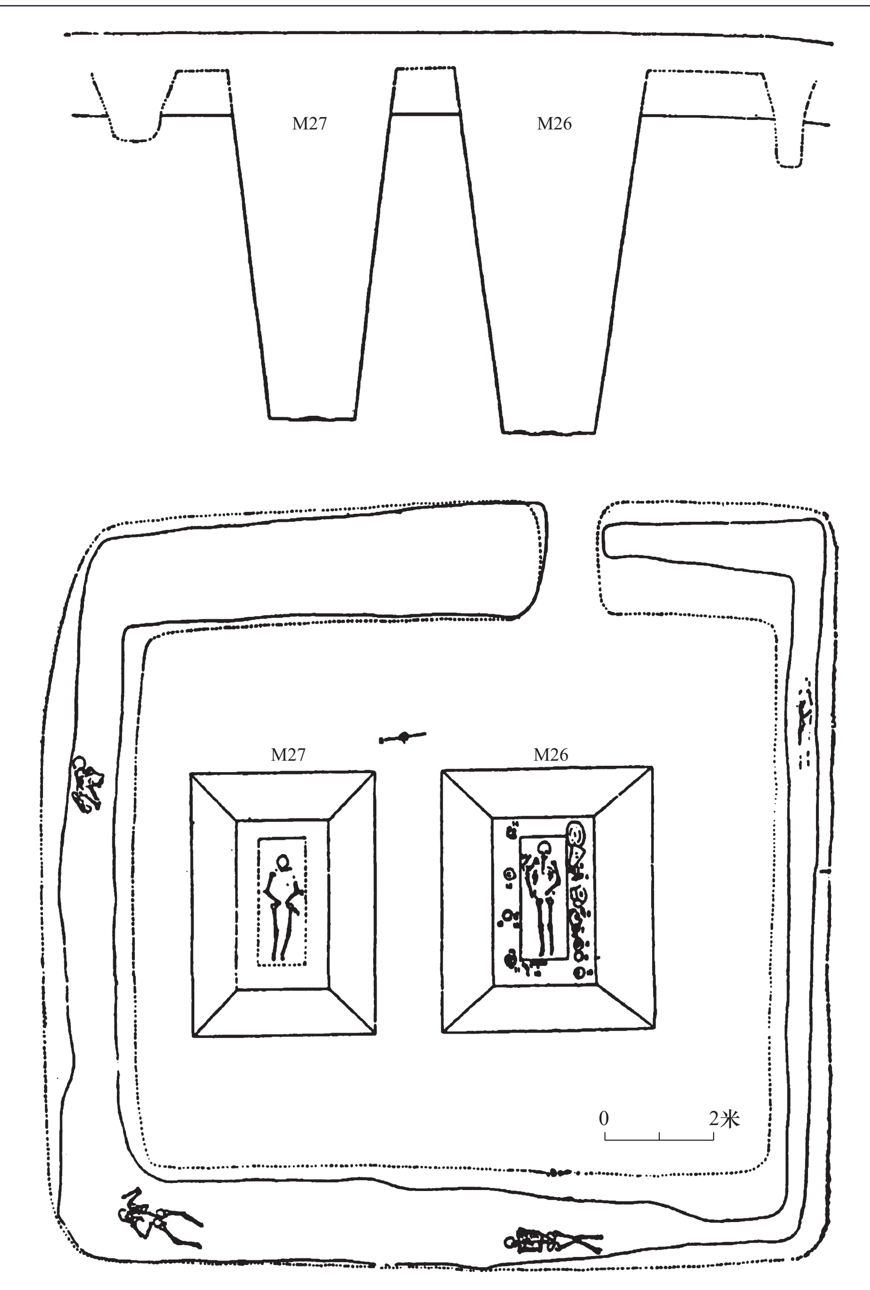
③ 墓葬多为土圹的，但也有作成石室的，有不少则是瓮棺葬。

④ 沟内或有低矮的坟丘，据推测，是使用挖围墓沟的土堆筑而成。沟内之墓往往是在坟丘顶部开挖出土圹而形成的。

⑤ 除瓮棺葬外，主墓用木棺，附葬之墓也常有木棺。主墓皆有随葬品，附葬之墓也常有随葬品。在围墓沟的内外，或有柱穴等建筑物遗迹，有时还有埋藏物品的小坑，约为祭祀遗迹。

史载西周衰败平王东迁时，大批西戎之族随之移入中原，屈肢葬、封土墓（即坟丘墓）的风俗同时在中原兴起。因此，西北地区青铜时代的坟丘墓，可能就是春秋以后中原地区封土墓的源头。发达起来的秦人，尽管其起源有东、西两说（最新的报道表明秦人来自东方[21]），但总是发迹于西北，秦人长期以围墓沟为其葬俗的传统，内含有相当的西北羌戎文化的因素。

公元前 234 年，秦大举攻赵，将取得的赵地，设置为雁门郡和云中郡，还派桓齮进攻赵的平阳、武城，大败赵军，斩杀赵将，斩首十万。秦将李信从云中出兵攻赵[22]，说明秦在战国末期进入了九原、云中地区，并以此为基地，继续向东扩张地盘，并经此攻灭燕国。



图一〇　山西侯马乔村 M26、M27 平、剖面图

因此，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具有围壕的秦人墓葬，应当是战国晚期以后的遗存。

在城址周围的这批墓葬中，还有一座墓打破了 M1394 墓葬的环壕。该墓[23]为土坑竖穴墓，近南北向，有木棺。尸骨保存的较差，葬式为侧身屈肢葬。随葬品 15 件，计有带盖陶鼎、豆、壶 2 套，此外还有陶豆、带盖小壶、西、陶盘各 2 件，鸟柱盘和罐各 1 件。该墓出土陶器为泥质灰陶或灰褐陶，器物上遍饰彩绘是其特点。这组陶器组合

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鸟柱盘的出现，这种器物在邯郸、邢台地区战国时期的墓葬中有大量发现[24]。这件鸟柱盘为泥质灰陶，盘中有圆立柱，柱上立一高于盘口的鸟，柱和鸟均为手制，制作粗糙。器物整体先涂一层黑底色，盘沿饰白彩，内侧饰两周白彩点，其间夹一周红彩横道，再饰白彩一周、红彩一周及红白彩点，盘外侧饰一周白圆圈套红圆圈彩绘。鸟从嘴到尾饰一白彩道，将鸟一分为二，两侧饰红白彩点羽毛。

以上的现象恰恰反映了战国末期到秦代统一的历史事实。秦朝建立后，并未在文化传统上立即统一诸国。政治上的演变往往有明确的界标，而观念的变迁却没有清晰的标志。和林格尔地区长期受赵国的统治，因此在赵国灭亡后，当地人随葬品的组合在一段时间内依然延续了赵国的传统，但是也不可避免受到了秦人的些许影响，如侧身屈肢葬的葬式，就明显有秦人的文化因素。中国各地墓葬文化内涵渐趋统一，是在汉朝完成的。正如有学者所言，“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观念上结束战国是在汉代”。[25]

注　释

［1］ a．段清波，于春雷．陕西战国秦长城调查与研究［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2（3）.
b．段清波，于春雷．布纹瓦及在秦地的传播—来自陕西早期长城沿线的观察［J］．考古与文物，2013（3）.
c．张多勇．战国秦长城的研究进展和尚待解决的问题［J］．华夏考古，2013（1）.
［2］ a．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1）.
b．王晓琨．秦汉时期河套古代城址的历史观察．草原文物［J］，2012（2）.
［3］ 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J］．文物，1975（10）.
［4］ 史念海．秦直道遗迹的探索［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5（3）.
［5］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文物管理所．东胜城梁段秦直道遗址发掘简报［A］．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三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6］ 张久和．秦朝对古代内蒙古地区的统治和开发［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3）.
［7］ 王晓琨．战国至秦汉时期河套地区古代城址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38.
［8］ 魏坚．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9］ 李逸友．论内蒙古文物考古［A］．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12.
［10］a．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县土城子试掘纪要［J］．文物，1961（9）.
b．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发掘报告［A］．考古学集刊第 6 期［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c．李强．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出土的战国、汉代瓦当［A］．内蒙古出土瓦当［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d．陈永志．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国家基本建设文物考古研究工作的主要收获［A］．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三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e．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考古发掘主要收获［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1）.

［11］张郁．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试掘纪要［J］．文物，1961（9）．
［12］同［10］e．
［13］崔睿．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J］．考古，1977（5）．
［14］同［10］e．
［15］同［9］：16．
［16］陈永志，李强，刘刚．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考古发掘主要收获［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1）．
［17］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J］．文物，1983（7）．
［18］a．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东陵一号陵园勘查记［J］．考古与文物，1989（4）．
b．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东陵第四号陵园调查钻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3（3）．
［19］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东周殉人墓［J］．文物，1960（8，9）．
［20］俞伟超．方形周沟墓与秦文化的关系［J］．中国历史文物，1993（2）．
［21］报道的题目：五单位联合考古十年发现最早秦人墓葬，证实秦人来自东方，报道依据在李家崖早期秦人墓葬中未见腰坑殉狗的习俗，推断秦人源自东方的商文化．详见中国文物报［N］．2014-12-3．
［22］张清常，王延栋．战国策笺注．燕策三［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燕太子丹质于秦条．另见《史记》刺客列传第二十六，太子避席顿首曰：……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王翦将数十万之众距漳，邺，而李信出太原，云中．赵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则祸至燕．
［23］该墓葬的情况转引自顾玉才．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土城子遗址战国时期人骨研究［D］．吉林大学，2007．
［24］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墓［J］．考古，1962（12）．
［25］胡宝国．《史记》《汉书》籍贯书法与区域观念变动［A］．古史文存（秦汉魏晋南北朝卷）［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80．

City sites of Qin Dynasty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Regions of Inner Mongolia

Wang Xiaokun

Abstract: Since there were not many important Qin Dynasty tombs and cities to be found in the past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regions of Inner Mongolia, and therefore it did not attract enough attention to academics. We found that Qin people started to build cities since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and many tombs of Qin style discovered at Helinger Tuchengzi city were good examples. Then that is proven Tuchengzi city walls probably date to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or Qin. Most of the Great Wall was newly built by the Qin Dynasty except for some borrowed from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Zhao Kingdom. Combined with our typology and city estimations

and we correct some of the past misunderstandings. In short, the end of the Warring States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regions of Inner Mongolia was politically Qin Dynasty; however the concepts of city building and burial customs found at the end of the Warring States continued until the Han Dynasty.

Key words: site; central and southern regions of Inner Mongolia; Qin dynasty; Tuchengzi city site; Typology

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结构中的西域

郑君雷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州，510275）

关于考古学上汉文化的内涵（或者说学术内容），俞伟超[1]、刘庆柱[2]等先生有过深富启发的论述，但是应该说还有很大的思考空间。具体到西汉边远地区的汉文化，我们认为可以从“文化”的本质[3]出发，放在“统一”的维度上来考量[4]。葛剑雄先生说，“统一的主要标准应当是政治上的服从和一致，而不能仅仅根据制度上的相似和文化上的类同”[5]。因此，“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结构”中的“西域”是指西域都护管辖下的诸小国，也就是谷苞先生从政治地理角度解读的狭义西域[6]，所谓“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7]的范围。

一

“西汉边远地区”是一个需要在学术层面进行界定的概念。“边疆无疑是国家内部的边缘区域，与国家的中心或中枢相对存在，这个‘边缘区域’具有多重层次的内容，比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地理的，这些层次的边缘区域或彼此重合，或相互背离，边疆的概念因此显得丰富而又复杂”[8]。我们界定“西汉边远地区”的标准，应当不仅考虑地理边疆的属性，同时也应该考虑社会、文化、族群、经济等层面的边疆特征，以及考古学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的差异性。

考古学者将关中和广义的中原地区视为考古学上的中心文化区，我们将此中心文化区宽泛地称为“中原”。中原以外的其他地区，均在不同层面上程度不同地表现出边远地区的面相，但是以西北朝鲜、辽西辽东、内蒙古中南部、河西河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岭南、东南沿海、西域等地区的边疆特征最显著。中原与边远地区之间还有一些表现出过渡性状的区域，如京津唐、陕北等地区，尤其以长江中游的鄂、湘、赣连片而成为一个大板块。可以理解为在“亚”“次”“准”这类概念上限定的边远地区，属于中原与边远地区之间的过渡地带。边远地区以远，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以第二松花江中游为中心的夫余、贝加尔湖地区的匈奴、越南北部汉代郡县以外的印度支那半岛等地，汉式文物有许多发现，但是西汉政府未曾行政管辖，可以视为汉文化的波及地带。

西汉边远地区与中原相互对应和相互作用，这两个社会文化区域构成了“环线”和“板块”两类结构，这两类结构层叠环套和迭互链接，累积成一个层次复杂、内涵丰厚的文化构造，我们称为“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环套链接结构”[9]，其内容大致可以作如下概括。

①西北朝鲜、辽西辽东、内蒙古中南部、河西河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岭南、东南沿海八个边远地区依次链接，社会文化和族群结构逐渐变化，最终环绕成为一条西汉帝国的边疆地带。②这条边疆地带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各种层面上与西汉帝国畿内的中心文化区、过渡地带和西汉帝国的外部世界构成同心圆结构。以中原地区为圆心，过渡地带、边远地区和波及地区的汉文化层叠环套，仿佛西周的五服制——自甸服以次社会文化的边疆属性渐次加重。③以上八个边远地区各自拥有宽阔的地域范围、庞大的人口基数、发达的经贸功能和深厚的人文民俗传统，各自构成一个社会文化板块，联结起来作为一个“边远地区整体”的体量和能量更为巨大。④以上八个边远“板块”之间通过“北方长城地带”“藏彝走廊”和“南方珠江地带”等民族走廊或考古学文化带发生文化交流，并且对中原地区和过渡地带发生着双向互动的政治影响和文化回馈。⑤在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欧亚草原、中亚、高地东南亚、南岛语族（文化基因的积淀）等域外文化圈也会对边远地区的各个“板块”产生影响。

在此“环套链接结构”中考察西汉诸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过程和类型，西域悬置在这条由八个边远地区构成的西汉帝国边疆地带以外（仅与同属边远地区的河西走廊相联结），在同心圆结构的中也脱离其他边远地区所处的圈层位置，情况较特殊。

二

西汉前期“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10]，“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11]。自武帝建元三年（前 138 年）张骞凿空西域至宣帝神爵二年（前 60 年）设置西域都护，以及元帝初元元年（前 48 年）设置戊己校尉，经过数十年的争夺，西汉政府基本控制了西域。

西汉政府设置行政机构以来，考古学上的汉文化因素已经大规模地渗透进西域。西域诸国“自译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12]，而且境内有很多汉人[13]。但是西汉政府、匈奴和西域诸国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以及西域诸国经济文化形态的各种差异，加之广袤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着西汉政府主要采取控制行政治所、屯戍据点和交通线路的经略方式，尤其是未设置郡县，成为与经略其他边远地区的最大差异。西域地区汉代考古学材料虽然不够系统，但是与其他边远地区比较，至少在两个方面显示出考古学文化面貌的特殊性。

第一，西域并未形成一个整体性的汉文化板块。

西域诸国及其与中原的联系依托几条主要交通线路及其孔线。“从鄯善傍南山北波西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14]，“从玉门关西出……，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15]。西域汉文化因素相对集中地出现在主要交通线沿途的屯戍点和西域诸国的王城附近区域。

西汉政府的行政治所、田官系统下的屯田区和侯官系统下的烽燧障塞是西域汉文化因素最为显著的地区。西域都护治乌垒城（今轮台县），戊己校尉主管屯田事务，初治交河城，后移置高昌壁[16]，屯田区从轮台扩展到鄯善、渠犁、车师甚至锡尔河上游。烽燧障塞线则与河西汉塞隐然呼应，“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17]，“在罗布淖尔北岸以及在焉耆至拜城之间，发现许多大小不等的汉代城垒及烽燧遗址”[18]。不过汉文化只是在楼兰地区有比较集中的“面”上分布。

“楼兰地区在汉通西域之后，完全在汉、魏、晋和前凉政府的控制之下，到魏晋前凉时期又在楼兰城设置西域长史机构。从此楼兰地区汉族居民逐渐占到多数（长史机构官员、驻军、屯田者及一般汉族居民等），汉文化成为当地文化的主体”[19]。土垠遗址是西汉政府在楼兰道上设置的管理机构和中心，“是新疆目前所知唯一单纯的西汉遗址，也是唯一出土西汉木简的遗址”[20]。于志勇先生将 LE 城推定为“伊循城”，认为构筑方法和规制与河西、居延和河套地区汉城相似[21]；将 LE 古城东北、北部以彩绘棺具为主要特征的墓葬推测为汉晋时期楼兰屯戍者军吏的墓葬[22]。城址、墓葬、烽燧障塞和大量汉式文物构成楼兰地区汉文化分布的有机整体。

西汉政府直接控制的屯戍区域以外，南疆地区的汉文化基本沿着串联西域诸国王城的交通线路呈点线状分布，尤其集中在丝路南道。哈密、焉耆、库车、和田、尼雅、若羌等地出有汉文铜印章、汉文简牍、汉代钱币、汉式漆器、中原纸等遗物[23]。北疆是游牧文化区，巴里坤草原和博格达山北麓草原的石结构建筑和石堆墓、伊犁地区“索墩布拉克文化”晚期遗存、昭苏县萨尔霍布草原和木札特草原的土墩墓，一般认为是月氏、匈奴、塞人和乌孙等游牧集团的遗存。虽然奇台、木垒等地出有汉代半两、货泉、五铢等钱币[24]，但是汉文化因素的发现较零散。

西域汉文化的分布态势与西汉其他边远地区汉文化整体性或大部性的覆盖有很大不同。在今天中华民族的分布格局中，“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和商业据点一般都有汉人长期定居。这样汉人就大量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25]。西域汉文化的分布态势与此结构骨架相似。“从汉魏晋前凉西域史来看，其通西域均以敦煌为西进基地，以楼兰道为通西域的主要干道，以楼兰地区和高昌地区为经营西域的桥头堡。敦煌、楼兰、高昌这个铁三角形成鼎足之势，楼兰和高昌地区犹如从敦煌伸出的双臂，呈钳形控制西域腹地”[26]。自敦煌而西，西域汉文化的分布亦表现为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未曾覆盖性地深入腹地而形成一个整体性的汉文化板块。

第二，西域并未形成一个汉文化的地方类型。

考古学上的汉文化在中原地区、过渡地区、边远地区表现出文化内涵的差异性，各自还可以划分出若干地方类型，比如中原地区（广义上的）汉文化可以划分出中原、关中、鲁南苏北等类型，西北朝鲜等八个边远地区亦大致可以各自独立为一个地方类型。这些文化内涵的差别可以理解为汉文化的层次性。

俞伟超先生关于“先秦各国考古学文化的层次性及主体族群文化的核心地位”[27]的论说，对于认识汉文化的地方类型很有启发。我们认为，中原汉文化相当于俞先生所谓的“第一层次”文化，此一层次的汉文化在西汉初年的六七十年间已经形成。过渡地区和边远地区的汉文化则可以理解为俞先生所谓“第二层次”即“各地土著文化与主体文化综合而成的区域性文化”，此类区域性文化的核心，仍然为第一层次的主体族群文化（即中原汉文化，虽然在云贵高原等地表现出很强烈的土著色调），此一层次的汉文化一般是在武帝或者其后得以形成。

汉文化地方类型的划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汉文化的考古学分区，“在秦汉以后历史考古学文化分区中，墓葬（包括葬式和葬俗）的分区占有重要位置”[28]。我们注意到，西域地区的汉晋墓葬整体上并未表现出以汉文化为核心的特征。虽然有汉文化因素的大规模渗透，但是西域当地以独立政权形态或土著民族形态表现出来的文化体系并未整体性地、实质性地被颠覆。

“新疆秦汉时期的聚落往往是在早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9]。汉代吐鲁番盆地的竖穴土坑墓属于春秋以来的当地土著文化传统；兴起于战国的偏洞室墓与竖穴土坑墓长期并存，成为吐鲁番盆地汉代以来墓葬形制的主流；竖穴木椁墓在吐鲁番盆地西部的兴起则与伊犁河流域的塞人迁徙有关[30]。尼雅 N3 南部西汉墓地的陶器“有大口双系罐、折腹圜底钵、侈口圜底钵、单耳罐、单耳带流平底罐、高领带流坠腹罐等，多夹砂黑陶，少夹砂红陶，手制，火候低，制作古朴厚重”[31]。交河沟西、沟北和洋海Ⅲ号墓地（车师）、尼雅遗址（精绝国）、扎滚鲁克墓地（且末国）、山普拉墓地（于阗国）、营盘墓地（墨山国）、和静县察汗乌苏墓地[32]等处材料说明，所谓三十六国（五十五国）的考古学文化在西汉政府掌控西域以后仍然循着土著文化的自身逻辑发展。

西域与欧亚草原和中亚两个域外文化圈的互动也很强烈。和静县察吾呼沟三号墓地的匈奴文化因素[33]，以及吐鲁番交河沟北墓地的铜狼头饰、骨雕鹿首等显示了与欧亚草原的密切联系[34]；新疆各地汉晋丝织物的西亚、罗马工艺图案和营盘墓地 M15[35]希腊化风格的织物则表现出与中亚地区的联系。龚国强先生将塔里木盆地周缘汉晋墓的随葬品划分为本地特色、中原汉文化特色、西方异域（包括印度）文化特色和北方草原文化四组，“属于中原汉文化特色的器物主要有直接来自内地的汉式陶罐、铜镜、五铢、丝绸衣被、漆器、纸片文书等，以及在当地仿制的汉式铁镞、铁刀镰、木几案、木耳杯等”[36]，这组文化因素在随葬器物中并未占据主导地位。

在西汉其他边远地区，内蒙古中南部和河西走廊两个地区的汉文化整体上从中原直

接进入，在与当地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调适中逐渐形成地域特色；其他地区在土著族群逐渐汉化的同时，汉人移民也经历着“在地化”的过程，不同人群集团相互整合而浑然一体，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性汉文化类型。而在西域，西汉政府直接控制区域的汉文化本质上是河西走廊汉文化地方类型的延伸，诸国王城附近的汉文化因素则是在土著文化底层上的“叠加”，很难认为西汉时期的西域存在着一个具有区域文化特征的汉文化地方类型。

三

西域汉文化分布势态和发展进程的特殊性，固然与当地青铜时代以降至早期铁器时代末期的土著文化传统和文化内涵有关，但是更根源于当地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否则就无法解释同样是以土著文化为根基的西北朝鲜、岭南、东南沿海等地区汉文化地方类型得以迅速形成的事实。

西汉政府在边远地区扩张的基础动因在于拓展农业资源以疏解人口压力。王明珂先生指出“华夏认同与中国边界的形成具有生态资源背景”[37]；东汉帝国疆域（行郡县地区）与今天中国大陆汉族主要分布区（少数民族自治区除外）有着惊人重叠，“这显示在汉代，‘汉人’在亚洲大陆已扩张至其生态地理上的边缘”[38]，正仿佛费孝通先生所谓“农业上具备发展机会的地方，汉族几乎大都占有了”[39]。天山以南诸国的农业因素虽然是西汉政府掌控西域的生态资源基础，但是沙漠绿洲脆弱的生态环境限制了农业发展，农业潜力其实有限。

鄯善县苏贝希一号墓地[40]、哈密市寒气沟墓地[41]、和静县察吾乎沟一号墓地[42]和四号墓地[43]等处遗存说明农牧兼营是战国时期西域普遍的经济生活形态。周伟洲先生的统计表明，西域以“田畜”（农牧兼营）为主的城郭国人口多于以畜牧为主的行国[44]，两汉书《西域传》也记载一些行国“颇知田作”，或者“寄田”、“仰谷”（民族志材料说明游牧经济并不排斥农业和粮食）。魏晋时的且末国“（左末城）土地无雨，决水种麦，不知用牛，耒耜而田”[45]，农业生产技术落后。我们认为，汉晋西域的天山以南诸国大致相当于今天“绿洲耕牧”的经济文化类型——在绿洲上依靠人工灌溉系统种植农作物，其农耕生活中普遍夹杂浓厚的畜牧因素[46]，新疆汉晋墓葬中普遍发现的殉牲和皮毛制品可为印证。

更重要的是，西汉帝国经略西域的目的是政治性的，而非经济性的。余太山先生指出，“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记述的出发点从来就不是西域或西域诸国本身，而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文治武功，这决定了“西域传”的性质。……除葱岭以西诸国外，各史“西域传”关心较多的是乌孙、悦般等天山以北，伊犁河、楚河流域的游牧政权。这是因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契机是为战胜塞北游牧政权而寻求与其西方的敌国结盟。这些政权是作为中原王朝的天然盟友受到中原王朝、从而也受到“西域传”编者注

意的”[47]。余先生对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认知和阐述系统的解读，正是西汉政府经略西域历史背景的阐释。

在西汉边远地区的汉文化结构中，敦煌是西域和河西走廊两个边远板块的链接点。“东汉中期西域副校尉就常驻在敦煌，行使着西域都护的职权，后来由敦煌太守兼管西域事务。这种办法后来又为魏晋两朝所沿袭”，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把敦煌划入西域范围是有其历史根据的”[48]。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的战略目的在于“隔绝羌胡”[49]“以断匈奴右臂”[50]，并非着眼于农业生产。《汉书 • 地理志》记载河西四郡的户口数、人口数、辖县数在西汉北方边远地区各个人文地理区域中明显偏低，但是完备的塞防体系、严密的军屯组织和“咸以兵马为务”的社会风尚却成为突出特征。河西四郡的设置对西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河西走廊的社会经济环境与西域汉文化的发展状态是紧密联系为一体的。

西汉政府经略西域的目的性，以及有限的农业潜力以及仅与同属边远地区的河西走廊相联结的两大背景，决定着西域汉文化的发展是渗透性的和渐进性的。经过西汉政府的开拓经略，西汉中晚期辽西辽东、内蒙古中南部、四川盆地、吴越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大致比同内地，西汉晚期西北朝鲜、河西走廊、岭南地区已经被汉文化全面或大部占据，边远地区的韵味只是更多地表现在地理空间层面。属于过渡地带的长江中游地区，东汉时期人口显著增长[51]，社会文化的边疆属性大幅消退。但是对比前后两汉书的记述，西域地区社会文化的变化并不明显。

西汉政府设置行政机构以后，虽然“西域的冶铸水平和生产规模得到了很大的提高”[52]，虽然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由丛葬向夫妻合葬的转变透露出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血缘纽带的松弛），虽然尼雅遗址的丧葬礼俗受到中原礼制的巨大影响[53]，虽然扎滚鲁克第三期墓葬“完全不是本地所产的”漆品、玻璃器、贝饰、丝织品和木耜表明魏晋时期“且末国的商品交换和贸易活动已有了发展”[54]，但是这些墓葬材料反映的西域土著文化的底层和基质并未发生本质性变化。例如尼雅遗址 95MN Ⅰ号墓地（西晋时期[55]）的随葬器物“以具有本地特色的木器为主……并在随葬的木盆中无一例外均放置羊腿（或羊头）……另外男性墓主均随葬弓、箭、箭箙、弓袋等武器，反映出十分明显的狩猎业经济的存在或战事的频繁”[56]；山普拉墓地“木器多为食用器，其出土量约占随葬器物的 25%……，葬具很多是用羊毛制成的……，随葬品中的服装（衣、裤）、鞋、帽、袜、枕头……也是用羊毛织物制成的”[57]。以本地陶器、木器和毛织物为代表的土著文化因素组合在塔里木盆地周缘的东汉晚期至魏晋墓地普遍存在。

从西汉至魏晋，西域社会文化的发展是在土著文化根基上多元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魏晋尉犁营盘遗址群古城、佛寺、烽火台、古代墓群和大面积古代农田组成的文化景观，勾勒出这种文化结构的剪影。汉文化的大规模进入以外，还要注意到佛教传播的深远意义以及察吾呼沟三号墓地显示出来的匈奴文化因素的顽强存在。

四

西域诸国处在分散性的部族政权结构中，城邦小国大抵数百千户，经济文化类型不一，人种来源更复杂[58]。爰及东汉，西域诸国或者役属匈奴，或者更相攻伐、彼此兼并，与中原时绝时通。两汉书是将西域记在四夷传的，两汉政府对西域实施的是羁縻体制。正如西汉政府虽然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但是主要依靠当地王侯君长实行羁縻管理，“这种间接的统治，被认为是在边远地区扩张帝国领土最为有效和最低消耗的方式，反映了汉朝并无参与地区方社会生活的愿望”[59]。

我们认为设置郡县是西汉政府稳固掌控边远地区的标志。“西晋末年，前凉政权占领西域，并正式在高昌地区设置郡县，在县以下设乡、里，与内地实施一体化统治，肇古代中国的中原、大漠南北诸政权局部或全部郡县治理西域之先声”[60]，这又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其后西域汉文化发展的具体历史过程中仍然出现贾敬颜先生所谓“同而未化、融而未合，或半同化、半融合的情形”[61]，比如北朝高昌“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略同华夏。文字亦用华夏，兼用胡书。习读经史书，而皆为胡语。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62]。西域汉文化更宜置放在此“环套链接结构”中边远地区与波及地区的交界位置，而以边远地区的社会文化属性为重。

西域汉文化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延续至其后历史时期的漫长过程，其间甚至有反复，但是不同群体互动所决定出来的汉化方向却是明确的。新疆史前考古学中的西方文化因素影响的断裂性特征和东方文化因素影响的连续性特征[63]，亦适用于汉晋时期的西域。尼雅遗址 95MN Ⅰ号墓地“夫妻合葬、棺椁制度、铭旌制度、‘裁定盖形’的被衾，死者穿戴，头枕鸡鸣，覆面衣，随葬铜镜等诸多习俗与中原地区汉魏以来的丧葬风俗保持一致”[64]，这是中原王朝礼仪制度的影响在器物层面的反映。塔里木盆地周缘汉晋墓地的汉文化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是判断墓葬主人富贵和贫贱等级（以及年代）的重要标准”[65]，表明了西域土著人群集团对中原文化和主流习尚的羡慕和认同，尼雅 95MN Ⅰ号贵族墓地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66]是著名的例子。随着西域汉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丝路畅通，汉文化因素扩展至中亚乃至更远方[67]。

“秦汉帝国的形成”为中国考古学界近十数年来所特别关注。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不但是西汉帝国形成的重要历史内容，而且是西汉帝国形成的重要历史步骤。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建构起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文化结构，在民族融合、文化构造和历史疆域等诸多层面表现出厚重的历史意蕴，这其中自然也有西域的贡献。“秦汉时各族改汉姓虽不普遍，但在许多族中都已开始”，这其中也有“西域，东汉有龟兹侍子白霸、龟兹刘平国”[68]的例子。

尤其要指出，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形成造就出来的西汉帝国的族群格局和文化结构，持久深远地决定了中国历史边疆和现今中国版图的基础范围，我们对这个问题曾经

进行过简要讨论[69]。在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环套链接结构”中，西北朝鲜、辽西辽东、内蒙古中南部、河西河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岭南和东南沿海八个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整体上奠定了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的内圈骨架。西域汉文化的发展，则在西北方向上对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的外圈骨架和外延轮廓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成为西汉帝国经略西域历史意蕴的最重要表达。

注　释

[1] 俞伟超 . 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A］. 古史的考古学探索［C］.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2] a. 刘庆柱 . 关于当前汉代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A］. 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济南：齐鲁书社，2006.
b. 刘庆柱 . 汉长安城考古与汉代考古学［A］. 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3] 作为凝结和整合世界的途径，“文化”使得大千世界林林总总的人文事项纳入某种体制或者形成某些秩序规范 .

[4] 郑君雷 . 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模式［J］. 人民论坛 • 学术前沿，2010（12）（总第 311）.

[5] 葛剑雄 . 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M］. 上海：三联书店，1994.

[6] 谷苞 . 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意义［J］. 新疆社会科学，1984（2）.

[7] 汉书 • 西域传［M］.

[8] 汪洪亮 . 民国时期边政学的兴起［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0（5）.

[9] 郑君雷 . 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形成的考古人类学研究［Z］. 教育部 2005 年度规划基金项目“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形成的考古学研究”结项报告（未刊稿）.

[10] 汉书 • 卷九四 • 匈奴传［M］.

[11] 同［7］.

[12] 同［7］.

[13] 主要包括“流落西域的使者和军卒”“汉公主随从”“自由迁入西域的平民”和“屯戍人员及其家属、私从”几类，主要来自酒泉郡、张掖郡、武威郡、金城郡、京畿叁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南阳郡和上郡 . 贾丛江 . 关于西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 . 西域研究［J］，2004（4）.

[14] 同［7］.

[15] a. 魏略 • 西戎传［M］. 羊毅勇先生认为丝路中道大致是沿库鲁克塔格山南麓，波孔雀河、塔里木河的走向 .
b. 羊毅勇 . 论丝绸之路中道的兴衰［J］. 新疆文物，2003（1）.

[16] 周伟洲 . 两汉时期新疆经济的开发［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1）.

[17] 西汉会要 • 蕃夷下 • 西域［M］.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中国考古学 • 秦汉卷第十二章第二节［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9] 孟凡人 . 楼兰考古学的重要性与开展楼兰考古工作的紧迫性、艰巨性、复杂性和可行性［J］. 新疆文物，2003（2）.

[20] 同[19].
[21] 于志勇. 西汉时期楼兰“伊循城”地望考[J]. 新疆文物，2010(1).
[22] 于志勇，覃大海. 营盘墓地 M15 及楼兰地区彩绘棺初探. 西部考古第一辑[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23] 同[18].
[24] 杜淑琴. 从昌吉出土古钱浅谈汉唐时期中央王朝与西域的关系[J]. 新疆文物，2008(3～4 合刊).
[25] 费孝通 .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32.
[26] 同[19].
[27] 同[1].
[28] 徐苹芳 . 中国历史考古学分区问题的思考[J]. 考古，2000(7).
[29] 同[18].
[30] 钟焓 . 吐鲁番盆地汉代墓葬研究[D]. 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31] 于志勇，关于尼雅聚落遗址考古学研究的若干问题[J]. 新疆文物 .2000(1～2 合刊).
[32]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 和静县察汗乌苏古墓群考古发掘新收获[J]. 新疆文物，2004(4).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和静县察吾呼沟口三号墓地发掘简报[J]. 考古，1990(10).
[34] 同[18].
[35]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 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 M15 发掘简报[J]. 文物，1999(1).
[36] 龚国强 . 试论新疆塔里木盆地周缘汉晋时期的墓葬 .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C].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37] 王明珂 .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87.
[38] 同[37]：205.
[39] 同[25]：34.
[40]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 鄯善苏贝希墓群一号墓地发掘简报 . 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R].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
[4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 哈密寒气沟古墓地发掘简报 . 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R].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
[42] 新疆考古研究所 . 和静县察吾乎沟一号墓地 . 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R].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43] 新疆考古研究所 . 和静县察吾乎沟四号墓地 1987 年发掘简报 . 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R].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44] 同[16].
[45] 周祖谟 . 洛阳伽蓝记校释 . 卷五宋云行记[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46] 张海洋 . 经济文化类型 . 民族学通论[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47] 余太山 .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 • 绪说[M]. 北京：中华书局，2003.
[48] 同[6].
[49] 盐铁论 • 西域篇[M].
[50] 同[7].
[51] 零陵郡东汉人口是西汉的七倍余，豫章郡、长沙郡达四至五倍，桂阳郡是三倍多 . 转引自许倬云.

汉代农业［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35.
［52］同［18］.
［53］a. 阮秋荣. 尼雅遗址 95MN1 号墓地墓葬制度研究［J］. 新疆文物，2001（3～4 合刊）.
b. 赵丰. 汉晋新疆织绣与中原影响［J］. 新疆文物，2009（3～4 期合刊）.
［54］羊毅勇. 考古资料所见魏晋时期丝路南道的经济文化［J］. 新疆文物，2002（1～2 合刊）.
［55］同［31］.
［56］同［53］a.
［57］同［54］.
［58］刘宁. 新疆地区古代居民的人种结构研究［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59］安赋诗. 边疆和边界：汉帝国的南部边陲（赵德云译）. 南方民族考古第六辑［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60］于逢春，干阳阳. 在历史、国际环境与现实间阐述新疆的历史与现状——评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3）.
［61］贾敬颜. 历史上少数民族中的“汉人成分”.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198.
［62］周书 • 高昌传［M］.
［63］邵会秋. 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的关系［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64］同［31］.
［65］同［36］.
［6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5 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 95MN Ⅰ号墓地 M8 发掘简报［J］. 文物，2000（1）.
［6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 • 秦汉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68］陈连庆.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2.
［69］我们将中国历史边疆划分为既是历史过程（时间结构）又是空间结构的四个轮廓，即萌芽轮廓、基础轮廓内圈、基础轮廓外圈和外延轮廓，这四个轮廓与从秦汉帝国至清王朝直属体制、羁縻体制和藩属体制三个层次的边疆行政管理体制存在明显对应关系，此“四个轮廓”的地域范围就是兼具共时和历时双重属性的中国历史边疆地区. 郑君雷. “中国边疆考古”的认识论. 人民论坛 • 学术前沿［J］. 2011（4）(总 324).

Western Region in the Western Han's Cultural Structure

Zhen Junlei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plicity of cultures. It is stressed that Chinese culture is an extension of the Hexi Corridor local type of Chinese culture. The Western Region of the Western Han was under

direct control of the government. However,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the Han and indigenous culture is a complex overlay promoted by the leadership.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Han culture on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west frontier.

Key words: western; Han dynasty; Remote areas;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Structure; the Western Regions

西汉眩雷塞小考

张文平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呼和浩特，010011）

西汉时期，每个边郡之下一般设置一至三个都尉，管理边防军事。每个都尉之下又管理若干塞，绝大部分位于长城沿线，塞的军事建制为侯官。由于塞的级别较低（与县同级），《汉书·地理志》不作专门记载，只有个别重要的塞址被偶尔提及，如朔方郡的鸡鹿塞、高阙塞和云中郡的益寿塞、葛邪塞等。而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的古居延泽地区，通过对出土汉简的研究，可知西汉张掖郡的居延都尉府之下辖有殄北、甲渠、卅井等三个塞，肩水都尉府之下辖有广地、橐他、肩水等三个塞。

眩雷塞也是西汉时期的一个重要塞址，《史记》《汉书》均有提及。据《史记·匈奴列传》，大约在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又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汉书·匈奴传》关于此事的记载，史料来源于《史记·匈奴列传》，内容完全相同。此外，《汉书·地理志》西河郡条下，在西河郡属县增山县之下有如是记载："增山，有道西出眩雷塞，北部都尉治。"

对于"至眩雷为塞"一语中的"眩雷"一词，东汉人服虔的《汉书音义》注释曰："眩雷，地在乌孙北也。"后来刘宋人裴骃的《史记集解》，对"眩雷"的注释认同了服虔的观点。服虔之所以将眩雷塞安排在乌孙之北，是因为《史记》《汉书》在"又北益广田"之前，讲的是汉朝与乌孙的关系，将细君公主嫁与了乌孙王。今人的一些研究成果中，将眩雷一地具体于今新疆伊犁河流域，并认为"北益广田"就是屯田，西汉王朝此时已经在伊犁河流域开展军事屯田了。

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并州、朔方刺史部"专图，从增山县"有道西出眩雷塞"的史料出发，将眩雷塞大致标注在了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与杭锦旗的交界处一带，而增山县则标注于东胜区的西部、西柳河上源地带。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新秦中考》一文中，否定了西汉王朝在乌孙屯田的可能性，并对《中国历史地图集》关于眩雷塞的地理位置提出了质疑，在作详细考证的基础上，推断其应位于汉代朔方郡三封、临戎、窳浑等西部三县南面的今乌兰布和沙漠之中[1]。

眩雷塞是在今天的新疆还是内蒙古？具体位置在哪里？近年来，一些新的考古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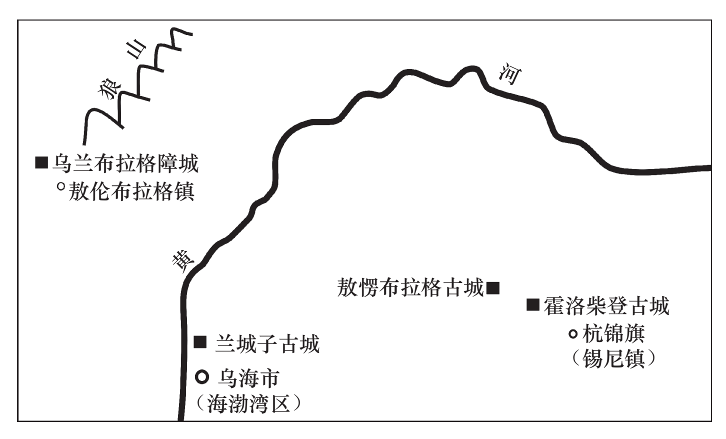
查与发掘成果，为重新认识眩雷塞提供了可能。位于今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锡尼镇浩饶柴达木嘎查西北约 2 千米处的霍洛柴登古城，为一座平面呈“回”字形的大型汉代古城，如今内城城墙已消失，外城东西长 1446 米，南北宽 1100 米。以前调查除发现大量西汉时期的陶器、砖瓦和“半两”钱、“五铢”钱外，还有“西河农令”“中营司马”铜印各一方，被认为是西汉西河郡郡治富昌县（取“富乐未央、子孙益昌”之意）。近年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古城内又发现了新莽时期的铸币作坊遗址，出土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泉”等本地铸造的钱币（图一），与新莽时期“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的币制改革政策相符合，从而凿实了该古城为富昌县的推断。



图一　钱范

据《汉书·地理志》，西汉西河郡辖有南部、北部、西部三个都尉。北部都尉所在的增山县，应当位于整个西河郡的西北部一带，起到护卫富昌县的作用，而不可能位于富昌县的东部。在霍洛柴登古城西北约 16 千米处，调查有西汉时期的敖楞布拉格古城。古城平面略呈方形，边长约 530 米，城内西北角有东西长 120 米，南北长 170 米的子城。从敖楞布拉格古城的规模及其与霍洛柴登古城的相对位置来看，前者符合西河郡增山县兼北部都尉治所的条件（图二）。

从敖楞布拉格古城一直向西，穿越库布齐沙漠，过北流黄河，进入乌兰布和沙漠。在乌兰布和沙漠之中，有一道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为狼山余脉哈鲁乃山。依托于哈鲁乃山，其南、北两侧各分布有一道汉代的列燧，暂分别称为“哈鲁乃山南麓列燧”和“哈鲁乃山北麓列燧”。从汉长城的整体分布情形来看，哈鲁乃山南麓列隧应是分布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查石太行山狼山一线的西汉朔方郡长城的延伸，而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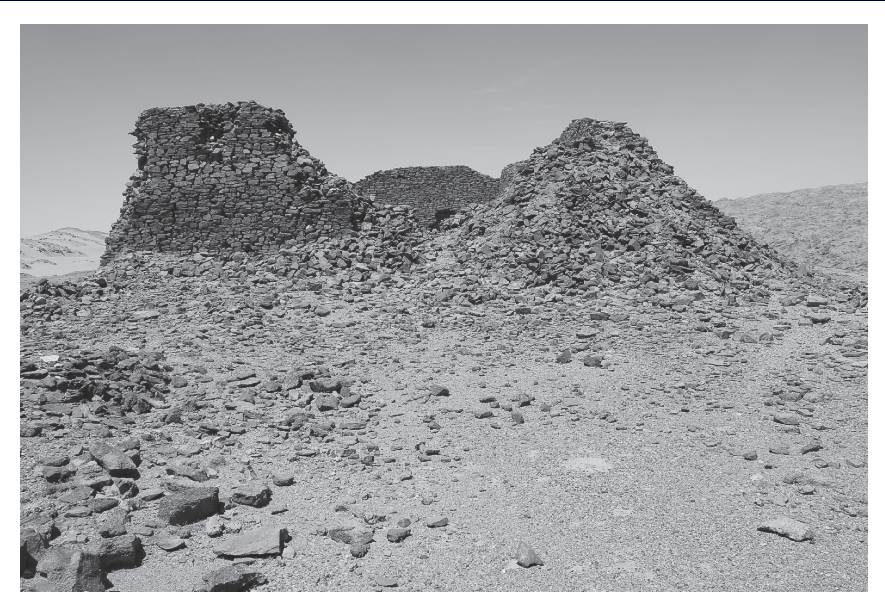
图二　敖楞布拉格古城的规模及其与霍洛柴登古城

鲁乃山北麓列燧则是分布于西汉朔方郡长城以北的、由光禄勋徐自为于太初三年（公元前 102 年）修筑的五原塞外列城（亦称光禄塞）的延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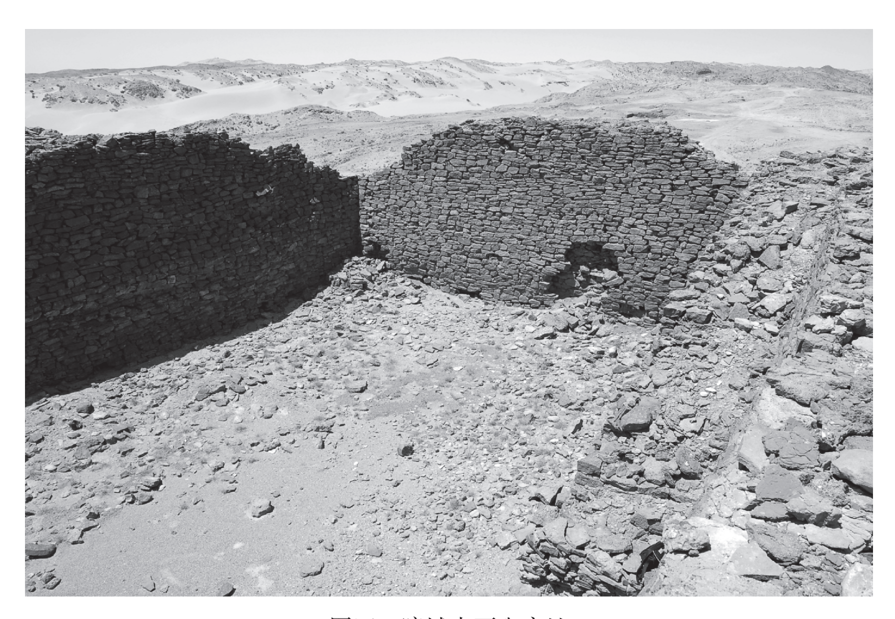
哈鲁乃山南麓列燧由当路塞墙体、烽燧、亭址和障城等长城遗存组成，东起今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敖伦布拉格镇西北与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沙金套海苏木巴音乌拉嘎查交界的哈鲁乃山东侧，沿山体南麓，向西南过亚玛雷克沙漠和乌兰布和沙漠交汇地带，经敖伦布拉格镇巴彦哈日嘎查、查干德日斯嘎查、吉兰泰镇呼和温都尔嘎查、乌西勒格嘎查、傲日格呼嘎查、巴特日布拉格嘎查，止于苏力图嘎查。这道处于哈鲁乃山南麓的列燧，凡遇山口和沟谷通道，局部便折向西或西北一侧设防。目前，该道列燧沿线共调查当路塞墙体 1987 米、烽燧 39 座、亭址 1 座、障城 2 座。

在哈鲁乃山北部，有一条大致呈南北向的山中通道，山间台地之上分布有乌兰布拉格障城，为哈鲁乃山南麓列隧的组成部分。该障城位于阿拉善左旗敖伦布拉格镇镇政府所在地西北约 11 千米处，东临贯通南北的乌兰布拉格峡谷，谷中四季有流水。障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31.5 米，东西宽 24 米。障墙采用大块片状石材错缝堆砌，自下而上有收分，内部以石块和沙土填充。现障城南墙东半部及东南角、西北角、东北角坍塌严重，现存墙体底宽约 4.7 米，顶宽 2～2.7 米，保存较为完整的障墙最高可达 6.8 米。南墙中部设门，宽约 1 米，方向为 165°。东墙内侧有斜坡踏道直通墙体顶部，长 15 米，宽 2 米，坡度约 45°。障内西南角有石砌房址 2 座（图三、图四）。障城南部相连有东西长 28 米，南北宽 26 米的近似方形院落；院落墙体为石砌，宽 1～2 米，残高 1～1.5 米，南墙中部开门（图五、图六）。障城内采集有灰陶壶、罐等残片。

西汉朔方郡长城之上分布有高阙塞、鸡鹿塞等塞址，乌兰布拉格障城与敖楞布拉格古城大体呈东西一线分布，相互之间的直线距离约 200 千米，将乌兰布拉格障城认定为西汉西河郡北部都尉眩雷侯官治所，与《汉书·地理志》关于眩雷塞位置的记载是可以吻合的。那么，以乌兰布拉格障城为中心的哈鲁乃山南麓列隧，应当就是眩雷塞的整体管辖范围。西汉时期，汉王朝数次从西河郡出兵匈奴，走的就是眩雷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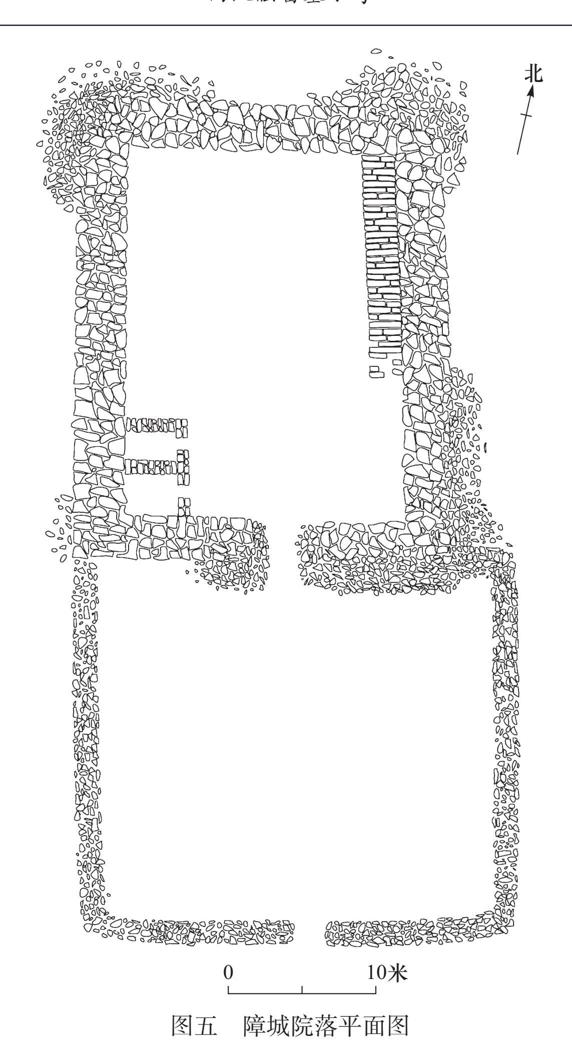


图三　障城内石砌房址



图四　障城内石砌房址

将乌兰布拉格障城认定为眩雷侯官治所之后，问题又来了，史籍记载的“又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是怎么一回事呢？从《史记》《汉书》中这一整段记载的前后关系来看，“至眩雷为塞”与前面的汉朝将细君公主嫁与乌孙王并非有着必然的联系，这应是记载同一时间段之中发生的两件事情，只不过没有把“又北益广田”的具体地域说清楚，使后来的注释者误植其于乌孙之下。“至眩雷为塞”，讲的应该就是在西河郡北部都



图五　障城院落平面图

图六　院落南墙中部开门

尉之下修筑了眩雷塞。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 127 年），大将卫青夺取河南地之后，在加筑沿用秦代蒙恬所筑大青山—查石太山长城的基础上，又沿着查石太山狼山一线修筑了朔方郡长城；从朔方郡长城向西南，西河郡长城的修筑晚于朔方郡长城，大约是在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 年）。

再进一步分析，“又北益广田”与军事屯田有关吗？在这一句话中，如果将“广田”理解为扩大屯田或者扩大领土，“广”与其前的“益”字有语义重复之嫌。稽诸《汉书 • 地理志》西河郡属县，三十六县之中有一县即名为“广田”，“又北益广田”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又向北增设了广田县呢？西河郡广田县在新莽时改名为广翰，广翰就是“大沙漠”之意，与西河郡北流黄河东西两侧均为沙漠相合。在汉代，分布于沙漠地区的长城有的不筑墙体，而是利用“天田”代替墙体来进行防御。天田是在沙漠中布一条长长的沙带，如果敌人入侵，会在沙地上留下清晰的活动印迹。如此来看，这里“广田”的含义，应该是与广翰相通的，广田的“田”字，在汉代亦有“沙漠”之意。

那么，广田县旧址在哪里呢？应当距离是在距离眩雷塞不远的黄河两岸一带。在今乌海市海勃湾区千里山镇王元地村内，西邻黄河有一座汉地古城，当地老乡称作兰城子。古城遭破坏严重，目前仅保留有 30 余米较为明显的东墙以及西北角少量土筑墙体遗迹。早年的调查资料显示，古城平面略呈方形，东西长 307 米，南北宽 294 米。城内地表散布遗物较多，有陶片、陶质建筑构件和“半两”钱、“五铢”钱等，遗物年代集中于西汉时期。古城东侧、北侧分布有汉代墓葬群[2]。兰城子古城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缘，西北距乌兰布拉格障城的直线距离近 100 千米，从该古城的位置及出土物来看，均符合西汉广田县的特点。西汉王朝于元朔四年（公元前 125 年）设立了西河郡，元封年间继续向西北方向发展，这样“又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就有了一个较为完满的解释了。到东汉时期，北匈奴势衰，南匈奴与乌桓等部族内迁边郡，西河郡西北部包括广田县在内的属县均废治，眩雷塞长城也随之失去了其边界防御的作用。

注　　释

［1］ 史念海 . 新秦中考［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1）.
［2］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 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82～83.

The Research of Xuanlei Fort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Zhang Wenping

Abstract: There were many forts settled along the Great Wall during Western Han Dynasty period. Xuanlei Fort was recorded by both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While the exact place of it was a controversial topic with no conclusion yet. This paper tries to prove the location the of the Xuanlei Fort with new evidence from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nd recent research into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conclusion is Xuanlei Fort is the Column Sui in the south side of Halunai Moutain, Alxa Left Banner, Alxa Leagu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The Wulanbulagean Barrier City should be the location of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the Xuanlei Fort.

Key words: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Xuanlei Fort; Wulanbulagean Barrier City; Guangtian

榆树老河深遗址中层墓地文化属性再思考

孙　危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郑州，450001）

榆树老河深遗址位于吉林省北部榆树县城以南30千米处。经过1980、1981两个年度的发掘，共清理房址2处，墓葬166座，出土各类文物4000多件。该遗址从文化面貌上大致可划分为上中下三层，其中上层属靺鞨时期的墓葬，下层为西团山文化时期的房址。至于中层，原报告及发掘简报均认为其属于汉代的鲜卑墓葬[1]，但更多的研究者则认为其文化性质为夫余[2]。时至今日，夫余说已基本成为定论。但中层墓地中所体现出的鲜卑文化因素，例如鎏金神兽铜牌饰也是不争的事实。故笔者想结合近年来的鲜卑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来谈些自己的看法，恳请方家指正。

从近年来拓跋鲜卑考古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其考古学文化特征是：4世纪以前，墓穴及棺均多为前宽后窄的梯形；侈口长腹罐一直是其随葬陶器的主要器形；镂孔双耳铜（铁）鍑和金属牌饰一直是其主要的随葬品，其中5世纪以前牌饰的画面形象多为鹿和马[3]。以此标准来审视老河深中层墓地，其所具有的拓跋鲜卑文化因素载体大体可分为葬具和随葬品两大类，以下分而述之。

1. 葬具

平面呈梯形，以M51为例。该墓的葬具呈梯形，无盖，无底，四壁较直，葬具的两壁长于两端横板堵头处。长2.5、宽0.85、残高0.3米[4]（图一，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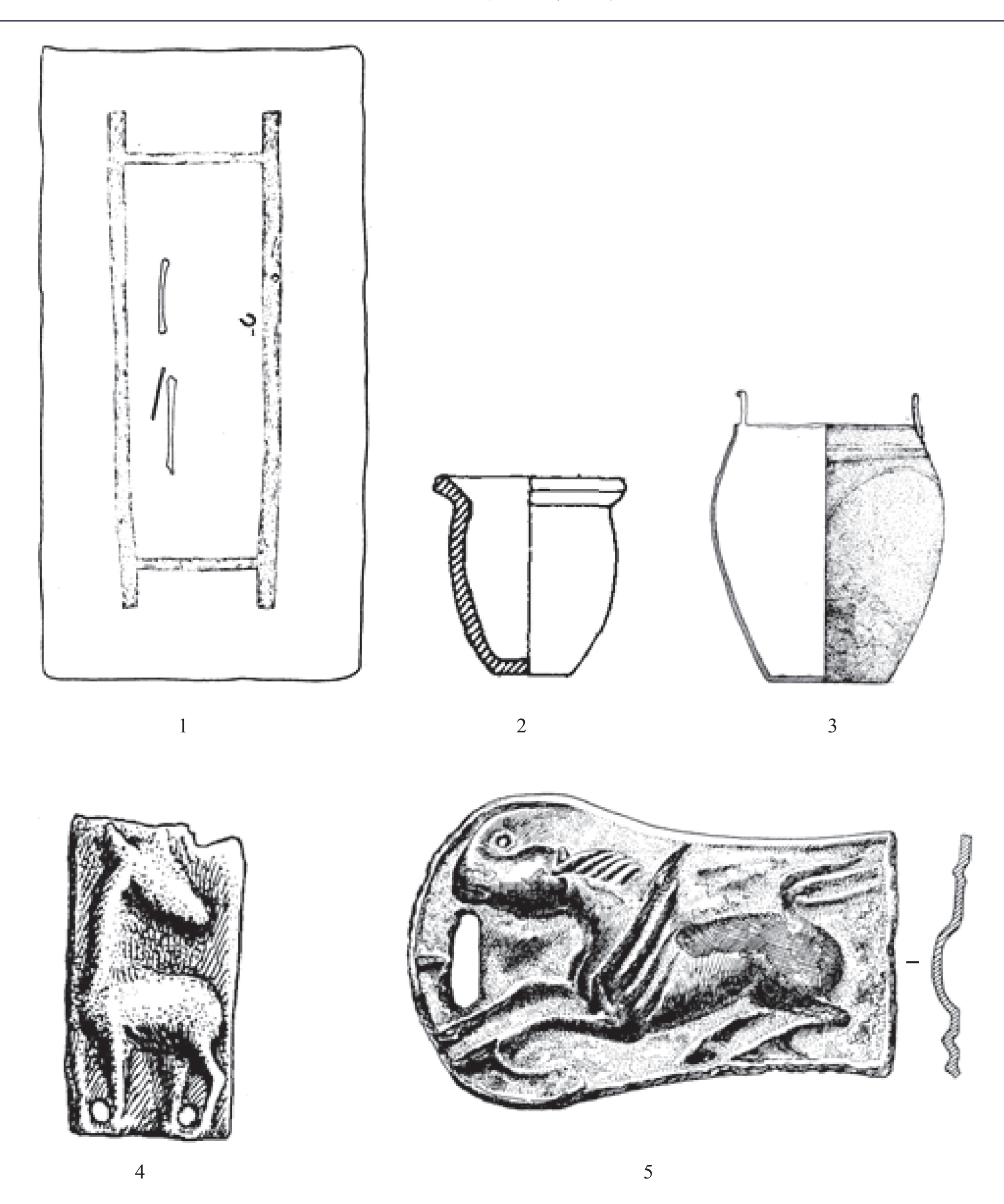
2. 随葬品

侈口长腹罐　原报告称Ⅱ式小陶罐，平唇外折，腹壁较直，平底，质地为夹细砂泥质灰褐色陶，体高12.8、口径11.6、底径4.8、腹径10.6厘米[5]（图一，2）。

铜鍑　平口，沿上有环形双耳，腹微鼓且较浅，平底，腹的上部铸有两道凸起的弦纹和一道弧形纹。通高26、口径16.4、腹径21、底径11、厚0.2厘米[6]（图一，3）。

鹿纹鎏金铜牌饰　长方形，正面铸鹿纹，回首静立，形象逼真。其上端有一圆形穿孔。长2.9、宽2、厚0.15厘米[7]（图一，4）。

此外，老河深中层墓地还发现了六件神兽鎏金铜牌饰。其所表现的神兽形象近似飞



图一　老河深中层墓地发现的具有拓跋鲜卑文化因素的葬具和随葬品
1. 梯形葬具（M51） 2. 侈口长腹罐（M88） 3. 铜鍑（M97） 4. 鹿纹鎏金铜牌饰（M56）
5. 神兽鎏金铜牌饰（M105）

马，吻部有一弯角上翘，近犀牛角状，昂首扬尾，四蹄腾云，双翼上展，作奔翱状[8]（图一，5）。并且报告编写者还敏锐地感觉到，这些牌饰上的神兽即为《魏书·序纪》中所提到的指引拓跋鲜卑迁徙的神兽[9]。

由此看来，这些神兽鎏金铜牌饰也应与梯形葬具、侈口长腹罐等随葬品一样，属于具有拓跋鲜卑文化色彩的遗物。这样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夫余历史上与拓跋鲜卑的关系较为密切；其二，能更加准确地判定老河深中层墓地的年代。该墓地的

时代目前多认定为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但由于拓跋鲜卑在神兽的指引下，迁往“匈奴故地”的时间为2世纪[10]。因此带有这种神兽形象的牌饰年代可能要晚一些，即不会早于2世纪。

下面我们再对老河深中层墓地那些出土具有拓跋鲜卑文化因素的遗物的墓葬性质进行分析。

在老河深中层墓地中，具有拓跋鲜卑文化因素的墓葬（包括葬具和随葬品）分别是：M25、M51，这两座墓葬的葬具均为梯形；M88，该墓随葬有一件侈口长腹罐；M97，该墓出土了一件铜鍑；M56，该墓发现了一件铜鍑、两件神兽鎏金铜牌饰以及五件鹿纹鎏金铜牌饰；M105，该墓发现了四件神兽鎏金铜牌饰和三件鹿纹鎏金铜牌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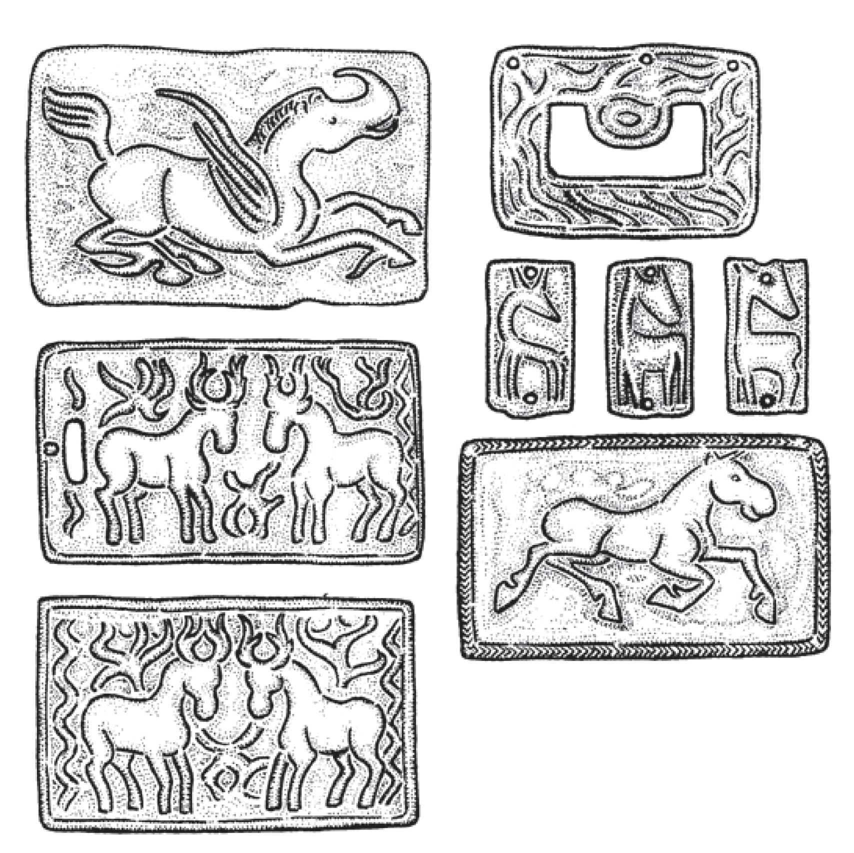
我们从墓葬登记表来看，除了M51随葬品较少以外，其余五座墓葬的随葬品均较为丰富。特别是M56、M97和M105三座墓葬，即便从中层墓地所发掘的129座墓葬来考量，其随葬品类型、数量也是较多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东汉时期夫余所受到的拓跋鲜卑影响，可能主要表现在前者的上层人士之中，至于中下层人士，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则相对不太明显。

关于夫余和鲜卑之间的互动，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来看，多集中于夫余与慕容鲜卑之间的交流[11]。而这两者之间的交流时间多在3世纪以后。对于早期夫余与鲜卑的互动，则几乎没有涉及。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相关史料记载的缺乏，另一方面则是相关考古材料特别是能确定族属的材料不足所致。如今随着夫余考古和鲜卑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能使我们结合史料，就二者早期的互动进行尝试性的研究。

关于夫余与鲜卑的早期互动，有一条记载非常重要。即《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所载：“（檀石槐）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檀石槐是东汉桓帝和灵帝时期的鲜卑首领，其所建立的军事大联盟如上文史料所载，由于进行军事扩张而与夫余产生了联系。而老河深中层墓地的时代很可能正处于这一时期，从上文总结的该墓地所体现出的拓跋鲜卑文化因素来看，固然有夫余上层人士受到拓跋鲜卑影响的可能；但结合这一时期历史发展，还有这样一种可能：夫余的统治阶层中有一部分就是拓跋鲜卑人。换言之，当时鲜卑的军事扩张虽占据了夫余的部分领土，但在这部分领土上所居住的民众基本上仍是夫余。鲜卑人仅仅是取得了统治地位，而并未改变当地居民的组成比例。老河深中层墓地所体现出的夫余文化属性，即绝大多数墓葬所显示出的共性，如盛行随葬双耳陶器、陶豆等即为明证。这两种可能中的任何一种，应该都是檀石槐“东却夫余”的现实表象所在。

丁零是欧亚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两汉时期居于今俄罗斯南西伯利亚东起贝加尔湖西至巴尔喀什湖之地[12]。其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前苏联和俄罗斯学者认为即是分布于叶尼塞河中游米努辛斯克盆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和克麦罗沃州东部的塔施提克文化。近年来，随着不断的考古发现，该文化的分布范围亦有所扩大，俄罗斯的图瓦

地区也发现了塔施提克文化遗存。图瓦是指西伯利亚南端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即萨彦岭与唐努乌拉山之间的地区。如前所述，檀石槐建立的鲜卑军事大联盟亦与丁零产生过联系。前苏联和俄罗斯考古学家在图瓦地区的塔施提克文化墓葬中发现了与老河深中层墓地出土的极为相似的、雕刻有独角神兽和鹿的形象的牌饰[13]（图二）。同时前苏联学者还注意到，就当地的塔施提克文化而言，并没有在 2 世纪，即檀石槐建立的鲜卑军事大联盟扩张时期发生显著改变[14]。这正与老河深中层墓地所体现出的文化面貌特点相似，即塔施提克文化和老河深中层墓地，无论是墓葬结构和葬俗，还是随葬品，均继承了当地早期的考古学文化特点，表现出了一种浓厚的土著文化特色。而且就老河深中层墓地而言，也恰恰正是这些土著文化特点，才使研究者能判定其为夫余文化。



图二　图瓦的阿伊末尔勒格墓地 M31 中出土的神兽纹和鹿纹青铜带扣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2 世纪中叶鲜卑军事大联盟勃兴之时，并未对其周邻的国家和民族，例如夫余、丁零等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是更加密切了各方之间的联系。就“（檀石槐）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的记载而言，当视为鲜卑与这些国家和民族之间发生的战争似乎更为合适，而并非鲜卑占据了其领土。当然，这一时期鲜卑与其周邻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互动，俄罗斯学者所提出的，鲜卑

的扩张具有开拓商路和将自己的影响施加于其周边地区的民族的目的等观点也值得我们在今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中予以注意[15]。

注　释

[1] a．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前言．
b．吉林省文物工作队，长春市文管会，榆树县博物馆．吉林榆树县老河深鲜卑墓群部分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1985（2）．
[2] a．李殿福．汉代夫余文化刍议［J］．北方文物，1985（3）．
b．刘景文、庞志国．吉林榆树老河深墓葬群族属探讨［J］．北方文物，1986（1）．
c．马德谦．夫余文化的几个问题［J］．北方文物，1991（2）．
d．林沄．西岔沟型铜柄铁剑与老河深、彩岚墓地的族属［C］．林沄学术文集［A］．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e．华阳．从考古发现看夫余的厚葬之风［J］．东北史地，2009（6）．
f．董学增．夫余文化遗存的发现、基本面貌及命名之我见［J］．东北史地，2010（4）．
g．范恩实．从榆树老河深墓地看夫余邑落人群构成——兼及夫余地方统治体制问题［J］．北方文物，2011（1）．
[3] 孙危．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73.
[4]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13.
[5] 同［4］：45.
[6] 同［4］：48.
[7] 同［4］：64.
[8] 同［4］：63，64.
[9] 同［4］：118.
[10] 同［3］：29.
[11] a．赵红梅．夫余与前燕慕容廆朝关系探微［J］．东北史地，2009（6）．
b．赵红梅．慕容鲜卑的崛起与夫余的灭亡——兼论夫余灭国慕容鲜卑因素［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5）．
c．张芳，刘洪峰．夫余对外关系史略［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3）．
[12] 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
[13] a．Стамбульник Э.У.Нов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гунно-сармат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в Туве (некоторые итоги работ)［J］. *Древние культуры евразийских* степей. - Л.1983.- С. 39.
b．Мандельштам А.М., Стамбульник Э.У. Гунно-сарматского период на територи Тувы［A］. *Степная полоса азиатской части СССР в скифо-сарматское время*［C］. - М.1992.- С. 200.
[14] Кызлаасов Л. Р. *История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в средниие века*［M］. - М.1984- С. 22.
[15] Худяков Ю.С., Алкин С.В., Юй Су-Хуа. Сяньби и южная Сибирь［J］. *Древности Алтая*: *Изв. лабора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 Горно-Алтайск.1999. – № 4.

A Reconsideration on the Cultural Nature of the Middle Cemetery in Yushu Laoheshen Site

Sun Wei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pares artifacts found in the middle cemetery of the Laoheshen Site in Yushu, Jilin province, and the typical artifacts found in Xianbei tomb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during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Xianbei influenced the Fuyu people predominantly in the upper classes. As for the lower and middle class people, the influence is not too obvious. On the basis of this conclusion,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ornaments carved with the image of the unicorn and deer found in the Laoheshen cemetery, to the extremely similar to the ornaments found in the Tashtyk culture in Russia. Combined with historical records,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interaction during the the Xianbei and Dingling in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author posits it is as same a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Xianbei and Fuyu. The expansion of Xianbei made a fundamental impact with Fuyu and Dingling.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a conclusion is proposed,"after Xianbei's expansion, the main form of interaction with the adjacent Fuyu and Dingling was warfare, but Xianbei did not directly occupy these regions."

Key words: the Middle Cemetery in Yushu Laoheshen Site; Xianbei; Fuyu; Dingling; Tashtyk culture

首阳山小考
——兼谈魏文帝首阳陵位置问题

耿　朔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北京，100102）

魏文帝首阳陵具体位于洛阳何处，长期以来没有可靠的线索。近年在河南省孟津县送庄乡三十里铺村东南发掘了葬于太和二年（228 年）的曹魏名臣曹休墓，并在附近大汉冢和朱仓东汉帝陵陵园遗址范围内，调查发现了 11 座形制相似、时代相近的大型墓葬，它们无封土、方坑明券、墓道朝东[1]。这些情况促使发掘领队严辉先生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墓葬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文献记载的司马懿、司马师的墓一样，与曹魏帝陵存在联系，并提到“过去民间有一个传说，文帝首阳陵在偃师市邙岭乡赵坡村。”[2]这一提示非常重要，惜尚未展开充分论证。本文主要将从历史地理的角度，通过对“首阳山”和“乾脯山”古今地望及名称的辨析，希冀为寻找首阳陵提供更多参考信息。不当之处，敬希专家指正。

与魏武帝（追尊）曹操高陵一样，首阳陵亦由文帝曹丕自己生前规划：黄初三年（222 年）“冬十月甲子，表首阳山东为寿陵”[3]，并预作终制，黄初七年（226 年）五月“丁巳，帝崩于嘉福殿，时年四十。六月戊寅，葬首阳陵。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4]这些记载清楚地说明首阳陵因位于首阳山之东而得名，要寻找首阳陵，就要解决首阳山的地望问题。

众所周知，邙山指的是洛阳城北的一条东西走向山岭，向东延伸到偃师、巩义境内，直至伊洛河入黄河处洛汭，它是北支崤山余脉，也是黄河和伊洛河的分水岭，即《元和郡县图志》中所云“旧说北邙山是陇山之尾，乃众山总名，连岭修亘四百余里。”[5]但自古以来，邙山的不同段亦有不同的名称，首阳山即是这些名称中较著名的一个。

今天所称的首阳山当是对偃师境内一段邙山的泛称，其主体部分在偃师市西部首阳山镇和邙岭镇境内，主峰位于首阳山镇邢沟村西北[6]，也就是今名首阳山的西段。今名首阳山东一带自古至今都没有曹魏陵墓的线索，给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惑。

那么，造成这一困惑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否存在文献记载不甚准确的可能呢？笔者认为应对“首阳山”这一名称在不同时期所涵盖的地理范围进行考证。

“首阳山”之名由来已久。《史记·伯夷列传》云“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

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7]，《后汉书》数次提及首阳山之名[8]。汉晋时期的许多诗文表明首阳山在汉魏洛阳城东北方向[9]，当时首阳山的范围应该就是汉魏洛阳城东北一带邙山，即邙山的东段，这是广义概念上的首阳山。

而“首阳山”之名，有时又似指狭义上的某座山峰。《水经注·河水》云“河水南对首阳山”，此句接在“又东径平县故城北”[10]一句之下，平县系西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 122 年）废平侯国置，王莽时一度更名治平县，东汉复名平县，属河南尹，《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将此县县治标在汉魏洛阳城东北南岸，其东南以山峰图例标示出“河水南对”的首阳山[11]。晋人戴延之《西征记》载“洛东北去首阳山二十里，山上有伯夷叔齐祠，或云饿死此山”[12]。两者所指的“首阳山”，位置均在今名首阳山西段即主峰一带。一个山名，既指整座山岭，亦指其主峰，这在地理学上不是少见的现象。狭义上的首阳山，所指的大概正是首阳山主峰一带，而这一对应关系自古至今都未改变。

确定了汉晋广义首阳山的大概范围，以及它的主峰被视为狭义上的首阳山，下面再来分析汉晋时期首阳山的东首位于何处。我们可以稍稍把目光移开，从西晋名臣杜预对身后事的规划中，捕捉有关这个问题的另一条线索。

《晋书·杜预传》载“（杜）预先为遗令曰：‘吾去春入朝，因郭氏丧亡，缘陪陵旧仪，自表营洛阳城东首阳之南为将来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无旧冢。其高显虽未足比邢山，然东奉二陵，西瞻宫阙，南观伊洛，北望夷叔，旷然远览，情之所安也。’”[13]杜预去世后是要陪陵的，他自表的墓地，可以向西瞻望洛阳宫阙，向北仰望首阳山上夷叔旧迹，向南眺望奔流东去的伊洛河，而向东，则是两处陵寝所在。由此，如果确定杜预所奉的是西晋哪两座陵寝，或许可以对其墓与首阳山之间的方位关系做更为具体的辨识。

有关杜预遗令的这段记载置于传尾，故不易从本传叙事顺序上判断遗令的写作时间。案杜预卒于太康五年闰十二月（285 年 1 月），享年 63 岁，遗令当不会比这个时间早太多。上述引文有“去春入朝”这个重要的时间结点[14]。

杜预于泰始七年（271 年）至咸宁四年（278 年）任度支尚书，身在洛阳，咸宁四年（278 年）十一月任镇南大将军，赴襄阳，此后一直在长江中游对吴前线上，直至太康元年（280 年）三月平吴，解甲休兵后才有可能还朝。

根据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后序》所述，他在吴平后自江陵还镇襄阳，先修成《春秋释例》和《经传集解》，之后见到此前发现的汲冢书[15]，这批文献“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见之”。再据文中言汲冢书“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岁，下去今大康三年五百八十一岁。”[16]可知杜预写就《后序》的时间是在太康三年（282 年）。收藏汲冢书的秘府在都城洛阳，由此可以推测杜预在太康元年（280 年）三月以后至太康三年（282 年）间，曾有一次见到汲冢书的入洛之举，笔者推测即本传遗令所说的“去春入朝”。由于平吴后他先返回襄阳编著《释例》和《集解》，因此入朝很可能是在第二年，即太康二年（281 年）春天，从“去春”一词看，遗令应与《后序》一样，写于太康三年（282 年）

杜预 60 岁时，距离去世有两三年时间，较为合理。

杜预父杜恕与司马懿不和，故杜预的入仕之路一度不顺，直至司马昭执政时，杜预被司马氏集团争取过去，娶了司马昭之妹，拜尚书郎，复袭祖父杜畿丰乐亭侯爵，而他取得更大成就则是在司马炎建立西晋之后。从杜预仕途经历看，他与司马昭、司马炎父子关系密切。而泰始元年（265 年）九月癸酉葬文王司马昭于崇阳陵，司马炎虽在太熙元年（290 年）去世，但于泰始十年（274 年）八月戊申葬武元羊皇后于峻阳陵，在上述推测的遗令写成的太康三年（282 年）前，崇阳、峻阳二陵已然存在。因此，杜预说的“东奉二陵”，肯定是指陪附司马昭崇阳陵和司马炎峻阳陵。

20 世纪 80 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邻近首阳山主峰的鏊子山南发现了峻阳陵区，又在属于今名首阳山南坡的枕头山南发现了疑似崇阳陵区[17]。二陵在今名首阳山的范围内。晋人郭缘生在《述征记》记述西晋五陵位置时说“北邙东则乾脯山，山西南晋文帝崇阳陵；陵西武帝峻阳陵；邙之东北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邙之南，则惠帝陵也。”[18]首阳山已是晋时名山，但《述征记》却以“乾脯山”作为叙述崇阳陵和峻阳陵的基准，可见二陵所倚之山，在当时叫乾脯山而非首阳山。考古发现崇阳陵在东，峻阳陵在西，相距大约 3 千米，符合《述征记》所载二者之间的相对位置，它们与首阳山主峰靠得很近，在其东南方向。由此可知，乾脯山位于首阳山主峰以东，虽然已是今名首阳山的一部分，但在汉晋时候却被认为与首阳山有别。二陵以西的杜预墓地位于“首阳之南”，应当不会距离二陵过远，估计位于首阳山主峰一带的南坡[19]，也能说明首阳山在西，乾脯山在东。

西晋陆机撰有《洛阳记》一卷，已失，轶文散见于《文选》《类聚》《书钞》《御览》等类书，他在该书中同时提到“首阳山”与“乾脯山”，云“首阳山在洛东北，去洛二十里”(《文选 • 赠白马王彪诗》注)、“乾脯山在洛阳北去三十里，于上曝肉因以为名”[20](《书钞》卷一四五“脯”)。汉魏洛阳城以北三十里，已是黄河，与崇阳、峻阳二陵的位置不符，故疑“乾脯山在洛阳”后脱一“东”字，应为洛阳东北去三十里。由此再次可以证明，首阳山和乾脯山均位于洛阳东北，一西一东，两山相近而不相合，两山相邻之处，正在首阳山主峰一带。

《述征记》说“北邙东则乾脯山”，似乎乾脯山也不是邙山的一部分，邙山的东首就在乾脯山以西的首阳山主峰一带，再往东就不再称为邙山了。关于这一点，近年在河北赞皇发掘的北朝晚期李氏家族墓中，出土于 M8 的北魏太尉府行参军李弼墓志可以予以佐证。M8 墓为迁葬墓，李弼灵柩于北魏末年即永熙三年（534 年）二月“自洛阳归穸此茔。”此前于“孝昌二年（526 年）八月八日甲戌终于洛阳东安里，春秋卌有八……以其年十二月八日壬寅葬于芒首杜镇南预墓东隔一峰方岸上。”[21]杜预生前曾任镇南将军，从墓志得知他的墓在“芒首”一带，到北魏时还是当地的一个地标，结合上引杜预遗令中所记葬地“首阳之南”就是首阳山主峰以南，可以印证首阳山主峰一带即汉晋邙山东首的判断。

综上分析，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首阳山主峰一带是汉晋广义首阳山的东首，也是当时所称邙山的东首，其东是乾脯山。张剑先生在研究洛阳地区出土墓志与古代行政区划的关系时，提到有三方北魏晚期墓志自题葬于“首阳”，根据它们的发现地点认为“（北魏）首阳山当是指洛阳老城北西起南石山，东经东山岭头，南至偃师县西首阳镇以北的邙山坡”[22]。北魏当是延续汉晋的情况。

由此，前引《三国志·文帝纪》所说位于“首阳山东”的首阳陵，不在今名首阳山之东，而应在首阳山主峰附近。但陵寝不宜建于主峰之上，往东亦是山岭，且进入乾脯山的范围。因此首阳陵应在首阳山主峰以南或以北的区域内寻找。

首阳山主峰以南，靠近崇阳、峻阳二陵，且据《述征记》“邙之南，则惠帝陵也”的记载，在邙山之南应该也就是二陵之西，还有惠帝太阳陵，祖孙三代的陵区应是由东向西排列。迄今，在首阳山主峰以南及周边区域，发现了数量不菲的西晋墓葬，除去 20 世纪 80 年代对鏊子山、枕头山两处墓地的调查发掘外，90 年代的羊瑾墓碑征集地点（有“陪葬崇、峻之阳”的记载）在首阳山镇沟口头村，1992 年清理抢救性清理的出土墓表的西晋名臣何桢墓在南蔡庄村砖厂，2002 年在偃师市首阳山镇香峪村北四方砖厂发掘的 2 座两座西晋墓，位于枕头山墓地的西南方，2008 年在新庄村北发掘的 2 座两座西晋墓，位于鏊子山墓地的西南方，它们被推测是晋陵的陪葬墓，由此可见首阳山主峰以南及周边区域，正是文献记载的西晋诸帝陵及其陪葬墓群的位置[23]。司马昭执政时，魏晋鼎革已箭在弦上，他去世后很快魏帝禅位，司马炎建立西晋，被追尊为帝。不知道司马昭的葬地是否系生前规划，但以时局和人情论，其葬地避开曹魏陵区是理所当然，大概就是出于这个缘故，离开了父兄墓茔所在“邙之东北”，而转至“邙之东”的乾脯山西南，以后武帝、惠帝均依次葬于山南。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正相吻合。

由此反推，曹魏陵区应在首阳山主峰以北区域寻找。按照《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于嘉平三年（251 年）“九月庚申，葬于河阴，谥曰文贞，后改谥宣文。先是，预作终制，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24]高原陵所在的首阳山，应等同于《述征记》说的高原陵地处的“邙之东北”。根据前面的研究，可知这里的“邙”指代的范围，东不会超过首阳山主峰，“邙之东北”应当就是汉晋广义首阳山东段偏北的山阴地带。

由此，再看曹休墓位置及其附近墓葬的所处区域，便更能理解严辉先生的判断：“魏晋文献记载的邙之东北，指的是今邙山中段的东北，即朱仓东北区域，距离曹休墓数公里而已。至此，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司马懿、司马师的墓也在这里。司马懿、司马师曾是曹魏重臣，他们和曹休一样是在陪陵，陪曹魏的陵。”[25]他的言下之意，这一带正是魏文帝首阳陵的陪葬墓区。

从曹休墓所在的朱仓往东不远，就是应有司马懿墓的汉晋广义首阳山东段偏北的山阴地带，再往东即首阳山主峰以北区域，东西全长约有十多千米。这样大的一个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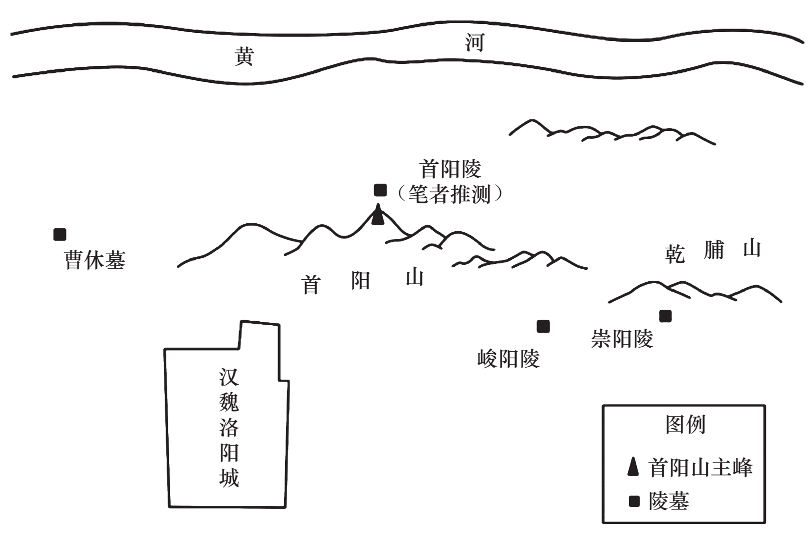
域是否都属于首阳陵区及其陪葬墓区，还需讨论，不过曹休墓和其附近已探明的11座形制、规模类似的墓葬，数量如此之多，应当不只是曹休的家族墓，因此将上述区域看作相对集中的曹魏高等级墓葬区，问题应该不大。在这个高等级墓葬区中，首阳陵可能位居最东，文帝《终制》中说“其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前又以表其处矣。”明确要求后宫终后合葬首阳陵，给她们划定的葬地是在陵区的涧西。郭皇后去世于青龙三年（235年），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三月庚寅，葬文德郭皇后，营陵于首阳陵涧西，如终制。”[26]即“首阳陵西”[27]，此墓又因此名“首阳西陵”[28]，可见首阳陵区内，帝陵在东，后陵和妃嫔墓区在西，由此结合司马懿、司马师父子及曹休墓等的位置，或可推测首阳山北麓整个曹魏高等级墓葬区也是以东为尊。

乾脯山除见于上引《述征记》和《洛阳记》外，还见于《魏书》《北齐书》等文献[29]。《隋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条记其境内“有首阳山、郦山、乾脯山。”[30]可见直到此时，首阳、乾脯二名依然并存，而《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偃师县”条只记录“首阳山，在县西北二十五里”[31]，可能乾脯山这一名称到唐代就不怎么再被使用了。张剑先生提到有三方也自题葬于“首阳”的唐代墓志，发现地点在偃师西，他认为“唐代时所指首阳山在新庄和南蔡庄之北的邙山南坡，就是今天所称的首阳山。”[32]

新庄和南蔡庄之北一带，紧靠首阳山主峰，在后者的东边，也就是晋武帝峻阳陵所在区域，原来属于首阳山和乾脯山之间的过渡地带，但在唐代则直称为“首阳”了。可见大概正是从唐代以来，广义上首阳山的地理范围东移了，“吞并”了原名乾脯山的那些山头，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其涵盖的范围愈加向东扩展。与此同时，首阳山主峰以西的一大段邙山可能就不再称为首阳山了。

因此，汉晋文献提到的首阳山与今名首阳山，只在主峰区域存在重合，它们在广义概念上所涵盖的范围则有很大不同，曾发生了地理上向东的移动。因此如果在今名首阳山以东寻找魏文帝首阳陵只能是缘木求鱼，而并非文献记载有误。当然广义首阳山概念的变化和乾脯山名称的消失，应当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通过以上对“首阳山”和“乾脯山”古今地望及名称的辨析，笔者基本同意严辉先生文章里给出的提示，即应在朱仓附近也就是邙山中段的东北的区域范围内，重新考虑魏文帝首阳陵的位置。具体来说，笔者认为首阳山主峰以北地带最值得关注，即偃师市邙岭镇一带（图一），这竟与“文帝首阳陵在偃师市邙岭乡赵坡村”的民间传说大体而合，从卫星地图上看，其北也还有山可倚。当然从这个地点到曹休墓，中间还有很大一个区段缺乏考古资料的支撑，希望未来能在此多做工作。同时，搞清楚了首阳山与乾脯山的相互位置关系，对研究这一带曹魏、西晋墓葬分布规律等学术课题也不无裨益。



图一　魏晋时期洛阳城附近地理环境和主要遗迹示意图

注　　释

［1］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J］.文物，2011（9）：32～47.

［2］严辉.曹操墓和曹休墓的比较与研究［N］.中国文物报，2010-09-17（5）.

［3］三国志·文帝纪·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59：81.

［4］同［3］：86.

［5］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一·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3：132.

［6］笔者查询了几种现代地理辞典，均没有查到今名广义首阳山的确切范围，根据包括Google earth等各种资料可以推断出今名首阳山是偃师境内一段邙山的泛称，应该西接孟津县境，主体部分在今偃师市首阳山镇和邙岭镇境内，并向东延伸，东西长约十多千米，其中一些小山头还有自己的名字。笔者通过Google earth，大致推定首阳山最高点在偃师市西部首阳山镇邢沟村西北2.5千米左右，海拔约400米，这里也是整个邙山的最高点。

［7］史记·卷六一·伯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2123.

［8］a.如后汉书·卷六·顺帝纪［M］.阳嘉元年（132年）二月“庚申，敕郡国二千石各祷名山岳渎，遣大夫、谒者诣嵩高、首阳山，并祠河、洛，请雨。”北京：中华书局，1965：259.
b.同书·党锢列传［M］.记范滂在洛阳被囚时曾说“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北京：中华书局，1965：2206.

［9］如东汉末年王粲《吊夷齐文》：“秋之仲月，从王师以南征。济河津而长驱，逾芒阜之峥嵘，览首阳于东隅，见孤竹之遗灵。”魏明帝曹睿《步出夏门行》：“步出夏门，东登首阳山，嗟哉夷齐，仲尼称贤。”夏门汉雒阳城北墙上偏西的一个门，此门至晚在西晋已改称“大夏门”。又如阮籍《咏怀诗》：“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朝出上东门，遥望首阳基”。上东门为汉魏洛阳城东墙之上最北的一个城门。

［10］水经注校证·卷五·“河水”条［M］.北京：中华书局，2007：128.

［11］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西汉、东汉时期［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42～42.

［12］太平御览·卷四十·地部五·“首阳山”条引戴延之《西征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91.
[13] 晋书 • 卷三四 • 杜预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032～1033.
[14] a. 遗令中还有“郭氏丧亡”这个时间节点。“郭氏”是谁？史籍似乎没有其他记载。据晋书 • 卷三四 • 杜预传 [M]. “文帝嗣立，预尚帝妹高陆公主”，北京：中华书局，1974：1025.
b. 以及陈书 • 卷十七 • 袁敬附袁枢传 [M]. “案杜预尚晋宣帝第二女高陵（查《晋书 • 地理志》无高陵县，而雍州京兆郡下有高陆县，当为公主汤沐邑，故“陵”应为“陆”之误）宣公主，晋武践祚，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赠公主，元凯无复驸马之号。”北京：中华书局，1972：241. 高陆公主在泰始元年（265 年）司马炎建立晋朝之前就已去世，笔者怀疑这位郭氏是杜预的续弦，但无法知晓其去世时间。
[15] 有关汲冢书出土时间的考证，可参考辛德勇 . 谈历史上首次出土的简牍文献——《茂陵书》. 文史哲 [J]，2012（4）：49～59.（请重点参考该文第一部分即 49～52 页的内容）
[16] 杜预. 春秋左传正义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720.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 西晋帝陵勘察记 [J]. 考古，1984（12）：1096～1107.
[18] 文选 • 卷三八 • 傅亮《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李善注引 [M]. 中华书局，1977：534.
[19] 杜预遗令中说墓地可以“北望夷叔”，说明距离首阳山上的伯夷叔齐祠不远，而戴延之《西征记》说距离洛阳东北二十里的首阳山上有伯夷叔齐祠，如前分析，这里说的应是狭义首阳山，即首阳山主峰一带，伯夷叔齐祠可能就是建在主峰之上。由此或可也能推测杜预墓所在的“首阳之南”，就在首阳山主峰之南。
[20] 刘纬毅. 汉唐方志辑佚 [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70.
[21] 此信息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朴南巡同学告知并应允引用，在此致谢。引自其著. 赞皇北朝李氏家族墓葬的初步整理和研究 [D]. 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3：26～28.
[22] 张剑. 洛阳出土墓志与洛阳古代行政区划关系 [A]. 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 [C]. 北京：朝华出版社，2002：157.
[23]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偃师市文物局. 河南偃师市首阳山西晋帝陵陪葬墓 [J]. 考古，2010（2）：47～62.
[24] 晋书 • 卷一 • 宣帝纪 [M]. 中华书局，1974：20.
[25] 严辉. 曹操墓和曹休墓的比较与研究 [N]. 中国文物报，2010-09-17（5）. 需要指出的是，晋景帝（追封）司马师是在曹芳、曹髦时期坐大，若说死后陪陵，由于曹芳已被废，曹髦尚在位，由此往上推，他似乎陪葬明帝高平陵更为合理，但文献既然说“邙之东北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很可能司马师是葬于司马懿墓侧，也就是葬在陪葬魏文帝首阳陵的司马家族墓地中。
[26] 三国志 • 卷三 • 明帝纪 [M]. 北京：中华书局，1959：104.
[27] 三国志 • 卷五 • 后妃传 [M]. “青龙三年春，后崩于许昌，以终制营陵，三月庚寅，葬首阳陵西。”北京：中华书局，1959：166.
[28] 三国志 • 卷五 • 后妃传 [M]. 裴注引《魏书》载哀策曰：“维青龙三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宫启殡，将葬于首阳之西陵。”北京：中华书局，1959：167.
[29] a. 魏书 • 卷九 • 肃宗纪 [M]. “（神龟元年）十有二月辛未，诏曰：‘民生有终，下归兆域，京邑隐赈，口盈亿万，贵贱攸凭，未有定所，为民父母，尤宜存恤。今制乾脯山以西，拟为九原。’”北京：中华书局，1974：228.
b. 魏书 • 卷十一 • 出帝平阳王纪 [M]. “（中兴二年四月）壬辰，齐献武王还邺，车驾饯别于乾

脯山。”北京：中华书局，1974：282.
c．上引事也见于北齐书 • 卷一 • 神武帝纪上［M］.“（永熙元年四月）壬辰，还邺，魏帝饯于乾脯山，执手而别。”北京：中华书局，1972：9.
［30］隋书 • 卷三十 • 地理中［M］. 北京：中华书局，1973：834.
［31］元和郡县图志 • 卷五 • 河南道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83：132.
［32］同［22］.

Study on Shouyang Mountain

Geng Shuo

Abstract: The excavation of Cao Xiu's tomb recent years in Mengjin, Luoyang, provides an important clue for determining the location of the Shouyang Mausoleum of Emperor Wendi of Wei Dynasty. Based on the preceding discovery, this article differentiates and analyses the ancient and modern location and name of Shouyang Mountain and Ganpu Mountain. This article believes Shouyang Mountain from historical sources in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is in an overlapping portion of the ancient and modern locations. The clarity of this area is significant to finding Shouyang Mausoleum.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specifically mentions the possible area located in north of main peak area of Shouyang Mountain.

Key words: Cao Xiu; Shouyang Mausoleum; Mang Mountain; Tombs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北燕、柔然与草原丝绸之路
——从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器谈起

刘　宁

（辽宁省博物馆，沈阳，110167）

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是十六国时期有确切年代及墓主人的墓葬，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有 5 件玻璃器，计有鸭形器、碗、杯、钵和 1 件残器，是中国出土的年代较早而数量又最多的一批玻璃器[1]。这些珍贵的玻璃器，数量较多且成一组出现，较少见，在中国大陆或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同一时期的同一个墓葬里未曾出现数量这么多的玻璃器。冯墓玻璃器到中国正常应该是通过丝绸之路过来的，究竟是怎样的一条丝路，通过什么人带入北燕的？本文根据文献记载及相关研究，认为是经过草原汗国柔然传来，下面试分析柔然、北燕与草原丝绸之路的关系。

一

鸭形玻璃注　长 20.5 厘米，腹径 5.2 厘米，重 70 克。淡绿色玻璃质，质光亮，半透明，微见银绿色锈浸。体横长，鸭形，口如鸭嘴状，长颈鼓腹，拖一细长尾，尾尖微残。背上以玻璃条粘出一对雏鸭式的三角形翅膀，腹下两侧各粘一段波状的折线纹以拟双足，腹底贴一平正的饼状圆玻璃。此器重心在前，只有腹部充水至半时，因后身加重，才得放稳。此器造型生动别致，在早期玻璃器中十分罕见（彩版二，1）。

侈口玻璃杯　口径 9.4 厘米，高 8.8 厘米。深绿色玻璃，侈口，颈微收，下腹微鼓，圆底，底心上凹，质地纯净，因含深绿色而不甚透明，但映光以视，澄澈如湖水，鲜丽异常（彩版二，2）。

玻璃碗　口径 13 厘米，底径 4.4 厘米，高 4.3 厘米，重 100 克。透明玻璃，闪淡绿色，质光洁明澈，口微敛向内卷沿，口外出一道弦纹痕迹，下用玻璃条粘成圈足，底心微凹，尚留有烧制时因敲掉粘柄而遗留的粘疤残痕。此器胎壁甚薄，而做工极精，反映了早期玻璃器的工艺水平（彩版二，3）。

玻璃钵　口径 9.5 厘米，高 9.2 厘米，壁厚 0.2～0.3 厘米。残碎复原，与玻璃碗质地、色泽相同（彩版二，4）。

玻璃残器　底径 7.6 厘米，残高 1.2 厘米，壁厚 0.2 厘米。质色同玻璃碗，器残，原应为一件高足杯的底足，也可能是器座。

二

关于这几件玻璃器的研究，主要是安家瑶先生的两篇文章，一是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的古代玻璃器皿》中研究了这批器物，并把它们确定为进口的罗马玻璃[2]。二是为编写《北燕冯素弗墓发掘报告》，她应邀又一次考察了这批玻璃器实物的现状及工艺，并与罗马玻璃进行了比较。安先生认为这批玻璃器皿的工艺相似，都是无模吹制成型，采用了顶底铁杆技术，口沿内卷成环状，这些工艺都是罗马时期常用的玻璃工艺。玻璃的熔制水平较高，尤其是碗和杯，气泡和杂质都很少，透明度好。鸭形器是工艺最复杂、器形和装饰最有特点的一件，全中国唯此一件，国外也无完全一样的造型。用玻璃条、玻璃丝盘卷做出装饰，粘贴在容器表面，这种技术属于热装饰工艺中的一种，玻璃鸭形器成型和装饰的全过程都是在炉前完成的，要求有很高的技术水平。鸭形玻璃器的装饰手法也是罗马玻璃经常采用的。经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用电子探针检测，这几件均为普通的钠钙玻璃，可以归类到罗马玻璃中，很可能是罗马帝国东北行省的产品[3]。

安家瑶文章中提到冯墓五件玻璃器与域外罗马玻璃器的比较时指出，其中一件深翠绿色的玻璃杯，亦是绝无仅有的，玻璃杯的研究结果表明，3 世纪，罗马工匠制造有类似颜色的彩色玻璃器，在年代可靠的罗马玻璃器中，与此杯器形相似的玻璃器出现于 4 世纪末，“没有发现早于 375 年的，可以有把握地说，是罗马晚期的器皿”。冯素弗死于 415 年，距此中间只有几十年的差距，因此 375～415 年是这批玻璃器制造和输入的最宽泛的年代。

375～415 年正处于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玻璃器是这一时期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当时人们称之为琉璃、水精，非常珍贵，多是舶来品。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斗富时，西方进口的玻璃器是宝物中的一项。《洛阳伽蓝记》：“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4]。

考古发现这种“从西域而来”的罗马玻璃在中国、朝鲜半岛及日本均有出土，如广州西汉中期墓出土三件玻璃碗[5]，洛阳一座东汉墓出土缠丝玻璃瓶[6]，南京象山七号东晋墓出土一件磨花筒形杯等[7]，与冯素弗墓年代相近的南北朝墓葬出土的罗马玻璃器更为集中，显然这些罗马玻璃器应该是通过丝绸之路进口到中国的。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根据徐苹芳先生的研究，认为共有四条：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其中丝绸之路的主道是汉唐两京（西安和洛阳）经河西走廊至西域的路线，也就是沙漠丝绸之路。4 世纪的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北方草原上的东西交通日益重要，至 5 世纪北魏时期，以平城（山西大同）为中心，西接伊吾（新疆哈密），

东至辽东（辽宁辽阳），经朝鲜而至日本。逐渐形成了一条贯通中国北方的东西国际交通路线，这条草原路线是连接西亚、中亚与东北亚的国际路线。平城和龙城（营州，今辽宁朝阳）是这条路线上的两颗明珠[8]。魏晋十六国时期的辽西，是连接草原丝路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重要环节，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也已发现了这一时期的罗马玻璃[9]，有一部分可能是通过这条横贯中国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输入的。

具体到冯素弗墓出土的这五件罗马玻璃器的来源，应是从柔然带入北燕的。柔然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主要活动于4世纪末到6世纪中叶。《魏书·蠕蠕传》说“蠕蠕，东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闾氏。”“蠕蠕”是后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对柔然的贱称。北魏天兴五年（402年），柔然主社仑自称丘豆伐可汗，进入政权的强盛时期，其控地“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其常所会庭则在敦煌、张掖之北。”[10]关于北燕和柔然的关系，一方面，据文献记载，北燕时期与草原及西域诸国有较多往来的有柔然；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和中西亚的交通主要是通过西域，柔然地处北方草原，西连西域，东接三燕，彼此往来，有地理上的方便。柔然强盛时，曾染指今内蒙古、新疆甚至中亚地区，是可以与北魏相互敌对的草原游牧王国。柔然王又曾长期客居北燕，这应当是这批玻璃器发现的由来。柔然与北魏的关系非常复杂，402～487年间二者战斗居多，和好居少[11]。因此柔然王往来草原丝绸之路是可以不走经过平城的路线，所走的草原丝路应与学术界公认的从西域到平城的北方草原路线有所不同。

三

从文献记载看，柔然与北燕有三次往来。

第一次是社仑之后410～414年在位的斛律可汗，与北燕主冯跋有姻亲关系。斛律刚登台不久，411年派人到北燕求婚。这件事在《资治通鉴》及《晋书》上均有记载，内容相同，记载的文字稍有出入。《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纪三十八》安皇帝辛义熙七年（辛亥，411年）记载为：

> 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献马三千匹于跋，求娶跋女乐浪公主，跋命群臣议之。辽西公素弗曰：“前世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许以妃嫔之女，乐浪公主不宜下降非类。”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以乐浪公主妻之。

《晋书》卷一百二十五载记第二十五《冯跋》的记载为：

> 蝚蠕勇斛律遣使求跋女伪乐浪公主，献马三千匹，跋命其群下议之。素弗等议曰：“前代旧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许以妃嫔之女，乐浪公主不宜下降非类。”跋曰：“女生从夫，千里岂远！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许焉。遣其游击秦都率骑二千，送其女归于蝚蠕。

从记载可知，当初冯素弗认为柔然是“非类”，应以前代的惯例以宗室女嫁之，是

反对以公主远嫁。因此，当后来斛律举家来北燕时，势必要与素弗这个北燕的重臣搞好关系，所呈献的礼物应该非同一般。

第二次是斛律将嫁女与北燕冯跋和亲时，斛律兄子步鹿真与大臣树黎共谋，将斛律父女逐往北燕，步鹿真立为可汗，斛律举家来北燕，后请还其国，在回归时半途被杀。据《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纪三十八》安皇帝辛义熙十年（甲寅，414 年）记载：

> 柔然可汗斛律将嫁女于燕，斛律兄子步鹿真谓斛律曰："幼女远嫁忧思，请以大臣树黎等女为媵。"斛律不许。步鹿真出，谓树黎等曰："斛律欲以汝女为媵，远适他国。"树黎恐，与步鹿真谋使勇士夜伏于斛律穹庐之后，伺其出而执之，与女皆送于燕，立步鹿真为可汗而相之。
>
> 斛律至和龙，燕王跋赐斛律爵上谷侯，馆之辽东，待以客礼，纳其女为昭仪。斛律上书请还其国，跋曰："今弃国万里，又无内应，若以重兵相送，则馈运难继，兵少则不足成功，如何可还？"斛律固请，曰："不烦重兵，愿给三百骑，送至敕勒，国人必欣然来迎。"跋乃遣单于前辅万陵帅骑三百送之。陵惮远役，至黑山，杀斛律而还。

《晋书》卷一二五载记第二十五《冯跋》记述为：

> 蝚蠕斛律为其弟大但所逐，尽室奔跋，乃馆之于辽东郡，待之以客礼。跋纳其女为昭仪。时三月不雨，至于夏五月。斛律上书请还塞北，跋曰："弃国万里，又无内应。若以强兵相送，粮运难继；少也，势不能固。且千里袭国，古人为难，况数千里乎！"斛律固请曰："不烦大众，愿给骑三百足矣。得达敕勒国，人必欣而来迎。"乃许之，遣单于前辅万陵率骑三百送之。陵惮远役，至黑山，杀斛律而还。

据《通鉴》这件事发生在 414 年，也是在同一年，步鹿真继可汗位不久，王族内讧，为社仑季父仆浑之子大檀绞杀，步鹿真在位并未超过一年。大檀亦作"大但""檀檀"，是继步鹿真之后柔然的第十位可汗。

第三次是柔然可汗大檀送马三千匹、羊万口给北燕。这件事无具体的年代记载，《资治通鉴》与《晋书》均是在记载万陵杀斛律之后，仅以数语带叙此事，《通鉴》的记述为："大檀亦遣使献马三千匹、羊万口于燕。"《晋书》记载为："蝚蠕大但遣使献马三千匹，羊万口。"大檀 414～429 年在位，也是柔然汗国的极盛期，继续与北燕冯跋联盟。无论是斛律还是大檀在与北燕和亲，赠送马匹的同时，还与地处其南方的后秦和亲，与南朝的宋、齐、梁等通好，目的都是为了牵制北魏，以便向南进攻，获取更多的粮食和物资。因此送马羊与北燕的时间亦应在大檀即位后不久。

柔然政权存在时间（402～552 年）与北魏王朝存在时间（386～534 年）大体相当。这个时期内，我国北方诸少数民族中，只有柔然能与北魏相抗衡，故二者既时相攻战，又时相和好。从上述文献记载柔然与北燕往来的时间段分析，从柔然到北燕，如果走

传统的丝绸之路，从河西走廊到龙城，其间隔着北魏、后秦及西北的几个凉国，且柔然“其常所会庭则在敦煌、张掖之北”，也就是说柔然控制的地域在沙漠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北部，因此柔然到北燕走的应是比丝绸之路北魏平城更北的一条路线。

四

北燕送斛律还其国时，斛律称至敕勒其国人“必欣而来迎”，北燕的部将万陵“惮远役”，至黑山杀斛律，这个“黑山”，应在北燕与敕勒之间，离北燕距离不远，同时，也不应是北魏管辖的地区。据史料记载，唐显庆五年（660年）大将薛仁贵、辛文陵等，率军攻伐契丹，大军进入草原，战于黑山，俘契丹首领阿卜固，解至洛阳[12]。《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纪十六》亦记高宗显庆五年，唐高宗以阿史德枢宾、延陀梯真、李合珠并为冷岍道行军总管讨叛奚，奚族遣使降。再以阿史德枢宾等为沙砖道行军总管，会同营州辽东经略薛仁贵，以讨伐契丹。薛仁贵与辛文陵于黑山大破契丹，擒阿卜固献于当时皇帝所在的东都。辽代史料中多次提到黑山，它可能是通往漠北的某条传统路线的一个必经之地。《辽史·营卫志》记载：“黑山在庆州北十三里，上有池，池中有金莲。”辽庆州在今西拉木伦河北的巴林右旗。根据考古调查、发掘及有关考证，黑山就在巴林右旗的罕山，有辽代祭祀的遗址[13]。巴林右旗今属赤峰市，由赤峰向北经巴林桥跨过西拉木伦河即为右旗辖境。北燕时期，赤峰一带是库莫奚的活动地区，此时尚未强盛，不足与北燕抗衡，因此，斛律归国时，要避开北魏的管辖区域，从龙城（朝阳）出发，向北走是最安全的路线。另一方面斛律入勅勒境不仅可安全到达柔然，而且会受到其国人的欢迎，说明其时柔然与敕勒交好，关系密切。敕勒，又称赤勒、高车、狄历、铁勒、丁零（丁灵）。汉朝击溃北匈奴之后，敕勒的地域开始南移，与中原的汉人交往。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继匈奴、鲜卑之后，敕勒人和柔然人活动于中国大漠南北和西北广大地区。

敕勒与柔然互打互包容，柔然曾长期驭使敕勒。据《魏书》记载，高车的叱洛侯叛其渠帅投柔然，引导柔然主社仑破高车诸部落，特别重创高车主力与核心，高车臣服于柔然，奠定了柔然漠北霸权的基石。社仑称汗建国，基于叱洛侯的功绩，社仑德之，封为大人。社仑之后的斛律仍待之如故。步鹿真趁斛律与北燕和亲，将其父女逐往北燕继汗位后，与社仑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妻告步鹿真，叱洛侯欲举大檀为主，遗大檀金马勒为信。步鹿真闻之，归发八千骑往围叱洛侯，叱洛侯焚其珍宝，自刎而死。步鹿真遂掩大檀，大檀发军执步鹿真及社拔，绞杀之，乃自立。”[14]

叱洛侯曾给大檀“金马勒”为信，事发后又“焚其珍宝”自刎而死，其珍宝从何而来？荒漠草原上很难生产出珍宝，叱洛侯的珍宝应来自丝绸之路，即：草原丝路可通高车（勅勒）。勅勒既从属且紧依于柔然，丝绸之路应该也能通连柔然。当时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西方商人，被称作“商胡”，这些珍宝应与“商胡”有关。

据《魏书》记载，社仑侵入高车后，高车要向柔然纳贡还要参加柔然发动的战争，高车不堪压迫，多次反抗。487 年被柔然所役属的高车副伏罗部阿伏至罗及其弟穷奇逃离柔然，建立了高车国，阿伏至罗为了能打败柔然，采取了联合北魏的策略。北魏太和十四年（490 年）"阿伏至罗遣商胡越者至京师（北魏京师平城，今大同），以二箭奉贡"[15]。这是高车立国后，想脱离柔然，投向北魏（此时北燕已亡），其首领利用"商胡"作为使者，向北魏示好送礼，且有盟誓之意。商胡的记载很重要，他们想顺利地来往于丝路做生意，必然会与沿路的各国打交道，因而可以代行使者之职。出现在 490 年记载里的商胡，在丝路上往来必然已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之前必然也到过柔然和高车控制的地域。所以这几件玻璃器可能来自商胡。

高车遣商胡到北魏示好，说明商胡走的路线既可通到平城，也可通连漠北的勅勒与柔然。冯素弗葬于 415 年，柔然与北燕的三次往来，特别是前两次都在 415 年之前，冯墓出土的深绿色罗马玻璃杯的最早产生年代不超过 375 年，因此推测冯素弗墓出土的这几件玻璃器应该是 411～414 年由斛律带到北燕的。

那么，这批玻璃器是如何到柔然的？再看柔然与丝绸之路诸国之间的关系，当柔然强盛时，西域"小国皆苦其寇抄，羁縻附之。"[16]斛律统治时期，柔然的势力已进入伊吾、高昌之地，并联合悦般国夹击乌孙，瓜分其地，乌孙"其国数为蠕蠕所侵，西徙葱岭山中。"[17]远征西域的胜利，使得柔然号称占有东到朝鲜，西至巴尔喀什湖的广大地区[18]。但北魏与柔然对西域的争夺从五世纪初柔然建国起就从未间断，双方争夺的结果，互有胜负。因此，通过河西走廊，经伊吾，横贯南北疆，越葱岭与域外建立联系的丝绸之路，在柔然与北魏争夺西域、或柔然征战西域时期，因西域诸国的叛附无常，战乱频仍，应是比较混乱，没有保障的。

里海东南岸有一个重要城市，也是丝路上的一个重要地点"和椟城"（即里海东南的达姆甘），在今伊朗。以里海边上的这个丝路站点为出发点，一路向东，经撒马尔罕，越葱岭，有三条线路通河西走廊，北路走碎叶、高昌、哈密到敦煌，中路沿昆仑山、天山，经疏勒、龟兹、焉耆，还有南路经于阗、且末均至敦煌，沿汉时张骞开通的河西走廊道路，可直到长安。

另外，《随书・铁勒传》提到铁勒（高车）的疆域范围："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西海即今里海。商胡要到达高车或柔然，除越葱岭，经新疆地区的丝绸路线外，从和椟城出发还应有一路向东北，即可到高车、柔然控制地盘的路线。所以冯素弗墓出土的这批罗马玻璃器是草原丝路可能在里海东南岸和椟城这个点上，沿里海东岸，又一路向东北，到高车（今哈萨克斯坦，汉时属大月氏境内）柔然的地域。因此，这批玻璃器或是由商胡带到高车，然后高车向柔然纳贡的，或是由商胡直接带到柔然的。

这样丝路就从和椟城这个点分开，一是越葱岭，穿新疆，经河西走廊向东，是传统的沙漠丝路；一是向东北走里海东岸到高车，经"敦煌、张掖之北"柔然控制地盘的草

原丝绸之路。

草原丝绸之路也至少有两条路通向东方，一条是传统意义上通向北魏平城的，这是用商胡向北魏通使示好走的路线，也就是五世纪北魏时期以平城为中心，西接伊吾的草原丝绸之路。自冯素弗墓出现这组玻璃器之后，对其所经过的草原丝路的走向，学界一般认为是经和椟城进入中国境内后，走大同（平城）、张家口、赤峰而后东南折向朝阳（龙城）。通过草原路线输入到东亚的罗马玻璃应属于罗马晚期偏东部行省的产品，从制造工艺方面分析，冯素弗墓出土的罗马玻璃与朝鲜半岛庆州和河北景县出土的罗马玻璃比较相近[19]，景县在山西大同的东南，紧邻山东德州，也是离山东半岛出海口较近的、发现罗马玻璃器的一个地点，暗示着在朝鲜半岛发现的罗马玻璃有可能是通过平城这条路线，经山东半岛从海路输入。但这或是北魏统一北方之后的情况。在此之前的北燕时期，柔然和北燕的往来，走的显然是另外一条路线。

这另一条路线就是柔然王斛律举家来北燕时避过北魏管辖区域，更北的路线，从斛律还家被杀黑山事件，可推知这条路线是由朝阳北上，跨过西拉木伦河走黑山（今巴林右旗境）进入高车（东部高车）领域，到达柔然（如果走赤峰—张家口一线，则需经今河北围场，而无须穿过西拉木伦河），这是不用经过平城而可到达中国东北的一条路线。因此，北燕玻璃器及朝鲜半岛发现的玻璃器亦有可能是经里海、高车，通过柔然，经巴林右旗的黑山进入北燕，进而向辽东、向朝鲜半岛北部进入的这条北方草原路线输入的。这是一条可考证于文献记载的路线，学界对此似还罕有注意，本文的论证希望对草原丝路的研究能有所裨益。

注 释

［1］黎瑶渤．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J］．文物，1973（3）．

［2］安家瑶．中国的古代玻璃器皿［J］．考古学报，1984（4）．

［3］安家瑶．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器［A］．桃李成蹊集——庆祝安志敏先生八十寿辰［C］．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04.

［4］杨铉之．洛阳伽蓝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85.

［5］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M］．文物出版社，1982：239.

［6］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出土文物集粹［M］．北京：朝华出版社，1990：图 50.

［7］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 5 号、6 号、7 号墓清理简报［J］．文物，1972（11）．

［8］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J］．燕京学报，1995（1）．

［9］a．〔KO〕Leeln-sook．The Silk Road and Ancient Korean Glass［J］．*Korean Culture*，14：4（1993）.

b．橿原考古学研究所．新泽千家 126 号坟［M］．奈良：奈良县教育委员会，1977：46～48.

［10］魏书卷一〇三・蠕蠕、匈奴宇文莫槐、徒何段就六眷、高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91.

［11］田建平．略论柔然与北魏的关系［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3）．
［12 旧唐书・卷八三・薛仁贵列传［M］．“俄又与辛文陵破契丹于黑山，擒契丹王阿卜固及诸首领赴东都。”新唐书・卷一一一・薛仁贵列传［M］．亦有相同的记载．
［13］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巴林右旗文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罕山辽代祭祀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1988（11）．
［14］同［10］：2292．
［15］同［10］：2310．
［16］北史・卷九八・蠕蠕传、匈奴宇文莫槐、徒何段就六眷、高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3251．
［17］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乌孙国［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67．
［18］王静．柔然汗国研究［M］．太原：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3．
［19］同［3］．

The Northern Yan, the Rouran Khaganate and the Grassland Silk Road: A Discussion From the Glasswares of Feng Sufu's Tomb

Liu Ning

Abstract: At Feng Sufu's Northern Yan tomb excavators unearthed five Roman glass artifacts. These glass artifacts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eastern provinces of the late Roman period. They traveled through the northern steppe route into the East Asia. The Rouran Khaganate and the Northern Yan are related with each other. The Khan of Rouran Khaganate, Yujiulü Hulü, had lived in the Northern Yan as a guest. These glasswares should have been taken from the Hedu City near the southern Caspian Sea, through the Xinjiang into the Rouran Khaganate, and then crossed the Khingan Mountains into the Northern Yan by the Hu Merchants.

Key words: glasswares; the Northern Yan; the Rouran Khaganate; Silk Road

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丝织品纹样特征探讨

达瓦加甫·乌吉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乌鲁木齐，830000）

一、墓 地 概 述

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位于吐鲁番市向东南40余千米的二堡、三堡乡戈壁荒漠中，是古代高昌王国的公共墓地，有“地下博物馆”的美称。阿斯塔那又叫三堡，位于古墓群西面，它的东北与哈拉和卓相连。哈拉和卓也叫二堡，位于东面。古墓群北望火焰山，东南紧邻高昌故城，东西长5千米，南北宽2千米，占地10平方千米。因气候干燥，墓中的丝织物多保存较好。从1959年至今，大小发掘共13次，共清理墓葬473座，其中阿斯塔那发掘362座，哈拉和卓发掘111座。根据出土纪年物，其中330座墓葬可以判断年代。可知的墓葬年代范围为273年至772年，年代跨度逾五百多年。据研究，墓群的年代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魏晋南北朝早期（3世纪～6世纪初），即西晋至高昌郡阶段；第二期，南北朝中期至初唐时期（6世纪初～7世纪中），即麴氏高昌阶段；第三期，盛唐至中唐时期（7世纪中～8世纪后期），即唐西州时期。这处墓地出土丝织品的数量之大，种类之丰富，纹样之精美，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首屈一指。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的丝织品未有正式的报告发表，但分别见于《丝绸之路·汉唐织物》《考古》《文物》《新疆文物》等书刊的报道，并先后有武敏、夏鼐、薄小莹、赵丰等先生，以及俄罗斯的陆柏、加拿大的盛余韵先生做过研究。

由于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的丝织品年代久远，且因目前丝织品保护技术和能力所限，又大多分散发表在一些图录和简报中，因此可以收集到的标本资料数量也较少。本文图表资料主要来源有：专业刊物陆续发表的发掘简报[1]《织绣》[2]《丝绸之路·汉唐织物》[3]《锦上胡风——丝绸之路纺织品上的西方影响（4～8世纪）》[4]《新疆出土文物》，[5]以及一些研究者的论文。本文通过这些资料对这批墓葬出土的丝织品纹样特征试做分析。

二、纹 样 概 述

（一）丝织品种类

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群出土的丝织品都来自死者的衣物、枕、覆面、囊袋、被褥和绢画等。出土的种类有：锦、绮、绢、缣、纱、刺绣、夹缬、绞缬、绛丝、绨、缯、绫、罗等。三个时期出土的数量及种类如表一所示。

表一　出土丝织品种类（不完全统计）

时期	数量	丝织品种类
第一时期	61 件	锦、绢、绞缬、绞缬、绮、绨、刺绣、缯、纱
第二时期	190 件	锦、绢、绮、缣、绞缬、染缬、绛丝
第三时期	465 件	锦、绢、绮、绫、罗、缣、纱、刺绣、绛丝、染缬、绞缬

（二）丝织品纹样

三个时期共收集到有图版的纹锦、绮、绫、罗等标本 118 件。现将每期的丝织品纹样按出土简报时的介绍及丝织品登记表中的纹样概述如下。

1. 绮

第一时期的纹样有：回纹、菱纹，这个时期丝织品总体出土量比较少，大多绮是彩色绮，没有纹样的居多；第二时期的纹样有：对兽对鸟纹、宝照纹、联珠菱格纹、菱格纹、联珠团花纹、联珠套环纹、龟背纹、“贵”字套环纹、菱纹、联珠套环鸟兽纹；第三时期的纹样有：套环联珠纹、套环联珠菱纹、棋局花鸟纹、团花纹、球路团花纹、菱格纹、花树孔雀纹、菱格花草纹、回纹等。

2. 锦

第一时期的纹样有：彩条锦、禽兽纹、对鸟几何纹、鸡鸣纹，出土数量较少；第二时期纹样有：规矩纹、菱纹、对兽对鸟纹、鸟兽树木纹、树纹、联珠纹、忍冬菱纹、棋局、树纹、几何纹、瑞兽纹、龟背纹、狮纹、菱花、丝纹、双鸟纹、鸳鸯纹、双鸭纹、鸟兽栏杆纹、几何瑞花纹、兽头纹、猪头纹、鹿纹、“吉”字纹、“胡王”纹、对鸟“吉”字纹、方格几何纹、联珠对雀“贵”字纹、套环树纹、联珠天马纹、四角花纹、三叶纹、鸡鸣纹、菱形几何纹、几何纹、对狮对象纹、牵驼胡王纹、凤花纹、联珠对凤纹、联珠对蜍纹、对鸟对羊灯树纹、宝塔纹、条纹、杯花鹰纹、“王”字联珠星月纹、龟甲星月纹、“王”字纹；第三时期纹样有：对马纹、小团花纹、球路团花、菱格四瓣

花纹、龟背纹、双鸟纹、鸳鸯纹、骑士纹、鹿纹、猪头纹、树纹、几何瑞花纹、鸟兽栏杆纹、球路小宝照纹、瑞花遍地纹、对鹿纹、鸾鸟纹、联珠宝相花纹、联珠鹿纹、宝相花纹、天王纹、熊头纹、天马骑士纹、对鸟对狮“同”字纹、对鸭纹、联珠对鸟纹、彩条纹、人面兽身纹、联珠孔雀纹、棋局纹、联珠对马纹、鸡鸣纹、对鸟对树纹、彩条纹、菱形几何纹、禽兽纹、条纹、四叶彩条纹、团花纹、宝相花纹、联珠变体如意卷草纹、联珠戴胜鹿纹、十字棋局纹、环点几何纹、套环对鸟纹、连环对鸟纹、草叶“吉”字纹、条纹提花纹、如意纹。

3. 染缬

第一时期出土的有：蓝地梅花染缬娟、烟地鱼子缬绢、红色绞缬绢、绛色绞缬绢、蓝色印花绢；第二时期出土的有：红地白点夹缬；第三时期出土的有：鹅黄地印绛色朵花纱、绛地菱格梅花印花绢、橘黄地宝花印花纱、绿地对波花鸟夹缬绢、绿色印花绢（印黑色宝相花和缠枝纹）、小联珠菱格填花套色印花纱、白色套色印小宝相花绢、敷彩印花红罗帊、团窠绿叶红鸳鸯夹缬纱、彩色染缬方孔纱、棕地凤鸟花草纹印花绢、黄地印花纱（雪花纹）、红地印花纱（六点梅花纹）、绿地仙人御鹤纹印花绢、浅棕地团窠立鸟纹印花绢、棕色地菱格朵花印花绢、绿色夹缬联珠纹绢、翠绿色绞缬联珠纹绢、烟地印花绢。

4. 刺绣

出土的刺绣品不多，纹样有：卷草纹、花草纹、海兽葡萄纹、鸟兽纹、云团纹、联珠套环纹、联珠纹、如意纹等。

5. 其他

橘黄色地几何纹缂丝绦、缂丝针衣、黄色菱纹罗等。

三、纹 样 特 征

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群出土丝织品的纹样题材十分丰富。以下分为纹样的主体风格、纹样反映的文化交流特点和纹样体现的宗教色彩三个方面来讨论。

（一）纹样的主体风格

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第一时期（西晋至高昌郡阶段）的丝织品是三个时期内最少的，主要纹样是中国传统的丝织品纹样，有回纹、菱纹、禽兽纹等，但同时也有异域纹饰的织物出现（葡萄纹）。这个阶段已经开始吸收西亚装饰图案的纹样因素。但因

资料较少，故难以进行详述的分析。

第二时期纹样织物有大量的动物纹、联珠纹、几何纹、植物纹（其中花纹为辅助纹饰的较多）和少量的文字纹等。此时期的纹样具有浓郁的异域风格，其中动物纹饰成为主流，占有很大的比例。两汉时期丝绸之路主要经南道，自南北朝以后，丝路北移，吐鲁番成为必经之地，必然受到东、西方新的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任何产品的兴衰，都与社会背景相关，同样也能影响到丝织品的纹样上。这一时期，既有中原传统的纹样题材，如龙、羊、鹿等。但在动物纹样上带有瑞祥之意的新的珍禽异兽题材出现在织物、刺绣、染缬上，其中出土凤鸟纹的丝织品较多，寓意吉祥。凤是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有大量对兽对鸟纹锦、对鸟“吉”字纹锦、大联珠立鸟纹锦、联珠对鸟纹小半臂、联珠地凤纹锦等出现。还有由圆形几何点连接排列的、最为普及的联珠纹形成几何形骨架，在骨架内填以动物和植物的各种纹样图案的联珠纹。这类纹样题材在中原盛行于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但在西亚、中亚地区的流行则更早更甚，故一般可认为其源头应在西亚。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群出土的联珠纹最为丰富，其中的主题纹样有人物、植物、动物等[6]。丝绸纹样中的几何纹饰出现的较早，织机几何图案甚至可能出现在殷商时期，到战国由小的几何纹发展到大几何纹。阿斯塔那出土的几何纹从所有记录及标本可见，有回纹、菱格纹、龟甲纹、联珠纹、圆形纹和文字纹。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植物纹类中的花草纹逐渐增多，有作为主要纹饰的植物纹，也有作为辅助纹饰的植物纹。这时期出土的花卉纹较多，而且是作为辅助纹样出现的情况更为多见，特别是在联珠纹外作为辅花表现。如对马纹锦，就是在联珠纹外以四瓣辅花的形式出现。也有的是连接联珠纹的形式，同样在对马纹锦中也有出现。同时也有作为主要纹饰图案的，有黄地球路套团花纹锦、大红地宝相花纹绦式锦等，花纹一般有团花、宝花、朵花等。

第二时期除以上纹样之外，还有大量单色的丝织物。总的来看，此期出土的丝织品色彩绚丽，纹样丰富，不仅有中原色彩的凤鸟纹，还有大量外来纹样，如联珠纹和结构对称性较多的纹样等，也有生活化的场景，如牵驼胡王纹锦覆面等纹样，体现了文化因素的多元和相融。

第三时期的织物纹样有联珠纹、几何纹、植物纹（主流）、动物纹、少量的文字锦。出土的刺绣纹样有联珠纹等。出土的染缬纹样有大量的印花纹样和少量的动物纹及几何纹。纹饰中的主题纹饰有小团花、几何纹、对马纹、猪头纹、鹿纹、对鸡纹、立鸟纹、彩条纹、人面兽身纹、宝相花纹、梅花纹、狮纹、文字锦、孔雀纹、对鸭纹、骑士纹等。主题纹饰有不对称的多于对称的纹饰，纹饰内容跟上期相比，显得更加的自然。联珠花纹的纹饰在此时期到了鼎盛时期。此时期最有特点的是小团花锦与联珠动物纹锦。小团花是由联珠圈构成的簇四排列的团花纹，团花不仅由单层到多层发展，同样，团花纹饰的辅花已达到最为复杂的四向忍冬纹阶段。这时的动物纹饰到达鼎盛时期，花草纹饰也由辅助纹饰走向主纹饰，并向宝相花发展。

第三时期的纹样主流从动物纹样过渡到与植物纹样并存，到植物纹样大放异彩，尤

其是宝相花纹。此时期的纹样色彩更加绚丽，纹样不仅丰富，而且比较上期更加自然、生动；纹样元素结合多样化，纹样的结构非对称性多于对称性结构。

（二）纹样的文化交流特征

丝织品的纹样，大多是人们将自己所喜爱的神、瑞兽、植物等，通过织机的工艺表现在丝织品上，不仅代表了当时人们的工艺技术，同样表达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审美情趣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人们的变化而变化，丝织品纹样的更新换代同样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关。吐鲁番作为丝绸之路上的枢纽，是中外商旅的必经之地，许多来自中亚的商人过往与此，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以贸易经商闻名的粟特人。粟特人作为古代丝绸之路贸易的承担者，被称作“东方腓尼基人”，主要活动的年代是3～9世纪。他们不仅是商人，同样扮演着宗教、文化、科技的传播者角色。粟特人的东来，不仅将他们所信仰的宗教——袄教带入到丝绸之路沿线，甚至建立聚落和袄祠。根据吐鲁番出土的文书可知，粟特人也在高昌建立了袄祠，这不仅说明高昌有粟特人的聚落，而且逐步将自己的文化成功引入到了内陆地区。在异域文化影响到当地固有文化时，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好，会有所保留的接受外来的文化，包括宗教、艺术等。作为丝绸之路的主角——丝绸，其纹样必然会受其影响而使本土的纹样有所改变。

根据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群出土的丝织品的分析，发现数量出土最多的纹样是联珠纹、动物纹和植物纹。这些有着异域风情图案的丝织品出现在以汉文化为主体的高昌地区，体现的应是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繁盛。

吐鲁番地区自1世纪以来多次经历政权的兴衰更迭，且毗邻北方草原游牧汗国，又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必然导致不同地域的文化在高昌的碰撞融合。丝织品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媒介，纹样也必然会发生变化。

联珠纹是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出土的丝织品图案艺术中，最引人瞩目的表现形式，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以联珠圈纹为图案的联珠纹。联珠圈纹在图案纹样中表现为一种结构框架，其与禽兽、人物、花卉等各种题材组合成复杂纹样，使之成为装饰纹样的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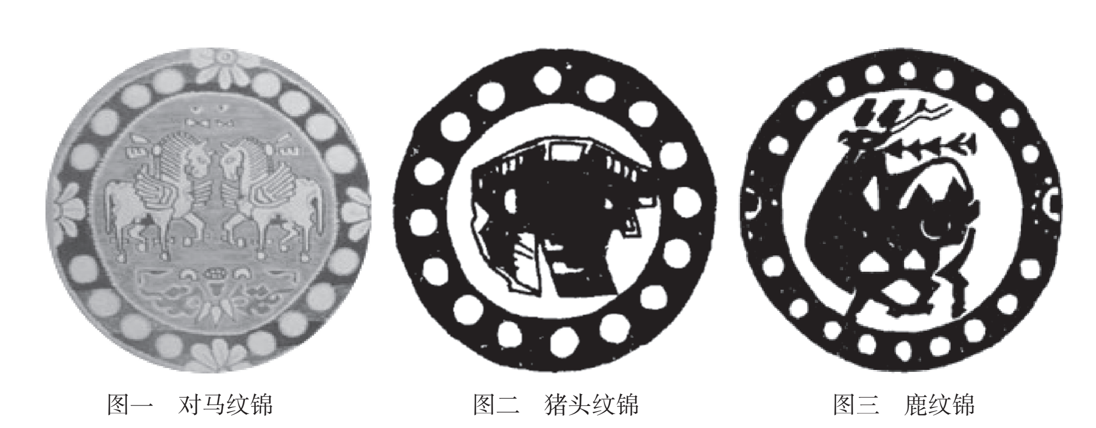
联珠纹在中原盛行于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但其纹样早在原始彩陶、商周青铜器以及两晋青瓷上，均有出现过，但是一直没有形成连续的复杂纹样传统。对于联珠纹的来源虽然众说纷纭，但联珠纹与禽兽、人物、花卉等题材组成的复杂纹样，在古代西亚、中亚地区的流行则表现的更早一些，特别是在联珠纹圈内填各种动物纹饰，主要有翼马、鸾鸟、猪头、狮、象、孔雀、骆驼、大角鹿、胡人、鸡、鸭和狩猎等，这些纹饰主要出现于6～7世纪，与中原的传统纹样有着很大的区别，却与波斯萨珊和中亚粟特地区等西方文明有着密切联系，故一般认为其源于西亚。

联珠纹圈内的翼马纹样，即是带有翅膀的马纹，唐代称之为“天马”。带翼的天马

一说是波斯萨珊时期祆教日神米特拉的化身，具有崇高的宗教含义；一说是埃及之太阳神。翼马纹样约在北朝末来到中国，出现在了丝织品图案之中（图一）。

织锦上的猪头纹形象，一般被认为是来自波斯萨珊时期祆教伟力特拉格纳神的化身，表现为独特的萨珊式纹样。在崇尚力量的萨珊人信仰的祆教经典里，伟力特拉格纳神的化身就是“精悍的猪”，伟力特拉格纳神的化身还有骆驼和山羊。一般出现在 7 世纪中期左右（图二）。

除此之外，鹅（鸭）寓意着云，是早期代表月亮的动物，又因嘴衔葡萄枝而表示太阳；动物脖颈、腿上的绶带源于王室专用的披帛，借以强调其神圣的属性，雄鸡被认为是阿胡拉 • 马兹达的使者斯劳沙的圣禽。[7]一般来说，这些置于联珠圈内的动物纹饰都具有宗教或神话的原型（图三）。



图一　对马纹锦　　　　图二　猪头纹锦　　　　图三　鹿纹锦

此外，联珠纹以外还常填以葡萄纹，这类图案在 3 世纪就被引入且用到了丝织品纹样中。到唐代，葡萄纹被更多地织入到丝织物中。

联珠纹织物的差异来自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在波斯，是蕴含着复杂的宗教意义；在中国，是因为审美情趣与艺术选择，融入了自身的理解。出土的联珠圈纹内不仅有西亚的装饰题材，同样有中国传统的纹样，说明联珠圈在向中西方传播中，图案面貌不断变化，这说明纹样是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中原对联珠圈内题材的改造，使纹样更加中国化、交融化，体现了吸收的过程。如有纪年的（551 年）对兽对鸟纹锦，是丝织品中较早的织物，在联珠圈纹内有对牛对马对鸟纹。其中的马纹是翼马，属典型的波斯萨珊时期风格，而鸟纹是凤鸟，是中国传统纹饰。联珠纹到后期走向衰落，最晚的是阿斯塔那出土的联珠对龙纹绫。

如上所述，丝绸之路上的古代各国，不仅交换的是物品，也交流着文化，同时影响人们的审美风格。从阿斯塔那出土的丝织品纹样可以看出，纹样不仅仅是被简单传入到了中国，唐人对联珠纹的改造不仅仅是联珠纹本身，还有其内的主题纹饰。联珠纹在特定的祆教环境中具有特定的意义，而脱离其依托的文化背景，纹样只能保留装饰的作用。在新的地区被借用、复制时，人们会按照自己的社会文化背景，去有选择的理解、

改造，并赋予新的含义，这正是文化交流与交融的具体表现。联珠纹从波斯传入到中国，依赖居于其中的中亚民族，尤其是信仰祆教的粟特人。来到中国后的纹样也不一定完全是波斯纹样，而是掺杂了众多民族有保留的选择及有中亚因素的纹样。

（三）纹样中所显现的宗教特征

由于高昌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是中西文化、经济交流的主要中转站。吐鲁番古墓群出土丝织物纹样上体现着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这里将重点讨论丝织物体现的宗教与交流。

最早传入新疆的外来宗教是祆教，还有稍晚传入的佛家，以及后来的摩尼教、景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等。

1. 佛教

出土的关于佛教的织物不多，有“天王”化生纹锦，锦中织出佛教中的化生形象并有“天”“王”两字。此锦同墓出高昌重光元年（620年）文书，是麹氏高昌时期的织物（图四）。



图四 “天王”化生纹锦

佛教何时传入吐鲁番地区的，尚无法确知。迄今为止，出土的最早的有一件纪年题记的写经，是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在吐峪沟发现的《诸佛要集经》，该经写于西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8]。现在能确定的时间大概是在3世纪末至4世纪初佛教已传入到吐鲁番盆地。汉传佛教以大乘佛教为主，在高昌郡、高昌国时期已深深扎根于吐鲁番地区，入唐以后空前兴盛。

2. 祆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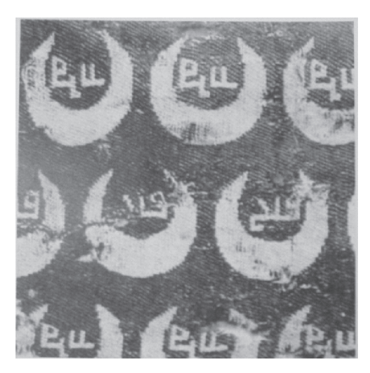
祆教，是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在公元前6世纪创立的，所以又称为琐罗亚斯德。因崇拜火神及其特殊拜火仪式的显著特征又叫“拜火教”“火祆教”。祆教是最早传入新疆的外来宗教。祆教传入新疆的时间没有明确的结论。粟特人信仰祆教，并使之东传，给中原带来波斯文化。作为文化交流媒介的丝织品，异样的文化特征必将有选择性的体现在丝织品的纹样上。吐鲁番出土的丝织品纹样的翼马、猪头、绶带纹均是祆教的特征（图五）。至少在高昌郡时期，祆教已经传入高昌，并在高昌城东建立了供奉胡天的祆祠。到麹氏高昌时期，祆教设有“萨薄”一职，负责管理高昌粟特人聚落的事务，同样也是管理祆教教务的官员。高昌地区祆教的流传，设置萨薄，说明



图五 大联珠立鸟纹锦

在推崇佛教的麹氏高昌时期对祆教采取了一种包容政策，这也是高昌文化多元化的原因之一。入唐以后，祆教神职人员正式纳入唐朝的官职体系。

3. 伊斯兰教



图六　蓝地阿文新月锦

出土的织物仅有一件，是蓝地阿文新月锦，现藏于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图六），其具体的意义赵丰先生已有诠释："锦用蓝、黄两色色丝织成，图案相当简单，为两两错排的新月图案，弯月弦内有一阿拉伯文词、两排不同，一正一反，一为 farid，意为独一的，另一为 fath, 意为胜利和征服。从词意上来说，两词均为安拉的美名或称号，为赞颂安拉所专用。从字体上，其书法属伊斯兰教历一世风格（622～721 年）的库菲体。新月是阿拉伯世界的常见题材，在当地的艺术品种出现更早。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印信、银币、冠式上均有新月为饰，在萨珊王朝时，新月图案也出现在织物图案中。这件织锦的新月之中的阿拉伯文铭文，用来称颂安拉的功劳，'独一的'即指伊斯兰教的唯一神安拉，'除了安拉、再没有神、穆罕穆德是安拉的使者'；胜利和征服正表现了阿拉伯在扩张时期那种横扫一切的气概。全意或为：胜利属于真主，安拉征服世界。因此，这一织锦当是阿拉伯征服区内的产品，他反映了伊斯兰文化的东进曾以丝绸为先导而从西北一线进入。"[9]

除此之外，道教在唐代已传入高昌，但是未出土相关的织物。摩尼教与景教等均未出土明确的相关织物。

综上所述，纹样的特征不仅仅是人们的选择，更是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由文化交流做出的选择。这些选择代表着人们的信仰和审美情趣。纹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着多元的特征和发展趋向，并在相互影响和交融中发展变化。

注　释

[1] a．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1960（6）.

b．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群清理简报［J］．文物，1972（1）.

c．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 363 号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2（2）.

d．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1973（10）.

e．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973 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1975（7）.

f．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1978（6）.

g．新疆博物馆考古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第二、三、十、十一次考古发掘简报［J］．新疆文物，2000（3、4）.

h. 吐鲁番地区文管所.（1979 年）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的文书—吐鲁番阿斯塔那 382 号墓清理简报［J］. 文物，1983（1）.

i. 吐鲁番地区文管所. 1986 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J］. 考古，1992（2）.

j. 吐鲁番地区文物局. 新疆吐鲁番地区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 408、409 号墓［J］. 考古，2006（12）.

［2］ 武敏. 织绣［Z］. 台北幼狮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 丝绸之路——汉唐织物［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2.

［4］ 赵丰. 锦上胡风——丝绸之路纺织品上的西方影响（4～8 世纪）［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新疆出土文物［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6］ 赵丰. 中国丝绸艺术史［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143.

［7］ 陈彦舒. 六世纪中后期的中国联珠纹织物［J］.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1）.

［8］ 田卫疆. 丝绸之路吐鲁番研究［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87.

［9］ 同［6］.

Disscussion about Patterns of Silk Fabrics Unearthed from Astana and Khara-khoja Cemeteries of Turpan

Dawajiafu • Wujima

Abstract: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is the patterns of silk fabrics unearthed from Astana and Khara-khoja Cemeteries in Turpan.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achievements of previous studies. After collecting and sorting the samples, I try to work out the silk fabrics's major types. Then I try to understand these silk fabrics's patterns. In the end, I try to point out these patterns' features, which include the main style, and other styles which demonstrate cultural exchange and religion.

Key words: Astana and Khara-khoja Cemeteries of Turpan; Silk fabrics; Pattern; Pattern style

略论北朝墓室壁画中牛车鞍马题材

张涵烁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100024）

所谓牛车鞍马出行图，是指北朝壁画墓中出现的一种装饰题材——在墓室两壁一左一右分别绘制以待行的牛车和备骑的鞍马为中心，并且伴随有大量的男女侍仆组成的出行图。迄今为止发现的北朝壁画墓共有四十余座，然而大部分保存不佳，墓室壁画绘有牛车鞍马出行题材且保存较完整可供讨论的共计 7 座（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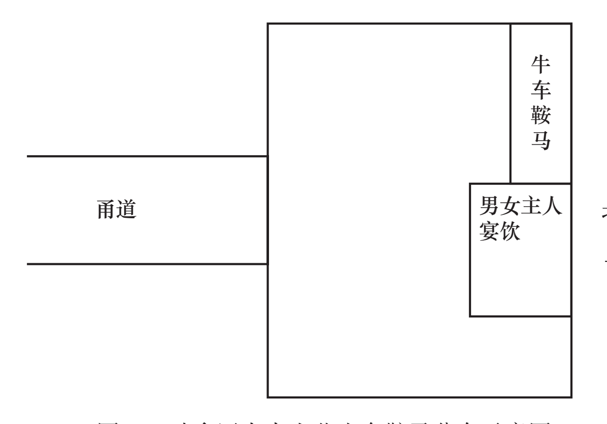
表一　绘有牛车鞍马出行图的壁画墓

分布地区	人物	职官	年代	墓葬朝向	出行内容	
					牛车出行	鞍马出行
山西大同[1]	破多罗太夫人	其子为太子少保，平西大将军	北魏太延元年（435 年）	东西方向，墓室东壁为正壁	牛车鞍马出行同位于墓室正壁的左下侧，占画内面积很小。牛车为通幰牛车，车前有一女子牵缰绳驭牛，鞍马与牛车同向行驶，鞍马的网状后鞧带和障泥描绘清楚	
太原王郭村[2]	娄叡	右丞相东安王	北齐武平元年（570 年）	南北方向，墓室北壁为正壁，三栏布局，牛车鞍马位于下层	西壁绘牛车出行，车辕左有驭者，车前八位侍女，车后华盖撑张	东壁绘鞍马出行，马具俱全，马前后有扈从若干，亦有侍卫持列旗羽葆
太原王家峰村[3]	徐显秀	太尉公武安王	北齐武平二年（571 年）	南北方向，墓室北壁为正壁，单层布局	东壁以牛车为中心，车右有驭者一人，车前后侍仆若干，持旒旗、羽扇华盖，车后有女仆捧有匣盒等物	西壁以鞍马为中心，马具俱全，马前三人持旒旗，马旁两人分持羽扇和伞盖，马后有侍仆若干
太原第一热电厂[4]	不明	不明	北齐后期（564～577 年）	南北方向，墓室北壁为正壁，三层布局	东壁南侧绘一卷棚牛车，车前一驭者握缰绳，车后男女侍仆各一，分别捧衣物和伞盖。东壁北侧画三属吏	西壁漫漶不清，西壁北侧与东壁画画三属吏的位置上残留有三双黑靴，推测与也是属吏
济南马家庄[5]	道贵	祝阿县令	北齐武平二年（571 年）	南北方向，墓室北壁为正壁	西壁绘车舆一辆，车具齐备，等待套马出行，车后绘妇女三人	东壁南端绘鞍马一匹，马前后各有一驭吏，北端两属吏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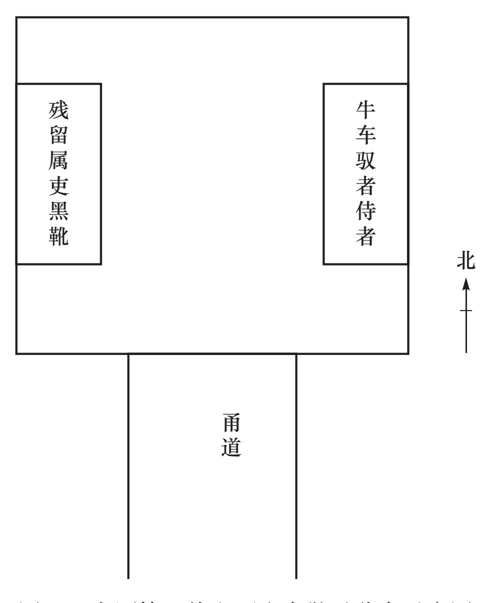
分布地区	人物	职官	年代	墓葬朝向	出行内容	
					牛车出行	鞍马出行
磁县城西[6]	高润	左丞相文昭王	北齐武平七年（576 年）	南北方向，墓室北壁为正壁	东壁残存羽旌二，华盖、车棚、侍者各一	西壁残存有侍从二人
山东嘉祥[7]	徐敏行	隋驾部侍郎	隋开皇四年（584 年）	南北方向，墓室北壁为正壁	东壁绘一帷屏牛车，车前四女侍执宫灯前导，车后四侍从护行，另有四女侍捧物	西壁绘一鞍马，旁有一人执缰，马后五人，分别持乐器、伞、扇、高柄行灯，其后还有二人牵二马护行

一、北朝牛车鞍马题材的发展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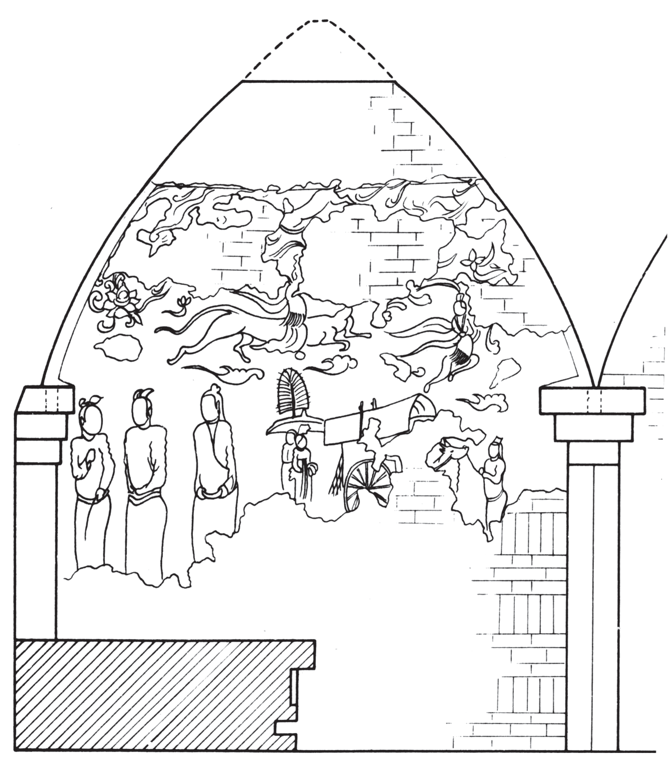
图一　破多罗太夫人墓牛车鞍马分布示意图

以上这 7 座壁画墓，其年代从北魏太延元年一直延续至隋开皇四年，主要分布在北魏前期的都城平城、北齐的政治中心晋阳和邺城以及经济文化繁盛的山东地区。就其布局特点而言，出现有两种情况：第一种仅破多罗太夫人墓一例（图一），该墓中的牛车与鞍马位于墓室正壁一侧；其余墓葬均为第二种：牛车鞍马分布于墓室左右两侧，并形成了以其为中心，伴随有众多男女侍仆围绕的格局。其中的男女侍仆有些画于墓室两侧（如第一热电厂墓（图二、图四）、道贵墓（图三、图五）、徐敏行墓（图六、图七），有些从墓室正壁中男女主人宴饮图两侧一直延续到南壁墓门左右两侧（如徐显秀墓）（图八）。这种出行图中牛车一般无人乘坐，骏马是鞍辔俱全也无人乘骑，将此题材称为备行图似更为确切。牛车鞍马分列两侧的几座墓葬集中在北齐后期，和太延元年破多罗太夫人墓的年代相差一个世纪，这使我们产生一个困惑：是否分列于墓壁两侧的牛车鞍马题材是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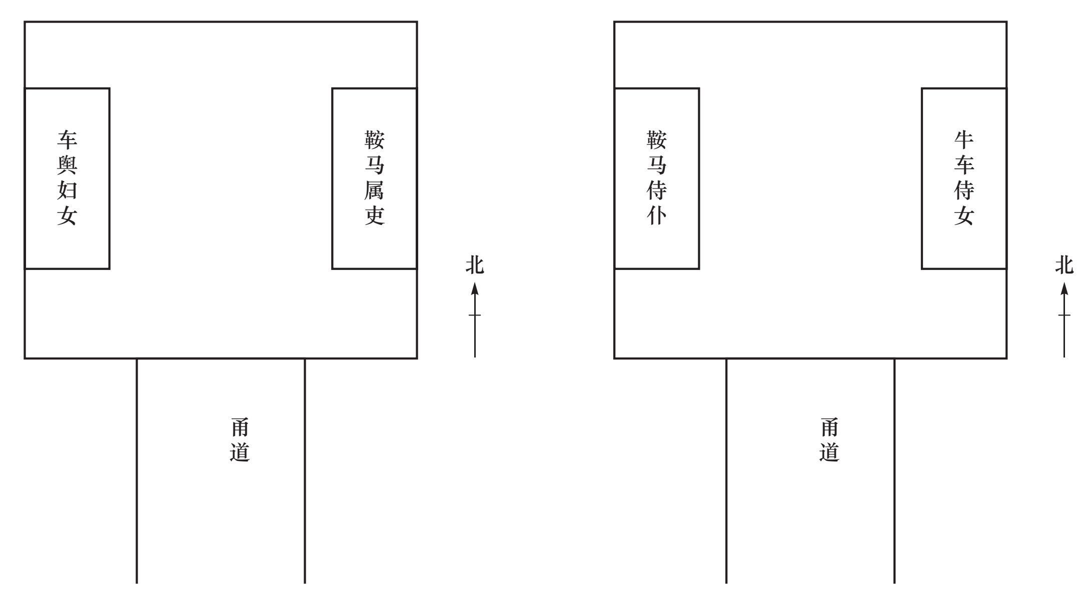


图二　太原第一热电厂牛车鞍马分布示意图

齐后期才出现，北魏破多罗太夫人墓中处于同一侧的牛车鞍马图只是个例外？还是该题材从北魏早期出现后经过发展一直延续到北齐后期并且逐渐规范化？



图四 太原第一热电厂出行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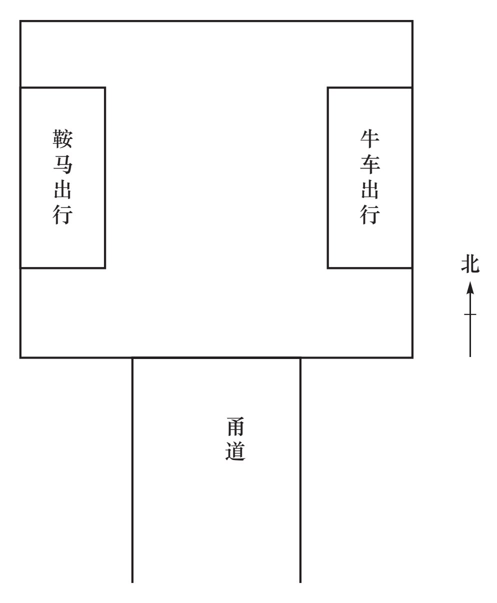


图五 道贵墓牛车鞍马分布示意图

图六 徐敏行墓牛车鞍马分布示意图



图七　徐敏行墓鞍马出行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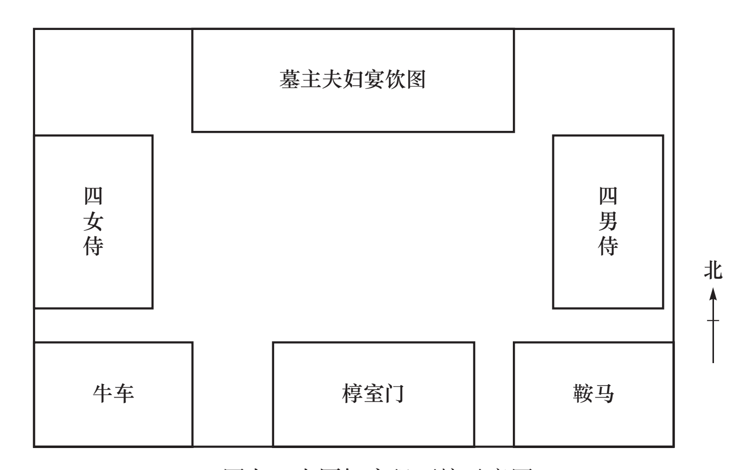
图八　徐显秀墓牛车鞍马分布示意图

为解决这个困惑，我们必须参考处于北魏早期和北齐晚期之间的壁画墓。北魏迁洛后有元怿墓、元乂墓和低等级军官王温墓，但是这三座墓葬的壁画均保存很差。东魏除茹茹公主墓外，其余也无法提供参考。而西魏北周在壁画墓的装饰上，显然走了一条和东魏北齐不同的道路。从保存较好的李贤夫妇的壁画来看，墓室壁画以带红框的伎乐为主，没有北齐常见的墓主宴饮和牛车鞍马出行题材。陈寅恪先生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认为西魏北周的统治集团在当时三分天下的局面下，为了和东边的高齐以及以正统自居

的南朝萧梁抗衡，大力拉拢关中世家，远宗周礼，创建了一套以关中地域为本位的制度来建设其的正统地位和标榜天命所向[8]，自然墓葬壁画与北齐不同。

显然，壁画墓的壁画资料是不充分的，在这种情况下，与墓室壁画同为墓主死后世界一部分的石质葬具应当可以提供一些借鉴。

山西大同智家堡北魏墓中出有单檐人字坡悬山式顶、抬梁式承重墙结构的石椁。石椁内的四壁、顶部、三角形梁上都绘有壁画，北壁是男女墓主人宴饮图，身后及周边有侍仆若干。西壁绘四位女侍，东壁绘四位男侍，南壁墓门左右两侧分别绘有牛车与鞍马出行图像[9]（图九、图一〇）。墓葬年代应在太和八年至十三年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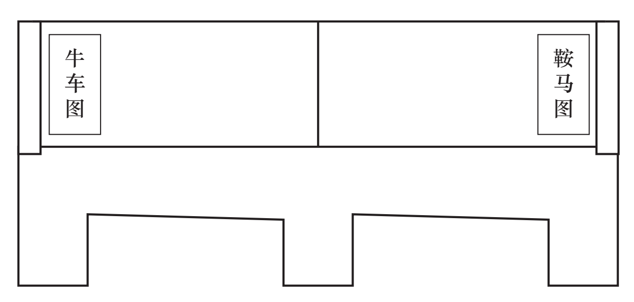
图九　大同智家堡石椁示意图



图一〇　大同智家堡石椁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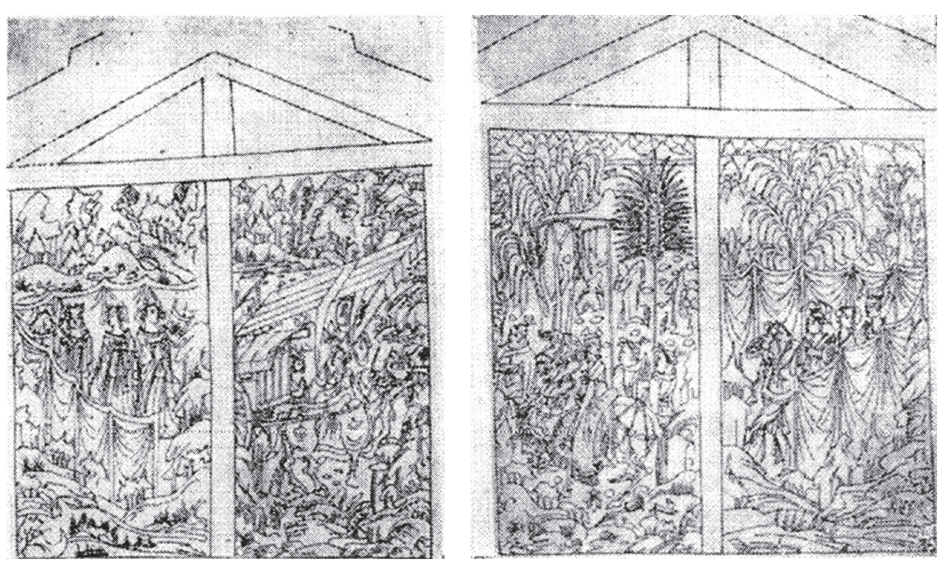
河南沁阳西向公社发现的一座北魏晚期墓[10]中出有一座画像石棺床，床上左右及后方共有四块围板。西侧围板上为四个女侍；正面西侧围板从左至右为牛车图、行进侍女图、女主人图；正面东侧围板从左至右为男主人图、两男侍和两女侍、鞍马图。东侧

围板上为四个男侍。其中行进中的牛车和被仆从围绕的骏马的位置出于图一一所示之方位。该发掘报告所呈现的图片因年代久远有些漫漶，故以报告中的文字描述为主。



图一一　沁阳西向公社石棺床上牛车鞍马位置示意图

宁懋石室（北魏孝昌三年）上亦刻有牛车鞍马题材的出行图[11]（图一二）。该石室和大同智家堡出土的石椁形制相似，但内外壁皆有图案，且为线刻。牛车出行图刻于室内左侧的山墙上，中间用双线将画面分为两部分。北侧刻有一辆牛车，车厢右侧站一驭者，车前一人举幛扇，牛前亦有一人手中捧物；南侧刻一半圆形帷帐，帐内有四女侍。鞍马图刻在室内右侧的山墙上，也以双线分割为两个画面。北侧画面中间刻一骏马，马具缨络俱全，马前一驭者，马左侧站三人，分别举伞和幛扇；南侧画面中间也刻有半圆形的帷帐，帐内站男女侍仆各二。



图一二　宁懋石室牛车鞍马出行图

结合这三座石棺椁和破多罗太夫人墓中的牛车鞍马出行图，我们可以大致看出这一题材在北朝的发展脉络。在破多罗太夫人墓中，墓室壁画的主题是东侧正壁的墓主夫妇宴饮以及环列四周的男女仆侍，南北两侧壁分别绘制的是由大量导骑、军乐组成的车骑

出行以及乐舞杂技和宴饮庖厨画面，牛车与鞍马图绘在正壁墓主夫妇北侧，占画面很小的位置，且牛车鞍马同侧绘制。而在北魏迁洛之前，从大同智家堡石椁中可以看出，牛车鞍马题材被继承了下来且有所变化，牛车与鞍马已经分开绘制，各自形成一个中心，分绘于墓室内部两侧，且牛车与女侍一侧，鞍马与男仆一侧。至北魏晚期，从沁阳石棺床和宁懋石室可以看出，牛车鞍马题材继续在使用，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规范，牛车与鞍马分置，装饰华丽却无人乘骑，牛车前后一般跟随女侍，骏马周围跟随男仆。此阶段牛车鞍马题材仍未成为墓室装饰的中心，地位却在一直上升，在宁懋石室中，牛车鞍马已经与侍女男仆并列在内壁两侧了[12]。

东魏以茹茹公主墓[13]为代表，墓室的东西两侧壁画依然以男女侍仆为中心，北壁绘公主和其身边女侍，南壁壁画脱落，无踪迹可循。仔细类比下，茹茹公主墓与大同智家堡石椁有很多相似之处。所区别者，只是正壁一个是夫妻宴饮，一个是公主独自和女侍，以及侧壁男女侍仆人数多少的问题。智家堡的牛车鞍马题材绘于南壁两侧，而茹茹公主的南壁壁画脱落，不过依照内容的相似性，推断茹茹公主墓南壁可能曾绘有牛车鞍马。

至北齐后，该题材在墓室壁画中大量使用，且逐渐形成了特定的规范。牛车鞍马开始正式成为墓室侧壁的中心，不再和侍女男仆并列，侍女男仆地位降至跟随在牛车鞍马前后，且手执羽扇、旌旗、伞盖等仪仗用物（图一三）。同时，以牛车鞍马为中心的出行图有了表现品官等级的含义，主要体现在随从侍仆的多少以及侍仆手中所持之物。道贵墓墓主为七品县令，墓室壁画中的牛车旁仅有一驭者，车后二女仆跟随，鞍马前有二属吏，一驭者，马后有持收拢的伞盖者一人。而身为武安王的徐显秀墓墓室两壁中男女侍仆人数繁多不可计量，簇拥相挤，从墓室正壁中墓主人宴饮图两侧一直延续到南壁墓门口两侧。在牛车与鞍马周围的侍仆手中持有旒旗、羽伞、华盖等仪仗之物，体现了武安王高贵的身份。郑岩在研究东魏北齐壁画墓时曾经提出了“邺城规制”的模式[14]，认为在东魏北齐的墓葬壁画装饰中已经形成了一套规范性的制度，而“牛车鞍马题材则是表现人物身份的一种固定模式”，对此观点笔者是基本赞同的。但单就牛车鞍马这一题材的形成，笔者认为可能出现的更早，应在北魏定都洛阳前后，而邺城规制中的这部分题材有可能是直接继承了洛阳的内容而将其制度化、规范化。这也正是陈寅恪先生提到的“洛阳文物人才虽经契胡之残毁，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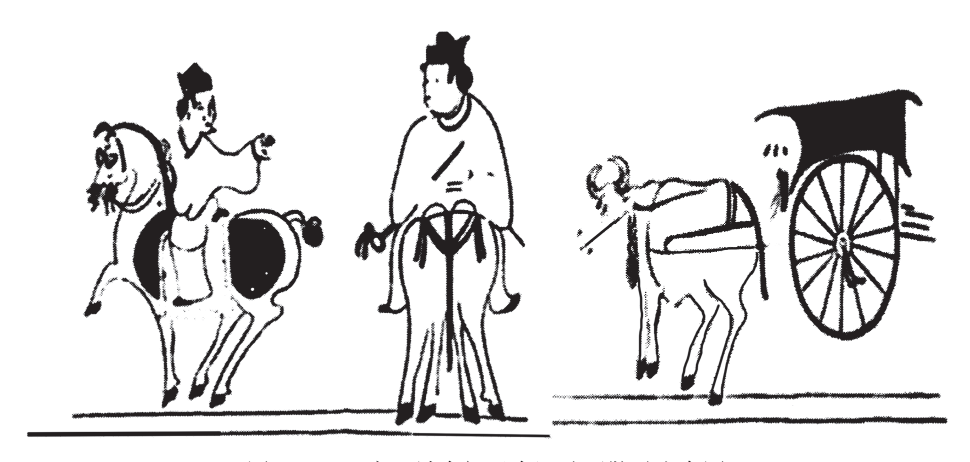

图一三　徐显秀墓牛车鞍马出行图，左图为牛车出行右图为鞍马出行

遗烬再由高氏父子之收掇，更得以恢复炽盛于邺都”[15]。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北齐后期，牛车鞍马出行题材越来越多且越来越规范化的原因。

二、北朝牛车鞍马题材的源流

熟悉汉魏时期壁画墓都知道，在两汉和魏晋时期亦有以鞍马和牛车为题材的出行图，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即北朝所见的牛车鞍马出行图是自行发展而来还是继承了汉魏传统。

汉代牛车与鞍马题材共存的壁画墓数量不多，列举三例：一是在内蒙古托克托县发现的汉孺子婴居摄二年壁画墓[16]，该墓由前中后三室组成，带有多个耳室。在墓室中室右耳室的前壁上绘有二骏马一牛车，画中另有二人，一人做骑马状，一人做牵马状，牛车绘于墓室右壁，前署“闵氏车牛一乘”。二是辽宁省辽阳市东门里发现的东汉中期偏后的壁画墓[17]，该墓有东西并列的两个棺室，牛车鞍马图绘于墓室的西侧棺室西壁，绘有一帷幔，帷幔南部有二骑马男子，一个回首侧望，一个倒骑马背上，两骑后是一辆牛车（图一四）。三是在辽阳市三道壕窑业第四现场发现的东汉晚期墓[18]，其右棺室右壁上绘有四导骑，导骑后有一辆驾黑盖马车，推测其为男主人车。后又有二导骑，后跟一辆驾黄牛黑轮红軿车，牛右有驭者，车后有侍仆二人，推测为女主人车。



图一四　辽宁旧城东门里东汉壁画鞍马牛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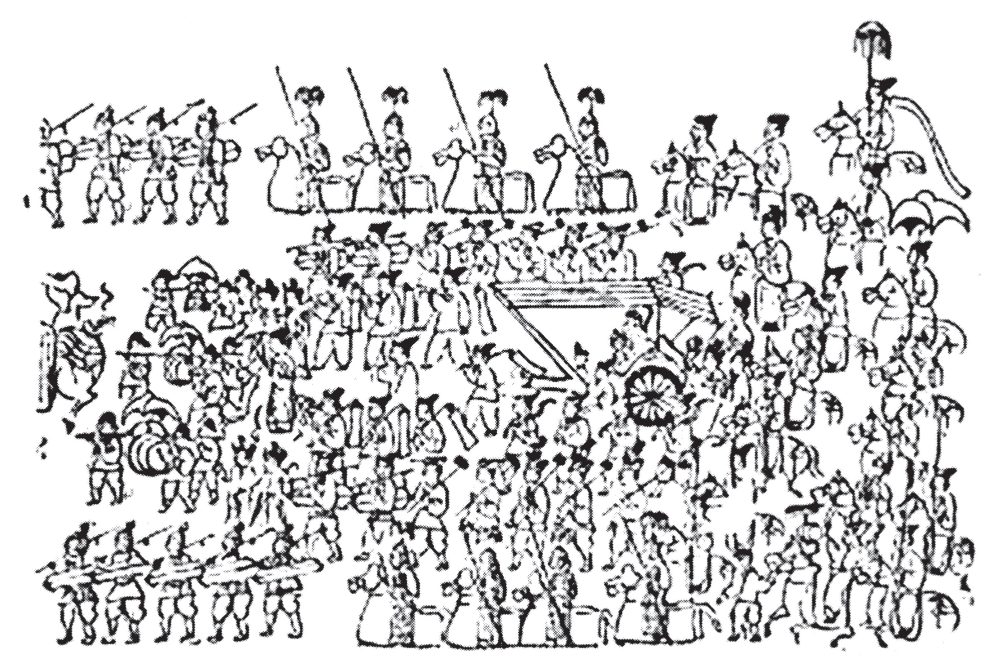
在汉代墓室壁画或画像砖画像石的装饰中，出行是一个很常见的题材，汉代人喜欢用众多的导骑、各种不同功能的车辆、大队人马的随从来表示盛大的出行仪式，即“车骑出行”。在这种出行题材中，画面中心往往是图中位置偏后装饰华丽的一辆驾马车，单人单马的图像数量虽然很多，但都不是画面表达中心。牛车同鞍马图一样，在车骑出行中也不是画面中心，它只是表明乘骑者的女性身份。按汉制“太皇太后、皇太后”“非法驾，则乘紫罽軿车”[19]，刘熙认为“軿车，軿，屏也，四面屏蔽，妇人所

乘牛车也”[20]。而考古发现的壁画牛车，如内蒙古托克托墓和辽阳三道壕窑业墓所示，也印证了牛车为妇人所乘的观点。相较于北朝那种分置两侧且无人乘骑的牛车鞍马图，汉代的是完全不同的。此外，在汉代一般以马车为贵，牛车被认为是贫者所乘之车，这点在文献中经常可见。如“汉兴，接秦之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21]；“其后诸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22]，而北朝的墓室壁画中所绘之牛车则均出现在品官墓中。由此可见，北朝的牛车鞍马出行题材的形成与汉墓壁画的渊源不大。

汉末魏晋之际，牛车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晋书 • 舆服志》载“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汉武帝推恩之末，诸侯寡弱，贫者至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23]。达官贵族出行不再以马车为贵，而以牛车为贵，在众多的导骑侍卫簇拥下的牛车出行流行于魏晋，考古发现的墓葬壁画中也体现了这一趋势。如发现于辽阳市上王家村的一座晋墓[24]，由前廊、两个棺室和左右两耳室组成。在该墓的左棺室正壁绘车骑出行图。前有导骑八人，分列两侧，骑吏均拱手捧笏，鞍勒俱全。后有黄牛黑轮车一辆，驭者持缰绳步行，车厢内坐一人，作拱手状，当为墓主人（图一五）。在朝鲜黄海北道安岳发现的东晋永和十三年太守冬寿墓中[25]，也有一幅大型的牛车出行图。该墓由羡室、前室和东西两侧室、后室和环绕后室的回廊组成。牛车出行图位于后室东面，且一直延伸至北面的回廊壁上，画有 250 多人，场面浩大，有车舆、铠马、举盾执斧的兵士、击鼓作乐的乐队、执弓带箭的兵士、打着幡节的侍卫等。画面中心则是墓主乘坐的牛拉车舆（图一六）。此外在辽宁省朝阳县袁台子村发现的袁台子墓（东晋 4 世纪初至 4 世纪中叶）中[26]，墓室东壁壁龛上部也有一幅小型的牛车出行图。图画左上方绘一牛车，旁有车夫一人，做牵牛姿态。牛车前方左右各一人，骑于马上并列而行。



图一五　辽阳上王家东晋牛车壁画



图一六　冬寿墓牛车出行图

从以上三座壁画墓可知此时牛车成为出行的主流，而鞍马则作为陪衬担任牛车出行前的导骑而已。一般马上有骑者，牛车上有主人像，和北朝盛行的无人乘骑的鞍马和空闲待行的牛车图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魏晋时期配有鞍马的牛车出行题材与北朝之间联系也不是很密切，北朝流行牛车的风气可能继承了魏晋传统，但是墓葬壁画中的牛车鞍马分置于墓室两壁的布局方式应不是直接继承于魏晋。

以牛车为主的壁画出行图一直延续到北魏时期。在大同智家堡发现的一座北魏墓中出土有一木棺板[27]，棺板上亦有牛车出行图，以华美的主牛车为中心，展示了盛大的出行场面。前有导从仪仗、乐舞杂技，后有随从侍者和车辆。主牛车高大华丽，墓主人坐在挽有绿色帷幔的舆中，两侧有驭手与车同行。主牛车左上方绘有四匹鞍马，马旁有仆从随行。发掘者将此墓断代在北魏都平城时。同一时期的破多罗太夫人墓中也有大型的出行图，只是内容为车骑出行。可见，在北魏前期，墓室壁画的题材还是比较纷乱的，既有体现汉墓传统的大型车骑出行，也有魏晋盛行的牛车出行，而牛车鞍马出行题材在此时也只是刚刚萌芽，在墓室壁画中不占主流，直至北魏后期和东魏北齐盛行并且流传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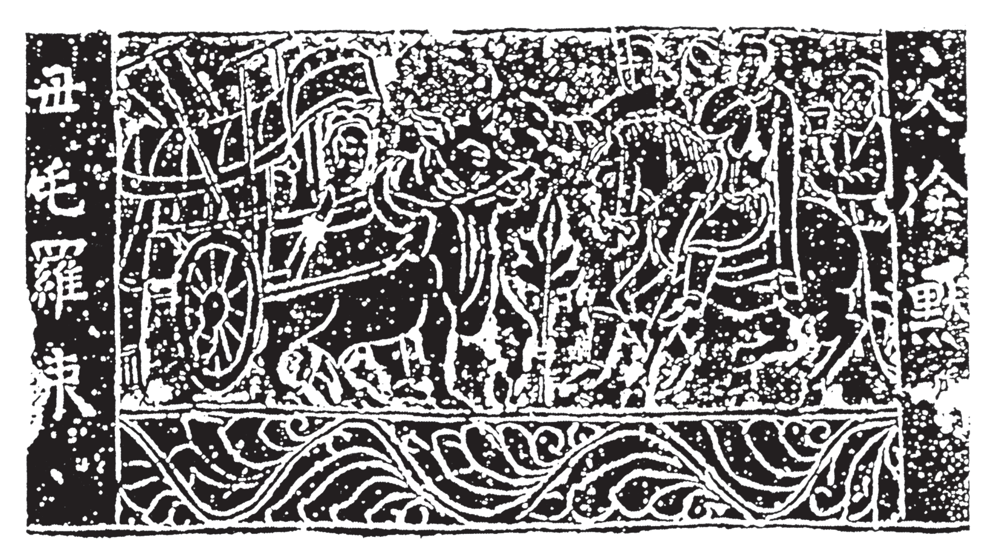
可见，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牛车鞍马出行题材，且牛车与鞍马之间没有从属关系、无人乘骑的就是大同太延元年的破多罗太夫人墓中的壁画。在没有新的考古材料出土之前，笔者认为，在墓室壁画中一左一右分别饰以待乘的牛车和备骑的鞍马为题材的出行图最早是出现在北魏，它的出现有可能借鉴了魏晋时期流行的牛车出行图，同时参考了北魏鲜卑民族的特性——对马的喜爱，融合此二者因素而产生，是北魏的创新，经

北魏一朝的发展后，慢慢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在北魏分裂成东西魏后，该题材被鲜卑化的汉人政权东魏北齐所继承，从而出现了北齐后期墓室壁画中纷纷出现牛车鞍马出行图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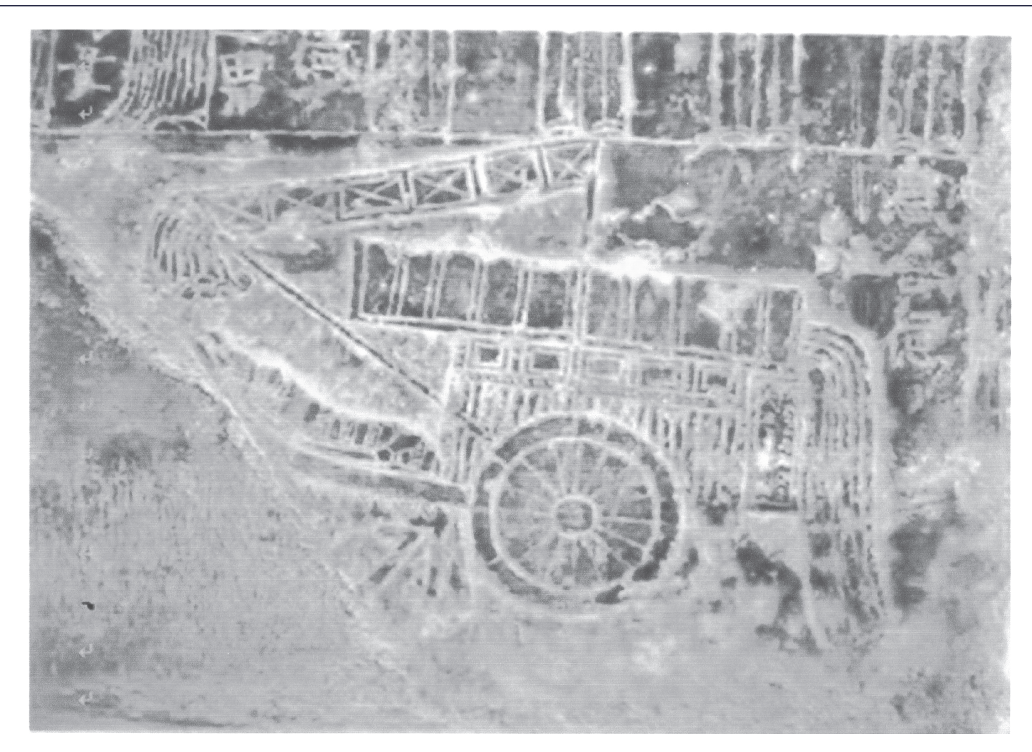
三、北朝牛车鞍马出行图的意义

在梳理了北朝墓室壁画中牛车鞍马出行图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后，我们可以看到，牛车鞍马题材的使用在地域上从京畿邺城到政治重心晋阳，并扩展到经济文化繁盛的山东地区，使用者从皇亲国戚封王称侯者一直到县令级别的低级官吏，该题材使用的广泛性不得不令人思索在待行的牛车和备乘的鞍马背后所蕴含的意义。

在死者最后的家园——墓室或者石椁室中装饰什么，怎么装饰，这个问题既受死者本身思想观念的影响，同时也和当时社会风俗制度的大背景有关。郑岩在讨论这个话题时，借助陕西耀县出土的隋开皇八年徐景辉造像背面中层一幅刻有男子骑马、女子乘牛车，且标记有“父徐默”“母毛罗束”的图像，认为该题材反映的是“为死者所预备的出行工具”[28]（图一七）。笔者认为此看法似过于简单化，把道教造像中的供养人出行和墓室壁画中的出行图做比较，首先在二者的功能作用上是讲不通的。其次，从北魏早期到隋代，在陕西耀县周边的一批道教造像碑上都刻有供养人为其亲属所制的鞍马牛车乘骑图像，如北魏延昌三年张乱国造像碑（残存牛车一辆，图一八），北朝孝昌三年王阿善造像碑[29]（图一九），有拓片残存的北周张氏造像[30]（图二〇）以及上文的徐景辉造像。这可能是当时道教造像的一种传统，同时也说明当时北朝盛行的出行方式是女子乘牛车而男子骑马，与南朝普遍盛行的犊车出行是有区别的。但此种牛车鞍马出行无论特点还是目的都与墓葬壁画中的不同。



图一七　徐景辉造像牛车鞍马出行图



图一八　张乱国造像犊车残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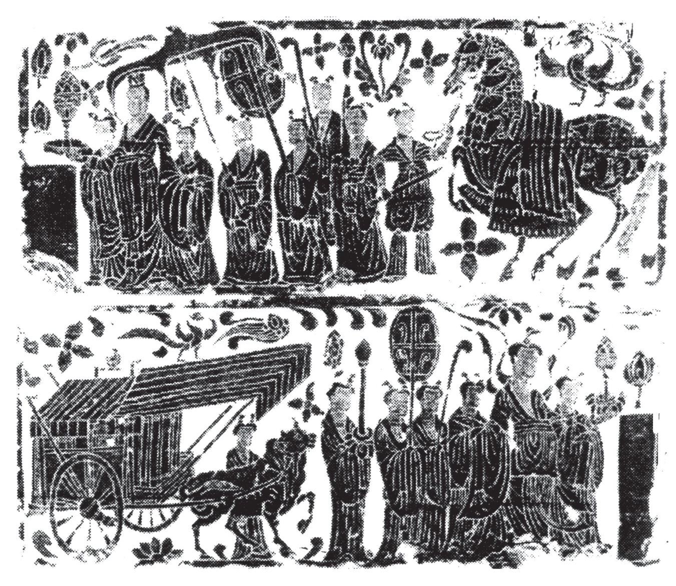


图一九　王阿善造像牛车鞍马出行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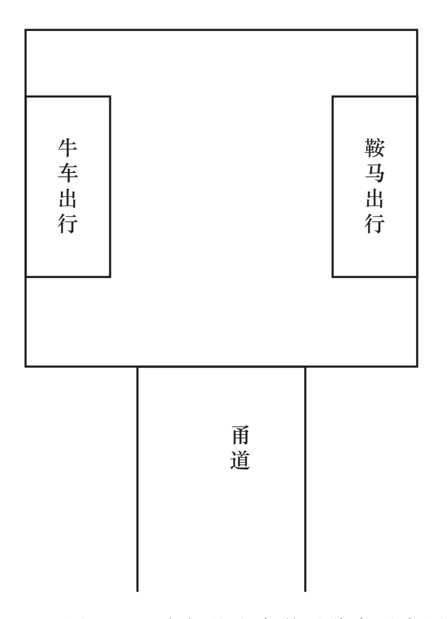
图二〇　张氏造像碑牛车鞍马出行图

除了道教造像外，佛教造像中也大量绘有牛车和鞍马题材的出行图。如山东临淄出土的北魏正光六年曹望憘造像[31]，在造像基座上对称绘有男女主人礼佛图，男女主人分别被一群手持羽扇、伞盖的侍仆簇拥，身后分别跟有鞍马和牛车（图二一）。敦煌西千佛洞第六窟（北周）的东壁下层也绘有供养人的牛车和鞍马[32]，牛车和鞍马位于同侧并驾齐驱，前有一驭者，马上无骑者（彩版一，3）。又如敦煌三〇三窟（隋代）东壁北侧中层亦绘有供养车马[33]，车为一牛驾辕軿车，车左一驭者，车后跟随四女侍，其后为一仆牵二马，马鞍俱全，无人乘骑，马后跟随四侍从，侍从中二人持收拢的伞盖（彩版一，4）。这些佛教造像中的牛车鞍马出行和墓室壁画中的在形象上更加接近，都是无人乘骑的牛车与鞍马，后跟侍从。笔者推测这些佛教造像图和墓室壁画在粉本上可能有相互借鉴之处，但所表达的意义应该是不同的，并不能将其都简单归结为死者的出行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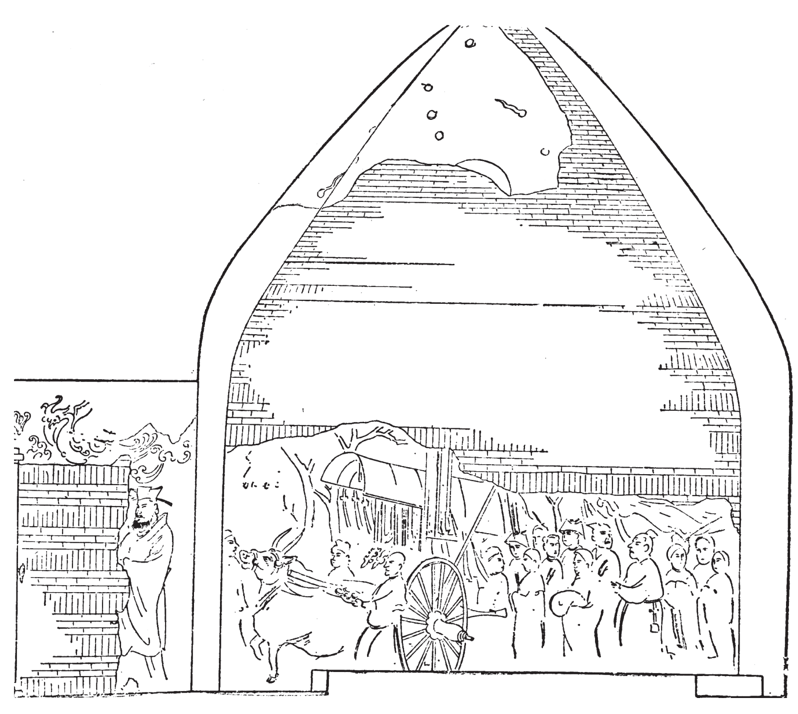
图二一　临淄曹望憘造像座画像图

笔者观察到，北朝墓室壁画中出现的牛车鞍马题材在其成熟期——北齐晚期即六世纪七八十年代时，一般都是一左一右分布在墓室两侧，但孰左孰右似并没有明确规律[34]。如表一中所示，娄叡墓和道贵墓中是在墓室东壁绘牛车图，西壁绘鞍马图（图二二、图二三），而其他如徐显秀、太原电热厂、高润（图二四、图二五）和徐敏行墓则刚好相反。但这些出行图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在牛车旁一般跟随侍女较多，而鞍马图旁大多跟随男仆，联系上文所谈到的佛道造像中的牛车鞍马题材，我们可以了解到牛车和鞍马的乘骑对象——牛车是为女主人服务而鞍马是为男主人服务的。但这点引出了另外一个矛盾，大多绘有牛车鞍马图的墓葬并非是夫妻合葬墓，表一中所列除徐敏行墓是夫妻合葬外，其他都是单人葬。如果说待行的牛车和备乘的鞍马是为墓主人预备的出行工具，只埋葬了一位男墓主的墓室中为何还要绘制牛车呢？因此笔者认为，牛车鞍马出行图在形成之初，其表达的也许是为墓主在另一个世界的出行提供工具，或者说是以待行这种状态表达了从生存世界步入死亡世界的一个转换过程。但是当这个题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广泛流传后，很可能在当时形成了一种制度性的规范，即存在一种约束性的力量让整个社会中的受约束者都采用这一题材。目前发现的绘有牛车鞍马题材的墓葬几乎全是品官的墓葬，而品官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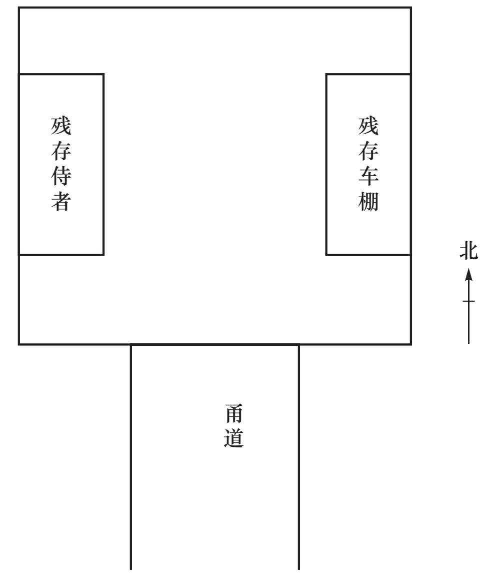


图二二　娄叡墓牛车鞍马分布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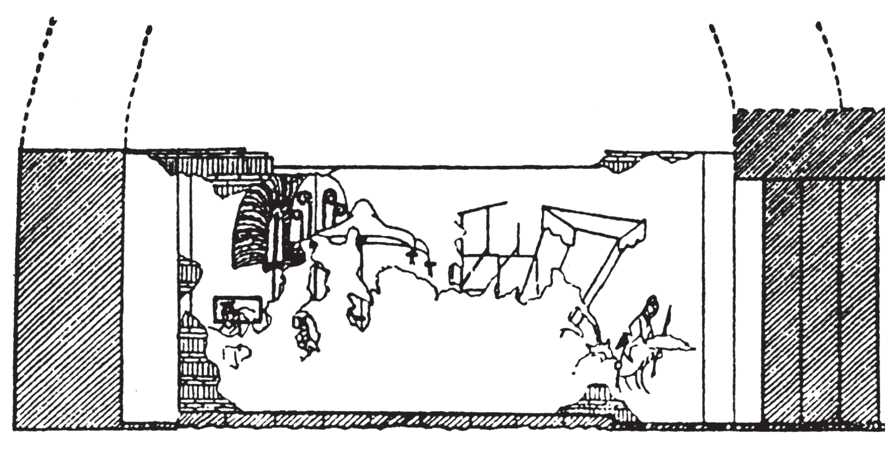
最容易受到制度性力量约束的。在品官墓中，壁画题材受朝廷制度性的约束力量远远大于品官的个人意志。表一所列墓葬中，牛车和鞍马的装饰、跟随侍仆的数量以及侍仆手中所持之物都与墓主身份成正比而无僭越。此时北齐也明确有诏令，规定婚丧葬娶应有等差，并用具体的条式规定之。



图二三　娄叡墓牛车鞍马出行图



图二四　高润墓牛车鞍马分布示意图



图二五　高润墓牛车出行图

（文宣帝）天保元年（550 年）六月辛巳，诏曰："顷者风俗流宕，浮竞日滋，家有吉凶，务求胜异。婚姻丧葬之费，车服饮食之华，动竭岁资，以营日富。又奴仆带金玉，婢妾衣罗绮，始以创出为奇，后以过前为丽，上下贵贱，无复等差。今运属惟新，思蠲往弊，反朴还淳，纳民轨物。可量事具立条式，使俭而获中。"[35]

同时，在北齐、北周、梁三国并立的局面中，为了标榜正朔所在，统治者都采取各种方式来标明自己是天命所向。为此，各国纷纷大修"五礼"，其中北齐除了立国之初的诏令外，在后主高纬时，于天统年间和武平年间两次撰修"五礼"，第一次以赵郡王高叡[36]为首，与袁聿修[37]、冯子琮[38]、胡长粲[39]等人辑修，后又以魏收[40]为首、与崔儦[41]、崔子枢[42]、薛道衡[43]、马敬德[44]、熊安生[45]、权会[46]等议定五礼。与这两次修订五礼的时间相对应的，便是北齐晚期娄叡、徐显秀、道贵、太原第一热电厂墓葬中出现品秩有序的牛车鞍马出行图，所以很可能这两次修订的五礼中，有内容规定了北齐丧礼的程序以及社会各阶层装饰墓葬的要求和规格。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北齐天保元年临朐崔芬墓[47]和东魏至北齐之间的济南东八里洼墓[48]在墓室壁画内容上没有出现牛车鞍马出行题材。崔芬墓的壁画保存较好，绘有屏风状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以及墓主夫妇出行图。其墓室装饰风格与推测为南朝帝陵级别的一些大墓非常相似[49]，所以论者多从崔芬家世（祖父曾在南朝刘宋为官）以及山东青州地区在 410～469 年都属于东晋南朝统治这些角度考虑[50]，而笔者认为，崔芬下葬年代在天保二年，此时文宣帝诏令发布不久，新王朝的制度性规范力量还不能很快到达远离京畿的山东地区，所以还可以较为自由的按照自身喜好来布置墓室。济南东八里洼墓墓室仅保存北壁一幅壁画，绘有八扇屏风，中间四幅屏风上各绘一人物。东西壁的画面漫漶不清，隐约可辨侍女二人。其墓室内无牛车鞍马出行题材的理由也与崔芬墓相同——京畿的制度性规范力量尚未影响至此。但到武平二年（571 年），伴随着北齐官修五礼，在京畿确立的一套丧葬制度逐渐向四周推广，处在山东济南的祝阿县令道贵的墓中便出现了牛车和鞍马题材的出行图，甚至到了隋开皇四年（584 年），由于王

朝变革而引起的新的制度性因素尚未影响到远离长安的山东嘉祥，所以徐敏行墓还在延续北齐传统的牛车鞍马出行题材。

注释

[1]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6（10）：4～24．

[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3（10）：1～23．

[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3（10）：4～40．

[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J］，文物，1990（12）：1～10．

[5] 济南市博物馆．济南市马家庄北齐墓［J］．文物，1985（10）：42～48．

[6]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J］．考古，1979（3）：235～243．

[7] 山东嘉祥徐敏行墓已到隋开皇四年，不属于北朝范围．但是考虑到墓主生平职官升迁，在北齐为其最辉煌时：同时考虑 584 年距离北齐灭亡仅 6 年，墓葬文化又具有一定的延续性，而山东也不在政治中心位置，不处于由政治变革引起的制度改革的核心地带，而其墓室壁画中的牛车鞍马出行图又具有典型性，因此将其与北朝墓葬一起讨论．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隋代墓室壁画的首次发现［J］．文物，1981（4）：28～32．

[8]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适值泰以少数鲜卑之六镇民族窜割关陇一隅之地，而欲与雄踞山东之高欢及旧承江左之萧氏争霸，非别树一帜，以关中地域为本位，融治胡汉为一体，以自别于洛阳、建业或江陵文化势力之外，则无以坚其群众自信之心里”，北京：三联书店，2001：20．

[9] 王银田，刘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J］．文物，2001（7）：40～51．

[10] 邓宏里，蔡全法．沁阳县西向发现北朝墓及画像石棺床［J］．中原文物，1983（1）：4～13．

[11] 郭建邦．北魏宁懋石室和墓志［J］．中原文物，1980（2）：33～40．

[12] 近年来，过于宁懋石室的命名和性质一直有讨论，有学者认为其不是墓葬石椁而应是墓地祭祀祠堂，如林圣智．北魏宁懋石室的图像与功能．美术史研究丛刊［J］，2005（18）：1～57；Wu Hung. Three Famous Stone Monuments from Luoyang:‘Binary’Imagery in Early Sixty Century Chinese Pictorial Art［A］. Orientations［C］. 1994: 51-60．本文延续传统看法，以石椁对待．

[13]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4（4）：1～15．

[14] 郑岩．论“邺城规制”——汉唐之间墓葬壁画的一个接点．艺术史研究［J］．2001（13）：295～329；又“邺城规制”初论，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年：181～208．

[15]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49．

[16] 罗福颐．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新发现的汉墓壁画［J］．文物参考资料，1956（9）：43．

[17] 冯永谦，韩宝兴，刘忠诚，邹宝库，柳川，肖世星．辽阳旧城东里门东汉壁画墓发掘报告［J］．文物，1985（6）：25～42．

[18] 李文信．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J］．文物参考资料，1955（5）：15～41．

[19] 后汉书·卷一一九·志第二十九舆服上［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9：3647．

[20] 同 [19].
[21] 汉书 • 卷二四上 • 食货志第四上 [M].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9：1127.
[22] 汉书 • 卷三八 • 高五王传第八 [M].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9：2002.
[23] 晋书 • 卷二五 • 志一五舆服志 [M].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9：756.
[24] 李庆发. 辽宁上王家村晋代壁画墓清理简报 [J]. 文物，1959（7）：60～63.
[25] 洪晴玉. 关于冬寿墓的发现与研究 [J]. 考古，1959（1）：27～35.
[26]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县文化馆. 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 文物 [J]，1984（6）：29～45.
[27] 刘俊喜，高峰. 大同智家堡北魏墓棺板画 [J]. 文物，2004（12）：35～47.
[28] 郑岩. 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 [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90.
[29] 以上三个造像碑均选自胡文和. 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6，57，118. 徐景辉造像本书也收录.
[30] 李淞. 泾渭流域北魏至隋代道教雕刻详述 [A]. 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 [C]. 中华书局，2002：413.
[31] 周到.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 • 中国画像石全集 • 石刻线画 [Z]. 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图版 39～42.
[32] 敦煌研究院. 中国敦煌 [Z].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6：40.
[33] 中国美术全集编委会，敦煌研究院. 中国美术全集 • 绘画编 14 • 敦煌壁画上 [Z]. 上海：上海美术人民出版社，1985：166.
[34] 赵永洪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参看赵永洪. 由墓室到墓道——南北朝墓葬所见之仪仗表现与丧葬空间的变化 [A]. 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 [C].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436.
[35] 北齐书 • 第一册 • 卷四 • 文宣本纪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51. 又北史 • 第一册 • 卷七 • 齐本纪 "（文宣帝）天保元年（550）六月辛巳，又诏：吉凶车服制度，各为等差，具立条式，使俭而获中"，北京：中华书局，1974：245.
[36] "摄宗正卿，进拜太尉，监议五礼" 北齐书 • 第一册 • 卷十三 • 赵郡王深列传 • 附叡列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72.
[37] "天统中，诏与赵郡王叡等议定五礼"，北齐书 • 第二册 • 卷四十二 • 袁聿修列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565.
[38] "又诏子琮监议五礼，与赵郡王叡分争异同" 北史 • 第七册 • 卷五十五 • 列传四十三 • 冯子琮列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2011.
[39] "后主从武成还邺，仍敕在京省判度支尚书，监议五礼"，北史 • 第九册 • 卷八十 • 胡国珍传附虔子长粲列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2690.
[40] "掌诏诰，除尚书右仆射，总议监五礼事，位特进" 北齐书 • 第二册 • 卷三十七 • 魏收列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495.
[41] a. "武平中，参订五礼，待诏文林馆" 北齐书 • 第一册 • 卷二十三 • 崔㥄列传 • 附儦列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337.
b. "寻与熊安生、马敬德等议五礼" 隋书 • 第五册 • 文学传 • 崔儦传 • 卷七十六 [M]. 北京：中华书局，1972：1733.
[42] "仕齐，位考功郎中，参议五礼" 北史 • 第四册 • 卷三十二 • 崔㥄列传 • 附仲哲孙子枢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72：1160.

[43]“武平初，诏与诸儒修订五礼”隋书·第五册·卷五十七·薛道衡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406.

[44]“（魏收）多引文士令执笔，儒者马敬德、熊安生、权会实主之”北齐书·第二册·卷三十七·魏收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495.

[45]“至京，敕令于大乘佛寺，参议五礼”北史·第九册·卷八十二·儒林传下·熊安生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2745.

[46] 同［43］.

[47]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朐县博物馆. 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J］. 文物，2002（4）：4～26 页.

[48]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J］. 文物，1989（4）：67～78.

[49] a. 罗宗真. 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J］. 考古，1963（6）：291～300，290.
b. 南京博物院. 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J］. 文物，1974（2）：44～56.

[50] a. 杨泓. 山东北朝墓人物屏风壁画的新启示［J］. 文物天地，1991（3）：6～8.
b. 杨泓. 关于南北朝时青州考古的思考［J］. 文物，1998（2）：46～53.

The Procession Pictures with Oxcart and Horse in the Coffin Chamber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ies

Zhang Hanshuo

Abstract: Horse drawn oxcart processions are a common motif on frescoes within the coffin chamber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his paper focus on this topic. Specifically, to discuss the root cause how this fresco custom forms in that period. It first considers the first frescos of the Northern Wei. The Northern Wei inherited this from Jin system but invented new and innovative motifs. The procession with oxcart and horse had formal standard until North Qi, and since this rule constrained high to low level officials. We can observe this tomb fresco motif with oxcart and horse spread from main city to country side in the North Qi area.

Key words: procession picture with oxcart and horse; the Northern Dynasties; institutional norm

内亚游牧社会丧葬中的马*

沈睿文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100871）

毋庸多言，马在内亚游牧社会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游牧民之必需品，出现于不同场合之中，丧葬活动自也离不开它。本文拟讨论马在内亚游牧社会丧葬活动中的角色。总的说来，在内亚游牧社会的丧葬活动中，马主要出现在出殡、埋葬以及祭祀（烧饭）等三个场合，充当着不同的角色。下面试分述之。

一、烧物葬及烧葬中的马：殉马

内亚社会的埋葬有其特殊形式，且具有某种共性和持续性。火焚在埋葬中的普遍使用便是其中一例，此类葬俗在安德罗诺沃文化早期便已流行[1]。火焚丧葬最主要的形式有两种，即烧物葬和烧葬。

焚烧死者生前所用车马器用以送亡者魂归故里的葬俗，此即所谓烧物葬。目前所见最早见载于王沈《魏书》，该书详细地记叙乌丸（桓）的葬俗及其内涵：

> 〔乌丸〕贵兵死，敛尸有棺，始死则哭，葬则歌舞相送。肥养犬，以采绳婴牵，并取亡者所乘马、衣物、生时服饰，皆烧以送之。特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乎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以死之魂神归泰山也。至葬日，夜聚亲旧员坐，牵犬马历位，或歌哭者，掷肉与之，使二人口颂咒文，使死者魂神径至，历险阻，勿令横鬼遮护，达其赤山，然后杀马、衣物烧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毕皆烧之。[2]

史载，鲜卑言语习俗与乌桓同[3]。《宋书》记述鲜卑葬俗亦说：“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4]

在鲜卑墓葬中，烧物葬的现象较为常见，惟长期以来并未受到足够重视。如，在科右中旗北玛尼吐鲜卑墓群南 M35、朝阳十二台乡砖厂 88M1、辽宁北票房身村二号墓、

---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蒙古族源的考古学研究”课题成果之一。

安阳孝民屯墓以及辽宁朝阳后燕崔遹墓等墓葬中发现有木炭或灰烬等焚烧过的痕迹，这些应该都是鲜卑烧物葬的孑遗[5]。2013～2015 年，我曾参加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旗县博物馆藏品的整理，发现所藏鲜卑陶器基本上内外都有烟炱的迹象。这种情况说明这些陶器在下葬时经过特地焚烧，它们是墓主生前所用的器物。实际上，火焚的现象在呼伦贝尔地区的石板墓文化便可见。这些石板墓多坐落在依山傍水的朝阳坡地，分布较为密集。其时代为公元前 11 世纪～前 3 世纪，应属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即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游牧文化遗存。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海德拉斯图石板墓群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该墓群分布在一南北向山脊的两侧翼，在该山脊的中部偏上处可见一处人为的经过火焚烧的垒石[6]。这应该是在墓地举行焚烧仪式所致。同样的现象也见于新巴尔虎左旗伊和乌拉石板墓群[7]。当然，其焚烧器用以及焚尸与否仍有待今后进一步的考古工作。

烧物葬是跟乌桓、鲜卑族的宗教信仰紧密结合的一种葬俗，这就意味着它已然成为二者种族文化的一个标志。文献记载也表明，内迁后的鲜卑统治者内部对烧物葬的习俗一仍其旧。《魏书》卷四八《高允传》云：

> （高）允以高宗纂承平之业，而风俗仍旧，婚娶丧葬，不依古式，允乃谏曰："……今国家营葬，费损巨亿，一旦焚之，以为灰烬。苟靡费有益于亡者，古之臣奚独不然。今上为之不辍，而禁下民之必止。"[8]

又《魏书》卷一三《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云：

> 高宗崩，故事：国有大丧，三日之后，御服器物一以烧焚，百官及中宫皆号泣而临之。[9]

此上都说明迁徙后的鲜卑统治者内部依旧保留烧物葬的习俗，同时明确告知鲜卑烧物葬葬仪在丧后三日举行。

从已经发表的北朝墓葬所见现象判断，可确定举行烧物葬仪的有 3 座。即，磁县湾漳北朝墓 M106、茹茹公主墓和宣武帝景陵。上述三座墓葬所谓"涂黑墓室"现象的出现应该是相同行为所致，盗墓和地下水的影响并非最为根本的原因，而是应该跟北朝政府保留鲜卑葬俗中的烧物葬有关[10]。由此或可推论，如若墓室空间允许的话，则可在墓室里焚烧，而这显然是跟墓主人的社会地位相契的。

烧物葬的习俗普遍且持久地保留在内亚游牧社会。遗憾的是，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极其零散。从文献记载来看，鲜卑之后，契丹、女真以及满族也都存在该习俗。

《辽史 · 礼志二》："凶仪 · 丧葬仪"载，"圣宗崩，兴宗哭临于菆涂殿。……乃以衣、弓矢、鞍勒、图画、马驼、仪卫等物皆燔之"[11]。自清代以来被视为契丹遗裔的达斡尔族，"葬埋有棺椁，并殉死者所爱之良马，埋烧其衣服，及烧饭致祭等之俗，一如旧观"[12]。从《辽史 · 兴宗本纪》的记载可知，在圣宗下葬之前，至少曾三次焚烧其生前御用之物[13]。据此，可知烧物葬不止一次。但是，契丹族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火焚葬俗。即，先将死者树葬，三年后再焚烧所收骨骸。此见《北史 · 契丹传》所

载："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14]

《三朝北盟会编》记女真葬俗，"死者埋之而无棺椁。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15]。其中所谓"贵者"是否寓指举行烧物葬的社会群体之地位。

据意大利人卫匡国《鞑靼战纪》记载，"清代立国之前，满洲人仍沿袭着焚烧奴婢、马匹之类以殉葬的习俗，即如果一个贵人死后，要把他在另一个世界生活所需的仆人、妇女、马匹和弓箭投入他的火葬堆。这一野蛮习惯在后来他们征服了中国之后，由于中国人的反对和纠正而终于放弃了"[16]。但是，从清宫档案记载来看，实际上废除的只是焚烧奴仆，至于焚烧器用则仍旧。如，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太上皇高宗死后至下葬之前，曾先后二十余次行焚化之礼，烧掉的物品多达八百二十五件套，包括高宗生前御用的朝冠、朝袍、龙袍、棉褂、长襟袍、长褂、棉袄、朝带、皂靴、棉袜、手巾以及车轿幔帐等物[17]。

除了这种焚烧死者生前器用的葬俗之外，文献所载突厥的葬俗跟上述鲜卑烧物葬有似。不同之处在于除了焚烧死者生前器用之外，突厥还连同死者尸体一起烧焚，而且要"收其余灰，待时而葬"。这都是乌桓、鲜卑族烧物葬所没有的内容。我们不妨将突厥族的这种葬俗称之为"烧葬"，《周书》对此有详细记载。同书卷五〇《突厥传》云：

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诸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绕帐走马七匝，一诣帐门，以刀剺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黄落；秋冬死者，候华叶荣茂，然始坎而瘗之。葬之日，亲属设祭，及走马剺面，如初死之仪。葬讫，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又以祭之羊马头，尽悬挂于标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饰，会于葬所[18]。

《隋书》卷八四《突厥传》记载与此稍异，以为是"择日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19]。

在阙特勤墓地中曾出土阙特勤的一顶王冠，冠上有一只双翅展开的鹰像[20]。2001年，在突厥用比伽可汗陵园发现一窖藏，内有金带扣、金腰带、金牌饰以及黄金王冠等几千件文物。其中有两件镀金银鹿，一件完好，另一件被火烧坏，只残余头颈和三足。这两次考古发现证明突厥丧葬中确实存在焚烧死者生前服用之物的习俗[21]。在考古发掘过程中，经常发现在突厥人的墓地上有两种可以明显区分的骨殖残迹，一种是焚烧过的牲畜骨殖炭灰，这是生人供奉死者在阴间享受的"食物"之痕迹；另一种是没有完全烧掉，未至碳化的牲畜骨殖，乃是突厥人以日常烧炙方法做肉食以供生人食用而留下的。考古学家确认后者就是葬后宴的遗迹[22]。前者应即突厥烧葬的遗留。北周时期，突厥化的安伽其尸骨在天葬后仍以烧葬的形式安置于甬道墓志处，便是受突厥烧葬习俗影响所致[23]。唐《李思摩墓志铭》说："宜令使人持节册命，陪葬昭陵。赐东园秘器，于司马院外高显处葬，冢象白道山。葬事所须，并宜官给。仍任蕃法烧讫，然后葬。"[24]李思

摩，本姓阿史那氏，阴山人也，原为突厥人，其墓志铭文所谓“蕃法烧讫”，便是突厥特有之烧葬。

此外，还有一种火烧的丧葬形式称作焚尸葬，或曰火焚葬，它跟突厥烧葬中焚烧尸体的做法同。这是在墓坑内直接火烧墓主遗骸的下葬方法，但是并不焚烧器用，也非突厥烧葬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火焚葬方式也有不同。贝加尔湖内萨满岬岛上的新石器时代的谢洛沃文化墓葬是在把墓主遗体放入墓坑内，用火焚烧，火还在燃烧时便覆盖土，故墓主骨架只是部分被火严重焚烧。而无论是黑水靺鞨还是粟末靺鞨，其墓葬也以火焚葬最为常见，火焚的方式也很独特[25]。1980 年，在东外贝加尔发现一座石板墓（8～9 世纪），很可能属于古黠戛斯人的墓葬[26]。根据全部情况判断，死者膝部稍微弯曲，头向东北，是被仰身放置在用桦木点燃的篝火里，尸体在没被烧尽的时候，就用石头盖上。因此篝火下面的石头被烟熏黑，而沿篝火遗迹的边缘则保存下来很多物品。墓葬里的骨骼保存下来的不多，在篝火遗迹的东部残存烧焦的颅骨、臂骨和锁骨，在西部是腿骨残骸。有的上面没有火烧的痕迹，在中部只是一片烧焦的骨块。

西域早期丧葬中的用火现象，有火葬、焚烧墓室和火祭三种形式，它们在目的、程序和具体操作上都有明显区别，代表三种不同的丧葬观念和礼仪。其共同点则是对火的观念，或者可以说崇拜。这三种不同的用火葬俗，分别对应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体系。火葬习俗主要分布于帕米尔高原和阿尔泰山中国境内的西端，阿尔泰山西出进入米努辛斯克盆地。这类葬俗的墓葬的分布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从帕米尔高原至天山中国境内西端再到阿尔泰山的中国境内西端这样一条线上，这条线大致是中亚北部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影响区的东界。安德罗诺沃文化中典型的缸形器等器皿见于这些墓葬中。因此，这类文化遗存很可能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体系，或受到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影响。焚烧墓室葬俗主要分布于塔里木盆地南、北缘，以及与塔里木盆地联系密切的吐鲁番盆地，墓葬多为单墓道竖穴土坑墓，流行丛葬和分层葬，年代在汉代前后。这类习俗应是绿洲文化的表现。火祭习俗分布于昆仑山北麓山谷和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河岸，墓葬以石堆、石围、封土墓为主。其与火葬墓一道，属于游牧文化遗存[27]。显然，上述三种葬俗形式更为复杂多样，其中火葬、焚烧墓室的葬俗间或也焚烧了死者生前器用，这一点虽与烧（物）葬相同，但是该内容并非二者所必须，且其直接焚烧与焚尸葬同；而火祭的葬俗是否也预示着它们跟前述呼伦贝尔地区石板墓文化存在某种共性?

尽管上述火焚葬俗不尽相同，但已可表明，火焚或焚烧死者生前器用的葬俗在内亚游牧民族中普遍存在，并成为一种具有持续性的共同文化因素。

关于埋葬、焚烧死者生前所乘马匹的用意明指者，见载于上引王沈《魏书》。即，“肥养犬，以采绳婴牵，并取亡者所乘马、衣物、生时服饰，皆烧以送之。特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乎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以死之魂神归泰山也”。值得注意的是，该丧葬习俗不仅延续很久，而且还有迹象表明它跟随拓跋鲜卑的内迁进入

了中原地区。辽宁北票西北将军山东麓发现的北燕冯素弗夫妇墓中，冯素弗墓殉犬二只[28]，便是该东胡旧俗的存续。在山东嘉祥英山隋开皇四年（584 年）徐敏行墓的墓室壁画[29]东壁《徐侍郎夫人出游图》中最后为饲犬人和双犬，这应该是受到北齐拓跋丧葬遗风的表现。由徐敏行墓该壁画亦可证明史载拓跋鲜卑与乌桓同俗的真实性以及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以后该习俗的保留。因此，我们也就有理由认为在内亚游牧社会的丧葬文化里大体也应如是。

但是，在埋葬死者的过程中，除了焚烧其生前坐骑之外，还有杀马殉葬的行为。

在内亚游牧社会中，殉马可见于匈奴、鲜卑、突厥等墓葬中。汉霍去病墓前石马以及唐太宗昭陵六骏[30]便是分别仿自匈奴、突厥民族的习俗。当然，在霍去病及唐太宗昭陵的事例中，陵园列树石马的性质已被转换成为死者纪功[31]。

辽圣宗统和以后，屡见禁丧祭之礼杀生的诏令：圣宗统和十年（992 年）正月丁酉，“禁丧葬礼杀马，及藏甲胄、金银、器玩”[32]；兴宗重熙十一年（1042 年）十二月丁卯，“禁丧葬杀牛马及藏珍宝”[33]；重熙十二年六月丙午，“诏世选宰相、节度使族属及身为节度使之家，许葬用银器，仍禁杀牲以祭”[34]。

此上恰可说明马在辽代丧葬中的作用。

直至 16 世纪，在漠南蒙古人社会仍是如此。据明萧大亨《北虏风俗》说：“初，虏王与台吉之死也，亦略有棺木之具，并其生平衣服、甲胄之类，俱埋于深僻莽苍之野。死之日，尽杀其所爱仆妾、良马，如秦穆殉葬之意。”[35]可见，殉马也是内亚游牧社会普遍的一种葬俗。

综上，火焚是内亚游牧社会习见的葬俗，其中焚烧包括死者生前坐骑在内的器用是烧物葬以及烧葬的共同现象。在埋葬过程中，焚烧死者生前骑乘以及杀殉之马，不妨称之为“殉马”。此类“殉马”在烧物葬、烧葬的葬俗中皆可见。

二、祭祀（烧饭）中的马：祠马

北方民族祭祀的习俗称为“烧饭”，对它的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过程。王国维最早指出辽金“烧饭”的习俗。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六《蒙古札记·烧饭》：

> “烧饭”本契丹、女真旧俗，亦辽金时通语。……《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女真死者，埋之而无棺椁。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所有祭祀饮食等物尽焚之，谓之烧饭。”此俗亦不自辽金始。王沈《魏书》言乌桓“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婴（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服，皆烧而送之”。然“烧饭”之名，则自辽金始。……满洲初入关时，犹有此俗。吴梅村《读史偶述》诗云：“大将祁连起北邙，黄肠不虑发邱郎。平生赐物都燔尽，千里名驹衣火光。”后乃以纸制车马代之，今日送三之俗，即辽金烧饭之遗也。[36]

王氏认为，辽金元之所谓“烧饭”，既包括祭祀之礼，也包括殉葬之俗，并且这种丧祭习俗可以上溯至乌桓，下延至清初。此后相关研究甚多。学者所持观点主要有两类。

其一，认为殉葬与烧饭祭祀同，此说以王国维为代表。后贾敬颜进而认为烧饭之名虽起于辽金元三朝，但烧饭之俗则是许多北方民族所共有的，“杀马（甚至杀奴婢）殉葬与烧饭祭祀是一回事，‘殉’之与‘祭’并无绝对的差别”[37]。

其二，认为烧饭仅为祭祀之礼，与埋葬礼仪无关。如，陈述认为烧饭是祭祀而非殉葬，强调烧饭之俗仅见于辽金元时代，王国维所言乌桓和满族葬俗都属于殉葬，并指出祭祀和殉葬的界限非常清楚：祭祀可以在朔望、节辰、忌日多次举行，而殉葬则只能有下葬时一次[38]。

宋德金认为烧饭与殉葬之间存在两个明显的区别：一是次数不同，殉葬只烧一次，烧饭则是多次；二是所烧对象不同，烧饭仅指焚烧祭祀之酒食，殉葬焚烧之物则包括死者生前所用鞍马衣物等[39]。

对此，刘浦江著力最深。他在认同陈述和宋德金关于烧饭是祭祀而非殉葬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指出殉葬只烧一次的结论是靠不住的，并认为殉葬与烧饭是有区别的：其一，目的不同。即，以殉葬为目的的葬俗与以祭祀亡者为目的的烧饭；其二，内容不同。即，殉葬所焚之物具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均为死者生前所用之物，而烧饭则不一定，如烧饭所烧之马并非死者生前所乘之马；其三，时间不同。即，殉葬所行焚烧之礼均在下葬之前，而烧饭所行焚烧之礼则一般在下葬之后，前者属于凶礼，后者属于吉礼[40]。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关于烧饭的内涵要以刘氏的阐释较为清晰准确。

不过，从零星文献所勾勒出来的情况来看，烧饭之俗实也是许多北方民族共同的习俗。如，郝经《续后汉书·北狄传》记匈奴葬俗曰：

> 始死，号哭，众以酒酪饮之，谓之“添泪”。杀马、牛、羊祭而食之，焚其骨，谓之“烧饭”。所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41]

又前引王沈《魏书》中所谓“同祠以牛羊，祠毕皆烧之”指的是祭祀中烧牛羊，其意义应该与辽金时期的“烧饭”同。可见，殉葬所行焚烧之礼与祭祀所行焚烧之礼并见于匈奴、乌桓和鲜卑社会。

《魏书·高车传》称高车（敕勒）人送葬时，“多杀杂畜，烧骨以燎（祭），走马绕旋，多者数百匝”[42]。高车人究竟所烧何骨？其烧骨燎祭的具体仪轨如何？有何用意？若非置于上述内亚社会传统之中，仅就文献所载的这十几个字，殊难理解。

契丹也存在烧饭之俗。《辽史》卷四九《礼志》“吉仪·爇节仪”载：

> 及帝崩，所置人户、府库、钱粟，穹庐中置小毡殿，帝及后妃皆铸金像纳焉。节辰、忌日、朔望，皆致祭于穹庐之前。又筑土为台，高丈余，置大盘于上，祭酒食撒于其中，焚之，国俗谓之“爇节”。[43]

又李焘《续资治通鉴续编》卷一一〇“天圣九年（1031）六月”条记载：

> 〔辽主〕既死，则设大穹庐，铸金为像，朔望节辰忌日辄致祭。筑台高逾

丈，以盆焚酒食，谓之烧饭。[44]

叶隆礼《契丹国志·道宗纪》亦云：

> 后帝以〔宋真宗、仁宗〕御容于庆州崇奉，每夕，宫人理衣衾，朔日、月半上食，食气尽，登台而燎之，曰烧饭，惟祭天与祖宗则然。[45]

引文中“惟祭天与祖宗则然”可用来解释“烧饭”祭祀的性质，而前文所言高车人“烧骨以燎”的习俗于此抑或可相互勘合。如前所言，自清代以来被视为契丹遗裔的达斡尔族“葬埋有棺椁，并殉死者所爱之良马，埋烧其衣服，及烧饭致祭等之俗，一如旧观”，也曾存在烧饭致祭的葬俗。

同样，女真的烧饭习俗也非常盛行，屡见于《金史》诸纪传。《三朝北盟会编》载：“所有祭祀饮食之物尽焚之，谓之烧饭”[46]。又文惟简《虏廷事实》“血泣”条载：“尝见女真贵人初亡之时，其亲戚、部曲、奴婢设牲牢、酒馔以为祭奠，名曰烧饭。”[47]

不过，还是要以有关蒙古人烧饭习俗的文献记载最为详细。其中如下史料更有助于判明烧饭的性质：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记元朝蒙古人习俗：“元朝人死，致祭曰‘烧饭’。其大祭则烧马”[48]。

元朝政府还专门设有烧饭院，关于烧饭的内容有较详细的记载：“每岁，九月内及十二月十六日以后，于烧饭院中，用马一，羊三，马湩，酒醴，红织金币及里绢各三匹，命蒙古达官一员，偕蒙古巫觋，掘地为坎以燎肉，仍以酒醴、马湩杂烧之。巫觋以国语呼累朝御名而祭焉。”[49]鄂尔多斯地区有一种旧俗，于每年腊月二十九日夜，在成吉思汗陵庙附近掘地三穴，烧马奶酒、羊肉、面粉等物进行祭祀，并谓“此当为13世纪遗俗”[50]。2013年夏天，呼伦贝尔联合考古队在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发掘清理出两座灰坑，恐即是在墓地烧饭祭祀的遗迹。

1245年，奉英诺森四世教皇旨令出使蒙古的意大利人柏朗嘉宾，所撰《柏朗嘉宾蒙古行纪》记录的13世纪蒙古贵族的丧葬风俗或可给我们提供某种提示。他写道：

> 当病人死后，如果他官居上品，便把他秘密地埋葬于田野中人们所乐意的地方。届时还要用他的幕帐之一陪葬，使死者端坐幕帐中央，在他面前摆一张桌子，一大盆肉和一杯马奶。同时还要用一匹母马及其马驹、一匹带缰绳和备鞍的牡马等陪葬。当把另一匹马的马肉吃完之后便用稻草把其皮填塞起来，然后再竖于两块或四块木头之上。这样一来，死者在另一世界也可以有一幕帐作栖身之地，有一匹母马以挤奶喝和饲养牲畜，同时也有可供作坐骑使用的公马。已被吃掉其肉的马匹的骨头为祭其灵魂而焚烧，甚至还经常发现一些女子们结队而来为奠祭某些人的灵魂而焚烧骨头，正如我们在那里亲眼目睹和亲耳所闻的那样。[51]

上述记载可谓详尽，极为清晰地展示了13世纪蒙古贵族的丧葬仪轨。在所记蒙古人烧饭的习俗中，吃完马肉之后，要焚烧马骨，烧骨燎祭以祭亡魂。

在鄂尔多斯传统的成吉思汗祭奠中，每年 3 月 20 日要举行祭祀成吉思汗及其后妃的焚食祭仪，此即嘎利鲁祭（γaril-un tailγa）。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祭仪仍保存有焚烧祭牲骨头的习俗。按照惯例，要从作为牺牲的马、牛、羊中，各取前脖一块、后脖一块、跟骨一块、尾骨一块、腰侧三块，以及脊骨、桡骨、尺骨、膝骨各一根，用于嘎利鲁祭的焚烧祭祀[52]。

据此，高车人送葬时，所谓“烧骨以燎”也就不难理解。其中恐怕也有为祭死者灵魂而将吃掉肉的马匹的骨头焚烧的行为。由此也可判定，前文所述突厥葬后宴实际是跟烧饭有似的祭祀形式。

人类学资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古代突厥人最初的丧葬仪式、追悼仪式就是为亡灵准备饭食的仪式。死者生前富有，丧葬仪式上宰杀的牲畜数量就要多；死者生前贫穷，宰杀的牲畜数量就少。为了使亡灵食物不断。追悼、祭祀仪式几乎每年举行一次。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游牧民族祭祀祖先仪式上杀马、宰羊。维吾尔族较早地过上农业定居生活，杀牲祭祖现象已不多见。但是在库车、喀什等地，人们有在陵墓前堆放牛、羊角的习俗。在他们的观念中，牛、羊角到了祖先亡灵那里就是整条的牛，整匹的马，墓前堆放的牛、羊角越多，祖先亡灵拥有的牛、羊数目也就越多[53]。此或也是鲜卑墓葬中随葬牛头的用意。不知鲜卑墓葬中随葬的嘎拉哈是否也与此意同？这一点尚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可知烧饭致祭也为游牧民族丧葬中之共性，而马在其中同样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不过，烧饭也有只用羊，并不用马的。《元史·祭祀志》记蒙古旧俗，即云：“凡帝后有疾危殆，度不可愈，亦移居外毡帐房。有不讳，则就殡殓其中。葬后，每日用羊二次烧饭以为祭，至四十九日而后已。”[54]可知。

三、出殡中的马： 殡马

关于内亚游牧社会出殡中的马，除了充当出行仪仗的构成之外，其他方面文献记载更是缺乏，只能从现有的一些丧葬图像来考察。兹列举于后。

Sivaz 遗址 7 世纪纳骨器（图一）其上部图像左侧为娜娜女神，右侧为战神；其下部图像右侧可见一祭司身后有一匹佩戴鞍鞯的马。

这样的马还可见于 Miho 美术馆石重床的 B 屏（图二）、吉美石重床 1 屏（图三）、虞弘墓石堂椁壁浮雕之一（图四）、青州傅家第四石（图五）以及史君石堂东壁（e1-e3）（图六）图像。

在阿夫拉西亚卜（Afrasiab）发现的一幅 7 世纪的粟特大壁画（图八）上，绘有一奔赴帝王陵墓的仪仗（卤簿），其中的两个人之间有一匹佩戴鞍鞯的马，马前面的人将它牵向一位祭司（padām）[55]（图七）。可见，在上述石葬具中出现佩戴鞍鞯之马的场景应我们注意到，在史君石堂 E3 中，升入中界的史君夫妇便骑乘翼马。这恰说明死者

亡灵正是乘骑翼马而升入中界的。同样地，在史君石堂 E2 上部，两匹翼马竭力飞向并试图接住正在下坠的恶者。结合 E2、E3 的场景，可以推知翼马的任务是将死者灵魂载入中界。故可知，上述无人乘骑的覆盖鞍鞯之马是为墓主人进入中界而备。在史君石堂 E1、E2 下部钦瓦特桥上，紧跟史君夫妇之后的便是两匹马，其后才是牛羊、骆驼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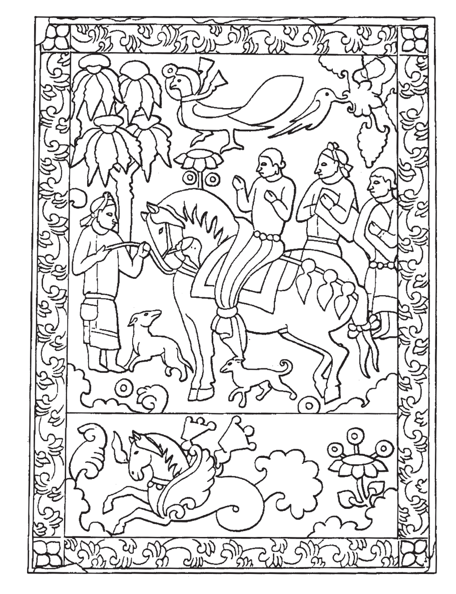
图一 Sivaz 遗址 7 世纪纳骨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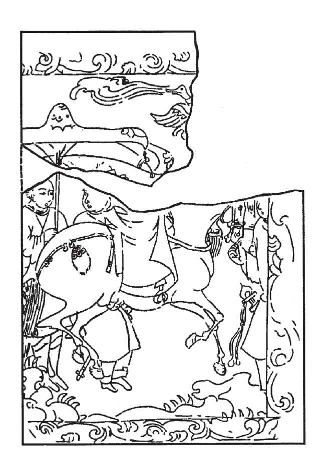
图二 Miho 美秀美术馆藏石棺床 B 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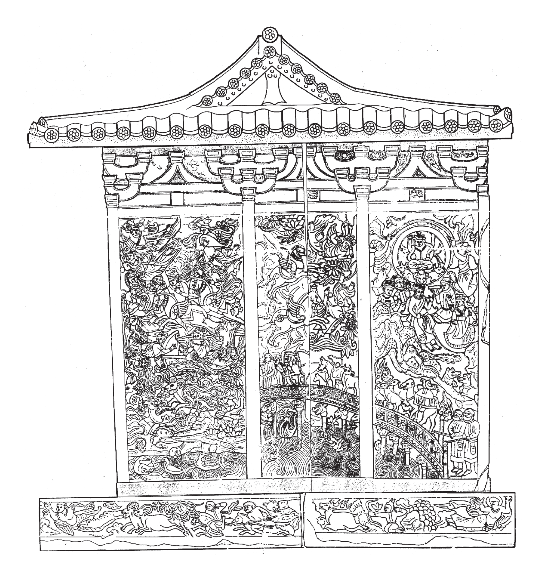
图三 吉美石重床 1 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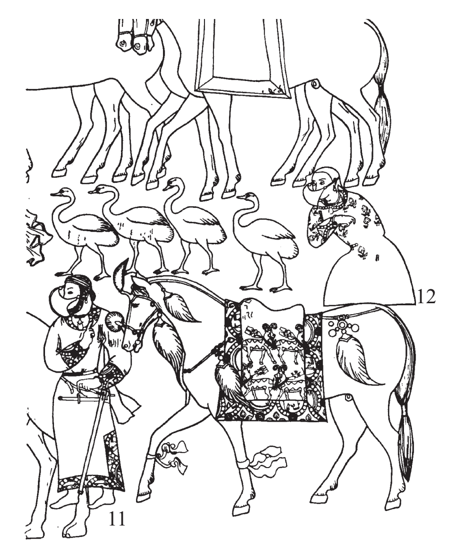
图四　虞弘石堂椁壁浮雕之一



图五　青州傅家第四石“出行图之一”



图六　史君墓石堂东壁 E1～E3



图七　阿夫拉西亚卜（Afrasiab）7 世纪粟特壁画局部



图八　阿夫拉西亚卜（Afrasiab）7 世纪粟特壁画

而到了 E3，上述所有动物都长出双翼随史君夫妇一同升天，当然那两匹马也随之变成翼马成为史君夫妇升入中界的坐骑。这也是为何在相关图像中在该马之前或有进行供奉的行为，如 Miho 美术馆石重床的 B 屏者，原来缘于该马承担着墓主人灵魂升入中界的神圣使命[56]。同样地，在史君石堂 E1 钦瓦特桥入口处也浅浮雕有两位祭司。也是现实出殡仪式的真实写照。

2013 年夏天，笔者采访陈巴尔虎旗大萨满获知，在蒙古族（贵族）的葬俗中，当蒙古贵族死亡之后，其家人会挑选一匹良马交给萨满，该马会跟随出殡队伍到墓地，萨满会对该马耳语，告知死者长相和爱好，以便该马在另一世界（长生天，即天堂）认得死者并跟随死者。但是，事实上，这匹马在葬礼上并没有被杀死或者焚烧。葬礼结束后，萨满会在这匹马的脖子上系一白丝带，然后让它在草原上自由生存直至自然死亡，任何人都不得伤害它。其实，在现在蒙古族祭敖包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此类马在丧葬中可称之为“殡马”。显然，这种现象的出现跟萨满在丧葬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

萨满教普遍存在于内亚游牧民族社会。早期鲜卑的崇拜包括自然与鬼神崇拜、图腾崇拜、祭天与祖先崇拜等，在此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中，似乎也应产生交往于人和神灵之间的使者萨满。不同于突厥、蒙古的是，鲜卑史料对此很少提及[57]。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从中获知萨满在游牧社会的重要性。前引王沈《魏书》载乌桓的葬俗：

> 至葬日，夜聚亲旧员坐，牵犬马历位，或歌哭者，掷肉与之，使二人口颂咒文，使死者魂神径至，历险阻，勿令横鬼遮护，达其赤山，然后杀马、衣物烧之。[58]

此处所提“口颂咒文”之人很可能是指萨满巫师[59]，而“历位之犬马”恐便是服侍死者灵魂于另一世界的殉马（犬）或殡马（犬）。

《魏书·高车传》载高车人：

> 喜致震霆，每震则呼叫射天而弃之移去。至来岁秋，马肥，复相率候于震所，埋杀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说，似如中国祓除，而群队驰马旋绕，百匝乃止。[60]

实际上，这是以自然林木或竖树枝为祭场，供牺牲，绕其周匝，以祭天地神灵的风俗。一般认为这就是萨满信仰普遍的祭祀形态，存在于今北亚、东亚、中亚的狩猎、游牧民族之间[61]。

根据《魏书·礼志》的记载，可知在北魏一年一度祀天的拓跋旧礼中，司礼者是一个执鼓的女巫[62]。更有甚者，这些萨满的神言在国家的军政行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每逢迁徙、征战、归附、反叛等重大的部族活动，酋长们必在事先请萨满占卜预言，请示神意以断定去从[63]。相关的史载并不少，如,《魏书·序记》载：

> 献帝讳邻立。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64]

同样，此处所提“神人”很可能是指萨满巫师[65]。

在拜占庭史料中，达头可汗致东罗马皇帝的一封信里便明确表示，突厥部落“有祭司预言未来之事”[66]。

唐永泰元年（765 年），回纥萨满“见一大人即归”的预言使其与唐廷的一场战争得以避免[67]。

《辽史》卷四九《礼志一》“吉仪・祭山仪”载，祭山时，有“大巫以酒酹牲”[68]。同书卷五〇《礼志二》“凶仪・丧葬仪”亦载，“圣宗崩，兴宗“率群臣入，柩前三致奠。奉柩出殿之西北门，就辒辌车，藉以素裀。巫者祓除之。诘旦，发引，至祭所，凡五致奠。太巫祈禳”[69]。

显然，前述突厥人绕帐剺面和绕墓祭标同样来源于江上波夫所言萨满教的基本祭祀仪式[70]。众所周知，蒙古族称萨满为“博”，称跳神为“行博”。因此，萨满广泛存在于蒙古族中也毋庸置疑。

要之，萨满普遍存在于内亚游牧社会，并在其日常生活、乃至国家军政事务中起着重要作用，当无疑义。因此，若从内亚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和共性来看，应可推断殡马在内亚游牧民族丧葬中的存在。殡马在上述场景及图像中出现，可称之为“殡马出行”。在上述所举祆教丧葬图像中，出现殡马以及墓主夫妇乘骑翼马升至中界（天堂）的场景，应是琐罗亚斯德教进入内亚以后，经内亚化后新出现的一项内容。

四、小　　结

在内亚游牧民族的丧葬活动中，马充当着重要的角色。火焚葬俗的出现很可能跟燎祭的观念有关。从文献记载可知，烧物葬（或烧葬）出现于内亚游牧民族的埋葬过程，而焚烧死者生前所乘马、或者杀马相殉便为重要内容。此外，在为祭祀而举行的烧饭仪式中或转变为燎（烧）骨以祭。此二者已为学界所熟知。

但是，在游牧民族的丧葬中，马并非只是在上述两个场景中使用。从人类学资料来看，在送葬的过程中，也会使用活马，在萨满举行相关仪轨之后，并不下葬，而是标记后任其自生自灭，不得伤害，但也同样服务于死者。考古所见图像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

尽管上述三种历史碎片在文献中并不完全见载于同一时代，人类学资料与可勘同的考古图像资料也不同期，但正是这种时间上的错位，才让我们相信只有连缀上述三种场景才能构成马在内亚游牧社会丧葬活动中的完整而真实的角色。

注　　释

[1] 相关研究可参 И・札巴罗夫，Г・德列斯维扬斯卡娅著．高永久，张宏莉译．中亚宗教概述[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2] a．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M]．北京：中华书局，1959．

b. 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列传的记载与此同. 北京：中华书局，1965.
[3] 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列传[M].
[4]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5]〔韩〕金成淑. 慕容鲜卑随葬习俗考[J]. 人文杂志，2005(3). 案，文中，金氏称之为“烧器习俗”.
[6] 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陈巴尔虎旗卷[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7] 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新巴尔虎旗左卷[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8]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9] 同[8].
[10] 沈睿文. 夷俗并从——安伽墓和北朝烧物葬[J]. 中国历史文物，2006(4).
[11] 辽史·卷五〇·礼志二[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 阿勒坦噶塔. 达斡尔民族考[A]，达斡尔资料集第二集[C].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13] 刘浦江. 契丹人殉制研究——兼论辽金元“烧饭”之俗[A]. 文史[C]，2012(2).
[14] 北史·卷九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5] 徐梦莘.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卷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6]〔意〕卫匡国著. 戴寅译. 鞑靼战纪[M]. 清代西人见闻录.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17] 大事档·白档·乾隆皇帝丧礼·卷三[M].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转引自苑洪琪. 清代宫廷丧葬礼仪奠献述略[A]. 清代宫史论丛[C].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
[18] 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 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此北史同周书，详北史.
[20]〔苏联〕H. 塞尔. 奥查夫著. 柯宁译. 蒙古国和硕柴达木地方的考古工作[J]. 考古，1959(12).
[21] 案，吐蕃也有类似葬俗. 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M]载，“其赞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玩及尝所乘马、弓剑之类，皆悉埋之”. 详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22]〔苏联〕Ю. С. 胡佳科夫著. 申屠榕译. 蒙古地区的古突厥葬后遗存[J]. 蒙古学信息，1993(1)；刘永连. 突厥丧葬风俗研究[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3] 沈睿文. 论墓制与墓主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关系——以康业、安伽、史君、虞弘诸墓为例[A]. 载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C]. 第六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24] 大唐故右武卫大将军赠兵部尚书谥曰顺李君墓志铭并序. 张沛. 昭陵碑石[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
[25] 冯恩学，王春燕. 靺鞨的火焚葬之谜[A].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研究(第14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26]〔俄〕E. B. 科维切夫著. 邱立英译. 东外贝加尔的中世纪焚尸葬墓及其民族文化的阐释[J]. 北方文物，1996(1).
[27] 肖小勇. 新疆考古发现的墓葬用火痕迹[J]. 西域研究，即刊.
[28] 黎瑶渤. 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J]. 文物，1973(3).
[29] 山东省博物馆. 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隋代墓室壁画的首次发现[J]. 文物，1981(4).
[30] a. 葛承雍. 唐昭陵六骏与突厥葬俗研究[A]. 华文史论丛(第60辑)[C]. 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9．后收入所撰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M］．北京：中华书局，2006．
b．葛承雍．唐昭陵、乾陵蕃人石像与“突厥化”问题［A］．欧亚学刊．［C］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后收入所撰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M］．
［31］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2］辽史・卷一三・圣宗本纪［M］．
［33］辽史・卷一九・兴宗本纪［M］．
［34］同［33］．
［35］萧大亨．夷俗记・北虏风俗［M］．“葬埋”条，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万历二十二年自刻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9．
［36］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7］贾敬颜．“烧饭”之俗小议［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1）．
［38］陈述．谈辽金元”烧饭”之俗［J］．历史研究，1980（5）．
［39］宋德金．“烧饭”琐议［J］．中国史研究，1983（2）．
［40］同［13］：179～205．
［41］郝经．续后汉书・卷七九上・北狄・匈奴传［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2］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M］．
［43］辽史・卷四九・礼志一［M］．
［4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5．
［45］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6］三朝北盟会・政宣上帙・卷三［M］．
［47］文惟简．虏廷事实［M］．笔记小说大观二十五编・卷八．台湾：新兴书局，1979．
［48］叶子奇．草木子［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9］元史・卷七七・祭祀志六・国俗旧礼［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0］额尔登泰等．蒙古秘史词汇选释［M］．呼和浩特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51］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2］a．赛音吉日嘎拉，沙日勒岱著．郭永明译．成吉思汗祭奠［M］．呼和浩特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
b．赛音吉日嘎拉著．赵文工译．蒙古族祭祀［M］．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
c．杨海英．オルドス・モンゴルの祖先祭祀－末子トロイ・エジン祭祀と八白宮の関連を中心に［A］．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大阪）21 卷 3］［C］，1997（3）．
［53］郎樱．西北突厥语民族的萨满教遗俗［Z］．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0897b01013x3m.html．
［54］元史・卷七七・祭祀志六・国俗旧礼［M］．
［55］Marshak. B.I. La thèmatiquesogdiennedansl’art de la Chine de la secondemoitiè du Vie siècle［A］.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 Belles Inscriptions & Belles-Lettres, Comptes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nnée 2001 janvier-mars*［C］, Paris, 2001.
［56］沈睿文．吉美博物馆所藏石重床的几点思考［A］．三夷教研究——林悟殊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C］．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
［57］韩香．试论早期鲜卑族的原始萨满崇拜［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5（1）．
［58］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M］．

[59] 同［ 57 ］.
[60] 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 M ］.
[61]〔 日 〕江上波夫．匈奴的祭祀［ A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 9 卷［ C ］．北京：中华书局，1993．
[62] 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 M ］．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
[63] 刘永连．突厥丧葬风俗研究［ 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64] 魏书·卷一［ M ］.
[65] 同［ 57 ］.
[66]〔 东罗马 〕狄奥菲拉特．历史［ M ］．转引自〔 法 〕沙畹．西突厥史料［ M ］．北京：中华书局，1948．
[67]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M ］.
[68] 辽史·卷四九·礼志一［ M ］.
[69] 辽史·卷五〇·礼志二［ M ］.
[70] 刘永连．祭帐仪式·置尸马上·待时而葬——突厥葬礼三考［ J ］．人文杂志，2001（ 6 ）.

The Horse in Nomadic Society's Funeral of Inner Eurasia

Shen Ruiwen

Abstract: The use of fire in funerary contexts is a common feature of inner Eurasia nomads, in which horses usually act as an important role. From the literature we know that burning appeared in the funeral process of inner Eurasia nomads, and burning or burying horses alive became an essential component. This is called " 殉马 ". Additionally, the Shaofan ceremony became to burning bones in sacrifice, this is called " 祠马 ".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have also documented funerals which also use live horses. After a shaman finished a ritual, people didn't bury or hurt the horses, just marked them. But this also served the dead. This is called " 殡马 ".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document this phenomenon. Although these three situations above are not documented in same period, and the materials of 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 are in different time, the fact that the phenomenons share many of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funerary traditions in Inner Asian nomadic society.

Key words: inner Eurasia; burning; Xunma; Cima; Bingma

奚族历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王丽娟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北京，100872）

奚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最初以“库莫奚”之名出现于《魏书》,《隋书》始以“奚”为名。奚族自北朝出现，历经隋、唐、五代、辽、金、元，拥有近千年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和中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探讨和研究奚族的历史，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学术界对奚族历史的研究已有时日，不同时期的中外学者，依据文献记载，从不同的角度，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奚族历史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不少成果。

一、奚族历史研究的回顾

奚族历史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对于奚族的种类、居地、“库莫奚”一词的含义作了探讨[1]，开创了奚族历史研究的先河，其结论也为众多后世研究者或批判或采纳。张云波《辽代契丹人及奚人的分布》就辽代奚人的分布状况作了系统的论述[2]。40年代，日本学者岛田正郎《辽代的奚》从辽以前的奚族、辽对奚族的统治政策、奚族的行政机关、法律地位、风俗等方面作了研究，并指出辽代奚人的地位仅次于契丹，相当于色目人在元朝的地位[3]。金毓黻《东北通史》中“奚、契丹之所在”一节对奚族的来源、地域作了大体的说明[4]，但由于编者未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基本停留在对史料的陈述上。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大陆史学界对奚族的研究黯然无光，未见相关研究成果，仅台湾和日本几位学者对奚族的历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于省吾《殷代的奚奴》认为甲骨文中“奚”字为一披发跪着的奴隶形象，卜辞中曾以族名出现，“豯东北夷名，通作奚”，从而得出奚族来源于殷代奚奴的结论[5]。赵振绩《大奚成立与消失考》对辽末金初奚人回离保建立的奚族政权及其成立与消失的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6]。李符桐《奚部族及其与辽朝关系之探讨》(1～5）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奚部族的演变情况及入辽后奚部族与辽朝的关系[7]。王民信《辽朝统治下的奚族》论述了辽朝统治下奚族的存在形式、部族、社会地位等问题[8]。这几篇文章涉及奚族的来源、政权以及辽代的奚族，尤其是对辽代奚族的部族、政治地位的研究较为系统和深刻，为后来

研究者参考和借鉴。

20 世纪 80 年代，史学界掀起了奚族历史研究的高潮，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奚族的来源。冯继钦《有关奚族族源的两个问题》得出奚族来源于东胡鲜卑宇文部的结论，并从地域、语言、经济生活、风俗习惯、族名等方面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奚族与契丹在族源上“异种同类”的关系[9]。这是对奚族来源和奚族与契丹关系问题较为具体、深入的研究。李德山《奚族增考》通过对甲骨文中“奚”字的字形及含义的分析，认为奚族的族称来源与黄帝十二姓中任姓所建立的奚国有关，商代初期为了躲避奴役，一部分奚国人往东北迁徙，这部分奚人即奚的祖先[10]。任爱君《契丹与库莫奚的先世及其关系略述》通过对白马与青牛的传说、奇首可汗传说以及契丹与奚族的风俗习惯进行考证，认为二者共出于东部鲜卑宇文部这一民族共同体[11]。

第二，不同时期的奚族。北朝的奚族：冯继钦《北朝时期的库莫奚族》认为，北朝时期除了少部分奚人被迫迁往内地与汉人杂居、融合外，绝大部分人仍住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这一时期奚族的经济类型以畜牧业为主，狩猎、农业为辅，并与北朝进行交换贸易。该文还对奚族的人口、奚族与北朝和周边民族的关系有所论述[12]。

唐代的奚族：孟广耀对唐代的奚族做了较多研究和探讨，他的《唐代奚族君长及世次考述》考证了唐代奚族的二十二个君长，认为这一时期奚族的王位不是世袭而是世选；《唐代奚族驻牧范围变迁考论》认为唐代奚族驻牧范围的移动有一定的规律性，即不断南下和西进；《回纥羁属下奚族：兼释唐朝与奚族的关系》指出安史之乱之后，奚族一方面受回纥控制，一方面仍接受唐朝册封。至唐武宗大败回纥后，奚族趁机摆脱了回纥的控制，归属于唐；《安史之乱中的奚族》称安史之乱期间，奚人被利用，成为安禄山等人的同党[13]。崔明德《唐与契丹、奚和亲公主考述》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唐与契丹、奚族和亲的唐朝公主的身份，并认为唐与契丹、奚族的和亲是在契丹、奚族对突厥具有牵制作用和唐军事实力下降的情况下进行的[14]。

辽代的奚族：王玲《辽代奚族考略》对辽代奚族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作了综合性考察，认为奚族在隋、唐之际，社会发展还较为落后，基本上是逐水草而居，进行狩猎活动，大体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阶段[15]。冯继钦《辽代奚族共同体的演变及其特征初探》的中心论点即从北魏到辽建国前基本以血缘联系的奚族部落、部落联盟共同体，在辽建国后被以地域联系为基础的行政区划所代替，其社会结构也由原始公社制末期进入阶级社会[16]。杨若薇《奚族及其历史发展》主要论述了辽代奚族的社会组织、经济发展、军事作用等问题，并指出北朝末期，奚族的阿会氏具有世选联盟长的资格，预示着原始部落民主制度的衰落。而到了唐时，世选制已开始向世袭制过渡了[17]。这几篇文章对辽代前后奚族社会性质的研究较具代表性。孟广耀《唐以后奚族诸部的对应关系及奚王府所属诸部剖析》对唐以后（主要是辽代）奚族五部落的对应关系作了考辨，认为奚族五部的名称应以《辽史・营卫志下》的记音为准。孟广耀《试论

辽朝直辖奚族诸部营——兼论奚人契丹化趋向》也对辽统治下的奚族部落作了说明，并指出辽代奚族不断与契丹相融合，逐渐契丹化[18]。

金代的奚族：冯继钦《金代奚族初探》论述了金对奚族的政策、金代奚人的分布、社会地位、奚族与其他民族的融合等问题。认为金太祖对奚人安抚的目的在于控制奚人和利用奚人戍边[19]。李涵、张星久《金代奚族的演变》探讨了金对奚族的民族政策、金代奚族的社会组织、地理分布、与其他民族的融合等问题，指出以移剌窝斡起义为界标，可将金朝对奚族的政策分为两期，前期是既防范又利用，后期则是防范多于利用。这种政策的变化，对金代奚族的地理分布、社会组织编制以至整个奚族的发展都带来深刻的影响[20]。孟广耀《金朝对奚族的基本政策》也就金对奚族的政策作了阐述[21]。

第三，奚族政权。孟古托力《萧干建国称帝及其失败琐议》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奚族政权建立后对金的反抗斗争。指出萧干（回离保）为北辽政权的核心人物，并对萧干称帝的时间、地点、年号、条件、奚族政权与辽宋金之间的关系、奚族政权灭亡的过程作了系统的研究[22]。

第四，西奚。孟广耀《西部奚的历史探讨》论证了西部奚的产生时间、发展状况、西奚的三代奚王以及西奚与中原政权之间的关系。指出西部奚是在反抗契丹奴役和压迫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其精神可嘉[23]。这是较早也较为系统研究西奚的文章。

总体而言，20 世纪 80 年代史学界对于奚族历史的研究涉及奚族的来源、奚族在北朝、唐、辽、金时期的基本情况、奚族的政权、西奚几个方面。这些研究成果丰厚了奚族的历史，为奚族历史研究的繁盛打开了局面。

20 世纪 90 年代，史学界对于奚族的研究方兴未艾。这一时期，学者们对奚族历史的研究进入到奚族的文化领域。冯继钦《奚族文化刍议》指出奚族文化既有精神层面又包含物质层面。对奚族文化的物质层面之饮食、住所、交通工具、服饰、发式、生产工具和精神层面之婚俗、葬俗、心理禁忌、伦理道德等方面作了分析和探讨[24]。王峰《辽奚文化追溯》对奚族文化之源（舍根文化）、奚族早期文化以及隋唐时期的奚族文化作了论述[25]。

李德山《北魏以后的奚族》阐述了奚族自商代，经北魏及以后的发展变化，直到消亡的过程[26]。冯继钦《奚族史研究概述》对奚族自出现至消亡的过程作了大体的论述[27]。这两篇文章是对奚族历史的概括性研究。

李彦平《唐与东北少数民族契丹、奚的和亲》对唐与契丹、奚和亲的历史背景、人数、特点、意义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28]。孙彩红《唐、五代时期中原与契丹、奚的互市贸易》通过表格的形式对唐、五代时期契丹、奚族前来朝贡的时间、使者、朝贡物品、回赐物品等情况作了说明，并论述了中原对互市的管理、互市的发展因素、影响等问题[29]。

日本学者高井康典行《辽朝的部族制度与奚六部的改组》系统地阐述了辽对奚族部落的改组问题[30]。杨福瑞《六至十世纪初契丹与奚族的关系：兼论两族的不同命运结

局》认为 6 世纪初，奚族与契丹的发展基本是同步的，在对唐、突厥的关系上也是步调一致。但奚族在安史之乱中实力大为受损，契丹则趁势发展，最终控制了奚族[31]。

孟古托力《辽金战争中的奚族》指出金对奚族的策略是武力打击与招降怀柔并用，并叙述了萧干及奚族政权自建立到灭亡的过程[32]。王淑英《奚人萧裕与海陵王的关系——兼释复辟辽朝活动的失败》叙述了奚人萧裕与海陵王由莫逆之交到萧裕反叛及被刺死的经过，认为萧裕是奚族的杰出人物[33]。陈缙《西奚与古崖居》考证了古崖居为西奚的聚居地、西奚在古崖居的居住时间及在妫州的活动[34]。

进入 21 世纪后，史学界对奚族历史的研究又跨入一个新的阶段，主要表现在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扩展和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奚族的文献资料研究。张文平、张久和《库莫奚基本史料的初步研究》通过对文献中奚专传和专条记载的辨析，指出《魏书》《周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新五代史》中的奚传是建构奚族历史的基本框架[35]。对奚族历史资料的总结和辨析是研究奚族历史的前提和首要工作，这为后来研究者在资料运用方面起到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第二，奚族的考古资料研究。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有关奚族的碑刻和遗址、遗迹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李义《辽代奚“大王记结亲事”碑》对 1974 年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金沟乡喇嘛沟门村的奚人碑刻《大王记结亲事碑》的出土情况、碑文所反映的辽代官制、社会风俗、经济状况和语言特点等方面进行了说明和研究[36]。陈晓伟《奚王萧福延墓志三题》对奚人萧福延其人、其家族和奚王的相关问题作了探讨[37]。周峰《奚族碑刻概说》详细地介绍了奚族现存的 7 件碑刻的出土情况、形制、内容和著录情况，并对各个碑刻的史料价值作了分析[38]。毕德广、曾祥江《奚人历史文化遗存考述》就奚人的驿站、墓葬、碑刻、生活用品等历史遗存进行了考证和推测[39]。毕德广《奚族文化研究》从奚族的聚居地及其生态环境变迁、与奚族相关的遗存、奚族的社会状况几个方面就奚族境内由奚人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即在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中发现的属于奚族活动时期和活动范围内的由奚人创造的各种遗存及其反映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40]。

第三，奚族的研究综述。随着奚族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关于奚族研究综述的文章开始出现。主要有王凯《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奚族研究综述》和刘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奚族研究综述》两篇文章。前者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奚族的研究成果分为史料、族源、地理分布、唐代奚族、辽代奚族、金代奚族以及奚族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几个方面作了综述。后者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从奚族的起源与族名、活动范围、社会组织、社会生活、奚族与周边政权及民族的关系、奚族的文献学和考古学几个方面对奚族的研究成果作了叙述[41]。

同一时期，包爱英《十世纪以前库莫奚历史初探》对 10 世纪以前奚族的历史，包括奚族的起源、地域及其变化、奚族的兴衰、奚族与各个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奚族

的文化习俗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42]。程妮娜《论唐代中央政权对契丹、奚人地区的羁縻政策》、李蓉《唐初两蕃与唐的东北政策》、陈巍和闰华芳《安史之乱前后的奚、契丹》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唐朝对奚族的民族政策[43]。

任爱君《契丹对奚族的征服及其统治方略》就契丹对奚族的征服过程及统治方略作了探讨[44]。葛华廷《辽奚迭剌部及相关问题浅探》、王宇勍《辽代奚族的地理分布》、李月新和梁磊《辽代奚人的生活探析》分别对辽代的奚迭剌部、辽代奚人的分布、辽代奚人的生活状况作了论述[45]。

姚德昌、李颖《浅谈奚国的建立——记一个转瞬即逝的王朝建立的主要因素》对奚族政权的建立背景、国都和建立者作了考证[46]。纪楠楠《金朝对奚族政策探微》叙述了金对奚族的政策[47]。周峰《最后的奚人——金元时期石抹也先家族考》对《元史》中的奚人石抹也先家族和较有影响的石抹也先的后裔进行了考证，并简单地介绍了元代的另一个奚人家族——石抹扎剌儿家族[48]。张永攀《契丹奚车考》通过基本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对奚车的种类、形制、功能进行了考述并对其产生的原因作了分析[49]。

另外，岛田正郎著，何天明译《辽代的部族制度》（1～5）和《大契丹国》对奚族的部族有所涉及[50]。陈永志《契丹史若干问题研究》认为奚族即为辽代的萧氏，并对奚族的遗址遗迹作了总结[51]。

综上所述，自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中外学者对奚族历史的研究大致经历了 30、40 年代起步，50 到 70 年代大陆成果零状态，台湾地区、日本学者作了基础性研究，80 年代高潮，90 年代继续发展，21 世纪进入新阶段这五个历程。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涉及奚族的来源、奚族在各个时期的基本状况、奚族与周边政权和民族的关系、奚族的风俗文化、奚族政权始末、奚族历史研究的基本资料等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勾勒出奚族历史的基本轮廓，是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基础，需要充分搜集、借鉴和吸收。

二、奚族历史研究的思考

对奚族历史的研究成果已经涉及奚族历史的很多方面，也为奚族历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这些研究成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奚族的来源问题，至今难以取得共识；奚族的地域中涉及的一些地理名词，也有诸多解释；奚族部落名称的演变还较为模糊；奚族与周边政权和民族的关系有较多疏漏。还有一些问题的研究尚处于空白或起步阶段，如奚族的族名、姓氏、部落、社会、经济状况等。

其次，有些研究者的看法过于武断，有失公允，如在对奚族来源的研究中，有的学者将两个相隔千年的民族，通过对一个古字的考释联系到一起。还有部分学者运用语言学知识生硬地释义奚族历史中涉及的专有名词，得出难以令人信服的结论。

再次，研究者对奚族历史的研究均为奚族历史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一个或一段时

期的研究，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

对奚族历史的研究现状与奚族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称。究其原因，应该有以下两点。

第一，奚族的研究资料较少。基本文献史料屈指可数，正史中仅有几条专传和专条记载，且因前后文献的转抄和沿袭情况，内容多相同或相近，属于第一手资料且有使用价值的不多。其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也较为稀少和零散。同时，由于奚族与契丹来源相同、地域相近、语言相通、风俗文化相似，在契丹建国之前的发展进程也十分接近，即使现代考古学科迅速发展，在民族文化特点上，也难以将两个民族的历史遗存严格地区分开来。因而，明确证实为奚族的考古学资料也所见不多。

第二，由于奚族与契丹关系密切，契丹曾建立了强大的政权，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并占有重要地位。而奚族作为被征服民族，独立性逐渐消失，成为契丹国家组织内的一个部分。所以，研究者们多重视契丹，于无形中缺少了对奚族的关注。

鉴于此，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在对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的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之上，对奚族历史的研究可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充分认识到奚族的重要性。奚族自北朝出现至元代以后消失。在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奚族的文化是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奚族与北朝、隋、唐、五代等政权和周边的契丹、地豆于、突厥、回纥等民族均有着或疏或密的联系和往来。这些交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促进了奚族自身的发展，也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认识和了解。到了辽代，奚族“拟于国族”，是契丹贵族的左膀右臂，为契丹贵族的统治和辽朝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金代，依然有大量的奚人活跃于政治舞台，为金朝的统治者出谋划策。奚族还建立自己的政权“奚国”，这是奚人争取独立和自主的象征。总之，奚族在整个北方民族史和中国古代史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其二，注重对奚族的文献资料解读和利用。基本文献史料是研究奚族历史的主要依据。从奚族以“库莫奚”之名称出现于《魏书》到元代以后逐渐消失，历代文献对奚族的历史多有详略各异的记载。依据这些记载，可以基本理清奚族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复原奚族的历史面貌。但由于文献的编撰时间有早有晚，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各自对资料的掌握程度、史德、史才、史识、史观等方面有所差异，文献的质量和史料价值也就有所不同。后世研究者存在对奚族相关史料掌握不够全面，研究有待深入，甚至真伪不辨使用失当的情况，以致对于奚族史的研究还存在许多问题。因此，需要对记载奚族历史的主要文献进行系统的辨析与评价，理清诸部文献的史源关系，辨别真伪，明确史料价值。以此为前提和基础，依据有史料价值的历史文献，才能有望梳理出更接近于本来面目的奚族发展变迁的历史脉络，对奚族历史的相关问题作更为深入的研究，提出和解决相关的学术问题。

其三，加强对奚族考古资料的分析和利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考古技术的进步，奚族的考古资料不断出现，可以分为奚族的碑刻资料和其他考古资料。在奚族的碑刻中，

有的碑刻内容为史书所未载，可以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有的可与文献史料相互参证，也属于第一手资料，与基本文献史料同等重要。这些碑刻对于奚族历史的探讨和研究具有证明、补充，甚至是纠正某一历史问题的作用。它们与基本文献资料同等重要，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诚如罗振玉在《西陲石刻录》序中所言："古刻之裨益史氏，以边裔石刻为尤宏"[52]。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考古资料，同样对奚族历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佐证作用。对这些研究资料进行搜集、归纳和辨析是研究奚族历史的前提和首要工作。

通过对奚族基本文献资料的辨析，可知历代文献对奚族由简略到翔实的记载过程，即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对奚族由陌生到熟悉的过程。通过对奚族的碑刻和相关考古资料的评介，可知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更多与奚族相关的历史遗存被发现和证实，为奚族历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在对前辈学者研究成果全面掌握的基础上，在相关研究者的共同重视和努力下，对奚族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对奚族历史研究中的不足、讹误和空白进行补充、修正、商榷和填补的工作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向前迈进。如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奚族历史将逐渐清晰，奚族的形象也愈加丰满。

注　释

[1]〔日〕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2] 张云波．辽代契丹人及奚人的分布［J］．四川大学季刊，1935（1）．
[3]〔日〕岛田正郎．辽代的奚［J］．北亚细亚学报（第1辑），1942（10）．
[4] 金毓黻．东北通史［M］．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
[5] 于省吾．殷代的奚奴［J］．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1）．
[6] 赵振绩．大奚成立与消失考［J］．幼狮学志，9卷1期，1970．
[7] 李符桐．奚部族及其与辽朝关系之探讨（1～5）［J］．大陆杂志，33卷7～11期，1966（10～12）．
[8] 王民信．辽朝统治下的奚族［J］．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1974（5）．
[9] 冯继钦．有关奚族族源的两个问题［J］．求是学刊，1984（1）．
[10] 李德山．奚族增考［J］．民族研究，1989（5）．
[11] 任爱君．契丹与库莫奚的先世及其关系略述［J］．昭乌达蒙古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2）．
[12] 冯继钦．北朝时期的库莫奚族［J］．求是学刊，1987（5）．
[13] 孟广耀．唐代奚族君长及世次考述［J］．求是学刊，1984（4）；唐代奚族驻牧范围变迁考论［J］．内蒙古师大学报，1983（1）；回纥羁属下奚族：兼释唐朝与奚族的关系［J］．北方文物，1983（3）；安史之乱中的奚族［J］．社会生活战线，1985（3）．
[14] 崔明德．唐与契丹、奚和亲公主考述［J］．西北民族学院，1988（2）．
[15] 王玲．辽代奚族考略［J］．民族研究，1983（2）．
[16] 冯继钦．辽代奚族共同体的演变及其特征初探［J］．史学集刊，1983（3）．
[17] 杨若薇．奚族及其历史发展［J］．历史教学，1983（7）．

[18] 孟广耀．唐以后奚族诸部的对应关系及奚王府所属诸部剖析［ J ］．北方文物，1987（ 1 ）；试论辽朝直辖奚族诸部营——兼论奚人契丹化趋向［ J ］．东北地方史研究，1988（ 3 ）.
[19] 冯继钦．金代奚族初探［ J ］．求是学刊，1986（ 2 ）.
[20] 李涵，张星久．金代奚族的演变［ J ］．武汉大学学报，1986（ 6 ）.
[21] 孟广耀．金朝对奚族的基本政策［ A ］．辽金史论集（ 第四辑 ）［ C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22] 孟古托力．萧干建国称帝及其失败琐议［ 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8（ 3 ）.
[23] 孟广耀．西部奚的历史探讨［ J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 2 ）.
[24] 冯继钦．奚族文化刍议［ J ］．社会科学辑刊，1993（ 1 ）.
[25] 王峰．辽奚文化追溯［ J ］．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6（ 1 ）.
[26] 李德山．北魏以后的奚族［ J ］．北方文物，1991（ 2 ）.
[27] 冯继钦．奚族史研究概述［ J ］．民族研究动态，1993（ 5 ）.
[28] 李彦平．唐与东北少数民族契丹、奚的和亲［ J ］．社会科学战线，1996（ 3 ）.
[29] 孙彩红．唐、五代时期中原与契丹、奚的互市贸易［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8（ 4 ）.
[30]〔 日 〕高井康典行．辽朝的部族制度与奚六部的改组［ J ］．史观，1997（ 137 ）.
[31] 杨福瑞．六至十世纪初契丹与奚族的关系：兼论两族的不同命运结局［ J ］．昭乌达盟族师专学报，1998（ 5 ）.
[32] 孟古托力．辽金战争中的奚族［ J ］．黑龙江民族丛刊，1997（ 4 ）.
[33] 王淑英．奚人萧裕与海陵王的关系——兼释复辟辽朝活动的失败［ J ］．北方论丛，1998（ 1 ）.
[34] 陈缙．西奚与古崖居［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8（ 3 ）.
[35] 张文平，张久和．库莫奚基本史料的初步研究［ J ］．内蒙古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1 ）.
[36] 李义．辽代奚“大王记结亲事”碑［ A ］．中国古都学会——2001 年年会暨赤峰辽王朝故都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第十八辑下册 ）［ C ］．2001.
[37] 陈晓伟．奚王萧福延墓志三题［ A ］．宋史研究论丛（ 第十一辑 ）［ C ］．2010.
[38] 周峰．奚族碑刻概说［ J ］．赤峰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9 ）.
[39] 毕德广，曾祥江．奚人历史文化遗存考述［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3 ）.
[40] 毕德广．奚族文化研究［ D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7 ）.
[41] a．王凯．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奚族研究综述［ J ］．东北史地，2011（ 1 ）.
b．刘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奚族研究综述［ J ］．学术探索，2013（ 8 ）.
[42] 包爱英．十世纪以前库莫奚历史初探［ D ］．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7 ）.
[43] a．程尼娜．论唐代中央政权对契丹、奚人地区的羁縻政策［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 6 ）.
b．李蓉．唐初两蕃与唐的东北政策［ J ］．四川大学学报，2003（ 2 ）.
c．陈巍，闰华芳．安史之乱前后的奚、契丹［ J ］．大连大学学报，2010（ 1 ）.
[44] 任爱君．契丹对奚族的征服及其统治方略［ J ］．内蒙古社会科学，2010（ 2 ）.
[45] a．葛华廷．辽奚迭剌部及相关问题浅探［ J ］．北方文物，2009（ 2 ）.
b．王宇勍．辽代奚族的地理分布［ J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6 ）.
c．李月新，梁磊．辽代奚人的生活探析［ 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4 ）.
[46] 姚德昌，李颖．浅谈奚国的建立——记一个转瞬即逝的王朝建立的主要因素［ A ］．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二辑）［ C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 5 ）.

［47］纪楠楠．金朝对奚族政策探微［J］．史学集刊，2012（6）．
［48］周峰．最后的奚人——金元时期石抹也先家族考［J］．东北史地，2011（6）．
［49］张永攀．契丹奚车考［J］．西北民族研究，2000（1）．
［50］〔日〕岛田正郎著．何天明译．辽代的部族制度（1～5）［J］．蒙古学信息，2000（3），2000（4），2001（1），2001（2），2001（3）；大契丹国［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51］陈永志．契丹史若干问题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12）．
［52］罗振玉．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六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79）．

Reviews on the Studies of Xi

Wang Lijuan

Abstract: Xi people research started in the 1930s, and lasted 5 periods. Throughout this period we have learned about the origins, process of development, cultural custom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other tribes around the Xi. The above research made clear the history of Xi clear and integrated with other research. However, because of a lack of materials, there are some questions about studies of Xi. We should be thinking deeply about how to promote the studies of Xi.

Key words: Xi; Researches; Reviews; Thinking

试论辽代契丹墓葬的棺尸床

林　栋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110032）

棺尸床是墓葬内盛放墓主人尸体或墓棺的床，在墓主室中居于显著位置，是墓葬制度和文化内涵的重要体现。辽代契丹族与汉族墓葬的棺尸床在总体面貌上呈现出较大差异，体现出了不同民族、社会阶层在墓葬制度和文化内涵方面的差别。此前笔者曾对辽代汉族墓葬的棺尸床进行了专门的探讨[1]，本文则主要对契丹墓葬棺尸床的类型、年代、演变以所反映的墓葬制度等问题进行初步的讨论。

本文所指的辽代契丹墓葬，是就墓葬特征和文化内涵而言，在墓主人族属方面，主要以契丹族为主，其中也包括了少数采用契丹葬制下葬的辽代汉人。

一、类 型 划 分

依据棺尸床制作原料和形制上的差异，本文首先将契丹墓葬的棺尸床分为三大类。

（一）甲类（木床）

由木质围栏、床板、底座及床腿等部分构成。依据整体形制的差别可分三型。

A 型　上部有围栏，下部呈“须弥座”造型，无床腿，有些下部为砖基。根据床上部围栏造型的不同，可分四个亚型。

Aa 型　两面护栏。即左右两侧有护栏，而前后无护栏（注：前后左右方位以墓门进入墓室的角度而定，下同）。胡柱山 M4[2]一座墓内出有两张木床，由内而外并排横放（以下分别用胡柱山内、外表示），其中胡柱山外为 Aa 型床的代表（图一，1）。

Ab 型　三面围栏。前侧不带围栏，或在前侧中部设有间柱，留出缺口，多与木屋形小账配合使用。早期小帐多位于床上，而晚期随着帐的空间逐步扩大，则将尸床放置于帐内。可分二式。

Ⅰ式：以代钦塔拉墓[3]和叶茂台 M7[4]等为代表（图一，3、4）。二林场墓[5]床保存较差，床底部特征不详，根据残存迹象，原报告认为其木帐特征与叶茂台 M7 接近，故暂将其纳入Ⅰ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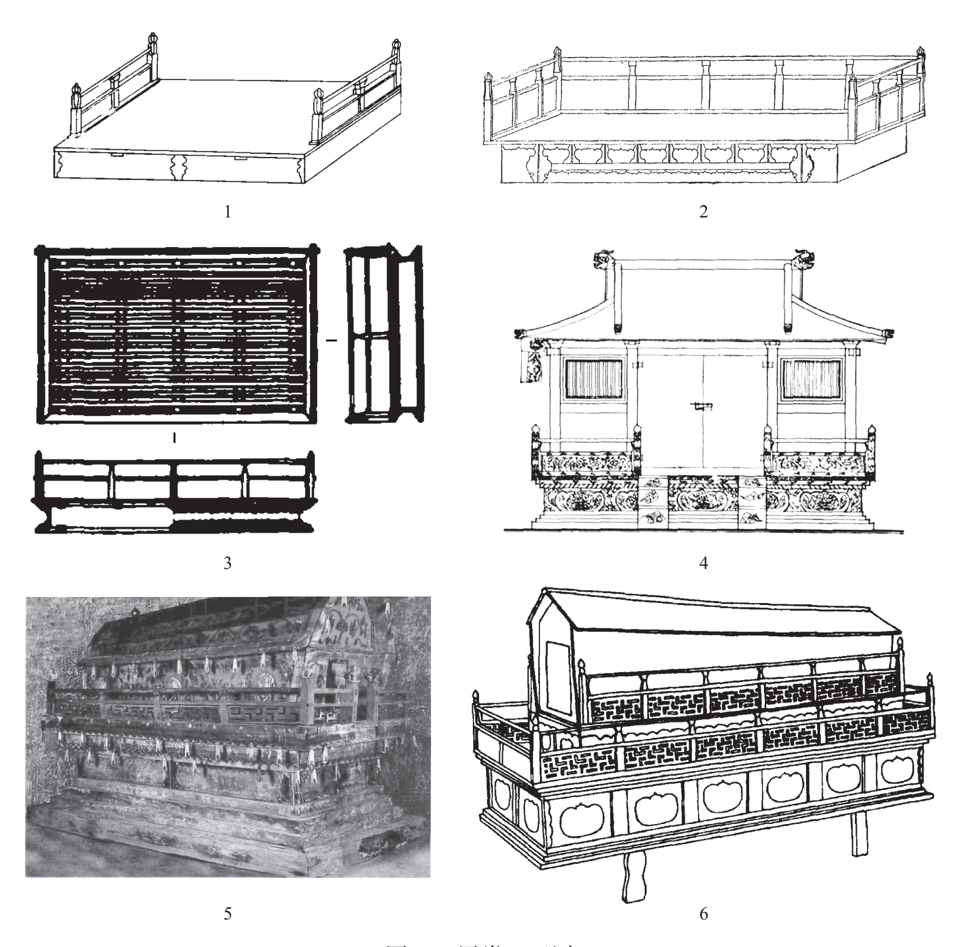
Ⅱ式：以解放营子墓[6]为代表（图一，2），另外包括胡柱山 M4 内、西窑村墓[7]和新地墓[8]。上烧沟 M2[9]木床从残存痕迹分析，原报告认为其特征与解放营子墓木床相似，故暂归为此式。

变化趋势为床下部须弥座的上下枭逐渐退化，束腰从有到无。有些床的位置由帐下移至帐内。

另外水泉沟 M2[10]尸床，只见文字报道，可知该墓出共出有木质的小帐、尸床和供桌，床的具体特征不详，但应属于 Ab 型的范畴。

Ac 型　三面护栏。前后均有护栏，左右其中一侧不带护栏或留有缺口，多与木棺配合使用。以吐尔基山墓[11]（图一，5）为代表。另外广德公墓[12]同样一墓出有两张木床，上下叠放（以下分别称为广德公墓上、下），其中广德公墓上（图一，6）也为此型。

Ad 型　四面均带围栏。以查干坝 M11[13]为代表。



图一　甲类 A 型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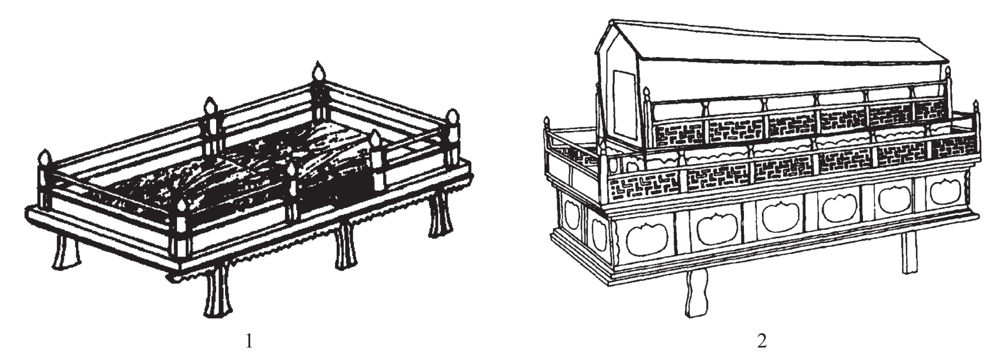
1. Aa 型（胡柱山 M4 外） 2. Ab 型Ⅱ式（解放营子墓） 3、4. Ab 型Ⅰ式（代钦塔拉 M3、叶茂台 M7）
5、6.Ac 型（吐尔基山墓、广德公墓上）（图上部）

注：3、4、6 来自刘未 . 辽代契丹墓葬研究［J］. 考古学报，2009（4）.

B 型　上部有围栏，床下部带床腿。根据形制不同可分两个亚型。

Ba 型　三面有完整的围栏，前侧围栏带有缺口。以上烧沟 M4[14] 为代表（图二，1）。

Bb 型　四面均为围栏。以广德公墓下为代表（图二，2）。



图二　甲类 B 型床

1. Ba 型（上烧沟 M4） 2（下）.Bb 型（广德公墓下）

注：图二皆来自刘未 . 辽代契丹墓葬研究［J］. 考古学报 .2009（4）.

C 型　无围栏、基座和床腿等结构，仅有一层床板直接放于地面之上，有些在床板边缘立有木框。以柴达木墓[15]、乌兰哈达墓[16]和范仗子 M101[17]等为代表。

（二）乙类（砖土床）

与辽代汉族墓葬砖土床的特征基本相同，砖土混筑（极少数床用琉璃砖制作），直接建于墓室地面之上，无床腿，床表面砌砖，内部多为土芯。根据床的平面形状及与墓壁的位置关系，可分为三型。

A 型　一体式。床的两侧及后部均与墓室壁相连，床体占据了整个墓室的后半部并与其连为一体。床的平面形状随墓室形状而变化，多呈长方形、半圆形、梯形等。根据床前沿的形态不同可分两个亚形。

Aa 型　床前沿为一条直线，可分三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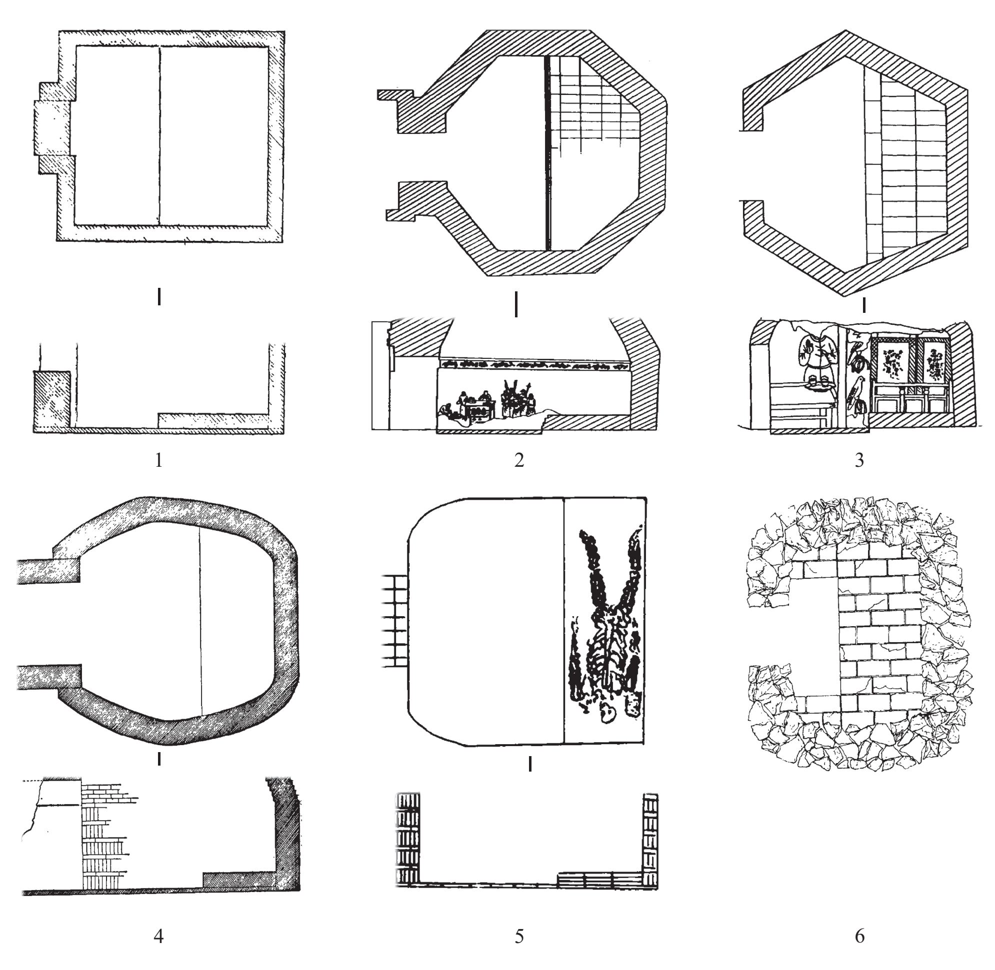
Ⅰ式：床平面占整个墓室的比例大于二分之一。以北三家 M2[18]为代表（图三，1）

Ⅱ式：床平面占整个墓室的比例约等于二分之一。以喇嘛沟墓为代表[19]（图三，2），另外包括七家 M5[20]等。

Ⅲ式：床平面占整个墓室的比例小于二分之一。以七家 M3[21]、北三家 M3[22]和程沟墓[23]等为代表（图三，3～5），另外包括北三家 M1[24]、李贝堡墓群 2007 年发掘的 M1[25]、M3[26]、小刘帐子 M2[27]、皮匠沟 M1[28]、豪欠营 M3[29]、M6[30]、和富拉尔基墓[31]等。

变化趋势为床平面占整个墓室的比例逐渐减小。

Ab 型　床前沿为一条凹线。以哲北 M1[32] 为代表（图三，6）。



图三　乙类 A 型床

1. Aa 型Ⅰ式（北三家 M2）　2. Aa 型Ⅱ式（喇嘛沟墓）　3～5. Aa 型Ⅲ式（七家 M2、北三家 M3、程沟墓）
6. Ab 型（哲北 M1）

B 型　独立式。床的四周与墓室壁均不相连，床体独立于墓室内。分三个亚型。

Ba 型　平面基本为长方形或抹角方形，床的高度矮，大体在 15～30 厘米。以叶茂台 M8[33] 和梯子庙 M4 为[34] 代表（图四，1、2），另外包括原碌科墓[35]、韩氏 M2[36]、叶茂台 M22[37]、曲家沟 M2[38]、古都河 M1[39]、M2[40]、大窝铺墓[41] 和达拉明安墓[42] 等。

Bb 型　平面基本为长方形或抹角方形，床的高度较高，大体在 60～80 厘米。以骆驼岭墓[43] 和红花岭墓[44] 为代表（图四，3、4），另外包括小努日木墓[45]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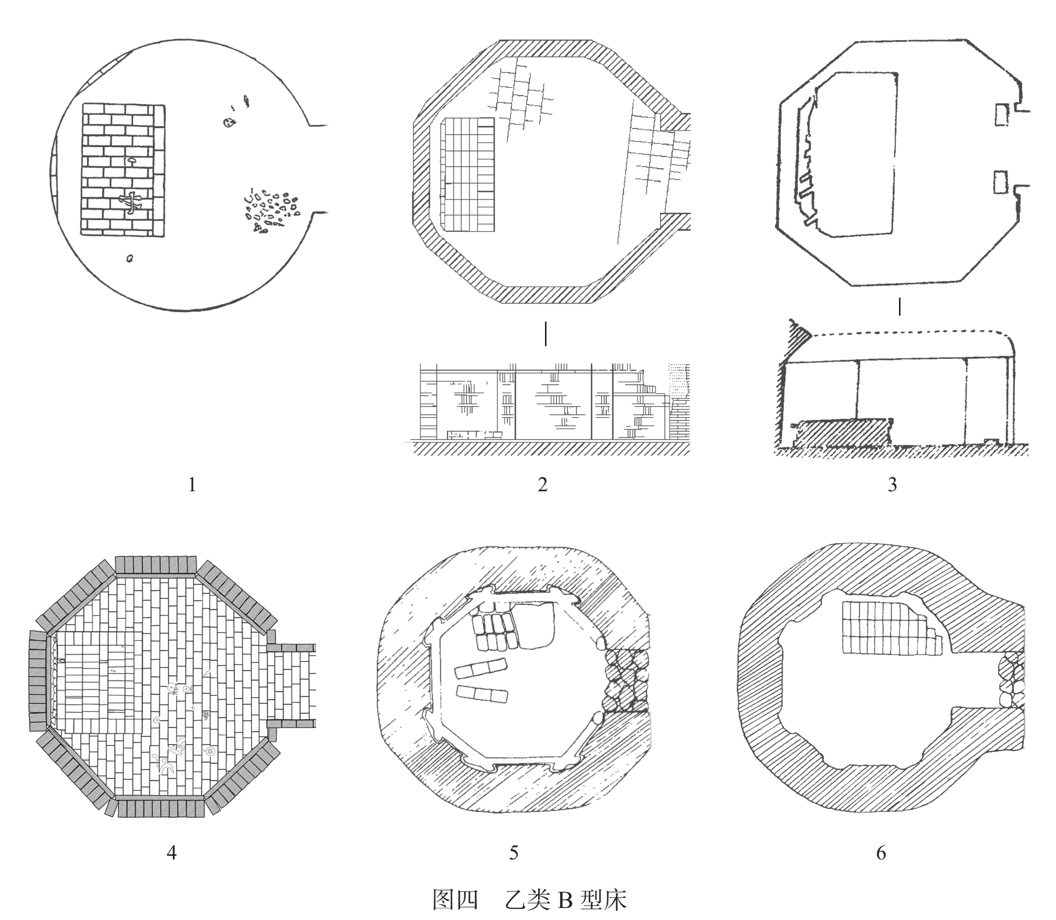
Bc 型　由两张床组成，一张横放于墓室后部，另一张侧放于墓室东侧。可分三式。

Ⅰ式：耶律羽之墓[46]。墓室北部和东部各放一床，由琉璃砖制成，该墓尸床未发表图像，只见文字。

Ⅱ式：万金山 M1[47]（图四，5）。墓室东部有床，北部有疑似床的痕迹（两道砖墙）。

Ⅲ式：万金山 M2[48]（图四，6）。仅在墓室东部有床，北部无床的痕迹。

变化趋势为墓室后部床逐渐退化到消失，而墓室东部床始终保留。



图四　乙类 B 型床

1、2. Ba 型（叶茂台 M8、梯子庙 M4） 3、4. Bb 型（骆驼岭墓、红花岭墓）

5、6. Bc 型Ⅱ式、Ⅲ式（万金山 M1、M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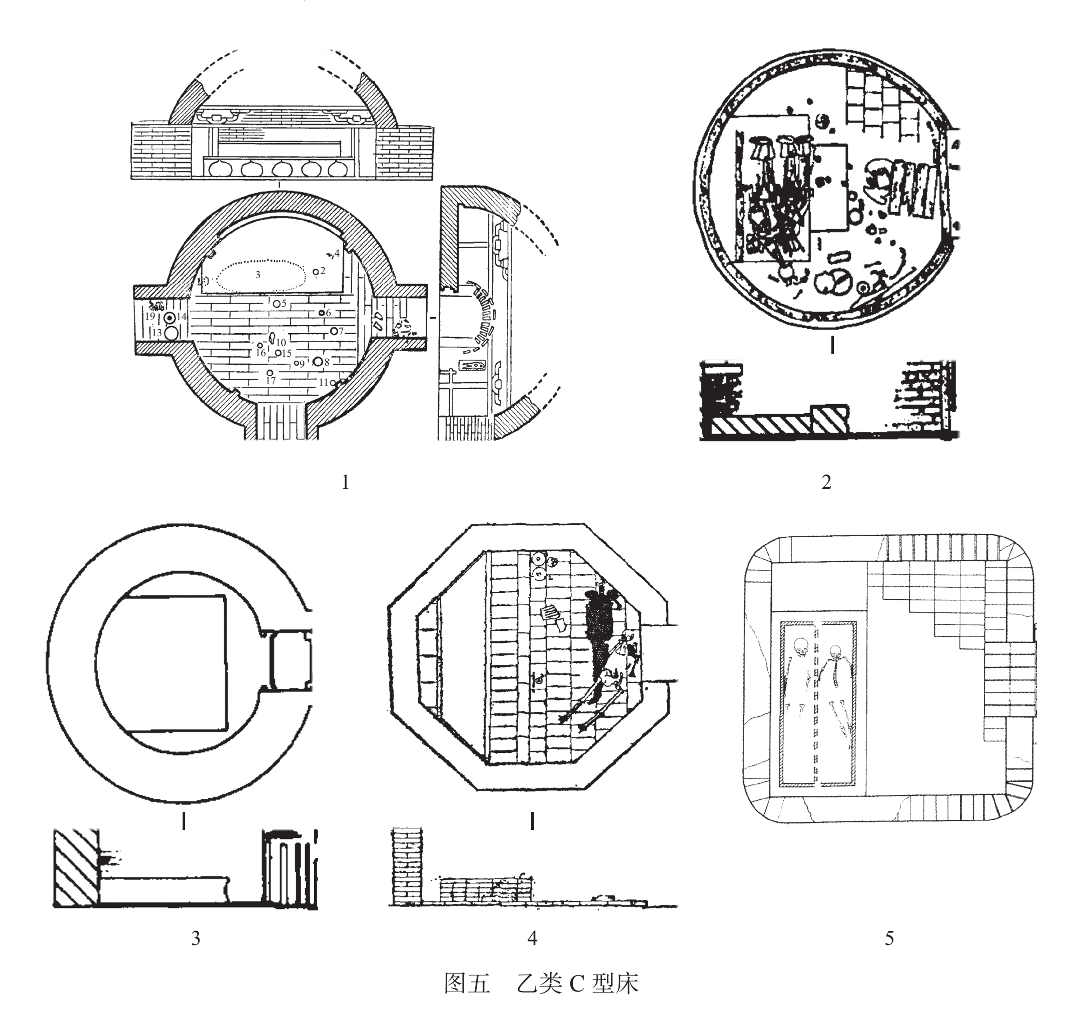
C 型　半独立式。总体形态介于一体式与独立式之间，床后部或两侧的局部区域与墓壁相连，而另外的部分则与墓壁保持一定距离。根据具体情况可分三个亚型。

Ca 型　床后部与墓壁相连而两侧与墓壁均保持一定距离。在圆形墓中床的形状多呈两侧直线而后部为弧线的“拱门”形状。以张扛村 M1[49]、陈国公主墓[50]和床金沟 M5[51]等为代表（图五，1～3）。另外还包括孤家子墓[52]和耶律氏墓[53]等。

Cb 型　床左右两侧与墓壁相连，而后部与墓室壁有间隔。以尖山墓[54]为代表

（图五，4），该墓为二次葬，后期又在原床前部接出一个长方形床，用于合葬。

Cc 型　床的后部和一侧与墓壁相连，而另一侧面与墓室壁保持一定距离。以朝阳沟 M2[55]为代表（图五，5）。



图五　乙类 C 型床

1～3.Ca 型（张扛村 M1、陈国公主墓、床金沟 M5） 4.Cb 型（尖山墓） 5.Cc 型（朝阳沟 M2）

（三）丙类（石床）

床面或整个床体由石料制成，分三型。

A 型　一体式。形态与一体式砖床相同，床后半部与墓壁相连。根据高度差别分为两个亚型。

Aa 型　床的高度较低。以萧孝忠墓[56]为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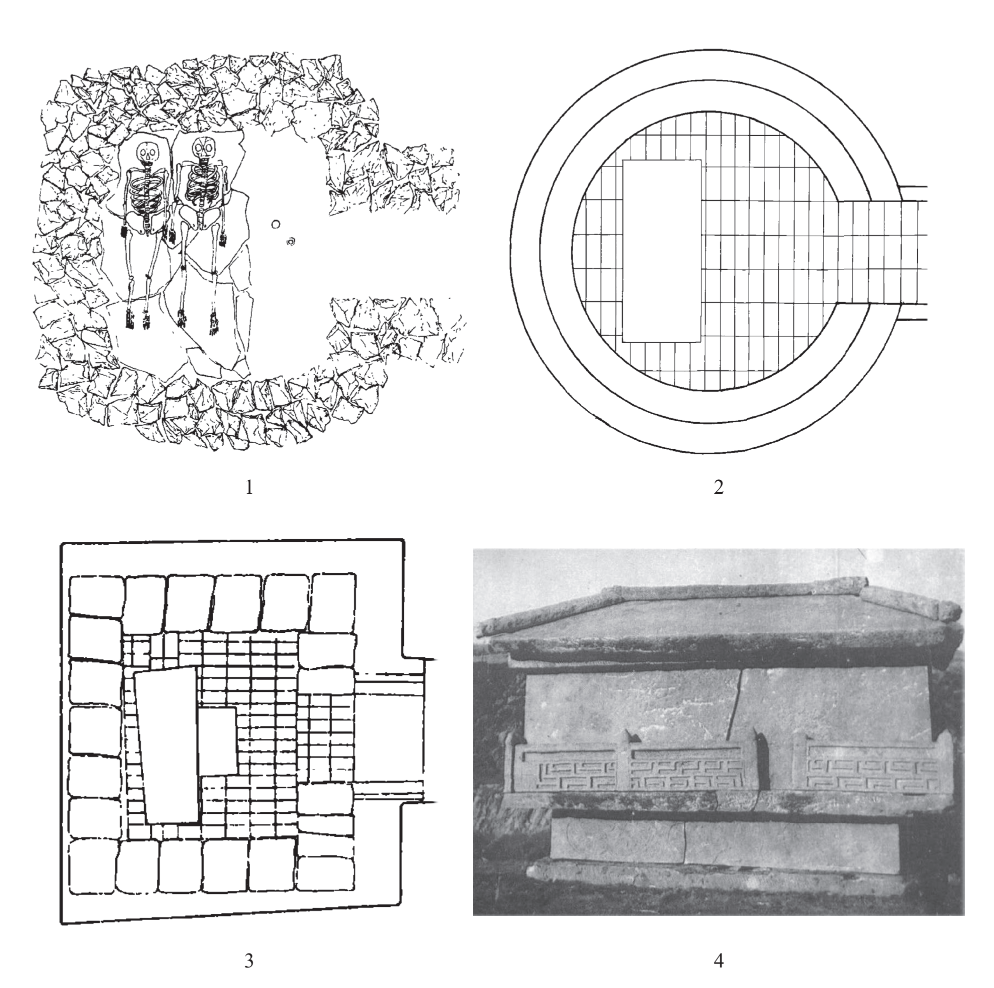
Ab 型　床的高度较高。以哲北 M3[57]为代表（图六，1 ）。

B 型　独立式。特征与独立式砖床相近，独立于墓室内，分两个亚型。

Ba 型　平面呈长方形。以亮甲山 M1[58]为代表（图六，2 ）。

Bb 型　平面呈梯形，且床前带有祭台。以梯子庙 M2[59]为代表（图六，3）。

C 型　围栏式。形制如围栏木床 Ab 型，在宽边围栏接近中部有一开口，床上同样设小帐而非墓棺，做工较木床粗糙简化。以张扛村 M2[60]为代表（图六，4）。



图六　丙类床

1. Ab 型（哲北 M3）　2. Ba 型（亮甲山 M1）　3. Bb 型（梯子庙 M2）　4. C 型（张扛村 M2）

二、年代与分期

（一）甲　类　床

甲类 Ab 型Ⅰ式的代钦塔拉 M3，具有比较典型的辽早期特征，叶茂台 M7 的时代大体在 970 年前后，二林场墓木帐特征与叶茂台 M7 接近，根据出土随葬品情况，原报告将其时代定为圣宗前期，大体也与前者接近。而Ⅱ式的胡柱山 M4 内和解放营子墓，据原报告分析年代均在辽中晚期之间。Ⅱ式上烧沟 M2 原报告将其定为辽早期，但从其

底座为“长方形合状，空底”的特征看，应与解放营子墓接近，该墓出土有三件黄釉瓷碗，这类黄釉瓷器被认为是从辽中期晚段以后才开始流行的[61]，且该墓为圆形单室墓，墓直径较小，这类小型砖室墓开始出现木床的时代上限亦不会很早（详见下文），因此上烧沟 M2 的时代大体也应在辽中晚期之间。西窑村墓出土铜器最晚者为“咸平通宝”，其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圣宗统合年间，该墓床基座部分同样退化明显，与解放营子墓特征相近，且该墓规模同样较小，因此期年代下限也有可能达到兴宗至道宗初期。Ab 型两式具有时代上的早晚关系。

另外的 A、B 型带围栏和基座（床腿）木床，如吐尔基山墓、广德公墓、上烧沟 M4、查干坝墓等，年代基本不超出辽早、中的范围，其中仅胡柱山 M4 时代下限可能稍晚，但大约也在道宗初期之前。C 型无围栏的木板床，总体时代要晚于 A、B 型床，目前所见的柴达木墓、乌兰哈达墓、范仗子 M101 等时间均集中在辽中期晚段（附表）。

（二）乙　类　床

乙类 Aa 型Ⅰ式北三家 M2 和Ⅲ式的北三家 M1、M3，同出自北三家墓地，原报告中就指出 M2 的时代要早于另外两座，前者大约在辽早期，而后二者约在辽中晚期。另外的几座 Aa 型Ⅲ式墓，七家 M2、李贝堡 M1、M3 和程沟墓等，时代大体也在辽中晚期。目前发现的两座 Aa 型Ⅱ式墓，喇叭沟墓和七家 M5，原报告将其时代定在辽晚期，参照特征与其相同的汉族一体式砖床看，Ⅱ式的年代上限可能更早，但确实与Ⅲ式存在交叉。契丹族一体式砖床的数量明显少于汉族，各式的年代均没有超出同式汉族床的范围，二者总体的时代特征和演变轨迹是基本一致的。

Ab 型的哲北 M1，时代在辽中期。Ba 型床的时代大体均集中在辽中期，其中年代较早者应为原碌科墓，较晚者为梯子庙 M4，二者的年代或可稍稍超出辽中期的范围，但相距不会太远。Bb 型主要集中在辽中、晚期。Bc 型Ⅰ式的耶律羽之墓，时代为 941 年，Ⅱ式的万金山 M1 和Ⅲ式的万金山 M2，同来自万金山墓地，原报告将其一并归为辽晚期，但从两个墓出土鸡冠壶的形态上看，M1 出土者体态相对矮胖，而 M2 出土者则明显修长，因此 M1 的绝对年代似乎应早于 M2，二者存在前后演变关系。Ca 型经辽早期的张扛村 M1、床金沟 M5 至辽中的陈国公主墓（1018 年），再到辽末期的耶律氏墓（1116 年），贯穿于整个辽代。Cb 型的尖山墓时代较晚，约在辽晚期。Cc 的朝阳沟 M2 则时代较早，在辽早期的穆宗应历年间。

（三）丙　类　床

丙类 Aa 型的萧孝忠墓时代为 1089 年，Ab 型的哲北 M3 时代为辽中期。Ba 型的亮甲山 M1 时代为辽中期；Bb 型梯子庙 M2 为辽早期。C 型的张扛村 M2，时代不晚于圣宗时期。因此丙类床除 Aa 型时代较晚外，其他的时代均在辽中期以前。

（四）契丹棺尸床发展的阶段性

根据以上对各类型床年代的分析，结合不同时期各类型床所在墓葬等级的变化情况，可将整个辽代契丹棺尸床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大体为太祖至景宗时期。突出特点为棺尸床主要以带围栏的木床（甲类A、B型）为主导，且集中出于大型贵族墓葬中。砖床和石床极为少见，且仅限于规模较小的墓葬中。

第二阶段大体为圣宗至兴宗时期。本阶段突出变化为，木床逐步由大型墓葬向中小型墓葬转移，床的形态有所变化。Ab型由Ⅰ式变为Ⅱ式，本期晚段开始出现不带围栏、结构简化的C型木板床。木床前期在大型墓葬中的风光不再，整体发展趋势逐步走向衰落。与此同时，以床金沟M5和陈国公主墓为代表大型墓葬开始流行使用砖土床，尤以平面呈拱门型的半独立式砖床为盛。砖土床崛起并取代了前期木床的位置，成为契丹大贵族墓葬的新宠，并较为迅速波及至中小型墓葬中。上述本期晚段新出现的C型木板床，形制与一体式砖床接近，可能也是受到砖床强势影响的结果。目前发现为数不多的石床以这一时期居多，且均出自中小墓葬。早段石床模仿木床形制建造的特征明显。

第三阶段大体为道宗至天祚帝时期。本阶段木床基本已消失不见，而砖土床则继续延续了上一阶段强势发展的势头，全面占据了大中小各级别的墓葬。以骆驼岭和红花岭墓为代表的高体独立式尸床（乙Bb型），可能就是这一时期强势驱动下在契丹墓葬中新变化。本阶段极为少见的石床（丙Aa型），形制也与砖床基本相同，而与前期石床存在较大差别，更加体现了砖床在这一时期的绝对主导地位。

三、源流与演变

契丹墓葬三大类棺尸床各有其来源。甲类带有围栏的木床及木棺，是从中原汉地（唐、五代时期）传统文化的丧葬习俗中借鉴而来的[62]。辽早期木床底部的须弥座造型，上下枭逐层内收，层次分明，特征与上述唐、五代时期同类床的造型特征十分接近；而后期枭部逐渐退化，束腰基本消失。这一趋势在带有须弥座的砖床上同样有所反应，可作为辽墓断代的参考依据。

乙类砖床，无论是一体式、独立式还是半独立式，均与辽代汉族同型砖床形制无异。契丹砖土床中时代较早的床金沟M5和北三家M2等，分别代表了半独立式和一体式砖床的早期形态，其共同特征是床平面占整个墓室的比重较大，与年代较之稍早的晚唐五代中原及北方汉族墓葬十分接近，二者有着十分密切渊源的关系[63]。这一点在近期公布的河南安阳刘家庄唐晚期李氏夫人墓（894年）砖床资料[64]上再次得到了证明。而后契丹各型砖土床的面积、占墓室的比重均有逐步缩小的趋势，其变化趋势也与辽代

汉族床同。近期新公布的朝阳杜帐子墓[65]，从其墓葬形制、随葬品及所处地理位置看，属于汉族墓葬的可能较大。原报告将其定为辽早、中期，但能够证明该墓属辽早期墓葬的证据并不明确，其尸床的形态属于晚期（Ⅲ式）特征，综合分析，其年代上限大约可推迟至辽中期以后。另外特征形制较为特殊的 Bc 型床，墓室北部与东部各放一床，这一特征与河北正定吴兴唐墓 M3[66]极为相似，因此可能也是受到唐代关内汉族的影响。

丙类石床中，时代较早的 Bb 型床平面呈梯形，体现出了一定的自身特色，而另外的 A 型、C 型和 Ba 型床，时代均在辽中期以后，特征分别与上述砖床和木床接近，应是不同时期分别受前二者影响的产物。如前述，至辽中期早段时受木床影响较大，而至辽晚期则明显是受到砖床的影响。纵观辽代石床，始终不见于大型墓葬中。辽早期的大型贵族墓葬，虽不见石床，但使用石房的传统确很明显。如宝山墓群[67]和岗根苏木怀陵陪葬墓[68]等，墓内都有用大型石板拼接而成的石房，辽祖州太祖时期的大石房虽建于墓外，但已被考证为太祖阿保机灵柩的权殡之所，后作为契丹皇室祭祖的神帐[69]，可见也与墓葬有很大关系。至辽早期晚段以后，大型墓葬的石房基本消失，从时间衔接上看，应是直接受到木床兴起的影响，继而又被砖床所取代。契丹石床应是前期石房文化传统的延续，并受到砖床、木床冲击的产物。

四、结　　语

各类棺尸床在不同级别墓葬中的流行时代各不相同，反映出了不同时期辽代墓葬制度的变化情况。其中作为契丹统治阶层墓葬代表的大型砖室墓，则始终引领着时代变化的潮流。进而又通过墓葬等级下向性的传播，影响了中小型墓葬棺尸床的总体面貌。由于辽代汉族墓葬的规模普遍较低，等级相差相对较小，因此棺尸床的总体面貌受到墓葬等级制度的影响较小，床的种类和变化也不及契丹族尸床丰富，这应是二者之间一个较大的差别。

木床在契丹墓葬中的逐步衰落，与砖床强势发展所带来的冲击有着直接的联系。作为汉族墓葬中最传统、使用阶层最广泛的砖土床，在契丹上层社会中从最初的不被接受，到逐渐发展壮大，并最终在契丹各级别墓葬棺尸床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发展是辽代契丹统治者对汉文化的认同和契丹族汉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具体表现。据传辽圣宗永庆陵（庆东陵）内曾出有汉白玉质地的石床及供桌，惜已无存，具体形制不详，但仍应视为辽代棺尸床最高级别的代表。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契丹墓葬中，无论大型还是中小型墓葬，都有一部分始终不使用棺尸床者，则体现了契丹族接受吸纳汉族文化的程度也是不尽相同的。而在辽晚期的汉族墓中，极少数墓葬中出现了木床和石床的迹象[70]，则是前期木床与石床在契丹墓葬中下向性传播的外延，是民族间互动交流的结果。

注 释

[1] 林栋．试论辽代汉族墓葬的棺尸床，待刊．
[2] 韩仁信．图木胡柱山辽墓九脊覆尸小账及辽代葬俗举隅［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1）．
[3] 周汉信，哈斯．科右中旗出土辽代木椁室及尸床浅析［A］．兴安盟文物工作站．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辽墓清理简报［A］．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
[4] 辽宁省博物馆等．法库叶茂台辽墓纪略［J］．文物，1975（12）．
[5] 张柏忠．内蒙古通辽县二林场辽墓［J］．文物，1985（3）．
[6] 翁牛特旗文化馆等．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发掘简报［J］．考古，1979．
[7] 李庆发．建平西窑村辽墓［J］．辽海文物学刊，1991（1）．
[8] 项春松．内蒙古赤峰郊区新地墓［J］．北方文物，1990（4）．
[9] 项春松．上烧沟辽墓群［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2（2）．
[10] 辽金考古队．扎鲁特旗辽墓发现精美壁画［N］．中国文物报，2000-10-29．
[11] a．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通辽市吐尔基山辽代墓葬［J］．考古，2004（7）．
b．郑承燕．吐尔基山辽墓彩绘木棺具［J］．中国博物馆，2010（3）．
[12] 项春松．内蒙古翁牛特旗辽代广德公墓［J］．北方文物，1989（4）．
[13] 董文义．巴林右旗查干坝十一号辽墓［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3）．
[14] 同［9］．
[15] 齐晓光．阿鲁科尔沁旗柴达木辽墓［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6（4）．
[16] 王建国等．阿鲁科尔沁旗乌兰哈达墓［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6（4）．
[17]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敖汉旗范仗子辽墓［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3）．
[18] 敖汉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昭乌达盟敖汉旗北三家辽墓［J］．考古，1984（11）．
[19] 敖汉旗博物馆．敖汉旗喇嘛沟辽代壁画墓［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1）．
[20] 同［19］．
[21]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敖汉旗七家辽墓［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1）．
[22] 敖汉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昭乌达盟敖汉旗北三家辽墓［J］．考古，1984（11）．
[23] 阜新市文物工作队．阜新程沟辽墓清理简报［J］．北方文物，1998（2）．
[24] 同［22］．
[25]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库县李贝堡辽墓群2007年度抢救性考古发掘报告［A］．沈阳考古文集（第二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26] 同［25］．
[27]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昭乌达盟宁城县小刘仗子辽墓发掘简报［J］．文物，1961（9）．
[28] 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博物馆．内蒙古敖汉旗皮匠沟1、2号辽墓［J］．文物，1998（9）．
[29] 乌盟文物工作站等．契丹女尸［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30] 同［29］．
[31] 齐齐哈尔市文物管理站．齐齐哈尔富拉尔基辽代砖室墓［J］．北方文物，2003（3）．
[32] 赉鹤龄等．内蒙古扎鲁特旗哲北辽代墓葬群［J］．北方文物，2002（4）．
[33] 辽宁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法库叶茂台8、9号辽墓［J］．考古，1989（4）．
[3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阜新县辽代平原公主墓与梯子庙4号墓［J］．考古，2011（8）．

［35］项春松．赤峰市郊区发现的辽墓［J］．北方文物，1991（3）．
［36］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白音罕山辽代韩氏家族墓地［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2）．
［37］许志国，魏春光．法库叶茂台第 22 号辽墓清理简报［J］．北方文物，2000（1）．
［38］同［35］．
［39］同［38］．
［40］同［38］．
［41］同［38］．
［42］同［38］．
［43］段一平．吉林双辽骆驼岭辽墓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1983（6）．
［44］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法库红花岭辽墓［A］．沈阳考古文集（第一集）［C］．北京 : 科学出版社，2007．
［45］武亚芹等．内蒙古科左中旗小努日木辽墓［J］．北方文物，2000（3）．
［46］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6（1）．
［47］刘冰等．赤峰阿旗罕苏木辽墓清理简报［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1）．
［48］同［47］．
［49］刘谦．辽宁锦州张扛村辽墓发掘报告［J］．考古，1984（11）．
［50］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陈国公主墓［R］．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51］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巴林右旗床金沟 5 号辽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2（3）．
［52］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法库县孤家子辽墓发掘报告［A］．沈阳考古文集（第二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53］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等．内蒙古山嘴子“故耶律氏”墓发掘报告［J］．文物资科丛刊，1981（5）．
［54］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兴和尖山辽墓发掘简报［J］．北方文物，1988（4）．
［55］李宇峰等．彰武朝阳沟辽代墓地［A］．辽宁考古文集［C］．辽宁：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
［56］雁羽．锦西西孤山辽萧孝忠墓清理简报［J］．考古，1960（2）．
［57］赉鹤龄等．内蒙古扎鲁特旗哲北辽代墓葬群［J］．北方文物，2002（4）．
［58］义县文物保管所．辽宁义县头台乡亮甲山辽墓清理简报［J］．北方文物，2007（3）．
［59］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阜新梯子庙二、三号辽墓发掘简报［J］．北方文物，2004（1）．
［60］同［49］．
［61］同［34］．
［62］刘未．代契丹墓葬研究［J］．考古学报，2009（4）．
［63］同［1］．
［64］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刘家庄北地唐宋墓葬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15（1）．
［65］朝阳市博物馆等．辽宁朝阳杜帐子辽代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2014（11）．
［66］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北正定吴兴遗址发掘简报［A］．沈阳考古文集（第一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67］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8（1）．
［68］张松柏．怀陵［J］．松州学刊，1992（2）．
［69］葛华廷．辽祖州石室考［J］．北方文物，1996（1）．
［70］同［ 1 ］．

附表　辽代契丹墓葬各类棺尸床统计表

序号	尸床	时代	类型式	平面形状	尺寸（厘米）			资料来源
					长	宽	高	
1	胡柱山 M4 外	兴宗至道宗	甲 Aa	长方形	234	96.5	24	[2]
2	代钦塔拉 M3	辽早期	甲 Ab Ⅰ	长方形	223	141	72	[3]
3	叶茂台 M7	970 年前后	甲 Ab Ⅰ	长方形				[4]
4	二拉林场墓	辽中期早段	甲 Ab Ⅰ	长方形			约 30	[5]
5	解放营子墓	中期至道宗初	甲 Ab Ⅱ	长方形	237	112	72	[6]
6	胡柱山 M4 内	兴宗至道宗	甲 Ab Ⅱ	长方形	240	98.4	33	[2]
7	西窑村墓	约辽中晚期	甲 Ab Ⅱ	长方形	216	113	37	[7]
8	新地墓	辽中期晚段	甲 Ab Ⅱ	长方形	210	105	20	[8]
9	上烧沟 M2	约辽中晚期	甲 Ab Ⅱ	长方形	210	120	60	[9]
10	水泉沟 M2	辽中期	甲 Ab	长方形				[10]
11	吐尔基山墓	辽早期	甲 Ac	长方形	231	131	90	[11]
12	广德公墓上	辽早中期	甲 Ac	长方形				[12]
13	查干坝 M11	辽中期	甲 Ad	长方形	230	150	32	[13]
14	上烧沟 M4	辽中期	甲 Ba	长方形				[14]
15	广德公墓下	辽早中期	甲 Bb	长方形	2.7	119	70	[12]
16	柴达木墓	辽中期晚段	甲 C	梯形	240	90	5	[15]
17	乌兰哈达墓	辽中期晚段	甲 C	梯形	265	145		[16]
18	范仗子 M101	辽中期晚段	甲 C		195		12	[17]
19	北三家 M2	约辽早期	乙 Aa Ⅰ	长方形	192	120	16	[18]
20	喇嘛沟墓	辽晚期	乙 Aa Ⅱ	近梯形				[19]
21	七家 M5	辽晚期	乙 Aa Ⅱ	近梯形				[20]
22	七家 M3	约辽晚期	乙 Aa Ⅲ	梯形				[21]
23	北三家 M3	辽中晚期	乙 Aa Ⅲ	梯形		98	20	[22]
24	程沟墓	辽中晚期	乙 Aa Ⅲ	长方形	260	90	18	[23]
25	北三家 M1	辽中晚期	乙 Aa Ⅲ	梯形	260	120	15	[24]
26	李贝堡 M1	辽晚期	乙 Aa Ⅲ	长方形	230	116	25	[25]
27	李贝堡 M3	辽晚期	乙 Aa Ⅲ	梯形	260	100	30	[26]
28	小刘帐子 M2	辽晚期	乙 Aa Ⅲ	长方形	215	64	10	[27]
29	皮匠沟 M1	辽中期晚段	乙 Aa Ⅲ	梯形			5	[28]
30	豪欠营 M3	辽中期晚段	乙 Aa Ⅲ	梯形	290	106	11	[29]
31	豪欠营 M6	辽中期晚段	乙 Aa Ⅲ	梯形	212	90	25	[30]

续表

序号	尸床	时代	类型式	平面形状	尺寸（厘米）			资料来源
					长	宽	高	
32	富拉尔基墓	辽晚期	乙 Aa Ⅲ	长方形	340	115	10	［31］
33	哲北 M1	辽中期	乙 Ab	凹型	200	90	10	［32］
34	叶茂台 M8	辽中期	乙 Ba	长方形	230	140	17	［33］
35	梯子庙 M4	约辽晚期	乙 Ba	抹角				［34］
36	原碌科墓	辽早中期	乙 Ba	长方形	100	75	18	［35］
37	韩氏 M2	辽中期	乙 Ba	长方形	271	155	26	［36］
38	叶茂台 M22	辽中期	乙 Ba	长方形				［37］
39	曲家沟 M2		乙 Ba	长方形	280	160	26	［38］
40	古都河 M1	辽中晚期	乙 Ba	半圆形	380	157	10	［39］
41	古都河 M2		乙 Ba	长方形				［40］
42	大窝铺墓		乙 Ba	长方形	150	120	40	［41］
43	达拉明安墓	辽中晚期	乙 Ba	长方形	250	124	15	［42］
44	骆驼岭墓	约辽晚期	乙 Bb	抹角	260	145	65	［43］
45	红花岭墓	约辽晚期	乙 Bb	长方形	246	200	80	［44］
46	小努日墓	辽中期	乙 Bb	长方形	220	190	60	［45］
47	耶律羽之（北）	941 年	乙 Bc Ⅰ	长方形	376	145	30	［46］
48	耶律羽之（东）	941 年	乙 Bc Ⅰ	长方形	270	132	30	［46］
49	万金山 M1	约辽晚期	乙 Bc Ⅱ	抹角		100	25	［47］
50	万金山 M2	辽晚期	乙 Bc Ⅲ	抹角	215	110	35	［48］
51	张扛村 M1	约辽早期	乙 Ca	拱门	192	120		［49］
52	陈国公主墓	1018 年	乙 Ca	拱门	260	147	36	［50］
53	床金沟 M5	辽早期晚段	乙 Ca	拱门	4.48	4.24	80	［51］
54	孤家子辽墓	辽中晚期	乙 Ca	拱门				［52］
55	耶律氏墓	1116 年	乙 Ca	长方形	210	140	20	［53］
56	尖山墓	约辽晚期	乙 Cb	梯形	310	129	31.3	［54］
57	朝阳沟 M2	穆宗应历	乙 Cc	长方形	284	144	36	［55］
58	萧孝忠墓	1089 年	丙 Aa	半圆	170	120	7	［56］
59	哲北 M3	辽中期	丙 Ab	长方形	190	100	70	［57］
60	亮甲山 M1	辽中期	丙 Ba	长方形	186	76	8	［58］
61	梯子庙 M2	辽早期	丙 Bb	梯形				［59］
62	张扛村 M2	不晚于圣宗	丙 C	长方形	212	124		［60］

A Tentative Study of Khitan Tomb Coff in Beds during the Liao Dynasty

Lin Dong

Abstract: The coffin bed which is used to place the corpse or coffin of an interned is a kind inter very important funerary artifact. The research concer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the coffin bed will be helpful to the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burial system an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During the Liao Dynasty, Khitan related coffin beds and Han coffin beds have distinct differences in the overall appearance, reflecting differences in burial system and culture between the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social class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type, age and evolution of the Khitan tombs' coffin bed, and preliminarily discusses the burial system and other issues.

Key words: Liao Dynasty; Khitan tomb; coffin bed; type and evolution

辽《南赡部州大契丹国兴中府东北甘草埚建塔葬定光佛舍利记》考释

姜洪军[1] 李宇峰[2]

（1.北票市文物管理所，北票，122100； 2.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110003）

在辽宁省北票市南八家子乡十家子屯西1千米的小山顶上，现有辽代塔基地宫遗址一处，但记载比较简略[1]。笔者近时在查阅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档案时偶然发现，该塔基地宫遗址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陈大为先生就曾调查过，并有详细调查记录和塔基出土的辽兴宗重熙十五年（1046年）《南赡部州大契丹国兴中府东北甘草埚建塔葬定光佛舍利记》碑铭拓片2张，未见著录发表，碑铭记述涉及辽代佛教、职官、历史地理等重要内容，特别是碑铭题名由辽代中期圣、兴两朝著名外交家刘六符领衔，弥足珍贵。现将碑铭全文抄录如下，并略为考释。谨以此纪念为辽宁高句丽考古做出杰出贡献的前辈学者陈大为先生。

一、发现与调查经过

据陈大为先生于1961年11月2日所写的八家子公社（即南八家子乡）十家子辽塔情况调查记录，十家子辽塔塔基位于北票市八家子公社十家子屯西1千米的小山顶上，南、西两面是大凌河，山根下就是锦州至承德铁路，东隔一小山丘与十家子村相对。据十家子村民介绍，山顶上的辽代砖塔于中华民国五年（1916年）塌毁。1956年修稻田涵洞时，把塔基拆毁，砖用于修涵洞，因此发现塔下地宫。塔基方形，边长8米，地宫亦为方形，边长3米。由四周塔基砖底向下1.5米即为生土。塔下有券门，内有石板四块，两长两短，皆一面刻字，皆为姓氏，应为题名录。中间立石碑一块即碑铭下有碑座，其上立有葫芦形石顶子一个。碑下有石匣一，上有雕花纹和佛像，并刻少许文字。其中石顶子高40厘米，底径28厘米。碑铭高114厘米，宽55.2厘米，厚10厘米。碑铭上方呈圭形，内阴刻缠枝纹，下有榫，宽27厘米，高14厘米，原应插在碑座之下。碑铭阳面与阴面均阴刻楷书碑文，其中碑阳竖排二十一行，满行32字，合计518字，碑阴竖排二十三行，满行36字，合计817字，总计1535字。现将碑文录下。

碑阳：

01 南赡部州大契丹国兴中府东北甘草埚建塔葬 /02 定光佛舍利记乡贡进土韩遂迁撰 /03 伏闻 /04 定光佛自成道已来经无量劫 /05 释迦菩萨偹行到二无数劫么公纳婆仙人布□淹□尚曾□□歎计其年布莫数 /06 算其代之无穷伏有妙明志硕于早岁中因临宜郡忽遇高僧傅得 /07 舍利四颗故以无虞引布有验言日比 /08 定光佛舍利也及有全州前刺史张琮□曾于高上傅得舍利数颗亦云 /09 定光佛舍利也夲因净土须届尘霖盖自上人遇相傅受特咨信士共可士葬藏 /10 倬有都维那广宁馆都监韩亮宿种善根求登彼岸心常精进志慕□行，言日恭阐 /11 童子聚砂□酬圣果沙弥救蚁乃出凡笼伏汎建塔宇乎于是遍纠多方原抽 /12 共□共□五浊之苦间敷十善之源言之者尽发皈依见之者咸生恭敬自然信不 /13 虚矣善者从之互相谓日夫甘草埚者以昔傅名枕三川之道路，从今□号为四众之 /14 福田遂册茄蓝构成塔址终致王砌下盘隣岳麓金衡上耸接云端影临而□ /15 蚁生灭鐸振而魑魅破瞻贵使日来月徃恒生瞻仰之心谷变陵迁方验葬臧之 /16 字所集止善迴施群生奉为 /17 太后皇帝皇后万岁诸王公主判府相公千秋文武百案恒居禄位雨顺风调万民 /18 乐业取今月八日午时葬毕故记重熙十五年四月日 /19 推诚奉国功臣昭文馆学士崇禄大夫行左散骑常待判兴中府上柱国开国公 /20 食邑三千户食实封参伯户刘六符韩国夫人李氏故彰武军节度使 /21 韩格妻兰陵郡夫人萧氏长男翰林副使准次男成长孙庆孙次孙没哥 /（彩版三，1）

碑阴：

01 故邺王孙韩悼妻陇西郡李氏长男燕京武军使贻□次男贻亳次男贻晟次男贻綸长孙 /02 刘家奴次孙冯家留右承制韩德祐妻张氏左班殿直韩遂志妻王氏韩遂行母唐氏妻田氏 /03 院王沙门智诠僧志念僧志清沙弥文殊奴沙弥马儿乡贡进土韩遂迁妻弘农郡杨氏 /04 都维那广宁馆都监韩亮副维那冯文翌次维那李文则次维那郭仲方次维那孙建恕次 /05 维那郭承賛次维那卢建训次维那郝匡宁次维那郝匡翌次维那刘文则次维那张匡辇次 /06 维那崔行赟次维那赵文演次维那郭仲女次维那韩遂瑀次维那韩遂良次维那卢维徒次 /07 维那孙元纪次维那刘秉裔次维那马继志次维那马玄正次维那孙知俊次维那冯怀玉次 /08 维那刘秉式次维那刘秉正次维那卢继德次维那卢继武次维那郭承俊次 /09 维那赵承义次维那郭仲仙次维那张德从二次为轴僧道来次维那何德□□□□□□在赟次 /10 维那尚□五次维那李德密次维那曹用和次维那郭仲方父延训□□□□□□□□□□弟仲□ /11 弟仲昇弟安哥弟小安儿妻刘氏悉妇尚氏悉妇赵氏男高十文师□□□□□□□□□□□ /12 □□都维那妻太原郡王氏弟德政妻万氏长男郭哥次男谢哥次男王□次男□□□□□□□□□□ /13 文则妻崔氏长男正安次男正巳次男正德昌南妻南阳郡韩氏次男□□□□□□□□□□□□□□□氏 /14 趙□妻崔氏长男文义次男文通次维那马玄正妻南阳郡韩氏长男□□□□□□□□□□□□□□ /15 小奴次男文儿次男韩奴次维那卢匡训妻王氏长

男从政□□□□□□□□□□□□□ /16 次男五儿次男马留次维鄃刘秉裔妻郭氏男得哥悉妇郭氏□□□□□□□□□□□□弟 /17 匡遂悉妇崔氏长男承义次男承俊次维鄃刘秉绍妻李氏长男用已次男用□□□□□□奴 /18 前银州军事判官登仕郎试太子正字武骑尉韩国亮母刘氏兄姿弟□建州□□□□□ /19 元泰妻韩氏全州前刺史检校太子宾客提点州事张琮砵长男鸿举次男鸿□长孙简次 /20 孙韩五次孙韩六次孙韩七次孙韩八次孙韩九孝子□老人王次维鄃弟□弟□□娷 /21 男德旻娷德和娷川州前商□判官德翌五戚万世则五戚韩□□□□□□次维鄃郭 /22 承赟父廷玉母张氏弟承犛弟承化弟承佐弟宜儿长男□□次男奴佛留娷以哥□维鄃刘 /23 文则□母张氏兄文□弟文一娷推荐推孝娷□嫂翟氏妻王氏悉妇田氏悉妇□氏 /（彩版三，2）。

二、关于南赡部洲*

南赡部洲按照佛经的说法为四大部洲之一，在须弥山南。唐释玄《大唐西域记》："海中可居者，大略有四州焉。"依佛教的地理概念，中国属于四大部洲中的南赡部洲。在辽代中晚期的石刻中，常见"南赡部州大契丹国"或"南赡部州大辽国"的说法。如兴宗重熙四年（1035年）的张哥墓志《南赡部州大契丹国奚王府□榄母呵长管具劣男太保张哥墓志》一竭[2]。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沈阳塔湾无垢净光舍利塔地宫内出土石函顶面上刻有"维南赡部州、大契丹国辽东沈州西北丰稔村东字样"[3]；兴宗重熙十四年（1045年）的《沈州卓望山无垢净光石棺记》记有"南赡部州大契丹国辽东沈州南卓望山造无垢净光塔一所"[4]；兴宗重熙十八年（1049年）辽庆州白塔发现的《庆州白塔螭首造像建塔碑》曰"南闫浮提大契丹国章圣皇太后特建"[5]；章圣皇太后即辽兴宗之生母钦哀后。"南闫浮提"即梵语"南赡部州"之异译。又作闫浮利瞻部提，闫浮提鞍波、判浮州、闫浮州、瞻部州、瞻浮州，略称闫浮。此州为须弥山四大洲之南州，故又称南闫浮提，南赡部州。道宗大安五年（1089年）的萧孝忠墓志曰："南赡部州，大辽国锦州界内胡曾山西廿里北撒里比部落"[6]。按有学者论及，唐宋石刻中常以南赡部洲指称中原王朝（中国），辽代石刻中的自称为南赡部洲，则是自比于华夏之邦[7]。

三、兴中府与刘六符

在辽代，起塔藏舍利很普遍，尤其是在圣、兴、道三朝，影响远及朝鲜和日本，建特定的塔藏舍利似乎东北亚地区的传统。《南赡部州大契丹国兴中府东北甘草埚建塔葬定光佛舍利记》就是一例。在兴中府，此前还有圣宗统和二年（984年），霸州刺史姚

* 一般佛教用语中为南赡部洲，而碑刻上为南赡部州，故本文区别对待。

汉英及许国夫人刘氏全家建特定的塔埋葬定光佛舍利的例子[8]。可知在辽代兴中府起塔藏舍利也很普遍。据《辽史 • 地理志》记载："兴中府、本霸州彰武军节度…重熙十年升兴中府。"[9]地即今辽宁朝阳市，是辽代六大藩府；南大王府、北大王府、乙室王府、黄龙府、兴中府、奚王府之一[10]。

历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有学者依据《辽史》等文献和出土辽代石刻的统计，自兴中府设置后，先后在兴中府担任"知兴中府事。"[11]"知兴中府"并在辽朝中央担任过重要职官的要员就有十几位之多。如杨绩担任过南院枢密使，知枢密院事，被封为赵王；姚景行，进士出身，曾任南院枢密使朔方军节度使，被封为柳城郡王；还有皇族耶律宗教，耶律庶几等人。而《南赡部州大契丹国兴中府东北甘草埚建塔葬定光佛舍利记》的领衔官员刘六符即是其中之一。其署衔为"推诚奉国功臣昭文馆学士崇禄大夫行左散骑常侍判兴中府上柱国开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叁伯户刘六符。"刘六符是辽朝中期圣、兴两朝著名外交家。在《辽史》[12]《契丹国志》里均有传[13]。

刘六符，平州人，是曾任北府宰相的刘慎行六子的幼子。自幼精通经史和百家之言，少有大志，能文，是刘慎行六子中最为成名者，历仕圣，兴两朝，卒于道宗初年，据有学者论及[14]，自刘六符时始，河间刘氏家族，"子孙显贵不绝"史称刘六符之子孙，就有"为节度，观察者十数人"，刘六符的后裔子孙曾经使宋的刘云曾对宋使陈襄说："本家有十二人曾奉使南朝。"[15]刘氏家族此时俨然可称"外交世家"。

作为刘氏家族"外交世家"的首位外交家，刘六符最为成功的外交使命是在兴宗朝重熙年间先后三次出使北宋。重熙四年（1035 年），以政事舍人为贺宋仁宗生辰副使。重熙十一年（1042 年）一年之内曾经两次出使北宋，先以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浩同修国史为副使，与宣徽南院使，归义节度使萧英赴宋索关南地。后又以礼部侍郎、同修国史为副使，与枢密副使保大节度使耶律仁先奉誓书如宋。这次与耶律仁先同行的外交使命十分重要。事情的起因与刘六符第二次使宋索要南地有关。关于辽宋两国有关二州十县地边界的争议最早可上溯到五代后晋石敬瑭时代。当时后晋石敬瑭曾将瀛、英二州所辖十县地（即今河北省河间、任丘地区）割让给辽太宗耶律德光。这十县地后来又由后周世宗柴荣从辽国手中夺回。至北宋取代后周之后，辽国多次要求北宋归还当年石敬瑭割让的二州十县南地，但北宋始终不肯还地。辽兴宗重熙年间，辽国以此为借口，拟大举进犯北宋。因此才有重熙十一年（1042 年），刘六符两次使宋和耶律仁先一起赴宋奉誓书和约之外交使命。这次二人的外交使命完成得很圆满，达到了辽国预期的目的，最后两国签订合约，罢兵，以北宋在从前澶渊之盟基础上，每年向辽国岁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达成和约，握手言和，重归旧好。

当时二人赴宋朝见宋仁宗时，宋仁宗赐扇赠与刘六符，扇上飞白八字："南北两朝，永通和好。"刘六符有志操，能文，乃以"两朝永通和好"为赋题，以宋朝皇帝御书飞白为韵，赋诗作答。自此以后，辽宋两国，岁岁遗使，交聘庆弔，再后有发生大的争执和冲突，直至终辽之世。据《辽史》记载，刘六符因为奉誓书和约有功，被兴宗皇

帝“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宋币至命六符为三司使以之。”[16]但因刘六符与时任参知政事的杜防《辽史有传》[17]，政见不合，不久即受杜防排挤出中央权力中枢，出为长宁军节度使。长宁军即为辽川州军号。此正与刘六符领衔的《南赡部州大契丹国兴中府东北甘草埚建塔葬定光佛舍利记》的署衔、判兴中府、重熙十五年（1046年）的时间相符合。刘六符的墓地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北京市文物考古所于2007年1月至5日在此发掘两座规模较大的辽墓，其中一号墓为刘六符与四位夫人的合葬墓[18]。而在上述题名录刘六符之后的韩国夫人李氏则应是刘六符的原配正室。据《刘六符墓志》记载、刘六符卒于清宁三年七月十九日，享年55岁[19]，此正与《辽史·刘六符传》所记刘六符卒于道宗初年相符。刘六符的事略待墓志全文发表后才能详考。刘六符领衔的署衔为“推诚奉国功臣昭文馆学士崇禄大夫行左散骑常待判兴中府上柱国，开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叁伯户，”据有学者对辽代官员的实职与虚衔的研究[20]，推诚奉国功臣是功臣号，昭文馆学士，崇禄大夫，行左散骑常待、都属文散官的虚衔，是刘六符在中央朝廷时的官阶，《辽史》及《契丹国志》里未见，可补史缺。判兴中府应是刘六符的实职与上述“知兴中府事”“知兴中府”一样的官职，即是主持兴中府最高军政长官，刘六符正是以辽代兴中府封疆大吏的身份领衔。刘六符的勋位为上柱国，是唐代文官十二勋级当中最高的一级，视正二品[21]。刘六符的爵位是开国公，在《宋史·职官制》中，为北宋十二爵中的一级，食邑三千户，略高于唐代的开国郡公的等级（唐开国郡公为正二品，食邑二千户）可见，刘六符的爵位并不低。

另外，2012年10月，在河北省平泉县蒙和乌苏乡八王沟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地[22]，又出土了秦晋国大长公主之子萧绍宗墓志，刻于兴宗重熙七年（1038年），志文即由刘六符撰写，署衔为“翰林学士、中大夫、行政事舍人、柱国、赐紫金鱼袋臣刘六符奉勅撰。”[23]这是目前所见，刘六符流传下来的唯一作品，文辞，书法俱佳。表明刘六符是一位学养很高颇具文采的文章大家。

四、与《题名录》相关诸事

《南赡部州大契丹国兴中府东北甘草埚建塔藏定兴佛舍利记》曰：“奉为太后、皇帝、皇后万岁诸王公主判府相公千秋文武百寮恒居禄位雨顺风调万民乐业”在辽代兴宗道宗时，建塔藏佛舍利愿文多为皇帝祈福很普遍。如重熙十三年（1044年）的《沈州无垢净光舍利塔》[24]，重熙十四年（1045年）的《沈州卓望山无垢净光塔石棺记》[25]，道宗清宁四年（1058年）的《白山院舍利石匣记》[26]，大安八年（1092年）的《懽州西会龙山碑铭》[27]，愿文奉为的对象都是按等级顺序排列，首先是皇太后、皇帝、皇后、接着是皇室诸王、公主，然后是文武百官，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在《南赡部州大契丹国兴中府东北甘草埚建塔定光佛舍利记》上提名的经粗略统计有157人，有朝廷命官刘六符领衔，还有其他官员多人，名僧主持，社会贤达，以及虔诚佛事的善男信女。

多以家庭为单位，夫妻，祖孙等联名方式。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姓氏是韩姓，计有 29 人，从名字上分析，应是辽代玉田韩知古家族的后裔子孙。如碑阴领衔的“故郧王孙韩悼妻陇西郡李氏”中的郧王应指韩知古之子韩匡美。韩匡美之名，仅在《辽史・景宗纪》里一见，保宁三年正月辛酉“南京统军使魏国公韩匡美封郧王。[28]”而据《韩椅墓志》记载[29]韩椅祖父即郧王，南京统军使韩匡美正与《辽史》所记相符。

韩匡美有两个儿子，韩瑜和韩瑀。而《题名录》上的韩悼明确记载是郧王韩匡美之孙，但不知是何人之子，韩悼有四子，贻□、贻毫、贻晟、贻綸、二孙、刘家奴、冯家留。另外是《题名录》上所见韩德祐与韩匡嗣九子名字中间均犯“德”字相同[30]，应是同辈兄弟行，而韩德祐之子韩遂志、韩遂行以及韩遂迁、韩遂瑀、韩遂良等人的名字中间均犯“遂”字，亦与韩匡嗣的孙辈遂忠、遂正、遂宁相同，抑或为同辈兄弟行，这些韩知古的后裔子孙均可补辽代玉田韩知古家族系表[31]。另从《题名录》上有故彰武军节度使韩格、妻兰陵郡夫人人萧氏来看，这是韩氏家族与辽代后族萧氏联姻的又一例证。韩格次孙得没哥起的是契丹名字。还有在《题名录》上有的汉族官吏给自己的孩子好起佛名和佛号，韩悼长孙刘家奴，又见文殊奴，奴佛留等名字，显然是受到唐代文化的影响[32]，反映多元文化的水乳交融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五、有关历史地理

在《南赡部州大契丹国兴中府东北甘草埚建塔葬定光佛舍利记》上的题名人中，还有一些其他州、馆驿前任或已故官吏或眷属，例如：

全州前刺史张琼琳

广宁馆都监韩亮

燕京骁武军使韩贻□

前银州军事判官登仕郎试太子正字武骑尉韩国亮

建州、川州前商□判官德昱

全州应属于上京道所属的头上州之一，是韩匡嗣所建的私人城[33]。地即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四方城村内的城址[34]。最早到四方城城址调查的中国学者是李文信先生[35]，并有民国三十年（1941 年）的调查记录和城址草图发表。广宁馆是辽代接待北宋使者的馆驿之一，地在辽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明城）至辽上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之间。据沈括的《熙宁使掳图抄》记载：“广宁馆，南距鹿驼帐九十里少西。自馆东北行，五里圣澄州。路由西门之外。州有土，崇六、七尺、广度一里，其中半空，有民家一、二百。屋多泥墁间有瓦覆者。旧日丰州。州将率其部落和扣河西内附，邵丰州以处之，自尔改今名。[36]”据有学者论及，广宁馆故址在今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山嘴子村东北 1.5 千米的小南地村附近。燕京即今北京市。银州若按历史地理学术界趋于一致的观点认为辽代银州即今辽宁省铁岭市区[37]，几成定

论。但最近又有学者对上说提出质疑，认为现在的铁岭并非辽代银州，而是明代所建城址。辽代银州初治之地在今铁岭县李千户乡楼子山城，后迁至今铁岭县凡河镇的新兴堡村，金代中期移至今铁岭，明代建铁岭卫时将城位东移，成为清至近现代铁岭城的前身[38]，并从文献和考古发现相结合阐述其理由，令人信服。建州属辽代中京道辖州，故址应在今辽宁省朝阳县大平房镇黄花滩城址川州据在北票市南八家子乡四家板村[39]。辽代城址出土的辽圣宗开泰二年（1013年）《佛顶尊胜陀罗尼幢记》尾结衔有“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傅使持节诸军事白川州刺史”及白川州咸康县治[40]。在学术界已成共识。白川州州治于圣宗开泰末年由咸康县迁至宜民县，地即今北票市黑城子镇黑城子城址[41]。《题名录》刻于兴宗重熙十五年（1048年）显然川州是指黑城子城址而言。

注　释

[1]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M］（下）．十家塔基址条目．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9：386．

[2] 陈述辑校．全辽文·卷七·张哥墓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沈阳塔湾无垢净光舍利塔塔宫清理报告［J］．辽海文物学刊，1986（2）．

[4] 章万岩．辽沈洲卓望山无垢净光塔石棺铭［J］．辽海文物学刊，1987（1）．该文依据辽宁省博物馆1953年的入藏记录，认为沈阳南郊白塔铺村塔山即陈相屯塔山即是辽代卓望山是不对的．辽代卓望山应是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的莫子山，详见姜念思．辽代沈州卓望山调查记［A］．沈阳考古文集第2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5] 德新等．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辽代佛教文物［J］．文物，1994（12）．

[6] 刘谦．辽宁锦西西孤山出土的辽墓墓志［J］．考古通讯，1956（2）．

[7] 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4（2）．

[8]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朝阳新华路辽代石宫发掘简报［J］．文物，2010（11）．

[9] 辽史·卷三十九·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 契丹国·卷二十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1] 任仲书．辽朝兴中府的设置［A］．辽金史论集（第十二辑）［C］．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

[12] 辽史·卷八十六·刘六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3] 契丹国志·卷十八·刘六符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4] 王善军．世家大族与辽代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5] 陈襄．神宗皇帝即位使辽语录［M］．辽海丛书本．

[16] 辽史·卷八十六·刘六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7] 辽史·卷八十六·杜防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8]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六十年［J］．北京文博，2009（3）．

[19] 刘六符墓志全文尚未发表，此据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原所长齐心老师于2014年9月5日晚电话告之笔者，谨致谢枕．

[20] 王曾瑜．辽代官员的实职与虚衔初探［J］．文史，1992（34）．

[21] 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2] 郑绍宗．契丹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铭［ J ］．考古，1962（ 8 ）.
[23] 资料尚未发表，笔者与 2013 年 8 月 16 日参加“中国平泉第二届契丹文化研讨会”时，在平泉县博物馆见到萧绍宗墓志.
[24]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沈阳塔湾无垢净光舍利塔宫清理报告［ J ］． 辽海文物学刊，1986（ 2 ）.
[25] 章万岩．辽沈州卓望山无垢净光塔石棺铭［ J ］．辽海文物学刊，1987（ 1 ）.
[26] 李宇峰．辽白山院舍利石匣记考［ J ］．阜新师范专科学院学报，1992（ 2 ）.
[27] 刘谦．辽懽州塔记［ A ］．阜新辽金史研究（ 2 ）［ C ］，1995.
[28] 辽史 • 卷八 • 圣宗纪上［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29] 毕任庸．辽韩瑜、韩椅墓铭考证［ J ］．人文杂志，1936（ 3 ）.
[30] 盖之庸．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韩匡嗣墓志［ 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81.
[31] 蒋金玲．辽代韩知古家族世系证补［ A ］．辽金史论集（第十一辑）［ C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32] 尤李．论唐幽州佛教对辽代佛教的影响［ J ］．兰州学刊，2011（ 1 ）.
[33]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罕山辽代韩氏家族发掘报告［ J ］．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 2 ）.
[34]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 • 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 M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
[35] 李文信．李文信考古文集（增订本）［ 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
[36] 陈得芝．关于沈括的熙宁使掳图抄［ J ］．历史研究，1978（ 2 ）.
[37] 冯永谦．辽宁地区辽代建置考述［ J ］．辽海文物学刊，1987（ 1 ）.
[38] 周向永，陈术石．辽代银州考［ A ］．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 C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
[39] 同［ 37 ］.
[40]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 M ］.
[41]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 • 辽宁分册（下）• 黑城子城址条［ M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9 .

A Study on the Book of Liao Period: Nanshan Buzhou Daqidanguo Xingzhongfu Dongbei Gancaoguo Jiantazang Dingguangfo Sheliji

Jiang Hongjun Li Yufeng

Abstract: On the hilltop in Nan Bajiazi village, in Beipiao City, there is a Liao tower site. According to Chen Dawei's investigation records dated November 2, 1961, the inscription of the stone tablet dated to Liao Xingzong Chongxi's fifteenth year (1046), Nanzhan Buzhou Daqidanguo Xingzhongfu Dongbei Gancaoguo Jiantazang Dingguangfo Sheliji, was unearthed from the underground palace in the tower base. The content has not been published. The

inscrip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description related to the terms of Buddhism, government, history and geography. This paper will publish the full text of the inscription, and an interpretation the inscription.

Key words: Liao Dynasty; tower base; inscription; interpretation; Liu Liufu

辽博馆藏两方石刻考释
——兼谈辽代佛教“显密圆通”思想之研究

齐　伟

（辽宁省博物馆，沈阳，110167）

2014 年，辽宁省博物馆在筹备新馆《中国古代碑志展》期间，在整理馆藏库房碑志文物时发现尚未发表的辽代石刻两方，负责该展览事宜的张力先生及时将此事告知从事辽代碑刻研究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宇峰先生和笔者，两位先生嘱咐笔者将此石刻尽快成文发表，以供学界参考利用。笔者不揣浅陋，现将两方石刻文字抄录如下，并就相关问题简要阐释，不当之处敬请雅正。

一、石刻概述

石刻一：呈红褐色，砂岩质地，通高 51 厘米，宽 38 厘米。石刻正面四周阴刻勾连纹，顶部雕刻牡丹花纹饰，阴刻楷书，共 5 行。石刻反面四周只用阴线刻一方框，框内阴刻楷书，共 10 行（图一，1、2）。

现将石刻文字抄录如下：

（正面）

随一駕教坊雜劇副使，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侍御史，都尉

王文喜

妻　張氏

長男　士章　次男　鹿哥

小男　獐哥

（反面）

駈丁口如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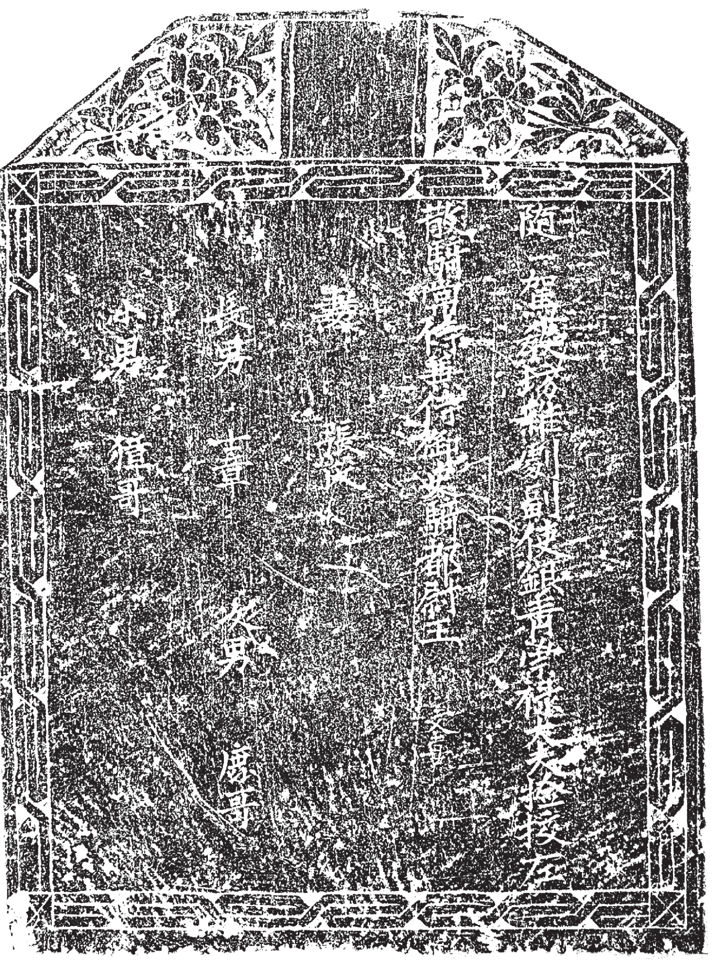
匡旻　妻阿刘　匡正　妻阿刘

刘住　妻阿張　興兒

刘五　妻阿張　匡□　妻阿刘

婦人阿王　望伯　冬兒汰□　黑頭　喜兒

匡進　妻阿江　長壽　望叔



1



2

图一　辽博馆藏石刻一

1. 正面　2. 背面

撒篤　妻屈也　十得

王六　妻重喜　青潢

達哥　孫郎婦

重熙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丁時記

石刻二：呈褐色，砂岩质地，下方有榫卯，榫卯下接一龟趺，石刻通高52.5厘米，宽34.5厘米，榫卯宽11.5厘米，高5.5厘米，龟座通长59厘米，最宽处35厘米，石刻四周阴刻勾连纹（彩版四，1）。石刻正面为汉字铭文，阴刻楷书，共12行，满行23字，共307字。背面阴刻梵文佛教密宗陀罗尼（图二，1、2）。

现将石刻文字抄录如下：

大遼國故北樞密院令史劉郎中娘子傅氏實行記

夫亡妣，姓傅氏，本霫都之人也。年至十七，始姤於彭城郎中之謂與。賦性溫約，其德柔順，常恪奉於二尊，善和協於九族，鄉閭上下，無不稱其淑善之德耶。至於大安七年十月，郎中傾逝，尔後惟以貞順自持，撫育為念，迄於乾統四年孟春之月，染疾於私室，自願預開菩薩戒兩席，誦法華經五百部，開延道場七晝夜，廣齋僧寶，不可勝數，所行陰德不無善報也，至當月二十八日，以手頂頭，冥然而逝。有子四人。長男中道，進士舉第，見帶秘書郎。次男中履。第三道白，削染。第四善教奴。有女三人，長名無□，削染；次名寶哥，誦法華經；第三名超哥。又撫一生之善迹，可垂萬載之休名。以為記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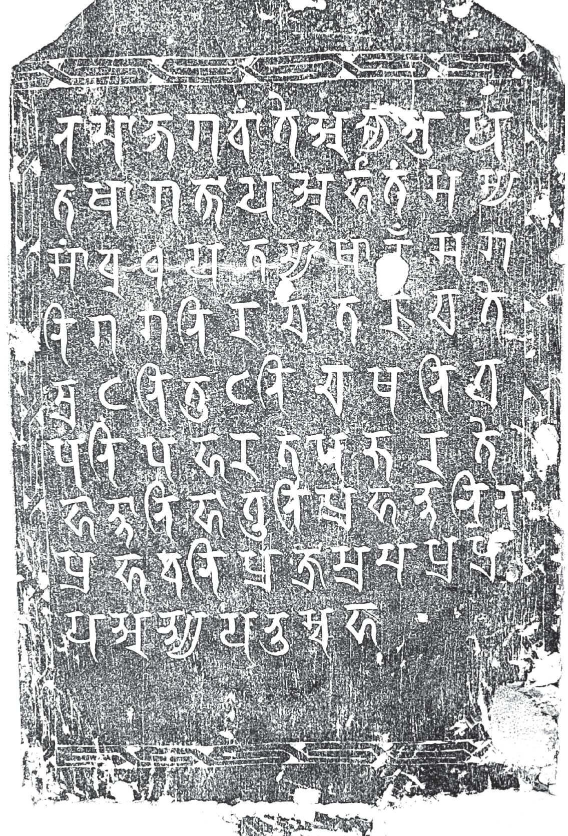
維乾統四年六月一日坤時建長男述並書

二、相关考释

第一方石刻从形制上似碑，从文字内容上判断也不符合墓志的书写规范。辽代墓志大都为长方形或方形，内容一般是书写墓志主人的家世、生平事迹、死亡时间及原因、下葬时间地点、家庭成员、铭等内容。而此石刻从文字内容上看，所列就是王文喜一家及其家族成员名称，这种形式不乏先例。从已经发现的会同十年（947年）《宋晖造像题记》[1]、应历五年（955年）《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罗尼幢记》[2]、保宁元年（969年）《宝峰寺尊胜陀罗尼幢记》[3]、大安七年（1091年）《塔子城建塔题名》[4]诸多石刻内容看，多是与佛事有关，故而推测第一方石刻有可能是王文喜一家举行某种佛教仪式后所立的石碑，将家族成员名字刻于其上，以表达保佑家族繁荣昌盛的美好愿望。但只是推测，有待考证。刻文称，王文喜任职“随一駕教坊雜劇副使”，“教坊”，为辽代戏剧乐舞机构，这一机构的设置仿效唐、五代之制，当然宋的制度也对其有一定的影响[5]。教坊中的人员最初多来自于契丹对外扩张时所掠夺的中原人和渤海人，后周广顺中，胡峤记曰：“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



1



2

图二　辽博馆藏石刻二

1. 正面汉文铭文　2. 背面梵文佛教密宗陀罗尼

术、教坊、角抵、儒、僧尼、道士。中国人并、汾、幽、蓟为多”[6]；同时，辽早期依附政权的支援也在其中，“晋高祖使冯道、刘煦册应天太后、太宗皇帝，其声器、工官与法驾，同归于辽”，“晋天福三年，遣刘煦以令官来归”[7]。后期应该也包括其自己培养的教坊之人，诬蔑伶人赵唯一的朱顶鹤便是教坊之人，这二人想必都是在教坊中培养出的或是自身具备这样的素质。《辽史》未载教坊机构设置情况，墓主王文喜在教坊中任杂剧副使一职。《辽史》记载辽朝皇帝庆祝生日时音乐演奏的顺序：

酒一行，觱篥起，歌。

酒二行，歌，手伎入。

酒三行，琵琶独弹。饼、茶、致语。食入，杂剧进。

酒四行，阙。

酒五行，笙独吹，鼓笛进。

酒六行，筝独弹，筑球。

酒七行，歌曲破，角抵。

曲宴宋国使乐次：

酒一行，觱篥起，歌。

酒二行，歌。

酒三行，歌，手伎入。

酒四行，琵琶独弹。饼，茶，致语。食入，杂剧进。

酒五行，阙。

酒六行，笙独吹，合法曲。

酒七行，筝独弹。

酒八行，歌，击架乐。

酒九行，歌，角抵[8]。

杂剧是辽散乐的一种，在辽朝重大节日当中杂剧也在其表演节目当中，墓主王文喜作为杂剧副使当常伴驾出行。

第二方石刻铭文称傅氏本为“霫都之人”，“年至十七，始媎於彭城郎中之謂與”，“霫都”当指辽中京大定府，即傅氏的娘家在中京，十七岁时嫁给彭城郎中刘氏。傅氏于“乾統四年孟春之月”即1104年1月染疾，并于当月28日去世，生年不详。其夫彭城刘氏，先于傅氏早亡，曾为“大遼國故北樞密院令史”。“枢密院令史”，《辽史》未载，《宋史》有记载：“宋初，循唐、五代之制，置枢密院——凡房十有二——吏三十有八——令史十三人”[9]，金代也设枢密院令史一职：“枢密院令史，女直十二人，汉人六人，三品官子弟四人，吏员转补二人”[10]，金承宋辽之制，在碑志资料中有零星记载，寿昌元年（1095年）《添修缙阳寺功德碑记》的撰写者郑昉任“枢密院令史”[11]，寿昌五年（1099年）《尚暐墓志》记载尚暐“清宁五年及第，当年勾充枢密院令史”[12]，天庆四年（1114年）王师儒墓志载，“执政者惜公徒劳于州县，擢充枢密院令史”[13]，

可见辽代确曾设置“枢密院令史”一职，可补史缺。

第二方石刻称傅氏“迄於乾統四年孟春之月，染疾於私室，自願預開菩薩戒兩蓆，誦法華經五百部，開延道場七晝，後廣齋僧寶，不可勝數”，说明傅氏是位佛教徒，得病之后，希望通过诵经等佛教仪式以达到消除病痛的目的。“诵经”行为也是辽代佛教徒每日必修“科目”，以消灾祈福，得来世福报。“广斋僧宝”指“饭僧”，在辽代，礼佛形式很多，建塔，建经幢，诵经，饭僧等，有的以政府名义，有的则以个人家庭为单位，史料及石刻资料中均有相关记载，此处不再赘述，通常情况下，建塔多是政府出资，诵经和饭僧多是个人行为，而建经幢则二者兼而有之。

三、从傅氏的佛教信仰看辽代“显密圆通”思想之研究

这次发现的两方石刻并没有传递给我们太多有价值的信息，倒是从第二方石刻傅氏的佛教信仰出发，可以谈一下辽代的佛教信仰。傅氏是一位普通的汉妇，“自願預開菩薩戒兩蓆，誦法華經五百部”，不仅如此，其三个子女，第三子道白，长女无□，次女宝哥，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刻石背面又镌刻密宗梵文陀罗尼，反映出辽代晚期佛教信仰显密兼修的特点。《法华经》是天台宗奉行的经典，辽代佛教派别众多，天台宗便是其一。辽代社会尤其是辽中晚期佛教广泛传播，普通民众崇佛现象相当普遍，除了天台宗，还有崇奉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禅宗等，学术界已有相关研究，在此不必赘述。谈到辽代佛教思想，不可避免的涉及显密兼修的问题。笔者试就辽代佛教“显密圆通”的有关问题略论一二。

“显密圆通”思想来源于辽道宗时期的名僧道㲀法师所著《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以下简称《要集》），该书提倡显密兼修，省略繁琐的仪式，推广大准提陀罗尼，提倡多种陀罗尼兼修，并依梵文版本最佳。有关辽代佛教“显密圆通”思想，学界关注相对较少，台湾佛教学者蓝吉富先生有《〈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与准提信仰》[14]《准提法在中日两国的流传》[15]《准提信仰札记》[16]，对《要集》的内容结构和思想特点做了简略的介绍；吕建福先生的《中国密教史》对《要集》和准提信仰的形态表现有所提及和说明[17]。唐希鹏先生对《要集》的内容以及道㲀法师为调和辽晚期佛教信仰中的显密矛盾所阐明的理论方法和解决方法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18]。张明悟先生所著《辽金经幢研究》一书在研析辽金经幢演变规律时，认为辽晚期出现诸多陀罗尼，甚至开始出现梵汉对译的陀罗尼，这都与《要集》有关，并就《要集》的成书年代、道㲀法师所提倡的“显密兼修”方法做了论述[19]。诚如诸家所述，《要集》主要阐述的就是“显密兼修”的思想。

笔者顺带谈一下《要集》的成书年代问题。毋庸置疑，《要集》成书于辽代，吕澄先生已做过论证[20]。张国庆先生认为道㲀是辽代初期的名僧，而对《要集》的成书年代未做进一步的论证[21]，张明悟先生在《辽金经幢研究》中经过考证认为《要集》成

书年代应该界定在大康五年到大安五年（1079～1089年）之间，同时又认为辽代经幢上出现诸多陀罗尼与《要集》提倡多种陀罗尼兼修有关，即是由于《要集》的问世，才出现经幢镌刻诸多陀罗尼的现象。如是说，在《要集》成书之前是不应该出现多种陀罗尼同时镌刻在经幢上的现象的，但是恰恰在《要集》成书之前辽代经幢上就已经开始镌刻诸多陀罗尼了。位于辽宁省阜新市蒙古族自治县的关山辽墓群8号墓出土的石经幢，便是一例。

该经幢为汉白玉质地，整体呈八面棱柱形，四宽四窄，未发现顶盖和底座。柱体长140厘米，直径36厘米。柱体一面镌刻汉文：

> “大丞相、公主为□□诸行宫都部署、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驸马都尉、柳城郡王、故魏国公主，特建斯幢。
>
> 维大康二年岁在丙辰年十月乙亥朔十七日丙时建”

其余七个柱面均镌刻梵文陀罗尼经文，并汉文题名，包括“大宝广博楼阁善住秘密警觉陀罗尼”“大宝善住根本陀罗尼”“一切如来白伞盖大佛顶陀罗尼”“大佛顶陀罗尼”“佛说金刚大摧碎陀罗尼”“六字大明真言”“文殊菩萨一字咒”“智炬如来心破地狱陀罗尼”“阿閦如来减轻重罪障陀罗尼”“大灌顶光陀罗尼”“复说警觉陀罗尼”“一字顶轮王真言”共12种陀罗尼[22]。

此石经幢汉文序明确记载其建幢时间为“大康二年（1076年）”，并且该经幢镌刻陀罗尼达十二种之多。但在这十二种陀罗尼之中，有几种是道㲀法师在《要集》中强调大准提陀罗尼修持必备的经文，如准提后面一定要接续一字顶轮王真言，作为道㲀法师独创的修持方法出现在大康二年所建的经幢上，这又与张明悟先生的推断相抵牾。要对这一现象做出合理解释，还需求证于其他的佐证资料。

在朝阳北塔天宫、地宫中可以找到时间更早的例子。朝阳北塔天宫出土银经卷，镌刻梵本《佛说金刚大摧碎陀罗尼》《佛顶尊胜陀罗尼》《慈氏菩萨真言》《大尊真言》，时间是重熙十一年（1042年）。出土的经塔塔身第四重银质，镌刻梵汉陀罗尼：《大宝广博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请一切如来真言》《法舍利真言》《五如来真言》《梵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波罗蜜心经》（汉文译本）《佛说佛顶尊胜陀罗尼》《佛说菩提场庄严陀罗尼》《一切如来大乘阿皮三摩耶百字密语》《佛说大乘圣无量寿使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六字大明陀罗尼》《圣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均是不空、波利版本[23]。除了《梵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波罗蜜心经》（汉文译本）属显教外，其他均属密宗经典，体现了大乘佛教思想。时间是重熙十二年（1043年）。

朝阳北塔地宫出土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石经幢也镌刻陀罗尼，该经幢第一节镌刻《大佛顶如来放光悉怛多钵怛罗陀罗尼》，第二节镌刻《大随求陀罗尼》，第三节镌刻《梵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悲心陀罗尼》《金刚大摧碎延寿陀罗尼》，第四节镌刻《佛顶尊胜陀罗尼》《菩提场庄严陀罗尼》《大轮陀罗尼》《大乘百字密语》[24]。以

上陀罗尼均为梵文汉字音译或梵汉对译。

北塔天宫和地宫中出现的不空、波利版本的佛教经典显然要早于《要集》，这样似乎可以解释“道殿法师独创的修持方法为什么会出现在大康二年所建的经幢上”了。如果张明悟先生“《要集》成书年代应该界定在大康五年到大安五年（1079～1089 年）之间”的推论可以成立，那么经幢镌刻诸多密宗陀罗尼的现象在《要集》成书之前即大康五年（1079 年）之前则应该有一段滥觞期。在这个滥觞期内，各种陀罗尼版本尚未统一。因为考虑到《要集》成书的背景，辽圣宗、兴宗、道宗，佛教盛行，尤其道宗时，显、密之争上演剧烈，密宗陀罗尼在民间应该得到相应范围的支持，这时急需一个佛教理论力挽狂澜，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要集》就是这“山雨”，在辽道宗的支持下，《要集》应时而生，平息了显密两派持久的纷争。以上推断还需更多相关资料以佐证。

关注《要集》，对深入了解辽代佛教信仰很有益处，继而延伸到辽代佛教密宗领域，笔者认为，这将鼓励我们重拾以往旧史料，更加细致的探寻辽金史研究的新途径和方法。以《要集》为蓝本所衍生出来的诸多研究，如《辽金经幢研究》一书，作者根据《要集》的成书年代，认为在辽代晚期密宗诸陀罗尼开始镌刻在经幢上，那么其本身便可作为断代之用。还有，很多镌刻梵文经文的佛教遗物，是否可以根据经文内容和版本确定其经文的种类和类别。而这些皆有待有识之士去尝试和研究。

张国庆先生在《佛教文化与辽代社会》中，引用大量墓志资料介绍了辽代佛教的显密兼修问题，而张明悟先生的《辽金经幢研究》从石经幢所体现的密宗信仰继而论及辽代的“显密圆通”思想。辽宁省文保中心的陈述石先生则从辽代建筑方面阐述辽代佛教显密圆通的思想。辽宁省兴城白塔峪便兼容了显密特征，郎思孝是显密圆通大师，兴城白塔峪塔兼容了显密特征：五佛、七佛及诸杂陀罗尼造塔功德经，九圣八明王八塔均属密宗，而一百二十贤圣则出自《华严经》，属显教；七佛信仰为早期小乘佛教信仰，而五佛、八明王的密宗和一百二十贤圣的华严经属于大乘佛教信仰，所以白塔峪塔及其地宫出土的佛教圣物既融合了小乘、大乘思想，又体现了显教和密教相结合的特色[25]。而朝阳北塔塔身四面密宗金刚寺佛造像源于《金刚顶经》，八大灵塔源于密教部经典《苏悉地羯棉经》《苏悉地羯罗》和《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等经，体现了密宗特点。北塔地宫石经幢上所刻八大菩萨、过去七佛和执金刚神众、八大灵塔、药师七佛体现的是密宗小乘佛教思想。刻于天宫石函东面石板“三身佛左侧”的《都提点重修塔事》题记有宣演大师。宣演即鲜演，是辽道宗、天祚帝时期的华严宗的代表[26]。综上所述，朝阳北塔是以密宗为主，兼具显教特点，体现的也是显密圆通思想。

以上笔者就近年来有关辽代显密兼修思想研究的状况大致梳理并就相关问题稍作论及，囿于以往对佛教显宗、密宗问题不求甚解，所以论述只是蜻蜓点水，有关辽代佛教显密兼修思想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从辽代佛教建筑角度阐述就是非常好的命题。

注 释

[1]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2] 同［1］．
[3] 同［1］．
[4] 同［1］．
[5] 黎国韬．辽金元教坊制度源流考［J］．学术研究，2008（5）．
[6] 辽史·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 辽史·乐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 同［7］．
[9] 宋史·职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0] 金史·卷五五·百官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 同［1］．
[12] 同［1］．
[13] 同［1］．
[14] 蓝吉富．佛教研究中心论丛［M］．北京：北京社会科学院．2001．
[15] 显密文库：http://read.goodweb.cn/news/news_view.asp?newsid=29498..
[16] 显密文库：http://read.goodweb.cn/news/news_view.asp?newsid=29497.
[17] 吕建福．中国密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8] 唐希鹏．中国化的密教《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思想研究［D］．四川：四川大学，2004．
[19] 张明悟．辽金经幢研究［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20] 吕澄．吕澄佛学论著选集（卷三）［M］．济南：山东齐鲁书社，1991．
[21] 张国庆．佛教文化与辽代社会［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
[22] a．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关山辽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b．同［1］．
[23]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北塔博物馆．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24] 同［23］．
[25] 陈述石，佟强．从兴城白塔峪塔看辽代佛教的密显圆通思想［J］．北方文物，2012（2）．
[26] a．鲜演大师墓碑，同［1］．
b．〔日〕野上俊静．辽代佛教研究［J］．摩由罗，大谷大学圣典语学会，1933（2）．

Philological Study of Two Stone Carvings Collected by the Liaoning Museum

——Research of the Buddhism thought ‘显密圆通’ in Liao Dynasty

Qi Wei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wo stone carvings collected by Liaoning Museum. The article summarizes and organizes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concerning Liao Dynasty Buddhist faith ‘显密圆通’. Currently research on this issue stems from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inscriptions, Buddhist stones and Buddhist architecture. In addition, I also discuss the completion time of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

Key words: inscriptions; Buddhist stone; Buddhist architecture of Liao Dynasty

元代《集宁文宣王庙碑》考释

赵立波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北京，100872）

集宁路古城遗址，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巴音塔拉乡土城子村。遗址内曾树有一通元代《集宁文宣王庙碑》（图一；彩版四，2），该碑建造于元皇庆元年（1312 年），民国十年（1921 年）出土[1]，民国十一年（1922 年）修补重建，现藏于乌兰察布博物馆。李兴盛、张涛《元代集宁路文宣王庙学碑》[2]对碑文及碑身尺寸、纹饰等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碑文另有两个誊录版本，一是 1924 年《绥远省集宁县志》[3]誊录版；二是 1958 年张驭寰[4]誊录版。由于碑身保存状况较差，故三个版本之间存在不少差异。近年来乌兰察布博物馆制作了高质量的拓片，为碑文的识读带来极大的便利。笔者经过仔细辨识拓片和实地考察，在碑阴发现了一些不见于以往誊录版本的汉、蒙文碑文。故本文在前人工作基础上，对碑文进行重新识读，并就相关历史问题进行考证，以更好地认识集宁路古城的面貌。

一、碑文的识读

《绥远省集宁县志》和张驭寰本均无碑阴碑文，李兴盛、张涛本虽有碑阴碑文，但没有录入碑身背面左下角长方形方框内的蒙文。现依据原碑和拓片，同时参考上述誊录版本，对碑文进行全面识读，并试加标点，转录于下。脱字之处，用□表示。标“/”号者，为原碑文一行之末。

碑额及碑阳

1. 碑额

01 集宁 /02 文宣 /03 王庙 /

碑额背面残损严重，从残存部分看，或许无字。

2. 碑阳

01 上天眷命 /02 皇帝圣旨，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而无以明；后孔

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纂承 /03 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宜加号 /04 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05 於戏！[5] 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明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 /06 我皇元。主者施行。大德十一年七月十九日。至大三年正月日，/07 赵王钧旨，出帑币，遣侍人，届分邑集宁，建立 /08 大成至圣文宣王庙学碑。节该钦依已降 /09 圣旨事意施行。大德丁未秋，近臣传 /10 旨议加 /11 至圣文宣王封号。臣复承乏翰林，获预其议。窃谓自古称夫子者多矣，而莫如孟子。孟子曰："自古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又曰："伯夷，圣 /12 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盖言孔子集三 /13 圣人之事，而为一大圣人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宜加号 /14 大成至圣文宣王。/15 奏可。玺书锡命。臣复职当具草，既以颁示天下矣。迩者，江南浙西道佥肃政廉访司事吴举建言："褒封 /16 先圣实当今盛典，若不腾芳琬琰，曷以昭示罔极？"于是省台檄下诸路，勒石庙学。噫！自木铎声沉千八百年，有国家者追崇圣号非一。/17 至唐玄宗始进爵为"文宣王"。宋真宗复加"至圣"二字，是皆议出一时，虽极徽美之称，孰若 /18 我朝取孟子之言为准，以圣誉圣之深切着明也！凡在郡邑，长吏祇若朝廷尊师重道之意，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忠信与 /19 兴化善俗为务，顾不韪欤。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 /20 制诰监修国史遥授平章政事致仕臣阎复顿首谨述。王傅文学张益禄进义副尉前静安路总管府判官裴克钦篆额 /21 敦武校尉前同知静安路总管府事王元举书。学正完颜克敬□治中庐庭训、李德辉、董役，/22 宣授集宁等处前民匠总管府达鲁花赤陶断事官完颜允，集宁总管府达鲁花赤奥剌佴，总管完颜克孝，/23 同知集宁县达鲁花赤王郎黑台，县尹□□□权教授王叔凯，学录贾瑞，教谕王光祖等立石。/24 皇庆元年正月日。云中巡检司□。石匠宋德、林中男、宋珏镌。/

碑阳另有一个独立区域，位于 07 行下方，与该行并 7 不垂直，竖书：

01 中华民国十一年建补经理人：李成、何治、一劬、傅万。/

碑阴：

01 集宁总管府同知□□治中皇甫□制□拙□虽□□推官完颜□佳 /02 农事总管□□□□□散户总管完颜克 /03 集宁县尉刘润 /04 □□□□官□□□□□□□□□□□□克□□□□□□□□□□□ /05 □□事苗□ /06 监造者□□ /07 □尉□□□□□□□□□□□□□□县尉皇甫□ /08 □□□□□□□□□□□□□□□□□鹰□总管□达鲁花赤不花朱 /09 □□□□□□□□□□□□举裴□□□□□□□□□ /10 □□完颜允□□□□举王

□□□/11 大使赵恒德，大使□□/

除此之外，另有 4 个独立区域，可看出有破坏元代碑文的痕迹，文字大小及风格亦不相同，年代晚于元代。除蒙文外，其余 3 个区域应是民国人所刻。

（1）碑身上部，自右至左横书：

01 乡党耆艾□□□绅赏□□□□赠输所集而赞成者/

此行下，自右至左竖书：

01 李伯俞字继贤/02 张□字□□/03 □□字□礼/04 时□□□/05 □让字□□/06 □兄□字□□/07 卢□字文卿□□□□□□经历景□□□□通□□□字□□/08 乔□字仲□□□□□□字文□/09 □□□□□□□□□□字□□/10 李□□字□□□□□□字□□/11 张□□字仲□□□□□□□段□/12 董□□字□卿□□□□□□□字□德/13 □□□字□秀/14 张□□字仲□/15 医院□□□胜医工□秀字□□/16 褚□□□仲文/17 □国□□□/

（2）碑身中上部，自右至左横书：

01 李经生日以讲求□□者/

（3）碑身下部，自右至左横书：

01 平民□□□□□以供香火洒扫者/

此行下，自右至左竖书：

01 王国□/02 □仲□/03 □□□/04 □□□/05 □□□/06 □□□/07 □□□/08 党□□/09 □□□/10 姚□□/11 李□□/12 姚仲□/13 □伯□/

（4）碑阴左下部，阴刻一长方形框，框内刻传统蒙古文若干行，可识读 4 行[6]（图二）。

汉语意为："愿家国永固……水草丰美的地方游牧……丝绸……路……游牧的……畜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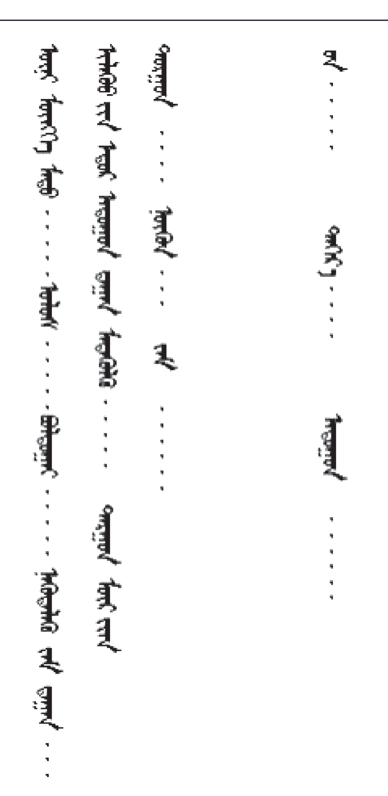
二、对碑文的初步认识

（一）碑　　阳

碑阳的碑文包括两部分：元代碑文和民国碑文。

元代碑文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为圣旨，自"上天眷命"始，至"大德十一年七月十九日"止。这道圣旨颁布于元武宗大德十一年（1307 年）七月十九日。元武宗遵循古制，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圣旨的起草者是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监修国史、遥授平章政事阎复[7]。



图二　元代《集宁文宣王庙》碑碑阴蒙文

第二部分，记述赵王遵照圣旨，建立“大成至圣文宣王庙学碑”的过程。“至大三年正月日，赵王钧旨，出帑币，遣侍人，届分邑集宁，建立大成至圣文宣王庙学碑。节该钦依已降圣旨事意施行。”意思是，汪古部首领赵王下令，从府库中出经费，派遣使者，至领地集宁建立大成至圣文宣王庙学碑。经考证，这位赵王是汪古部第二代赵王术安[8]。

第三部分，是翰林学士阎复讲述元武宗追封孔子的原因和过程，自“大德丁未秋”始，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监修国史遥授平章政事致仕臣阎复顿首谨述”止。

第四部分，是立碑时间和立碑人。自“王傅文学张益禄”始，至“石匠宋德、林中男、宋珏镌”止。

民国碑文仅一行，记载民国重建此碑的时间和人物：“中华民国十一年建补经理人：李成、何治、一劻、傅万。”

（二）碑　　阴

碑阴有元代碑文、民国碑文和年代不详的蒙文碑文。

元代碑文主要记载了一些地方机构和官员，这些官员参与了集宁文庙碑的建立。自“集宁总管府同知”始，至“大使赵恒德，大使□□”止，漫漶严重。该部分涉及的官

吏级别较低，有集宁总管府同知、治中等人。

民国碑文分为三个独立区域。第一部分，“乡党耆艾□□□绅赏□□□□赠输所集而赞成者”及此行下之名单“李伯俞字继贤”等，应是共同出资重建集宁文庙碑的本地士绅。第二部分，“李经生日以讲求□□者”，单独一行，意义不明。第三部分，“平民□□□□□以供香火洒扫者”及此行下之名单“王国□”等，应是参与重建集宁文庙碑的平民。由碑阴的这些记载可以得知，民国时期，众多士绅和乡民共同参与了集宁文庙碑的重建。重建完成之后，还进行过一些祭祀活动。今天依旧矗立在遗址的小庙，或为当时所建。

蒙文碑文，字体为传统蒙古文。这段碑文漫漶不清，未能识读出刻铭的时间和人物信息。它的位置位于碑阴左下方，破坏了皇庆元年的碑文，保存状况较差。

三、碑文相关问题的考辨

（一）元武宗加封孔子的过程

元代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碑在全国各地多有发现，但是碑文涉及的一些历史事件和问题被研究者忽视，特别是元武宗加封孔子的具体过程，这里有必要进行重新梳理和考证。

碑文第一部分是加封孔子圣号诏书。对于元武宗加封孔子的原因和过程，赵文坦《元代尊孔“大成至圣文宣王”的由来》[9]一文有详细考证，该文结合史料和碑刻文献，论证的结果比较可靠，但是没有指出加封诏书颁行全国以及下令勒石全国庙学的时间。

元代各地建立加封孔子碑的时间不尽相同[10]，就集宁路出土的这块文庙碑而言，元武宗颁布圣旨的时间是大德十一年（1307 年），而赵王下令建立文庙碑的时间是至大三年（1310 年），最后立碑的时间是皇庆元年（1312 年），为何时隔 5 年后才树立此碑?

事实上，大德十一年元武宗命加封孔子，命阎复起草诏书[11]，诏书颁示天下后，并没有在全国各地建立石碑。

集宁文庙碑中阎复云：“大德丁未秋，近臣传旨议加至圣文宣王封号。……奏可。玺书锡命。臣复职当具草，既以颁示天下矣。迩者，江南浙西道佥肃政廉访司事吴举建言：‘褒封先圣实当今盛典，若不腾芳琬琰，曷以昭示罔极？’于是省台檄下诸路，勒石庙学。”

“迩者”，近来之意；“腾芳琬琰”，“琬琰”即碑石之美称。集宁文庙碑没有记载阎复此文的写作时间，而查阅阎复《静轩集》，可知此文名为《加号大成诏书碑阴记》，作于至大三年（1310 年）[12]。据此进一步考证可知：大德十一年（1307 年）秋，元武宗下旨加封孔子，加封诏书颁示天下。约在至大二年（1309 年）（赵王下令树碑的时间是

至大三年正月），江南浙西道佥肃政廉访司事吴举建言，将大成至圣文宣王加封盛典勒石庙学，于是中书省和御史台下令在全国庙学建立“加号大成诏书碑”。吴举建言的确切时间，可考证 1983 年云南大理出土的至大二年《加封圣诏碑》：

皇帝圣旨里，云南诸路行尚书省准尚书省咨，该至大二年五月十九日太保三宝奴丞相奏，在先孔夫子汉儿帝王虽是封赠了，不曾起立碑石来，如今各处行与文字封赠了，于赡学地土子粒钱内教立碑石呵，今后学本事的人肯用心也者奏呵，奉圣旨是有那般者，钦此。照得先据御史台呈，亦为此事，已经遍行去讫，都省咨请照验，钦依施行，准此，省府合下，仰照验钦依施行须议札付者。至大二年五月十九日。[13]

至大二年（1309 年），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咨奏尚书省勒石庙学事[14]。五月十九日，尚书省三宝奴丞相奏请元武宗降谕，理由是“在先孔夫子汉儿帝王虽是封赠了，不曾起立碑石来”。这是元武宗在全国建立加封孔子诏书碑的另外一个直接原因。元武宗恰好在之前收到御史台的奏请，也是为立碑事，故而同意了御史台和中书省的奏请。联系上一条材料中“江南浙西道佥肃政廉访司事吴举建言”，御史台上奏元武宗的呈请，最早是吴举的提议。阎复文中并未提及云南行中书省的咨奏，也没有说明省、台“檄下诸路勒石庙学”是元武宗的旨意。将上述两条史料结合在一起，则元武宗下旨勒石庙学的两条直接原因就变得十分明朗了。

因此，元武宗加封孔子的时间、过程，以及在全国勒石庙学的原因和时间如下所述。

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 年）五月二十八日，集贤院大学士赵也先和王颙奏请加封孔子，元武宗令先拟定封号。六月初八日，集贤院拟定封号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拟奏请遣使大都、上都和曲阜致祭孔子；七月，集贤院再与翰林院共同商议，确定封号。七月十九日，中书省将封号奏告元武宗，二十一日，元武宗“加封至圣文宣王为大成至圣文宣王”[15]。九月，阎复拟定诏书。

武宗至大二年（1309 年），江南浙西道佥肃政廉访司事吴举建言勒石庙学，御史台将此事奏请元武宗；稍晚时候，云南诸路行中书省亦向尚书省奏请此事，五月十九日，尚书省奏请元武宗。元武宗因御史台和尚书省皆奏请将加封盛典勒石，下旨在全国庙学建立加封孔子诏书碑。

武宗至大三年（1310 年）正月，赵王下令在集宁路建立加封孔子诏书碑。六月，阎复作《加号大成诏书碑阴记》。

仁宗皇庆元年（1312 年）正月，集宁路建立加封孔子诏书碑。

（二）集宁县升为路的时间

集宁路文庙碑还涉及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即集宁县升为集宁路的时间问题。元代的

路及总管府名称虽沿袭宋、金，但建制规模并不相同。两宋路为监司之路，金代路才成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且宋、金之路辖区较大。金代路总管府都总管统领本路兵马及民政，元代路总管府转变为地方管民官[16]。元制“十万户之上者为上路，十万户之下者为下路”[17]。集宁路属下路。

前人对于集宁路的设立时间有两种说法，分别是：

（1）不晚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时期全图（一）》以至元十七年（1280年）为准，其上标示了集宁路和隆兴路[18]。

（2）皇庆元年（1312年）。《新元史》：“皇庆元年，改隆兴路为兴和路。户八千九百七十三，口三万九千四百九十五。旧领柔远、集宁、丰利、威宁四县。集宁县升为路，丰利县并入高原。……集宁路。下。金集宁县，属抚州。元初升为路。领县一：集宁。下。本市场。金明昌三年置县。元因之。”[19]

这两种说法均未见有何史料依据。

金时集宁县属抚州，金亡后，抚州的名称及行政区划历经数次改变：

> （中统三年，1263年）十一月……戊申升抚州为隆兴府，以昔剌斡脱为总管，割宣德之怀安、天成及威宁、高原隶焉。[20]
>
> （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戊午，立提点宫城所。析上都隆兴府自为一路，行总管府事；立开元等路转运司。城大都。[21]
>
> （至大元年，1308年）十二月庚申……中都立开宁县，降隆兴为源州，升蔚州为蔚昌府。[22]
>
> （皇庆元年）冬十月甲子，有事于太庙。改隆兴路为兴和路，赐银印。[23]
>
> 兴和路，上。唐属新州。金置柔远镇，后升为县，又升抚州，属西京。元中统三年，以郡为内辅，升隆兴路总管府，建行宫。户八千九百七十三，口三万九千四百九十五。领县四、州一。县四：高原，下。倚郭。中统二年隶宣德府，三年来属。怀安，下。元初隶宣德府，中统三年来属。天成，下。元初隶宣德府，中统三年来属。威宁。下。元初隶宣德府，中统三年来属。州一：宝昌州，下。金置昌州。元初隶宣德府，中统三年隶本路，置盐使司。延祐六年，改宝昌州。[24]

金抚州在元中统三年（1263年）升为隆兴府[25]，至元四年（1267年）升为隆兴路，至大元年（1308年）降为源州，时隔不久又升为隆兴路，皇庆元年（1312年）十月改为兴和路。中统三年（1263年）升为隆兴府时，辖“怀安、天成及威宁、高原”，旧辖集宁县划分出去之后，可能继续作为集宁县，也可能升为路。所以，集宁县升路的时间上限是中统三年（1263年）。

至正七年（1347年）《王傅德风堂碑记》（以下简称《德风堂碑》）：

> 自至大元年，始立王傅府事，奉王□颁银印，给虎符……俱备。王傅府后乃为赵国之纲领，以下德宁、砂井、净州、集宁等路及断事官，所辖总计壹佰……

拾……属焉。[26]

至大元年（1308 年），设立王傅府，遂以王傅府为“赵国之纲领”，集宁等路属焉，说明至迟在至大元年（1308 年），集宁即已升路。

综上所述，集宁县升路的时间当在中统三年（1263 年）至至大元年（1308 年）之间。

（三）集宁文庙碑的形制、碑文格式等问题

集宁路文庙碑的形制、碑文格式、内容和文字等亦值得引起注意。

首先，集宁路文庙碑的碑首是螭首，这和大多数的加封孔子诏书碑是一致的[27]。

其次，集宁路文庙碑和其他加封孔子诏书碑的格式相互之间存在一些不同。“以‘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一句为例，北京国子监本与河北省蔚县文庙本（索书号为‘各地 1339’）、河北省易县本在‘大’字处另起一行，并比正文提升一格以示尊重。而在陕西省西安市本（索书号为‘各地 5283’）和甘肃省皋兰县本中都是随文书写，并不换行。而甘肃省皋兰县本中‘祀以太牢。於戏！……’一句中‘於戏’却换行书写，这一做法在上述其他各本均不见。”[28]集宁路文庙碑的“大成至圣文宣王”也另起一行，但并没有比正文提升一格。另外一句“我皇元主者施行”仅提升一格，这和北京国子监本、净州路本[29]等提升两格的做法是不同的。

再者，内容方面，集宁路文庙碑所刻圣旨比其他版本多一个“宜”字。集宁路文庙碑：“举追封之盛典，宜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北京国子监本、河北省蔚县文庙本、陕西省西安市本等均为“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多字可能为误刻。

最后，文字方面，集宁路文庙碑中出现了不少简化汉字，可资语言文字学者研究元代的简化汉字使用情况。《北京国子监孔庙元代〈加号诏书〉碑考》：“在上述各版本的诏书拓片‘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一句中的‘法’字，均为与目前简化汉字完全一致的简体汉字，可见‘法’字的简化形式至晚在元代就已经普遍使用了。”[30]集宁路文庙碑与净州路加封孔子诏书碑中的“法”字均是简体形式，可见这种写法在汪古部领地也已经广泛使用了。“在‘盖闻先孔子而圣者’一句中，山东曲阜市本与河北省蔚县文庙本都使用了‘盖’字，不同于其他版本的繁体‘盖’字。”[31]净州路加封孔子诏书碑中的“盖”字是繁体字，集宁路文庙碑的“盖”字却是简体字，说明“盖”字的简体形式在汪古部领地并不十分流行。将这些碑刻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了解当时相关简化汉字的使用状况，进一步的研究就有待方家开展了。

“元代的庙学（即孔庙内附设学校、传播儒学）无论其规模或数量上都远远超过了唐宋，其分布之广也是前所未有的。”[32]元武宗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以及集宁路文庙碑的建立，客观上推动了儒家文化在汪古部领地的传播。针对这一封号，有研究者认为元武宗时期封赠泛滥，元代统治者对孔子的尊崇程度远不及佛、道[33]，也有研究者比较历代加封孔子封号，对“大成至圣文宣王”封号的历史地位提出了极高的评

价[34]。若横向比较，元代对儒家的尊崇程度确实不及佛教，如元英宗即位后，“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庙有加”[35]；对道教的加封也并不逊色[36]。若纵向比较，则元武宗所加之封号确实空前绝后。总之，元武宗加封孔子的行为和庙学的建立客观上提升了元代社会对孔子及儒家的尊崇程度，扩大了儒家思想在全国的影响，特别是对汪古部领地集宁路所处的农牧交错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7]。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展开了。

后记：本课题的开展受到了乌兰察布市文广新局的资助，乌兰察布博物馆同仁亦提供了大量协助，在此谨致谢忱。

注 释

[1] 许辑五．绥远集宁县志略（续完）[M]．西北刍议第二卷．1936（4）．

[2] 李兴盛，张涛．元代集宁路文宣王庙学碑[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7（2）．

[3] 杨葆初．绥远省集宁县志[M]．中国地方志丛书 • 塞北地方 • 第一三号影印民国十三年抄本[Z]．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4] 张驭寰．张驭寰文集 • 第十一卷 • 祠堂，庙宇，书院，会馆，内蒙古考察[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5] 按，“於戏”不能写作“于戏”．史记 • 三王世家：“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闳为齐王。曰：‘於戏，小子闳，受兹青社！’”司马贞索隐：“於戏，音呜呼。戏，或音羲。”“於戏”同“呜呼”。山东曲阜孔庙的《加封孔子圣旨及致祭先师颜孟祝文碑》将“於戏”写作“呜呼”，研究者认为因“於戏”同“呜呼”，故刻工可能误刻。参看杨海文．重订曲阜孔庙元代加封孔子碑两通[J]．西夏研究．2013（3）．

[6] 蒙文的识读与翻译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2011级硕士特尔巴依尔和2012级硕士乌云花共同完成，在此谨致谢忱。

[7] 阎复起草的诏书名为《加封孔子制》，收入《静轩集》。见阎复．静轩集 • 卷二[M]．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2册）[Z]．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阎复著作久佚，清末缪荃孙自《元文类》《元名臣事略》《元诗选》及石刻等辑得复文四十三篇，厘为六卷，刻入《藕香零拾》丛书，《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据此影印。文集收录的《加封孔子制》辑自《元文类》卷十一，和集宁文庙碑的版本略有出入，集宁文庙碑中为“宜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文集中无“宜”字。题下有“大德十一年九月”之题记，各地“加号大成诏书碑”落款均为“大德十一年九月”，此处“九月”当为“七月”之误。

[8] 盖山林．阴山汪古[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

[9] 赵文坦．元代尊孔“大成至圣文宣王”的由来[J]．历史教学．2009（22）．赵文坦考证，加封孔子的过程分为四步：一，大德十一年（1307年）五月二十八日，也即元武宗登基后的第七天，集贤院大学士赵也先和王颙奏请加封孔子尊号，元武宗令其先拟定尊号；二、六月初八日，集贤院商定孔子的尊号作“大成至圣文宣王”，并拟奏请遣使大都、上都和曲阜致祭孔子；三、七月，集贤院再与翰林院共同商议，确定封号；四、七月十九日，由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的官员

将封号奏告元武宗，二十一日，元武宗玺书“加封至圣文宣王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赵认为元武宗尊孔的行为与当时的皇位争夺有关。

[10] 葛仁考．元代“鉅鹿县庙学碑”考释［J］．兰台世界．2014（4）.

[11] 元文类 • 卷十一．《制》录阎复《加封孔子制（大德十一年九月）》：“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于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明言之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见苏天爵．元文类［Z］．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67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134。诏书颁布后，落款仍为中书省奏请下旨之日七月十九日。

[12] 阎复．静轩集 • 卷四．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 2 册）［Z］．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13] 杨益清．大理发现元初同刻一石的加封孔子圣旨及立碑文告［J］．文物，1987（11）.

[14] 据杨益清考证，“尚书省之议立在七月，到八月才正式设置，而行尚书省则到了九月才设。因此，大德十一年的“加封圣诏”和至大二年的文告，是在至大二年九月以后才颁发各地立石的。这时尚书省、行尚书省都已正式设置，碑文因系后来才颁刻，所以就统称尚书省、行尚书省，其实原先咨奏的应是云南诸路行中书省。”意思是，文告中虽曰“云南诸路行尚书省准尚书省咨”，实际上“云南诸路行尚书省”直到九月才设立，五月奏请的机构还是“云南诸路行中书省”。

[15] 宋濂等．元史 • 武宗纪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6]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下）［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7] 宋濂等．元史 • 百官志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8]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 第七册 • 元时期全图（一）［M］．北京：地图出版社，1996.

[19] 柯劭忞．新元史 • 地理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9.

[20] 宋濂等．元史 • 世祖纪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1] 宋濂等．元史 • 世祖纪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2] 同［15］.

[23] 宋濂等．元史 • 仁宗纪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4] 宋濂等．元史 • 地理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5] 清人钱大昕曾对兴和路的行政变迁作过考证：“兴和路，中统三年，升隆兴路总管府。考本纪，至元四年，析上都隆兴府自为一路，行总管府事。至大元年，降隆兴为源州；四年，复隆兴路总管府；皇庆元年，改隆兴路为兴和路，志皆阙而不书。但据志，中统三年已升州为路，而纪于至元四年复有析隆兴自为一路之文，似不相照，岂此中统乃至元之误邪？抑中间更有改隶之事，而纪失之乎？”参看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下）• 卷八十八 • 地理志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229．钱大昕认为中统三年兴和路升为隆兴路总管府，此说恐有误。《元史 • 地理志》载“（中统三年）升抚州为隆兴府”，府是路的下一级行政区划，下辖州、县。隆兴府下辖怀安、天成、威宁及高原四县。

[26] 此碑是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黄文弼于 1927 年 6 月所发现，残碑当时在敖伦苏木古城中，碑文是林子良所作，作于“至正七年岁次丁亥十一月”。北平《新晨报》于 1928 年 9 月 2 日副刊发表了碑文，1935 年黄奋生著《百灵庙巡礼》，也发表了他抄录的碑文，二者可互相补充。这段文字即出自《新晨报》1928 年 9 月 2 日副刊，转引自周清澍．元蒙史札［M］．呼和浩特：内

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
[27] 邢鹏. 北京国子监孔庙元代 < 加号诏书 > 碑考 [N]. 中国文物报，2006-11-15.
[28] 同 [27].
[29]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 [C].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
[30] 同 [27].
[31] 同 [27].
[32] 胡务. 元代庙学的发展 [A]. "元史暨宋元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参看张天周. "元史暨宋元文化学术研讨会"述要 [C]. 中州学刊. 1997 (5).
[33] a. 赵文坦. 元朝封孔子尊号"大成至圣文宣王"的背后 [J]. 文史知识，2008 (2).
b. 胡务亦认为"封号对于崇孔来说仅是流于形式，孔圣人似乎并未立刻显灵，至大年间平均每年的庙学始建数和重建数与世祖以后其他各朝相比都算很低。"见胡务. 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链 [M]. 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
[34] 杨海文. 重订曲阜孔庙元代加封孔子碑两通 [J]. 西夏研究，2013 (3). 杨认为"封号之高，空前绝后"，"赞誉之极，无与伦比"。
[35] 宋濂等. 元史 • 英宗纪一 [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36] 赵文坦. 元朝封孔子尊号"大成至圣文宣王"的背后 [J]，文史知识. 2008 (2). "元成宗时加号正一教主张留孙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开府仪同三司、同知集贤院道教事，且追封其三代皆魏国公，官阶品俱第一。武宗时更升大真人，知集贤院，位大学士上。仁宗时又加号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刻玉为玄教大宗师印以赐。英宗时其徒吴全节嗣位，英宗制授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崇文弘道玄德真人、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玉印一、银印二并授之。"
[37] a. 王风雷探讨了元代漠南地区的教育，认为"当时集宁路儒学曾经有过一名教授、一名学正、一名学录、一名教谕，这说明集宁路儒学的规模达到了相当程度。女真族学正的出现，是集宁路儒学的一大特色。"，"当时漠南地区的教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为当地社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见王风雷. 元代漠南地区教育考 [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4).
b. 胡务则认为元代庙学在元代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如"岁贡儒人，培养统治人材""训导僚吏""变化风俗，减少狱讼"等，见胡务. 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链 [M]. 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

The Annotations of Jining Confucius Temple Stele of Yuan Dynasty

Zhao Libo

Abstract: The Jining Wen Xuan Wang (Confucius) temple stele, established in 1312 which was also the first year of Huang Qing in Yuan Dynasty, was discovered in the ancient city ruins of Jining Lu. This paper aims to reconfirm the tablet inscriptions and research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issues.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front side of tablet contained two parts, which were the inscription of Yuan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inscription of Yuan Dynasty recorded a couple of historical moments including the imperial edict as theinvestiture of Confucius by Emperor Wu of Yuan dynasty and King of Zhao established the tablet according to the imperial edict and also includes some relevant data about the established time and establisher. The opposite of the stone tablet included the inscriptions of Yuan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dentified inscriptions written in Mongolian. The inscriptions of Yuan Dynasty mainly recorded some local government branches and officers. The epigraph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corded the information about rebuilding this tablet.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time and character can't be recognized from the Mongolian epigraphy. The stele is involved the process of investiture of Confucius by Emperor Wu of Yuan dynasty, the time of Jining changing from county to Lu, the shape of tablet, and the form of the epigraphy.

Key words: Yuan Dynasty; Jininglu; Confucius temple stele

安图县三道村古城堡遗址石器研究

刘亚林　陈全家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长春，130012）

2006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师生会同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志在延边地区进行石器考古调查时发现了此遗址。遗址地处吉林东部长白山地，附近有五道白河流经。在地表采集黑曜岩石器28件，大部分为石片，工具以刮削器为主，并有2件完整的压制石镞。推测遗址的年代为新石器时代。

一、地理位置与地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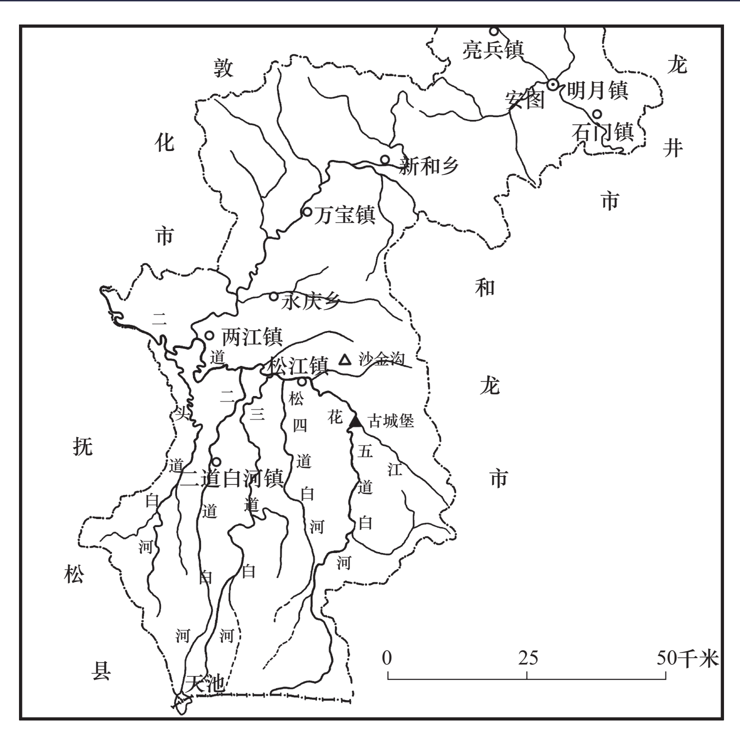
遗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松江镇三道村古城堡，北距安图县城约70千米，南距长白山天池约60千米，地理坐标为东经128° 27′ 35″，北纬42° 32′ 9″，附近有二道江（西流松花江的北源）的上游河流——五道白河流经，其发源于长白山主峰白头山的东北麓。安图县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西南部，东南以南岗山脉为界与和龙市相邻；东北以哈尔巴岭为界，与龙井市相接；西北以牡丹岭、新开岭、马趟岭、阳保太大顶子、尖山为界，与敦化市毗邻；西部以错草顶子、马鞍山、东土顶子、二道松花江为界，与抚松县接壤；南部以长白山天池、双目峰为界，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两江道三池渊郡陆路相通（图一）[1]。遗址地处吉林东部的长白山北麓，分布有大量中生代和新生代火山，绝大多数火山由火山喷发碎屑堆积物组成[2]。境内丘陵和河谷密布，地表出露有较多火山喷出岩，在玄武岩溶台地中夹杂有黑曜岩。

二、石器的分类与描述

本次调查共采集石器28件，包括石核1件、石片14件、断块2件和工具11件，原料均为黑曜岩。大部分石器表面棱脊清晰，风化较轻。

（一）石 器 大 小

根据石器的最大直径，可将石器分为微型（＜20毫米）、小型（20毫米～50毫米）、



图一　遗址地理位置图

中型（50 毫米～100 毫米）、大型（100 毫米～200 毫米）、巨型（≥ 200 毫米）五种类型[3]。石器的分类统计表明，石器以小型为主（n=18），其次为微型（n=9），存在一定数量的中型石器（n=1），不见大型和巨型标本（表一）。

表一　石器大小分类统计

石器大小→	＜ 20 毫米	20 毫米～ 50 毫米	50 毫米～ 100 毫米
石器类型↓	n	n	n
石核	/	1	/
石片	9	5	/
断块	/	2	/
工具	/	10	1
总计	9	18	1

（二）石　　核

1 件。为锤击石核。

标本 06ASG：05，双台面石核。形状不规则，长 40.5 毫米，宽 31.2 毫米，厚 13.8 毫米，重 16.2 克。两个台面，互为剥片面，即台面 A 的剥片面是台面 B，台面 B 的剥片面是台面 A。台面 A 比较平坦，其剥片面（台面 B）鼓起，转向剥片，可见 10 个左

右的剥片疤，其中左侧的片疤较完整，打击点和打击泡阴痕清晰，上部的片疤被台面B的剥片面（台面A）破坏，打击点缺失。台面B在剥片面（台面A）上可见5个左右的剥片疤，也为转向剥片，上部的片疤较完整，右侧的片疤被台面A的剥片面（台面B）破坏，打击点缺失（图四，1）。

（三）石　　片

14件，占石制品总数的50%。可分为完整石片、断片和修片。

（1）完整石片　1件。

标本06ASG：01，柳叶形，长17.8毫米，宽10.9毫米，厚3.3毫米，重0.53克。素台面，三角形，长5.7毫米，宽1.8毫米，石片角121°。劈裂面打击泡突出，同心波和放射线清晰。背面均为石片疤，中部有一纵脊。侧缘薄锐而汇聚，远端尖灭（图二，6）。

（2）断片　9件。长10.4～35.2毫米，平均长21.8毫米；宽9.7～28.1毫米，平均宽16.7毫米；厚1.2～7.8毫米，平均厚3.8毫米；重0.24～7.16克，平均重1.47克。可分为近端石片、中段石片、远端石片和碎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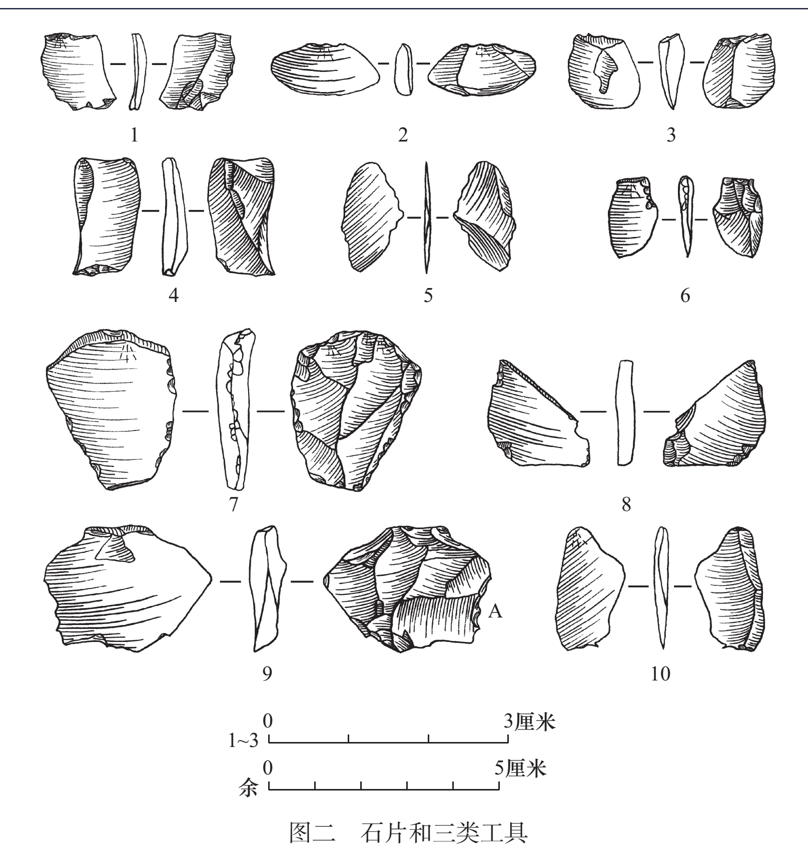
近端石片　3件。标本06ASG：04，倒三角形，长35.2毫米，宽28.1毫米，厚7.8毫米，重7.61克。素台面，形状不规则，长23.2毫米，宽4.8毫米，石片角117°。劈裂面打击泡凸出，半椎体显著，同心波和放射线清晰。背面均为石片疤。两侧缘锋利，在劈裂面和背面均分布有断续的片疤，不能确定是否为使用或者是磕碰所致。远端有小部分折断（图二，7）。标本06ASG：02，形状不规则，长27.3毫米，宽15.4毫米，厚3.4毫米，重0.85克。人工台面，分布有多个小碎疤，形成小平面。劈裂面打击泡凸出，同心波和放射线清晰。背面均为石片疤。侧缘薄锐而汇聚，远端折断，但石片基本完整（图二，10）。

中段石片　1件。标本06ASG：18，三角形，长23.4毫米，宽22毫米，厚4.7毫米，重1.35克。劈裂面微凸，同心波和放射线清晰。背面有一个较大的石片阴痕。近端断口倾斜，远端断口平齐（图二，8）。

远端石片　5件。标本06ASG：21，柳叶形，长24毫米，宽13.5毫米，厚1.9毫米，重0.29克。劈裂面平坦，同心波和放射线清晰。背面均为石片疤。侧缘薄锐而汇聚，远端尖灭（图二，5）。

碎片　1件。在此，笔者将近端和远端均缺失，同时丢失一些其他部分，但仍可以观测到腹面和背面特征的石片归为碎片。标本06ASG：19，四边形，长25.7毫米，宽14.7毫米，厚5.6毫米，重1.55克。近端台面和远端缺失，从背面观测为石片中段的左侧部分。劈裂面微凹，同心波和放射线清晰。背面为石片疤（图二，4）。

（3）修片　4件。长6.5～9.8毫米，平均长8.3毫米，宽7.9～13.8毫米，平均宽



图二　石片和三类工具

1～3. 修片（06ASG：15，06ASG：16，06ASG：17） 4. 碎片（06ASG：19） 5. 远端石片（06ASG：21） 6. 完整石片（06ASG：01） 7、10. 近端石片（06ASG：04、06ASG：02） 8. 中段石片（06ASG：18） 9. 锯齿刃刮削器（06ASG：03）

9.7 毫米，厚 1.7～3.4 毫米，平均厚 2.5 毫米，重 0.1～0.18 克，平均重 0.15 克。

标本 06ASG：15，叶形，长 9.8 毫米，宽 7.9 毫米，厚 1.7 毫米，重 0.13 克。多疤台面，线形，长 6.5 毫米，宽 1.2 毫米，石片角 103°。打击点集中，劈裂面略向背面弯曲，无打击泡和半椎体，同心波和放射线清晰。背面均为石片疤，中部有一纵脊。侧缘薄锐而汇聚，远端终止状态为羽状。石片整体较薄。根据其特点，可能为软锤或压制修理过程中剥离下来的石片（图二，1）。

标本 06ASG：16，扇形，石片轮廓自台面向尾端变宽，长 6.5 毫米，宽 13.8 毫米，厚 2.3 毫米，重 0.18 克。多疤台面，线形，长 6.3 毫米，宽 0.7 毫米。劈裂面打击泡显著凸出，同心波和放射线清晰，背面均为石片疤，中部有一与此石片同向剥片的阴痕。侧缘薄锐，呈扩展趋势，远端外翻为关节状，石片整体较厚（图二，2）。

标本 06ASG：17，圆叶形，长 9.5 毫米，宽 9 毫米，厚 3.4 毫米，重 0.18 克。素台面，透镜形，长 6.1 毫米，宽 2.7 毫米，石片角 110°。劈裂面打击泡凸出，有锥疤，同心波和放射线清晰，背面均为石片疤。侧缘薄锐，近似平行，远端略微外翻为关节状，石片整体较厚（图二，3）。

小结：尺寸普遍较小。由于黑曜岩质地细腻均匀，石片均呈现贝壳状断口。台面有素台面和多疤台面，打击点集中，打击泡凸出，个别有锥疤，同心波和放射线清晰。背面均为石片疤。完整石片远端终止状态有羽状和关节状两类。

（四）工　　具

11 件，包括二类工具和三类工具。

1. 二类工具

4 件。包括刮削器和残器两类。

（1）刮削器　3 件。分别为单凸刃、单直刃和双直刃。

单凸刃　标本 06ASG：06，近四边形，长 33.7 毫米，宽 20.6 毫米，厚 5 毫米，重 2.26 克。以石片为毛坯，略向背面弯曲，素台面，打击泡微凸，背面均为片疤，远端折断。石片一侧边为凸形，即 A 处，经过使用在背面形成细密连续的疤痕，使用刃长为 20 毫米，刃角约为 20°（图三，6）。

单直刃　标本 06ASG：08，四边形，长 22 毫米，宽 20.5 毫米，厚 3.7 毫米，重 0.77 克。以石片为毛坯，多疤台面，打击泡微凸，背面均为片疤。石片一侧边为直刃，即 A 处，经过使用在劈裂面形成细密连续的疤痕，使用刃长为 10 毫米，刃角约为 20°（图三，2）。

双直刃　标本 06ASG：07，五边形，长 38.4 毫米，宽 33.4 毫米，厚 8.6 毫米，重 9.1 克。以石片为毛坯，近端折断，断面远端有一棱脊，远端断口呈屋脊形。劈裂面平坦，背面均为片疤。A、B 两处直刃经过使用在背面形成细密连续的疤痕，使用刃长分别为 13.7 毫米和 18 毫米，刃角为 45°和 30°（图三，5）。

（2）残器　1 件。

标本 06ASG：09，三角形，长 20.5 毫米，宽 23.3 毫米，厚 4.8 毫米，重 1.05 克。以石片为毛坯，劈裂面平坦，背面为片疤。A 处经过使用，在劈裂面形成细密连续的疤痕。此为工具的残段部分，残存刃长为 18 毫米，刃角约为 30°（图三，1）。

2. 三类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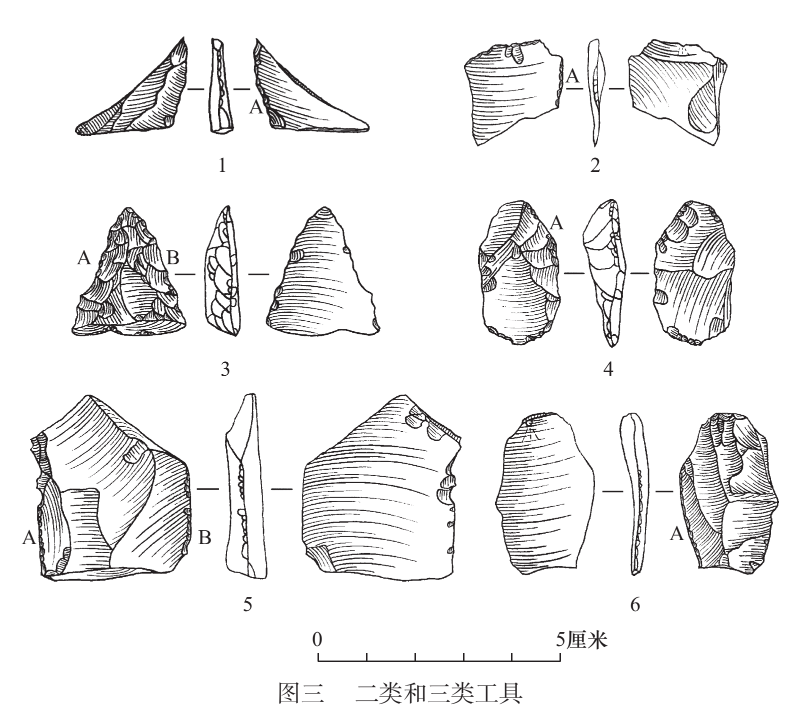
7 件。包括刮削器、石镞和残器三类。

（1）刮削器　2 件。分别为单凹刃和锯齿刃。

单凹刃　标本 06ASG：25，长 71.6 毫米，宽 45.6 毫米，厚 17.8 毫米，重 48.72 克。以厚石片为毛坯，在一侧边正向锤击修理，形成凹刃，即 A 处，刃角 74°，刃长 36 毫米。此件工具为此次调查中最大的标本（图四，3）。

锯齿刃　标本 06ASG：03，长 25.7 毫米，宽 34 毫米，厚 7.7 毫米，重 5.33 克。以

石片为毛坯，远端小部分缺失。劈裂面打击泡微凸，锥疤显著，背面均为片疤。石片的一侧边，即 A 处，其背面可见 3 个连续的修疤，形成锯齿刃，刃长 11 毫米，刃角约为 50°（图二，9）。



图三　二类和三类工具

1. 残器（06ASG：09） 2. 单直刃刮削器（06ASG：08） 3、4. 残器（06ASG：10，06ASG：11）
5. 双直刃刮削器（06ASG：07） 6. 单凸刃刮削器（06ASG：06）（1、2、5、6 为二类工具，3、4 为三类工具）

（2）石镞　2 件。

标本 06ASG：26，凹底三角形，长 21.3 毫米，宽 11.3 毫米，厚 2.8 毫米，重 0.44 克。以石片为毛坯，两面压制修理，修疤细密规整。器身沿长轴方向左右两侧对称。基底修理为凹形（图四，4）。

标本 06ASG：27，等腰三角形，长 22.8 毫米，宽 14.2 毫米，厚 4.2 毫米，重 1.05 克。通体压制修理，修疤细长规整。器身沿长轴方向左右两侧对称。基底平直（图四，5）。

（3）残器　3 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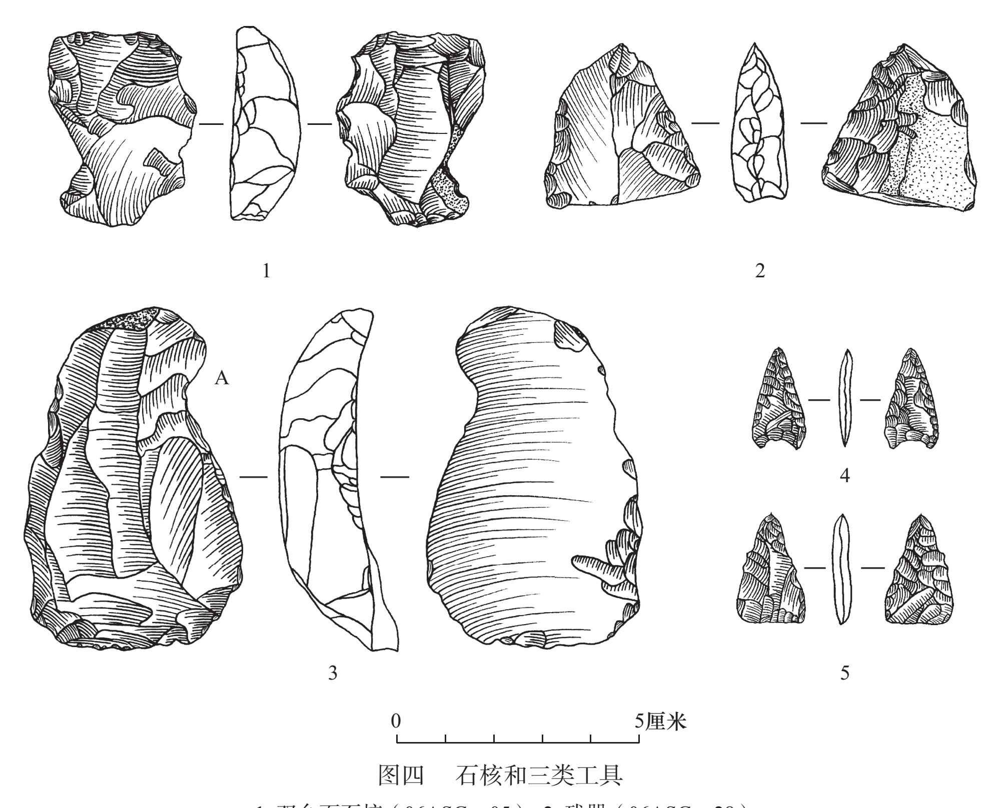
标本 06ASG：11，长 30.1 毫米，宽 17.1 毫米，厚 8.3 毫米，重 3.85 克。以石片为毛坯，近端厚，远端薄。远端为弧形，有一些细密的疤痕。近端一侧边劈裂面，即 A 处，可见 4 个规整的压制修理阴痕，修疤呈细长的羽状，但最顶端的一个修疤被断面破坏。残存刃长 21.1 毫米，刃角 53°。此工具的原型尚不清楚（图三，4）。

标本 06ASG：10，三角形，长 27.1 毫米，宽 23.7 毫米，厚 7.6 毫米，重 3.62 克。片状毛坯，劈裂面平坦。A、B 两处经过正向压制修理，形成陡直的边刃，修疤连续规

整。远端断口不平齐，且破坏了已存在的修疤，此件器物应为废弃状态。残存刃长分别为28.2毫米和28毫米，刃角为65°和50°。两边刃相夹形成尖刃，刃角为68°（图三，3）。

标本06ASG∶28，三角形，长34.4毫米，宽32.3毫米，厚11.3毫米，重9.6克。块状毛坯，其中一面保留部分自然面。A、B两侧经过正、反向锤击加工，分别形成凸刃和直刃。远端断口平齐，且破坏了已存在的修疤，此件器物应为废弃状态。残存刃长分别为35毫米和32毫米，刃角为34°和60°。两边刃相夹形成尖刃，刃角为96°（图四，2）。

小结：工具类型简单，二类工具主要为刮削器（使用石片），三类工具可分辨的为刮削器和压制石镞，另有一些残器。毛坯多为石片，正向、反向和两面加工，修理方式有锤击法和压制法，或许使用指垫法。



图四　石核和三类工具

1. 双台面石核（06ASG∶05） 2. 残器（06ASG∶28）
3. 单凹刃刮削器（06ASG∶25） 4、5. 石镞（06ASG∶26、06ASG∶27）

（五）断　　块

2件。断块是指具有人工痕迹的石块，可能为剥片时沿自然节理断裂的石块或破碎的石制品小块，是工具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难以将其归入某种特定的石器类型。调查所获得的两件标本，个体变异较小，长20.5～26.1毫米，宽11.2～12.4毫米，厚

7.2～8.3 毫米，重 1.61 克～1.62 克，无自然面，人工打击痕迹明确，但未知其意图，应为工具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

三、结语与讨论

（一）黑曜岩的开发方略

调查所得的标本，原料均为黑曜岩。“黑曜岩是在火山喷发过程中由黏性较大的酸性熔岩迅速冷凝形成的火山玻璃……又由于酸性岩浆的火山以爆裂式喷发为主，而在剧烈的火山喷发过程岩浆混合充分，使得形成的黑曜岩质地通常是比较均匀的……常含有少量石英、长石等矿物的微晶、斑晶及骸晶”[4]。总之，黑曜岩具有隐晶质、硬度高、脆性好、无解理、贝壳状断口等特点，使其备受古代石器和装饰品制造者的青睐，米洛斯岛[5]和北海道[6]等地产出的黑曜岩，被远距离输送到其他地区，形成了各个时期的黑曜岩交易网络。例如东北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滨海地区南部、堪察加半岛、库页岛、朝鲜半岛、日本群岛）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铁器时代，展开了一系列的黑曜岩交换活动，这一过程伴随着古人类的迁徙，甚至石器制作技术的传播，运输距离远至 3000 千米[7]。

三道村古城堡遗址地处吉林东部长白山火山群，分布有中生代和新生代火山，中生代火山喷出岩以安山岩为主，伴有流纹岩和厚层黑曜岩，新生代火山喷出岩以玄武岩为主，伴有少量的浮岩和黑曜岩，而遗址距东北的屋脊——长白山天池的白云峰（海拔 2691 米）约 60 千米，可谓是近水楼台，便于直接从产地采集原料。李有骞在长白山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分布图上，以天池为中心，分别以 60、100、200、300 千米为半径画同心圆，结果显示，黑曜岩石器在遗址中的比例随着与天池的距离增加而递减，在 60～100 千米范围内，黑曜岩石器的比例大多超过 70%，而在 200 千米以外，比例则不足 7%[8]。因此可以将天池看做一个黑曜岩资源供应区，在供应区外，黑曜岩的传递受到距离的阻碍，其数量也逐渐递减，这说明吉林东部长白山地区的黑曜岩遗址与天池有密切的关系。三道村古城堡遗址恰好处于 60～100 千米的区间内，所以原料来自天池的可能性极大。Peter Weiming Jia 等人运用便携式 X 射线荧光分析仪对吉林省东部地区发现的黑曜岩石制品进行了测定，并将考古标本和原产地标本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长白山地区黑曜岩考古标本主要来自长白山天池组（Paektusan），少部分来自俄罗斯玄武岩台地组（也称为玄武岩玻璃，Russian Basaltic Glass）和日本白滝（Japan BL），还有一小部分无法确定其产地[9]。俄罗斯学者 Popov 等人对长白山地区的黑曜岩考古标本进行了微量元素分析，识别出 3 个地质化学成分组，分别为长白山 -1（PNK-1）、长白山 -2（PNK-2）、长白山 -3（PNK-3），但并未给出产地的确切位置[10]。所以，也不排除古城堡遗址的黑曜岩来自长白山天池以外产地的可能性。

Masami Izuho 等人将黑曜岩资源分为原生类型（primary）和异地搬入型（secondary），前者在一定的地质学环境中体现（河流上游），例如火山带内分布的流纹岩熔岩流和火山弹，另外原生类型产地附近发现有大量劈裂的砾石和石片，工具和细石叶石核皆由黑曜岩岩屑或角砾制成，尺寸较大。后者主要发现于河床和阶地堆积中（河流中下游），通常以磨圆砾石的形式出现，工具大多由磨圆度高的砾石制成，也存在一些角砾制成的工具，尺寸相对较小[11]。古城堡遗址位于发源于白头山东北麓的五道白河与二道松花江的交汇处，石器尺寸较小，个别工具表面有磨圆砾石的石皮，假若古城堡遗址的黑曜岩源自长白山天池，或应属于异地搬入型，但尚未对遗址所处的地质环境作深入研究，并且石器数量较少，所以黑曜岩资源的获取方式仍需进一步探讨。

以上表明，古人类对黑曜岩作为打制石器优质原料的特性已经具有明确认识，但这些原料是就地取材抑或是远距离交易和交换，是采用母岩岩屑或角砾还是磨圆砾石？仍然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二）剥片技术和修理技术

调查仅发现一件锤击石核，并无砸击石核、石叶石核和细石叶石核，并且从完整石片和断片的特征来看，均为锤击法剥片，所以锤击法可能是此遗址的剥片方法。但同为东部山地的和龙市柳洞遗址[12]和珲春市北山遗址[13]均发现了黑曜岩砸击石核。砸击法通常被认为是为了充分利用优质原料[14]，或者是为了劈开小型的卵石[15]，而黑曜岩砾石普遍较小，所以此遗址有可能存在砸击法技术，但砸击石核和石片未被采集或识别。同样，间接剥片法也是吉林东部长白山地诸多遗址普遍使用的剥片方法，例如和龙石人沟[16][17]、抚松新屯子西山遗址的石叶石核[18]，细石叶技术在和龙青头[19]、和龙石人沟[20]、和龙柳洞[21]、和龙崇善大洞[22]、珲春北山[23]、抚松新屯子西山[24]、安图沙金沟[25]等遗址都有发现，但在本遗址的缺失可能为埋藏过程、遗址性质、生计活动或地表采集等因素所致。

废片分析（debitage analysis）可以影射石核剥片和工具修理技术，也能推断石核剥片和工具修理的各个阶段。废片（debitage），是指“除石核和工具以外的所有石制品，它们一般指石核剥片和工具生产中所产生、丢弃的废料”[26]。在 Andrefsky 的分类系统中，废片包括了完整石片、断片和断块[27]。而 Sullivan 和 Rozen 将废片分为两类，即非工具废片（石核剥片产生的废片）和工具废片（石器加工时产生的废片）[28]。工具废片“在大小、重量和相对厚度来说都远远小于非工具废片”[29]，又可分为硬锤锤击法、软锤锤击法和压制法修理。按照 Sullivan 和 Rozen 的分类系统，本文中的完整石片和断片，即指非工具废片，而修片则指工具废片。三道村古城堡遗址的非工具废片以断片为主，未经过使用的完整石片仅 1 件。石片尺寸较小，人工台面，背面均为片疤，说明石核的剥片率较高。而工具废片，尺寸远远小于完整石片和断片，平均长 8.3 毫米，

平均宽 9.7 毫米，平均厚 2.5 毫米，平均重 0.15 克。其中，标本 06ASG：16，多疤线形台面，打击泡明显凸起，远端终止状态为关节状。06ASG：17，透镜形素台面，锥疤显著，远端轻微外翻为关节状。06ASG：14，打击泡凸出。这 3 件标本较厚，应为锤击修理所致，至于是修理石核还是工具，目前尚未确定。而标本 06ASG：15，台面很窄，但带有许多小片疤，石片较薄且向背面弯曲，远端终止状态为羽状，应为软锤或压制修理。

工具中存在着大量的使用石片，即二类工具，在完整石片或断片锋利的边缘，分布着细密连续的使用疤痕，包括直刃和凸刃。三类工具多以石片为毛坯（只有标本 06ASG：28 为块状毛坯），有 3 件残器，其中标本 06ASG：10、06ASG：11 为压制修理，06ASG：28 为锤击修理。完整石镞（06ASG：26 和 06ASG：27）为压制修理，修疤细长浅平，而刮削器（06ASG：25 和 06ASG：03）为锤击修理。加工方向有两面通体加工、两面局部加工、正向加工和反向加工。刮削器的加工部位一般在侧边，不见端刃刮削器。

从精细加工的压制石镞看，此时的人类已经使用绑柄复合工具，其狩猎能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三角形石镞的装柄方式有很多种，日本绳文时代的考古发现给出了一种解释，“即用沥青或天然漆等，先把石镞胶着在顶端有槽、下部有梃的骨器上，然后再接在到竹、木箭杆上”[30][31]。弓箭，大大提高了狩猎的射程和精确度，箭头也可以随时更换，同时便于携带，是流动性强的工具。

（三）遗址的年代推测

由于标本均采于地表，未有可以判定年代的地层，并且可能由于后期扰动，是多个时期遗存的混合体，同时黑曜岩石器在东北存续的时间很长，吉林市桦甸仙人洞遗址上文化层（1 件黑曜岩石制品）的动物骨化石 ^{14}C 测年数据为距今 34290 ± 510 年[32][33]，为旧石器石器时代晚期，而有些含有黑曜岩石器的遗址甚至进入了早期铁器时代，所以仅能根据其他线索对遗址年代作一个大致的推测。在对古城堡遗址进行调查时，除了黑曜岩石器，也采集到了几件新石器时期的陶片（不确定是否具有共存关系），同时安图县人民政府在 2010 年颁布的《尚未核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目录》中，将三道村古城堡遗址的年代定为新石器时代和金代[34]。

石镞作为东北亚地区常见的石器类型，其锋部和基底形态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有一定的差异，因此可以作为年代标识，进行分类和对比。本次调查采集到两件石镞（06ASG：26 和 06ASG：27），一为凹底三角形，一为平底三角形，通体压制修理。根据张宏彦的石镞分类模式[35]，则应属于两面修整无茎式中的平基和凹基。和龙青头遗址出土 1 件黑曜岩压制石镞，呈凹基三角形，发掘者认为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旧石器时代过渡[36]。红山文化奈曼旗大沁他拉[37]和赤峰市西水泉遗址[38]，共出土有 61

件三角形平基和凹基石镞，原料有碧玉、燧石、水晶和硅质岩，与细石器共存，^{14}C 年代为距今 5485 ± 110 年。嫩江流域在 30 年代和 60 年代的调查，也采集到 100 多件三角形平基和凹基石镞，比较明确的是昂昂溪文化[39]～[42]。呼伦贝尔地区的哈克文化（包括哈克—团结遗址[43][44]、辉河水坝细石器遗址[45]）均出土有三角形两面压制石镞，年代为距今 6000～5500 年。新乐文化有局部修整叶形压制石镞（平基和有茎）和磨制石镞[46][47]，新开流文化包含局部或两面修理叶形压制石镞（平基、凹基、尖基、有茎）和磨制石镞[48]，后者虽有黑曜岩材质的石镞，但形制与此次调查所获石镞相异甚大。总之，遗址内采集到的两面压制三角形平基和凹基石镞，与昂昂溪文化和红山文化出土的石镞性质相似，加工技术也一致，为距今 6000 年左右。

在东西伯利亚地区，贝加尔湖周围的各期新石器文化、阿尔丹河流域贝里卡钦遗址第 5 层（4880 ± 90BP）均出土有三角形压制石镞，远东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中后期的扎伊萨诺夫卡文化（4500～3500BP）也出土了黑曜岩材质的三角形凹基石镞；此外，朝鲜半岛新石器时代中后期的农圃洞遗址以及日本绳文时代的各个时期（10000～2300BP）也出有黑曜岩三角形凹基和平基压制石镞[49]。且不论石镞的发源、传播、风格演变以及与欧洲、西亚石镞形制的差别，就东北亚而言，三角形凹基和平基压制石镞主要流行于新石器时代的各个阶段。

所以，根据采集的陶片以及三角形压制石镞的形制，此遗址的年代可能为新石器时代。

（四）遗址的性质及功能推测

由于没有发掘单位，所以未能根据遗存的空间分布对遗址的性质进行准确的判断，但根据石器组合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还原古人曾在遗址内进行过的活动。遗址内断片和残器较多，并且含有石核和工具修理的废片，表明古人曾在此对石核剥片或工具修理，这些废品由于不再具有实用价值而被丢弃，从而进入考古材料系统。二类工具属于即用即弃（disposable）的物品，它们在使用一次或几次之后就会被丢弃。根据 Schiffer 和 Keeley 的观点，器物在使用遗址或活动相关遗址丢弃，后者如石器在维护遗址丢弃、残次品在生产遗址丢弃，均为原生丢弃（primary refuse），除此之外的其他遗址均为次生丢弃（secondary refuse）[50]～[52]。假设没有经过水流远距离搬运或人为清理，采集到的修理废片则很可能为原生丢弃，根据麦凯乐原理（Mckellar Principle），较小的器物在活动区不易被清理，会作为原生丢弃保留下来[53]。遗址中两件完整石镞应为丢失物品，Feson 和 Scholtz 定义“丢失过程”（loss processes）为：物品与使用者意外的分离，是一种进入考古材料系统的沉积方式，并且遗物在使用过程中的流动性和可维护性（可替换性）越高，丢失的几率越大[54]。石镞作为流动性极高的小型石器，在作用于被狩猎的动物时，极容易意外落空，坠入密集的草丛或树林，从而未被使用者找

回，这也是世界各地发现大量完整石镞的原因。综上，遗址内的石器类型简单，有随意地使用石片、修理工具的废片、丢弃的残器和狩猎时意外丢失的石镞，可以想象史前先民是此地的过客，于此作短暂的停留，或使用一些石片作为刮削器或切割器，来加工其他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品以及食物资源，或对其携带的工具进行简单的维护，过程中会丢弃一些残器，或手持弓箭追逐猎物到此，并未射中目标，箭头却不慎坠落，或者这些活动兼而有之。总之，此地可能是先民狩猎过程中的一个落脚点。

采集的黑曜岩石器散布于古城堡周围，但这些石器与古城堡是否具有同时性，即黑曜岩石器的制造者和使用者是否为古城堡的居民还不能够确定。如若两者不存在联系，那么这些黑曜岩则是流动性极大 的狩猎采集者所留下的遗存。假设同时性存在，那么古城堡应是先民的大本营（定居能力增强），他们在聚落周边流动，进行一些狩猎活动。在一个已经开始驯化农作物的时代，究竟狩猎在当时生计活动中所占的比例有多大，换句话说，人们对农业的耕作和控制能力如何，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农业，人群的流动性有多高，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但必须结合时代和其他背景材料，才能做出判断，因为东北地区的农业不但明显晚于华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并且渔猎经济和狩猎采集经济的延续时间很长，一直到历史时期。严文明先生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松嫩平原的昂昂溪文化“可能是以狩猎为主的漂泊性采集经济文化”，并且各种经济成分在东北各区之间往往有交叉现象[55]。陈胜前教授认为东北地区的史前先民是“最强悍的狩猎采集者”，并且东北地区史前文化适应具有多样性，西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先民具有一定程度的“定居”，生计以广谱的狩猎为主（辉河水坝遗址）；松嫩平原腹地主要为渔猎经济（昂昂溪文化和新开流文化）；东部丘陵地区则发展了初步水平的农业（西断梁山遗址）[56]。古城堡遗址位于东部丘陵地区，具备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但由于并未发现农耕工具，所以尚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其生计方式中包含农业经济成分。

注　释

［1］ 安图县政务信息网．安图概况：地理位置［DB/OL］．http://www.antu.gov.cn/info.aspx?id=5012, 2012-2-1.

［2］ 刘祥，向天元．中国东北地区新生代火山和火山碎屑堆积物资源与灾害［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

［3］ 卫奇．石制品观察格式探讨［A］．第八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C］．北京：海洋出版社，2001.

［4］ 刘爽，吴小红，陈全家．黑曜岩的考古学研究概述［J］．边疆考古研究（第 8 辑），2009.

［5］ 戈登 • 柴尔德著．陈淳，陈洪波译． 欧洲文明的曙光［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2.

［6］ Y. V. Kuzmin, M. D. Glascock, H. Sato. Sources of archaeological obsidian on Sakhalin Island（Russian Far East）［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9, 29（7）.

［7］ Masami Izuho, Hiroyuki Sato. Archaeological obsidian studies in Hokkaido, Japa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s［J］. *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BIPPA)*, 2007 (27).

[8] 李有骞，陈全家．长白山地黑曜岩旧石器的技术模式研究［J］．东北史地，2014（5）.
[9] Peter WeimingJia, Trudy Doelman, Chuanjia Chen, Hailong Zhao, Sam Lin, Robin Torrence, Michael D. Glascock．Moving source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volcanic glass artifact distributions innortheast China using PXRF［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0 (37).
[10] V. K. Popov, V. G. Sakhno, Y. V. Kuzmin, et al. Geochemistry of volcanic glasses from the Paektusan vocano［J］. Doklady Earth Science, 2005, 403 (5): 803-807.
[11] Masami Izuho, Hiroyuki Sato. Archaeological obsidian studies in Hokkaido, Japa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s［J］. 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BIPPA), 2007 (27).
[12] 陈全家，赵海龙，霍东峰．和龙市柳洞旧石器地点发现的石制品研究［J］．华夏考古，2005（3）.
[13] 陈全家，张乐．吉林延边珲春北山发现的旧石器［J］．人类学学报，2004（2）.
[14] William Andrefsky Jr. The geological occurrence of lithic material and stone tool production strategies［J］. *Geoarchaeolog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994 (9).
[15] W. J. Parry, R. L.Kelly. Expedient core technology and sedentism［A］. The organization of core technology［C］.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7.
[16] 陈全家 , 赵海龙 , 方启 , 王春雪．延边和龙石人沟旧石器遗址 2005 年试掘报告［J］．人类学学报，2010（2）.
[17] 陈全家，王春雪，方启，赵海龙．延边地区和龙石人沟发现的旧石器［J］．人类学学报，2006（2）.
[18] 陈全家，赵海龙，王春雪．抚松新屯子西山旧石器遗址试掘报告［J］．人类学学报，2009（2）.
[19] 陈全家，方启，李霞，赵海龙，程新民，郑钟仁．吉林和龙青头旧石器遗址的新发现及初步研究［J］．考古与文物，2008（2）.
[20] 同［16］.
[21] 陈全家，赵海龙，霍东峰．和龙市柳洞旧石器地点发现的石制品研究［J］．华夏考古，2005（3）.
[22] 李霞．和龙崇善大洞旧石器遗址（2007 年）发掘的石器研究［D］．吉林大学，2008.
[23] 陈全家 , 张乐．吉林延边珲春北山发现的旧石器［J］．人类学学报，2004（2）.
[24] 同［18］.
[25] 陈全家，赵海龙，方启，程新民，李有骞，郑钟仁．安图沙金沟旧石器遗址发现的石器研究［J］．华夏考古，2008（4）.
[26] 王春雪．旧石器时代遗址废片分析：回顾与展望［A］．边疆考古研究（第 11 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27] William Andrefsky Jr. Lithics. Macroscopic approaches to analysis (second edition)［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76.
[28] Alan P. Sullivan Ⅲ , Kenneth C. Rozen. Debitage anlysis and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J］. *American Antiquity*, 1985 (50): 755-779.
[29] 王春雪．旧石器时代遗址废片分析：回顾与展望［A］．边疆考古研究（第 11 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30]〔日〕上敷領久．東海地方先史时代の骨角器［A］．岡崎敬先生退官記念事業会編，東アジアの考古と歴史：岡崎敬先生退官記念論集［C］．日本：同朋舍，1987.
[31] 张宏彦．东亚地区史前石镞的初步研究［J］．考古，1998（3）.

[32] 陈全家，赵海龙，王法岗，王春雪．桦甸仙人洞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与孢粉［ J ］. 人类学学报，2013（ 1 ）.

[33] 陈全家，赵海龙，王法岗．吉林桦甸仙人洞旧石器遗址 1993 年发掘报告［ J ］. 人类学学报，2007（ 3 ）.

[34] 安图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官方网站．关于公布安图县尚未核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通知［ DB/OL ］. http://www.atwgx.com/atwtjnr.php?id=26, 2011-12-18.

[35] 同［ 31 ］.

[36] 同［ 19 ］. 3 ～ 9.

[37] 朱凤瀚．吉林奈曼旗大沁他拉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 J ］. 考古，1979（ 3 ）.

[3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占工作队．赤峰西水泉遗址发掘报告［ J ］. 考古学报，1982（ 2 ）.

[39] 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 A ］. 梁思永考古论文集［ C ］.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40]〔 日 〕大贯静夫．昂昂溪采集の遺物について［ J ］. 东京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研究纪要（ 第 6 号 ），1987.

[41] 黑龙江省博物馆．嫩江沿岸细石器文化遗址调查［ J ］. 考古，1961（ 10 ）.

[42] 赵善桐，杨虎．昂昂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 J ］. 考古，1974（ 2 ）.

[43] 赵越．哈克文化在呼伦贝尔史前诸考古学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J ］. 文化学刊，2010（ 2 ）.

[44] 乌恩，刘国祥，赵越，赵玉明．内蒙古海拉尔市团结遗址的调查［ J ］. 考古，2001（ 5 ）.

[4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细石器课题组，刘景芝，塔拉，赵越，白劲松，陈凤山，郭殿勇，敖卫东，达西尼玛．内蒙古呼伦贝尔辉河水坝细石器遗址发掘报告［ J ］. 考古学报，2008（ 1 ）.

[46] 曲瑞奇，沈长吉．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 J ］. 考古学报，1978（ 4 ）.

[47] 于崇源．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 J ］. 考古学报，1985（ 2 ）.

[48] 黑龙江省文物工作队．密山县新开流遗址［ J ］. 考古学报，1979（ 4 ）.

[49] 张宏彦．东亚地区史前石镞的初步研究［ J ］. 考古，1998（ 3 ）.

[50] Michael Brian Schiffer. Archaelolgical context and systemic context［ J ］. American Antiquity, 1972 (37): 156-165.

[51] Keeley, Lawrence. Hafting and retooling: effects o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J ］. American Antiquity, 1982 (47): 798-809.

[52] Michael Brian Schiffer. Formation Processes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M ］.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87.

[53] J. A. McKellar. Correlates and the explanation of distributions［ J ］. Atlatl, Occacional Papers4. Anthropology Club, University of Arizona, 1983.

[54] J. R. Fehon, C. S. Sandra.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artifact loss［ J ］. American Antiquity, 1978 (43): 271-273.

[55] 严文明．东北亚农业的发生与传播［ J ］. 农业考古，1993（ 3 ）.

[56] 陈胜前．史前的现代化——中国农业起源过程的文化生态考察［ M ］.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A Preliminary Study on Stone Artifacts of the Guchengbao Site

Liu Yalin Chen Quanjia

Abstract: The Guchengbao site is situated at Sandao Village, Songjiang Town, Antu County, Yanbian Kore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Jilin Province. It was discovered in 2006, and 28 obsidian artifacts were collected on the ground surface.The assemblage includes cores, flakes, debris, scrapers and pressure arrows. Among the lithic artifacts, flakes take up the largest proportion, some of which may be used directly. Tools appear to be retouched by hard hammer and pressure repair. In general, the shape of the tools are small, no large and giant tools. Because of no accurate dating provenience layer and fossils, these artifacts can not be dated accurately. However, the morphology of arrows seem to have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to those of the Hongshan Culture and Angangxi Culture, indicating that these stone artifacts should belong to the people of Neolithic Age. This paper will briefly describe the stone artifacts and discuss the related issues such as the exploitation of obsidian raw materials, the flaking and retouching technique, the inference of site age and the subsistence.

Key words: the Guchengbao site; obsidian artifacts; small stone tool; Neolithic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店里墓地战国时期人骨研究

韩　涛[1]　李　强[2]　张全超[1]

（1.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长春，130012；　2.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呼和浩特，010011）

店里墓地位于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城关镇九龙湾行政村店里自然村村东南的台地上，地势南高北低。2011 年 5 月、7～9 月，为配合呼杀（呼和浩特—杀虎口）高速公路的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和林格尔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店里墓地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勘探面积约 6 万平方米，发掘清理古代墓葬 39 座，出土有各类随葬器物 62 件。其中战国中晚期墓葬 37 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葬具的墓葬 20 座，葬具多为木棺或木椁。多是单人葬，以仰身直肢葬居多。随葬器物有陶罐、陶壶、铜（铁）带钩、铜环、骨簪、骨剑、玛瑙环、料珠等[1]，为研究该地区战国中晚期的丧葬习俗和文化面貌等提供了系统、翔实的实物资料。

店里墓地的地理位置处于中原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过渡地带，其古代居民族属问题的研究对于了解当时中原人群与北方游牧人群的交流与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将店里墓地出土的全部人骨材料交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人类学研究室，由我们进行了性别和年龄鉴定，并对其中保存较完整的 12 例（男性 6 例，女性 6 例）战国中晚期成年个体颅骨标本进行了观察和测量，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一、观察与测量

1. 颅骨的形态观察

颅骨非测量性形态特征的观察标准依据《人体测量方法》[2]和《人体测量手册》[3]的相关著述。

店里组颅骨标本的形态特征可以概括为：颅形多为卵圆形，眉弓凸度中等居多，额部中等平直者较为常见，颅顶缝结构普遍发育简单。男性乳突普遍发达，而女性则以中

等偏小者居多。眶型以方形为主，梨状孔心形最多，梨状孔下缘以锐形和鼻前窝型为主。鼻前棘多为 Broca Ⅲ级，犬齿窝以中等偏弱为主，鼻根凹多数表现为 0 级和 1 级。翼区除 1 例 X 型外，其余均为 H 型。颧骨上颌骨下缘转角处多欠圆钝，腭型以抛物线型为主，其次为 U 型。腭圆枕以瘤状和嵴状居多，颏形以圆形和方形为主。下颌角区外翻者居多，下颌圆枕和铲型齿均有较高的出现率。

2. 颅骨的测量性特征

从店里组颅骨测量性特征的分类结果来看，该组男性颅骨的主要体质特征可以概括为：一般具有中颅型、高颅型和褊狭的中颅型相结合的颅形特点，中等的面宽绝对值和中等的上面高度，偏高的中眶型和偏阔的中鼻型，中等偏小的上面部扁平度。女性组在主要颅面部测量特征上，与男性组相比，除鼻型稍阔外，其余各项性状与男性基本一致。

鉴于本文颅骨标本上所反映出的简单的颅顶缝、欠发达的犬齿窝和鼻根凹、转角处欠圆钝的颧骨上颌骨下缘、铲型齿较高的出现率等特点，我们认为该组颅骨应归属于亚洲蒙古人种的范围。

二、比较与分析

1. 与亚洲各近代组的比较

为了进一步考察店里战国时期居民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个地区居民在种族类型上的渊源关系，本文选择华北组、抚顺组、爱斯基摩（东南）组、爱斯基摩（勒俄康）组、楚克奇（河滨）组、楚克奇（驯鹿）组、蒙古组、通古斯组[4][5] 8 个近代颅骨组与之进行比较，参加对比的项目和对比组详见表三。本文采用计算店里组与各近代组之间欧氏距离系数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并根据欧氏距离系数绘制聚类图。所有的统计分析都是在 SPSS11.5 for windows 下完成的，所有用于统计分析的数据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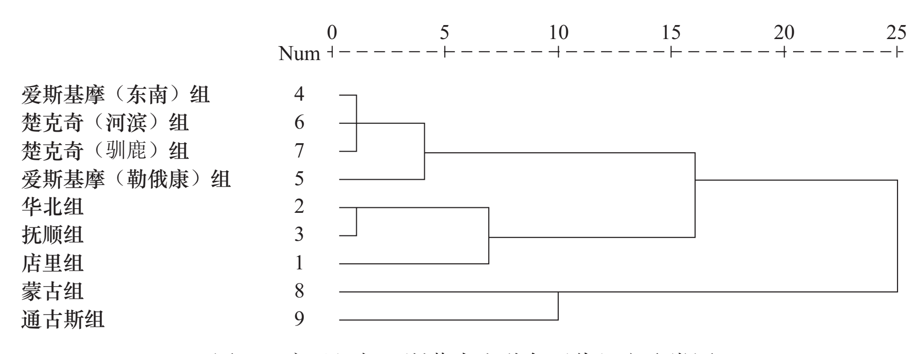
表一　店里组与亚洲蒙古人种各近代组之 *dij* 值（男性）

	1	2	3	4	5	6	7	8	9
1 店里组	0.0								
2 华北组	8.3	0.0							
3 抚顺组	9.5	5.2	0.0						
4 爱斯基摩（东南）组	12.6	10.7	9.3	0.0					
5 爱斯基摩（勒俄康）组	17.2	15.9	13.9	7.2	0.0				
6 楚克奇（河滨）组	15.9	14.7	13.2	5.0	6.3	0.0			

续表

	1	2	3	4	5	6	7	8	9
7 楚克奇（驯鹿）组	16.6	14.1	11.2	5.7	6.7	5.1	0.0		
8 蒙古组	20.6	22.2	20.8	15.6	16.1	12.9	15.4	0.0	
9 通古斯组	23.0	24.3	23.8	18.6	20.5	16.1	19.1	10.2	0.0

根据表一的欧氏距离系数值，我们进一步对其进行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制出聚类图，图一清晰地反映出了店里组与亚洲蒙古人种各个近代组之间的关系，在小于刻度 25 的范围内，9 个颅骨组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聚类群，第一聚类群（1～7 组）除店里组以外，基本上代表了现代蒙古人种中的东亚和东北亚类型群体，第二聚类群（8、9 组）主要代表了现代蒙古人种中的北亚类型群体。而刻度在小于 20 的范围内，第一聚类群（1～7 组）又分为两个小的聚类群，第一小类（4～7 组）代表了现代蒙古人种东北亚类型群体，第二小类（1～3 组）包括了店里组和代表现代蒙古人种东亚类型的群体。店里组与现代蒙古人种中的东亚类型群体聚为一类，可见该组古代居民与现代蒙古人种东亚类型居民在颅骨特征上较为一致。



图一　店里组与亚洲蒙古人种各近代组之聚类图

2. 与各相关古代组的比较

为了进一步探讨店里战国时期居民与东周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其他居民在人种类型上的关系，本文选择了与其在时空范围内相关的东周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毛饮合并 A 组、毛饮合并 B 组、忻州窑子 A 组、忻州窑子 B 组、朱开沟组[6]、新店子组、阳畔组[7]等 7 个古代颅骨组，仍然采用计算欧氏距离系数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并根据欧氏距离系数绘制聚类图，具体项目见表四，比较的结果见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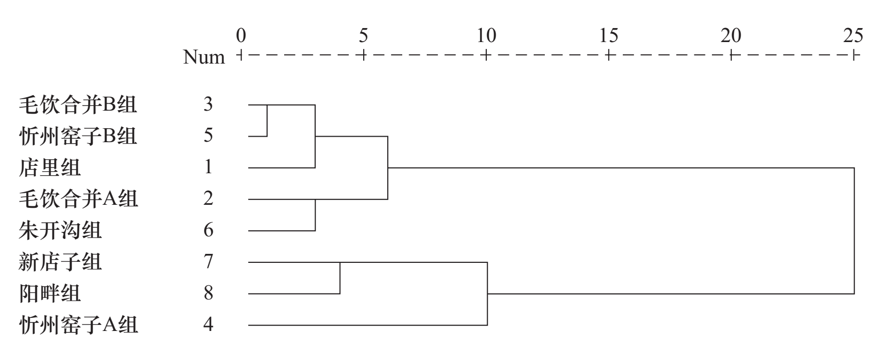
表二　店里组与其他古代组之间的 *dij* 值（男性）

	1	2	3	4	5	6	7	8
1 店里组	0.0							
2 毛饮合并 A 组	8.8	0.0						

续表

	1	2	3	4	5	6	7	8
3 毛饮合并 B 组	6.1	8.2	0.0					
4 忻州窑子 A 组	16.6	12.2	19.2	0.0				
5 忻州窑子 B 组	6.8	6.9	4.9	16.3	0.0			
6 朱开沟组	8.2	6.1	7.8	15.3	8.2	0.0		
7 新店子组	19.5	16.7	22.7	8.8	20.1	18.4	0.0	
8 阳畔组	19.7	16.6	22.1	10.9	19.6	19.4	6.8	0.0

图二直观地反映出了店里组居民与东周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其他相关古代居民之间的关系。在刻度小于 25 的范围以内，8 个颅骨组大致可以区分为两个聚类群，第一聚类群包括：毛饮合并 B 组、忻州窑子 B 组、店里组、毛饮合并 A 组、朱开沟组，基本代表了与现代蒙古人种东亚类型颅骨形态特征相似的群体；第二聚类群包括新店子组、阳畔组和忻州窑子 A 组，代表了与现代蒙古人种北亚类型颅骨形态特征相似的群体。第一聚类群在刻度 5～10 的范围内又可以分为两个小的聚类，第一个小聚类包括：毛饮合并 B 组、忻州窑子 B 组和店里组，毛饮合并 B 组、忻州窑子 B 组属于先秦时期该地区“古中原类型”的古代群体，“古中原类型”居民在先秦时期曾广泛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8]，店里组居民在体质特征上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先秦时期的“古中原类型”居民十分相似；第二个小聚类是代表“古华北类型”居民群体的毛饮合并 A 组、朱开沟组，“古华北类型”居民在先秦时期的内蒙古长城地带广泛分布，应该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原始土著，其中心分布区可能是在内蒙古中南部到晋北、冀北一带的长城沿线[9]。



图二　店里组与其他古代人群关系的树状聚类图（男性）

三、讨论与结论

1. 讨论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位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中段，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

文明的一处重要交汇点，中原人群和北方游牧人群在此相互交流融合。店里组居民的人骨标本是该地区战国中晚期具有代表性的古人类学资料，在探讨该时期中原王朝北拓疆土、移民屯戍与北方游牧民族相互交流过程中的冲突与融合等历史问题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战国时期，诸国纷争，战争频仍，《史记·赵世家》载“今吾国……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邻近的游牧民族经常派骑兵南下侵扰，破坏赵国边地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为了加强边防，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实行军事改革，“……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史记·匈奴列传》）。第二年，赵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公元前305年，赵国又大举攻略中山，设置九原郡和云中郡，“命吏大夫奴迁与九原，命将军、大夫、嫡子、戍吏皆貉服”（《水经·河水注》引《纪年》魏襄王十七年）。史念海认为赵国设置云中郡是为了北防匈奴、西防林胡[10]。赵国攻取大片胡地和中山地区，为巩固边防，将大量中原人迁移到此地屯垦戍边。店里墓地所在处历史上正归云中郡管辖，在与忻州窑子B组、毛饮合并B组等“古中原类型”居民的对比中，显示出在人种类型上有较大的一致性，而店里墓地出土的带钩、陶罐等器物也多带有中原特色，印证了文献中的记载，推测其可能为赵国巩固边疆统治，防御匈奴而从中原迁来的移民。

2. 结论

（1）颅形多为卵圆形，颅顶缝结构普遍发育简单，眉弓、眉间突度和鼻根凹均不发达。乳突中等发达，方形眶型，梨状孔心形居多。梨状孔下缘以锐形和鼻前窝型为主，鼻前棘和犬齿窝均欠发达。颧骨上颌骨下缘转角处多欠圆钝，腭型多为抛物线型和U型，腭圆枕以瘤状和嵴状为主。颏形以圆形和方形为主，下颌角区外翻者居多，下颌圆枕和铲型齿均有较高的出现率。这些性状都显示了其具有亚洲蒙古人种的形态特点。

（2）主要的颅面部形态特征可以概括为：一般具有中颅型、高颅型和褊狭的中颅型相结合的颅形特点，中等的面宽绝对值，和中等的上面高度，偏高的中眶型和偏阔的中鼻型，中等偏小的上面部扁平度。

（3）与现代亚洲各个蒙古人种的欧式距离的计算结果表明：店里组战国中晚期居民与近代华北、抚顺居民在颅骨的基本形态特征方面最为接近。可见，该组古代居民与现代蒙古人种东亚类型居民在颅骨特征上较为一致。

（4）与相关的古代居民的聚类分析的结果显示：在7个古代对比组中，本文标本与毛饮合并B组、忻州窑子B组等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先秦时期的“古中原类型”居民在人种类型上较为一致，而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土著居民“古华北类型”的代表毛饮合并A组、朱开沟组以及代表“古蒙古高原类型”的新店子组、阳畔组和忻州窑子A组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形态学差异。推测该组居民很有可能是赵国为巩固边防而迁来屯垦戍边的中原移民。

表三　店里组与各近代颅骨组的比较（男性）（长度：毫米；角度：度；指数：%）

比较项目	店里组	华北组	抚顺组	爱斯基摩（东南）组	爱斯基摩（勒俄康）	楚克奇（河滨）组	楚克奇（驯鹿）组	蒙古组	通古斯组
1 颅长（g-op）	175.8	178.5	180.8	181.8	183.9	182.9	184.4	182.2	185.5
8 颅宽（eu-eu）	138.6	138.2	139.7	140.7	143.0	142.3	142.1	149.0	145.7
17 颅高（ba-b）	135.8	137.2	139.2	135.0	137.1	133.8	136.9	131.4	126.3
9 最小额宽（ft-ft）	91.2	89.4	90.8	94.9	98.1	95.7	94.8	94.3	90.6
45 颧宽（zy-zy）	134.3	132.7	134.3	137.5	140.9	140.8	140.8	141.8	141.6
48 上面高（n-sd）	73.1	75.3	76.2	77.5	78.2	78.0	78.9	78.0	75.4
52 眶高 R	34.0	35.5	35.5	35.9	35.9	36.3	36.9	35.8	35.0
51 眶宽（mf-ek）R	42.8	44.0	42.9	43.4	44.5	44.1	43.6	43.2	43.0
54 鼻宽（nasal breadth）	26.8	25.0	25.7	24.4	23.5	24.6	24.9	27.4	27.1
55 鼻高（n-ns）	53.7	55.3	55.1	54.6	54.7	55.7	56.1	56.5	55.3
72 面角（n-prFH）	86.5	83.4	83.6	83.8	85.6	83.2	83.1	87.5	86.6
8：1 颅指数	78.8	77.6	77.3	77.6	77.5	77.9	77.2	82.0	78.7
17：1 颅长高指数	77.3	77.0	77.1	[74.3]	[74.6]	[73.2]	[74.2]	[72.1]	[68.1]
17：8 颅宽高指数	98.1	99.5	100.0	[96.0]	[95.9]	[94.0]	[96.3]	[88.2]	[86.7]
52：51 眶指数 R	79.5	80.7	83.0	83.0	80.8	82.4	84.5	82.9	81.5
54：55 鼻指数	50.0	45.2	46.9	44.8	43.0	44.7	44.5	48.6	49.4
9：8 额宽指数	65.8	64.7	[65.0]	[67.5]	[68.6]	[67.5]	[66.7]	[63.3]	[62.2]

注：[ ] 中的数值是根据平均数计算所得的近似值

表四　店里组与其他古代颅骨组比较（男性）

马丁号	项目↓组别→	店里组	毛饮合并 A 组	毛饮合并 B 组	忻州窑子 A 组	忻州窑子 B 组	朱开沟组	新店子组	阳畔组
1	颅长（g-op）	175.8	182.0	182.2	178.5	182.4	179.1	173.8	176.0
8	颅宽（eu-eu）	138.6	142.0	139.8	146.9	139.8	139.9	153.3	152.5
17	颅高（ba-b）	135.8	136.9	142.7	127.9	138.0	138.1	129.2	129.5
9	最小额宽（ft-ft）	91.2	90.5	90.6	91.0	89.1	90.8	94.3	89.5
45	颧宽（zy-zy）	134.3	134.6	135.5	136.9	135.4	135.2	142.1	139.0
48	上面高（n-sd）	73.1	74.5	74.3	78.1	74.4	71.8	73.9	72.0
52	眶高 R	34.0	33.9	33.7	32.4	32.7	33.4	33.1	33.0
51	眶宽（mf-ek）R	42.8	43.8	42.9	42.8	42.9	43.9	44.4	42.1
54	鼻宽（nasal breadth）	26.8	26.0	26.8	26.8	25.9	27.0	27.1	25.1
55	鼻高（n-ns）	53.7	55.1	54.7	56.6	53.8	52.4	56.5	55.2
72	面角（n-prFH）	86.5	86.0	83.6	89.5	82.7	87.3	88.0	84.0
8 ： 1	颅指数	78.8	78.1	76.8	82.3	76.6	78.2	88.1	87.5
17 ： 1	颅长高指数	77.3	75.5	78.9	71.8	75.7	77.6	72.8	73.3
17 ： 8	颅宽高指数	98.1	96.6	101.6	87.1	98.8	98.6	84.6	84.9
52 ： 51	眶指数 R	79.5	77.4	78.7	75.9	76.4	76.0	74.7	78.5
54 ： 55	鼻指数	50.0	47.2	49.1	47.4	48.4	51.7	48.1	45.5
9 ： 8	额宽指数	65.8	64.1	64.9	62.1	63.8	64.2	61.6	58.7
77	鼻颧角（∠ fmo-n-fmo）	142.7	150.2	145.6	150.5	145.1	149.3	148.8	149.0

致谢：本文的研究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民族历史形成过程的生物考古学考察，课题号：11&ZD18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赤峰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的发掘与多学科综合研究，课题号：14ZDB05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青铜—早期铁器时代蒙古高原古代居民体质人类学的综合研究，课题号：11JJD78000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龙山时代晋陕高原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课题号：13JJD780004）；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基金基础性研究课题（课题号：141111）；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课题号：2012QY090）的资助，本文所使用的颅骨标本是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的，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注　　释

［1］ 店里墓地的考古学背景材料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2］ 吴汝康，吴新智，张振标. 人体测量方法［A］.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

［3］ 邵象清. 人体测量手册［A］.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

［4］ 潘其风，韩康信. 柳湾墓地的人骨研究［A］. 青海柳湾［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5］ 韩康信. 沈阳郑家洼子的两具青铜时代人骨［J］. 考古学报，1975（10）.

［6］ 潘其风. 朱开沟墓地人骨的研究［A］. 见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R］.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7］ 张全超.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墓地人骨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8］ 朱泓. 中原地区的古代种族［A］. 见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9］ 朱泓. 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种族［J］. 文物季刊，1998（1）.

［10］ 史念海. 论秦九原郡始置年代［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2）.

A Research on the Ancient Human Skulls from Dianli Cemetery in Helinge’er County, Inner Mongolian

Han Tao　Li Qiang　Zhang Quanchao

Abstract: Dianli cemeter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in the south and central Inner Mongolia region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the human remains found in this area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understanding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s inhabitants and the northern nomadic inhabitants. In this article, 12 ancient human skulls (6 male, 6 female) unearthed

from Dianli cemetery in Helinge’er county, Inner Mongolian were studied.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Dianli group crania show that the racial typ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odern East Asiatic Mongoloids. Som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group are closer to those in the ancient Central Plain Region population. Combined with the historical material, the inhabitants of Dianli are likely to be the immigrants from central plains area for reclaiming agricultural lands and guarding the frontier.

Key words: Helinge’er county; Dianli cemetery; Human skull; East Asiatic Mongoloids

《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译著评述

袁延胜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郑州，450001）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重要游牧民族。它兴起于战国后期，鼎盛于秦西汉时期，衰落于东汉时期，在欧亚草原活跃了300年，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于匈奴的情况，中国的史籍，如《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列传》等多有记载，这是我们了解匈奴的政权组织、社会结构、经济生活等情况的基本材料。但对于匈奴的物质文化情况，在大量考古资料被发现之前，我们知之甚少。1912年夏，俄国矿业勘探技术人员巴勒洛德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市以北、恰克图以南250千米处的诺彦乌拉山谷寻找金矿时，发掘了第一座匈奴墓葬。时隔10年之后的1924～1925年，由前苏联科兹洛夫率领的蒙古——西藏考察团，对诺彦乌拉墓地进行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发现了匈奴墓葬200余座，并发掘了其中的8座带墓道的贵族大墓和4座小墓，墓葬的时代大约在1世纪，墓内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为我们了解匈奴的经济、文化等情况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鲁金科指出了这次考古发掘的意义："首次在诺彦乌拉地区发现了有大量随葬品的匈奴贵族墓葬，这些物质资料能准确地反映两汉时期匈奴的文化面貌。"（鲁金科"前言"第5页）1925年，这批考古资料的简报被刊布，但科兹洛夫在报告书中并没有把发掘的全部结果，特别是该墓出土的珍贵文物公诸于世。1932年与科兹洛夫一起参加发掘工作的特列维尔，在彼得格勒用英文出版了《1924～1925年蒙古北部的发掘》一书，也仅仅简单介绍了墓葬的一般构造，公布了一部分随葬品。1960年，参加整理工作的梅原末治出版了《蒙古诺彦乌拉发现的遗物》一书。这些论著尽管对诺彦乌拉的匈奴墓葬发掘材料做了介绍，但其考古资料却一直没有详细完整的发表过。有鉴于此，1962年，前苏联著名学者鲁金科重新整理，出版了《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一书。该书第一次对科兹洛夫考察团在诺彦乌拉发现的匈奴墓葬资料做了全面系统的介绍，还附有详细的出土器物图版，并全面分析和描述了匈奴的物质文化。《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一书"是截止目前关于科兹洛夫考察团在诺彦乌拉墓地发掘工作最详细的考古报告"（"译者说明"），因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诺彦乌拉匈奴墓地的考古学资料，很早就受到了我国学者的关注。1927 年 8 月，向达翻译的《俄国科斯洛夫探险队外蒙考古发现纪略》一文就发表于《东方杂志》第 24 卷第 15 号。此外，马长寿的《北狄与匈奴》、陈序经的《匈奴史稿》、林幹的《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 ～ 1979）》《匈奴通史》等著作，都提到了诺彦乌拉匈奴墓地的考古资料[1]。足见这批考古资料在匈奴研究中的重要地位[2]。由于完整的诺彦乌拉匈奴墓地考古资料一直没有介绍到中国，因此以前我国学者引用的资料多是零碎的、不全面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学者对诺彦乌拉考古材料的使用。

可喜的是，由长期研究北方民族考古、同时精通俄语的孙危博士翻译，马健博士校注的鲁金科的《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一书，经过 4 年的磨砺，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了（2012 年 12 月版）。该书弥补了《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没有中译本的缺憾，为匈奴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仔细阅读，发现该书有如下特点和价值。

第一，忠实原著。该书上编是鲁金科《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俄文原稿的汉语翻译。该书不但翻译了俄文版的全部十一章内容，即：“匈奴的墓葬”“匈奴的经济”“住所与家具”“服装与饰物”“交通工具”“各类器物的制作工艺”“武器与军事”“匈奴的社会组织”“形象艺术”“宗教信仰与祭祀”“匈奴的对外联系与交流”，而且配发了全部的插图与图版，这不但保证了原著资料的完整性，也为学者利用该书成果提供了权威的资料。而且该书的翻译，严谨科学、文意准确、语句简洁，条理清晰，是一部质量上乘的学术翻译佳作。

第二，超越原著。该书下编是译者对上编原著的补充。由于《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的著者鲁金科并没有参加诺彦乌拉匈奴墓的发掘，对这批考古资料的理解和描述，还存在一定的纰漏。而且继科兹洛夫考察团之后，诺彦乌拉的匈奴考古工作仍在继续，1927 年，蒙古科学院西姆科夫发掘了苏楚克台谷口的 5 号墓和另一座“西姆科夫墓”。1954～1957 年，蒙古考古学家道尔吉苏荣率领的考察队对诺彦乌拉山谷的墓葬群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了一批普通墓葬和有墓道的中型墓葬，获得了不少新的考古资料。2006 年，在俄罗斯科学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的博罗斯马克指导下，苏蒙联合考察队在诺彦乌拉发掘了一座带墓道的中型墓葬，出土了金饰牌、汉式马车、毛毯等精美文物。同时，20 世纪中叶以后，在俄罗斯的外贝加尔地区、蒙古国境内、中国的北方长城沿线等地区发现并发掘了大量的匈奴墓葬。以上这些匈奴考古工作，极大地丰富了诺彦乌拉匈奴墓的考古内容，需要及时补充完善到《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一书中。有鉴于此，孙危博士和马健博士并没有满足于对原著的翻译，而是在上编翻译的基础上，又补充编写了下编。下编内容包括诺彦乌拉墓葬资料整理、译名对照表、与匈奴有关的参考文献三部分。该编厘清了一些墓葬资料、丰富了学术信息，极大地弥补了原著的一些不足。如在诺彦乌拉墓葬资料整理部分，孙危和马健按照我国考古学报告描述范例，对诺彦乌拉墓地的考古资料进行了重新整理，补充了一些考古资料，完善了鲁金

科原书的遗漏和不足。

第三，注释精确。译者并不仅仅局限于上编部分的翻译，而是在翻译的同时还对原稿加以解释、说明和补充，所有这些都以译者注的形式附于页下。页下注不仅对原著描写不清楚的地方作了大量补充说明，纠正了原著的一些错误，而且还把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与信息补充进去。因此这种注释形式非常好，它不仅使译稿的原貌得以保持，而且使原稿的科学性大大提高，有利于中国学者对这批考古资料的充分利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原稿作者对中国历史文献不太熟悉，因此在引用中国史料时基本采用的是俾丘林的翻译本，而俾丘林的译本个别地方有误，这就需要进一步核对原文。因此，孙危博士、马健博士在注释时，不但指出了原文的出处，而且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的原文也注释出来，有利于读者的阅读与判断。

孙危、马健二位博士多年从事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有较深的学术素养，孙危博士出版有《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马健博士出版有《匈奴葬仪的考古学探索：兼论欧亚草原东部文化交流》（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正是由于二位博士对北方草原民族考古的熟悉，才使得《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一书的翻译，既保留了原著的原貌，又补充了近年来的新的学术成果，使该书成为翻译外国学术著作的一个成功典范。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该书质量上乘，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该书同样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原文校对有误。如第十章“宗教信仰与祭祀”中引用《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云：“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103 页）其中误把“三龙祠”翻译成了“三岁祠”。这可能是没有认真核对《后汉书》原文所致。

第二，注释的体例有待统一。在对原著中引述中国史料的注释中，有的不但指出了出自俾丘林翻译本的卷数和页码，而且以［译者］的形式补充了《史记》《汉书》等的原文，但有的注释则只有前者，而没有补充原文（如第 35 页，第 73 页、第 76～85 页、第 104 页、第 107 页的注释就存在这种情况）。

第三，个别地方应该注释的未注释。这种情况大致有：①原文有错误的。如第七章“武器与军事”中提到诺彦乌拉一墓葬出土“一件汉式的尺子，其长度正好符合汉制的一尺长度——29.5 厘米”（74 页），这个表述是错误的，因为根据出土器物测量，西汉、新莽、东汉时期的一尺基本都是 23.1 厘米[3]。因此，此处应该加注说明原文的错误。再如第十一章“匈奴的对外联系与交流”提到“当匈奴得知汉朝要派人出使月氏后，他们表示出了不解”（112 页）原作者可能对《史记·大宛列传》中“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一句理解有误。实际上，匈奴单于的这句话表达的是对张骞出使月氏的愤怒和不满。因此文中的“不解”应为“不满”。②应补充一些学术信息。如第四章“服装与饰物”中提到了伞盖，“这种设想被诺彦乌拉墓葬中发现的伞盖边缘的青铜部件所证实。这种伞盖边缘的青铜部件也曾在中国河北省战国时

期的遗存中发现过。另外，辐条上涂漆的痕迹也证实了匈奴的伞盖确实起源于中国。”（55 页）这里提到的“河北省战国时期的遗存”一句，如果加上注释，补充一些学术信息，可能更好。③应该补充的一些铭文资料及史料原文等。如第一章“匈奴的墓葬”中提到：“幸运的是，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带有铭文的漆耳杯为我们提供了比较精确的年代。这些铭文已被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解读。在漆耳杯底部的铭文明确地写着其由上林苑制造，而且还指明了其制造的年代和制造者。”（23 页）这里最好把漆耳杯的铭文以注释的形式，全部抄录下来，这样可能会更有利阅读与研究。再如第二章“匈奴的经济”提到“中国史料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匈奴人会遗弃鸟兽大量灭绝的大片土地”（31 页），此处最好加以注释，补充史籍的原文[4]。

当然，瑕不掩瑜，《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的翻译与注释无疑是非常成功的。该书作为一部重要的匈奴考古著作，它的翻译与出版，必将对匈奴考古、北方民族史和汉匈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注　释

[1] a．马长寿．北狄与匈奴［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62．

b．陈序经．匈奴史稿［M］．（该书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写成，60 年代初期补充）．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c．林幹．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C］．北京：中华书局，1983．

d．林幹．匈奴通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

e．马利清．原匈奴、匈奴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

f．潘玲．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g．乌恩．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匈奴时期［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h．单月英．匈奴墓葬研究［J］．考古学报，2009（1）．

[2] a．田广金，郭素新认为：“诺音乌拉匈奴墓的发掘，将匈奴考古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见田广金，郭素新．北方文化与匈奴文明［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b．陈序经认为：“诺彦乌拉古墓地的发现，在蒙古考古学研究史上起了极大的作用．这是 20 世纪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见陈序经．匈奴史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c．魏坚认为：“在大量的匈奴考古资料中，诺彦乌拉墓地的发掘资料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这处年代在公元前 1 世纪至公元 1 世纪阶段的匈奴墓地，反映的正是匈奴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的物质文化面貌，是这一阶段匈奴历史的一个缩影，墓内出土的大量随葬品为研究匈奴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汉匈关系以及中西交通等方面内容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见孙危翻译．马健校注．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M］．北京：中华书局，2012，魏坚“序”．

d．马健根据以往考古调查与发掘的匈奴墓葬的分别情况，同时结合自然地理和汉文典籍的记载，将匈奴及其相关遗存划分为 1．中心区，2．边疆区，3．互动区，4．汉地区。其中将诺彦乌拉墓地划为“中心中区．”马健．匈奴葬仪的考古学探索：兼论欧亚草原东部文化交流［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

[3] 丘光明，邱隆，杨平．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4] 这句话的原文出自何处，不得而知，有可能是鲁金科对中国史籍的误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未见“匈奴人会遗弃鸟兽大量灭绝的大片土地”之语的记载．
关于匈奴“弃地”，只在冒顿打东胡时提到过。《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载：“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东胡使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群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于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柰何予之！’诸言予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记载与此相同．这条史料是说冒顿单于对土地的重视，而非遗弃土地．
引起鲁金科对中国史籍误读的也可能与晁错所言有关．《汉书》卷四九《晁错传》载：“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但晁错是以形象的比喻，描述匈奴像“飞鸟走兽”一样，“草尽水竭则移”，来说明匈奴逐水草而徙的特点。这段话中也没有“匈奴人会遗弃鸟兽大量灭绝的大片土地”之意．

Commentary on the Translation of Huns Culture and the Large Tomb of Nuoyanwula

Yuan Yansheng

Abstract: Former Soviet scholar C.I. Rudenko’s Huns Culture and the Large Tomb of Nuoyanwula is a famous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mongraph about the Xiongnu. The book describes the materials of the Hun tombs of Nuoyanwula which discovered by Kozlov’s mission in 1924 - 1925, and gives a detailed analysis and description of the Xiongnu's’ material culture. The book is a translation of Dr. Sun Wei, Dr. Ma Jian proofreading, published by Zhonghua Book Company in December 2012. The book is based on the original but also a lot supplemental material. Its publication will further promote Xiongnu research and ethnic groups found north of China.

Key words: Huns; the Large Tomb of Nuoyanwula; Qin and Han: Xiongnu Dynasties; C.I. Rudenko

考古“三大杂志”的创办、改名、停刊与复刊

齐东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100871）

学术杂志的出现是学术史上的大事。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刊物办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素有“三大杂志”之称，即《考古学报》《考古》《文物》。三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是中国考古学兴衰变化的缩影，杂志本身的创办、改名、停刊、复刊，也直接体现了中国考古学走过的历程，杂志反映的一些现象和事件已不光是考古学本身，还涉及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

中国汉语的“考古”一词，原本是指宋代以后的金石考据，现代西文的Archaeology翻译对应为“考古”，概念容易混淆。早年梁启超说起现代考古学与传统金石学的关系时说：“考古学在中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起自北宋时代”。梁启超具有现代学术思想，可这一表述却很模糊。宋代出现的刘敞《先秦古器图碑》、吕大临《考古图》、王黻《宣和博古图》、赵明诚《金石录》、欧阳修《集古录》等一批著作，描绘古器物的形状、尺寸、重量以及摹写铭文，有的还指出收藏者和出土地，编撰体例形成一定规范，“金石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出现了。现代考古学是以科学发掘的遗迹、遗物和遗痕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与宋至清代的“金石学”（或称“考古”）有本质不同。是否可以这样说，前者是一种古老的学问，而后者是一个现代的学科。区别在于，现代考古学不仅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并有一套方法、理论体系。作为现代学术，考古学还出现了专业性定期的学术刊物。

中国现代考古学出现不久，于1929年便创办了《安阳发掘报告》，这部既不像书也不像杂志的刊物，不收外来稿件，只发表安阳殷墟发掘的工作简报和有关研究文章，从学术上说这是前所未有的考古书刊，与宋代诸多的金石学著作完全不同。最前冠以“安阳”不奇怪，因为当时的考古发掘是小范围工作，带有尝试性。名称上突出“发掘”一词也能看出，它以一种崭新的面目出现，首次把中国自己的科学田野考古发掘成果公诸于世，意义重大，它点燃了考古学的学术火花，一直燎原至今不息。

《安阳发掘报告》至1933年6月在上海出版，共出四册。随着考古调查发掘范围的扩大，《安阳发掘报告》已经涵盖不了当时考古学家们的工作，以单一地点命名的学术

刊物，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于是 1936 年《安阳发掘报告》改名为《田野考古报告》，两者之间虽有极为密切的承袭关系，但改名后却标志着中国考古学不再是个别的发掘，初步形成的学科，而是以独立发展的面目出现，第一个综合性考古学专业杂志正式诞生。

一个杂志的改名不是件小事，小者反映了编辑方针的变化，大者是学术发展甚至社会背景的变化。李济在改名后的《田野考古报告》的《编辑大旨》中指出："田野考古工作，本是史学之一科，在中国，可以说，已经超过了尝试阶段了。这是一种真正的学术；有它必需的哲学基础，历史的根据，科学的训练，实际的设备。田野考古的责任是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供给史学家采用，这本是一件分不开的事情；但是有些有所谓具现代组织的国家，却把这门学问强分为两科，考古与历史互不相关；史学乃是政客的工具，考古只能局部的发展：如此与史学绝缘的考古学是不能有多大进步的。"

这段话很能反映当时站在学术界前沿的学者对考古学的认识。在当时许多人连甲骨文的真实性都不肯承认的情况下，通过科学的田野发掘得到无可非议的真实资料，证明了考古学"是一种真正的学术"。这句话似乎像一个宣言，宣布考古学不仅有别于传统的金石学，而且是一种"有哲学基础，历史的根据，科学的训练，实际的设备"的新兴科学。对于考古与历史的关系，李济的回答也十分肯定，他强调了两者密不可分，提出要把田野考古资料整理出来，供给史学家采用。这一观念与稍早些时候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所说的"考古是学术界的仆人"很相似。

然而在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田野考古报告》，只出版一期就因中国发生的抗日战争被迫停刊。庆幸的是，《田野考古报告》没有因战争的爆发成为流产儿，它以顽强的生命力在 10 年后的 1947 年重新复活，不过改名为《中国考古学报》（1947～1949 年，3 册）。复刊后的杂志收录的 6 篇文章的作者，两位已故，两位改行，两位抱残守阙的人的健康也被战争折磨虚弱。此时的李济也不能肯定杂志的命运如何，以喜悦和辛酸的心情再次撰写了前言，他用悲观的语气说道："田野考古工作的恢复，在最近的将来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于是提倡学者们暂时多写些"靠背椅子"的考古文章。

中国第一部考古学术杂志的改名，与考古学的自身发展有关，也与社会大背景紧密相连。李济的话不幸言中，抵御外来侵略的抗日战争，迫使殷墟等考古发掘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因内战一时难以恢复。好在有很多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杂志可以维持，然而只好刊登以"靠背椅子"上写出的考古文章为主，杂志的名字亦顺其自然，去掉了"田野"两字，改称《中国考古学报》。显然这是鉴于当时田野发掘暂停，再冠以"田野"二字已不合适，但从《安阳发掘报告》、到《田野考古报告》、再到《中国考古学报》，清晰地反映了中国早期考古学的状况，透露了中国考古学由小范围的发掘扩大到更广阔的区域，又由单纯的田野发掘开始了更多的研究，不得已而为之的室内"靠背椅子"上写出的考古文章，也多是新观念和以考古发掘为基础。

1949年中国政治发生巨大变革，原来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几近神奇的是，这个人文领域的学术杂志，没有因为两党之争，政权的变革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消失。《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仍由梁思永、夏鼐编辑出版，这是承上启下的一册。其后1951年出版的第五册，改由新中国的中国科学院编辑。新旧政权更替之初，中国考古学仍旧继承着原有的学术规范和传统，杂志沿用原来《中国考古学报》的名称，编辑按原来的次序，从第五册编起，体现了学术发展和连续性，没有向其他许多学术刊物一样，或夭折、或重打锣鼓另开张。

1953年这本杂志迎来了第四次改名，去掉了原来的“中国”二字，称《考古学报》。对这次刊物改名没有申明大意，但似乎是人们意识到中国的考古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不再是一门单纯的乡土科学，也不是一个封闭的学问，去掉了“中国”二字，不仅标志这门学科的逐渐成熟，也预示着中国考古学将要走向世界。实事上从此以后杂志也开始介绍外国的考古情况。

《考古学报》以崭新的面目面对读者。饶有趣味的是，新改名的《考古学报》，首篇刊登的是《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及经济问题的著作与苏联考古学家们底任务》一文，翻译的是《苏联考古学》第十七卷的社论。意图已经明显，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将作为新中国历史和考古学的理论指导思想，考古学术刊物从此也打上了政治烙印。

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中，在全国各地发现了大批古代遗迹遗物，一本《考古学报》根本无法报道突然增加的考古发现资料。1950年文化部文物局创办了《文物参考资料》，为不定期内部刊物，次年公开发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5年又创办了《考古通讯》，为双月刊，用来发表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新成果。

新出现的这两个杂志，由于学术发展的需要不久也改了名，与早年《考古学报》的改名有相似之处。1959年《文物参考资料》改名《文物》,《考古通讯》改名《考古》。不难看出，去掉了“参考资料”和“通讯”的字样，标志着由原来的简单介绍和新闻报道性质变为正式的学术刊物。改名的《考古》第一期开篇“编者的话”说道：“希望能够做到适应考古工作的新形势担负讨论建立我国考古学体系、交流工作经验、开展学术批判以及报道考古工作动态等方面的任务”。还提出几个意见或口号：“争取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基本上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考古学体系”,“在整理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九年来收集的资料当中把旧的考古学系统、理论推翻”。在提倡考古综合研究时，提出“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

当时的中国报刊有个特点，有时会以编辑部等名义刊载社论，或没有明确作者的评论员文章，却具有纲领性、权威性，带着政治色彩和领导层的意图。考古专业杂志也如此，与考古学无直接关系的如“毛主席致电吊唁斯大林逝世”“万岁！伟大的十月革命，光荣的十月革命”等新闻、政治文章也常常出现。这一现象在60年代中期达到极致，1966年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几乎所有报刊都同时转发了姚文元的《评

“三家村”》，这篇奇文转载之多，堪称中国之最，或许创下了空前绝后记录。《评“三家村”》与考古学和许多专业本身并无关系，却与学术界和广大学者的命运紧密相关，它像是一枚重型炸弹，轰平了所有刊物，几经波折，摇摇起步的《考古学报》，连同姊妹杂志《考古》《文物》，停刊实属在劫难逃，这不光是考古学科杂志的命运。

1972 年，中国考古学乃至整个学术界，甚至整个社会发生了一件几乎难以想象的事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直接写报告，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笔批准，《考古学报》《考古》《文物》三大杂志复刊。这不仅是当时人文社会科学中最早复刊的刊物，也是当时唯一能见到的学术杂志。普普通通的学术刊物出版，竟要由国家总理的亲笔批示。

“文化大革命”中经过了惊心动魄的“破四旧”洗礼，对颇有些怀古之幽情的《考古学报》《考古》《文物》杂志，给予了令人不安的宽容，也许是当时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陈伯达、康生等对文物独特的癖好？也许是有周恩来的亲笔批示的力量？也许是广大人民喜爱？也许是国内国际政治上的需要？也许各种因素都有，或更加复杂，总之，三大杂志在动乱中复活了，该是悲伤中的庆幸。

在那疯狂的年代里，三大杂志复刊是奇迹，是意外。腰折五年的杂志一经出版，便成为一朵奇葩。当时在大批判、大字报满天飞的中国，三大杂志犹如万绿丛中一点红，显得娇娇俏俏，很快创下了意想不到的发行数量，学术性很强的专业性杂志，当时竟成为普及社会的超级畅销书，其程度几乎令人目瞪口呆，连工厂、医院甚至幼儿园都争相订阅，考古类的学术杂志能得到如此殊荣，怕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了。

其实道理十分简单，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各种杂志停刊、大学停办、图书馆封闭，书店报刊里能看到的除了红彤彤的革命书籍，人们都希望能看到些别样文字，三大杂志突然出现，像是给文化需求接近绝望时的人们注入了一针兴奋剂，管他看懂看不懂，凡识字的人都要换换口味，这是本能式地对知识的渴望。于是，三大杂志创造了以前没有、以后也很难再出现的最高发行量。

尽管畅销的三大杂志，与当时接连不断的“批林批孔”“批儒评法”“评水浒”等政治运动发生了关系，但是，尽管有些应景文章并没得建立在可靠的资料之上，却也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兴趣，三大杂志体现出特有的社会功能，至少还给人们带来了某些趣味性。在一个动荡不安、不要知识的年代里，考古学反而在中国出现一次空前的传播，也许是歪打正着。

复刊的三大杂志，虽是专业学术刊物，但面孔多少有些奇特，杂志的文章目录印在最后一页，政治气氛极为浓厚。人们都可以查阅到，《考古》以红色封面复刊后的第一页，大字刊登着毛主席语录：“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第一篇刊登的是编辑部文章，题为《坚决贯彻“古为今用”的伟大方针努力办好考古学刊物》。

考古学比其他人文学科领域更接近于自然科学，历次政治运动对它的影响相对较

小。客观地说，在胡批乱斗的“文化大革命”中，复刊后的杂志尽管为政治服务的倾向极浓，也有些跟风文章，但许多聪明的学者巧妙地避开、绕开那些毫无道理的政治训导，发表了一些“纯学术”的论文，借得这一片园地来发挥学术才能。就连写文章常常赋有激情的郭沫若，这时也采用另一种写作方式，他的《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本来是对新疆吐鲁番唐墓出土的一个十二岁小孩练字学习所写的诗词进行研究，但在整个文章结束后，十分突兀地加上一句话：“老沙皇的子孙们！你们看看，我所写的《论语郑氏注》和我所写的五言诗吧！”看上去像是振臂高呼。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读起这没头没脑的话难免莫名其妙。在当时的中国学界，私下流传着写文章要学会“穿衣戴帽”，即学术研究心得写出后，要再进行一次政治包装，这样才能发表，才能免遭批判。如果我们找几篇当时的文章掐头去尾，读起来不会感到缺少什么，甚至更通顺，对这种文章的写法，中国学者彼此心照不宣。以今天的眼光看，当时的一些文章措辞的确令人啼笑皆非，结论牵强附会，风马牛不相及者也有。写文章到了害怕“顺得姑心违嫂意”的程度，实在令人同情。后人应该对那黑白颠倒岁月中出现的带包装的学术论文给予包容，了解那场史无前例浩劫的人，能理解学者们有价值的考古学论文，像是苦涩中发出的微弱呐喊，却在黑暗中撕裂出一线光明。

复刊后的考古学术杂志，当然还延续了发表“社论”和重要政治新闻的特点，如《学习大寨根本经验，努力做好考古工作》(《考古》1976年1期。)，农业上的大寨与考古是否有关无需论述，但口号中显示出在特定时期考古学术上的豪迈。政治对学术刊物的干涉不可避免，这种无奈反倒使人轻蔑了杂志上刊载的如“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类的文章，因为这是与考古学术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的新闻。

不必讳言，“文化大革命”中的考古学，在杂志中也有篡改历史的文章，这给后人留下了必需吸取的警示，考古学家责任重大，应该谨慎从事，迎合政治的褒贬引起对史实的抹杀，等于参与了犯罪的行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各行各业拨乱反正，大量书刊杂志如雨后春笋复刊、创刊，人们对读物有了自己的专业、兴趣选择，逐渐在旧书市、街头书摊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的三大杂志，封面常印着机关、工厂、中小学甚至幼儿园的公章，开始作为不需要的旧书、甚至废纸出售。然而考古学专业性杂志，由于刊登着各地田野发掘报告，具有永远的资料性质，这时的考古初学者们有幸在旧书摊贩中以极为便宜的价格买到。

《考古学报》1978年恢复了每年4期。《考古》1983年恢复了每年12期，《文物》一如既往也是12期。三大杂志的学术性更强，所不同的是读者群迅速减少，原本不该出现的热潮逐渐降温，销量减少、恢复了本来该有的正常，这并没什么遗憾，失去了往日的火爆，迎来的却是真正的辉煌。

The Founded, Renamed, Discontinued and Reopened of The Three Journals of Chinese Archeology

Qi Dongfang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academic journals is a major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rcheology journals, known as “the three journals,” said the “Journal of Archeology”, “Archeology”, “Heritage” is the journal longest and most influential academic publications. Three articles published on Chinese archeology is a microcosm of the rise and fall change, the founder of the magazine itself, renamed, ceased publication, reopened, but also directly reflects the Chinese archeology through the course, the magazine reflects phenomena and events have not only the archaeological science itself, but also to the broader social context. Archeology generated at the 1920s generation and 50 years of its development is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three major publications and renamed. “Cultural Revolution” ceased publication and mass distribution first reopened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a strong political atmosphere, which is not a normal social phenomenon. Today, three scholarly journals stronger,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e boom was not supposed to occur gradually cooling down, the others have been returned to normal, it did not any regrets, lost its former hot, but it is truly usher brilliant.

Key words: archeology; “the three journals”; the Founded; renamed; discontinued and reopened

彩版一　铜觯与牛车鞍马图



1．铜觯与其他酒器体量对比图（戴家湾出土）



2．大河口墓地铜卣（M1：276）及内置铜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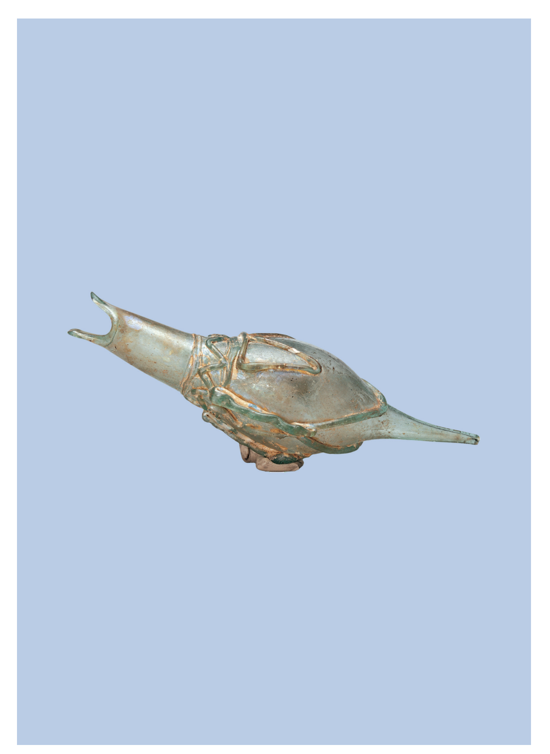


3．西千佛洞北周造像第六窟东侧下牛车鞍马出行图



4．敦煌三〇三窟（隋代）东壁北侧中层牛车鞍马出行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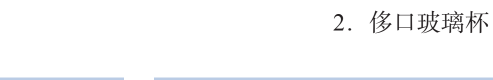
彩版二　冯素弗墓出土玻璃器



1．鸭形玻璃注



2．侈口玻璃杯





3．玻璃碗



4．玻璃钵

彩版三 《南赡部州大契丹国兴中府东北甘草埚建塔葬定光佛舍利记》碑铭



1．碑铭阳面碑文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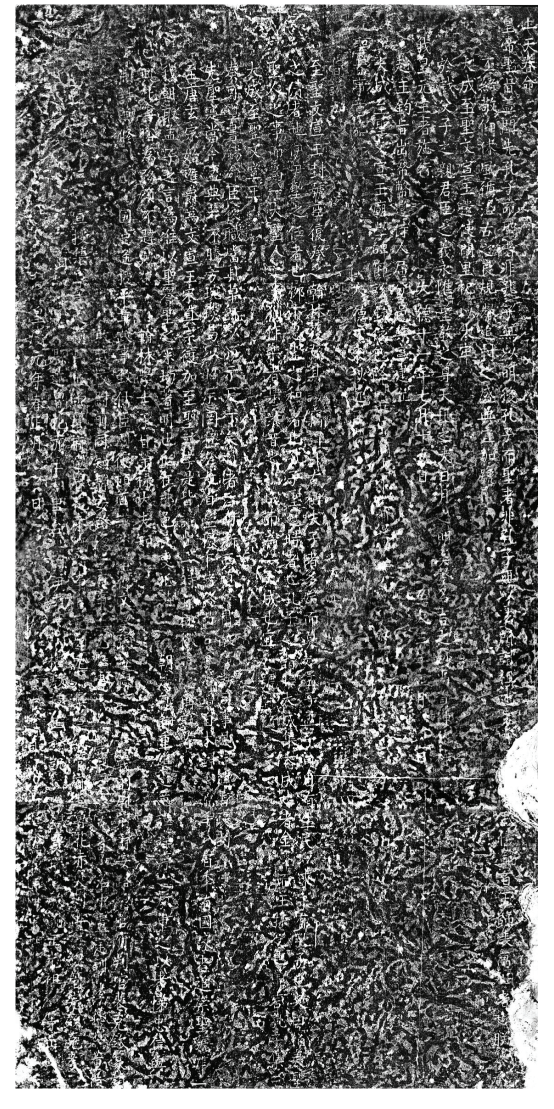


2．碑铭阴面碑文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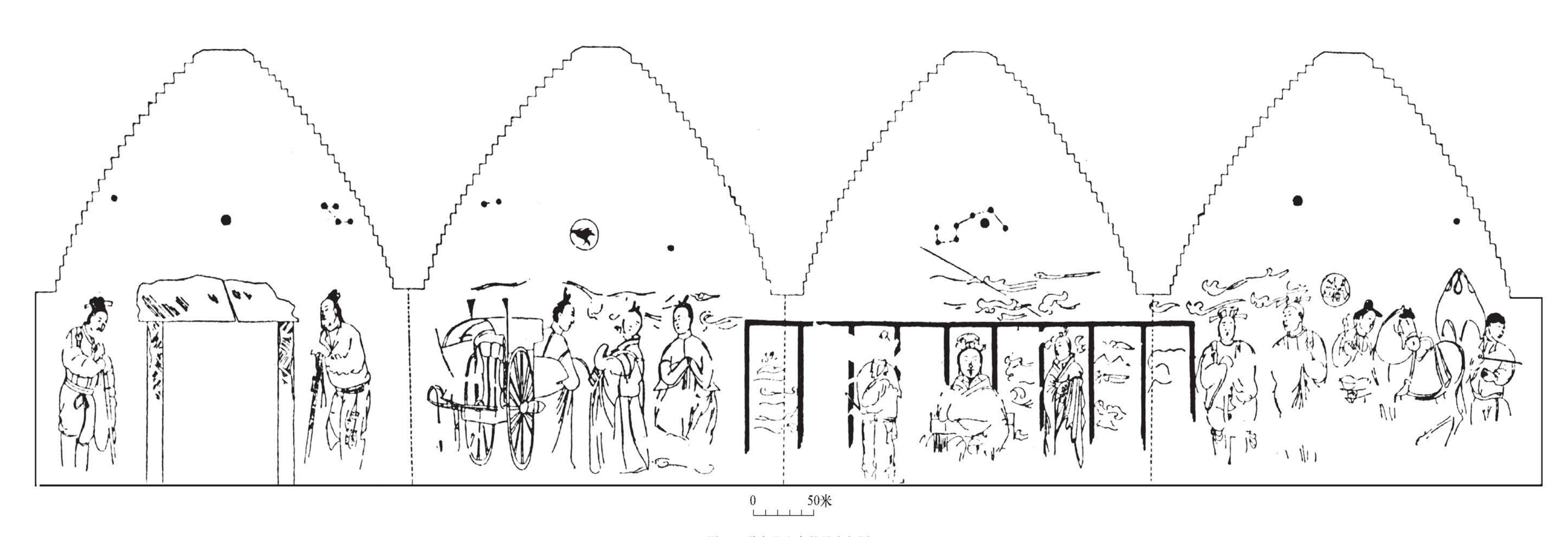
彩版四　石刻照片与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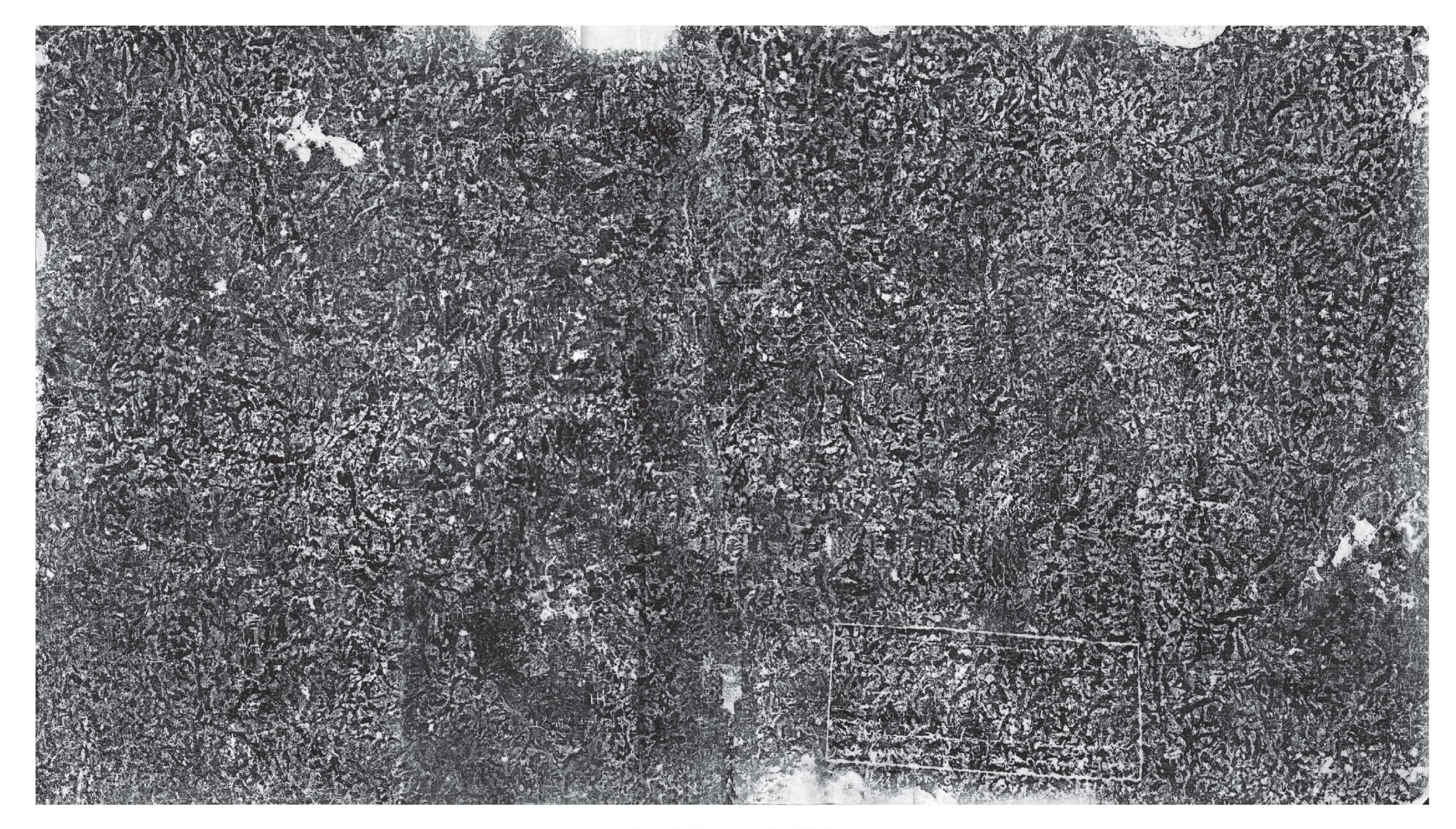
1. 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石刻二照片



2. 元代《集宁文宣王庙》碑碑阳拓片



图三　道贵墓牛车鞍马出行图



图一　元代《集宁文宣王庙》碑碑阴拓片

征 稿 启 事

《北方民族考古》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科创建十周年之际创办的学术刊物。本刊本着加强学科建设，增进学术交流，普及考古文博知识的宗旨，以北方民族考古为主要特色，同时兼及中原和长江流域的考古学研究。

为及时反映最新考古学研究成果及田野考古新材料，本刊拟每年出版一辑，目前拟设置的栏目包括：①考古新发现；②研究与探索；③考古新视野；④考古与科技；⑤书评等。稿件内容以北方民族考古为主，同时也欢迎其他研究领域的优秀成果投稿。

稿件具体要求：①论文不超过 15000 字，考古发掘报告字数可适度增加；②来稿请附中、英文摘要（300 字左右）、关键词（3～6 个）作者简介及邮编；③注释统一采用文后注，注释格式请参见《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的样式；④译文需取得原作者的授权，以免发生版权纠纷。

《北方民族考古》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刊用意见将在收稿后 3 个月内通知作者。本刊不收取任何版面费，一经刊用，即奉样刊。

联系人：李梅田

电子邮件投稿地址：limeitian@hotmail.com（如邮件超过 20M，请发至 578134457@qq.com）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 号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邮编：100872

(K-2208.31)





www.sciencep.com

ISBN 978-7-03-045770-7

定　价: 108.00 元